

韩国学术译丛一

「韩国」卢启铉 著

高丽外交史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永林
封面设计：金胜铉



ISBN 7-5634-1606-4



ISBN 7-5634-1606-4/D·128
定价：58.00 元

本书由

韩国大象文化财团资助出版

韩国学术译丛

出版说明

我社素重视移译韩国学术著作,以为学术界提供研读查考之资料,兼利于文化交流与积累。所选书目,均为独创性著作或鼎力之作,成一家言,立一家说,足可鉴照。其所蕴藏一定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学人自能了然于心,毋庸赘述。

为成系统,相得益彰,汇编为《韩国学术译丛》。体例及版式、开本力求统一,基本保留原文全貌,如有遗漏或不得已删改之处,详加说明。相信读书界能以正确的分析态度研读这些著作,汲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深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推动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促进国际学术及文化交流。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2年3月

中译本序言

高丽外交史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并积累大量资料的研究课题，在我终于利用学术假期，将此稿撰写完毕，才使其得以付梓。此次中译本问世，当喜不自禁。

高丽外交领域大体可分为以中国的宋、契丹、辽、女真、金、蒙、元等为对象的北方外交，以日本为中心的对倭外交，以及以中东、南方和西域为对象的其他外交。其中，以北方外交为高丽外交的主线。

北方外交既以强国、大国为对象，维护主权、保全和扩大领土、保护国民，自然也就成为高丽外交政策的中心，在慕华思想主导下的文化输入，亦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外交政策的基调。而在事大外交的名义下，实质上追求的是实利外交。高丽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很敏感，这种外交是善于适应既成事实而随机应变的适应外交。

在中国群雄割据、天下未能统一之时，高丽王曾自称皇帝，采取独立外交路线；中国群雄争霸、天下纷争之时，高丽王则采取了中立外交，直到中国重新决出新的霸主。

事态对己不利时，高丽则通过王室间联姻的方法，以中国为保护伞，藉以保护王室的权威和安宁，维护国家主权，发挥了统治国家的机智。

中国一旦出现新霸主并出现稳固局面之时，高丽就采取事大外交的路线。高丽选择的事大外交路线，平时在名分、礼让及实际形式上和往复文书中，很注重表现事大的形

态。然而，一旦关系到国家安危，或有重大利害关系时，则断然奉行追求实利、进行抗议甚至不惜卷入战争的路线。

如上所述，由于高丽在北方外交中展开实利外交、适应外交和事大外交，才得以在谋求国家主权、实际利益和保全领土过程中发展壮大。

在对倭外交和对琉球外交方面，高丽则根据情况，使用恩赐、安抚、怀柔和惩戒等手段，立足于所谓的小中华思想，展开了必要的外交。

高丽当时面向中东和南方及西域的外交活动虽不多，但在这些国家主动上门要求接触之时，则采取了以恩惠与雅量交涉为主的怀柔外交路线。

高丽外交政策就是因势利导，以熟练的手腕，对强者刚柔相济，或刚或柔，对弱者则施以怀柔，进而保全和发展国家的政策。

在高丽外交史这一尚未被开拓的领域里，笔者虽然尽了一定的心力，但还有很多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需要研究。值此中译本出版之际，谨请专家学者斧正。

最后，谨向在拙作翻译出版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延边大学金龟春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谨向承担拙作翻译工作的紫荆先生和金荣国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谨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为拙作的翻译出版提供资助的韩国大象文化财团和林炳云副理事长致以诚挚的谢意！

卢启铉 谨识于 2001年5月5日

自序

我曾拟了几个研究课题，决心在有生之年一一使之成书。这部《高丽外交史》，乃是其中之一。现在，它得以付梓与读者见面，我算是又了却一桩心愿。

当年，承蒙庸斋白东濬先生和硕山徐硕淳先生热忱地规劝我研究国史，我感谢其好意指点，遂一直潜心钻研它，尤其是注重研究韩国外交史。

韩国当然一向都在搞外交，而长期以来却未有外交史方面的著述。有鉴于此，我便在大学讲坛上讲授朝鲜开国外交史之余，决心上溯国史，使朝鲜外交史、高丽外交史和新罗外交史一一成书问世，以饕广大的读者。

在搦管编写这部拙著时，自始至终有一种使命感。也就是说，为了从事在此之前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的韩国外交史的开发及使之今后有更好的发展，我在生前一定要修撰成这部拙著。因为，无论是高丽外交史、新罗外交史还是朝鲜外交史，其第一手资料都是用古汉文写成的。而时至今日，古汉文对于专攻外交史的青壮年学者来说，已无异于外语，在熟谙方面无疑是难处多多。而一些懂得古汉文的国史学者，由于对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在解译上则有些问题。至于本人，曾专攻过国际政治学、

国际法和外交史,在古汉文和汉文方面具有基础,所以也就有了如上的使命感。

高丽的外交史长达 500 年。我首先悉心收集了有关它的所有资料,然后在整理这些资料与编撰成书方面整整耗费了五个春夏秋冬。可喜的是,今天它终于得以问世。

这部拙著的出版,使我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之感。与此同时,由于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生怕受到诸位先辈与同窗挚友的指责而不胜悚惶惭赧。

拙著《高丽领土史》与《丽蒙外交史》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这部拙著依其主旨,系在它们的基础上作些修订与增补而成书。

恳请诸位先辈方家与同窗挚友斧正。

卢启铉 谨识于 1994 年 5 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中译本序言·····	(1)
自 序·····	(1)

第一篇 建国与领土扩张期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3)
第一节 太祖统一三国·····	(3)
第二节 太祖的领土扩张·····	(16)
第三节 与耽罗和芋陵的关系·····	(20)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23)
第一节 高丽的自主外交路线·····	(23)
第二节 宋、辽战争与高丽的亲宋外交·····	(30)
第三节 辽入侵高丽与丽、宋结盟·····	(34)
第四节 宋朝对辽夹攻提案与高丽的自制·····	(37)
第五节 丽、宋、辽暂时和解与高丽的领土扩张·····	(40)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42)
第一节 契丹入侵前的国际关系·····	(42)
第二节 契丹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53)
第三节 《徐熙—萧逊宁协定》与确保江东六州·····	(61)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67)
第一节 战争的肇始·····	(67)
第二节 高丽的媾和外交·····	(79)
第三节 契丹军的撤退与高丽军的追击·····	(81)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	(86)
第一节 契丹挑起战端·····	(86)
第二节 第三次丽、辽战争·····	(90)
第三节 战争的结果·····	(106)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109)
第一节 文宗的契丹观及其亲宋政策·····	(109)
第二节 丽、宋之间的贸易·····	(115)
第三节 丽、辽边界谈判及文化交流·····	(121)
第四节 诱导开放的对日外交·····	(125)
第五节 通过宋朝商人与大食国商人的来往·····	(130)
第六节 高丽海军征伐女真海盗·····	(131)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136)
第一节 宋、辽围绕吊丧拉拢高丽·····	(136)
第二节 契丹建议设置榷场与领土问题·····	(139)
第三节 耽罗郡的设置·····	(144)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与其领土政策·····	(151)
第一节 女真的状况·····	(151)
第二节 修筑千里长城与丽、辽外交纠纷·····	(155)
第三节 羁縻州的设置与完颜部女真的入侵·····	(162)

目 录

- 第四节 睿宗伐战曷懒甸与设立九州…………… (171)
- 第五节 睿宗归还九城与领土处理…………… (178)
-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 (185)
- 第一节 金、辽战争与高丽拥有保州 …… (185)
- 第二节 高丽的亲宋外交…………… (192)
- 第三节 金国事大要求与高丽断然拒绝…………… (195)
- 第四节 宋、金密约与契丹的灭亡 …… (202)
-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204)
- 第一节 高丽改变对金政策与宋朝要求借道…………… (204)
- 第二节 金国对高丽的强硬斡旋与
保州归属问题的重提…………… (213)
- 第三节 保州居民的管辖权问题…………… (221)
- 第十一章 征伐内地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225)
- 第一节 妙清、郑和常的征伐金国论 …… (225)
- 第二节 金国对高丽王位继承问题的态度…………… (231)
- 第三节 高丽对金国的维持现状政策…………… (239)

第二篇 对元抗争期

-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 (243)
- 第一节 蒙古崛起与国际局势的变化…………… (243)
- 第二节 契丹遗族军队的入侵…………… (245)
- 第三节 蒙古军及万奴军来援与丽、蒙协约 …… (251)
- 第四节 蒙古使臣行径与其遇害…………… (257)

高丽外交史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262)
第一节	撒礼塔入侵	(262)
第二节	迁都江华与撒礼塔再次入侵	(268)
第三节	唐古入侵	(275)
第四节	阿母侃入侵	(280)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285)
第一节	也古入侵与王子充人质	(285)
第二节	车罗大两度入侵与金守刚的外交手腕	(293)
第三节	车罗大第三次入侵与王子出访蒙古	(303)
第四节	车罗大第四次入侵与高丽太子朝覲	(306)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313)
第一节	太子出访蒙古	(313)
第二节	太子与忽必烈会晤及达成协议	(317)
第三节	拒绝蒙古“六事”与元宗出访蒙古	(322)
第四节	高丽拒不还都与丽、蒙双方媾和	(326)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330)
第一节	林衍废黜元宗与蒙古的干预	(330)
第二节	李藏用的外交手腕	(335)
第三节	蒙古设置东宁府与元宗的复位交涉	(340)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345)
第一节	出陆还都与要求归还西京以北领土	(345)
第二节	三别抄之乱与丽、蒙军队攻陷珍岛	(349)

目 录

- 第三节 三别抄在耽罗坚持抗战与蒙古管辖耽罗…………… (353)
第四节 蒙古统治高丽与西京以北地区的归还…………… (358)

第三篇 衰退期

-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371)
第一节 高宗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371)
第二节 元宗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377)
第三节 金方庆将军与达鲁花赤…………… (386)
第四节 忠烈王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392)
第五节 耽罗道的归属问题…………… (403)
-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 (410)
第一节 忠烈王与元成公主的联姻…………… (410)
第二节 忠宣王与蓟国大长公主的联姻…………… (417)
第三节 忠肃王与三公主的联姻…………… (425)
第四节 恭愍王与鲁国公主的联姻…………… (430)
第五节 蒙古顺帝与奇氏联姻及其后遗症…………… (433)
- 第二十章 丽、蒙联军征伐日本 …… (443)
第一节 征伐前的丽、蒙、日关系…………… (443)
第二节 高丽在蒙、日间的中介作用及其意图 …… (445)
第三节 第一次征伐…………… (453)
第四节 第二次征伐…………… (458)
第五节 第三次征伐日本计划与高丽的劝阻…………… (465)

高 丽 外 交 史

-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468)
- 第一节 征日本行省的设置及其职能…………… (468)
- 第二节 设立于高丽的征东行省…………… (472)
- 第三节 蒙古成宗在位时征东行省的变质…………… (475)
-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482)
- 第一节 忠烈王让位与蒙古的干涉…………… (482)
- 第二节 忠烈王复位与蒙古的干涉…………… (486)
- 第三节 忠宣王再即位与蒙古的干涉…………… (492)
- 第四节 忠肃王和忠惠王的王位反复与蒙古的干涉…………… (496)
- 第五节 忠穆王即位与蒙古的干涉…………… (502)
-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507)
- 第一节 沈阳王的册封…………… (507)
- 第二节 沈阳地区与高丽的关系…………… (510)
- 第三节 忠宣王兼任沈阳王与洪重喜的纠葛…………… (524)
- 第四节 沈王暉与忠肃王的对立…………… (528)
- 第五节 沈王暉与忠惠王的对立…………… (535)
-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539)
- 第一节 蒙古乃颜叛乱与高丽援兵…………… (539)
- 第二节 哈丹入侵前的丽、蒙关系…………… (543)
- 第三节 哈丹入侵与丽、蒙关系…………… (545)
-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553)
- 第一节 人员交流…………… (553)
- 第二节 贸易…………… (559)

目 录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输入·····	(562)
------------------	-------

第四篇 复兴的企图与灭之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569)
第一节 恭愍王的对外政策·····	(569)
第二节 蒙古国内起义事件与高丽援军·····	(575)
第三节 恭愍王的反蒙政策·····	(583)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593)
第一节 恭愍王收复北方的领土·····	(593)
第二节 元朝的衰退与恭愍王恢复国权·····	(601)
第三节 红巾贼两度入侵与高丽的大捷·····	(604)
第四节 金镛、崔濡废黜恭愍王的叛乱与元朝的作用·····	(612)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626)
第一节 明朝的兴起与元朝的衰亡·····	(626)
第二节 高丽收复辽沈地区的政策·····	(631)
第三节 勉强进贡济州马与征伐济州牧胡·····	(637)
第四节 丽、明外交的尴尬与明朝的刁难·····	(641)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650)
第一节 恭愍王被弑与禑王的即位·····	(650)
第二节 围绕禑王即位的对元外交·····	(655)
第三节 围绕禑王即位的对明外交(1)·····	(665)
第四节 围绕禑王即位的对明外交(2)·····	(676)

高 丽 外 交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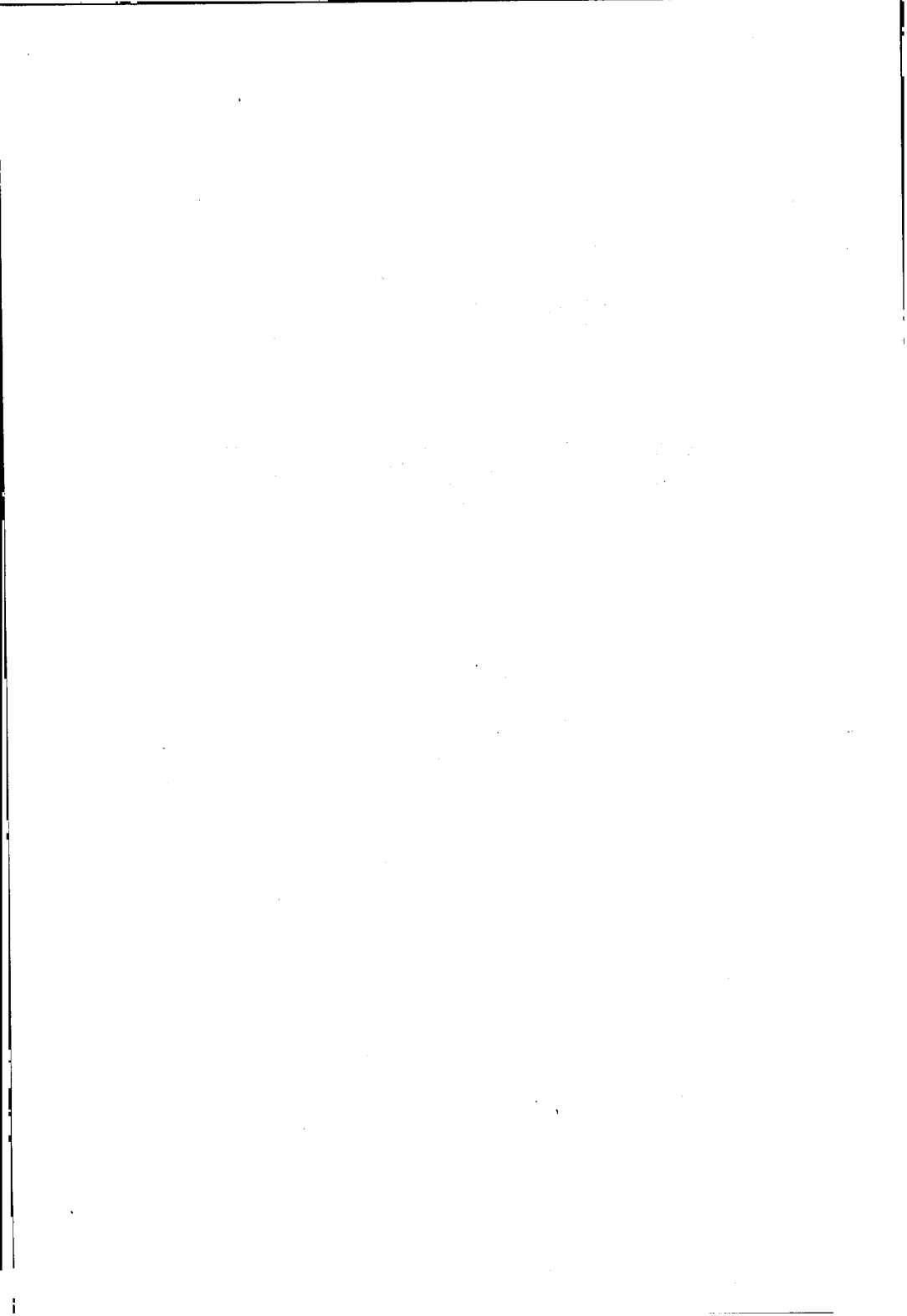
-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684)
- 第一节 吉州地区女真归属高丽…………… (684)
- 第二节 高丽与纳哈出的关系…………… (687)
- 第三节 李成桂提出安定边防的方略…………… (690)
- 第四节 兀良哈与斡都里的归属…………… (692)
-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700)
- 第一节 高宗与元宗在位时的倭寇…………… (700)
- 第二节 李穡和楔长寿的防倭之策…………… (705)
- 第三节 高丽对日交涉与日本的态度…………… (712)
- 第四节 倭寇的猖獗与郑地的平定计划…………… (720)
-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 (725)
- 第一节 暗杀倭人的阴谋与禁倭交涉…………… (725)
- 第二节 倭寇逞凶与高丽的讨伐(1) …… (731)
- 第三节 倭寇逞凶与高丽的讨伐(2) …… (737)
- 第四节 赵浚建议征伐对马岛与朴葳率军征伐…………… (743)
- 第三十三章 与琉球的关系…………… (749)
- 第一节 中国与琉球的关系…………… (749)
- 第二节 高丽与琉球的关系…………… (751)
-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754)
- 第一节 明朝的无理刁难…………… (754)
- 第二节 明朝的绝交通牒…………… (760)
- 第三节 明朝将铁岭以北纳入版图与高丽的抗议…………… (763)

目 录

第四节	倣王派兵攻伐定辽卫与李成桂的回师·····	(766)
第五节	李成桂掌握实权与恭让王被废黜·····	(772)
后 记	·····	(779)

第一篇

建国与领土扩张期



第一章 高丽太祖

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第一节 太祖统一三国

一、太祖统一三国的构想

太祖^①建立高丽国之时，朝鲜半岛上的情况是：新罗握有庆尚道，后百济雄踞全罗道和忠清南道，高丽则拥有京畿道、江原道、黄海道和平安道。

当时，亦即公元918年，朝鲜半岛外部的状况则是：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五代十国在中国内地相继粉墨登场，相互角逐霸权。在五代十国之中，只有吴越国与后唐分别同后百济和高丽通交。渤海国虽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存在过一个时期，然而在8

^① 太祖姓王，字若天，讳建，松岳人。其父王隆为金城太子。关于太祖的世系，可参照如下的资料：《高丽史》卷首世系条中金宽毅（毅宗在位时人）之编年通录；黄周亮撰《太祖实录》之太祖世家2年3月条；李齐贤著《栋翁禅说》前一。

年之后即公元 926 年灭亡。它在灭亡之前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关系并不频繁。只有契丹的势力一直在崛起,女真势力则在朝鲜半岛北边骚扰不已。日本不时地对唐和新罗进行的海盗式的掳掠,虽使后者颇为不安,却因日本采取的是闭锁政策,对高丽和后百济提出的建交要求置之不理,无意与之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

基于对上述国际形势的审时度势,太祖认识到高丽欲发展壮大,并统一后三国,在当时遭受外来势力干扰的可能性很小,依靠外来势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这一切有赖于朝鲜民族自身在朝鲜半岛内加以实现。^① 于是,他的统一后三国的构思着眼于国内,决心在国内这一层次着手,达到统一后三国的目的。

太祖从建立高丽国之初起,不仅殚精竭虑欲统一后三国,而且就像他所定的国号一样,一心想“复兴高句丽”,具有定要恢复高句丽原有领土和版图的雄心壮志。^②

其统一后三国的设想,具体地说来,在对内方面便是在建国之初树立王权的威信,严惩谋反者和获得民众的拥戴。他采取这样的政策,当然是旨在实现统一后三国的理想,为统一后三国奠定基础。这些对内的种种举措,因不属于外交方面的事项,恕不在此敷陈。

高丽在实现其统一后三国的进程中,基本上未受到中国和日本干涉和影响,这样的国际条件,对于它来说是很有利的。另一

^① 此与 7 世纪末金春秋利用唐朝与日本统一三国恰成对照。参阅卢启铨著《韩国外交史研究》第 221 页至 241 页,该书由甲寅出版社出版于 1983 年。

^② 参阅李齐贤著《益斋乱菑·史赞》卷 9 下:“我太祖即位之后……屡幸西都,亲巡北鄙,其意亦以东明旧壤(高句丽领土)为吾家青毡,必卷席而有之,岂止操鸡搏鸭而已哉。”

方面,太祖虽然与新罗曾建立结盟关系,对之实行援助政策,与后百济也达成了一时的和解,但与新罗、百济争霸进而实现统一后三国的政策,一直是其既定不变的目标。他既制订这样的统一后三国的政策而又实实在在推行之,对内便存在如何认识和构建统一后三国的基础课题,对外则有既援助新罗又与新罗保持友好关系、从中对之进行怀柔的课题,以及与后百济争霸的课题。这些课题必须同时予以一一解决,而这在当时对于太祖来说,确实是相当艰难的使命。

二、与后三国的外交关系

王建挺身而出进行改朝革命,撵走弓裔,建立高丽国之后,后百济的甄萱立即于翌年,亦即公元919年(高丽天授二年)委派闵郃为特使,专程到高丽祝贺太祖即位。高丽太祖以礼相待,接待得相当隆重。^①921年9月,甄萱又委派功达为特使,到高丽献上孔雀扇和智异山竹箭等礼物,表示了友好之忱。于是,高丽与后百济建立了和好的关系。后百济欣然承认了高丽国。

新罗的景明王也于公元920年委派特使到高丽,祝贺太祖即位,表示往后两国永远保持友好的关系。^②新罗以此表示它承认高丽国。

如上所述,高丽太祖立志统一后三国,其与新罗建交的深层意旨,乃在于新罗已处于末期的混乱状态。太祖这样既与之合作又予以援助,便可收买新罗的民心,进而帮助新罗与后百济作对,使它们处于战争状态,达到削弱后百济势力的目的。

① 参阅《三国史记》卷50,列传10,甄萱条。

② 参阅《三国史记》卷12,新罗本纪12,景明王4年春正月条。

而在新罗执政者的心目中,王建本是新罗普通百姓,因依附叛乱头目弓裔而成了叛逆,是个无需高看一眼的宵小。所以,新罗本不想与高丽建交,但后来转而考虑到若给王建这个叛乱集团以国家般的同等待遇,一方面可使之对新罗没有多大的损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新罗得以安定一些。于是,便承认了王建建立的高丽国。新罗的这种对外政策,充分表明当时其国力已相当衰弱,不得不这样屈尊对待异己。

换言之,上述这样的事实,意味着新罗已经衰退到了毫无复兴可能性的地步,只有后百济的甄萱与高丽的太祖才有能力在朝鲜半岛上乾坤一掷决出雌雄。甄萱表面上佯装与高丽维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则不时地侵略新罗,既炫耀国力又想扩张领土。新罗已无力抵挡后百济的进攻,只得依靠高丽的援助以维护国家的安全。而高丽则在援助新罗的同时,制订了逐渐并吞新罗并使后百济完全屈服的计划,一步一步推进其统一后三国的大业。

高丽与后百济的冲突,肇始于后百济攻打新罗,以及高丽支援新罗。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新罗景明四年)10月,甄萱率领一万名骑兵,攻陷了新罗的大耶城(现在的陕川),进而向进礼城进军。遭到侵略的新罗,当即委派金律为特使,匆匆赶到高丽,通报后百济又在入侵新罗,请求高丽出兵援助。

高丽得知此事,当时深感左右为难:后百济曾派特使送礼物祝贺高丽国的诞生,而且与高丽维持着友好关系。新罗也是如此,毫无非礼之处。怎么办?高丽太祖深思熟虑之后,决心出兵援助新罗。因为,高丽与后百济只有单纯的表面上的友好关系,而与新罗则有互相合作与互相援助之协约。当然,高丽太祖做出这一抉择,还在于按照其统一后三国的构思行事。他这样出兵援助处于弱势的新罗,既可使新罗与后百济交战,使它们两败俱伤,便于分而治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之,又能使衰弱了的新罗感恩戴德,从而收买新罗的民心,实现高丽统一后三国的目的。

高丽太祖派出的援兵,帮助新罗打退了后百济的入侵。^①事后,后百济立即与高丽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反目成仇。而新罗则与高丽相处得更加亲密无间。在此之后,高丽与新罗又曾多次合作,与后百济为敌,较量数个大回合。在这个过程中,新罗军队的好几位将军干脆先后归属于日益强大的高丽,甘愿为之效犬马之劳。据史料记载,公元922年和923年,新罗的溟州(现在的江陵)、命旨(现在的抱川)和京山(现在的星州)的将军向高丽投降。925年,新罗京城近处的高郁府(现在的永川)的将军也归顺于高丽。^②

924年(高丽太祖天授七年),甄萱命其子须弥康和良劔等为先锋,率领军队攻打高丽的曹物城(可能是现在的金泉)。高丽太祖让将军哀宣与王忠坚守该城。经过激战,哀宣战死。而曹物城则由于军民合力抵抗而固若金汤,后百济的军队久攻不下,只好撤退。甄萱见军队无功而还,于翌月亦即是年8月间,派特使送给高丽太祖一匹骏马,也就是绝影岛聪马,一是送礼,二是由此对自身无礼兴兵攻城表示歉疚并示慰劳之意。^③

925年,甄萱不甘于前次的劳师无功,亲率大军再次入侵高丽,不夺得曹物城誓不罢休。高丽太祖亦率军亲征,坚决保卫曹物

① 参阅《三国史记》卷12,新罗本纪12,景明王4年条。《三国史记》卷50,列传10,甄萱条。《高丽史记》卷1,太祖世家1,太祖3年10条。《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3年冬10月条。

② 参阅《三国史记》卷12,新罗本纪12,景明王6年7月、11月条,7年4月、8月条,景哀王2年3月、9月、10月条。《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太祖5年7月、11月;6年7月、11月;8年3月、9月、11月。

③ 参阅《三国史记》卷50,列传10,甄萱条。《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太祖7年7月条。

城。战斗打响后，高丽的西征大将军庾黔弼率军与高丽太祖围住百济军。甄萱见势不妙，急忙乞求媾和。太祖应允，与甄萱签订了曹物城讲和条约。该条约的内容如下：

- (1) 双方停止曹物城之战，今后互不侵犯，不再无事生非。
- (2) 双方各以亲戚为人质，以作为互不侵扰的保证。
- (3) 王建与甄萱结成亲戚。

按照第 1 条与第 2 条的规定，后百济的甄萱以其外甥真虎为人质留在高丽，高丽太祖则以其堂弟王信留在后百济作为人质。

按照第 3 条的规定，甄萱比王建年长 10 岁，王建尊之为尚父，彼此结成了父子关系。

高丽太祖本想亲赴后百济军营与甄萱面晤，而庾黔弼等将军劝阻道：“双方虽已讲合，但人心难测。倘若贸然到甄萱的军营，不知会出什么事。”太祖觉得言之有理，便毅然作罢。

新罗的景哀王见高丽与后百济讲和并签订了条约，对此表示反对。当即派特使到高丽，向高丽的太祖进言：“甄萱为人奸诈，贯于信口雌黄和食言而肥，与他讲和贻害无穷。”^①言下之意，高丽虽与后百济讲和，这样的相安无事不可能持续多久。

果然，高丽与后百济的和平仅仅维持了半年。926 年（高丽天授九年）4 月，甄萱的外甥真虎突然病死。高丽太祖让甄萱的特使护送真虎的尸体回后百济，向甄萱说明真虎病死的实况。甄萱不信，认为真虎是被害而死。于是，后百济便把同样作为人质被留在后百济的高丽太祖的堂弟王信杀死，然后出兵进击高丽，攻打熊津（现在的公州）。

高丽太祖闻报，命令熊津城守将毋出动军队与之交锋，只需坚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太祖世家 1，太祖 8 年 10 月条。《高丽史》卷 5，庾黔弼传。《高丽史节要》卷 1，太祖 8 年 10 月条。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守城池便可。这时，新罗王派特使到高丽，向太祖进言：“甄萱自食其言，兴兵滋扰，必为天理所不容。太祖只需擂鼓助威，出兵讨伐，甄萱一定死无葬身之地。”新罗王恳求高丽太祖改变消极的固守策略，以积极的攻击战术取胜。太祖听了之后对新罗特使说明道：“朕不是惧怕甄萱而不采取攻势，而是静候甄萱为非作歹坏事做尽，使之多行不义必自毙。”

当时，甄萱听到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失绝影名马，百济必亡。”不禁惴惴不安，特意派特使到高丽，要求高丽归还他于两年前前送给高丽太祖的绝影岛聪马。太祖听了不禁一笑，当即让后百济特使把该马牵回去。

甄萱越来越暴戾，恨不得一口把高丽吞掉。于是，927年（高丽天授十年），后百济与高丽大战了一场。

高丽对后百济的侵略忍无可忍，于这年1月与新罗军队联合，攻打后百济的龙州（现在的龙宫）。攻陷运州（现在的洪城）后，又攻打近品城（现在的尚州）。与此同时，高丽水师攻打康州（现在的晋州）、平西山（现在的南海）和突山（现在的顺天）等地，抓获许多俘虏，得到不少战利品。

甄萱奋起反击，于927年9月烧毁近品城，率军闯入新罗，袭击永州，直逼新罗的京城。新罗景哀王见情况危急，连忙派连式为特使到高丽，请求火速援救。高丽太祖闻报说道：“新罗与我们和好已久，今知其危在旦夕，岂能坐视不救！”随即命令公萱将军率领一万名精兵前去救助。

然而，甄萱在高丽援军到达之前已率军攻陷了新罗的京城。景哀王逃亡未遂，被抓到后百济军营里而自杀，其王妃惨遭凌辱。甄萱的部下闯入新罗王的后宫，将宫女们一一奸污。景哀王自尽后，甄萱以其表弟金傅为国王。于是，金傅成了新罗最后一位国王，亦即敬顺王。

高 丽 外 交 史

高丽太祖得知这些情况，大为震惊和愤慨，遂派遣特使到新罗，对敬顺王等慰劳有加。同时，亲自率领精兵五千，与甄萱军队大战于大邱附近的公山。是役，高丽军大败，大将申崇谦与金东战死于沙场，其部下大多被俘，太祖本人侥幸得以逃脱。^①

中国内地的吴越国与后百济有外交关系，吴越王得知后百济与高丽激战于朝鲜半岛，便于这年11月7日派班尚书为特使，将一份外交信件转交甄萱，力劝两国和好。这份信函这样写道：“深知百济与高丽和乐已久且已结盟，却因双方质子身亡而反目成仇，以致互相征伐不已。今派特使送去信函，给高丽也送去一信，但愿彼此重修旧好，永远互不用兵。”

甄萱读了此信，借着公山大战大获全胜的凛凛威风，给高丽太祖送去了一份外交信函，指出新罗与高丽一向维持友好往来，而两国不自量力，低估后百济的军威，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势危殆。后百济出兵攻打新罗，使新罗官吏无不臣服，后百济的义风现已遍及新罗。此信继而美化甄萱的所作所为，写道：“新罗的奸臣们望风而逃，致使国王不得善终。本王不得已扶持已故国王的表弟、宪康王的外孙金傅即位，这才使风雨飘摇的新罗得以再造。”此信接着写道：“本王一向通达义理，尊王事大，但愿汝收到吴越的国书之后亦能如此。难道说，汝只思穷兵黩武而不思己过？兹将吴越国书的要旨抄录于此，愿汝牢记在心。我们两国倘若互相攻打不休，劳民伤财，必会导致他国乘虚而入。如是，岂不貽笑大方？是以，我们双方还是修和不做蠢事以免后悔莫及为上。”^②

高丽太祖当即委派林彦为特使前往后唐，告之以高丽已收到

^① 参阅《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太祖10年正月、4月、9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0年正月、4月、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太祖10年8月、12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0年12月。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吴越国王的国书以及高丽与后百济水火不相容的紧张的关系。然而,迄今未发现任何史料记载过后唐对此的反应以及是否对高丽提供什么援助。与此同时,高丽太祖随即给甄萱复信,信中写道:“本王虽然尚武却更崇仁,为了不致杀生,才悉心解围与贵国交换了质子。此举当然旨在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使南方的人们惠沐德泽。然而,血书盟约的血迹未干……麾下便如虎似狼疯狂地侵犯新罗的京城……新罗的君王被弑,宫阙被烧毁,贵胄高官与百姓被俘,姬嫔受辱被劫掠。麾下的所作所为,比桀王和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祖对甄萱作了这样的谴责之后,列举了高丽军队在海岸地区的燕山郡(现在的文义)、马利城(现在的安阴)、任存(现在的大兴)、青州(现在的清州)、桐藪(现在的河阳)、京山(现在的星州)、康州(现在的晋州)和罗府(现在的罗州)等地所打的胜仗,接着写道:“吴越国王的用意,在于弘扬仁德,本王心领神会,遵循不误。倒是麾下倘若不改弦更张,日后恐悔也无益。”^①

后百济和高丽,表面上都以第三者亦即大陆强国的劝喻大做文章,大耍外交手腕,实际上则都在炫耀本国军队的军威,以之互相威胁对方,要求各自克制,不再轻易用兵。

三、新罗自愿合并

新罗与高丽友好相处后,常常得到高丽的援助。但由于后百济的侵略有增无减,新罗可谓国运日衰。新罗的将军们度日维艰,仰慕高丽的太祖势力与德望,竞相投诚于高丽。930年(高丽天授

^① 参阅《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太祖11年正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1月正月。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42页至43页,45页至46页,乙酉文化社出版1973年。

高 丽 外 交 史

十三年),新罗东海岸地区南、北秩夫城(现在的兴海)的城主们投降高丽。从溟州(现在的江陵)到兴礼府的110多个城,也相继向高丽降服。这样一来,新罗的领土规模已不像一个国家,而只能算是一个郡邑。

当时,高丽和后百济置吴越国特使班尚书的劝告与斡旋于不顾,兀自继续交战。高丽在瓶山大战中大破后百济军的捷报传到新罗,新罗敬顺王立即派特使到高丽,既祝贺高丽大获全胜送又转达敬顺王欲会见高丽太祖的要求。翌年2月间,新罗敬顺王委派谦用为特使到高丽,再次要求与太祖会晤。

高丽太祖应新罗敬顺王的请求,于公元931年(高丽天授十四年,后唐长兴二年,契丹天显六年)2月,专程出访新罗。敬顺王让其弟金裕廉率领百官至城外迎接,接待得相当隆重。敬顺王在临海殿举行宴会为高丽太祖接风时说道:“我不幸得不到天下,又常遭甄萱兴兵讨伐,国势衰亡一至如此,真是可悲可叹!”说毕,悲痛得泪如雨下。

太祖在新罗滞留了两个多月,至同年5月才归国。临行时,新罗敬顺王亲自到城外送行,并让弟弟金裕廉作为质子到高丽。新罗百姓也很感动,对太祖说道:“过去甄萱来时,我们如遇豺狼虎豹。今天见到王公,却似见到父母一般。”

934年,新罗敬顺王召集群臣,商议把国土与国民一并献给高丽之事。群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王子属于此事的反对派,他说道:“国之存亡乃是天意。只要相信忠臣义士,获得民心,上下齐心协力,天无绝人之路。建国已达千年之久的好端端的国家,怎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拱手让与他人?!”他坚决反对自亡其国。敬顺王说服道:“国势已经危殆到了这等地步,非我等之力所能保存。想使之强战,已是无能为力。任其再衰弱下去,等于让无辜百姓送死。我不忍如此,不忍这样对待子民。”群臣见敬顺王降意已定,也就未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再说什么。会议决定向高丽降服。

敬顺王之所以在群臣会议上力主向高丽降服,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新罗的国力已实在太衰弱,另一方面则是得知曾经不可一世的后百济甄萱也已亡命于高丽,而新罗和他自己则确实得到过高丽太祖的多次支援与恩泽,为太祖的恩德所深深感化。

敬顺王随即派金封休作为特使到高丽,请求回访高丽太祖。高丽特派王铁与韩宪邕前往迎接敬顺王。敬顺王于935年(天授十八年,新罗敬顺王九年)11月带领新罗百官来到高丽。高丽太祖准备了仪仗队,亲自来到城门外迎接敬顺王。敬顺王抵达开京十天之后,太祖才在正殿坐朝,当着文武百官之面,以隆重的礼仪将其长女乐浪公主嫁给了敬顺王。敬顺王当上太祖驸马之后过了六天,上书太祖表示愿向高丽降服,把新罗献给太祖。表中写道:“本国久经危乱,国运已尽,保存国基无望,愿以臣子之礼事君。”太祖阅后,不予应允。^①

翌月,高丽百官一齐进言,建议太祖接受新罗敬顺王的请求。太祖对百官说:“朕与新罗曾歃血为盟,誓让两国永远和好,江山永固。而今,新罗王定要对朕行臣子之礼,众卿又认为此事可行,真叫朕惭愧万分,却又盛情难却。”于是,接受了新罗王的庭见之礼。

至此,新罗算是气数已尽。它自始祖至敬顺王共有五十六代国王临朝视政,历时992年(公元前57年~公元935年),终于难

^① 参阅《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2,太祖18年10月、11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8年10月、11月。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3页至54页,乙酉文化社1973年版。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19页至30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

逃灭亡之厄运。^①

四、后百济的灭亡与高丽的统一

王建以外交手腕抚慰新罗，而用武力对付后百济，结果几乎同时达到了合并新罗与武力灭掉后百济的目的。

高丽军队在瓶山大战中把后百济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之后，过了4年，于934年9月在运州（现在的洪城）又与后百济军队血战了一场。这场运州大战，是王建与甄萱争夺天下的最后一战，在这场大战中，王建指挥高丽军队杀毙3000百济军，大获全胜，占领了后百济熊津以北的30多个城池。^②

后百济军队在运州一役大败而归之后，后百济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能免对王长子神劔阿谀奉承，唆使神劔联合弟弟良劔（晋州都督）和龙劔（光州都督）共同起事，将父亲甄萱软禁于金山寺（金堤），并且杀死弟弟金刚。随后，神劔私自即位自称大王。

甄萱被软禁于金山寺，过了三个月，才于这年6月带着末子能X、女儿和妾逃离后百济，潜入高丽的锦城（现在的罗州），要求与宿敌王建会晤。高丽太祖面对这一意外的事件又惊又喜，让将军

① 参阅《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2，太祖18年12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8年12月。太祖封投降高丽的金傅（敬顺王）为政丞公，位在太子之上，岁禄千石，建神鸾官让其养尊处优。其随从亦获田禄甚厚。改新罗国为庆州，以之作为政丞公的食邑。同时，任命金傅为庆州事审官，管辖该处副户长以下的地方官。为了使自己与新罗旧王室的关系更加深厚，太祖以金傅的伯父亿廉之女为王后（神成王后），生下了显宗之父王郁。还可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的第44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2，太祖17年9月。《三国史记》卷12，新罗本纪12，敬顺王8年秋9月。《元史》卷50，列传10，甄萱条。《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7年9月。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庾黔弼和万岁等前往迎接甄萱，从水路把甄萱一行送至开京。甄萱当即向高丽投降。太祖感情款待，尊之为尚父，职位在百官之上，并以扬州为其食邑。^①

新罗并入高丽，宿敌甄萱投降之后，高丽太祖深感其雄心壮志亦即统一天下的宏图即将完全实现。太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神劔虽然篡夺了王位，其国政依然乱七八糟，如果趁热打铁一举将后百济打垮，则其必然指日灭亡，此乃天赐良机！

恰在这时，后百济将军朴英规（甄萱女婿）派密使潜入高丽，一方面慰问甄萱，另一方面请太祖发兵击溃后百济，他愿意作为内应。甄萱也认为时不我待，建议太祖尽快兴师讨伐其逆子神劔，早日荡平后百济。

高丽太祖于 936 年 9 月亲率大军南征。神劔也亲率大军北上，欲与高丽军队决一死战。双方在一利川（现在的善山）决战。一利川之战，成为决定两国命运的生死存亡之战。高丽军队由坚权率领左军两万名，金铤（大相）指挥右军两万名，王顺式（大匡）率领中军两万名，庾黔弼（大相）率领蕃人部队骑兵约一万名和步兵三千名，公萱（大相）率领军队一万五千人，共出动了大军十万名。后百济军队也分为左、右、中三军，与高丽的三军厮杀。结果，后百济军队相继投降或逃走。高丽军队乘胜追击，追至黄山郡（现在的论山），神劔、良劔和龙劔无计，可施只好率领后百济的百官向高丽太祖投降。

甄萱在其三个悖伦的儿子投降高丽之后，见自己一手培植的后百济军队被打垮，自己一手建立的后百济亡于一旦，不禁忧郁成疾，不久便撒手人寰。至此，由甄萱建国达 45 年（892～936 年），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世家 2，太祖 18 年 3 月、6 月。《高丽史节要》卷 1，太祖 18 年 3 月、6 月。

使用后百济国号达 36 年的后百济,宣告完全灭亡。

高丽太祖则成为朝鲜半岛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为高丽的 500 年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太祖的领土扩张

一、把平壤建设成为前哨基地

具有雄怀远略的太祖,志在继承高句丽昔日的伟业,确保高句丽最强盛时期的版图。为了向北方扩张领土,他着意建设平壤,使之成为其前哨基地。当年,平壤曾与古朝鲜和高句丽有过密切的关系。

太祖在平壤设置了大都护府,使之与首都开京处于同等地位。他从黄州、凤州、海州、白州、盐州等地移民于平壤,使平壤的人口大增,并让堂弟王式廉掌管平壤之政。他将平壤改称西京之后,经常驾临视察,还设立学校,努力发展其教育文化事业。

太祖对于北方的领土十分关注,甚至曾想迁都于平壤。他派人补筑与增筑了平壤的城郭,积极作好向北方拓展的准备工作。据《高丽史节要》记载,他在这方面所作的经略如下:太祖元年,移民于平壤;太祖二年,在平壤和龙冈县修筑城池;太祖三年,在咸从安北筑城;太祖五年,筑城平壤城;太祖十一年,筑城于字北府与镇国;太祖十二年,在安定镇、永清镇、安永镇、兴德镇、安北府以及刚德镇(现在的成川)修筑城墙;太祖十七年,筑城于通海镇;太祖十八年,筑城于肃州、阳岩、龙冈和平原。

二、安抚渤海与女真遗民

安抚住在北边的居民,是太祖北方领土政策的重要课题。

渤海灭亡之后,其遗民络绎不绝来到高丽,寻求栖身之所。太祖本着同族之爱心和实现自己扩张领土的欲望,分外注重收容他们,命人好生接待。

渤海遗民得知这种情况,归顺于高丽者越来越多。这方面的重要史实如下:

高丽太祖八年12月,曾任渤海国左首卫的冒豆干等率领一千户百姓来到高丽。太祖十年3月,渤海的工部卿吴兴与和尚载雄等,带领110多人进入高丽。太祖十二年6月,洪见等人用20条船满载人与物归顺高丽;7月,正近等带领300多人归顺。太祖十七年7月,渤海国王太子大光显带领几万名军民来到高丽;12月陈林等带领160人来到高丽。太祖二十一年,朴昇等带领3000多户老百姓归顺高丽。

尤其是渤海国王太子大光显及其将军、文官等大举归顺之时,太祖命人接待得很隆重。太祖对大光显优渥有加,赐姓王,给他取名王继,准其加入高丽王的宗室,让他去治理白州(现在的白川)。太祖又让大光显的部下一一担任官职,为他们带来的士兵和百姓安排了房屋与水田旱田,使之得以安居乐业。

三、扩张领土

太祖在统一了鸭绿江方面的西北边界与图们江方面的东北边

界的领土之后，一心想继续加以拓展。^①

当时，高丽在西北面与灭掉了渤海国的契丹相对峙，东北面则与散居于满洲（中国东北一译者注）和咸镜道地区的女真相接壤。太祖对这些北蕃人没有什么好感，曾经对其左右说过：“北蕃人可谓人面兽心。饥饿时，他们纷至沓来，吃饱了之后悄然而去，见利忘义却不以为然。现在，他们虽然对我们颇为顺从，却不知他们何时会背信弃义，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②

太祖一方面欲恢复高句丽旧土，另一方面瞧不起北蕃人。他决心从东北面与西北面这两个方面着手，扩张北方的领土。

高丽西北面的疆界，在新罗时期是大同江，亦即溟江。^③

契丹灭掉渤海国之后，高丽的边境与契丹相邻。太祖对契丹采取了相当坚定的政策。922年（天授五年），契丹耶律阿保机派使臣送来骆驼、马和毡给太祖，两国继而建立了外交关系。^④契丹灭掉渤海国之后，太祖大怒，斥责道：“契丹撕毁与渤海国的盟约，居心不良灭掉了渤海国，真是暴虐无道至极。我们决不能与之永久维持外交关系，它不是友好的邻居。”他下令将契丹派来的使臣一行38人流放到孤岛，把他们送来的50匹骆驼绑在万夫桥下，将其活活饿死。^⑤这样一来，高丽与契丹断绝了外交关系。

太祖为了征伐契丹，决心借助后唐的兵力。933年（太祖天授十六年），后唐册封太祖为高丽国王，由此高丽放弃天授这一年号，

① 两界的名称，或谓西北面、东北面，或谓西北路、东北路，或谓西北界、东北界等等，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② 参阅《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2，太祖14年11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4年11月。《高丽史》卷2，世家卷2，太祖20年4月。太祖厌恶契丹人的想法，清楚地体现在他的训要十条之中。

③ 参阅《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圣德王34年。

④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1，太祖5年2月。

⑤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卷2，太祖25年10月。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使用后唐为之规定的年号长兴。然而，太祖未能如愿借助后唐的兵力。^①

后来，太祖又与后晋、后汉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后晋相处得特别亲密。为了借助后晋的兵力征伐契丹，太祖派王规与邢顺为特使到后晋，祝贺后晋高祖登极，并送王仁翟到后晋为质子。后晋高祖派谢攀为册封使到高丽，册封高丽太祖王建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从此，高丽使用起后晋年号天福。

太祖搞好与后晋的外交关系，意在与后晋结盟，组成两国联军，齐心攻打契丹，以便前后夹攻。所以，后晋使者祿罗到高丽时，太祖亮出了其方案：“渤海国对于我来说是亲戚之国，其国王已成契丹的俘虏。我想与后晋联合夹攻契丹，以释旧怨。贵使节回国之后，望奏明天子，定下时日共同攻打契丹。”

祿罗回到后晋，果然将此情况奏禀后晋高祖，高祖不允。后来，出帝（后晋高祖的侄子）即位后欲与契丹交战之时，祿罗又奏明高丽太祖的方案。出帝派郭仁遇到高丽，相约夹攻契丹，让高丽为之探明契丹的虚实。^②然而，此方案却因高丽太祖驾崩及继位的惠宗软弱无力而化为泡影。

高丽在与契丹处于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逐渐扩展了新罗时到大同江为止的国境线。太祖十一年2月，在清川江畔的要塞安北（现在的安州）设府，后来又设置了通德镇（现在的肃川）。太祖十二年，设置了安定镇（现在的顺安）和永清镇（现在的永柔）。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卷2，太祖10年3月。

② 当时，太祖已驾崩。惠宗即位后与大臣们相处不甚融洽，甚至引起过内乱。这样一来此举自然只好作罢。参阅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284，后晋记，齐王开运2年冬10月条。对于胡注所引用的宋白之说，李齐贤在其《栎翁稗说》前集一里认为《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不实。而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则认为这是与事实相近之论。还可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1，太祖20年5月，22年3月。

年9月,又设置了安水镇(现在的价川),从而使高丽西北面的国境延伸到了清川江。^①然后,在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设置了浪西十三镇,并使高丽的影响力波及到了鸭绿江江口。

在高丽的东北面,新罗时国境在元山附近。^②太祖元年,高丽采取怀柔政策,尹瑄率领鹤岩城周边的北蕃人投降。太祖四年2月,黑水酋长高子罗率领部属170多人内附高丽。这年4月,黑水人阿於闲率领200多人归顺高丽。太祖五年7月,太祖高度评价溟州将军顺成所辖北镇地区的战略价值,特意为之赐姓王氏,封官为大匡,以之为前导,治理这一地区的女真人。

在高丽的东北面,太祖认为与西北面不同,不想贸然北上,而只想保存原有的土,所注重的是防御,因而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有一些北蕃人仰慕太祖的德望而归顺于高丽。

第三节 与耽罗和芋陵的关系

耽罗(济州岛)与芋陵(郁陵岛)一直属于新罗管辖。在新罗末期,它们得知太祖的德望与威势,分别派使臣到高丽进贡,表示愿意附属高丽,以小事大。

芋陵(郁陵岛)于930年(太祖十三年),派白吉与土豆到高丽进贡。太祖接受其贡物,使郁陵岛正式归属于高丽,以作为使臣前来高丽的白吉为正位(高丽初期,模仿秦封国时的制度。正位系一

^① 参阅《高丽史·地理志》卷12,安北大都督府条。该条有“太祖14年置安北府”之说。

^② 在此看法之外,有人认为是江陵。参阅丁若镛著《疆域考》。

第一章 高丽太祖统一三国及其领土政策

种官职,职位高于正朝),土豆为正朝(高丽初期的官职,相当于分职七品)。

耽罗于925年(太祖八年)向高丽进贡土特产。938年(太祖二十一年),高丽统一后三国两年之后,耽罗派太子末老到高丽,请求以臣子之礼对待高丽。高丽当即让末老担任星主、王子的官职。^①结果,耽罗维持了半独立的地位,附属高丽而以小事大。高丽以其统治者的星主、星主子为王子、太子。星主可有其官署与职制并加以运营。公元1105年,亦即肃宗十年,耽罗被改编为高丽的郡县。

耽罗的历史是这样的:高乙那的第15代孙高厚和高清等昆弟三人,乘船渡海来到新罗的耽津。这时,新罗的太史见客星出现于南方,向国王奏道:“此乃异国人来朝的征兆。”于是,新罗国王以他们三人来到新罗的祥兆,称其长兄为星主,称其次兄为王子(新罗国王很赏识高清,待之有如亲子,故而称之为王子),称其弟弟为都内,定其邑的名称为耽罗,其名缘于三兄弟来新罗时登陆在耽津。新罗国王分别赐给他们三兄弟以财宝和衣服。

从此,三兄弟子孙繁盛,对国家忠心耿耿,以高为星主,以良为王子,以夫为徒上。后来,良改称梁。

《三国遗事》辑录了《海东安弘记》一文,罗列了九韩,毛罗居其四。百济文周王二年,封耽罗国使臣恩率。东城王二十年,由于耽罗未到百济朝贡,东城王率军前往征伐。大军行至武珍州,耽罗闻讯连忙派使臣向东城王请罪。东城王遂回师,未对之进行征伐。

百济灭亡之后,新罗文武王元年,耽罗国王佐平徒冬音律投降

^①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卷2,太祖21年12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21年12月。有关星主的说明,可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745页的星主条,三荣出版社1984年版。

高 丽 外 交 史

新罗。高丽统一后三国后,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耽罗国太子末老到高丽朝贡。太祖赐其星主、王子之官职。1105年(肃宗十年),耽罗改称毛罗,成为高丽的耽罗郡。毅宗在位时在该处设县置令。1211年(熙宗七年),该县的石浅村改制为归德县。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 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第一节 高丽的自主外交路线

一、光宗时期的东方国际形势

在光宗在位的 26 年间,东方政局主要表现为中国内地处于五代十国^① 时期,政局十分纷乱。光宗处于这样的时期,遵循父王太祖的意旨,制订了旨在收复高句丽故土的计划,并为此开展外交活动。他时而使用自主的年号,自称皇帝,炫耀高丽的国威;时而使用在中国大陆的群雄争霸中有可能掌握霸权的国家的年号,欲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以防御辽国与女真这两大宿敌的入侵,或者与

^① 所谓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之后,以汴都和河南省洛阳为中心,统治汉族及业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发祥地的中原五个王朝。具体说,就是指朱全忠的后梁(908~923)、李存勖的后唐(923~936)、石敬瑭的后晋(936~947)、刘知远的后汉(947~950)以及郭威的后周(951~959)这五个相继更替的朝代。然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范围仅限于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其他地区不承认其具有代表中国内地权威,各自随意成立国家,互相征伐,一个个走马灯般兴亡交替。除了在河北地区建立的赵、燕、郛、北平国等势力很弱的临时政权之外,在长江以南有由唐朝河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一名淮南国,902~936)。吴国占据了广阔的地盘,曾兴旺过一个时期。取而代之的南唐(936~975)定都于金陵(现在的南京)。钱鏐在南唐南面的钱塘(现在的杭州)建立了吴越国(908~970),与闽州的闽国(909~947)势不两立。江西有荆南国(一名南平国,925~963)。湖南长沙有楚国(927~951)。广东有南汉国(917~971)。四川地区有王运的前蜀国(906~925)和取而代之的孟知祥建立的后蜀国(934~965)。这些国家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都想并吞对方。在长江以北,后汉的刘崇在后汉灭亡之后,在山西省晋阳建立了北汉国(951~979),一心想灭掉中原的后周。可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国史·高丽》4 的第 216 页至 217 页,该书出版于 1984 年。

之制订前后夹攻辽国与女真的计划。

让我们具体看一看光宗在位期间的国际局势。

自从后梁太祖朱全忠篡夺了唐朝的王位之后,中国内地出现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政局混乱不堪。后来,后梁发生内讧,晋王李存勖推翻后梁,继承被灭亡的唐朝衣钵,建立了后唐。然而,后唐只存在了四代14年。石敬瑭借助与契丹结盟的荫庇,建立了后晋,兀自即位为帝。契丹太宗利用与后晋的结盟,视乱世为其在中国内地扩大势力的契机,首先占领了幽州和云州等十六州。在征伐过程中,契丹又追究后晋未尽同盟义务的责任,一举攻垮与吞并了后晋。

契丹太宗接着又率领大军攻打大梁,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权。这时,契丹太宗干脆改国号为辽,年号亦改为大同。辽太宗结束这次三个月的征伐之后,在大梁驻扎了军队,自己则返回契丹的老巢。

这时,太原节度使刘知远获得民心的支持,起兵攻打大梁,赶走了辽国的军队,建立了后汉,自己即位为高祖。但是,他不久即死去,隐帝随即即位。隐帝昏庸,为奸臣所作弄,杀害了几位功臣。后来他企图杀害辅弼高祖有功的重臣郭威,未遂反而被杀,郭威取而代之,建立后周。

当时,辽太宗因征服中国内地的梦想未遂而赍志而没。辽世宗继位后,又率军南下,欲征服中原。后周郭威出兵抗阻,好不容易打退了辽军。然而,辽国南侵的野心未弭,总有一天又会卷土重来。

二、高丽的自主外交路线

高丽的第三代国王光宗,就是在中国内地这种局势下即位的。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他颇有霸气,在位第4年,亦即948年,便弃后汉的年号乾祐不用,用起了光德这一自主的年号。^①

当时,东方国际社会均受中华思想的支配。所谓中华思想,指的是统治中国内地的国家在政治、文化、军事上均处于优势,左右着东方世界,中华内地之外的东方国家不得不服从于它的思想。换言之,正如《书经》所言:“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迹,毕献方物。”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小国使用大国(中国)的年号,用其册历,进献贡物,接受赐予;国王受其册封,有时得送上人质;中国的皇帝与各国的国王之间,所使用的用语、指称与衣饰均有等级之分。^②

光宗使用光德这一自主的年号,是中国内地群雄割据互相征伐而尚不知鹿死谁手的情况下,摆脱以往外交政策的束缚,让高丽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进行自主的活动的表现。当时在中国内地,无法确定哪一个国家最终能执掌霸权,主政中原,高丽也实在是无所适从。而采取这种自主政策,便可避免由于倾向某国而此国又掌握不了中华大权时的尴尬被动。很明显,光宗这样使用自主的年号,是对高丽国的缔造者、光宗之父太祖所制订的继承高句丽雄风、恢复北方领土而决不与野蛮成性的契丹与女真妥协政策的继承与发扬。

^① 高丽使用自主的年号,当于太祖在位之时。太祖元年,定年号为天授。在三国鼎立时期,三国也时而使用年号。辽国也多次使用过年号。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光宗元年正月。

^② 关于中华思想和事大主义,可参阅卢启铨著《中华思想的历史背景与中共》,该文刊载在大旺社出版于1984年的《韩国外交史论》,见其第21页至31页。参阅卢启铨著《新罗的统一外交政策研究》,此文被收录在甲寅出版社出版于1983年的《韩国外交史研究》,见其第242页至244页。参阅金岸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61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645页,三荣出版社出版于1984年。

光宗不仅使用自主的年号,而且自称皇帝,将开京称作皇都。^①光宗称皇帝陛下的这一史实,还见之于骊州慧目山高达禅院国师元宗大师惠真塔碑文。^②与此有关的碑文如下:“乾德九年岁次辛未十月二十一日,于元和殿开读大藏经时,皇帝陛下诏曰:‘国内寺院唯有三处只留不动,门下弟子相续住持,代代不绝,以此为矩所谓高达。除曦阳院道峰院住持三宝,须凭国王之力。所以,释迦如来出世道佛法嘱国王大臣,是以我皇帝情深敬重释门妙理,共结良因,轨矩垣流。’”由此可知,此碑文有两处用上了皇帝这一用语。此碑文的皇帝陛下,就是指称光宗。这说明光宗处理国政时已以皇帝自居。

光宗在内政上推行德治,设立了敬祖祀宗的庙堂,装点皇都与西京,使之具有政治中心的威风。同时,重视学问,建立科举制度。在外交方面,年号使用光德,向东海和周边邻国显示威势。他整饬了定宗在位时所设置的光军司,以对付外来的侵略。在东北面与西北面,继续补筑与增筑城郭,一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二是为了继续执行太祖确定的向北方扩张领土的政策。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光宗在位时中国内地的政局。

辽世宗具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于天禄四年亲自率军南征,却未能如愿,只好颓然北归。翌年9月,他与后汉的宗室刘崇结

^① 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44页。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光宗11年3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世家卷2,光宗11年2月。

^② 此碑的竖立旨在追慕于光宗10年(959年)去世的元宗大师。此碑于光宗18年(967年)动工兴建,12年后,于景宗3年(978年)竣工。此碑为翰林学士金迁彦所建。参阅秋浦香雄的论文《回顾高丽光宗朝的国际局势》,该文刊载在1933年出版的《青丘学丛》第12期第134页。此碑的碑文,一方面称光宗为皇帝陛下,一方面又使用宋朝的年号乾德,真是令人费解。然而在光宗辛未年,高丽在形式上仍然承认宋朝是宗主国,所以它使用宋朝年号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盟,起兵征伐后周。途中,其部下察割谋反,遂不得善终。而一心想与他合力征伐后周的刘崇则即位于晋阳,自称汉帝,是为北汉世祖。由于北汉与契丹交往甚密,后周的国基处于岌岌可危状态。

辽世宗死后,穆宗继位。因后汉与世宗结盟共伐后周时未尽到同盟义务,尽管穆宗表面上仍与后汉保持结盟关系,实际上对北汉则不予积极支持。此时,中国内地由北汉、南唐等国逐鹿中原,群雄并立。而后周太祖趁没有外来侵略之机,逐渐整饬国内体制,竟然发展到足以与契丹势均力敌的程度。

高丽光宗估计后周有望打败契丹而统一天下,便于951年不再使用自主的年号光德,而开始使用后周的年号广顺。^①光宗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单凭高丽的兵力无法与国强善战的契丹对峙,当时见后周很可能会统一天下称霸中国中原,便尽快与之结盟,以便实现高丽太祖扩张北方领土的夙愿。952年,光宗派广评侍郎徐逢出使后周,献上贡品,建议与后周增进友好关系,密切合作。后周太祖于953年派卫尉卿王演和将作少监吕继宾到高丽,表示愿意接受高丽的建议,册封高丽光宗为特进检校大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克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高丽国王。^②

然而,中国内地的政治局势变化无常。几年后,后周太祖死去,继位的世宗也只执政了几年便病逝。恭帝即位时年仅七岁,国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时,后周将军赵匡胤的势力越来越大。

^① 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219页至220页。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光宗2年12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光宗2年12月。参阅新旧《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纪广顺2年正月。高丽使用中国的年号,既纳贡又送人质,是一种讲信义的表现,有时还具有表现同盟的性质。高丽光宗究竟是何时废弃使用自主的年号而使用后周的年号呢?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的第99页注2。

^②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光宗3年,4年。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光宗3年,4年。

而辽国仍然在跃跃欲试,想挥军南征。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光宗于960年(光宗十一年)称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翌年,又开始使用峻丰这个自主的年号。^①

光宗之所以又起用峻丰这个自主的年号,是因为后周已灭之,新兴起的宋朝的命运又难以预料。在当时情况下,不论与中国内地的哪一个国家结盟,或者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都不足以与契丹这一强虏对峙,都无助于高丽实现太祖王建恢复高句丽国土的遗愿。这是独立特行的路线,也是自主的路线。光宗奉行这一追求实利的自主政策,旨在恢复高句丽故土,实现高丽朝廷的雄图和对国民的承诺。

后来,宋太祖赵匡胤整饬内政,带兵征服湖北的荆南,平定湖南,势力壮大得足以打败契丹。962年冬天,高丽光宗派李兴佑作为特使到宋朝,奉献贡品,要求增进友好关系。翌年12月,

^①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光宗11年3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光宗11年3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99页及第101页的注1。《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称开京为皇都,西京为西都,却无光宗使用峻丰这一自主年号的记载。只有日本人秋浦秀雄在其论文《回顾高丽光宗朝的国际局势》中有此看法。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还在其第99页和第101页的注1写道:峻丰这一年号,见于金石文。《清州龙头寺铁幢竿记》有“维峻丰三年太岁壬戌三月二十九铸成”之说。全罗南道灵岩郡西院钟(现在日本广岛县贺武竹原町照连寺)的钟铭镌刻着:“峻丰四年癸亥九月十八日”。前者为光宗即位13年(壬辰,962年),后者为其第二年亦即963年。当是光宗于其即位11年(庚申,960年)称开京为皇都,并开始使用峻丰这一自主的年号。三年后,亦即光宗14年(峻丰4年,963年),光宗又使用宋太祖的乾德年号。笔者从上述金石文以及《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光宗14年12月条所记载北宋年号和当时光宗推行的外交政策看,同意这样的看法。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使用宋太祖年号乾德，不再使用自主的年号峻丰。^①

不仅光宗如此，高丽王朝历代的国王都是如此。光宗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总是旨在与主宰中国内地的国家结盟，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借助称霸中国内地者的力量，按照父王太祖的遗志，征伐契丹并打垮之。而在中国内地不存在称霸天下的势力，群雄互相割据、一时难分雌雄、政局一片混乱之时，光宗则靠本国的军事防御契丹入侵，并在条件成熟之时出兵征伐契丹。

高丽从定宗、光宗、景宗和成宗初期，亦即从 947 年到 992 年，在扩张北方领土方面，其西北面的疆界一直维持在清川江沿岸。

定宗执政仅仅四年，却遵从父王太祖王建的遗志，努力开拓北方。定宗二年，亦即 947 年，在西北面设置了德昌镇（现在的博川）、铁雍镇（现在的孟山）、博能镇（现在的博川）、通德镇（现在的肃川）和德成镇（现在的宁边），在东北面设置了三陟镇（现在的三陟）。另一方面，定宗计划把国都迁至开京以西的西京，设置了光军司，使兵力保持在 30 万的规模，经常进行训练。定宗确定这样的北进政策，是在采纳人在契丹做官的崔光胤的建议后而作出的抉择。崔光胤在到中国内地后晋留学的途中被契丹军队俘虏，契丹政府赏识崔光胤的才华，授予官职，让他供职于龟城。崔光胤收集到各种情报之后，命人悄悄地送回高丽，其主要内容为：“契丹将出兵侵略高丽。”^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世家卷 2，光宗 14 年 12 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世家卷 2，光宗 14 年 12 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 81，兵志 1，定宗 2 年。参阅《高丽史》卷 92，列传卷 5，崔彦列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2，世家卷 2，定宗 2 年。上述史料均记载光军司的设置，是防备契丹入侵之策。我认为不仅如此，而且是一种北进政策的具体实施。因为定宗是谨遵太祖遗志的睿敏的统治者，他想把京都移至西京，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高丽外交史

从光宗在位期间实行的北方政策看来，可知他从即位之初起就注重增筑城池。光宗元年（950年）修筑了长清镇（现在的宁边与泰川之间）和威化镇（现在的云山）。后来，他命人先后修筑了13镇，在渭善西北面修筑了安岳镇（现在的云山）、湿忽（现在的嘉山）、松城（现在的定州）、拉能镇和威化镇（现在的宁边）、安朔镇（现在的云山）、运州城（现在的运州）、新都城（现在的博川）、嘉州城（现在的嘉山）和安隆镇（现在的安州）等城。在东北面则修筑了长平镇的两城（现在的永兴）、博平城（现在的永兴）和高州城（现在的高原）等城。

景宗则于979年（景宗四年），在最北部的青色镇（现在的熙川）修筑了城郭。

从这样的筑城情况看来，太祖在位时高丽的领土只是到大同江为止。而到景宗在位时，高丽领土已扩展到了清川江以北。

第二节 宋、辽战争与高丽的亲宋外交

一、宋、辽战争

契丹^①酋长耶律阿保机为契丹部族的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是本部族的首领，而且是可以指挥其他部族的酋长。在其部族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占尽优势之后，他成功地暗杀了所有其

^① 契丹作为胡族的一支，是通古斯与蒙古的混血族，曾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生活。辽河上游地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亦即汉族争权夺势之地。后来，这里曾是北方的突厥、南方的隋朝和东方的高句丽等的角逐之地。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他的酋长，于916年（后三国时期新罗信德王五年）建立了契丹国，后溢为太祖。925年（天赞四年）2月，他率军入侵渤海国。翌年2月；渤海国抵挡不住契丹军队的侵略而灭亡。

其子太宗率军征服周边的势力，在进一步壮大了国势之后，改国号为大辽，自称辽太宗。

太祖并未管辖其所占有的渤海国故土，而是于927年扶植了一个被称为东丹国的傀儡国家，任命其长子倍为国王。这年7月，他在返回本国途中遽亡。次子德光继位，是为太宗。

辽太宗把他的哥哥，亦即东丹国的国王放逐于南唐，于928年（辽太宗天显三年）将东丹国京城迁至渤海国故都上京南面的辽阳，以之为蕃属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辽太宗之所以把东丹国的首都后撤至辽阳，^①是辽国放弃东北地区的满洲（图们江流域与松花江流域）的结果，这便给一心想北进的高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赵匡胤所辅佐的后周恭帝年仅7岁，后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后来，赵匡胤利用北汉世祖依恃契丹势力入侵后周的机会，率军进入大梁，推翻恭帝，于960年建立宋朝，成为宋太祖。

宋太祖驾崩后，继位的宋太宗于979年（辽景宗乾亨元年）2月，怀着统一中国的壮志，率军征伐北汉。这时，北汉已与辽结盟，受到辽国的支持。^②

这样一来，高丽在朝鲜半岛上奉行北进政策，一心想恢复高句丽旧土实现太祖王建的夙愿；辽国在满洲（中国东北）蠢蠢欲

^① 参阅脱脱等撰《辽史》卷77，“耶律靺烈”附羽之。

^② 参阅秋浦秀雄著《回顾高丽光宗朝的国际局势》一文第139页。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232页。

动，想侵略中原和朝鲜半岛；宋朝则在中原费尽心机欲非统一中国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高丽的外交政策不仅须视北方辽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原宋朝的外交政策而定，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

当时，宋朝与辽国都想称霸中原，因而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不断发生战争。

979年（高丽景宗四年，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7月，宋太宗为了收复失去的幽、云16州（河北、山西的北部一带，辽的根据地），急急忙忙起兵攻打辽国，却因无法制服辽国的骑兵战术，而在高粱河一战中遭到惨败。后来，宋太宗曾想利用与宋朝有过友好关系的定安国^①而两面夹攻辽国。^②但是，定安国势单力弱，实际上根本无力帮助宋朝攻打辽国。

二、高丽的亲宋外交

高丽与宋朝的关系可谓相当友好。

高丽于962年（高丽光宗十三年，宋乾隆二年）派广评侍郎李兴佑出使宋朝，献上贡物，探索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途径，并于翌年12月使用了宋朝的年号。高丽原本想与后周保持友好的关系，后来看到继后周而兴起的宋朝有可能统一中国，便与宋朝维持友好关系（也可视为以小事大关系）。

宋朝也派时赞等率为册命使90多人到高丽，进一步增进了

^① 定安国是渤海国遗民为了光复祖国而建立的国家。970年（宋开宝3年），其国王列万华曾派使臣到宋朝，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定安国同灭掉渤海国又与宋朝势不两立的辽国关系，无疑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② 参阅《宋史》卷491，定安国传。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两国的友好关系。^①

后来，高丽于965年和972年分别派王辂与徐熙等到宋朝，维持了友好关系。接着，两国更换统治者。高丽的宗死后由景宗继位，宋朝则在太祖驾崩后由宋太宗即位理政。

宋太宗在其即位的976年（高丽景宗元年）11月，派于延超等到高丽，册封景宗为高丽国王。高丽景宗也派使臣到宋朝，祝贺宋太祖即位。

从此，高丽与宋朝保持了长久的友好结盟关系。当然，双方都想利用对方。实际上，当时高丽与宋朝由于陆地上有辽国和女真踞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只能通过黄海进行各方面的交流。为此，双方均感十分不便。尽管如此，对于高丽来说，辽国与女真是其实现太祖王建收复高句丽旧土的巨大障碍，而与宋朝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则可使宋朝遏制辽与女真的势力。对于宋朝而言，自其开国以来，宋朝过于文弱，国力不强，常受辽国与女真的侵略，因而也想利用高丽的力量牵住辽国与女真。

983年（高丽成宗二年，宋太平兴国八年，辽乾亨五年）3月，宋太宗派少卿李巨原到高丽，册封成宗为高丽国王，以国书喻成宗以德抚民。成宗读了宋朝的国书极其感动，决心与民分享这一欢欣，甚至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是以当此之时，理应允许议论诉讼，缓和刑罚，容许有点正常的瑕疵，以沐中国皇帝的恩泽。为此，在太平兴国（宋太宗年号）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以前，凡是已经发觉、尚未发觉和已经结案、尚未结案的罪犯，只要其所犯的不是斗殴致死的杀人罪，不论其轻重，一律予以赦

^① 当时，宋朝使节因在赴高丽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90人落水淹死，只有时赞幸免于难到达高丽。所以，高丽光宗对他接待得很隆重，慰抚有加。

免，不追究其罪行！”这一特赦，使得罪囚也皆大欢喜。

984年5月，辽国兴兵征伐居住在高丽的边境，亦即鸭绿江流域的女真。高丽成宗生怕辽军趁机入侵高丽，连忙命令御史李谦宜督促各地在鸭绿江沿岸筑城，控制边境地区居民的来往，牢牢把守关隘，进而严防女真入侵。而女真得知这种情况，果然起兵攻打高丽。李谦宜无法督促筑城，惨败逃回京城。^①

高丽由于女真的侵扰，未能筑就边境地区关隘，便派韩遂龄作为特使去到宋朝，报告女真的情况与攻势等，进一步下定决心增进高丽与宋朝的纽带关系。

第三节 辽入侵高丽与丽、宋结盟

一、辽入侵高丽

辽国进入圣宗时期后，一方面整饬政治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开始对高丽与女真采取强硬的政策。圣宗一即位，便于983年（高丽成宗二年，辽圣宗统和元年）10月，让萧浦宁（一名耶律阿没里）等制订讨伐高丽的计划，作为攻打高丽的第一阶段准备。当时，辽国要想讨伐高丽，必先征伐处于高丽与辽国中间地带的女真。

辽军果然兴师第一次征伐女真。女真见大势不妙，躲避至北

^①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成宗3年5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成宗3年5月。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边鸭绿江流域的博川、云山、泰川等地。辽军长驱直入，闯入高丽领土内讨伐女真。当时，辽军故意对高丽大宁江北岸的守备兵说：“女真放肆，竟敢潜入辽国边境抢掠……现在此仇已报，我们马上收兵回朝。”^①这是一种谎言，也是一种障眼法，旨在不暴露其攻打高丽的计划。

翌年7月，辽国圣宗决意“从东面攻打高丽”，命令各地军队备战。8月，以辽河下游一带的涝洼地涨水难以进军为由，暂停对高丽的远征，同时任命耶律斜轸为总指，挥率军攻打处于中间地带的的女真。

辽国东征军攻打女真获胜，抓到10万名俘虏，掳获10万多名马，于翌年1月凯旋。这是辽国第二次征伐女真。有的学者说，辽国第二次征伐的女真，是居住在鸭绿江中游西部地区的部族。实际上，这个部族并不是女真，当是定安国。^②

二、丽、宋结盟

定安国与辽国相处得不好，其君民对辽国有一股同仇敌忾之心。981年（高丽景宗六年，宋太祖太平兴国六年，辽乾亨三年），定安国国王乌玄明通过女真使臣，向宋太宗呈上了一份国书，表示赞成宋太宗制订的夹攻辽国的政策。这份国书写道：“臣本是渤海国遗民，现在拥有高句丽故土一隅……臣赞成天朝

^① 参阅《辽史》卷10，本纪第10，圣宗统和元年10月。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4年5月。

^② 参阅金库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70页。参阅和田清著《略论定安国》一文，刊载于《东洋学报》第6卷第1号，见其第193页。参阅池内宏著《高丽成宗朝与女真及契丹的关系》一文，该文刊载在《满洲史研究·中世》第2册，见其第137页至141页。

(指宋朝)的秘密计划,一定协助天朝大军,攻打辽军以报不共戴天之仇。臣决不会违抗天朝的命令,决不会食言。”

然而,当时由于宋朝要全力击退党项族西夏的入侵,未能实现宋朝与定安国夹攻辽国的协约。

从其时的东方政局看来,高丽、宋朝、女真、定安国等都敌视辽国,都为辽军屡屡出兵侵略深感不安。尤其是高丽,文明程度较高,国力也强盛,辽国以之为其称霸之大敌,视之如眼中钉,并不把处于两国中间地带的女真和定安国放在眼里。

当时由于高丽奉行北进政策,高丽与女真的关系并不友好。所以,女真在遭受辽国先后两次侵略之后,竟然对辽国放弃了敌意,转而误认为是高丽怂恿辽国讨伐女真。984年,女真曾派人给宋朝送去写在木板上的国书,敦促宋朝谴责高丽。正好高丽使臣韩遂龄出使宋朝,宋太宗便把女真写在木契上的国书交给韩遂龄看,劝高丽尽力维持与女真的友好关系,释放被抓到高丽的女真俘虏。

另一方面,定安国派人取道辽东半岛,沿着渤海湾的岛屿而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定安国以这一路径与宋朝交往。如前所述,宋朝在攻打辽国时,想以定安国的军队打头阵。辽国的圣宗有鉴于此,于985年(高丽成宗四年,辽圣宗通和三年)8月,本着削弱宋朝同盟势力的目的,发兵攻打定安国,于翌年1月征服定安国,彻底灭掉了这个小国。^①

^① 参阅《辽史》卷10,本纪第10,圣宗统和元年10月丁酉;统和3年7月甲辰。

第四节 宋朝对辽夹攻提案与高丽的自制

一、宋朝的结盟提案

辽国巩固了它在北方的势力，占领了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后，对中原虎视眈眈。它征伐了鸭绿江西面的女真，吞并了定安国。而后侵略高丽便提上了其日程。

另一方面，高丽与宋朝维持着友好关系，彼此互相利用，都想找准机会图谋北方。女真虽然尚处于无国家形态，却与宋朝有着友好往来，它处于辽国与高丽之间，当时受害最甚。

其时，高丽与辽国并非毗邻，且无领土纠纷，之所以如此不和，是因为高丽欲收复高句丽旧有领土，而辽国则是其实现这一夙愿的障碍和北上的牵制。辽国则奉行侵略性的征服政策，高丽则是其扩大领土与南下的障碍。于是，双方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状态。当然，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宋太宗为了收复失去的河北幽、云 16 州，于 986 年（高丽成宗五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5 月派韩国华为特使到高丽。韩国华出使高丽的目的有两种，其中之一是促使高丽与女真和解。

如前所述，辽国攻打女真时，曾讨伐了避难于高丽领土之内的女真，为此，女真曾向宋朝诬告过高丽。当时，恰好出使于宋朝的高丽特使韩遂龄并未把此中因由向宋太宗阐述清楚。于是，高丽成宗就此向宋朝特使韩国华当面详细地作了说明：

“女真贪婪无度，惯于说谎。去年冬天，他们派人来报：‘契丹将出兵入侵女真。’而向我们求援。我们认为他们是谎报军情，未派兵前去援助。然而，辽军果然入侵女真，杀戮抢掠，无所不为。女真人当时成群结队，逃至高丽的会昌、渭北和光华等地避难。契丹军队追至，对我们的军队说：‘女真常常入寇我国边境，烧杀抢掠，为害不浅，此番我们出兵是为了报仇，请把他们交出来！’当时逃至我国境内的女真人有二千多名，我们并未把他们引渡给辽军，对他们管住管吃，然后，送他们回到了女真本土。没想到女真却恩将仇报，突然派兵闯入我国，杀害我官吏与百姓，掠走财物，抓走壮丁为奴。”

成宗在指责女真的恩将仇报和反复无常之后，说道：“他们常常口口声声说崇敬天朝，迨敢不报答大恩大德。而这次却以诬告玷污圣德，令人难以琢磨。我们高丽常受天朝恩宠，决不会心怀二意而与敌人勾搭。何况契丹在辽海之外，江海滔滔，与之从无交往。上次女真来我国避难者之中，有几十人曾担任过高丽的官职，而他们却居心叵测，一心只想去天朝当官。我本想派使臣至天朝详细奏明这一事实的真相，而今特使来此，但愿能将这些情况转奏宋太宗。”^①

宋朝使臣韩国华听了高丽成宗如上的详细说明，遵照成宗的叮嘱，答应一定将此原原本本奏明宋太宗。

韩国华出使高丽的另一个目的，则是要高丽派兵，支援宋朝攻打辽国。韩国华转述宋太宗的旨意说，举世万方万物皆臣服中国，唯有辽国斗胆忤逆，不仅不俯首帖耳，而且占据了幽云十六

^①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成宗4年5月。参阅《高丽史节要》，世家卷2，成宗4年5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的第70页。

州及晋汉故土，宋朝因而打算出兵征伐辽蛮。高丽成宗久慕天朝，平日贤明施政，是一位知礼节讲大义的国王。而今，辽蛮屡屡骚宋境，高丽岂能坐视不顾？倘若天朝出兵伐辽，望立即起兵夹攻，齐心协力平定辽国。韩国华特使怂恿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国如出兵夹攻辽国，必能马到成功灭掉北虏。宋朝答应将交战中掳获的生口、牛羊、财物和器械等，犒赏高丽将士。

二、高丽的自制

高丽不赞成宋朝提出的夹攻辽国的计划。其理由是：尽管宋太宗强调指出这是千载难逢的灭辽良机，高丽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也就是说，在高丽看来，当时宋军的实力还未强大到足以灭辽的程度。而辽军征伐辽国与高丽之间的女真，实际上等于解决了高丽的一大心腹之患。尽管辽国征伐女真需经过高丽的领土，却对高丽无大影响。再者，高丽当时也根本不具备足以攻打辽国的实力。

在高丽的上述理由之中，有必要了解其时辽国对高丽的态度，以及高丽当时的军事政策与军事力量。

第一，辽国对高丽的态度。就在宋太宗派特使要高丽派军队与宋军两面夹攻辽军之前，也就是在986年（高丽成宗五年，宋太宗雍熙三年，辽圣宗统和四年）1月，辽圣宗派厥烈为特使到高丽，要求两国增进友好往来。^①高丽由于自太祖以来就认为辽国是无道之国，已与之断绝外交关系，此时见辽国正式提出与高丽建交，便采取左右观望的态度，但并非是放弃了北进政策。

^①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卷2，成宗5年1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成宗5年1月。

第二，高丽成宗的军事政策与军事力量。当时，尽管高丽收复高句丽故土的意志十分强烈，但在军事上却无力攻打辽国。成宗对兵制作过改革，但只是剥夺地方的兵权和对中央兵制进行改编。也就是说，成宗六年（987年），将州、郡的兵器全部没收而用以制造农具，解除了地方豪族的兵丁武装。成宗九年（990年），设置了左右军营。但它们只是以守卫王宫为主要使命的左卫右卫，只是构成后来六卫的基础。定宗和光宗在位时创设与保持下来的光军司的30万军队，其实发挥不了多大的威力。

高丽成宗自认有自知之明，并对宋军颇有了解，便不赞成宋朝的夹攻方案，因而按兵不动。宋朝使臣韩国华有鉴于此曾千方百计加以说服，甚至列举天朝对高丽的种种恩泽。高丽成宗出于无奈，只好同意与宋军夹攻辽军，同意按期出兵。然而，宋朝出动的军队当时先得抵挡西夏军队的入侵，只好延期攻打辽国。这样一来，高丽也就暗自庆幸无需为此兴师动众。

第五节 丽、宋、辽暂和解与高丽的领土扩张

一、丽、宋、辽暂时和解

在此之后的4、5年间，宋、辽两国相安无事，处于和平的氛围之中。

辽圣宗得知高丽在宋朝提出与高丽组成联军夹攻辽国之时，深思熟虑不予响应，便于986年派厥烈为特使到高丽表示谢意，提议两国永远保持友好。辽国提出这样堂而皇之的建议，绝非打消了侵略高丽的念头，而是权宜之计。

第二章 初期的自主外交政策与领土扩张

宋太宗也于990年6月派光禄卿柴成务到高丽，给高丽国王追加了1000户食邑和400户食实封。高丽成宗则于这年12月派兵部侍郎韩彦恭到宋朝，转达了成宗对宋太宗的谢忱。当时高丽与宋朝也是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有过引渡罪犯的事例。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当高丽使臣白思柔奉命到宋朝，对宋朝送佛经与御剑给高丽而向宋太宗表示谢意时，高丽的孔目吏张仁途向宋朝诬陷高丽而图谋叛国，因而无法归国。于是，宋太宗派秘书少监陈靖到高丽，在追封高丽国王1000户食邑和400户食实封的同时，把张仁途引渡给高丽，请高丽成宗饶恕其罪。成宗欣然答应，未对张仁途作任何处罚。

二、高丽的领土扩张

高丽、宋朝与辽国之间的暂时和解，其实却是更大军事风暴刮起的前奏。而这时，高丽于990年（高丽成宗九年）10月，赶走了鸭绿江外的女真，迫使其迁徙至白头山下。^①由此可见，此时，高丽西北地区的领土已扩展到了鸭绿江下游沿岸地区。

对于高丽西北方面的领土扩张到了鸭绿江这一事实，迄今尚无史料可作具体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定安国已为辽军所灭，这一地区的女真族也曾多次遭受辽国征伐，势力已十分微弱，高丽自然会不失时机趁势而入。

然而，高丽在鸭绿江中游地区和东北面却未能有所扩张。因为这一地区是山区，山多人少，而高丽的国力也不足以在这样的地区有所作为。

^① 参阅《高丽史》卷1，世家卷2，成宗11年6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世家卷2，成宗11年月。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 与徐熙的外交

第一节 契丹入侵前的国际关系

在契丹于993年（高丽成宗十二年，辽统和十一年）入侵高丽之前，东方的局势十分复杂。

在中原，宋朝行将统一天下。在以蒙古和满洲为中心的这一带，契丹雄踞一方。在朝鲜半岛上，高丽与契丹之间散居着女真族，^①其势力也比以前强大了一些。以女真族为主的定安国，^②横亘在高丽国与契丹之间。

当时，宋朝、契丹、女真、定安国以及高丽诸国，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异常尖锐，相互间矛盾异常复杂，故其彼此间的外交

① 女真是通古斯系统的一个民族，亦称女直。主要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流域和日本海岸地区以及鸭绿江沿岸地区。10世纪初，契丹太祖灭渤海国，从渤海国旧土上崛起的靺鞨族被称为女真。黑水靺鞨在辽国强盛时，迁徙于与高丽毗邻的鸭绿江流域与咸镜道地区之间。

② 定安国是渤海国遗民在佟佳江与鸭绿江中游地区（高句丽故都附近，亦即现在的通沟附近）建立的小国。据《宋史》定安国传与《文献通考》等中国史料记载，定安国人系“马韩之种”。然而，毫无疑问他们是高丽系统的渤海人。参阅和田清著《略论定安国》一文，该文刊载在东洋学会出版《东洋学报》第6卷第1号，见其第114页到118页。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关系也便复杂起来。

宋朝的目标是统一中国，使周边各民族与国家归其统治，由其实现中华的复兴，号令天下。然而，其周边像契丹这样的势力，不仅不想臣服，反而想征伐宋朝，进而统治整个中国内地。像高丽这样的国家，则有其独自的努力目标，悄悄地奉行北进政策，一心想收复高句丽故土。定安国和女真势力则相当微弱，对于宋朝的外交路线始终是顺从事大。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当时宋朝与契丹的关系。

宋太祖赵光胤统一中原后，挥师北方，征伐北汉。契丹知道一旦北汉被宋朝灭掉，契丹便与宋朝国境相接，会受到宋朝的威胁，因而尽力援助北汉。宋朝与契丹之间围绕北汉所开展的斗争，于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宋朝的胜利而告终，北汉为宋朝所完全征服。

紧接着，契丹与宋朝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的争夺，形成不共戴天之势。对于宋朝来说，只有收复了幽、云十六州，才算名符其实统一了中原。而对于契丹说来，不仅要继续把持这十六州，而且还要以之为征伐中原的前哨基地，根本不想失去这块业已到手的大肥肉。于是，宋军趁占领北汉的威势正炽，大举北伐，想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却因契丹顽强反击而未能如愿。

后来，西夏屡屡兴师进犯，宋朝必须首先消除这一心腹之患，无奈不得不尽量避免与契丹交战，转而希望利用处于契丹背后的女真与高丽牵制契丹，再伺机前后夹攻灭掉契丹。

尽管宋朝改变了策略，而高丽也不会改变恢复高句丽故土的夙愿，但高丽也不会轻易按照宋朝的意旨行事，而是执著地构思着自身的战略（容后详述）。

定安国和，和女真则按照宋朝的指使，一直与契丹处于敌对

状态。

坐落在鸭绿江西岸地区的定安国其根据地设在鸭绿江下游以及邻接黄海的所谓鸭绿女真和渤海女真地区，从唐朝时期起就是前往中国朝贡的道路，亦即所谓的朝贡道。这个地区也是与中国交往的海上交通要道，利用它与中国交往，相当方便。

定安国和女真本来有与宋朝进行各方面交流的陆路，但因其已为契丹占据，不容定安国和女真加以利用。所以，定安国和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愈加疏远恶化，转而利用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与宋朝保持亲密友好的外交关系。

宋太宗想兴兵攻打契丹时，深知定安国与契丹不共戴天，上上下下对契丹同仇敌忾，曾派人送去国书，约定安国出兵同宋军一起夹攻契丹。定安国王乌玄明知其祖父在位时起就常受契丹攻打，受够了窝囊气，此时见有机会报仇，便欣然赞成宋朝的这一秘密计划，决心出兵助宋军一臂之力，灭掉契丹，为祖先报仇，慰悼祖上的英灵。^①

宋军与定安国军队夹攻契丹的作战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是，通过两国的这一密约，我们可以想见宋朝当时连定安国这样的小国也想加以动员，其征服契丹的决心该是多么坚定，而定安国国力小，竟然想与契丹军一拼，其对契丹的仇恨该有多么深重。

据《辽史》本纪记载，女真自辽太宗以后，曾向契丹纳贡，但是，未写清楚到底是指何处之女真。辽穆宗会同三年与四年，也有鸭绿江女真纳贡的记载，但仍未写明它究竟是鸭绿江流域的

^① 参阅《宋史》卷491，定安国传。和田清著《略论定安国》第116页。津田左右吉著《辽国的辽东经略》，该文被辑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书》第3册，见其第234页至235页。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哪一处女真。从《辽史》看来，从辽太宗到辽穆宗大约 40 年之间，契丹未攻打过女真，女真也未侵扰过契丹的边境。这说明在此期间，契丹未对女真采取征伐政策，女真自然也就无需对契丹进行引人注目的反抗。

女真一方面与契丹未发生过多少次冲突，另一方面与宋朝交往甚密，双方相处得很好。《宋史》高丽传对此有不少记载。女真派人到宋朝朝贡，所走的水路，是从鸭绿江经大海，而后在宋朝的登州上岸。

二、围绕契丹的国际关系

契丹的野心在于征服中原。为了实现这一欲望，就得与宋朝决一雌雄。契丹始而不断地与宋朝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与战斗，继而改变战略，先征伐定安国、女真、高丽这些宋朝的盟友，然后消灭乌桓，再与宋朝逐鹿中原，问鼎九州。

首先，契丹于 985 年（高丽成宗四年，宋太宗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7 月准备征伐定安国，继而打算全军出动征伐高丽。^①为此，契丹检查了其军队的装备，确定了出征的路线。^②

契丹以“征伐高丽”为名，挥军征伐定安国，继而以征途涨水无法出征为理由，改变方向征伐定安国。^③其实，契丹军队的这次出征，完完全全是为了征伐定安国。因为，无论是征伐高丽

① 参阅《辽史》卷 1，圣宗纪统和 3 年秋 7 月甲辰条：“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

② 参阅《辽史》卷 1，圣宗纪统和 3 年秋 7 月丁卯条：“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

③ 参阅《辽史》卷 1，圣宗纪统和 3 年 8 月癸酉条。参阅池内宏的论文《辽圣宗的征伐女直》，见其第 185 页和第 192 页。

还是征伐定安国，它都得经过这个积水的低洼地区。它之所以张扬其出征为的是征伐高丽，是想迷惑定安国。契丹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是很明显的。这一年，辽圣宗亲自率军出征，经显州、乾州，于9月到达海滨。^①

辽圣宗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任命肖阔览为契丹军总司令。圣宗到达海滨5日后，契丹军开始攻打定安国。行军15天后，大军抵达定安国领域。11月间，契丹军深入定安国内，接受了定安国贡物求和。翌年1月，耶律斜轸将军等带着10万多名定安国的俘虏，20万多匹马和其他战利品凯旋。

契丹的这一次东征，给定安国沉重打击。但是，契丹未能完全如愿。它本想粉碎宋朝与定安国的同盟，封锁定安国与宋朝交往的通道，进而想永远占领定安国。而所有这些，都未能完全做到。

定安国虽然遭到很大的打击，却更加敌视契丹，丝毫也未屈服，并且更加密切了与宋朝的交往。987年，契丹趁其让定安国尝了尝苦头之机，规劝定安国附属于契丹，而定安国不仅不应允，而且将契丹的这种策划原原本本报告宋朝，进而建议与宋军联合夹攻契丹。^②

991年，定安国委托到宋朝纳贡的三十部女真^③使臣，给宋

^① 参阅《辽史》卷1，圣宗纪统和9年丙子条。

^② 参阅《宋会要》蕃夷3，女直，雍熙4年条：“（女直国）首领遣国人阿郝诣登州上言：本国为契丹以书招诱，今遣使持书诣州。诏书嘉答之。”

^③ 关于三十部女真的根据地，池内宏推断在咸兴地区。津田左右吉认为在咸镜道北青。小川裕人在其论文《略论三十部女真》中说：“三十部女真是各部均有一城的部族。这么多城，这么多人，不可能挤在咸兴平原这个小小的地区。从《辽史》在三十部女真前面加上长白山的地名看来，三十部女真的主要居住地肯定在咸兴平原、间岛地区以及绥芬河地区。”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朝送去了骏马与弓箭等。当时，传送与献呈弓箭之类的武器，含有共同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作战之意。这说明定安国与宋朝依然保持同盟关系，而对于契丹则依然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契丹此次东征定安国，在制止定安国进行反契丹活动和切断鸭绿江河口海上通道等方面可谓毫无直接效果，倒是使定安国更加深知其国力太弱，不久即在鸭绿江河口筑城，以努力保持其领土的完整。

另一方面 988 年（高丽成宗七年，辽统和六年）8 月，契丹以萧勤德和石老为元帅，率军攻打居住在鸭绿江河口的滨海女真（濒海女真），大获全胜，抓获大量俘虏。紧接着，契丹生怕宋军一方面从本土出发攻打契丹，另一方面一部分军队则渡海在鸭绿江口登陆，与女真联合两面夹攻契丹，遂于 989 年在岐沟关同宋军大战并大获全胜。这样一来，宋军气势大大受挫，鸭绿女真的势力也渐渐衰弱。

契丹在打败宋军与鸭绿女真，切断宋朝与女真联络的同时，努力消除宋军与女真腹背夹攻的后患。契丹考虑到前次出兵攻打定安国未能将占领区变成其领土，又深恐宋朝、女真与定安国继续制订与推行夹攻契丹的计划，竟然在鸭绿江口修建了三座城池，以便作为其领土直接统治。

991 年（高丽成宗十年，辽统和九年）2 月，辽圣宗在威寇、振化、来远三地分别筑就城池之后，派军队在这三城驻守。^① 在这三城中，来远城修筑在鸭绿江心的岛屿（现在的九连城与新义州中间）上，另外两座城郭则修筑在鸭绿江口附近。来远城是直属设在辽阳的东京司令部的重要军事机构，管辖屯兵一千人，对

^① 参阅《辽史》卷 31，圣宗纪统和 9 年 2 月甲子：“建威寇、振化、来远三城，屯戍卒。”

这支军队有指挥权。同时，它又是属于辽国东京道的行政机构，格局上属于州城，起州城的作用。

契丹在来远、威寇、振化三处筑好城郭，切断女真出鸭绿江与宋朝的交通路线之后，为了消除宋朝和女真夹攻契丹之忧，又多次征伐女真。983年（统和元年）和984年，契丹出兵袭击鸭绿江女真，获得胜利。985年与986年，又出兵蹂躏了定安国的腹地。988年，契丹军队第二次对鸭绿江女真肆行讨伐。990年，契丹军队第三次征伐鸭绿江女真。自987年以来，契丹对三十部女真所采取的怀柔政策，到了990年才在其中的部分地区初见成效。正是因为肆行多次征伐又大搞怀柔政策，到了991年（统和九年），契丹才终于有可能在鸭绿江江口筑成三座城郭，了却其一桩心愿。^①

契丹这三座城郭的修筑成功，使得处于来远城附近地区的鸭绿江女真和定安国女真不再具有反击契丹的力量。然而，契丹对于居住在较远处的三十部女真（住在威兴与间岛地区），却只是对其中一部分女真采取的怀柔政策获得成功，使之不致会对契丹进行攻击。然而，大多数三十部女真在契丹封锁鸭绿江口之后，遇到生死存亡问题。尽管三十部女真有一部分成契丹的内应，但为整个三十部女真不会坐视契丹在鸭绿江江口筑城和切断女真与宋朝的交往通道等行径。也就是说，三十部女真会继续与宋军联合，争取有朝一日摧毁这三座城郭，打垮契丹军队。

991年，三十部女真首领野里鸡派人到宋朝，报告了上述情况，建议与宋军一起夹攻契丹。宋朝考虑到当时的时机尚不成

^① 参阅日野开三郎著《统和初期契丹圣宗的东方经略与九年的鸭绿江口筑城》一文，该文刊载在天理大学朝鲜学会出版于昭和36年的《朝鲜学报》21期、22期合刊特辑号，见其第153页。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熟，未立即答应三十部女真的请求。

女真无力单独出兵讨伐契丹，只好暂时忍气吞声。

三、围绕高丽的国际关系

宋朝建国两年之后，高丽于962年（高丽光宗十三年），派李兴祐为特使到宋朝，与宋朝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高丽一直与宋朝保持了友好关系。高丽与宋朝当时国境不相邻接，根本不会发生国境纠纷。由于两国之间间隔阻着契丹与女真，其时彼此只好通过黄海频繁交往。

高丽与宋朝之所以能长久保持友好关系，固然是因为高丽需要从宋朝引进文化，而更主要是由于两国都认为，对方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有互相利用的价值。也就是说，高丽自太祖以来一直想收复高句丽故土，所奉行的是扩张领土的政策，而其北面的女真和契丹不仅是它实现这一夙愿的巨大障碍，而且因其不时侵犯高丽，故高丽一直想利用契丹背后的宋朝，以打垮契丹与女真。

另一方面，宋朝自建国以来就偏于文弱，国力也比较弱，北面不时遭到女真与契丹的入侵。为了打击与征伐契丹，也想利用位于契丹与女真背后的高丽。

高丽与宋朝的这种友好关系，与其说是互相援助，不如说更加偏重于相互利用。这样一来，难免引起不快甚至酿成事端。

985年（高丽成宗四年，宋太宗二年）5月，宋太祖为了攻打契丹，收复幽、云十六州，曾派韩国华为特使来到高丽，约请高丽兴兵支援。对此，高丽始而反对，继而勉强同意，而实际上根本未动用兵力。

从此，高丽与宋朝在表面上虽仍然照常交往，实际上则有了隔阂。而高丽遭到契丹第一次入侵后，也曾请求宋朝出兵攻打契

丹，宋朝当即加以拒绝。

高丽与女真的关系，也互相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有其双重性。高丽对于女真，奉行慰抚与征伐并施的政策。女真对于高丽也是反抗与依附并举。

渤海国被辽国灭亡之后，其遗民南下，归化于高丽。女真一遭到辽国的欺凌，想依恃高丽渡过难关，是很自然的趋势。后来，渤海国大延琳在辽东兴兵建立兴辽国时，也曾派使臣到高丽求援。兴辽国灭亡后，渤海人大多归顺高丽。辽国曾经指责过渤海、女真、高丽互相依靠互相合作，^①也说明了这一侧面的情况。女真与高丽毗邻，遭到契丹入侵时，实际上也只能向高丽求援。

高丽对于前来归附的女真人采取抚励举措，甚至授予官职。女真人前去纳贡，必给予厚重的报酬。但是，高丽对女真并非想保护与援助，更不想由于女真问题而与契丹交战。高丽想向北面扩张领土时便出兵讨伐女真，女真出兵侵扰高丽时，高丽把它驱逐出境。在这种时候，双方往往发生冲突。高丽与女真之间的双重关系，使得两者之间时而互相合作，时而发生冲突。

983年（高丽成宗二年，契丹统和元年）10月，契丹圣宗命令萧浦领等率军征伐鸭绿江流域的女真，女真误以为高丽从中捣鬼，曾呈木契（即写在木片上的文书）向宋朝告状。这说明女真虽然表面上对高丽表示友好，实际上并不相信高丽，对之疑虑重重。

自契丹修筑来远城之后，女真和定安国与宋朝的交通遂告断绝，从而契丹成功地初步制服了女真与定远国。也就是说，契丹

^① 参阅《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重熙年间上奏：“渤海女真高丽合纵连横。”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在来远、威寇、振化等三城筑栅，切断了女真通过江口与宋朝交往的通道后，女真只好亲近高丽，派使臣跟随高丽的使臣到宋朝，建议宋军、高丽军、女真军联合作战，攻打契丹的这三个城池。然而当时宋朝与高丽在对外政策方面持消极态度，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契丹发生冲突，有鉴于此，宋朝自然不会同意女真提出的这一建议。

女真对宋朝表示失望，又失去了与宋朝发生交易的大市场，便转变对外方针，宁愿归化和附属于契丹。

991年（高丽成宗十年，宋太宗淳化二年，辽统和九年），定安国王子同女真使臣最后一次赵宋朝，之后便与宋朝不再往来。这时，高丽出兵攻打住在鸭绿江西岸的女真，将其一部分逐至白头山以外，使之定居于长白山以北。

在高丽与契丹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女真各部就聚居在这个地带。在高丽与女真不相邻接时，双方未有过任何直接的交流，在表面上看来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利害关系，因而也没有任何冲突。

983~984年（高丽成宗二年到三年，辽统和元年二年），契丹突袭女真，并一直追击到高丽西北地区的德昌（平北博川南面）。肆行大讨伐之后，契丹骑兵故意闯入高丽兵营，向兵营的将士说道：“我是契丹的骑兵。女真侵入契丹边境为非作歹，我们这次是对它进行报复。现在，报复已毕，我们马上撤兵。”^①这说明双方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契丹为了与宋朝角逐天下，非征伐女真与定安国这两

^① 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时有契丹一骑，至德米河北，大呼关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骑也，女真寇我边鄙，卒以为常。今则复仇已毕，整兵回矣！’”

股宋朝的同盟势力不可。它在破坏了女真和定安国与宋朝的同盟关系，国境又与高丽相邻接，之后与高丽便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换言之，高丽一向奉行的北进政策与契丹的南进政策（征伐宋朝盟友高丽的政策），便一下子出现了短兵相接的局面。

契丹于983~984年征伐女真时，表面上声称征伐女真，实际上则是为征伐高丽而练兵。而985~986年再一次征伐女真时，契丹曾宣称其调动军队为的是东征高丽。^①

这些都充分表明，契丹奉行的是入侵高丽的政策。当时，契丹的目标是与宋朝争霸，而在其周边，高丽与宋朝维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为了达到其称霸东方的目的，契丹必须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也就是说，或者设法断绝高丽与宋朝的纽带关系，使高丽转而与契丹结成同盟；或者征伐高丽，给高丽一点颜色看看，使高丽对契丹俯首帖耳，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高丽当时并未积极响应宋朝关于两国兴兵夹攻契丹的建议，只是一味醉心于与宋朝交流文物，让使臣来往于两国之间。高丽给大臣与百姓灌输的也是慕华思想。

986年左右，契丹军队的铁蹄席卷定安国。在给予定安国与进出于鸭绿江地区的三十部女真以沉重打击时，高丽未抓住机遇北进于鸭绿江边。因为高丽成宗认为，定安国和女真虽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三十部女真的根据地在咸兴地区和间岛地区（译者按：指今吉林省东部等地区），实际上依然安然无恙。

尽管高丽与契丹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一方想北进，另一方想南下，但双方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这时，也就是986年，契丹却

^① 参阅《辽史》卷10，圣宗纪，统和元年10月条和统和3年秋7月甲辰条。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派厥烈为特使到高丽，建议永远保持两国之间永恒的和平与友好。^①

契丹在征伐定安国大获全胜之后，主动建议高丽保持双方的和平与友好，其真正的居心应当从战略的层次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当时契丹亟须从定安国撤兵，以便把军队转向中原与宋军对峙。它生怕高丽趁机袭击它，更怕高丽与宋朝结盟而出动联军对之进行腹背夹攻。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它便玩弄了这样的外交手腕以便稳住高丽。

契丹深知宋朝曾要求高丽出兵与之联手夹攻契丹，故契丹采取这种以防万一的举措是很自然的。它在与宋军对峙的同时，把高丽视为心腹之患，总想伺机出兵征伐高丽，以不致有此后顾之忧。

契丹对高丽玩弄的这种和平共处政策，确实有些见效。高丽与契丹之间，当时毕竟在紧张却无冲突的气氛中度过了五六年。

第二节 契丹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一、高丽的防备

契丹圣宗出兵灭掉定安国，沉重打击女真，一举消除来自宋朝的后患之后，派厥烈到高丽讲和。然而高丽对此并无反应，却与宋朝依然保持友好关系。也就是说，高丽派韩藺、魏德柔等到

^①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5年正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5年正月。

宋朝增进友好往来，宋太宗加封高丽成宗为推诚顺化功臣，增加其食邑一千户和食实邑 400 户。高丽成宗随即又派兵部侍郎韩彦恭到宋朝谢恩。^①契丹得知这一切，深感高丽实为腹背之患，便制订了远征高丽的计划。

高丽一心想向北方扩大势力和领土，一直在为实现其北方政策而厉兵秣马。990 年（成宗九年）10 月，高丽设置了左、右军营，在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屯兵 14000 多名，并且做好了随时增兵的准备。

发生战事时，需要贮备足够的军粮。高丽成宗出巡西京平壤时，赐给平壤府和安城等 11 个驿站大米 9300 多石，虽然不是以军粮的名目发放，但一朝有了战事，便可转为军粮。后来契丹军入侵时，为了使这批军粮不被敌军所利用，成宗曾下令把这批军粮扔入江中。这一事实，证明高丽在军粮方面确实做好了准备工作。

二、契丹的入侵

如前所述，契丹在出兵征伐女真时，每每扬言是为了征伐高丽。993 年（高丽成宗十二年，契丹统和十一年），契丹举兵侵犯高丽。在此之前，高丽西北边界的女真侦察到契丹进行入侵高丽的战备，于这年 5 月间将这一情报提供给了高丽。

居住在西北边界的女真，对高丽曾经有过误解，以木契向宋朝告状，控告高丽唆使契丹攻打他们，也曾高丽筑城于鸭绿江边时进行刁难，搞过破坏。后来，女真消除了对高丽的误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世家，成宗 9 年 6 月，12 月条；成宗 10 年 4 月条。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解，却因契丹在鸭绿江畔筑三城封锁了它与宋朝交往的通道，不得不附属于契丹。然而，它在内心却对高丽深有好感。唯其如此，它侦得契丹打算入侵高丽的情报，立即提供给高丽，唯恐高丽因而大吃其亏。高丽成宗闻报，随即召集群臣商议，群臣不理解女真的一片苦心，以为女真又在玩弄花招，竟然决定不予理会。于是，高丽未对契丹的入侵采取专门的对策，只是像平时一样有所戒备而已。

这年8月，女真再一次告诉高丽：契丹为了征伐已经调集了兵马。高丽成宗得知之后，这才慌慌张张派出兵马齐正使到各道，命令各道募集兵马军粮，对付契丹军队的入侵。10月契丹入侵后，高丽以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奔赴国境地区，阻挡契丹军入侵。

为了激扬军队的士气，高丽成宗于10月4日巡视西京之后，随即巡视安北府（现在的安城）观察局势，督励将士，强调高丽历代奉行的北进政策必能实现，再一次表明了高丽朝廷的雄心。然而这时，高丽的蓬山郡（泰川与龟城之间）已为契丹军队所占领。高丽先锋将军尹庶颜及其许多部下，已被契丹的将军萧逊宁（名恒德，又名肯德、垦德、劝德，逊宁系其字，他是契丹王驸马，任东京留守）军队活捉。战况对高丽极其不利。高丽成宗不敢继续前往督战，而后退至西京。

二、徐熙的多谋善断及其外交

这时，徐熙将军率军出征救援蓬山郡的守军，与萧逊宁军相遇。敌将萧逊宁大声喝道：“大朝（契丹）已经拥有高句丽的故土。你们竟敢侵犯我边境，我等奉命特来讨伐。”他还向徐熙将军下书，声称“大朝已经统一了天下，你们竟敢不投降，特来荡

平你们的国土。如不想死，快快把降书交来！”

徐熙将军见敌军滞留蓬山郡未再进军，而且在对阵时只是高声劝降并下书敦促投降，并无他意，当即判断契丹此次入侵不是想大战一场扩张领土，而只是想让高丽投降附属于契丹。于是，徐熙未率军接战，而是立即回到西京，向成宗提出建议：从敌军的种种表现看来，双方完全有可能达成和解，不如派使臣前往契丹妥作协商。成宗闻奏，接受了徐熙的建议，当即派监察司宪、借礼宾小卿李蒙戡去到契丹军营，交涉双方和好之事。

在使臣李蒙戡赴契丹军营途中，敌将萧逊宁又向高丽下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契丹此次出动 80 万大军，尔等倘若不至江边投降，大军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尔等理应速速来至军前投降才是。”李蒙戡到达契丹军营后，询问契丹兴兵侵略高丽的原因，敌将萧逊宁答道：“此乃汝国不体恤百姓之天罚。倘若有意求和，快快前来投降！”

使臣李蒙戡回到西京，将契丹之意上奏成宗。

成宗闻奏，在西京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会上，群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大臣说：“请王驾速回开京，派一重臣率领军士去契丹军营投降！”还有些大臣说：“不如割让西京（平壤）以北土地给契丹，从黄州到岳岭（慈悲岭）划界，以之为丽、辽之间的国境线，求得相安无事。”

当时，成宗倾向于将西京以北土地割让给契丹的割地救和论。成宗得出这种以割地求和为上的结论之后让百姓把西京粮库里的大米随意拿走。由于这样放粮之后，还是剩下不少大米，成宗为不让敌军利用这些军粮，竟下令让人把这些军粮全部扔入大同江。

成宗在位 16 年，注重道德修养，倾注心血做学问，平日过于文弱，优柔寡断，忽视燃灯、八关、仙郎等固有的庆典活动，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醉心于大兴中华风物，缺乏应有的主体性。自高祖以来一直奉行收复高句丽故土的北进政策，他在在位之时黯然失色，传统精神渐趋泯灭。当时，成宗以其这样的性格，脑子完全被败北意识所支配。也就是说，他一听敌军出动了80万大军，又多方进行威胁，便万分惊恐。得知敌将催促前来投降，竟然不想与敌军交锋。他毫无挠战之意，竟想把先王与国民流血流汗开拓和扩张的领土拱手让与敌人。国家粮库所贮军粮，本是在非常之时供军民吃用求存的粮食，他却生怕落入敌人手中，而命人丢弃于大同江之中。

这时徐熙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成宗的决定。他从敌将萧逊宁不再挥军往蓬山以南挺进，故意显示出动了80万大军，不靠将士冲锋陷阵而只是以下书表达其要求，以及再三督促速速投降等等表现，判断此次契丹出兵入侵并非想大战一场，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只是要求高丽投降，附属于契丹。他由此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契丹军队之所以如此，表明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有关的问题。徐熙将军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如果这一判断有误，不妨与之一战，然后再投降或割地赔款也不迟。

于是，徐熙反对成宗水葬粮食的决定。他奏道：“粮食充足，并守城，才能在交战中取胜。战争的胜负，与其说取决于军队的强弱，不如说取决于伺机而动。我们怎可随意扔弃粮食呢？何况，民以食为天，粮食即使被敌军利用，也比扔弃更好。水葬粮食，不合天意。”成宗一听，觉得言之有理，便只好收回成命，中止了把粮食扔入大同江的做法。

徐熙将军又向成宗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契丹东京到我国安北府，其间的几百里土地本是女真居住过的地方。光宗把它据为己有，修筑了嘉州、松城等城。此次契丹出兵来侵，旨在把这两座城攫取到手。他们虽口口声声说要取得高句丽的故土，实际

上惧怕我们。如今，我朝见契丹军队来势汹汹，便为之割让西京以北的土地，是不明智的。三角山以北也是高句丽的故土，彼等欲壑难填，倘若又提出要求，我朝能都割让给它吗？何况，现在就割地与敌，乃是万世之耻辱。但愿王驾回到开京，让臣等与敌人较量，倘若力不从心，届时再议也不迟。”^①

当时，前民官御事李知白赞成徐熙将军的看法，也向成宗进言：“圣祖（太祖）创业不易，王统延续至今。国难当前，无一忠臣为王分忧，轻率割地与敌国，多么可悲可叹！蜀国大臣售周^②劝蜀后主割地献魏，已成千古笑柄。依臣之见，不如送些金银财宝给萧逊宁，试探试探其意如何。如今之计，与其轻易割地与敌国，不如重振先王的燃灯、八关、仙郎等庆典，不袭他国之风俗，以求保全国家之太平。倘若认为臣言有理，请先告神明。而后，是战是和，由圣上明裁。”当时，成宗一味爱好中国之风俗，国民对此很不称心。故而，李知白作了如上的建议。

成宗觉得徐熙将军与李知白的如上建议不无道理，便予采纳，对自己所作不妥当的判断与决定则后悔不已。

敌将萧逊宁见高丽使臣李梦戩一去不返，高丽朝廷久而不答，为了以武力促使高丽降服，便挥军攻打安戎镇（现在的安州）。

高丽命令中郎将大道秀与郎将庾方率军与之交锋。契丹军大败。契丹军队被高丽军队以少胜多之后，气焰再不敢那么嚣张，

^① 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徐熙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176页，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金岸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73页至74页，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

^② 售周，应为谿周。谿周，蜀之西充国人，字允南。因对蜀后主阿谀奉承而官至中散大夫、尧禄大夫等。263年（景耀末），蜀衰。谿周在群臣会议上力劝后主降魏，并因而被魏王封为阳城亭侯。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不敢再向前挺进。

契丹将军萧逊宁又派人到高丽军营催促高丽降服。成宗派阁舍人张莹到契丹军营进行和好的协商。萧逊宁认为张莹官卑职低，拒绝与之商谈，让高丽派大臣前往。张莹只好无功而归。

成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环顾群臣问道：“谁愿去敌营，以三寸不烂之舌让契丹军不战而退，为国建树万载不泯之大功！”一时，竟然无人敢于挺身而出。

徐熙将军见此情景，向成宗奏道：“臣虽不才，愿意去走一趟。”徐熙将军已知契丹此次兴兵前来，似无占地之欲，只求高丽对之臣服，加之安戎镇一战已挫其锋芒，显然已有协商的余地，故而敢于担此重任。他心里想：即使协商不成，可再与之一战，决不让敌人割走领土。

徐熙将军带着国书启程去与契丹军协商，成宗到江头送行，对之激励有加。徐熙将军作为外交官向敌阵进发，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契丹乃是胡族，决不对之卑躬屈膝；即使80万大军压境，也要保持高丽的矜持与主体性；不仅寸土不让，还得确保太祖以来一直想恢复的高句丽故土。

徐熙作为外交使臣，想到首先在商谈的步骤上不能表示屈辱，便先派翻译去见萧逊宁，打探会谈如何进行，双方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萧逊宁回答道：“我乃大朝的贵人（萧逊宁是契丹王室的驸马），当我坐在大厅里，高丽使臣应在院子里向我跪拜。”他把两国的关系视为主从关系，态度十分骄横。徐熙早已料到这一层，不慌不忙，让翻译向萧逊宁转述道：“臣子向国王致意，当然得在阶下跪拜。如今，是双方的大臣会晤，岂有这等道理？”

萧逊宁执意要双方以君臣之礼相见，徐熙则主张双方以平等之礼进行会谈，双方各不相让，交涉多次，还是各持己见。徐熙

见对方顽固不化，不禁大怒，回到下榻处保持沉默，等候对方转变立场。

萧逊宁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感到非常奇怪，只好派人联系，答应双方代表登堂入室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会谈。

徐熙得知，便骑马来到契丹军队的营门，下马后，在院子里与对方代表平等地作揖。然后登堂行礼，分东西而坐。当时，分南北而坐，意味着双方是主从关系。而分东西落坐，则表明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紧接着，双方代表举行会谈。

萧逊宁说：“你们这个国家是在新罗的大地上建立的。高句丽国土已为我朝所拥有。你们侵犯了我朝拥有的高句丽国土。国境同我朝邻接后，竟然不与我们交往而舍近求远去巴结宋朝。所以，我朝今天才出兵到此。如果你们割地朝聘，双方不必再交战，可以相安无事。”

徐熙说：“你之所言差矣！高句丽的旧土本属我国。所以我国才以高丽为国号，而且定都于平壤。如果说起疆界，上国（契丹）东京（辽阳）也在我国领土之内，怎能说我们侵犯了上国的领土呢？还有鸭绿江两岸，也都是我们的领土，现在由女真偷偷地居住着。他们顽黠多端，挡住了我们两国的通道。正是他们使得我们无法与上国的天子斡旋。倘若撵走了女真，把高句丽旧地归还我们，我们修筑交通八达起城池，我们怎敢不向上国天子修聘？将军如能将我此言转奏贵国天子，当感激不尽。”

而后，双方代表开始协商。萧逊宁再次强调契丹此次出兵是因为高丽侵占了契丹的领土。为了不再引起两国之间的冲突，增进两国的友好，此时解决争端的办法，是高丽把侵占的土地还给契丹，同时断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附属于契丹。

徐熙谈到领土问题时说，不仅鸭绿江两岸是高丽的领土，连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契丹的辽阳也应隶属高丽。所以，高丽志在继承高句丽的版图。至于高丽与契丹的建交与和好，是女真介乎两国之间以妨碍和切断为能事所致。只要驱逐了女真，筑起城池，确保了高丽的领土，建交与和好不在话下。

尽管成宗和一些大臣主张割地赔款，坠入败北主义的深渊，徐熙却理直气壮认为连契丹的东京也属于高丽的领土，顽强捍卫太祖以来奉行的北进政策。他之敢于此，是因为尽管契丹在强词夺理指责高丽奉行的北进政策，但其这次出兵却是消极的，尤其是在安戎镇一战被打败之后，更是一心只想催促高丽降服，其目的显然主要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与掳掠，而是旨在断绝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使高丽与契丹建交。徐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迅速窥出了契丹的真意之所在，从而见缝插针，趁机巧妙地坚持了高丽历来奉行的北进政策。

第三节 《徐熙—萧逊宁协定》与确保江东六州

一、《徐熙—萧逊宁协定》

徐熙与萧逊宁在萧逊宁的军营会谈了七天之久。

会谈结束后，萧逊宁将高丽代表徐熙逻辑分明富有说服力的论点以及双方的协议向契丹圣宗作了奏禀。契丹圣宗听了之后说道：“既然高丽已要求和好，可予以接受，立即撤兵回朝！”^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徐熙传。

接着，双方代表签订了《徐熙—萧逊宁协定》。^①这一协定的内容包括：高丽向契丹朝觐；高丽奉契丹为正朔（月历），成为其臣民；契丹同意高丽拥有鸭绿江左岸女真的二百八十里旧地。

这一协定签订后，双方代表设宴表示祝贺。徐熙接受了萧逊宁赠送的如下礼物：10 匹骆驼、100 匹马、1000 只羊和 500 匹绸缎。

这一协定签订后，契丹破坏了高丽与宋朝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因其出动 80 万大军劳民伤财，并因安戎镇一战中大败而大失体面。

而高丽坚持了太祖以来奉行的北进政策，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江东二百八十里的旧地，同时树立了徐熙的机智外交谈判的卓越范例。当然，高丽忍受了附属于夷狄契丹的屈辱，遇到了今后如何与宋朝恢复友好同盟关系的难题。成宗及其一些大的懦弱无耻的败北意识，也在此次暴露无遗。

二、确保江东六州及善后措施

萧逊宁与高丽代表徐熙签订协定之后，率领契丹大军回国。994 年（高丽成宗十三年，辽统和十二年）2 月，萧逊宁与徐熙签订的协定经契丹圣宗批准。萧逊宁为此特地致书高丽，其书函全文如下：“萧逊宁致书曰：近奉宣命，但以彼国信好早通，境土相接，虽以小事大，国有规仪，而原始要终，须存悠久。若不设于预备，虑于阻于使人，遂与彼国商议，便于要冲路陌，创筑

^① 参阅《高丽史》卷 94，列传 7，徐熙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 178 页。参阅金岸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 77 页。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城池者，寻准宣命，自便斟酌。拟于鸭江西里创筑五城，取三月初拟到筑城处下手修筑。优请大王预先指挥，从安北府至鸭江东计二百八十里，踏行稳便田地，酌量地理远近，并令筑城，发遣役夫，同时下手。其合筑城数，早与回报。所贵交通车马，长开贡觐之途，永奉朝廷，自叶安康之计。”^①

这样一来，徐熙与萧逊宁签订的协定，便由高丽与契丹两国之间来往文书完全确定了下来。

自此以后，这一协定的内容，逐渐一一付诸实施。

高丽当即按照协定的规定，起用契丹的统和这一年号。四月，遣侍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还俘虏。^②高丽尽管占有了江东二百八十里广阔的土地，却因自太祖以来一直瞧不起胡族，以之为野蛮之夷狄，向来与之疏远，而长期具有的慕华思想和中原传入的文化以及与强大的宋朝保持悠久的外交关系，又使成宗与群臣对臣服于契丹实在难于释然。于是，高丽成宗于994年6月委派元都为密使到宋朝，告之以去年契丹军的入侵及双方签订协定的内容，说明这样做绝非自愿，而实在是迫不得已。同时提议宋军与高丽军组成联军夹攻契丹把契丹灭掉。高丽认为此时下手也为时不晚。然而，宋太宗鉴于当时宋朝与北方的契丹毫无冲突相安无事的状况很重视，认为此时与高丽联合攻打契丹乃是轻举妄动，因而未接受高丽的这一建议。

高丽对宁朝的这种态度深表失望，便决定与宋断交，转而与契丹增进友好往来。成宗派李周禎与李知白到契丹，一方面进献

^①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13年2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13年2月。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267页，该书由探究社出版于1984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13年2月，4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13年2月、4月。

高 丽 外 交 史

礼物，一方面选送 10 名少年到契丹留学，学习契丹的语言文字。这当然是高丽增进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一种手段。不仅如此，成宗还派朝之遴到契丹，提议两国通婚，以增强友好纽带。契丹欣然应允，还让东京留守（成宗驸马）萧坦德把女儿嫁到高丽。接着，高丽任命李承乾为鸭江渡勾当使，与契丹的来远城相望，负责从事鸭绿江上的往来与警戒事务。另一方面，高丽派使臣到契丹，献上妓女与妓乐，以加强双方的亲睦。契丹婉拒妓乐，未予接受。

高丽与宋朝断交并附属于契丹之后，于 994 年（成宗十三年）命令平章事徐熙率军攻打女真，赶走了女真部众，在长兴（泰川的东面）、归化二镇和郭州、龟州两地筑起城池，确保了这一疆土。995 年，徐熙将军奉命率军长驱直入女真境内，在安义（安州）、兴化二镇筑起城池，巩固了北方边防。同时，在灵州筑成有 699 个墙垛的大城，此城有七个门、两个水口、十二个城头和两个遮城。在猛州（又称孟州）也筑成一座有 655 个墙垛的大城，此城有五个门、四个水口、十九个城头和两个遮城。这一年，高丽还在云州（一名古远化镇）设置防御使，在博州也设置防御使，在抚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样一来，高丽在契丹同意高丽拥有的江东地区强化了防备，使这些地区完全成为高丽领土。995 年（成宗十四年），高丽在东界的领土内设立了十个城邑，在登州设了团练使，在宜州设了防御使。

经过徐熙采取军事行动与外交活动，经过国民齐心协力，在契丹的同意与合作下，高将鸭绿江左岸地区的女真完全驱逐出境，使这一地区成为高丽的领土。

契丹不知高丽曾派人与宋朝秘密协商，于 994 年 8 月派萧述管和李婉到高丽，叮嘱高丽好生以小事大。996 年（成宗十五年）3 月，契丹又派翰林学士张斡和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到高

第三章 契丹的第一次入侵与徐熙的外交

丽，册封成宗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成宗只好谢恩。

成宗歿世之后，穆宗于997年10月即位。11月，他派阁门使王同颖一到契丹，主要是“告嗣位”。12月，“契丹遣千牛卫大将军耶律迪烈来贺千秋节，王迎，命告于前王成宗柩前。”翌年10月，“契丹遣右常侍刘续，来加册尚书令”。^①

穆宗在位12年间，高丽与契丹的外交关系虽然不算活跃，却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往来，彼此和平无隙。

有一事值得一提：“二十三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②保州（现在的义州）有了高丽与契丹之间的榷场。榷场是互市的一种，是相互之间交换与购买土特产的场所。当时在高丽与契丹之间，有朝贡等多种贸易，不仅有朝贡品与赐予品形式的贸易往来，而且使臣们或为公或营私，让其随行人员夹带贸易，甚至通过榷场进行市场性交易。当时，契丹的上层人物穷奢极欲，奢靡程度不亚于宋朝的权贵，自然对具有国际水平的贵重物品垂涎有加。

高丽与契丹建交达二百年，其间从1005年~1010年（高丽穆宗八年~显宗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二十八年）的6年间，一直进行榷场贸易。换言之，从高丽与契丹进行蜜月外交的穆宗八年起，榷场交易一直进行到契丹第二次入侵高丽进的显宗即位一年。

榷场设在振武军与保州，且位于高丽、契丹与女真的交界

^①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穆宗即位年11月、12月壬寅，穆宗2年10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16年11月、12月，穆宗2年10月。

^② 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的《韩国史·高丽》4，第234页。参阅李龙范著《韩满交通史研究》一书第241页至243页。参阅《辽史》卷15，圣宗本纪，统和23年丙戌。参阅《辽史》卷60，食货志下。参阅方东仁著《关于高丽时代的北界划定研究》第43页，该文为博士学位论文。

处。当时，两地的榷场曾经相当繁盛，一度财货骈集、贾贩辐辏。

高丽最喜欢契丹物品是绦罗、契丹丝、人参和羊等。契丹最中意的高丽物品则为金、银、铜、布帛、础石、藤席等工艺品，以及纸墨类及鹰鹞。

然而，穆宗也是像其祖先一样，总认为契丹太野蛮，实际上所奉行的还是慕华排蕃政策。997年（穆宗二年）10月，穆宗瞒着契丹委派吏部侍郎宋仁绍到宋朝，希望与宋朝永结友好，却因契丹从中作梗而无法如愿，无法与宋朝继续加强交往。宋真宗也很想与高丽保持盟国关系和友好关系，却唯恐因而引起与契丹的摩擦，使只是慰抚来使作罢，并未采取任何增强与高丽友好交往的实质性举措。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第一节 战争的肇始

一、契丹入侵的动机与目的

成宗死后，穆宗继位。在穆宗在位的12年间（997年～1009年）高丽国内政局不稳，民心大乱。尤其是后宫淫乱不堪，以王后为靠山的大臣则横暴无度。穆宗身为国王却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高丽第6代王成宗在位16年，死于997年，年仅38岁。穆宗于17岁即位。他名叫王诵，是第5代国王景宗之子。他仅在位12年。康兆发动政变后，他不仅被废黜而且还被弑害。其后由显宗继位。

显宗即位于1009年2月。他像穆宗一样，即位后即派使臣司农卿王日卿到契丹，^①告之以穆宗被弑及自身即位之事。4月，又派工部侍郎李有垣到契丹，祝贺当时契丹掌握朝中实权的萧太

^① 契丹于太宗时改国号为辽。拙著仍以契丹称之，以契丹与辽为同一国家。

后寿辰。这年12月，萧太后南行中死于行宫。翌年，亦即1010年（显宗元年），高丽派特使到契丹吊慰。为萧太后举行葬礼时，高丽又派去参加葬礼的使节，从而密切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竭尽了藩属国的事大之礼。

显宗是由于康兆发动政变弑其君^①而得以即位的。在他与契丹的关系变得牢固之前，1010年5月，女真向契丹状告高丽。

事出有因。此前高丽尚书左司郎中河拱辰曾率军讨伐东女真，却被东女真打败。河拱辰怀恨在心，后来见有95个女真人来高丽朝贡，住在和州馆，竟串通和州防御郎中柳宗，将这95个女真人全部杀死。义愤填膺的东女真请契丹代出这口气。

契丹圣宗即位时年仅12岁。27年来，一直由母后萧太后左右一切，丞相耶律隆运则握有实权，他自己作为一国之主却未能随心所欲料理政事，直至萧太后去世后才正式亲政。他刚一实实在在掌权，便奉行比萧太后更强硬的对外征服政策，想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高丽问题是：乱臣竟敢弑君；国王手下的武将甚至无法无天，胆敢把去高丽朝贡的95个女真人悉数活活杀死。

不仅如此，尽管契丹为了使高丽断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甚至承认鸭绿江以东的女真土地归高丽所有，而高丽仍秘密与宋朝往来。契丹圣宗对此尤其恼火。于是他命人修书一封向高丽问罪，书中云：“汝与女真勾搭，而同宋朝往来，其意何在？”由此可知两国关系已有裂痕，情况对高丽不妙。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对高丽很不放心，不知昏庸无道的高丽朝廷何日会与宋军联合攻打契丹，不知反复无常的高丽何日

^① 康兆发动政变，弑穆宗而迎立显宗。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会背叛契丹，因而暗自做出决定：亲自领兵征伐高丽，誓让高丽许诺城下之盟。

显宗即位后，立即派人到契丹报告自己的继位，又派人去为萧太后贺寿，又为萧太后吊丧，派参加其葬礼，一心想增进与契丹的友好关系。然而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毫无用处，反倒招来契丹军队的入侵。

契丹圣宗打定主意征伐高丽后，曾经征求过许多大臣的意见。1010年（高丽显宗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他在群臣会议上，在康兆弑君的不忠不义上大做文章。他谓群臣曰：“高丽康兆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也。宜发兵，问其罪。”群臣皆曰：“可！”^①

他得到群臣的赞成后，为使其亲征万无一失，遂主要采取以下三种举措：

第一，充分准备兵力，检阅军队。他认为这是侵略高丽的先决因素。获得群臣支持后，圣宗便向全国下令，命令军队做好出征的准备。

第二，他生怕契丹军攻打高丽时，宋军会与高丽军联合起来，从后面袭击契丹军，更怕高丽与宋朝组成联军，因而特地派将军耶律宁到宋朝展开先发制人的封锁外交，^②以杜绝丽、宋联合之患。

宋朝事先得得到通报后，考虑到高丽有可能派人来宋朝求援，

^① 参阅《辽史》卷88，萧敌烈传：“统和二十八年，帝谓群臣曰：高丽康兆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也。宜发兵，问其罪。群臣皆曰：可。”

^② 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3年10月：“雄州（现在的中国河北省雄县，当时是宋朝的北方要地）言：契丹涿州移谍言，本国将征高丽，遣右监门将军耶律宁奉书来告。”

或者建议组成联军，竟然预先找好了婉言拒绝的借口。因为在当时，宋朝不想与契丹作对，更不想为高丽与契丹交锋而弄得两败俱伤。

在6年之前，也就是在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高丽穆宗七年）9月，契丹曾兴兵入侵宋朝。契丹军从河北省南下，冲破宋军费尽心机布下的沼泽地防御设施，推进到黄河北岸。宋军按照宰相寇准的作战计划，渡过黄河在澶渊摆下战阵，阻击契丹军。双方对峙了几天，宋朝与契丹终于不想再打下去，选择了媾和，双方签订了条约。这一条约的内容有：（1）宋朝每年送20万匹丝绸、10万两纹银给辽国，作为其军事补助费；（2）宋、辽国境线维持原状，双方不得在国境附近修筑军事设施；（3）互不隐匿亡命者。此外，契丹圣宗称宋朝真宗为兄，两国结为兄弟之邦。由于谈判之处是澶渊，这一盟约在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①

宋朝与契丹有了这种关系，在高丽与辽国交锋之时，自然不会助其一臂之力而与契丹交恶，更不想因而兴师动众。考虑到高丽很有可能又来求援或提议组成联军夹攻契丹，竟然事先想好了婉拒的借口，这就是：“高丽已有多年未向天朝朝贡。”当时，高丽虽与宋朝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商人却来往频繁。宋朝的名士亡命于高丽，高丽甚至加以重用。然而，双方都只有私人的交往。

实际上，当时宋朝已相当文弱，国力也不强，即使有心倾向高丽，面对强大的契丹也不敢孤注一掷帮助高丽，进而惹火烧身。

^① 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卷4，第233页至234页，该书由探究堂出版于1984年。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第三，契丹根据萧敌烈的建议，首先派使臣到高丽促其就范。契丹圣宗在征求群臣的意见时，多数大臣莫不赞成，只有萧敌烈认为需慎重行事，先派使臣前去作外交交涉，然后视情况再做决定。他说：多年来，我朝连续用兵，将士已相当疲乏。何况陛下尚在丧中，新粮尚未收成，军粮也嫌不足，在出兵方面还有不少欠缺之处。高丽虽岛夷小国，城垒却很坚实，我朝即使大获全胜，也无可炫耀之处，而万一大败而归，则后悔莫及。”他所提出的建议是：“先派一使臣到高丽，询问康兆弑君之缘由，如其知罪，恕其莽撞。倘若桀骜不驯，待陛下服丧期满，国内又获丰收之时，再出兵声讨，也为时不迟。”

契丹圣宗接受了萧敌烈这一建议，于这年7月派给事中梁炳和大将军耶律允到高丽，了解了前王穆宗被弑的真相。

高丽在向契丹特使梁炳等讲明真相之后，于这年8月派内史侍郎平章事陈颀和直中台尚书右丞尹余，到契丹增进两国关系。9月，又派左司员外郎金延保到契丹，向圣宗请秋安。紧接着，派左司郎中王佐暹和将作丞白日升到契丹东京，商谈希望搁置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增强双方的友好交往。

高丽已预见到契丹会借故再度入侵，便一方面与契丹进行外交交涉，另一方面任命参知政事康兆为行营都统使检校尚书，率领30万大军驻守契丹入侵的必经之路通州（现在的平北宣川），^①防止契丹军长驱直入，阻敌于国门之外。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元年7月戊寅，8月丁未，9月、10月丙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显宗元年7月、8月、9月、10月。

二、第二次丽、辽战争

1010年（高丽显宗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月，契丹派给事中高正和阁门引进使韩杞到高丽，告知契丹将起兵攻打高丽。高丽当即派参知政事李礼均和右仆射王同颖到契丹，请契丹中止出兵，保持双方友好。11月，高丽又派起居郎姜周载到契丹，贺冬至礼。当时，高丽对契丹竭尽了以小事大之礼，却未对之屈服。

圣宗又派将军萧凝到高丽，通告辽圣宗将亲自率军征伐高丽。^①15天后的11月16日，契丹圣宗果然亲自率领40万大军，渡过鸭绿江，入侵兴化镇（义州东南三江桥北侧），将该城团团围住。

守卫兴化镇的都巡检使杨规，与镇使郑成、副使李守和一起，激励士卒坚守城池。这样一来，契丹40万大军一时无法攻陷该城，过了7天仍难以往南推进，只是活捉了一些在城外收割庄稼的农夫，让他们把书函带进兴化镇。该书函写道：“此番兴兵前来，是问康兆弑其主擅立新君之罪，只要交出康兆，我们立即撤兵。否则，大军直捣开京，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契丹军甚至给兴化镇的高丽将士送去了绸缎衣饰与银碗。契丹所采取的手段，是对高丽将士尽怀柔笼络之能事，旨在掩盖其南侵的真实企图，使高丽国民对康兆弑害穆宗的事件不满。然而，杨规将军及城中将士与百姓却毫不为之所动，坚守城池。

契丹圣宗无计可施，只好不再包围兴化镇，而是兵分两路，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元年10月癸丑，11月丙子。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显宗元年10月、11月。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于11月22日派20万大军驻屯于麟州（现在的新义州南面），自己亲自指挥20万大军向通州进发，与康兆指挥的30万大军决战。

康兆率领将士来到通州城南面，与契丹军对阵。他将部队分为三部分，摆起了背水阵。他让一部分将士在通州城西面的小溪汇合处，摆起阵势，亲自坐镇在这里指挥，同时让一部分将士在附近山麓摆起了阵势，让另一部分将士在城里把守。这时，他利用起特地准备好的剑车每次契丹军一进攻，他就出动剑车，把敌人碾死，从而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契丹军的20万兵卒面对这些剑车，一个个束手无策。

康兆看到敌人望车兴叹，竟骄傲自满起来，瞧不起敌人，兀自与部将下围棋消闲，放松了警惕。就在他逍遥自在优哉游哉下围棋期间，契丹先锋耶律盆奴率领敌军攻破了三水砦。高丽军阵脚大乱，守将连忙报告康兆：“敌军已冲上来了！”哪知康兆却泰然自若，说道：“这就像嘴里的食物，太少了嚼不出味道。让敌人来吧，多多益善！”他边说边继续下围棋。

不久，守将又来向他禀报：“敌军涌入者越来越多啦！”他大吃一惊，起身喝道：“真的？”在这一瞬间，他神情恍惚，好像看到被他弑害的穆宗站在面前指责他。穆宗的幻影对他吼道：“你这奸贼！干尽坏事，丧尽天良，天理难容！我看你今天往哪里逃！”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当即解甲卸盔跪在地上连声自责：“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就在他喃喃自语之际，契丹将士已一拥而入，将他捆绑得结结实实，用一条毯子把他抬走。他的部将李铉云也成了俘虏。^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7，列传40，康兆传。《高丽史》卷94，列传7，杨规传。

与此同时，卢颀、司宰丞徐崧、主簿卢济等高官纷纷战死，都官员外郎卢戡、监察御史卢颀、杨景、李成佑等许多重臣成俘虏。高丽军大败，纷纷退却，契丹军则穷追不舍。高丽将士损失30000多名。撤退时，高丽军队损失了许多武器和无数军粮。

康兆被俘后，并未丧失高丽人的骨气。契丹圣宗见他卓有节操，对他耐心说教。为了考验他的意志，圣宗为他解去绳索，问道：“你愿意当我的大臣吗？”他答道：“我是高丽人，怎能对你俯首称臣？”这真是威武不能屈。契丹圣宗又把这样的问话重复了好几遍，而他的回答始终如一丝毫不改。圣宗勃然大怒，让人边对他施加荆肉的恶刑边要他俯首称臣，而他的回答还是：“我是高丽人，怎能对你俯首称臣？”

契丹圣宗继而吓唬康兆旁边的俘虏李铉云，要他降服称臣。李铉云未予作答，却吟了这样两句诗：“双目已见新日月，一心怎思旧山川？”诗句的意思很明显：愿意投降向契丹王俯首称臣。康兆见李铉云如此无耻，气愤得踢了李铉云一脚，骂道：“你也是高丽人，怎能卑怯得出此媚语？”契丹圣宗见康兆不是可以软化的懦弱之辈，便命人将他处死。

康兆发动政变弑害穆宗，其咎难辞，但他在外敌面前却显示了高丽人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和高丽武士的气魄。

康兆军是高丽的主力军。这支军队一被击垮，契丹军便把锋芒转向了在其后方布阵以待的兴化镇杨规军。契丹侵略军以已死的康兆的名义写了一封劝降的假信，命人送至兴化镇，敦促杨规率军投降。杨规读完这封假信咬牙切齿吼道：“我是奉国王之命而战，不必按康兆的命令行事！”

契丹军又让被俘的卢戡和马寿等带着檄文到通州，劝驻守通州的高丽军投降。通州城中的将士见卢戡等大臣带着契丹檄文前来劝降，始而有点畏怯。中郎将崔质和洪淑等见城中军民士气大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受影响，十分厌恶卢戡与马寿二人的叛变行径，便毅然将二人捆绑关押起来。然后，防御使李元龟等将士将城门紧闭，率军拒敌守城。城中百姓安定下来之后，也与军队团结一致，携手共同抗击敌人。

这年12月6日，契丹军占领郭州（现在的郭山）挥军南下，到达清川江。在安州布好阵势的安北都护府使朴进见势不好，竟弃城潜逃。安州城民也随之四散逃命。契丹军趁势进攻西京平壤，放火烧毁了中兴寺木塔。翌日，肃州（现在的肃川）也宣告陷落。7天后，契丹圣宗亲自率军攻打西京，想团团围住西京，一举将其攻陷，却因高丽军队顽强抵抗而未能如愿，只好从东面围住西京。

当时，西京军民顽强抵御誓死抗战。就在契丹圣宗率领大军攻打西京之时，已成俘虏的卢颢当向导，与契丹人刘经赉檄至西京谕降。副留守元宗奭与部将崔纬、咸质、杨泽和文晏等商议之后写下了降表。智蔡文等闻之，引兵至西京城门，等到卢颢与刘经揣着降表一到，将他们二人掩杀，当即取其表付之一炬。

其时，都巡检使卓思政率领将士赶到西京，智蔡文与之会合，一起坚持守城。

而高丽显宗见三军已败，诸州郡沦陷，竟懦弱生畏，命人把降表送到契丹军营，要求与契丹圣宗会晤。圣宗允诺，让部将暂停攻打西京，而任命马保佑为开城留守，王八为副留守，在占领区建立了行政体制。另一方面，圣宗任命阁门引进使韩杞为特使，带领200名骑兵到西京北门，大声喊道：“我皇帝昨日派刘经与卢颢等揣诏书前来劝尔等投降，你等为何至今没有回音？倘若不想违旨抗命，留守与官吏快快前来，听我实言相告！”

都巡检使卓思政听了韩杞的狂言，当即与智蔡文商议，然后与部将郑仁荣一起，带领骑兵突然破门而出，杀死韩杞及100多

名契丹骑兵，将其余 100 名骑兵活捉。这样一来，卓思政等以其实际行动使显宗上降表与契丹圣宗受降的安排完全失效。

契丹圣宗大怒，命将军乙凛率军攻打高丽军队。卓思政和尚法言带领九千将士在林原驿南面与契丹军接战。卓思政率领部将杀死敌军 3000 多名，和尚法言不幸战死。

在契丹军后方，杨规将军率军从兴化镇攻入郭州，打垮驻守郭州的契丹军，救出 7000 多名高丽人，成功地使这些民众转移到了通州。

契丹圣宗见高丽军依然在契丹军后方坚持抵抗，西京又一时难以攻陷，便决定全力进攻高丽西京，以控制高丽全局。

翌日，契丹军大举反击，圣宗亲自督战于西京西面佛寺。卓思政见势不妙，率军后退。将军大道秀率军抵抗了一阵，见形势于己不利，竟向契丹军投降。这时，赵元被推戴为兵马使，把零散的将士集合起来，独自指挥军民，英勇守护西京。

都巡检使卓思政率军回到开京，向显宗奏明西京的惨败状况，建议君臣向契丹投降，群臣也都附议。只有姜邯赞反对投降，说道：“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众寡不敌，当避其锋，徐图兴复耳。”他劝显宗南行。于是，显宗去南方避难，姜邯赞则率军继续与敌人作战。^①

三、显宗的避难与蒙羞

显宗生于 992 年（成宗十一年）7 月，于 1009 年继穆宗即位，当时是个 17 岁的少年。他踏上避难的征途后，大臣们乱作

^① 参阅《高丽史》卷 94，列传 7，姜邯赞传。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三荣出版社 1984 年，第 222～223 页。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一团。有的随即叛变，有的还想谋反。然而，智蔡文忠心耿耿，自愿保护国王安全避难。显宗对他说道：“昨日，李元与崔昌前来表示愿随我离京，而现在却不见其身影，为君之臣岂能如此？卿愿前来护卫，诚意与忠心着实可嘉！”

12月17日晚上，显宗在智蔡文护卫下，带领后妃、吏部侍郎蔡忠顺和50多名禁军，悄悄离开开京南下。在避难的途中，显宗处处受惊，灾祸丛生。

显宗刚到积城县丹枣驿，便有武率坚英前来行刺，智蔡文击退之。到昌化县，当地官吏又横生枝节，智蔡文机智地护卫显宗脱了险。

显宗来到扬州，河拱辰和柳宗、高英起等前来迎驾。“河拱辰追谒于道，奏曰：‘契丹本以讨贼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请和，彼必班师。’显宗筮得吉褂，便命河拱辰与高英起，奉表状往契丹营。”^①

契丹军队占领开京后，到处杀人放火。河拱辰等奉表状去讲和，却一去杳无音信，显宗在行宫里得到的只是他们被俘的小道消息。侍奉在显宗身边的佞臣们心生恐惧，大多借故离开显宗逃之夭夭。只有侍郎忠肃和张延佑、蔡忠顺、周佇、柳宗，金应仁还留在显宗左右忠谨如前。

显宗无意亲自去朝拜契丹圣宗，也不想当面向他投降，便于1011年1月4日离开广州，南下至鼻脑驿，不想在这里又一次蒙羞。当时，柳宗奏道：“臣之故里阳城就在近处，请去暂时驻蹕。”他听了很高兴，命起驾赴阳城。柳宗把显宗带到其故乡后，与金应仁一起趾高气扬，当晚假传御命，拆去显宗的马鞍分给众乡亲。当地百姓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稀里糊涂接受了

^① 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卷7，河拱辰传。

下来。到了天明得知真相，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纷纷逃命。柳宗与金应仁等见智蔡文对显宗忠心耿耿，矢志保护显宗，自知难以下手，也难以有所作为，只好跟随当地百姓之后也逃之夭夭。

显宗一行抵达参礼驿时，全州节度使赵容谦竟只穿野服未穿正服迎驾。朴暹见其对王不恭，便向显宗奏道：“全州乃古百济，圣祖（太祖）一向讨厌此处，请圣驾莫在此驻蹕。”显宗觉得言之有理，便未去全州，而留宿于长谷驿（现在的水原）。赵容谦与转运使李载合谋，声称由他们负责勤王，想借王威而掌握朝政大权。智蔡文平息了他们引起的骚乱，赵容谦只好灰溜溜返回全州。^①

1月11日，在契丹军占领开城之后的第十天，契丹圣宗让其将士撤出开京。显宗不知“乙酉丹兵退”，于12日经由仁义县（现在的泰仁）抵达水多驿（现在的宝城）。13日，又到罗州，并在罗州留宿。当晚，候人（掌管迎送宾客事宜的官吏）奏道：“契丹兵丁赶到！”显宗年轻，一听之下大吃一惊，竟然拔腿往外就跑。智蔡文奏道：“大驾倘若连夜离去，必使百姓惊恐不安，民心大乱，不如先回行宫歇息，待臣探知军情之后再行离去，也不算太迟。”显宗这才心神稍定。

智蔡文仔细一打听，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河拱辰等交涉成功，契丹圣宗已命令其军队撤离开京，却留下河拱辰等作人质。河拱辰写好密信，连同契丹前锋元帅（契丹驸马）的信一起，交给通事舍人宋彦均和别将丁悦（他们作为河拱辰求和的使者，先行进入契丹军营）带给显宗。候人见他们骑马赶来，以为是契丹的追兵，连忙报告显宗，使显宗虚惊一场。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2年正月乙酉：“乙酉丹兵退。”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2年春正月乙酉。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1月16日晚上，显宗读了宋彦均与丁悦带来的两封信，才知契丹军已撤离开京，河拱辰等则已被契丹军留作人质。契丹驸马所写的信是用契丹文写的，显宗身边又无翻译，不知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不难猜测是要显宗去朝觐契丹圣宗。

显宗得知契丹侵略军已撤离开京，却不作声张继续踏上避难的征程。1月24日，到达古阜，25日过金沟，26日抵达全州。他在全州逗留了7天。2月3日（丁未），他离开全州来到砺山县。4日到公州，停留了6天。这期间，他娶金殷溥的长女为王妃。

2月13日，显宗到清州。15日，他在行宫举办燃灯会。16日离开清州，于23日回到京都开城。

显宗在避难期间，大失国王的体面与气度，所到之处每每遭难，可谓王威尽失。他得知敌军已退却，但不思迅速回宫收拾局面，竟有闲心再娶王妃醉心于新欢，怎能不受知情者责难。

第二节 高丽的媾和外交

前述显宗在扬州接受河拱辰与高英起等的求和建议，任命其为媾和使节，让他们去契丹军营进行有关交涉。

显宗在战火中与契丹进行媾和交涉，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如前所述，是在西京陷落、高丽三军一败涂地之时，显宗向契丹交降表愿意朝觐契丹圣宗。没想到卓思政等与敌军交时截得显宗的降表，一气之下把它烧成灰烬。于是，那次求和也就胎死腹中。第二次让河拱辰等带去的高丽国书，史书未予记载，估计其内容还是：“只要契丹圣宗答应撤兵，显宗愿意亲自朝拜上国皇帝圣

宗。”

河拱辰等为了媾和到达昌化县，想先摸清底细，窥察契丹的意向，弄清它此次究竟是想继续攻掠必欲灭亡高丽而后快，还是只要达到某种目的便罢兵。于是，他以表状授郎将张旻与别将丁悦，让他们先到契丹军营，请求讲和撤兵。张旻等带着表状到敌营，说道：“我国王固愿来觐，第惧兵威，又因内艰，出避江南，遣信臣拱辰等陈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惧不敢前来，请速收兵。”^①

契丹军营对张旻等的提议毫无反应，却派一支部队南下，到河拱辰所在的昌化县与河拱辰直接对话。河拱辰等把国王显宗的意愿，像张旻所说的那样，重述了一遍。契丹的先锋将问道：“你们的国王上哪里去了？”河拱辰判断他们对高丽的地理情况知之甚少，便故意说了谎话：“江南很远，他现在也许在几万里之外。具体的去处，我无法得知。”契丹的先锋将听完，没再说什么，领兵而去。河拱辰这才知道契丹军队对于开京以南的高丽地理情况竟全然不知。

契丹圣宗听了先锋将的奏报，认为为了让高丽国王前来觐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他活捉。然而，从此处去江南迢迢几万里，追击起来多有不便，便采取第二方案，即攻陷开京。于是，1011年1月1日，他亲自率领军队攻占开京，放火焚烧开京的宫阙、宗庙、民宅与文物，极尽破坏之能事，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显宗判断以高丽的兵力无法让40万契丹大军撤走，当时又不想去朝觐契丹圣宗，当面向他投降，便继续向南方避难。为了使契丹军队早日撤走，他采取了两种措施：其一是依恃佛力，其

^① 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河拱辰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元年12月甲戌。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二是展开外交谈判。

在借助佛力使契丹罢兵方面，他与大臣一起对菩萨作无上大愿的祈祷，发誓许愿说一定出齐大藏经的雕版。^①另一方面，他指示河拱辰以假朝觐为条件，与契丹军队交涉撤兵。

契丹军队攻陷开京两天以后，亦即正月3日，河拱辰与高英起等到契丹军营，交涉契丹撤军事宜。契丹圣宗见自己这次亲征对为忠不义的乱臣贼子问罪已毕，康兆已被处决，大军又占领了开京，感到业已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又听说高丽国王将来朝觐他，便以之为条件同意罢兵。于是，圣宗将河拱辰与高英起扣留为人质。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以之作高丽显宗亲身朝拜契丹圣宗的担保。河拱辰等被扣为人质后，偷偷地写了一封密信，交给已在契丹军营的丁悦，让其把自己与契丹交涉的结果报告显宗。

显宗读了这封密信，明知敌军已撤出开城，如前所述，却依然辗转于避难的旅途之中。

第三节 契丹军的撤退与高丽军的追击

契丹圣宗在与高丽显宗派来的求和使节河拱辰与高英起协商之后，决定撤军。1011年1月11日，亦即契丹军占领开城10

^① 据说，显宗一向佛天盟誓雕刻大藏经版，契丹军便悄然退去。深信有此灵验的高丽人在以后蒙古军队入侵时，曾经效法显宗的做法，雕刻了大藏经板。在朝鲜历史上，将显宗时的雕板称为第一次大藏经雕版，将蒙古军来侵时亦即高宗时的雕版，称为第二次大藏经雕版。参阅《东国李相国集》卷25，大藏刻版君臣祷告文；《大觉国师文集》卷15，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

天之后，契丹军开始撤出开城。

当时，契丹圣宗虽然率领军队攻陷了高丽首都开京，却没有勇气也未能做好准备，无法派军队去追击业已避难于罗州的显宗。契丹军尚未拿下兴化镇、龟州、通州和西京，就径去攻陷开京，在其后面，以杨规等为主的高丽军士气昂扬。这样一来，契丹也就无法再往南推进。据《高丽史》和《东国李相国集》记载，当时，显宗及其许多大臣竟然完全相信契丹军之所以撤走，是显宗向佛天许愿一定再刻大藏经雕版的效验。

这时，契丹圣宗为了保证撤军途中的安全，曾派 200 多名骑兵去西京，规劝高丽军投降。卓思政断然加以拒绝，杀死了 100 多名敌人。紧接着又击溃了撤退中的 1000 多名契丹骑兵。

龟州、通州和郭州等地军民继续严阵以待。敌军来袭时，顽强地加以抵抗；敌军南下时，杨规将军与金叔兴将军等率军在契丹军后方袭扰；敌军撤退时，又给予最后的打击。

1月 17 日，龟州别将金叔兴与中郎将保良一起率军攻打契丹军，杀死敌人一万多名。18 日，杨规将军率领将士在无老代进行奇袭，毙敌 2000 多名，救出被敌人抓去的 2000 多名百姓。19 日，杨规率领将士在梨树（现在的义州）与敌人交战，追击到义州地区的石岭，杀死敌军 2500 多名，救出被俘的 1000 多名老百姓。22 日，杨规率军在义州地区的余里站与敌军血战，歼灭敌人 100 多名，救出被俘的 1000 多名高丽人。这天，杨规与其战友三战三胜，在艾田与契丹军队接战，歼敌 100 多名。过了不久，契丹圣宗亲自指挥大军突然奔袭而来，杨规与金叔兴与之战斗了一整天，结果，箭矢射尽，将士全部捐躯，他们也在阵地上壮烈牺牲。

杨规身经七战，率领将士杀死敌人无数，解救了被敌人俘虏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的百姓 30000 多名，缴获战马与武器不计其数。^①

契丹主力部队在受到杨规将军及其将士的攻袭之后，已溃不成军。受到高丽军的多方攻击，加上天降暴雨，契丹军队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雨停始得渡过鸭绿江。这时，郑成将军又率领将士追击，往后撤退的契丹军队在过桥时，受到这一奇袭，溺死江中者不少。战况有了这样的转机，原来向契丹投降的好几个城池也已重归高丽。^②

2月29日，在退却途中遭到伏击的契丹圣宗，渡过鸭绿江回到来远城，受到皇后与皇弟的迎接。这座来远城，是契丹为切断女真与宋朝交往的通道，而于990年（高丽成宗十年，契丹统和九年）在鸭绿江中的黔同岛上建立起来的。

必须记述一笔的是，江东六州和鸭绿江以东的女真人，与高丽团结一致击退了契丹军队。女真与高丽是不同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女真过的是半游牧生活，与过着农耕生活的高丽人也不一样。然而，当时他们已熟悉了高丽的文化，顺从于高丽的统治，因而与高丽同心协力击退了契丹。^③

高丽在击退契丹大军之后论功行赏，致力于理顺混乱的体制，慰抚全国百姓的民心。与此同时，一方面做好准备，以防契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2年2月壬寅。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杨规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杨规传。参阅《辽史》本纪，圣宗统和29年正月条：“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龟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霁乃得渡……次鸭绿江。”《辽史》所记载的日期有误。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3年11月条。参阅《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女真条。

^③ 参阅《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女真条：“契丹征高丽，道由女真。女真复与高丽合兵拒之。契丹大丧师而还。”另参阅《宋史》高丽传，大中祥符3年：“大举来伐，询（显宗）与女真设奇激击，杀契丹殆尽。”

丹军队再次入侵，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方式，想消除高丽与契丹之间不和谐的关系。

1011年（显宗二年）4月，高丽派工部侍郎王瞻到契丹，对契丹军队的撤走表示谢意。8月，又派吏部郎中崔元信到契丹。10月，派都官郎中金崇义到契丹贺冬至之礼。11月，派刑部侍郎金瞻傅到契丹，祝贺契丹圣宗的生日，增进友好关系。

契丹圣宗回到宫中，回顾这次远征高丽，深知并未讨到任何便宜，反而在撤军时遭袭，损失了不少人马和兵器。若论有所得，则是得到了显宗亲来朝覲的许诺与河拱辰、高英起这两个人质。圣宗很赞许河拱辰的高风亮节，对他相当优待，让他住在燕京（现在的北京），娶良家之女为妻。然而，河拱辰无日不在思念高丽，思念自己的祖国。

河拱辰一直想伺机归国，“多市骏马，列置东路，以为归计”。有人将这种情况报告契丹圣宗，圣宗当面询问此事，他具实以对，说道：“臣于本国不敢有二心，罪当万死，不愿生事大朝。”圣宗敬其忠义，恕其准备逃走之罪，谕令他改节效忠。而他以自己是高丽人而感到自豪，见契丹圣宗一再劝他，感到十分反感，与圣宗谈话时措辞又越发厉而不逊。圣宗见其不想回心转意，便命人将他处决。显宗二年（契丹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2月的一天，河拱辰被斩，契丹刽子手扒出河拱辰的心肝争相食之。^①从这一件事，可知契丹的一些人对河拱辰多么恨之入骨，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2年12月。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河拱辰传：“拱辰既彼留，内图还国，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宠遇。……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骏马，列置东路，以为归计。人告其谋。契丹主鞠之，拱辰具以实对，且曰：‘臣于本国不敢有二心，罪当万死，不愿生事大朝。’契丹主义而原之，谕令降节效忠。拱辰辞益厉不逊，遂杀之。争取心肝食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2年12月。

第四章 第二次丽、辽战争

也可以想见契丹必会再度入侵高丽，以泄其愤。

另一方面，河拱辰虽死得很悲惨，却表现了高丽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对高丽国王忠心不渝的品格，以及不为异邦人的权力与利欲所诱惑的气节，使世人对之肃然起敬。

卒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

第一节 契丹挑起战端

在高丽与契丹之间的土地上，居住着女真。对于这块土地与女真人，高丽与契丹的意图可谓全然不同。

高丽为了确保高句丽的故土，一直在积蓄实力，也一直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扎扎实实推行北进政策。契丹则特别注重封锁女真与宋朝的交往途径，同时总想伺机南下。

在契丹与高丽的边界仅以鸭绿江一江之隔而互相毗邻之后，契丹圣宗与契丹前两次侵略高丽时不同，竟然打起了江东六州地区领土的主意。江东六州原是鸭绿江以南女真的领土，契丹圣宗以之为一块肥肉，对之垂涎三尺。契丹本是游牧民族，侵略他国可谓家常便饭，而其国主圣宗更是好大喜功，总想寻找机会显示其凛凛威风与赫赫武功。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侵略高丽的战争中不仅无成功可言，而且尝到了败北的滋味，便总想对高丽进行报复。这种报复心一发作，很自然地表现为对鸭绿江以东高丽领土的征服。

高丽在契丹圣宗两度入侵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对契丹做好了和与战的两手准备。为了对付契丹军队的再次入侵，高丽于显宗二年8月重修了松岳城，在西京修筑了皇城。这年，亦即1011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年（显宗二年，辽统和二十九年）的4月，高丽派工部郎中王瞻到契丹，对契丹的回师（实际上是后撤）表示感谢。8月，派户部侍郎崔元信到契丹。10月，都官郎中金崇度奉命前往契丹。11月，元成王后的父亲、刑部侍郎金殷溥奉旨到契丹。他们或贺冬至之礼，或祝贺契丹圣宗的生日。

高丽对契丹采取这样的亲近举措，无非是想收拾战后的局面，而契丹却另有打算。这年11月，契丹杀死了战时奉命去求和而被契丹圣宗扣留作人质的高丽忠臣河拱辰。1012年（显宗三年，契丹开泰元年）3月，契丹又指使女真人在来远城绑架了到契丹祝贺圣宗生日之后回国的高丽使臣金殷溥，至10月才予以释放。^①

契丹不理睬高丽在战后所表现的诚意，竟然采取了这些挑衅性的举措。1012年（显宗三年，契丹开泰元年）4月，契丹终于又伸出了侵略的魔掌，要高丽显宗去朝觐契丹圣宗。^②契丹第二次侵略高丽时，显宗在去南方避难的途中，为了使契丹军队撤走，采取了这样的非常措施：让河拱辰奉表状去契丹军营求和，许诺契丹如果收兵，显宗固愿来觐。这本是一种权宜之计，从高丽这方面来说，考虑到事关国家的体面，无法实现这一诺言。

于是，这年6月，高丽派刑部侍郎田拱之为夏季问候使到契丹，转达了高丽方面关于显宗亲自朝觐的难处，理由是：“王病不能亲朝。”在这个问题上，契丹认为这本是高丽显宗主动的许诺，契丹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才收兵，高丽不应食言。而高丽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2年12月。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金殷溥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2年12月，3年3月，闰10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3年4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3年4月。

显宗当时做出这样许诺，实在是出于无奈，无非是想让契丹军撤走，根本无意履行这样的诺言。

契丹圣宗见高丽国王显宗故意以生病为借口而无意亲自朝觐一怒之下决定攻取兴化镇、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这江东六州。^①第一次丽、辽战争期间，徐熙与萧逊宁签订协定，以打开高丽与契丹之间交往的通道为名，契丹同意这江东六州算是高丽的领土。后来，高丽命令徐熙率领军队征伐女真族，对江东六州进行开拓，筑起了城池，江东六州也就完全成为高丽的领土。然而到了这时，契丹以高丽显宗弃约为由而要高丽交出江东六州，这对于高丽来说，就像显宗亲自朝觐圣宗一样，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契丹圣宗之所以要占有江东六州，一是想对高丽进行报复，二是认清了江东六州的战略价值，萌生了扩大领土的欲望。对于他来说，这两者均是其出兵的理由。

此后，双方的外交官围绕高丽显宗亲自到契丹朝觐圣宗的问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这年9月，高丽派西头供奉官文儒领到来远城。闰10月，又派工部尚书参知政事张莹和礼部侍郎刘徽弼到契丹。13天后，契丹派契丹使大尉韩郃到高丽。12月，作为使臣到契丹的张莹，同契丹外交使节引进使李延弘一起归国。翌年，亦即1013年（显宗四年，契丹开泰二年）1月，高丽派礼宾小卿张洎到契丹，2月又派中樞院使蔡忠顺到契丹。^②

尽管高丽派出这么多使节，为和平解决显宗亲自朝觐问题和江东六州问题作了极大的努力，而契丹干脆不想再谈论显宗的亲

^①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3年6月，甲子：“遣刑部侍郎田拱之如契丹，夏季问候，且告王病不能亲朝。丹主怒，诏取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六城。”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3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3年9月己巳；闰10月庚午、癸未；12月庚寅；显宗4年1月丁酉，2月庚寅。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自朝覲问题，对于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则强硬地声称以武力加以解决。

1013年（显宗四年）3月，契丹派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平行到高丽，抗议高丽占有江东六州。7月，又派耶律平行踏查江东六州，对江东六州的地形地物进行了勘察。^①这充分表明契丹以武力解决江东六州的决心已定，想一举撕毁前次签订的徐—萧协定。

高丽深知契丹占领江东六州的野心已不会改变，正在寻找侵略的借口，便一方面继续做和议的打算，另一方面做好准备与契丹军决战。这年6月，高丽为其派往契丹谈判却被契丹扣留而无法回国的官员升迁官职，提升陈颀与李礼均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王同颖为内侍侍郎平章事，尹余为司宰卿，王佐暹为将作小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慰抚这些竭尽才智与契丹打交道的官员，另一方面旨在燃旺举国上下对契丹的仇敌恚心。

高丽既已决心与契丹军一战，便想找个同盟军。于是，8月，派内史舍人尹徵古到宋朝，极想同以往一样与宋朝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结盟对付契丹。“宋帝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之”，对结成同盟则毫无诚意。^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4年3月戊申，7月戊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4年3月、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5年6月、8月甲子：“八月甲子，遣内史舍人尹徵古如宋，献金线织成龙凤鞍幞……仍请归附如旧。宋帝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5年6月、8月。

第二节 第三次丽、辽战争

一、围绕江东六州的第一次入侵

这年9月，契丹派将军李松茂最后一次踏查江东六州，发动战争的准备大致就绪。10月，契丹任命萧敌烈为总指挥率领大军攻打通州（现在的宣州）和兴化镇（义州）等地。

高丽与契丹围绕江东六州的领土权问题协商已久，知道交战已是必不可免，在战争打响之前做好了和、战两手准备，所不满意的只是与宋朝的友好同盟关系一时难以恢复。而今，契丹已经入侵，便以准备好的兵力与之顽强对抗。

将军郑信勇与别将周演率领将士在兴化镇英勇抗敌，打死敌军700多名。契丹军惊恐万状，不少人落水而亡。这样一来，契丹围绕江东六州领土权问题的第一次入侵正式开始。历史学家们通常称之为契丹在第三次丽、辽战争中的第一次入侵。

第一次入侵，从1014年（高丽显宗五年，契丹开泰三年）10月到1015年（高丽显宗六年，契丹开泰四年）9月，历时一年。

1015年1月，契丹以建筑在鸭绿江中黔同岛上的来远城为中心，在鸭绿江上架起了长桥，东西两面筑起城垣，旨在夺取江东六州。高丽对此采取制止措施，却未能如愿。契丹军在挫败了对此抵抗了一阵的高丽军之后，于1015年1月（高丽显宗六年，宋大中祥符八年，辽开泰四年）架成了从来远城经黔同岛到义州的桥梁，在鸭绿江东岸（高丽领土）修成了保州城。与此同时，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契丹兴兵攻打高丽的宣化镇与定远镇，攻陷后在此二镇筑城，称定远镇为宣州，又称宣化镇为怀化军。^①这是契丹采取的旨在夺取江东六州的有力举措。当时，高丽曾出动军队试图阻止契丹架成这一浮桥，但未能如愿。

契丹军队乘着首战打败高丽军队的威势南下，想占领江东六州，于同月包围了兴化镇。高丽将军高积余和赵弋等率领军民英勇抗击，迫使契丹军不得不退去。

翌年，契丹军入侵通州。3月间，契丹军队侵入龙州。由于高丽军奋勇抗战，契丹军一无所获，只好于4月间退去。

^① 参阅《高丽史》卷4，显宗6年正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6年，春正月。保州作为鸭绿江下游辽国东界，也称抱州或把州，即今之义州。契丹灭亡之后，保州于高丽睿宗12年（1117年）最终成为高丽领土，称为义州。当时围绕以保州为中心江东地区的归属问题，辽国与高丽之间曾长期纠缠不休。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38，保州条。参阅《大清一统志》卷421，保州条，此条说保州即今安州（在义州东南面，清川江左岸），这是误传。保州不是安州，而是今义州。“军”在当时是比州更小的行政单位。参阅《辽史》卷48，百官志，南面方州官条：“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保州宣威军节度使名中××州和××军连用，这种情况下军的意义乃是修饰××州节度使这一职名所在时使用的形容词。节度使一职是唐朝设置的军职，不仅掌管地方军务，而且兼管民政。契丹也加以袭用，称地方长官为节度使，因是军职，便附之以××军加以修饰。当时在契丹，不仅节度使，就连州观察使也附以军名，有时州刺史也适用。来远城，在金代成为来远州。在古代高句丽时，如有北方蛮族前来降服，便置之于鸭绿江心的此岛，称此城为来远城。该城在高丽静州附近。如此看来，来远城设置于古代高丽之时，距静州南面25里处。所以，来远城确实是鸭绿江心的一个岛。《武经总要》卷22称：来远城东距兴化镇（义州南面55里处）40里，南距大海30里，西面至保州（今义州）40里。从而可知来远城确实是鸭绿江心的一个岛屿。今义州附近的鸭绿江中，北面有於赤岛，西面有黔同岛，西南面有威化岛。参阅《在满洲的辽疆域》一文，刊载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于1912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第2期的第5~7页，第8~9页；参阅金库甚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的第94页的注30与注40，汉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接着，契丹派耶律平行到高丽，要求把江东六州让给契丹。高丽将其扣留。在此之前，契丹曾扣留了高丽使臣陈颀等5人作为人质，不让他们回国。高丽以耶律平行为人质，是对契丹做法的报复，也是对1013年10月萧敌烈率契丹军入侵破坏两国和平而采取的断然措施。

上述交锋，便是契丹围绕江东六州的领土权问题而肆行的高丽的第一次入侵。在这次入侵中，契丹未能如愿，只是夺得了江东的保州。

契丹为何这次要入侵高丽，其侵略意图在哪里呢？

第一，契丹这次不只是想掌管这一女真族居住的地区，而是要进行实质性的统治，也就是说要把这片土地纳入其版图。

契丹在占领保州后于同一年（高丽显宗五年，辽开泰三年）修整坐落在鸭绿江北面的石城，新设了开州（现在的凤凰城）。在此之前，亦即在1011年（显宗二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则设置了归州和宁州。契丹明目张胆视之为其势力范围的鸭绿江以北一带的地区，过去是女真居住的地方。契丹采取这一系列措施，显然已逾越了单纯支配（不是统治）的范畴，而是想永远进行统治。把这一带纳入契丹的行政系统，是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方式的重大转折，与以往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契丹出动兵力，在保州等地筑起了城池，其意图显然是想收回鸭绿江南岸的土地。契丹这样放肆，并不单纯是对女真有什么特别的欲求，而是把鸭绿江南北土地连成一片并扩张领土的野心大暴露。也就是说，契丹把居住在鸭绿江两岸的女真人视为一个整体，必欲置之于契丹的管辖之下而后快。过去，鸭绿江从未作为丽、辽两国的分界线。自从契丹掌握与控制了江北的女真之后，便想控制江南的女真，进而大举侵犯，想把这一带变成其领土。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鸭绿江以南地区，根据徐熙与萧逊宁签订的协定，已成为高丽的领土。契丹要想实现对这个地区的领土野心，就须进一步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其结果便是肆行武力侵犯。当时鸭绿江左右地区的居住者，大部分是女真人。

换言之，当时高丽和契丹都想把住在两国中间地域，亦即住在鸭绿江两岸地区的女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同时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领土。然而，双方都无法如愿以偿。只好签订协定以鸭绿江为境界，将女真分而治之。然而，契丹在统治鸭绿江以北的女真之后，复又得陇望蜀。于是，便对高丽肆行了此次第一次入侵。

第二，契丹认为江东六州在征服女真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不惜发动战争把江东六州攫取到手。

江东六州，在战略上确实是很重要的地区。要想征伐或统治鸭绿江两岸的女真，必须占有这一地区。不仅如此，契丹圣宗在第二次丽、辽战争中攻打高丽占领开城后回师契丹时，曾在江东六州地区受到了高丽军队的痛击，险些全军覆没，故而对江东六州怀恨在心。也唯其如此，契丹圣宗认识到要想征服和统治女真，首先就要占领江东六州，其战略价值不容低估。

尤其使契丹眼红的是，自从高丽拥有江东六州之后，东北女真纷纷对高丽进贡，各部女真争相与高丽结成友好关系。而高丽在江东六州修建了军事据点之后，在统治西北面女真的同时，切断了西北面女真与契丹交往的通道。契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更加体会到对江东六州的战略价值。

让我们回顾一下1010年（高丽显宗元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契丹圣宗在发动第二次丽、辽战争后回师时所受到打击的实例。在龟州方面，巡检使杨规和龟州别将金叔兴率军截断契丹军的退路，给予契丹军以痛击。1月17日，契丹军遭到金叔兴将军所

率高丽将士的袭击，损兵折将 10000 多人。1 月 18 日，杨规将军率领将士在义州南面的无老代袭击契丹军，歼灭敌人 2000 多名，救出了被俘的 3000 多名高丽人。1 月 19 日，契丹军在义州的梨树到石岭之间受到高丽军的追击，损失 2500 人，被契丹军抓走的 1000 多名高丽男女，获得解救。1 月 22 日，契丹军在义州的余里站损失 1000 名军兵，高丽军救出了被契丹军抓走的 1000 多名高丽百姓。契丹圣宗带领余军渡过鸭绿江时，遭到高丽将军郑成率军袭击，被射死与落水溺死者极多，生还者无几。^①

契丹圣宗经历这次惨败后，深深地认清了江东六州无论是在完全扫荡和统治女真方面，还是在征伐高丽方面，都具有战略价值，因而下决心肆行这次侵略，以便占领这一地区。可以这样说，契丹这次出兵侵略高丽，为的就是把江东六州攫取到手。

二、第二次入侵

契丹圣宗侵略成性，竟然对高丽肆行第二次入侵，妄图实现其意愿。

圣宗于 1015 年（高丽显宗六年，辽开泰四年）9 月，派李松茂将军对江东 6 州进行勘察与了解。25 天之后，契丹军攻打通州。高丽大将军郑神勇闻讯率领军队从兴化镇攻击契丹军的后路，歼敌 700 多名。然而，郑神勇大将军和别将周演、散员任忆、校尉杨春、大医丞孙简、太史丞康承颖等六人在这次战斗中战死。四天后，契丹军闯入宁州城，被击退。3 天后，双方又在

^① 参阅《辽史》本纪，圣宗统和 29 年正月。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74，大中祥符 3 年 11 月。参阅《文献通考》卷 327，四裔考，女真条。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宁州城展开激战，高丽大将军高积余、将军苏忠玄和高延迪、散员金克和别将光参等战死，兵马判官王佐和录事卢玄佐等被俘。

11月，契丹圣宗命令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和各个宫卫（斡鲁朵）抽调精兵5万5千名远征高丽。他们又占领宣化、定远二镇，筑起了城池。

1016年（高丽显宗七年，辽开泰五年）1月，契丹军由耶律世良和萧屈烈指挥，大举入侵高丽的郭州。高丽军英勇迎敌，不幸大败，数万人战死，被缴去大量武器。^①这一战，被称为契丹围绕江东六州拥有问题而肆行的第二次入侵。历史学家一般称之为第三次丽、辽战争的第二次入侵。

契丹在这一战斗中给予高丽以很大的打击。四天之后，派出10名使者敦促高丽投降，归还江东6州。他们到达鸭绿江边时，高丽未派人前去迎接，也未派人与之协商。这说明高丽军队尽管在郭州之战中吃了败仗，却全然无意投降和交出领土，因为高丽军队还有与之交战的士气和力量。

高丽在契丹军队入侵宁州城，设立宣化、定远二镇，高丽军队牺牲不少将士之后，于1015年（显宗六年，辽开泰四年）11月派民官侍郎郭元到宋朝，一方面纳贡，另一方面告之以契丹军队年年入侵，使得高丽鸡犬不宁，建议宋朝与高丽结盟，显示天朝皇帝的神威，使契丹不敢肆意侵略高丽。女真也同时派使者到

^① 参阅《辽史》本纪，开泰4年11月庚申：“诏汰东京僧，乃命上京中京汨诸宫（宫卫），选精兵五万五千人，以备东征。”参阅《辽史》本纪，圣宗开泰5年正月庚戌条：“耶律世良萧屈烈，与高丽战于郭州西，破之，斩首数万级，尽获其輜重。”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7年正月庚戌条：“契丹耶律世良萧屈烈侵郭州，我军与战，死有数万人，获輜重而归。”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7年正月庚戌。

宋朝，告之由于契丹骚扰，女真才多年未到天朝朝贡的苦衷。^①

宋真宗听了高丽提出的这一正式的建议，于1016年1月高丽使臣郭元归国时，通过国书对高丽作了这样的答复：“朕位处司牧，志在安民。宋与高丽分处一隅，音信睽隔。王一向善睦邻封，久图盟好。但愿今后尔等更加和睦，永享国泰民安。”^②

宋朝有意援助高丽与女真，却因国力微弱无力战胜契丹。再者，当时宋朝与契丹已有澶渊之盟，两国国境相安无事，宋朝无意与契丹交战，也不想真正从各方面帮助高丽与女真。也就是说，面对高丽与契丹的冲突，宋朝进退维谷，实在无法给予高丽以斩钉截铁的答复。于是，宋真宗便让文笔健朗的钱惟院草拟这份国书，以模棱两可的口吻，使高丽国王读了不致有什么其他想法。而即使契丹圣宗有机会读到了它，也会无话可说。宋真宗给高丽送去这份国书，意在対显宗的难堪处境作一些抚慰与勉励。这份国书劝勉高丽做到国泰民安，表示宋朝会努力与邻国保持和好，也就算是体现了宋真宗当时的心境。

高丽想借宋朝的威势压制契丹的努力失败之后，依然尽力奉行与宋朝友好的政策。这年12月，由于契丹的侵略凶焰更加炽烈，高丽干脆使用起了宋朝大中祥符的年号，以表明高丽对宋朝的亲近。^③

契丹继续侵犯高丽，使高丽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而契丹百姓

① 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6年11月：“是岁，契丹取宜化、定远二镇，城之。遣民官侍郎郭元如宋献方物，仍告契丹连岁来侵。表曰：借以圣威示其睿略，或至倾危之际预重救急之恩。”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6年11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年正月壬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7年正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7年12月。《高丽史》卷94，列传7，郭元传。《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7年12月。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则络绎不绝投化于高丽。他们都是居住在毗邻高丽领土之处的契丹边民。当时，契丹不断入侵高丽，百姓要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还要被征调去服各种苦役，实在难以忍受，便成群结队逃到高丽。从1016年2月到1017年9月（显宗七年到八年）的一年半期间，契丹人投化高丽的情况如表。^①

显宗七年至八年契丹人投化高丽表

时间	投化者	内容
1016（显宗7年） 2月壬子	王美、廷相等7人	流亡
甲辰	曹恩、高忽等6人	投化
5月辛亥	马儿保良、王保可新等13户	投化
乙丑	要豆等3人	投化
6月戊寅	志甫等3人	投化
6月乙酉	张烈、公现等30户	投化
7月丁	由道、高宗等9人	投化
8月	失简等8人	投化
9月己酉	罗垦等5人	投化
辛未	奉大、高里等19人	投化
11月丙辰	匡义儿等10人	投化
12月乙未	瑟弗达等6人	投化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条有关的月、日。《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条有关的月、日。

高 丽 外 交 史

1017年(显宗8年) 7月戊戌	光正等7户	投化
己酉	买瑟多乙、郑新等14人	投化
8月癸酉	果许伊等3户	投化
9月甲辰	群其昆伎等10户	投化
壬子	乌豆等8人	投化

三、第三、四次入侵与姜邯赞的大捷

契丹出兵攻打高丽，妄图侵占江东6州，但屡次失败，未能达到目的。契丹圣宗对此并未死心，又出动大军进攻高丽，以夺取江东六州。

1017年(显宗八年，辽开泰六年)8月，契丹萧合卓率军入侵高丽，包围兴化镇，一连攻打了9天。高丽将军坚一、洪光和高义等率领将士英勇抗敌，契丹终无功而返。这就是契丹围绕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而肆行的第三次入侵。

萧合卓无法取胜灰溜溜返回之后，过了一年，亦即在1018年的10月，高丽窥知契丹不甘失败，仍在蠢蠢欲动，便派礼宾少卿元永到契丹，要求两国和好如初，莫再大动干戈。同时，使用宋朝新的年号天禧，未忘与宋朝搞好外交。然而，高丽未能与宋朝建立具体的同盟，也未能使契丹再动干戈的凶焰稍敛。

契丹王圣宗欲泄屡败的郁愤，于这年12月10日任命萧排押(萧逊宁的哥哥)为总指挥，率领10万大军侵略高丽。这次战争，被称为契丹围绕江东六州归属的第四次入侵。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萧排押率军一入侵高丽，便对高丽各州郡发布了这样的通告：“率众来降者受赏，胆敢抵抗者必悔！”

高丽对萧排押的这种心理战一笑置之，任命西北面行营统使姜邯赞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为副元帅，率领 20 多万名大军驻屯于宁州（现在的安州）与契丹军大战。

姜邯赞上元帅到兴化镇，抽出 12000 名精兵埋伏在山谷里，摆好了背水阵。他把许多牛皮串起来，挡住流往城东面的大川（流过兴化镇前的三桥川），等契丹军一到，立即把堵住的水放流，让埋伏着的骑兵进行突袭，从而大破敌军。萧排押不服，竟然纠集残军散卒向开京进军。他们在途中的慈州来口川（在慈州南面），被姜民瞻率军打得大败。侍郎赵元在西京的马滩（大同江渡口，现在的美林津）截击逃走的敌人，歼敌 10000 多名。^①

契丹军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竟然在与后方失去联系和补给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向开京进发，企图孤注一掷。高丽为了歼灭来敌，首先把太祖的梓宫（国王的棺材）移至负儿山香林寺，然后在开城一带做好了充分戒备。

1019 年（显宗十年，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1 月 2 日，姜邯赞迎击入侵开京之敌，拨给兵马判官金宗铉一万名军队，让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世家显宗 9 年 12 月戊戌。《高丽史》卷 94，列传 7，姜邯赞传及姜民瞻传。《高丽史节要》卷 3，显宗 9 年 12 月戊戌：“契丹驸马萧逊宁（萧逊宁已在 10 年前被萧太后赐死，此系误记，应是其兄萧排押）帅兵来侵，号十万。王以平章事姜邯赞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副之，帅兵二十万八千三百，屯宁州至兴化镇，选骑兵一万二千伏出谷中。大绳贯牛皮塞城东大川以待之。贼至决塞发伏，大败之。逊宁引兵直趋京城。民瞻追及于慈州来口山，大败之。侍郎赵元又击于马滩，斩获万余级。”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 100 页。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 196 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 1973 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 280 至 281 页。

他死守开城。同时，让东北兵马使率领 3300 名将士与开城的金宗铉所部合力抗敌。

高丽加强开城的守备后，契丹萧排押军入侵新恩县（现在的新溪，距汉城约 100 里）。这时，高丽显宗采用清野战术，让开城城外的民户住进城内，专等敌军闯入。这时，萧排押也大耍声东击西战术，命其部将耶律好德到西京的通德门派人送上假信，声称契丹军即将回师，实际上则悄悄派 300 多名精骑兵闯入金郊驿（现在的金川）。显宗识破了这一诡计，悄悄地派 100 名将士夜袭敌阵，全歼 300 多名敌军。^①

契丹萧排押军被姜邯赞在城东大川摆背水阵打得大败，又在开京被显宗派将士夜袭落得 300 多名精骑兵无一生还后，打消了向开京进军的念头，遂率领军队经连川（现在的价川）向渭川（现在的宁边）进发。姜邯赞派军队奇袭，歼敌 500 多名。2 月 1 日，契丹军屡战屡败，不得不向龟州撤退。姜邯赞将军率领将士从东面与敌交锋。金宗铉的部队也从开城追来，与姜邯赞的部队一起攻打敌军。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就在此时从南方刮来一股大风；顿时风雨交加。姜邯赞率军一鼓作气追击敌军，打得他们丢盔弃甲。当时，从石川（今皇华川？）到盘岭（今八营岭？）敌尸遍地，高丽军队抓到大量俘虏，缴获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契丹军得以生还者仅几千人。至此，契丹的第四次入侵高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萧排押的这次大败，连契丹的史料也为之记载了一笔。《辽史》写道：萧排押等与高丽军队交锋于荣陀二河。契丹军大败，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世家显宗 10 年正月辛酉。《高丽史节要》卷 3，显宗 10 年正月辛酉：“萧逊宁（应是其兄萧排押）至新恩县去京城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户内，清野以待。逊宁（应是排押）遣耶德好德赍书至通德门告以回军，潜遣候骑三百余至金郊驿。我遣兵一百，乘夜掩杀之。”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在天云与右皮室二处有许多人溺水阵亡。遥赞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洋稳高清明以及天云军详稳海里等都战死。萧排押大败而归，欲渡荣陀二河。敌军追至，肖排押扔去盔甲与武器，逃之唯恐不及。唯其如此，契丹随即撤销了萧排押的官职。

契丹圣宗以萧排押惨败之败因，在于他失之于轻敌，低估了高丽军队的士气实力，不该愚蠢地向开城纵深孤军深入。他遣使责备大败而归的萧排押道：“汝轻敌深入，以至于此，有何面目见我乎？朕当皮面然后戮之。”^①

这样的史料，使姜邯赞将军的战绩显得更加辉煌。

姜邯赞将军的龟州大捷，与高句丽的乙支文德将军使隋军覆灭的清川江大捷珠联璧合，在高丽外交史上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姜邯赞将军率军凯旋时，显宗对他接待得十分隆重。

契丹圣宗于这年8月又计划肆行第五次入侵。在此之前，圣宗于5月和8月两度派使臣到高丽打探高丽的实际情况。5月，他派文籍院少监乌长公拜见高丽显宗，试探显宗的胆略。8月，他派出工部少卿高应寿，让其窥察高丽的动向。

契丹圣宗之所以这样打探高丽的情况，是想弄清楚高丽是否一直对契丹怀着敌意，看看高丽的国力及军队的士气究竟如何，以便决定对高丽是和还是战。

就在契丹使臣乌长公于5月回国之后，另一使臣高应寿于8月至高丽的两天前，高丽派了礼宾卿崔元信和李守和到宋朝。他们名目上是贺正使，实际上则是向宋朝通报契丹侵略高丽的情况，想促使高丽与宋朝友好结盟。契丹特使高应寿到达高丽后，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10年2月己酉：“丹主闻之大怒，遣使责逊宁（应是排押）曰：汝轻敌深入以至于此，有何面目见我乎？朕当皮面然后戮之。”参阅《高丽史》卷94，列传7，姜邯赞传。

高丽以为契丹已改变主意，想与高丽真心和好，便于4天后派孝功员外郎李仁泽到契丹东京。

两国使臣来往频繁，两国之间也就有了点和平的气氛，外交关系也趋于正常。这年12月，高丽派特使向契丹纳贡，想通过以小事大求得安宁。为了使和平的局面保持下去，高丽于显宗十一年2月释放了契丹的只刺里，3月又释放耶律平行，使之回到契丹。6年前，他们作为使臣来到高丽，要求高丽归还辽东六州，高丽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把他们扣押下来作为人质，以示对契丹扣押高丽使臣的报复。

7天后，契丹派检校司徒韩绍雍到高丽，对高丽释放契丹的人员表示谢意。这年6月，高丽派特书使借司宰少卿卢执中到契丹，修好两国之间和平的基础。

高丽一方面与契丹修好，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另一方面派人与宋朝联系，继续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显宗十一年闰12月，高丽派崔齐颜到契丹，紧接着又派金猛到宋朝。显宗十二年6月，派汉祚到宋朝，就宋朝朝廷对高丽的恩惠表示谢意。^①

1022年（显宗十三年，辽圣宗太平二年，宋乾兴元年）4月，契丹派御史大夫、上将军萧怀礼到高丽，册封显宗为高丽国王，给予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还送了许多礼物。于是，高丽又使用起契丹的年号太平。这年8月，契丹派东京持礼使李克方到高丽，说明高丽以后必须遵守的礼节。也就是说，每年春天和夏天要派问候使到契丹向圣宗问候和致意，契丹太后生辰之日，要派特使到契丹为之贺寿。高丽对此一一应允照办。

在这以后，丽、辽两国相安无事，未曾发生什么摩擦。只是

^① 参阅《高丽史》4，世家显宗11年闰12月，12年6月。《高丽史节要》3，显宗11年闰12月，12年6月。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在1029年（显宗二十年，辽大平九年，宋天圣七年）9月，契丹的东京将军大延琳在契丹叛乱时，高丽大臣们对契丹的这一事变有着不同的看法。

契丹连续侵犯高丽，其辽阳地区百姓处于民不聊生的困境之中，不免怨声鼎沸。大延琳利用这些百姓的不满发起内乱，自立国号为兴辽，^① 自定年号为天兴。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保州、黄龙府（现在的农安）渤海人的拥戴。大延琳不可一世洋洋自得，于这年12月派兴辽大府丞高吉德到高丽，一是告之以其兴辽国已建国，二是要求高丽出兵助其攻打契丹。高丽显宗未予理会。

当时，高丽大臣们对兴辽国的建国持有不同的看法。刑部尚事郭元强烈地主张利用这个机会与兴辽国联合起来，将被契丹占领的江东保州城拿回来。门下侍中崔士威和徐讷、金猛等则认为应持慎重行事的态度。经过争论，后者占优势，高丽未答应兴辽国的要求。郭元固执己见，竟派将士去攻打占领保州的契丹军，结果未能取胜。郭元气忿不已，患背疮而死去。

1015年5月，历尽艰难曲折的显宗病逝。他在位22年，享年40岁。德宗随即继位。

这年7月，契丹侵略成性的圣宗也猝逝，其长子兴宗接位。

在契丹圣宗的葬礼结束之前，发生了皇太后、兴宗生母钦哀太后被其女婿萧钜不里和萧匹敌（萧逊宁的儿子，平定大延琳叛乱的功臣）杀死的事件。这一事件以讹传讹传到了高丽，高丽大臣们顿时又产生了意见分歧。王可道（原名李子琳）建议道：“契丹虽然已与高丽和好，却仍想并吞高丽。现圣宗已死，驸马匹梯（亦即萧匹敌）在东京搞叛乱。机不可失，我们应当趁此机

^① 兴辽国是大延琳于1029年至1030年间趁契丹衰弱之机举起反旗而建立的国家。他是渤海始祖大祚荣的世孙，当时任契丹的东京将军。

会要求契丹拆去鸭绿江上的城桥，要求归还被其扣留的高丽人。如果契丹置之不理，干脆与契丹断绝外交关系。”高丽德宗认为说得有理，接受了他的建议，派给事中金行恭到契丹祝贺兴宗即位，提出了这两个要求，却遭到契丹的拒绝。

高丽德宗当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徐讷等 29 位大臣赞成与契丹断绝外交关系。皇甫俞义等 39 位大臣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的认为：“如果现在就与契丹断绝外交关系，契丹必然反感，后患无穷。”德宗见大臣们的意见不统一，干脆依然使用契丹圣宗年号太平，而不使用新主兴宗年号景福。另一方面，柳韶欲率军夺回保州（现在的丹城），王可道也表示赞成，而德宗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决定推迟实施。1032 年（德宗元年）1 月，德宗要求契丹派使臣到来远城，商洽释放高丽被押留人质之事，契丹未予理会。

在这期间，高丽在朔州、宁仁镇和派川筑起了城池，防备契丹和女真入侵。

翌年 8 月，德宗命令柳韶到北方边界修筑关防。这座关防是沿着鸭绿江而兴建的长城，起点为鸭绿江入海处的麟州，横亘平安道和咸镜道，直抵东海的和州（现在的永兴）。当时，松岭（义州东南面的松山岬）西部的关防顺利修成，其东部的关防则从 1035 年（靖宗元年）到 1043 年（靖宗十年）分四次才全部修建完毕（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看本第 8 章第 1 节）。^①从松岭以西到靖宗元年修筑的松岭以东宁朔镇（义州东面的宁朔西的定山市）的关城，是专门对付契丹军的入侵，其余的关城则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 5，世家德宗 2 年 10 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 4，德宗 2 年 10 月：“契丹侵静州”。《高丽史》卷 82，志 36，兵 2，城堡：“德宗二年……城安戎镇、杆城镇，又城静州镇。”这个静州，是现在位于义州西南 25 里之处的正州洞。

第五章 第三次丽、辽战争与高丽的领土

为了对付女真。

契丹并未坐视高丽这样筑城，曾出兵予以制止。然而，高丽校尉边柔率军打退了契丹军的干扰。契丹的干扰无济于事。

1035年（靖宗元年，辽兴宗重熙四年）5月，契丹来远城给高丽的兴化镇下书，追问道：“自大延琳肆行叛乱以来，高丽不仅与契丹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筑造了关防。此欲何为？”高丽靖宗让宁德镇（义州东南面40里之处的威远面丁宁里）送去回函，所给予的答复是：“大延琳肆行叛乱时，道路不通，未能依礼行事。后来曾派尚书左丞郑乔参加了圣宗的葬礼。兴宗即位时，又曾派给事中金行恭作为特使前去祝贺。所以，不能说高丽已与契丹断绝了外交关系。高丽修筑关城，不是与契丹过不去，不过是为了使我国边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1037年（靖宗三年）12月，作为对契丹在9月间对高丽未去朝贡指责的回答，高丽派殿中小监崔延暇为使臣到契丹，请求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翌年1月，契丹派使臣马保业到高丽，两国于是恢复了外交关系。8月，高丽使用契丹年号中熙，两国达成了和解。^①然而，以保州为主的领土所有权问题，却依然未得到解决。

^①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3年9月、12月丁亥；10年正月戊戌，8月乙丑。

第三节 战争的结果

一、契丹的得失

契丹要高丽显宗去朝觐其主圣宗，以示高丽对契丹的臣服及以小事大的虔诚。显宗借故不去，契丹便要高丽归还江东六州，并以此为借口，从 1015 年到 1019 年先后四次出兵入侵高丽。然而，其损失却颇为惨重。

契丹军队侵略成性，却在对高丽的地理环境很不熟谙的情况下，竟敢冒险孤军深入，导致在长途行军时无后援更无补给，被高丽军队采取伏击围歼、摆背水阵和坚壁清野等战术打得落花流水，人员伤亡及辎重损失均不计其数。契丹军队其时的种种难处，见之于萧韩家奴写给契丹圣宗的一份报告。这份契丹是这样写的：

“战线太长太远。为了保障军队的补给，抽调了许多有钱的人负责运粮。然路途太远，道路崎岖，花了许多时日到达目的地，费用已耗去一大半。不少人家用两头牛拉一辆车运粮，结果如期返回者很少。一些没有强壮劳力服此苦役者，只好花双倍工钱请人代劳。由于实在太艰苦，不少人中途逃走。于是，在战场上血战的士兵，竟连粮食也补给不上。百姓由于粮食不足，只好以 10 倍的高息向他人借粮，结果，落得卖地鬻儿抵债的凄惨下场。不少人无法还债，干脆逃往他处不再露面。一些百姓被征调去为军队服务而不幸死去后，却得由家里的小孩去顶替。此中难

处可想而知。”^①

契丹王圣宗侵略成性，一向穷兵黩武，这次却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这才知道此番侵略高丽终是得不偿失。他看到用武力侵略无法使高丽投降并乖乖交出江东六州，也就不得不打消以武力征服高丽的念头，只好以高丽在形式上仍然对契丹行以小事大之礼而满足。

此后，契丹与高丽和平共处。而契丹百姓由于久被军队征战所连累，生活实在过不下去，而纷纷归化于高丽。契丹国力从此日见衰退，渐渐走上了穷途末路。大延琳乘机起来大搞叛乱之后，契丹更是雪上加霜一蹶不振。

丽、辽战争是围绕江东六州的归属问题而打响的。契丹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损兵折将的结果，除了得到了鸭绿江东部平安道方向的保州和宣州外，可谓一无所获。

二、高丽的得失

高丽不断被入侵，战场又始终在其领土上，在双方军队你来我往不断交锋的过程中，不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受害不浅。

由于既受战争之祸又得增强兵力，结果弄得官吏无俸给可领，只好用京军的永业田来支付官吏的俸给。这样一来，甚至引发了一场兵乱。

1014年（显宗五年），皇甫俞义和中枢院使张延佑向朝廷建议，用京军永业田充当官吏的俸给。武官们对此大为不满。上将军崔质、金训，与朴成、李协、李暹等一起，煽动军兵涌入官

^① 参阅《辽史》103，萧韩家奴传。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198页。

城，威胁显宗交出皇甫俞义与张延佑，然后把这二人打得半死。崔质等向显宗奏道：“皇甫俞义等夺走我们的水田和旱田，纯粹是为了牟取其私利，于国家毫无寸利可言，这可真是削足适履之举。将士们对此人心惶惶，怒不可遏，恳请吾王除此国蠹，以大快民心，使国运永昌。”

显宗无奈，只好依其所奏，革去皇甫俞义和张延佑的官职，让他们回乡为民。这次事件，成了日后高丽武臣专政独裁的嚆矢。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契丹军入侵，高丽京城及其西北面惨遭契丹军的蹂躏，高丽国民对国防的不稳和城郭的不完整议论纷纷，促使官吏们增强了国防意识。从此，高丽开始筑造京城的外城（罗城）。显宗根据姜邯赞将军的建议，让王可道主持这项工程。王可道于显宗二十年（1029年）8月完成了这项监筑任务。这座外城完全用泥土夯成，城墙周长为29700步，也有的记载说是只有10660步，墙高27尺，厚12尺，有罗阁13000间，城门15个（大门4个、中门8个、小门13个）。在修筑过程中，出动民夫304400名，有的记载说是238938名，出动技工8450名。在这座外城里，官厅与部落实行部坊制，有五部、三十五坊、三百四十四个里洞。

此后，高丽与契丹之间只有保州与宣州的问题悬而未决。除此之外，双方相安无事。高丽平时向往中国的文化，一直努力加以接受，因而与宋朝始终保持了友好交往。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 及其多边外交

第一节 文宗的契丹观及其亲宋政策

文宗即位以后东方的政局，是朝鲜半岛的高丽，中原的宋朝，东蒙古、北满洲地区的契丹以及南满洲、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等展开角逐。高丽的安危，与这些势力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丽与宋朝虽然民族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农耕文化和儒教文化，国境又相邻接，水陆交通早已通畅，彼此的交流与协作已经习惯成自然，再加上双方都有契丹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两国一直在互相帮助和利用，以便防御契丹侵扰。

宋朝末年的马端临在谈到宋朝与高丽的交流与合作时说过：“高丽与宋朝密切交往，是出于爱好中华文化，并想通过贸易得些好处。而宋朝与高丽的交往密切，大抵也出于优待远方来客，而与之和平相处。”^① 这种看法，可算是中肯之论。

当时，高丽与宋朝的友好关系，经常因宋朝与契丹的力量对

^① 参阅《文献通考》卷325，四夷考，高丽条。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第393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比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倘若宋朝的势力显得强大，高丽便与宋朝交往甚密。倘若契丹的势力显得强大，高丽便与契丹更加友好。而在宋朝与契丹的较量难分胜负，两国的实力也难以分出伯仲之时，高丽便同时使用两国的年号，与两国保持同样的友好。当然，这样的时代毕竟罕见。高丽甚至闹过这方面的笑话：在致宋朝的国书信封里竟然装进了致契丹的国书。就这样，高丽在宋朝与契丹之间斡旋，开展自主外交，以求得自身的生存、独立，还同时利用女真作中介，其外交活动卓有成效。

文宗在位期间（1046～1083年），对宋朝的文化分外钦慕，而对北蕃则视之为蛮族。在这一方面，文宗比高丽历代的国王更显得突出。高丽太祖对于北蕃人的看法是：“北蕃人，人面兽心”，“食不果腹之时，前来阿谀奉承，不以乞讨为耻。酒足饭饱之后，一去不回头。一言以蔽之：饥来饱去，见利忘义。”太祖当年对他们所持的态度是：“今虽服事，向背无常，筑馆城外以待之。”这就是太祖的北蕃人观。

对于北蕃人采取了最强硬政策的，要算是高丽的文宗。文宗亦认为北蕃人系人面兽心族，强则侵略他人，弱则乖乖雌伏，对之宜鄙而远之。文宗一方面对辽国持这种看法，另一方面却对宋朝的先进文化十分羡慕。宋朝见高丽文宗的爱憎如此分明，便采取传统的外交政策，对高丽保持友好，藉以牵制契丹。

契丹圣宗去世后，契丹的国力逐渐衰弱，对高丽与宋朝的交往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来越少。1058年（文宗十二年）8月，文宗命人在耽罗的灵岩伐木造大船，以便与宋朝加强交往。当时，大臣们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我国与北朝（契丹）修好，国境相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做，对于国计民生乃是上策。庚戌年（1010年）契丹送来的国书曾责问我们：‘东与女真结盟，西与宋朝往来。汝意欲何为？’尚书柳参奉作为特使到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契丹时，契丹东京留守曾质问我们，为何依然派使臣去宋朝，对此猜忌不已。倘若此次造船与宋朝交往之事泄露出去，为契丹所知晓，必然会与契丹发生龃龉。……何况我国的文物礼乐风行已久，商船不断地往来，奇珍异宝天天输入，已无需依赖于宋朝。倘若我们永远与契丹友好相处，根本无需派使臣与宋朝往来！”

文宗觉得说得也颇有理，便只好不急于与宋朝恢复友好交往。^①

宋神宗即位后，改变策略，采取联合高丽对抗契丹的政策。1068年（高丽文宗二十二年）7月，他对罗拯下达这样的圣谕：“高丽自古以来乃君子之国。自我朝开国以来，一直与我朝交往甚密，后来才断绝了外交关系。据说，高丽在位的国王乃是贤王，何不派人前往说服之？”罗拯照办，当即遴选商人黄慎到高丽。高丽文宗对宋朝派来的特使深表欢迎，对之接待得很隆重。^②

罗拯通过黄慎的第一次访问摸清了高丽的意向之后，于1070年（高丽文宗二十四年）8月，又派黄慎到高丽，协商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③高丽同意两国正式恢复交往，对黄慎说：“我们将派使臣到宋朝，表示我们的这种心意。”黄慎回国时，高丽派人把公文送到福建省，表示将对宋朝奉礼朝贡。1071年3月，高丽任命民官侍郎金梯为特使带礼物到宋朝，采取了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前奏措施。于是，由于契丹先后三次入侵高丽而中断的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有望重新恢复。^④

① 参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12年8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22年7月辛巳。《宋史》卷487，高丽传。

③ 参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24年8月。

④ 参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24年8月；25年3月庚寅。

此后，高丽和宋朝的交往更加亲密。高丽为了厚待来自宋朝的使臣，考虑到宋朝使臣到高丽时登陆的高蛮岛（现在的保宁）官舍离海太远，便在洪州（现在的洪城）贞海县（现在的海关）新建安兴亭，使宋使在交通上没有不便之感。宋朝也对高丽外交十分重视。1072年（文宗二十六年）6月，高丽派往宋朝的使臣金悌回国时，带回了宋神宗的五道文书。该文书表达了宋神宗的五种想法。其中，有一道圣谕是这样的：“我大宋一向崇文重道，在给高丽送去外交文书时，定要指定能文善写者拟稿，以才高八斗学富五本者为使臣到高丽。必先由中书省测试官员的书法，遴选书法出众者为书状官，负责书写外交文书。”^① 这表明宋神宗十分重视与高丽的交往。

高丽与宋朝恢复外交的举措，在当时可谓有目共睹，而使两国交往益臻密切的，则是宋朝对高丽文宗风痹症的治疗。宋朝特地派名医王愉与徐先万里迢迢到高丽，为文宗辨症用药。当时，由高丽使臣陪同两位名医到高丽，这说明两国都关注为文宗疗疾，都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尽管王愉与徐先竭尽了全力，文宗的痼疾却无起色。1073年（文宗二十七年）8月，高丽派太仆卿金良鉴与中书舍人卢旦到宋朝，对宋朝派名医为文宗疗疾深表谢忱，兼送王愉与徐先归国。

1074年（文宗二十八年）6月，宋朝名医、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到高丽为文宗医治，文宗的痼疾仍然未见好转。

这期间，两国之间使节来往频繁，两国友好关系通过为文宗治病而大大加强和益显亲密。

另一方面，契丹通过其东京留守向高丽提议勘查鸭绿江以东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26年6月甲戌。《宋史》卷487，高丽传。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的境界，这使高丽为之震惊。也就是说，1075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辽道宗太康元年）7月，契丹向高丽提出勘查两国境界问题之后，高丽派中枢使柳洪与尚书右丞李唐鉴二人与契丹使节协商，双方未能达成圆满共识。既然提出了境界问题，高丽便派特使到契丹，要求契丹撤销设置在鸭绿江以东的保州（现在的义州）。翌年8月，高丽又派特使到契丹，要求契丹撤除修建在契丹领土之外的庵子。^①

1078年（文宗三十二年）4月，宋朝派明州教练使顾允恭到高丽，递交了宋朝的国书。这份国书表明宋神宗将派使臣到高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心意。高丽的文宗得知这一通报后说道：“大朝将派使臣前来，实在令人欢欣，只恐我朝对其使臣的接待不够周到。”他当即命大臣们各负其责，虔诚迎接宋朝使臣，凡是尽心尽力立功显著者受赏，而对有差池者则严罚不饶。^②由于这是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宋朝第一次派使臣前来高丽，高丽决心表示自身最大的诚意。

这年6月，宋朝派左谏议大夫安焘和起居舍人陈睦为特使，来到高丽。为了接受他们带来的国书，文宗不顾身患重疾，由大臣搀扶，亲手接过了宋朝的国书。这份国书写到，高丽对宋朝特别友好，深知天朝的重托，从海路多次入贡。我宋朝此次派去国信使，捎去国信物，望好生收下。宋朝这次送给高丽的国信物，品目繁多，数量也很可观。^③

同年7月，宋朝国信使安焘等归国时，文宗让他们带去国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29年7月，辛酉、己卯。《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29年7月。《辽史》道宗本纪，太康4年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篇》第113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2年4月辛未。

③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2年6月甲寅、丁卯。

书。这份国书感谢宋神宗派来国信使，告知文宗的风痺症尚未痊愈，请神宗再派名医并送药材到高丽，为文宗疗疾。

宋神宗根据文宗的要求，于1079年（文宗三十三年）7月，派阁门通事舍人王舜封和翰林医官邢慥等88人，带着大约100种药物到高丽。文宗于1080年（文宗三十四年）3月派户部尚书柳洪和礼部侍郎朴寅亮到宋朝，对宋神宗为其专程派医生和送药物表示谢忱。^①

这年7月，高丽赴宋朝特使柳洪归国时所带回的宋神宗给高丽文宗的信，写了八条道理。宋神宗在这份文书中对高丽献给宋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的礼物表示谢意，对文宗的疾病表示担忧，但愿文宗服用神宗送去的药物之后早日痊愈。柳洪等于三个月之前带着文宗送给宋神宗等的礼物到宋朝时，海上突然刮起台风，几只船顿时被巨浪颠覆，送给宋朝的礼物损失了一大半。宋神宗在信中说这样的天灾无法抗御和避免，请高丽的文宗千万别怪罪有关的人员，饶恕柳洪等人，千万别予以追究。^②

宋神宗担忧高丽文宗的痼疾，紧接着又派名医马世安去高丽。1081年4月，高丽派礼部尚书崔思齐和吏部侍郎李子威到宋朝，对宋神宗派医送药表示感谢。然而，文宗的宿疾不易好转，尽管宋朝名医使出看家本领用尽百药，文宗依然不见痊愈。^③

高丽与宋朝恢复外交关系后，双方围绕为文宗治病交往十分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33年7月；34年3月。《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3年7月辛未；34年3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4年7月癸亥。《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34年7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4年7月丁卯。《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34年7月；35年4月。

频繁。与此同时，双方的通商也十分活跃，可以说已非昔日可比。

第二节 丽、宋之间的贸易

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双方的贸易情况随之好转。在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期间，显宗在位（1009年～1030年）时，宋朝商船只到过高丽12次，靖宗在位期间（1034年～1046年），宋朝的商船仅仅与高丽来往过5次。而在文宗在位期间（1047年～1081年），宋朝的商船到过高丽39次。这不仅说明此时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已经正常化，而且由此可知双方的贸易多么不可或缺。

当时，高丽与宋朝之间的贸易，有两种形式：通过使臣传国信物与民间层次的私献。国信物亦即贸易品，有宋朝派到高丽的国信使和其他使臣所带来的赐予品，以及高丽派往宋朝的国信使和其他使臣带去的贡物。^①

两国商人之间所进行的私献贸易，由于宋朝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和高丽实行对宋朝的友好政策，进而显得相当繁荣和活跃。

高丽文宗正式恢复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之后，双方为了医治文宗的痼疾，有了频繁的交往，而双方有关发展贸易的商洽之频繁，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2年7月乙未。《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32年7月。

为了使高丽与宋朝的贸易与来往得以更加活跃而又安全，高丽文宗首先采取措施，使两国之间交往航道远离北方的契丹。

过去，高丽与宋朝的交往的航道，是从瓮津渡海，在中国山东登州、密州等地登陆。^① 1074年（文宗二十八年），文宗派金良鉴到宋朝协商，将航道改为从高丽的礼成江到宋朝的明州（现在的浙江省宁波市），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②

这条航道，从礼成江到紫燕岛（仁川），再到马岛（海美的西面）、古群山、竹岛（全罗北道兴德西面）、黑山岛，一直通往明州（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府），是一条很安全的航道，不会受到契丹的干扰。其另一层意义，则在于它是利用西海岸海流的一条很安全的航线。

黄海的海流有一股回流。当时，黑潮暖流从台湾与琉球方面涌来，有一股往东面流向日本的南面，另一股对马海流则与从对马海峡沿着朝鲜东海岸而下的寒流发生冲突。于是，对马海流在这里分成两条，一条流出对马海峡进入朝鲜东海，沿日本西岸流入北海道的西海岸。另一条沿着朝鲜半岛南端折向西面进入黄海，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经胶东半岛中部南下，重又流入台湾海峡，像时钟指针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一样，出现了逆转循环回路现象。^③ 当时高丽与宋朝的航道亦即从瓮津到登州的航道，和新开辟的从礼成江到明州的航线，都利用这种逆转循环回流。

宋朝商船进入高丽领土黑山列岛之后，高丽为了迎接商船，特地派官吏前往周旋。宋朝商船倘若是夜晚通过，高丽有关人员

① 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

② 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参阅徐兢著《高丽图经》卷39，海道。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乙酉文化社1973年版，第390页。

③ 参阅森克己著《日宋通商与耽罗》，该书刊载在出版于1961年的《朝鲜学报》第21期、22期合刊号，见其第526页。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便在这一地区的烽燧台上燃起烽火，引导它进入礼成江。^①当时礼成江由于有宋朝的商船不断来往，曾经相当繁华。宋朝使臣来到高丽后，下榻于开京的顺天馆。高丽为宋朝商人也设立了迎宾馆和会仙馆等 10 多个留宿处。接待这些商人，当时曾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②

宋朝对高丽使臣和商船也接待很隆重周到。在他们路过之处，有高丽馆或高丽亭供他们食宿休憩。从高丽使臣与商人抵达宋朝之日起，到他们踏上归途时为止，宋朝的负担实在不小。就连他们所经之处路亭的百姓，也因而受到很大的惊扰。以致宋朝有的人士曾经因此提出过取缔对高丽的贸易，建议朝廷不必与高丽进行这样的交往。

当时，宋朝反对与高丽交往的代表人物是礼部尚书苏轼（东坡）。他在其《论高丽进奉状》一文中指出：“我朝无丝毫利益可言，而高丽则受益极大。……倘若我朝对之接待略不优厚，其贪心便又萌生，复思朝贡，而后患必然无穷。”他认为此中的弊端有：第一，接待其使臣与商人，劳民伤财；第二，来往的物品过于昂贵；第三，我朝送去的物品，每每经高丽人之手流入敌国契丹；第四，高丽使臣与商人所到之处画下宋朝的山川地图而归，如同泄露了国家机密；第五，高丽与契丹系结盟之国。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宋朝的书籍传至高丽过多，应予制止，不许滥传。^③

沈括则指出，前来宋朝的高丽使臣与商人画下宋朝的山川地

^① 参阅徐兢著《高丽图经》卷 39，海图。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 337 页，探求堂出版于 1984 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 64，礼 7，迎北朝诏使仪等。参阅《高丽史》卷 68，志 22，礼 10，三品使臣按察使相会议。

^③ 参阅《东坡全集》卷 32，奏议 30，“论高丽进奉状”。

图，被宋朝官吏发觉后，曾经予以没收。^① 其实，当时高丽的使臣或商人画下地图，绝不是有意侵略宋朝，也不是想转交契丹，而是为了双方进行贸易更为方便。

当时，宋朝的官府之所以对高丽人如此怀疑，是因为宋朝的福建和浙江的商人，有的假装与高丽进行贸易，实际上却利用航道暗通契丹，运回银、丝及钱物等。被官府发觉后，它们被全部没收。^②

当时，高丽之所以鼓励对宋朝的贸易，活跃彼此之间的交往，诚如宋末有识之士马端临所言，是因为高丽有以小事大之念，一心想求得国际上的安全。同时，高丽喜爱中华之风物，想获取国信物之制。而宋朝之所以搞活与高丽的贸易和往来，则在于抚慰高丽人，藉以求得国际间的和平共处。^③

从高丽与宋朝当时进行贸易的物品看来，高丽从宋朝进口的是衣带、鞍马、彩缎、漆匣、玉、犀、金银器、金箔、茶、香料、药材、乐器、书籍、书画、乐器和货币等。这些物品的进口量很大。仅仅是在高丽与宋朝恢复外交关系的 1078 年（文宗三十三年），如前所述安焘一行带到高丽的宋神宗赐予品就多达 104 种，其中有书籍、衣类、金银玉漆匣类、靴类、妆具、犀、彩缎、烛和药材等。^④

当时来自宋朝的进口品中，尤以书籍为多，有九经和诸子书、史书、历书、阴阳书、遁甲书、刑法书、医书、道家书和佛经等。由于高丽是信仰佛教之国，从宋朝进口的佛经可谓特别之

① 参阅《梦溪笔谈》卷 13，权智。

② 参阅《东坡全集》卷 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③ 参阅《文献通考》卷 325，四夷考，高丽条。

④ 参阅《高丽史》卷 9，世家文宗 26 年 6 月丁卯、庚戌；34 年 7 月。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多。

989年（成宗八年），高丽侍郎韩蕡作为使臣到宋朝归国时，带回了大藏经。990年（成宗九年），兵部侍郎韩彦恭又从宋朝带回了开宝敕板。1019年（显宗十年）8月，礼宾卿崔元信和李守和^①等从宋朝带回了金字藏经等。这些佛经，大大丰富了高丽的佛教文化，成为从显宗到文宗年间刻成的古板高丽大藏经的主轴。^②

当时，从宋朝进口的物品中，药材是很重要的进口品。由于高丽文宗患有痼疾风痹证，高丽从开国起又特别注重保健与卫生，当时朝野都很重视药材。文宗通过派往宋朝的使臣，正式要求宋神宗赐以名医良药。宋神宗考虑到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宋朝作为先进的文化国有必要对后进国示恩施惠，便一次次给文宗送医送药。尤其是在1079年，亦即文宗三十三年，宋神宗给文宗送来了100多种药物，供文宗治病与养生。^③

高丽向宋朝出口的物品，主要是朝贡的官营贸易品。这些贡品是官营机构的能工巧匠制成的精品，非私制品所可比拟。这些优质物品，主要有衣带、苧布、绸缎、漆器、金银器、鞍鞞、弓箭、长刀、纸笔、墨、扇、文席、人参和松子等。其中，纸、笔和扇子等在宋朝，是人见人爱的畅销货。

从高丽显宗到文宗在位期间，亦即从1012年到1084年的72年间，宋朝的商人到高丽来过67次，约有1600名商人到高

^① 翌年5月，他们以污辱奉使的罪名而被流配。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10年8月；11年5月庚辰。

^②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8年12月；9年12月；10年4月。参阅《高丽史》卷5，世家显宗10年8月己丑。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高丽，第339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第395页。

^③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3年7月辛未。

高丽外交史

丽做过生意。而文宗在位期间占 43 次 1400 人，最多的一次来了 230 名宋朝商人。由此可知当时高丽与宋朝的贸易开展得多么活跃。

宋朝商人大抵在一年的 7、8 月间纷纷来高丽做买卖，因为这两个月有西南季风可以利用。由于当时乘坐的是帆船，他们回宋朝时每每选择刮北风的 11 月到 1 月。有时，得知高丽在 11 月（西京在 10 月）举办热闹非凡的八关会，他们便不顾海上刮逆风，迎着北风而北上高丽。因为，宋朝商人献贡物和参加八关会，从高丽的德宗与靖宗在位时已成惯例。他们参加高丽的八关会，在高丽国内外官吏向高丽国王献礼仪式结束之后，他们的首领得以被安排在东蕃、西蕃和耽罗人的前头，向高丽国王献上礼品，享有这种殊荣。^①

当时，高丽商人很注重与宋丽做买卖。^② 他们的对外贸易分陆路与海路进行。在西北面，他们与契丹地设了互市。^③ 在西南面，他们从海路到宋朝。他们还沿东南海路去日本经商。

到了南宋末年，宋朝的明州地区对外国商船一律按物品量的十五分之一征收关税，而对高丽商船却只征收十九分之一的关税。当时，明州是宋朝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中心地区，对于出入频繁的高丽商船，曾给予特殊的优惠和照顾。

高丽与宋朝之间，不仅进行物质的交流，当时还有不少人分别归化于两国。高丽归化宋朝的人之中官职最高者，是金行成和

① 参阅《高丽史》卷 6，世家靖宗即位年 11 月庚子。《高丽史》卷 69，志 23，礼 11。

② 参阅森克己著《日宋通商与耽罗》，该文刊载在出版于 1961 年的《朝鲜学报》第 21 期、22 期合刊号，见其第 554 页至 555 页。

③ 参阅《续文献通考》卷 25，市耀考，市舶互市条。参阅《金史》本纪，宣宗兴定 2 年 4 月癸丑。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 166 页，该书由汉城大出版部出版于 1985 年。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康戩等。作为宋朝使臣或商人而归化高丽者，有周侂、张垓和胡宗旦等。在这些宋朝的归化者之中，既有官吏，也有知名文人雅士。^①

第三节 丽、辽边界谈判与文化交流

契丹侵略成性的圣宗去世之后，他的长子兴宗即位，契丹与高丽重又得以和平共处。此年即 1031 年，高丽德宗亦继父位而立。契丹兴宗即位之后，在与高丽的关系方面突出的课题，是边境问题与贸易问题。

契丹同意江东六州是高丽的领土，却以保州（现在的义州）为其根据地，不仅在其处增建了军事设施，而且由于它是高丽、契丹、女真的三角贸易场所，有一个时期，还曾想在其地设置互市。

1039 年（高丽靖宗五年）2 月，高丽派户部郎中庾先到契丹，要求撤除契丹设置在鸭绿江东面的保州城。当时提出的理由表面上是为了使该地区的高丽人得以安心务农，不必日夜提心吊胆，实际上则是为了确保高丽在鸭绿江以东的领土。契丹兴宗认为保州城系祖先在位时所设，而今断无撤除之理，根本不理睬受高丽的要求。

1054 年（文宗八年）7 月，契丹在抱州（当时契丹称保州为抱州，亦称之为把州）城的东面设置了弓口门（向敌人射箭的有

^① 参阅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 341 页。

高 丽 外 交 史

孔的门)，加强了军事设施。同时，还设置了邮亭（驿舍）。①

对此，高丽根据都兵马使的建议，于1055年7月，向契丹东京留守提出了这样的抗议：“高丽乃箕子之国，一向以鸭绿江为其境界。前太后（契丹圣宗生母萧太后）和皇帝（圣宗）下赐的玉册也以此江为高丽的境界。近来，贵国侵入我领土，配置桥垒，而来远城则在我国城池的近处增设了弓口门，而且备足了材石，准备新建亭舍。这一切，使得我国百姓极其惊讶。但愿留守大人能本着睦邻之心，向皇帝上奏，将该地归还我们，拆去城桥与亭舍。”然而，契丹不予理会。契丹兴宗于1055年9月逝去，道宗即位之后，竟然听任其子民在松岭（现在义州东南面的松山岬？）东北面垦荒，而且建起了庵子，在其地驻扎了人马。②

尽管其时高丽与辽国的关系业已正常化，然而在境界问题上双方却各不相让，毫无调和的余地。当时，契丹也感到确实很有必要勘定双方的境界，便于1075年（文宗二十九年，辽道宗太康元年）7月，由东京兵马都部署向高丽发出了一道公文，提议确定鸭绿江以东的境界。高丽当即派知中樞院事柳洪和尚书右丞李唐鉴同契丹代表会谈勘查和确定境界事，由于两国代表的意见不合，这次会谈以失败告终。③

此高丽曾派使节到契丹，要求契丹撤出保州，并撤销保州。翌年8月，契丹派人在定戎镇（现在的义州）关外修建庵子时，高丽又曾派使臣对此提出抗议，要求撤销保州城。当时，高丽将

①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8年7月。参阅《高丽史》卷58，志12，地理3，义州条。参阅《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8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11年4月。《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11年4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29年7月癸酉、己卯。《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29年7月。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朴寅亮的陈情表送到契丹。契丹道宗读后赞赏其逻辑谨严文笔优美，虽然无意把保州归还高丽，却不再命人在保州增添军事设施。^①直到41年之后，亦即1117年（睿宗十二年）3月，契丹被金国打败，契丹王在逃走时命人给高丽送来公文，把来远城和保州（现在的义州）一并归还高丽。1126年，亦即高丽仁宗四年12月，金国把保州交还高丽。至此，保州才名符其实成为高丽的领土，而再无异议。

除了以保州问题为主的境界纠纷之外，当时高丽与辽国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关系，可谓相正常顺利。

1055年（高丽文宗九年，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5月，契丹兴宗派耶律革和陈到高丽，册封文宗为高丽国王。三天之后，又派利州刺史萧禄到高丽，册封高丽王子王勋为三韩国公。^②

这年9月，契丹兴宗去世。文宗听说契丹告哀使张嗣复为了通报这一噩耗已渡过鸭绿江，当即以禁乐和禁止屠宰和狩猎等举措表示对契丹兴宗的悼念。契丹告哀使抵达京城后，文宗身穿丧服，率领百官至昌德门前迎接。一接过讣告，文宗便下令罢朝市三天，以示对契丹兴宗的哀悼。紧接着，高丽派崔惟善等到契丹，参加了兴宗的葬礼。所有这一切，都郑重行事，按外交礼节隆重举行。^③

契丹道宗继兴宗之后一即位，便于1057年（高丽文宗十一年）3月，派萧继从与王守拙带着外交诏书到高丽，重新册封文

^① 参阅《高丽史》卷95，列传卷8，朴寅亮传。《辽史》，道宗本纪，太康4年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9年5月辛酉、癸亥、丙子。《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9年5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9年9月癸亥、乙丑、丙子。《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9年9月。

宗为高丽国王。紧接着，又派天德军节度使萧素和紫德滋到高丽，重新册封王太子王勋为三韩国公。这年9月，文宗派王夷甫等到契丹，对道宗的册封深表谢意。^①

1065年（文宗十九年）4月，契丹道宗又派耶律宁和丁文通为使者到高丽，再一次册封文宗为高丽国王。接着，又派耶律迪和麻晏如到高丽，册封王太子王勋为三韩公。高丽于这年8月派尚书右仆射金良贄到契丹，对道宗的册封表示谢忱。^②

高丽与辽国在经济交流方面不甚活跃。保州的互市在契丹肆行第二次侵略而被取消之后，变得冷冷清清，但并未完全断绝交易。当时，高丽鼓励其使臣在往来于契丹时进行夹带贸易，默认可守备国境的军兵进行私下贸易。这样一来，高丽与契丹也进行了物质交流。当时契丹使臣来到高丽时，也进行一些私献形式的贸易。保州的互市关闭之后，契丹曾多次向高丽提出，继续进行保州的互市贸易。然而，高丽认为当时再在保州（现在的义州）设置互市，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确保领土安全上都于高丽不利，因而拒绝了契丹的要求。这样，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确曾有所退步。不过，在契丹和女真物资极其需要交流时，高丽的有关方面还是与它们进行了如上的秘密贸易，或谓黑市买卖。

高丽与契丹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文化交流，一直进行得十分活跃。

高丽文宗堪称贤君。他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树立了不少业绩，使高丽进入了全盛时期。契丹兴宗（1031～1054年），一生笃信佛教，为契丹与高丽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①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11年3月乙酉，9月甲申。《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11年3月、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19年4月癸巳、8月丙子。《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11年3月、8月。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让鲜演、希麟等名僧铸造契丹大藏经。这些名僧锲而不舍，于道宗（1055～1064年）清宁年间完成了579帙，而且悉数得以问世。1063年（文宗十七年）3月，这部契丹大藏经又一次为高丽所接受，对高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第四节 诱导开放的对日外交

高丽在建国初期，沿袭了新罗对日本的想法，认为日本人野蛮，其海盗行径令人作呕，因而与日本的往来很少，两国的关系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两国之间拘留与遣返漂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日本人不时地投化于高丽。

999年（穆宗二年），道要弥刀等20户日本人投化高丽，高丽将他们安置在内地利川，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1019年（显宗十年，日本宽仁三年），高丽的镇溟船兵（海军）张渭男截获一条东女真的海盗船，俘获了259名日本男女老少。高丽显宗任命供驿令郑子良为虏人送使，将他们遣送回日本，以示友好之意。当时，在日本主政的藤原赖忠政权也对高丽表示友好，于1036年（靖宗二年）7月，将谦俊等几名高丽漂流人送还给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17年3月丙午。《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17年3月。《辽史》卷23，本纪，道宗咸雍8年，赐高丽佛经一藏。

高 丽 外 交 史

丽。^①

文宗即位后，对外广泛地开展外交活动。^②日本看到这种情况，也对高丽表示友好。1049年（文宗三年），日本让对马岛官吏明任，将金孝等20名高丽漂流人送回金海。文宗五年7月，日本派使臣从对马岛来到高丽，将高丽逃匿罪人良汉等3人送还高丽。1060年（文宗十四年），日本让对马岛官吏将住在礼成江地区的高丽流人任孝南送回高丽。高丽按照惯例，给对马岛官吏赠送了礼物，称赞他们的友好行为，对他们遣返流人表示感谢。^③

高丽文宗为风痺症所困扰，向宋朝求医求药却不见效验，便请日本也派名医为其诊治。也就是说，到了文宗在位之时，高丽与日本的关系已处于友好的气氛中。所以，高丽才于1080年（文宗三十四年，日本承历四年）向日本发出了吁请，请日本派名医为文宗医治风痺症这一顽疾。^④

日本接到高丽的国书后，参加大臣会议的权中纳言源经信等大部分大臣主张在丹波忠康和同俊通这两位名医中派一位前往高丽。然而，参议源俊实却说：“派去了名医，倘若药石无灵，岂非有损日本国的脸面，不如不派为上。”参议源俊明也有此同感。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10年4月丙辰。《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2年7月壬辰。《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10年4月。《小右记》，宽仁3年4月25日、6月21日、8月3日、9月19日、9月22日至24日，12月30日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李齐贤之“赞”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3年11月壬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14年7月癸丑。《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3年11月；卷5，文宗14年7月。

④ 参阅《帅记·水左记》，承历4年闰8月条。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结果，大臣会议决定不派医生。^①

文宗在位时，日本处于白河天皇时期，亦即处于藤原摄关政治向院政过渡的时期。当时，以庄园为经济基础的贵族阶级，拥有来自庄园的年贡，过着养尊处优的优裕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越来越醉心于穷奢极欲。这些庄园领主和博多的豪商，不满足于坐等宋朝商船到来这种消极的做法，兀自着手建造商船，以之进行对外贸易。

高丽在地理位置上与日本相毗邻，自然条件与日本相近，日本自然首先与高丽进行接触。1056年（文宗十年）10月，日本使正上位权隶藤原和朝臣赖忠等共计30人在金海馆下榻。从此，日本商人往来于高丽日益频繁。1073年（文宗二十七年，日本延久五年）7月，日本的王则贞、松永年等42人渡海来到高丽的金海馆。此后，文宗在位时，日本商人来高丽凡14次，宣宗在位期间，日本商人又来过6次，睿宗时期和毅宗时期分别来过2次。与以往相比，日本与高丽的交往，此时可以算是最频繁。

王则贞等到高丽后，把螺钢、刀、镜匣、梳子、鞍具、砚台、书桌、屏风、扇子、香炉、弓矢、水银、珍珠、螺甲等物品献给文宗。日本的壹歧岛句当官派藤原安国等33人到高丽，要求献方物给世子与诸位大臣。高丽当时只准许他们把物品献给世子与大臣。他们到京城时，不许他们取道陆路，只许他们取道海路。^②

^① 参阅震檀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第403页。参阅《帅记·水左记》，承历4年闰8月5日、14日、25日条。参阅森克己著《日宋通商与耽罗》，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61年的《朝鲜学报》第21期、22期合刊号，见其第549页至550页。

^② 参阅《朝野群载》卷20，异国条，日本承历4年。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10年10月乙酉；文宗27年7月。《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10年10月；27年7月。

这样的事实说明，当时高丽允许日本商人与高丽做生意。之所以不许他们走陆路，是不想让日本知道高丽的国内情况。而之所以让他们把物品献给世子与大臣，是不想让日本的地方官吏直接与高丽国王和高丽朝廷打交道。其实，日本对马岛官吏之所以向高丽进献方物，一是想表明其商人的活动有官吏作后盾，二是想借此获得高丽的回赠品。

此外，文宗二十八年2月，日本先头重利等39人来高丽献纳贡物。文宗二十九年4月、6月和7月，日本商人大江等18人和另外59名商人也分别献纳了贡物。文宗三十年11月，日本25名僧侣表示要塑佛像，来灵光寺问佛祖膜拜，为高丽国王祈求长寿。文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文宗三十三年9月，日本将高丽的安光等44名漂流商人遣返回国。这年11月，日本商人藤原等来到高丽，施舍法住寺30枚法螺和300束海带，为文宗祈祷病愈与长寿。文宗三十四年9月，日本的萨摩州派使者到高丽献纳贡物。文宗三十六年11月，日本对马岛也派使者到高丽献纳了贡品。^①

当时，日本对马岛和萨摩州之所以能兀自派使者到高丽纳贡，是因为它们是日本的大蕃，其大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而由于高丽尚不允许日本的私人或地方官府直接与高丽朝廷往来通商，日本无法与高丽公开进行贸易，只能对高丽朝廷的回赠品垂涎三尺。所以，当时日本的地方官吏只好通过派遣使者博取高丽朝廷的好感，并顺便祝愿高丽国王的痼疾早日痊愈和长寿。

当时，高丽与日本的交往不多，从未进行两国政府之间的公开贸易。如上所述，只有日本商人和地方官吏一厢情愿地向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9月，世家文宗有关的年月条。《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有关年月条。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进献贡物。历史学家根据当时的情况，称之为私献贸易。

把日本人向高丽的进献方式称作私献贸易，同把高丽向宋朝进贡和得到回赠物的形式称为朝贡贸易，以及把女真人向高丽进献贡物并得到回赠的形式称为进献贸易，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①

在文宗一朝，高丽一直未与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只是听凭日本一厢情愿来访来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丽注重发展与宋朝的贸易关系，而对于日本的货物不甚感兴趣。

从当时高丽、宋朝和日本对外国商船的管理方法亦即贸易政策看来，高丽对于乘坐商船前来的外国商人，先看其所带来的商品，弄清楚之后，不视之为官方贸易，也不对之取缔，不使之受到损失，从引导的层次任其自由买卖。宋朝对于外国商船必收取关税，对于其香料等珍贵物品实行专卖与专买的举措，然后允许外国商人与一般百姓进行交易。日本在镰仓时期对于商船征收唐船点定钱，亦即收取关税。

东方这三个国家分别采取这样不同形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说明当时它们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各个民族不同的特性。

^① 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第404页。参阅森克己著《日宋通商与耽罗》，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61年的《朝鲜学报》第21期、22期合刊号，见其第551页。参阅金岸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165页。

第五节 通过宋朝商人与大食国商人的来往

高丽与大食国（阿拉伯）商人的来往，为高丽历史增添了一笔。

大食国商人在唐代利用海路，经中国南方的广州港，与中国进行贸易。到了宋朝，他们与中国的贸易更是十分频繁。当时出入于广州港的大食国商人，通过宋朝商人与高丽所进行的贸易而看中了高丽。尤其是他们在广州港与高丽商人会晤之后，便有心进出于高丽，以扩大其贸易范围。

1024年（显宗十五年）9月，悦罗慈等100名大食国的商人到高丽进献了土产品。翌年9月，蛮夏洗和罗慈等100名大食国的商人又到高丽进献了方物。^① 1041年（靖宗六年）11月，大食国商人保那盖等把土产物带到了高丽。^②

对于大食国的商人，《高丽史》只作了这三则记载，而且未曾作具体的说明。据记载，他们在靖宗六年带到高丽的土产品有水银、龙齿、占城香、没药和大苏木等。这些土产品，与宋朝给高丽的国信物和宋朝商人私献的物品不同，属于不同的种类。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到中国广州后带着宋朝的商品来高丽，而是直接把他们的土产品带到了高丽。

高丽对他们接待十分热情宽厚，还让他们在客馆里休息。他们离开高丽时，高丽赠给他们不少金帛。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15年9月；16年9月辛巳。《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15年9月；16年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6年11月丙寅。《高丽史节要》卷4，靖宗6年11月。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163页。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大食国商人到高丽来，前两次一来就是 100 人。由此可知他们对高丽何等感兴趣，他们出外经商的规模何等之大。

他们既关注高丽又对高丽有着好奇心，他们在高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然而后来他们再未到过高丽。考虑到当年高丽与大食国商人的贸易靠的是宋朝商人作中介，便可知是宋朝商人的猜忌心在此中发作，从中作梗所致。

第六节 高丽海军征伐女真海盗

有一部分女真人当时出没于高丽的东海岸和郁陵岛、对马岛沿岸，专事海盗勾当，势力相当之大。^①

他们的行动很猖狂，凶暴无比，残忍至极。所到之处烧毁住宅、抢掠钱财、杀害老弱、俘虏青壮年，无所不为无恶不作。1005 年（穆宗八年）正月，他们闯入登州（现在的安边），烧毁了 30 多个部落。^② 从显宗、靖宗到文宗三十二年（1079 年）的 74 年间，他们先后 20 多次侵略高丽沿海地区。

显宗见女真海寇的入侵渐渐频繁，所作所为越来越恶劣，高丽沿海居民所蒙受的祸害越来越大，一即位就命令 75 艘戈船停泊于镇溟口（现在的镇溟浦），专门在东北沿岸进行防御。^③ 这就是高丽的镇溟（现在的德源）船兵部署，亦即高丽的镇溟海军基地。

① 日本史书称女真海盗叫刀伊。

② 参阅《高丽史》卷 3，世家穆宗 8 年正月。《高丽史节要》卷 2，穆宗 8 年正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 82，志 36，兵 2。

镇溟船兵部署亦即镇溟道都部署或镇溟都部署，是统率船兵亦即水军，抗御女真海盗的国家机构。它控制了永兴湾这一要港，掌握了海路的咽喉，得以左右逢源能攻善守。除了镇溟船兵都部署之外，为了防御女真和日本的海盗前来掳掠，高丽当时设置的高丽海军基地，在东海方面还有元兴镇（现在的定平）都部署，在南海方面还有东南海船兵都部署（金海）。^①

女真海盗侵犯高丽沿岸，掳掠于山国，在对马岛一带胡作非为。其主要事例有：1011年（显宗二年）8月，女真的100多艘船队侵略了广州。翌年5月，他们闯进清河、迎日和长发等地。当时，高丽朝廷命令镇溟都部署的文演、姜民瞻、李仁泽、曹子奇督励地方军队，赶走了他们。^②

1015年（显宗六年）3月，拥有20艘船只的女真海盗侵略狗头浦，镇溟都基地的张渭男等捕获的8艘女真海盗船只。船上有被这些海盗抓走的259名日本男女，高丽随即让供驿令郑子良将这些日本人送回日本。^③

1049年（文宗三年）10月，发生了女真海盗全然不顾高丽海军的强大和对海盗毫不留情的打击，竟然抢走了两艘镇溟兵船的事件。高丽朝廷忍无可忍，下令立即追击和捉拿海盗。兵马录事文扬烈当即出动兵船，与元兴部署判官宋斋罕一起奋力追击，追至海盗的老巢，放火烧毁其部落，打死20名海盗而凯旋。至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年11月。《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3年11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2年8月；3年5月己巳。《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2年8月；3年5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6年3月；10年4月丙辰。《高丽史节要》卷3，显宗6年3月；10年4月。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于被抢走的两艘兵船下落，史料未作记载。^①

女真海盗的掳掠继续肆虐。翌年6月，这些海盗闯入烈山县（现在的杆城）的宁波基地，抓走了18名男女。12天后，文宗闻报，深感女真海盗的入侵不容小觑，下令由兵部尚书杨监兼任这一地区的防御负责人。这些海盗明知高丽朝廷已采取了这种由国防最高负责人主持防御事务的举措，却又于同年9月入侵烈山县，大肆抢掠。兵马录事文杨烈又率领23艘战船追击，斩杀9名海盗，烧毁其部落30多处，捣毁贼船8艘，缴获兵器100多件，立了一大功。这年11月，镇溟都部署副使金敬应率领海军，在烈岛击毁海盗的3艘贼船，打死海盗几十名，使不少海盗淹死于海中，立下大功。^②

1018年（显宗九年）11月，于山国（现在的郁陵岛）遭到女真海盗入侵。这些海盗的侵略行径特别猖獗和恶劣，使得于山国百姓到了无法务农的地步。高丽朝廷闻报，派李元龟到于山国慰问百姓，发给农具，使他们得以下田耕作。^③ 1019年7月，于山国百姓为了免受女真海盗的侵略，不得不渡海回到高丽本土。高丽朝廷当时采取措施，让他们重又回到于山国。

1021年（显宗十三年）7月，于山国一些百姓被女真海盗抓走，后来逃到高丽本土后，高丽朝廷不再把他们送回于山岛，让他们定居于礼州（现在的宁海），分给粮食与生产资料，准许他们上户口，完全成为高丽国民。1032年（德宗元年）11月，于

^①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4年正月。《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4年正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4年9月己亥，11月己酉。《高丽史节要》卷4，文宗4年9月、11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9年11月丙寅。

山国城主向高丽献纳贡品。^①

这些女真海盗的根据地何在，其规模又是如何，他们与高丽海军交锋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帮海盗，是居住在咸兴沿海岸地区以及骨面（现在的洪原）、三山（现在的北青）沿海岸地区的女真人。其中，有些人已归属高丽，有些人则在高丽的管辖圈外。其中在航海方面有经验者，竟然结伙下海为盗而无恶不作。

对于他们的装备，日本史料作了这样的记载：“海盗贼船，其长度，有的为12寻（寻等于8尺），有的只有8寻到9寻。一只船有楫30个到40个。船靠岸后，有50至60人或20至30人先行上岸。然后，有70至80人手持纠正弓矢和盾牌跟着上岸。这些人有10至20队，或爬山或履平地一涌而来。”^② 日本的另一史料则记载道：“战斗时，他们各人皆持盾牌。打头阵充当先锋者持长矛，其后者手持大刀。他们的箭矢长一尺，射箭的力气很大，往往能穿过盾牌而把手持盾牌者射死。”^③

将高丽海军的装备与女真海盗的装备一对比，可知高丽海军的装备优异得多。

当时，高丽的战舰往往采取把敌船撞坏的战术。高丽的战舰外面均有铁角这种特殊装置。如上所述，高丽在东海设有镇溟（现在的永兴）海军基地，在元兴镇（现在的定平）也设有基地，在东南海的金海也设有基地。这些基地，足以抵制女真海盗在东海、南海一带的掳掠。不仅如此，附属于高丽的女真人，对其民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10年7月己卯。显宗13年7月丙子。

^② 参阅《朝野群载》卷20，太宰府解，言上刀伊国贼徒或击取或逃却状。

^③ 参阅《小右记》，宽仁3年4月25日壬子。

第六章 文宗恢复对宋朝外交及其多边外交

族中的一部分人出没于高丽沿海地区大肆抢掠感到愧疚，特地制造了拥有高丽式装备的兵船和弓箭送给高丽。1030年（显宗二十一年）4月，东女真酋长曼头等60余人，献给高丽4艘兵船（戈船）和17600个横矢（用枯木制成的箭矢）。5月东女真奉国大将军苏勿盖等，又向高丽献上了9匹马、3艘兵船和58600个枯矢，表示其赤诚之心。

东女真所献上的兵船，都是高丽式包铁角的兵船。面对高丽兵船的特殊装备、高丽海军高昂的士气，那些装备简陋的女真海盗当然不是其对手。

“就这样，捱过了20多天……高丽国的几百艘兵船奇袭而来，攻打女真海盗。海盗虽然竭尽全力抵抗，却因高丽的攻势过于猛烈而支撑不住。高丽兵船船体又高又大，装有大量的兵器和箭矢。一交锋，高丽兵船便把对方的船撞得底朝上，船上的海盗无法幸存。海盗们再也不敢恋战……（我们）获救上得（高丽）兵船，见船舱又宽又大，非一般船只可比。船板是双重的，左右各有四根橹。20多名水兵，摇橹的摇橹，摇桨的摇桨，各负其责。还有七八个楫尚未挂上。船面包着铁皮，船头有铁角，一撞上贼船，贼船便被撞得七零八碎。”^①

上面这段话，是被高丽海军拯救出的日本人中的内藏石女等人的所见所述。他们被日本史书称之为刀伊的女真海盗抓到船里，幸遇高丽海军击破海盗船而获救。他们的叙述是真实的，所见所感比较正确。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高丽海军的结构、装备及其进行水战的战术，以及高丽海军高昂的士气。

^① 参阅《小右记》，宽仁3年8月10日。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220页至223页。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 对宋、辽的外交

第一节 宋、辽围绕吊丧拉拢高丽

治理国家达 37 年之久的文宗逝世后，长子顺宗于 1083 年 7 月即位。顺宗一即位，就派左拾遗知制诰吴仁俊到契丹（辽国），告之以文宗长眠的噩耗。哪知，顺宗竟于当年病死。文宗次子继兄即位而为宣宗。宣宗于这年 11 月派侍御史李资仁到契丹，通报顺宗的过早辞世。

契丹道宗惊悉这一讣告后，于翌年（宣宗元年）亦即 1084 年 4 月，派益州管内观察使耶律信为敕祭使，广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彦为慰问使到高丽。敕祭使耶律信所宣读的契丹道宗悼念作古的文宗祭文有这样的句子：“惊悉噩耗，沉痛无似，不问朝政，唯有叹息。悲夫！岁月不饶人，人寿难上千，相期只及五十年。君臣之谊，短暂如夜渊歇舟，艰难似东园匿碗，谨深表哀衷尽君臣之礼，但愿英魂有灵领受祭礼。”契丹道宗的悼词，可谓沉郁恳切。三天后，契丹敕祭使又向顺宗之灵位宣读了契丹道宗的悼词。

这年 8 月，宋朝以左谏议大夫杨景略为祭奠使，以王舜封为副使、礼宾使，以左谏议大夫钱勰为吊慰使，宋球为副使，来到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高丽吊丧。祭奠使杨景略在文宗的灵前守灵三昼夜，之后又为顺宗守灵。他所宣读的宋帝写给文宗的祭文曰：“是以中国德布四海，却难为王乞寿。思及东方之藩屏，哀切之忱难以尽表。故而专派使者献上奠仪，略表朕之悼意。”杨景略宣读的祭文向高丽新王宣宗转达了宋帝的关切：“唯愿恭顺之蕃永享哀荣之典。今特遣使者转述朕之眷存照佛高丽之意和慰问思念之心。”三天后，宋朝祭奠使向顺宗之灵宣读了宋帝的祭文。

高丽文宗、顺宗先后作古后，如上所述，契丹和宋朝竞相派特使对高丽新王进行了慰问，向羽化的二王之灵作了祭祀。然而契丹与宋朝对高丽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契丹只是表示了恳切的慰问与悼意，宋朝却在祭文中隐隐约约强调了藩屏。契丹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高丽，要高丽对之朝贡，在它看来，要高丽的新王保持藩邦的地位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需在祭文中点明。而宋朝却向高丽谈到了这一层。从高丽的立场看来，它历来钦慕宋朝的文化，与契丹相比，更想与宋朝进行友好的交流。而宋朝的国力懦弱，无法把契丹的势力驱赶出高丽。所以，高丽只好违心地在形式上表现得似乎与契丹更亲近一些。

然而，从这次的吊慰看来，高丽对宋朝使臣接待得更郑重也更热情，超过了对契丹使臣的礼遇。高丽让宋朝使臣在高丽停留了一个月，并于这年9月在会庆殿设宴款待宋朝使臣，三天后，再次宴请了他们，再过了两天，又设宴为宋朝使臣送行。宋朝使臣回国时，高丽附表向宋神宗表示谢意。^①

1085年（宣宗二年，宋元丰八年，辽大安元年）2月，契丹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元年9月己亥、壬寅、甲辰：“己亥，宴宋使于会庆殿。壬寅又如之。甲辰，饯别宴，附表以谢。”参阅《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元年9月。

改年号为大安，并通知高丽。高丽宣宗命令有关官员将此事莫告大庙与六陵。两天之后，宣宗于即位之后第一次出宫，接受了仁王般若经。这种做法，是按照宋朝的制度行事。作为高丽来说，这也是它在形式上对契丹表示亲近，在实际上则努力促进与宋朝交往的一种表现。

这年3月，宋神宗驾崩，皇太子即位，是为宋哲宗。宋朝派人将这一噩耗通知了高丽。这年8月，高丽宣宗派户部尚书金上琦和工部尚书林概到宋朝，既吊慰神宗的龙御宾天，又祝贺哲宗的登基。特地派尚书级的重臣为吊慰使与贺礼使，这充分体现了高丽对与宋朝外交的重视。^①

9月，契丹道宗派御史中丞李可及到高丽，祝贺高丽宣宗诞辰。然而，高丽宣宗诞辰的那一天，契丹使臣李可及却未抵达，充分表明契丹方面并无真正的诚意。当时，高丽人得知此事不免讥讽道：“使臣的名字叫可及，为何却偏偏不及？”高丽人本来就认为契丹人相当野蛮粗鲁，此时看到其使臣也如此失礼，心里便更加瞧不起契丹人。

契丹得知尚处在丧父丧兄悲哀之中的高丽王无法料理政务，便派高州管内观祭使耶律盛为落起复使到高丽，告知宣宗服丧亦可理政。接着，又派保静军节度使萧璋和崇禄卿温峤到高丽，册封宣宗为高丽王，兼“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上柱国”，还赏给宣宗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送给宣宗冠冕、车马、圭印、衣带等物品。

1086年闰2月，高丽宣宗委任卫尉小卿崔思说为天安节贺礼使，殿中小监郭尚为方物使，户部侍郎金士珍为生辰祝贺使到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2年3月戊戌、8月辛未。《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2年3月，8月。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契丹，表示了高丽的诚意。5月，高丽又派尚书礼部侍郎崔洪嗣到契丹，专门答谢落起复礼。同时，让礼宾卿李资智专事贺正，知中枢院事李子威和尚书右丞黄宗懿等携国书到契丹对，契丹王册封高丽宣宗表示谢忱。又遣尚书右丞韩莹为告奏使到契丹，要求契丹勿设保州榷场。值得注意的是，宣宗所派这些的职级使节，均低于派往宋朝使节的尚书级。

第二节 契丹建议设置榷场与领土问题

契丹曾经在鸭绿江下游东岸的义州（又称保州）设置榷场（亦即互市），与高丽、女真及宋朝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

1005年（高丽穆宗八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宋景德二年），契丹在保州和振武军设置榷场，持续了五年之久。^① 1010年（显宗元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宋大中祥符三年），第二次丽、辽战争打响，这个榷场自然而然消失。后过了70多年，即1086年（宣宗三年，辽大安二年，宋哲宗元祐元年）5月，契丹突然又想鸭绿江上设置榷场，高丽当即予以抵制。也就是说，高丽获知契丹打算在鸭绿江上设置榷场的情报之后，当即任命尚书右丞韩莹为告奏使，对契丹打算设置榷场的这一计划提出了抗议。^②

^① 参阅《辽史》卷24，圣宗本纪统和23年丙戌：“复置榷场于振武军。”《辽史》卷60，食货志下：“统和二十三年，振武及保州并置榷场。”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3年5月丙子：“又遣告奏使尚书右丞韩莹。时辽欲于鸭绿江将起榷场，故请罢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3年5月。

高丽外交史

高丽反对契丹在鸭绿江上设置榷场，是出于国防、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慎重考虑。从国防上说来，当时鸭绿江上和鸭绿江东边的高丽领土内已经有了契丹的城池，如果再在鸭绿江上设置榷场，则不仅人众嘴杂，而且有利于契丹储积军粮等各种战略物资，高丽不免又生契丹出兵入侵之忧。

从经济和外交上说来，高丽不想看到女真与契丹通过这个榷场而接近，而想巩固高丽对女真的统治。东北女真的首领太史阿道闲等 59 人到高丽朝贡之时，高丽有关官吏向宣宗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太史乃是契丹的官名。对于业已归化的阿道闲，应当将其官职改称正甫，正甫才是高丽的官名。”宣宗接受了这一建议，给阿道闲任命了高丽的官职。而沙伊罗等 55 名东女真人则因里通契丹，而被西北路兵马使捉获，送往开京问罪。高之问等居心叵测投奔高丽后；又背叛高丽投化契丹，因而被拷问和处决。

据西北面兵马使报告，西女真酋长曼头弗等几个蕃族，要求按照东蕃之例，设置州、郡，永为藩邦，不想再与契丹蕃人交往。高丽宣宗当即准许他们来朝，并指示西北面兵马使：今后如有前来投化者，要好生加以晓谕，让他们继续前来归化。这说明高丽在统治女真方面一直在警戒契丹，防范其从中插手无事生非。

契丹在鸭绿江东设置榷场，其牵涉面甚广，既有高丽对女真的统治问题，又有高丽禁止女真与契丹接近的问题，高丽自然会从经济、外交、国防等各方面深思熟虑。这样一来，也就不能不引起高丽与辽国之间新的纠纷。

契丹在保州和振武军（军是一个较小的行政单位）设置榷场，对于高丽来说，是一个非制止不可的课题。而对于契丹来说，再度设置这个榷场，亦是当务之急。于是，这个问题在当时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成为两国外交上的悬案。

1088年1月，契丹任命御史大夫耶律延寿为横宣使，^①到高丽就2月间契丹将在鸭绿江边设置榷场的问题与高丽进行协商。高丽对此表示反对，当即派中枢院副使李颜作为藏经烧香使到龟州，瞒着契丹增强边防的防卫，以防万一。这也可以说是高丽为对付契丹强行设置榷场而采取的一种秘而不宣的措施。

1088年9月，高丽派大仆小卿金先锡到契丹，要求取消设置榷场的计划，并将高丽宣宗的亲笔信呈给契丹道宗。

宣宗的这封亲笔信首先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他写道：“从天皇鹤柱之城到西岸，以一江为境界，江东为我们的疆域。我们于统和十二年甲午（994年）入朝，契丹圣宗亲下手谕，使这条江成了高丽的统治地区。契丹东京留守萧逊宁也对徐熙说过：‘卿于9月初出动力筑城，10月上旬即已竣工，卿之才能苍天知晓，卿之智略出类拔萃。今后，要显示以小事大之诚意，契丹王会遥受你们的朝见礼。卿要利用农闲期，出动力阻遏旷野上夷狄的侵扰，可先在要地筑城，这符合契丹的心意。女真虽努力于皇化，慑服于我朝的威严，不敢生背叛之念，卿还应速速筑城，以求永恒太平。’我们没有忘却他的这一用意。当即让徐熙肩负起这一警戒重任，与东京留守萧逊宁协商，分别在国境筑成了好几个城池。唯其如此，我们曾派河拱辰去雁门当鸭绿句当使，白昼上工地督工，晚间回内城歇息，终于弭息了草贼之祸。后来，即使边防不加防备，国境地区依然安然无恙。”

^① 横宣使与横赐物等的名称，非契丹所专有。当时，契丹称其派往高丽和西夏等国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节叫横宣使，称横宣使带去的特殊赐物叫横赐物。所谓“横”，有意外之意。横宣使，不是正规的使臣，而是必要时派出的使臣。参阅金库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100页至101页的注56。

这封亲笔信接着写道：“然而，圣宗的圣谕墨迹未干，太后的仁慈之语清晰如昨，甲寅年（1074年）竟造船而入。乙卯年（1075年）兵入州城设置三军（比县更小的行政单位）。乙未年（1055年）设置弓口门，建造亭子。丙申年（1056年）摧毁私宅，正如外交文书所言：‘小事遵循惯例。’壬寅年（1062年）贵国想在义宣军的南面设置买卖院，我们提出疑义，贵国说：‘莫干修理房屋之事。’甲寅年（1074年），才将探守庵从定戎镇（义州）北面撤除，而向我们通报说：‘建造此庵已久。’”

紧接着，这封亲笔信提出了抗议：“高丽世世代代忠诚于契丹，年年纳贡，而探守城桥却至今未拆除。而今又想建立新村，这说得过去吗？这显然是违悖先朝之意，不念高丽的一片丹诚。多年来，我们不远几千里来来往往，上纳了90年的贡物，竟无寸功可言，怎能不感到遗憾？……但愿契丹皇帝摒弃近臣们错误的建议，多想想邻国的忧虑。……千万别新建榷场，俾免引起种种事端，以求得永恒和平。”^①

这年11月，大仆小卿金先锡去契丹交涉莫设榷场一事回到高丽，带回了契丹道宗的回诏。道宗在回诏中写道：“屡抗封章，请停榷易，谅唯细故，诂假繁辞尔。然议于便宜，况末期于创置。务以安帖，以尽倾轮，释乃深疑，体予至意。”^②就这样，高丽的抗议有效，契丹有一个时期未再提及设置榷场之事。

过了10多年，高丽都兵马使于1101年8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今辽东京兵马都部署移文，请罢静州关内军营。倾在大安中（大安，契丹道宗年号），辽欲于鸭绿江置亭子及榷场，我朝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5年9月。《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5年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宣宗5年11月壬申。《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5年11月。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遣使请罢，辽帝听之。今亦宜从其请，制可。”^①高丽宣宗接受了这一可取的建议。

由此看来，可以说契丹打消设置榷场的念头，是始于契丹道宗通过让高丽使臣金先锡带给高丽宣宗的回诏中所作的诺言。当时契丹不再设置榷场，而高丽则撤掉了契丹军队把守的保州处高丽静州关内的军营。一方不设榷场，一方撤掉了前方的一座军营，这便是这次外交交涉的结果。

当时，高丽与契丹之间的国境争议，是围绕鸭绿江而展开的。高丽自太祖以来一直视高句丽旧土为高丽领土，努力谋求实现这一夙愿，当时实质上已将领土确保于鸭绿江以东。为了确保鸭绿江以西的高句丽领土也属于高丽的版图，高丽曾出动军队占领八站，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正因为如此，高丽对契丹想在鸭绿江以南的保州设置榷场，不能不一再表示严重抗议，不能不予以制止。

当时，契丹有意以鸭绿江为两国之间的境界。1097年（肃宗二年，辽寿隆三年，宋绍圣四年）12月，契丹派临海郡节度使检校大傅兼御史中丞耶律思齐为正使，大仆卿昭文馆直学士李湘为副使，带领一些随从到高丽，赐肃宗以王册、圭印、冠冕、车辂、章服、鞍马和绸缎等。他们带给肃宗的契丹道宗亲笔信写道：“朕治理天下43年，对外让百姓安居乐业，对内抚慰诸侯，承天合道，以致海隅立社，北至龙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现吉林省宁安县东京城），东至鸭绿江。”这说明在契丹看来，契丹与高丽的国境就是鸭绿江。

高丽在观念上一直认为包括鸭绿江以西在内的高句丽旧土都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6年8月乙巳。《高丽史节要》卷6，肃宗6年8月。

是高丽的领土，但这也是高丽一厢情愿的想法。后来，高丽于1356年，亦即恭愍王五年5月18日，曾出兵攻打鸭绿江对岸的八站。这年6月4日，又曾出兵攻打过包括婆婆府亦即九连城在内的三站。

对于契丹以鸭绿江为国境的说法，高丽从未加以同意。对于契丹想在鸭绿江以南的保州设置榷场，高丽当即提出了抗议。辽国境内和沈阳路居住着许多高丽人，高丽人在这一带来往一直很自由，这里又曾是高句丽的旧土，所以高丽在观念上总是顽强地对这里具有领土意识。然而当时契丹王的亲笔书信明确地指出契丹的国境是鸭绿江，高丽国王竟然未予任何作答，真是令人感到遗憾。

第三节 耽罗郡的设置

济州岛的名称，有耽罗、耽母罗和毛罗等等。济州岛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统治者称号为星主。耽罗星主年年向百济、新罗、高丽朝贡，因而得以相安无事。

济州与高丽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考察一下。

据《古记》记载，济州岛在古时曾经渺无人烟。后来从地下窜出三个神人。第一位神人名叫良乙那，第二位神人名叫高乙那，第三位神人名叫夫乙那。传至第15代，其后裔高厚、高清、昆季三人造了一只船，乘船抵达耽津。当时，正值新罗全盛时期。新罗国王见他们入朝，深感奇异，便称其长子为星主，次子为王子，第三子为都内，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耽罗。新罗国王之所以称他们居住之处为耽罗，是因为他们来到新罗之时，最先上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岸的地方是耽津。新罗赏赐给了他们一些宝贝与衣服，然后让他们返回耽罗。

从此，耽罗其地子孙昌盛，对新罗臣服。新罗封高氏为星主、良氏为王子、夫氏为徒上。后来，良改为梁。

起初，耽罗国隶属于百济。文周王二年，百济任命耽罗国的使者为恩率。后来，百济在东城王二十年曾因耽罗懒于朝贡，而由东城王亲自领兵征伐耽罗，大军行至武珍州，耽罗闻讯，立即派使臣前去请罪，东城王念其知过悔改停止了亲征。

百济灭亡后，耽罗国王佐平徙冬音律于新罗文武王元年向新罗臣服。高丽统一后三国后，耽罗于太祖八年（公元925年）11月，第一次向高丽进贡。太祖二十一年（938年），耽罗国太子末老到高丽，希望赐予星主、王子的职位，希望高丽把耽罗作为州郡加以治理。太祖当即赐给末老以星主和王子的职位，并且给予朱记，以示作为佐证。这说明，在当时耽罗自愿成为高丽的一部分，高丽也愿意接受它为其附属国。

1043年（靖宗九年）12月，耽罗国星主加利在其子豆罗死去之后，请求给予其弟弟以称号，高丽靖宗当即封之为王子。^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9年12月庚申：“毛罗国星主、游击将军加里奏：王子豆罗近因卒，一日不可无嗣。请以号，仍为王子，仍献方物。”《高丽史节要》卷4，靖宗9年12月：“毛罗即耽罗也。”

高丽外交史

高丽与耽罗的关系

年 代	内 容
925 年 (太祖 8 年)	耽罗向太祖进贡。
138 年 12 月 (太祖 21 年)	耽罗太子末老来朝，高丽封之以星主、王子的职位。
1011 年 9 月 (显宗 2 年)	耽罗要求高丽依州、郡之例对之加以管理，显宗欣然同意，给予朱记。
1012 年 8 月 (显宗 3 年)	耽罗派人把两艘大船献给高丽。
1019 年 9 月 (显宗 10 年)	显宗于重阳节宴请宋朝、耽罗、黑水国诸国使节。
1021 年 7 月 (显宗 12 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22 年 2 月 (显宗 13 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24 年 7 月 (显宗 15 年)	封耽罗首长周物子与高没为云摩大将军上护将。
1027 年 6 月 (显宗 18 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29 年 6 月 (显宗 20 年)	耽罗世子孤岛弩来朝，封之为游击将军，赏袍一袭。
1029 年 7 月 (显宗 20 年)	耽罗进献方物。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年 代	内 容
1029年7月 显宗(20年)	耽罗百姓贞一等从日本归来。此前,贞一等21人在海上漂流至东南远岛,岛人浑身是毛,口音听不懂。他们把贞一等拘留了7个月。后来,贞一等7人悄悄地乘坐一条小船向东北方驶行,到达日本的那沙府,才终于得以生还。
1030年9月 (显宗21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34年11月 (靖宗即位之年)	宋朝商人、东西蕃和耽罗进献方物。
1036年11月 (靖宗2年)	宋朝商人、东西蕃和耽罗进献方物。
1043年12月 (靖宗9年)	耽罗星主、游击将军加里奏:“王子豆罗近因卒,一日不可无嗣。请以号,仍为王子,仍献方物。”靖宗封其弟为王子。加利向靖宗进献方物。
1049年11月 (文宗3年)	耽罗振威校尉夫乙仍等77人和北女真的首领夫举等20人向文宗进献土产物。
1052年3月 (文宗6年)	三司奏报:“耽罗岁贡之桔改为100包,请准予以之为永远的定制。”文宗准奏。
1053年2月 (文宗7年)	耽罗王子殊云那派其子陪戎与校尉古物到高丽进献牛黄、牛角、牛皮、螺肉、榧子、海藻、龟甲等物。文宗封王子为中虎将军,赐公服、银带、彩缎与药物。

高 丽 外 交 史

年 代	内 容
1054年5月 (文宗8年)	耽罗派使者来祝贺册立太子。文宗给13名使者加职为梢工僭从, 分别赏赐物品。
1056年2月 (文宗10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58年8月 (文宗12年)	文宗意欲与宋朝交往, 命令在耽罗与灵岩伐木造大船。
1062年2月 (文宗16年)	耽罗高叶等人来高丽进献土产物。
1062年10月 (文宗16年)	耽罗星主高逸前来进献方物。
1063年3月 (文宗17年)	耽罗新星主豆良来朝, 文宗封其为明威将军。
1068年3月 (文宗22年)	耽罗星主游击将军加他仍来朝进献方物。
1077年12月 (文宗31年)	耽罗进献方物。
1078年9月 (文宗32年)	日本遣返耽罗方砺等18名漂流人。
1079年11月 (文宗33年)	耽罗句当使尹应均进献2枚大珍珠, 其光如星闪烁, 日本人称之为夜明珠。
1086年 (宣宗3年)	耽罗国游击将军加於内等来朝贺礼, 并进献方物。
1088年7月 (宣宗5年)	宋朝明州官员将耽罗的用叶等10名流浪者送回高丽。

第七章 宣宗、肃宗在位时对宋、辽的外交

年 代	内 容
1090年1月 (宣宗7年)	耽罗句当使奏报：“星主游击将军加良仍已去世，其弟陪戎副尉高福令继位，请依旧例，送来贖仪物。”宣宗准奏。
1092年2月 (宣宗9年)	耽罗星主懿仁前来进献土产物，宣宗封之为定远将军，赐之以衣带。
1094年6月 (献宗即位之年)	宋朝都纳徐佑等69人和耽罗高的等194人前来祝贺献宗即位，并且进献土产物。
1095年7月 (献宗元年)	耽罗高勿等80人前来进献土产物。
1096年9月 (肃宗元年)	耽罗星主派遣使者来朝，祝贺肃宗即位。
1099年7月 (肃宗4年)	宋朝将耽罗的赵暹等6名漂流人送回高丽。
1101年10月 (肃宗6年)	肃宗封耽罗新星主陪戎副尉具代为游击将军。
1101年11月 (肃宗6年)	宋朝商人、耽罗使者和东北蕃酋长前来进献土产物。
1105年 (肃宗10年)	耽罗改置为耽罗郡

当时，国际上也承认耽罗是高丽的附属国，与高丽具有特殊的关系。1029年（显宗二十年）7月，如前所述，贞一等21名耽罗人在海上飘流到远方的一个海岛，被岛上土人拘留7个月。后来贞一等7人侥幸脱身，乘船抵达日本的那沙府。日本得知他们是耽罗人，当即把他们遣返回高丽。1078年（文宗三十二年）

9月，日本救出方砺等18名耽罗漂流人，随即送他们回高丽。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已承认耽罗是高丽的附属国。

不仅如此，1088年（宣宗五年）7月，宋朝把漂流至明州的用户等10名耽罗人送回到高丽。1099年（肃宗四年）7月，宋朝亦把赵暹等6名耽罗漂流人，送回高丽。^①这说明在当时，宋朝也已承认耽罗是高丽的附属地区，故而对耽罗的漂流人作了上述的处理。

1058年（文宗十二年）8月，高丽文宗得知耽罗与灵岩盛产木材，材质优良，便下令在这两处采伐木材造船，以使用之于日益繁荣的对宋贸易。这意味着高丽已把耽罗的资源视为高丽所有，随时可以自由加以利用。1079年（文宗三十三年）11月，高丽已在耽罗设置了掌管当地事务的句当使，该句当使亦负责向高丽国王奏报及管理耽罗星主、王子的更替。^②

正是由于国际上早已认为耽罗属于高丽，高丽实际上已派句当使对耽罗进行治理，最终高丽于1105年（肃宗十年）正式将耽罗纳入高丽版图，置为耽罗郡。^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5年7月。《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4年7月。《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5年7月及肃宗4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12年8月。《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33年11月壬申。《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7年1月己丑。《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12年8月及文宗33年11月。《高丽史节要》卷6，宣宗7年1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57，志11，地理2，耽罗县条：“肃宗十年，改七罗为耽罗郡。毅宗时，为县令官。”参阅金库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179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第一节 女真状况

□

一、女真族起源

女真族是通古斯族的一个分支。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名称不断更易。在先秦时，它被称为肃慎。汉代和三国鼎立时期，它被称为挹娄。在后魏，它的名称为勿吉。到了隋唐，变成了靺鞨。契丹太祖灭亡渤海国以后，渤海国的遗民亦被称为女真。

女真族以游牧生活为主，也有一部分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主要在洞窟里过穴居生活。他们的文化很落后，受着周边势力的统治。高句丽强盛时，它受高句丽国的统治。到了渤海时期，它与高句丽遗民一起，成为渤海国的主要居民。当时，高句丽系统的民族是统治阶层，而女真系统的民族则是被统治阶层。渤海时期以后，女真族的文化略有提高，渐渐不再过穴居生活。

在当时，女真族从整体看来，尚不具备从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能力，因而他们分散在各地谋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二、女真族活动地区

当勿吉以部族为主散居于各地之时，它分为七部，亦即：粟末部、伯咄部、安东骨部、佛涅部、号室部、黑水部和白山部。^① 粟末部居住在从长白山到松花江（亦称粟末北）流域这一带，是生活在最南方的部族。伯咄部居住在吉林省扶余县伯都纳地区。安车骨部居住于阿勒楚喀河地区。佛涅部聚居于吉林省榆树沟地区。号室部生活在吉林省三姓东南面地区。黑水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白山部生活在间岛地区（现在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译者注）一带。在上述这些部族中，以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地区一带的粟末靺鞨和居住在从松花江下游地区到三姓地区的黑水靺鞨，其势力要强盛一些。

渤海灭亡以后，女真族渐渐南扩。到了新罗末期，它已居住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咸镜道一带和西北地区鸭绿江以南的平安北道一带。高丽时期，居住在东北方面的女真被称为车女真或东蕃，居住在西北方面的女真被称为西女真或西蕃，辽国则称其为鸭绿女真或渤海女真。引人注目的是，辽国把居住在吉林省东北地区不归辽国统治的女真称为生女真，而把居住在吉林省西南面亦即开原以南归辽国统治的女真称作熟女真。

三、高丽对女真的政策

高丽对女真的政策有其复杂的方面。因为第一，高丽与女真

^① 参阅《北史》列传第82，勿吉传。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高丽》4，第290页。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毗邻的边界线很长。第二，女真尚未联合成一个整体，散居于各地，他们因情况不同或归顺或入侵，或背叛或服从，可谓变化多端。第三，高丽必须在与宋朝和辽国的三角关系之中慎重处理与女真的关系。

如前所述，契丹太祖灭掉渤海国之后，在其地成立了东丹国。而契丹太宗生怕其兄治理的东丹国扩大势力，便让东丹国将其京都迁至忽汗城西面的辽阳，对之加强了控制。这就意味着契丹太宗放弃了对辽阳以东地区的拥有权。也就是说，在东丹国西迁之后，契丹太宗对中原进行的扩张更加露骨。换言之，契丹对中原实行领土扩张，自然对其东北方面便漠不关心。于是，渤海国的旧土便成了没有主人的地区。政治上尚未统一起来的女真也就得以散居于这个地区，生活得比较自由自在。

高丽自太祖以来一贯奉行北进政策，总想收复高句丽的故土，因而与这些女真便有了接触。

在女真人中，同高丽接触得最频繁的是东蕃。东蕃属于生女真，居住在辽国东丹国京城南面以东，行动比较自由。东蕃亦即生女真，有多个部落。这些部落，有的业已向高丽投降，服从高丽调遣，有的则不时地侵犯高丽的边境。在那些业已附属于高丽的部落里，有的部落也会背叛高丽。所以，高丽太祖总结其教训，告诫其子孙曰：“蕃族人面兽心，食不果腹时前来归顺，酒足饭饱之后立即背叛，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即使眼下服服帖帖，也不知其何时又会背叛。是以宜在他们进出的州镇，在城外为之建馆，接待他们起居于内。”^①

高丽的这种女真观，把女真族视为蛮族，主要从文化优劣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太祖2，太祖14年冬11月。《高丽史节要》卷1，太祖14年冬11月。

角度来看待它，不只是着眼于其血缘的因素。

高丽本着这种看法，对前来归顺的女真采用怀柔之策安抚他们，而对于背叛高丽入侵边境的女真，则以武力予以讨伐，亦即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对于前来归化或降服的女真人，高丽称之为投化人。当时，高丽在原则上不允许女真人来投，在特殊情况下则可以有所例外。

对于被允许来投化的女真人，高丽大体上采取四种办法加以治理：第一，让他们散居于内地，编入民户。第二，让他们居住于边境地区的空旷地区。第三，酌情把他们编入边境地区的边防军，让他们亦军亦农。第四，对于其中具有特殊技术者，让他们住到内地，分给房屋与土地，编入民户，使之自食其力。

投化人大多是女真人中的酋长及其部属。高丽给予他们以官爵。他们之中的酋长们因其势力与地位不同，所任的官职也不一样。其官爵的顺序为：大将军、将军（依次为怀化将军、归德将军、奉国将军、宁塞将军、柔远将军、绥远将军）、大相、大匡、元甫、正甫、大丞、正朝、元尹、申尹、左尹、甫尹、大常、正位和持印等。高丽给他们封官之后，凡是对高丽忠心耿耿始终不渝者，可以升官晋爵，还可以使用高丽姓名。^①

高丽给投化高丽的女真人封官，向他们显示高丽的威望，提高他们的地位，旨在促使他们更加忠诚于高丽。这样一来，在女真头中的一些归顺于契丹者，虽然也有了一官半职，却为高丽的政策所感化，竟弃官而向高丽投化。

女真既有向高丽投化者，亦有不断地侵扰高丽者。

^① 参阅《高丽史》卷4，世家卷4，显宗10年8月壬子：“东女真毛逸罗率众来朝，增阶职”；世家卷6，靖宗4年正月戊戌：“东女真归德将军高之向来朝，改授怀化将军，兼从皆授职。”参阅《高丽史节要》卷4，显宗10年8月；靖宗4年正月。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高丽尽力使女真人归化或投化，并且给以奖赏。这种奖赏，分赐物与职赏。受赏者如是几个人，便分等别类给予奖赏。

女真族献给高丽的物品，主要是农业社会缺少的马和兵船、弓、箭等兵器类及毛皮类。这些马和兵器，不仅便于高丽防御不断入侵的女真族等外来势力的侵扰，而且可供高丽用于扩张北方的领土，推行北进政策。这些兵器类和毛皮类物品，也是高丽在驱逐女真并在被其征服之处形成农业社会时所必需的。

高丽赏赐给女真的物品有用金、银制成的女性装饰品，绸缎和棉织物、衣服、器皿、酒和食品等消费品与装饰品。对于高丽来说，这样做是有意为女真提供必要的日用品，也旨在为征服女真和扩张北方领土做好准备。

第二节 修筑千里长城与丽、辽外交纠纷

一、修筑千里长城

高丽太祖确立收复高句丽故土的奋斗目标之后，高丽历任国王均秉承先祖的意旨，奉行北进政策，随着领土向北开拓而努力筑城。

太祖十一年（928年）2月，高丽派大相廉相卿到安北府（现在的安州）筑城。然后让朴权为镇头，率领700名开定军镇守此城。这一年，太祖又命人在通德镇（现在的肃川）筑城，让忠仁镇守此城。太祖还于十二年（929年）3月，派大相廉相卿

到安定镇筑城。9月，又让式廉到安水镇（现在的价川）主持修城，任命昕平为司令官，驻守此城。兴德镇也于这年修成城池。

太祖十三年8月，高丽派廉相到马山修城，称之为安水镇，任命严式为副司令官率军驻守。这年12月，连州也筑起了城池。

931年（太祖十四年）11月，太祖留下遗训，叮嘱他们切莫相信北边的夷狄，在他们进出的州、镇，于城外建馆接待他们，不让他们随意接触高丽的国民。这一年，高丽设置了安北府与刚德镇，任命平唤为指挥官镇守此镇。

这样一来，太祖统一了后三国，把高丽的领土从大同江到永兴一线，扩大到从清川江到永兴一线。后来，成宗趁契丹侵略高丽之机，把高丽的北方边界由清川江到永兴一线，扩大到鸭绿江口到永兴一线。在这一时期前后，高丽在北方筑城的实际情况如下：

984年（成宗三年），成宗本着扩张领土的目的，命令李谦宜到鸭绿江沿岸筑城，遭到女真偷袭，李谦宜及其部下大败，只有三分之一的兵卒生还。^①

991年10月，成宗出兵将居住在鸭绿江外的女真撵至白头山外定居。这一史实，并不意味着当时高丽已拥有了长白山以南地区的土地，而只能说高丽把居住在鸭绿江外地区的一部分女真驱逐到了远处。

994年，契丹对高丽肆行了第一次侵略，而高丽的徐熙以其威武不屈的气概和能言善辩的外交天才，使契丹的侵略军乖乖地撤退。面对高丽有理有节不畏不屈，契丹不得不承认江东六州是高丽的领土，并且提议双方以鸭绿江为界，互筑城池巩固边防。

^①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卷3，成宗3年5月。《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3年夏5月。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契丹这一提议的具体内容有：(1)以鸭绿江为中心，契丹在其西面的沿岸筑造五城，从翌月，亦即3月初起开始破土动工。(2)高丽则可在从安北府到鸭绿江东面的二百八十里地区筑城。(3)高丽在这一地区究竟想筑几座城池，要向契丹通报。(4)其筑城的时间要与契丹筑城的时间一致。^①

994年，高丽将军徐熙率军赶走女真，在长兴（现在的泰川的东面）和归化（现在的归城）设立了二镇，在郭州（现在的郭山）和龟州（现在的龟山）筑造了二城。翌年，徐熙又在安义（现在的安州）和兴化这两镇建造了城池。996年，徐熙又奉命在宣州和孟州筑起了城郭。他还在灵州（现在的灵山）和猛州（现在的孟山）筑起了城池。云州（又称古远化镇，即现在的云山）筑好城池后，设置了防御使。抚州（现在的抚山）和博州（现在的博川）也同时设置防御使。

1005年（穆宗八年）1月，东女真入侵登州（现在的安边），放火烧毁了30多个部落。高丽出兵击走之，在登州筑起了城郭。1030年（显宗二十一年）6月，高丽在麟州（鸭绿江江口地区）、威远城（鸭绿江沿岸）和定戎镇（鸭绿江沿岸）筑成城池。

由上可知，从太祖到显宗，高丽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诸国家（种族）的侵略，捍卫领土的安全，在多处筑起了城郭。

高丽修筑千里长城，柳韶功不可没。1029年（高丽显宗二十年），显宗命令柳韶出动民工，整修兴化镇西北面40里处的一座古石城，设立了威远镇。然后，又修好兴化镇北面的一座古石堡，设立了定戎镇。

^① 参阅《高丽史》卷3，世家卷3，成宗10年2月。《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10年2月。参阅卢启铉著《契丹的第一次来侵与徐熙的外交》，该文被辑于《郑云章博士花甲论文集》，见其第18页，该论文集由岭南大学出版。

这年9月，契丹将军大延琳在契丹造反，建立新的政权，国号为兴辽。大延琳派高吉德到高丽来求援。12月，兴辽国大师大延定见契丹与东北女真联合侵犯兴辽国，又派人到高丽求援。然而，高丽置之不理，而指示柳韶到北方建造城郭，以巩固高丽的边防。

德宗即位后，将太祖以来制订的防止北方民族入侵的修筑长城的计划付诸实施。德宗元年，辽国在鸭绿江上架起浮桥，在保州与宣州筑起城郭，抓走了高丽百姓。面对辽国的这种侵略行为，高丽派金行恭为特使到辽国，提出了如下三项要求：(1) 撤掉鸭绿江上的浮桥；(2) 拆毁保州与宣州的城郭；(3) 释放被抓走的高丽人。然而，辽国全部加以拒绝。于是，高丽在不派贺正使赴契丹的同时，使用前王的太平年号，断绝了与辽国的外交关系，命令柳韶主持修建千里长城。

1032年（德宗元年），契丹遗留使一行到达来远城，想驻留下去。高丽出兵赶走了他们，在朔州、宁仁镇（现在的永兴）和派川县（现在的安边）修筑了城郭，以对付契丹的入侵。1033年（德宗二年），德宗命令柳韶正式开始修筑千里长城。

高丽千里长城的规模很大。它始自鸭绿江入海口，向东经由威远（义州地区）、兴化（义州地区）、静州（义州地区）、宁海（义州地区）、宁德、宁朔、云州（云山）、安水（价川）、清塞（熙川）、平虏、宁远、定戎、孟州（孝山）和朔州等14城，到耀德（永兴地区）、静边（永兴地区）和和州（永兴地区）等诸城，延伸到定平（定州）海岸的都连浦（广浦），绵延一千多里，

城高 25 尺，宽 25 尺。这是朝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墙。^①

这条千里长城并非一年间一蹴而就的。如前所述，历代国王已命人修筑了不少城栅。高丽在此后多年间或把这些城栅连结起来，或加以补筑和修筑。这条千里长城，大部分是柳韶于德宗在位时主持修成，而于 1044 年亦即靖宗十年才完全竣工。

高丽在修筑千里长城的同时，生产和储备了大量武器。德宗根据尚舍奉御朴元绰的建议，制造和生产了车（革车）、雷（楛质弩雷）和炮（腾石炮），并将八牛弩和二十四船兵器运到了边防要塞。与此同时，还对士兵们的家小进行了抚恤。靖宗即位后，为使保卫边防的将士无后顾之忧，晓谕各地官府对家境贫困、耕地不足的将士以必要的抚恤。

二、辽国的抗议与高丽的对策

辽国对高丽修筑这条千里长城提出了抗议，但高丽却进一步补筑和加固城郭。

1035 年（靖宗元年），契丹来远城让检校右散骑常侍安署来到兴化镇（现在的义州），递交了一份通牒。“牒与兴化镇曰：‘窃以当郡。’最近仁封有小便宜，须至彼达，载念贵国原为附庸，先帝每赐优洽，积有岁月，靡倦梯航。昨因伐罪之年，致阻来庭之礼，既剪除于凶逆，合继续于贡输。曷越数年不寻旧好，筑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以欲碍奇兵……垆统八方之国界……”

^① 参阅李弘植著《国史大事典》第 1521 页，三荣出版社出版于 1984 年。参阅《高丽史》卷 5，世家卷第 5，德宗 2 年 11 月辛卯。柳韶以其建造千里长城之功于翌年获得推忠拓境功臣称号。德宗 2 年，修筑千里长城有功的女真人亏火等 156 人，都得到了官升一级的褒奖。参阅《高丽史》卷 94，列传卷 7，柳韶传。

唯独东溟之域未宾北极之尊，或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其于违允，自有变通。”^①契丹的这封通牒，怀柔与胁迫并用，旨在让高丽臣服于契丹，乖乖地听从其颐指气使。

高丽收到这封通牒后，通过宁德镇（义州）对契丹来远城作了答复，指出契丹的指责纯系信口雌黄。高丽的答函，逐段逐句对契丹的通牒作了驳斥：

第一，对于“昨因伐罪之年，致阻来庭之礼，既剪除于凶逆，合继续于贡输”之说，复函回答道：当时（1029年至1030年），大延琳兴辽国之乱。为了加以镇压，辽国兴师动众。如此乱世，自然道路阻隔，无法派人前往。然而，此乱一旦平息，高丽便派内部侍郎李守和到贵国进献。先大王（亦即德宗）去世之时，曾派蔡忠显到贵国通报这一噩耗。贵国先皇帝圣宗驾崩时，高丽当即派柳乔造参加葬礼。现在的皇帝一即位，又曾派金恭行曾入祝贺。这样来来往往，又怎能说是致阻来庭之礼呢？

第二，对于“筑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以欲碍奇兵”之说，复函答曰：任何国家都有国土，搞点防御设施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高丽设置城寨，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土和使国境地区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绝不是有碍于与契丹的往来。复函还指出千里长城的机能与性质，都只是为了防卫敌人的入侵。

第三，对于“唯独东溟之域未宾北极之尊”之说，复函答复道：前次，高丽派往贵国的六名使臣，至今仍被扣留在贵国。贵国不仅把宣州和定州二城修筑在我国领土之内，而且不让我们的使臣归国，我们恳切地希望这个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但愿贵国放

^①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卷6，靖宗元年5月甲辰。《高丽史节要》卷4，靖宗元年5月。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回我们使臣，把被侵夺的土地还给我们。也就是说，高丽要求契丹赶快释放高丽的使臣，拆毁契丹修筑在高丽境内的城郭。

第四，对于“或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之说，复函答曰：在我们想来，贵国皇帝人情通达，度量宽和，知恩必报。我们毫无差失，他怎会震怒呢？^①

高丽虽然收到了契丹抗议高丽修筑千里长城的通牒，却不予理会，继续加固千里长城。这年9月，靖宗命人继续修筑西北松岭的长城和东面的长城，以之为阻遏女真和辽国入侵的要冲。

千里长城于1044年11月完全修成之后，高丽对完成这一大业的有功人员一一论功行赏。高之知因修筑平虏城（现在的永柔）和宁远城这两座城池有功而受到了嘉奖。对于监修城郭的官吏，七品以上者官升一级，其父母也得以封爵。八品以下者也官升一级。

靖宗三年（1037年）9月，契丹派使臣带国书送到高丽的宁德镇，指责高丽近年疏于朝贡，要高丽以后及时朝贡。靖宗于这年12月派殿中小监崔延嘏到契丹，表示以后会继续及时朝贡，成为忠诚的友邦。这样一来，高丽于德宗元年与契丹断绝的外交关系，在经过6年之后，于1037年得以恢复。^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卷6，靖宗元年6月。《高丽史节要》卷4，靖宗元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6，世家卷6，靖宗3年6月，12月丁亥。

第三节 羁縻州的设置与完颜部女真的入侵

一、设置于长城之外的郡县

高丽靖宗命令柳韶出动大量民夫修筑成千里长城，但长城绝不是高丽的边界线。高丽的领土意识是恢复高句丽的故土，自然决不会认为长城之外的土地就不是高丽领土。千里长城是旨在防止女真族与契丹族入侵的防御性设施。恢复高句丽故土不宜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国力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扎扎实实付诸实施。高丽在散居于长城之外的女真地区设置羁縻州、郡、县，藉以统治这些女真地区，便充分体现了高丽的这种态度。

文宗在位之时，许多女真部落酋长来到高丽，要求设置羁縻州。高丽欣然应允，在其地设置了羁縻州、郡、县。这些羁縻州，有的是应女真的要求而设置的，有的是通过讨伐而强行设置的，有的则是经过业已成为羁縻州的女真说服而要求设置的。

1073年（文宗二十七年），东女真的归顺州（都领是古刀化）、昌州（都领是高舍）、城州（都领是耶好）、恭州（都领是多老）、恩服州（都领是阿忽）、温州（都领是三彬）、诚州（都领是尼多弗）等7个州的都领，率领部属到高丽，要求内附，在其地设郡、县。高丽文宗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其地设置郡、县的同时，为这些都领取了高丽名字。古刀化的高丽姓名为孙保塞，高舍的姓名是张誓忠，耶好的姓名是边最，多老的姓名是刘咸宾，阿忽的姓名是杨东茂，三彬的姓名是韩方镇，尼多弗的姓名是赵长卫。这些州所在地区不详，当在定平近处的咸兴平原一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带。从这一事实看来，这些州的称号似乎是在此前就已由高丽所定，并以之为羁縻州。

其余东蕃女真也来到高丽，请求准许他们成为高丽的羁縻州。是年4月，文宗作了这样的晓谕：“东北番15州的女真人争先恐后前来归附，愿意成为我们的州、县，至今未见止息……可等候远近的蕃人（指女真人、契丹人）都来纳贡，然后拓定州县。”16天后，这类州县均已拓定。文宗亲往龟山寺设宴，祭告宗庙社稷，对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国力隆盛表示感谢。

这15个州究竟在何处，史料未作明确记载。除了上述的归顺州等7个州之外，另外8个州大概是新设在千里长城之外的郡县。

继东北面的女真之后，西北面的女真也要求高丽在他们那里设州郡。文宗二十七年5月，西北兵马使向文宗奏道：“西女真酋长曼豆弗等诸蕃，请依东蕃例分置州郡，永为藩翰，不敢与契丹番人交通。”文宗准许来朝，因命往后有投化者，可招谕而来。西北面兵马使又奏道：“平虏镇（永柔，在宁远西面约10里处）近境蕃帅柔远将军骨於夫及冤害村（在咸镜南道地区）的要结等告云：‘我等曾居伊齐村为契丹大完（官职名）。迩者再蒙招谕，于己酉（1069年）十一月赴朝，厚承恩赉且受官职，不胜感戴。顾所去此四百里，往复为难，请与狄耶好等五户，引契丹化内蕃人内徙冤害村附籍，永为藩屏。’于是检得户三十五，口二百五十二，请载版图。”^①

6月，东北兵马使奏道：“三山（又称三撤，现在的咸镜南道的北青）、大兰、支栲等九村及所乙浦村蕃长盐汉，小支栲前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卷9，文宗27年5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27年5月。

里蕃长阿反伊、大支栻的与罗其那乌，安服夷州骨阿伊蕃长小隐豆等，一千二百三十八户籍。自从大支栻小支栻的袅应浦海边长城，凡七百里，今诸蕃络绎归顺，不可遮设关防。宜令有司奏定下州号，且赐朱记。”文宗准奏。这是业已被编为羁縻州的女真说服其他女真也入编羁縻州的事例。这一地区，大致是现在的洪原、咸兴和北青。

17天后，东路兵马使又奏道：“东番的大齐、者古、河舍等十二村酋长昆豆、魁拔等一千九百七十户，依照霜昆之例请求来附。豆龙骨伊和余波汉^①等酋长阿老汉等，也愿意其地成为我朝之州县。他们所居住之地相当偏远，从来未附属于我朝，也从未与我朝有过往来，现在都来归附。如果把这一地区都定为领土，设置关防，那么余汉岭之外的古大史伊、称见、昆俊、丹俊、无乙比和化豆等处均得设关防才是。这一带尽是女真散居之处，全设关防恐有难处。依微臣之见，不如等到岭外的那些女真居住之地尽被我朝编为州县之时，再逐渐在这些偏远之地设州县为上。”文宗准其所奏。

女真人纷纷自愿归顺，或者经过劝说而愿意内附被编为高丽州县。这样一来，远至摩天岭以南，至镜城以北，连高丽威力未及的偏远之处的女真族也纷纷前来归附。对此，高丽采取由近及远的办法，逐渐在这些地方设置了郡县。

这年9月，文宗根据翰林院的建议，将东女真大兰等十一村内附者，定名为滨、利、福、恒、舒、湿、闽、载、敬、付、宛

^① 参阅丁若镛著《疆域考》：“绎史云：余波汉岭即伊板岭，今之摩天岭……”“豆龙骨伊即徒龙古也……今之钟城也。”参阅《世宗实录》地理志，咸吉道镜城郡条：“镜城北五十八里，有豆龙耳岬。”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等十一州，各赐朱记，仍隶归顺州。^①

以上就是高丽修筑千里长城，及在其北面地区设置羁縻州的情形。

修筑这条千里长城，绝不是以之划定为高丽边界。高丽的领土意识，一贯就是恢复和确保高句丽的故土。对于千里长城之外的土地，当时由于时机不成熟，无法占据，故俟条件成熟之时，再图把它据为领土。

高丽于文宗二十七年2月在长城外设置了归顺州等七州，同年4月又设置了十五个州，9月间再度设置了滨州等十一个州。这样一来，摩天岭以南和镜城以南的地区，便都成了高丽的羁縻州。对于这一地区女真酋长，高丽为他们取高丽姓名，给他们封官，酌情为他们升官晋爵，赏赐物品给他们。

不仅如此，高丽还为这些地区确定了州、郡的名称，确定了其管辖的范围，规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想方设法使之服从于高丽，向高丽纳献。然而，这样的羁縻州，毕竟与高丽领土有别，从外表上看来似乎与高丽领土无异，实际上则颇有差异。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地区实际上无法强迫女真人臣服，也无法抹煞其文化，进而把高丽文化强加于这些女真人。若其前来归顺，便抚慰他们，对其施恩显惠。若其变心，便不加干预，听其自便。他们在延续其文化的同时，如想吸取高丽的文化，便予以鼓励，让他们得以沐恩高丽而受惠。

^①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卷9，文宗27年9月甲辰：“翰林院奏：东女真大兰等十一村内附者，请为滨、利、福、恒、舒、湿、闽、载、敬、付、宛十一州，各赐朱记，仍隶归顺州。从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27年9月。从业已编成归顺州作为羁縻州的情况看来，州内还有隶属于其他州的县、郡。州的概念和这些州的似乎互不相同。

他们一旦侵略某一地区，或者犯上作乱，高丽便出兵征伐。^① 由于其侵略与叛乱并非想摆脱羁縻州，高丽的出兵征伐也不是强迫他们非成为高丽的羁縻州不可。

当时，高丽并未从南部移徙高丽人，到这些羁縻州去居住，并未蓄意使这些羁縻州实现高丽化，而是以千里长城为界，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圈。这就说明，这些羁縻州并非是完全的高丽领土。当时，高丽限制高丽人与羁縻州的来往，也说明高丽对于其领土与羁縻州的看法是不同的。

1081年（文宗三十五年），西女真酋长遮亶等6人到高丽，进献盔甲等兵器。文宗赏赐其衣服和绸缎之后，对高丽官员晓谕道：“今后，东、西女真的酋长如想晋见朕，兵马使必须先行启奏。待朕准许之后，方可让其来朝。这要成为定制。”这年5月，东女真的酋长陈顺等23人来高丽献马。文宗就此晓谕有关的官员：“凡是女真人来朝，在京城逗留不得超过十五天，这也应成为定制。”^② 不仅如此，对他们的待遇也不甚相同。

这年8月，西女真的漫豆等17人带领家属前来投化。礼宾省奏道：“依旧制，除本国边民因很早就被蕃族抓走，后因思念国君而归来者和宋朝的木匠外，不许黑水人和女真人入朝。”文

^① 当时女真不时侵扰，高丽曾几度出兵，予以征伐。文宗27年6月丙申，兵马使奏报：“东蕃海盗入侵庆州管辖的波潜部曲大肆掠夺，元兴镇（现在的定平）将军当即率领十艘军舰，与敌人激战于椒岛，将其击破。”文宗33年5月戊辰，北蕃族入侵平虏关（现在的永柔），康甫等潜伏于草丛中侦察敌情，射死其先锋队的两个先锋，击溃了敌人。文宗34年12月己未，东蕃作乱，文宗任命文正为判行营兵马使，率领三万名步兵和骑兵，分几路冲入敌阵，将敌人一一击破，歼敌431名。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卷9，文宗同年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9，世家卷9，文宗35年2月辛酉；同年5月己丑；同年8月未己。参阅《高丽史节要》卷5，文宗35年2月、5月、8月。

宗下令依旧制行事。

从以上几点看来，高丽在千里长城之外设置的羁縻州，实际上不能算是高丽完全意义上的领土。

二、完颜部女真的入侵与甲戌战役

在东北满洲地区的女真族之中，完颜部得以崭露头角。盈歌（乌左拉伊之子，后来被追崇为穆宗）率领部属征伐周围的女真，统一了今天的间岛地区（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译者注），然后率军南下，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曷懒甸。^①

随着完颜部女真的南下，在千里长城之外的女真地区设置羁縻州，进而又设立了州、郡的高丽，自然便在曷懒甸地区与完颜部女真发生了冲突。

当时，高丽并未深刻地认识到完颜部势力的日益扩大。完颜部的统治者盈歌，曾先后4次派使臣到高丽。头两次，高丽只是当作一般例事。^② 1103年7月，亦即肃宗八年7月，盈歌第三次派使臣到高丽时，肃宗才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刻性与严重性。

^① 关于曷懒甸这个地区，学者们说法不一。津田左右吉在其《尹瓘征略地域考》一文（刊载于《朝鲜历史地理》第2卷）中认为，摩天岭以南和定州以北的地区是曷懒甸地区。松井等在其《辽在满洲的疆域》（刊载于《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一文中认为，曷懒甸就是图们江以南的咸镜道地区。池内宏在其《完颜氏的曷懒甸经略与尹瓘的九城之役》一文（刊载于《满鲜史研究·中世》一书）中认为，从咸关岭以南到定平以北的地区是曷懒甸地区。丁若镛在《兴犹堂全书·疆域考》中认为，曷懒甸地区指的是吉州以南咸兴以北的地区。曷懒，是黑水女真之谓，与海兰河、海浪河的江名和哈兰的地名相类似。参阅金九镇《尹瓘经略九城的范围与朝鲜六镇的开拓》（《史丛》第22期）第211页的注解27。

^② 参阅《高丽史》卷12，世家卷12，肃宗7年4月甲辰，11月癸巳、丁未。《高丽史节要》卷6，肃宗7年11月。

也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完颜部女真地区的一位高丽籍医生，为盈歌的亲戚治病之后，盈歌允许他回高丽。这位医生向高丽肃宗奏道：“居住在黑水的女真部族拥有军队，常常进行集训，现已相当强大。”高丽得知此情报，才意识到完颜部女真的存在对高丽是一大威胁。自此之后，双方使者的来往日见频繁。盈歌在攻打萧海里并占领该处之后，派人向高丽作了通报。高丽当即派使者前去祝贺。完颜部则派斜葛（盈歌的族弟）到高丽，对高丽的祝贺表示感谢。^①

盈歌兄之子乌稚束，继盈歌之后而继任完颜部的统治者。乌稚束于1104年（肃宗九年）10月即位后，高丽与完颜部女真终于发生了冲突。

1104年（肃宗九年）11月，当上了完颜部国王的乌稚束，让石适欢率领军队去夺回曷懒甸地区业已成为高丽羁縻州的女真和业已成为高丽州郡的七城（所谓叛亡七城）。^②乌稚束的这次军事行动，使得曷懒甸地区的一些已成为高丽羁縻州及郡、县的女真地区，很快就转而附属于完颜部。

高丽为了惩戒背叛高丽转向完颜部的曷懒甸女真，派使者到完颜部，以有事协商为由，引诱完颜部的代表到高丽。曷懒甸随即派斜勒和冶刺保到高丽，石适欢也派杯鲁到高丽。高丽扣留了斜勒、冶刺保及14名团练使，不让他们返回曷懒甸，只对杯鲁说：“此事与你无关！”放他回到了完颜部。这说明高丽对完颜部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世家卷12，肃宗8年7月甲辰。《高丽史节要》卷7，肃宗8年7月。肃宗8年11月丙申，完颜部的盈歌曾又一次派使者到高丽。

^② 这七城究竟在何处，史籍语焉不详，但分明是曷懒甸地区业已成为高丽州郡的地方。《高丽史》卷12，肃宗9年1月条提到过的与乌稚束反目的夫乃老和睿宗4年6月条的弓汉村，也许是七城中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城。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女真并无敌意，只是要业已倒向完颜部的曷懒甸女真继续成为高丽的羈縻州或州、县。同时，这也表明高丽对业已成为其羈縻州的女真不再持消极的态度，而是对之增强了领土意识，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态度。

结果，五水^①女真复又倒向高丽，东女真有 1753 名男女重又投化高丽。^②

这样一来，乌稚束便与归属于高丽的曷懒甸女真之一的夫乃老产生了不和，让公兄、之助率军征伐夫乃老。这支完颜部的骑兵还趁其余势，驻扎在高丽定州的关门之外。

完颜部军队抵达千里长城之外的这一事实，引起了高丽的重视。高丽不由得心生怀疑：难道说完颜部女真此举旨在侵略高丽？于是，高丽将女真酋长许贞与罗弗等骗来，把他们拘留在广州（现在的广州），加以拷问。他们果然供认完颜部女真想入侵高丽。于是，高丽一方面继续拘留他们，另一方面针对完颜部女真的侵略采取了对策。

然而，高丽朝廷对此议论纷纷。

内侍林彦与边将李日肃等持强硬论。他们过分低估女真的势力，对自己的实力也未作认真的分析，就主张立即出兵征伐完颜部女真。而直史馆李永则认为兵器乃是凶器，双方交战相当危

^① 关于五水，池内宏在其《满鲜地理历史报告》一书的第九部分，认为是咸兴平野的瑚珪川、城川江、汝渭川和院水川。方车仁在《尹瓘九城再考》一文中，认为是指图们江流域的星显水、陶温水、乙离骨水、活涅水与统门水。金九镇在其《尹瓘经略九城的范围与朝鲜六镇的开拓》（刊载于《史丛》第 22 期）一文中，认为是图们江及其支流海兰河、布尔哈通河与嘎呀河。参阅《金史》卷 135，列传 73，外国下，高丽。

^② 参阅《高丽史》卷 12，世家卷 12，肃宗 9 年正月辛巳。《高丽史节要》卷 7，肃宗 9 年正月。参阅《金史》卷 135，列传 73，外国下，高丽。

险，最好是勿动干戈引发战争。林彦等在女真并无侵略性的情况下就想起兵征伐，此事万万不可行。肃宗面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倾向于林彦等的征伐论，当即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林干为总指挥，任判东北面行营兵马使，赐以斧钺，^① 催其出征。

林干率领军队于2月8日在定州城外同女真军队交锋。由于他求胜心切，所指挥的又是未经训练的军队，结果大败而归。女真乘胜闯入定州城内，杀人掳掠无所不为。有司弹劾林干，建议问其败北之罪，肃宗罢免了林干的职务。

1104年，亦即肃宗九年的2月21日，肃宗任命枢密院使尹瓘为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统，赐之以斧钺，命其率军征伐女真。3月4日，尹瓘率军在定州城外的辟登水（现在的凤台川）与女真军队接战，打得十分勇敢，却还是损失大半而大败，史籍称此二战为甲申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林干与尹瓘都败在女真的之训（估计应是石适欢）手下。尹瓘败北后，竟对敌将卑躬屈膝连声道歉，发誓今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才得以生还。后来，高丽释放了女真的团练使等14人以及在高丽的其他女真酋长，唯独许员与罗弗仍被高丽扣留。

这年6月，女真拆去了定州城外的军事设施。以致后来有一个时期，千里长城之外的曷懒，落入了女真之手。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肃宗向天地神明祈祷道：“倘能助我扫荡贼境，定当匍匐在地行礼鸣谢。”由此可知，当时高丽在征伐军两度失利，丧失了一些羁縻州和设在千里长城之外的州县之后，肃宗卧薪尝胆之心可谓不同凡响。

^① 斧钺，指的是小斧与大斧。高丽国王将其赐予出征的将帅，意思是让将帅以之杀敌和处罚本军队中犯罪的人。此外，斧钺也被用作刑具和显示统治者威严的仪仗。

第四节 睿宗征伐曷懒甸与设立九州

一、准备出征

尹瓘为了洗雪 1104 年在甲申战役中败北的耻辱，向肃宗分析与奏报了失利的原因。他说：“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难以抵挡其锋芒。”他建议道：要想战胜敌人，兵力、兵器、战术均需敌人之上。他主张调动高丽总体力量与之一拚，并以之为具体的方略。

肃宗接受这一建议，组建了别武班。别武班由神骑、神步和特科队组成。由于女真军队尽是骑兵，高丽也加强了骑兵的建设，组建了神骑军。神骑军由有级无职的官吏和商人、奴隶以及全国有马者组成。神步军则由 20 岁以上无法参加科举的无马男子汉组成。同时，由僧侣组成了降魔军。之外，抓紧进行了军事训练，储存了足够的军粮。

肃宗征伐女真的意志十分坚定，命令有关的官员做好了各种出征的准备。然而，他未能亲征女真就已龙御宾天。

睿宗于 1105 年 10 月即位后，倾注全力实现肃宗未竟之征伐女真的遗愿。他于 11 月派智祿延等巡视东北面的山川。13 天后，他召集大臣们到乾德殿，商讨东北方面的经略问题。4 天后，任命吴延宠为东北界行营兵马使，随即又任命了东界知兵马使、长州分道、宣德分道等边境地方官，征伐准备工作完全就绪。

二、征伐曷懒甸与修筑九城

高丽做好征伐准备工作之后，展开了征伐前的摸底。1106年（高丽睿宗元年，女真康宗亦即乌稚束四年）1月，睿宗派黑欢方石到女真，通报睿宗已于3个月之前亦即前年10月即位。^①女真也派公牙（似是杯鲁）等10人到高丽，增进友好之谊。睿宗以礼相待，命人隆重接待。

这年3月，女真的之训（似是石适欢）率领两千骑兵在定州（现在的定平）城外摆下战阵，命人交给高丽东北面兵马使一份信函，内容竟是愿意纳献（虔诚服从之意）。这封信函写道“公牙去朝见高丽国王之时，蒙隆重接待赏赐甚厚，我们岂敢忘却上恩之隆而想背叛？但愿子孙万代都向高丽恭顺朝贡。”^②于是，高丽将增派至东北面的兵马使金德珍召回朝廷。

双方这样以友好和顺服为前导进行侦察，不过是玩弄让对方丧失警惕的手法。

高丽早知女真时而服从时而背叛反复无常，自然不会相信女真玩弄的任何花招，继续做好征伐的准备。高丽深知前两次失利于女真是因为军纪松弛，便着重整饬军纪。这年7月，军队切实

^① 《金史》卷135，高丽传：“康宗四年丙戌，高丽使黑欢方石来贺嗣位。康宗使杯鲁报聘。”这里记载高丽派使者去祝贺女真王康宗的即位，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高丽特使向女真通报了高丽新王的即位。参阅池内宏著《完颜氏的曷懒甸经略与尹璫的九城之役》一文，该文刊载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出版于1921年的《满鲜地理历史报告》一书，见其第203页。还可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215页的注解76，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12，世家12，睿宗元年正月辛亥，3月丁酉。《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元年1月、3月。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贯彻了显宗在位时实行得相当严明的军律。

这年10月，睿宗度过肃宗的周年忌日之后，于翌月命令尹瓘和吴延宠检阅了神骑军与神步军。翌年（睿宗三年）3月，派右副承宣林彦到东北道，对几个省作了巡视。在军备、军粮与边境的防备一切就绪之后，睿宗召开大臣会议，经过集思广益做出了三项决定：（1）已经收到确切的情报，就要入侵高丽边境的女真酋长，背着插有雉鸡尾羽的葫芦巡回于各个部落，以之为侵略高丽的信号，因而防止女真入侵已是当务之急，全国上下不可掉以轻心。（2）在两次败在女真手下之后，肃宗曾将征伐女真的誓词珍藏于重光殿，现在予以公诸众大臣。（3）经过占卦，出师大吉，可出兵征伐女真。

于是，睿宗任命尹瓘为总司令官，吴延宠为副司令官。出任总司令官的尹瓘当即向睿宗宣誓：“谨遵王旨，统率三军，打垮敌人，拓展国土，洗雪国耻！”

睿宗对这次出征分外重视，于这年闰七月亲自检阅和激励了出征的高丽军队。

12月1日，尹瓘等率领17万大军（号称20万），浩浩荡荡踏上了征伐女真的征途。尹瓘首先制订了扫荡千里长城边防女真的计划，派兵马判官崔弘正和黄君裳到定州和长州，向女真酋长谎称：“国家将释放许员与罗弗^①等，快快前来听令！”与此同时，埋伏了将士等候其到来。女真酋长信以为真，派了古罗等400多人前来。这400多人大多进了长城之内，只有五六十人，心生疑窦而在关外窥察动静。进入关内的女真人接受款待，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全被杀死。留在关外窥察动静的那些女真

^① 许员与罗弗等是女真的头目。肃宗9年甲申战役打响后，他们被高丽扣留，不得返回女真。

人也被高丽的伏兵悉数斩杀。^①

随后，高丽出征军于12月14日通过关防，开始军事行动，从陆路和海路攻打女真。尹瓘率领的大本营的军队，一举攻占了大乃巴只村和文乃泥村等37个村屯。高丽右军攻占了广滩等32个村，左军也攻占了深昆等31个村，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这场战斗中，以拓俊京立功最多。

尹瓘派俞莹若回京向睿宗报告了这一初战告捷的喜讯。与此同时，分兵几路，确定了各路扫荡境界：东至火串岭，北至弓汉伊岭，西至梦罗骨岭。

尹瓘继续选定城址，动员人力筑起了雄州、英州、福州和吉州等4座城池。东女真的要乙乃等3230人向高丽军队投降。

1108年（睿宗三年）2月，高丽朝廷在这些被征服地区设立了行政官署，使之完全变成了高丽的领土。也就是说，以咸州（现在的咸兴）为统治中心，设了大都督使，由柳泽担任。同时，在英州、福州、雄州、吉州及公险岭设了防御使。14天之后，亦即3月27日，尹瓘向睿宗奏报：已征服女真，修筑了六座城郭，并在公险岭竖碑为界，在3月间，尹瓘命人在宜州、通泰、平戎督造了三座城池。在这六州和三州筑城，史称尹瓘的九城之设。

高丽出动兵力占领这个地区，又设置了行政官府之后，为了使之完全成为高丽的领土，从高丽的南界移徙了6514户人家到这个地区居住。其中，咸州移徙了1948户，英州1238户，雄州

^① 参阅《高丽史》卷96，列传9，尹瓘传。参阅《金史》卷135，高丽传，康宗4年丙戌。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1436户，福州680户，吉州680户，公险岭532户。^①

这时，高丽的征伐军队在战略上犯了个大错误。中军司令官金汉忠反对尹瓘总司令官的这些做法，也就是说反对把内城的木材和砖瓦等用于在刚刚占领的地区筑造九座城郭，反对把南方的百姓移居于这些地区。他的论据是：“倘若外城（九城）未能完全修筑好，便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里面又没有完整的城郭，百姓又怎能安居乐业？”所以他说，尽管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本人无法服从。兵马副使朴景仁听说尹瓘筑九城，也不同意。他说：“在如此偏远的敌人地盘上筑城，即使现在能成功于一时，日后也恐怕难以守得住，千万不可造次。”^②

完颜部女真听说高丽军队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占领曷懒甸地区修筑九城，并设行政官厅及任命行政长官，又迁徙了大量高丽人居住在这个地区，不禁惊惶失色。康宗乌稚束连忙召集首长商议对策。当时，在座者都认为如果出兵与之交锋，契丹会视之为与之过不去，不如坐观事态发展为上。只有太祖阿骨打力挫众议说：“如果不出兵抗战，那么，不仅曷懒甸地区会被白白夺走，其余地区也休想有安宁之日。”在座者经过讨论，觉得阿骨打说得有理。于是，康宗乌稚束决定出兵，与高丽军队血战到底，一决雌雄。

女真的两万名骑兵与步兵在英州南面布下战阵，攻打高丽军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世家12，睿宗3年2月甲午、戊申。《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3年2月。在英州城中建造了护国仁王寺和镇东普洛寺，先王肃宗以之实践了其向天地神明的发愿和盟誓。参阅高永一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参考资料编第16页，该书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参阅李迺扬著《韩国通史》（一）第80页，该书为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4辑，由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于1956年。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217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95，列传8，金汉忠传，朴寅亮传附景仁传。

队。尹瓘与林彦首次指挥军队与完颜部女真军队对阵，高丽军队好不容易才打退了它。对于高丽军队与完颜部女真军队在曷懒甸的接战，《金史》作了这样的记载：“斜卯阿里父浑坦……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浑坦攻之，遇敌木里门甸，力战久之……浑坦与石适欢合兵于徒门水……”^①这徒门水，显然就是图们江。尹瓘的军队被完颜部女真攻打之后，在咸兴州大都督府召集各位指挥官制定对策。尹瓘等在讨论中，未能正确地估价阿骨打的统率能力、女真军队的团结一致与高昂的士气。

4月8日，完颜部女真军队又在雄州城周围布阵，围攻高丽军队。在完颜部女真的对抗益趋剧烈和雄州被围的情况下，尹瓘将军竟傲慢得作了错误的判断。而睿宗也因而轻敌，失之于轻妄。

也就是说，就在女真军队包围雄州与高丽军队激战的第二天，尹瓘与吴延宠都以凯旋的名义回到了开京。睿宗大设宴席欢迎他们。他们把铁钺献给睿宗，仿佛这次征战已大功告成，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完颜部女真军队攻打雄州，高丽军队无法将其击退，女真军队的气势便更加高昂。高丽守军无计可施，便命人火速送信给吴延宠，请他快快派兵援救雄州。吴延宠率领军队来到雄州与敌人激战，才于5月4日为雄州解了围。这时，雄州已被围困27天，险些陷落于敌人之手。

完颜部女真的对抗在多处越来越顽强，高丽军队与之打得难解难分之后，睿宗只得于7月7日让呆在开京的尹瓘回到前线继续率军征伐。8月间，吴延宠又从战地回到了开京。而女真军队的对抗则更加凌厉。8月16日，兵马判官庾翼、将军宋忠和神

^① 参阅《金史》卷80，斜卯阿里传。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骑军朴怀节等在吉州之战中战死。翌年，亦即1109年1月4日，行营兵马录事王思根与河亦铎也在咸州之战中殉国。

这年2月，睿宗在重光殿欢宴大臣。睿宗有了几分醉意，命群臣起舞助兴。平章事金景庸等领命，一个个手舞足蹈。这时，承宣林彦佯装已醉，边告退边喃喃自语：“东北面战事吃紧很不太平，重臣们竟有闲情逸致起舞？”

9天后，右谏议大夫上书，请君王明察战况。实际上，战况已经不妙。吉州城也已被女真包围。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吉州终于沦陷。4月4日，睿宗让吴延宠再度出征。他率领部队进击至公险岭，于5月16日遭到女真部队的奇袭，将士死伤和被俘者不计其数，他的部队行将溃灭。他不得已把遭到惨败的实际情况奏明睿宗，等候睿宗的处罚。

高丽在吉州城沦陷、吴延宠的部队溃灭的情况下，重整旗鼓整顿了部队，仍由尹瓘与吴延宠负责指挥。6月12日，他们率领部队从定州向吉州进发，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如上所述，尹瓘与吴延宠初战告捷，征服了曷懒甸的女真，筑起九城，设置行政官厅，移徙南方百姓于其地。后来，他们率领部队与完颜部女真部队正面交锋，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而指挥官尹瓘与吴延宠却自高自大，错误估计形势，竟以凯旋为名离开战地回到京城。睿宗被蒙在鼓里，接二连三设宴庆贺，轻歌曼舞踌躇满志，以致在敌人的攻势面前手足失措，既未能管理好业已征服的地方，又未能真正对敌军进行征伐，面对劲敌的进攻，只能徒叹奈何。

第五节 睿宗归还九城与领土处理

一、讲和与归还九城

睿宗四年（1109年）2月，右谏议大夫李载上书进谏，谴责群臣沉醉于酒宴与歌舞，而不思东北面的战事正在吃紧。他在谏书中写道：“东蕃派来假使臣史显请求和好，朝廷竟信以为真，想派使臣到契丹接受这一和好要求，把筑好的九城还给东蕃，此举实在不太妥当。”从这一点看来，可知完颜部女真曾派使臣史显请求双方讲和。

这年4月30日，女真又派史显到高丽，要求双方媾和。

睿宗四年6月12日，尹瓘与吴延宠决心与女真军队血战，率军从定州（现在的定平）向吉州进击。这时，咸州司录俞元胥火急通报：“女真的公兄、要弗和史显等来到我们的城门口说道：‘太师乌稚束让我们向兵马使（尹瓘）提出与高丽媾和建议。然而，现在战斗进行得太激烈，我们不敢进入高丽的关门。所以，请高丽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好向你们传述太师乌稚束提议的内容。我们特地前来告知此事。’尹瓘得知后，派兵马记事李管仲到女真兵营，对女真的头头吴舍说道：“我朝兵马使（尹瓘）不负责媾和之事。想媾和，应当赶快派使臣去天庭向圣上提出。”

于是，女真军队又派史显等到咸州，说道：“现在，双方打得很激烈，我们进不了高丽的关门。只要高丽有官吏作为人质被完颜部女真扣留，我们立即派媾和使节到高丽京城。”尹瓘得知这种情况后，考虑到吴延宠的部队已被女真斡塞的部队击溃，吉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州和公险岭又已沦陷，自己的北进战略也被麾下的将军们攻讦为无谋，在这种不妙的情況下，既然女真派人前来要求讲和，何不顺势推舟予以同意？于是，他让孔沃、李管仲和吴贤等作为人质到女真军营。女真讲和使节要弗等人也于这个月26日来到高丽。双方就讲和之事，开始进行协商。^①

女真顽强对抗以确保曷懒甸地区的同时，之所以积极参加媾和的协商，是因为曷懒甸地区对于他们的兴起至关重要，这一地区又是它与高丽的缓冲地带。加之它怕这场战争持续太久，会给契丹出兵侵略女真提供借口，便急于求和。

女真讲和使节要弗等6人到达高丽，于27日提出讲和的前提：把九城还给女真，使女真人得以安居乐业。女真的使节说：“女真向天盟誓：世世代代恭恭敬敬向高丽朝贡，从此之后连一片瓦砾也不会扔到高丽的土地上。”^②

睿宗接到这样的媾和提案后，于7月2日召集文武三品以上的大臣于宣政殿，就女真的媾和方案听取群臣的看法。结果，群臣一致同意将九城归还女真。

睿宗决定撤出九城，于7月3日当着女真讲和使节要弗等人的面，答应把九城还给女真。就这样，高丽只占有了九城600多天，到头来还是“完璧归赵”。

^① 参阅《高丽史》卷95，列传9，尹瓘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卷13，睿宗4年6月丙申，7月乙巳、丙午、辛酉。6月23日，睿宗预计女真会提出其媾和方案，曾就将九城归还女真一事征求文武百官的意见。当时，只有礼部郎中朴升中与户部郎中韩相表示反对。到了6月28日，所有的文武百官均表示赞成。参阅《高丽史》卷96，列传9，金仁存传。参阅朝鲜史学会著《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137页。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卷13，睿宗4年6月丙申。参阅李迺扬著《韩国通史》（一）第80页，该书为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4辑，由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于1956年。

从7月18日起，高丽的人马开始撤离九城。行营兵马别监崔弘正对女真酋长居燹伊等说：“你们要想收回九城，得遵照以前的约定，对天盟誓以表心迹！”这些酋长们在咸州城门外筑坛，上告苍天曰：“从今以后，直至九父之代，决无坏心歹意，永远向高丽朝贡。倘有变心之日，蕃土必遭天灭。”^①

于是，高丽接受了女真的对天盟誓，开始撤出吉州。高丽把堆放在九城的兵器、物资和粮食运回内地。19日，高丽的人马撤离崇宁和通泰二镇。20日，撤离英州、福州二州和真阳城。22日，撤离咸州、雄州二州和宣化城。撤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两年里，高丽在那一带所筑的城郭有：咸州、英州、福州、雄州、吉州、公险岭、宜州、通泰镇和平戎城等，而所归还女真的城郭则为：宜州、公险岭、真阳镇、崇宁镇和宣化镇等。也就是说，修筑了12座城郭，还给了女真9座。^②

高丽的人马撤离九城之后，女真依照其盟誓高丽朝贡。8月27日，女真史显等到高丽朝贡。直至睿宗十年，完颜部女真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卷13，睿宗4年7月丙午。参阅李树田著《光绪丁未延吉边务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参阅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译《间岛的领事权问题》第41页，该书出版于1990年。

^② 参阅池内宏著《完颜氏的曷懒甸经略与尹瓘的九城之役》，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21年的《满鲜地理历史报告》第9期，见其第227页与228页。关于公险岭和吉州城的归还，池内宏说，是因为吴延宠的军队被斡塞率领的军队打败后，吉州和公险岭已沦陷，落入女真之手。参阅金九镇著《尹瓘九城的范围》，此文刊载在高丽大学史学会出版的《史丛》第21期、22期，见其第214页。金九镇认为公险岭镇与吉州并未归还女真。因为从史料的记载看来，1111年，亦即睿宗6年，高丽曾经又在这里筑造了山城。

显赫人物阿骨打建立金，国自称皇帝，女真在此前后确实实遵守了其盟誓。

二、追究尹瓘的败北责任

九城归还女真之后，神骑军于8月1日回到开京。睿宗在重光西楼慰抚他们，对他们说：“东界战役之败，败在将帅的失误。你们劳苦功高，朕永志不忘。”睿宗把战败之咎归于将帅，耐人寻味。

这年11月，李载和谏议大夫金缘以及御史大夫崔继芳在御前会议上，建议追究尹瓘、吴延宠和林彦战败的责任，对他们治罪。25天之后，宰相崔弘嗣和任懿等在轮德殿上，与大臣们一起，再一次请求睿宗追究尹瓘等败北的罪责。睿宗置若罔闻，步入内殿。崔弘嗣等跟至重光殿，继续提出这一请求，直至日落西山。然而，睿宗还是未予答应。结果，宰相与大臣们回府，一连几十天未上朝，朝廷变得空空荡荡。睿宗只好派近侍说服群臣上朝。宰相等上朝后，受到了人们的非议。^①

很显然，重臣们所提出的关于处罚尹瓘等的建议是很强硬的，而且得到了国民的有力支持。

从重臣们多次提出追究尹瓘和吴延宠等败北的罪责这件事看来，可知尹瓘等所犯的误差是明显的。尹瓘等对完颜部女真的势力和规模等所作的判断不正确，因而所采取的对策也就不慎重不恰当。结果，徒自劳民伤财损失很大。尹瓘等确实难辞其咎。然而，睿宗并未接受重臣们的这一建议。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卷13，睿宗4年8月甲戌，11月癸卯，戊辰。《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4年8月、11月。

当时，契丹对于高丽睿宗征伐曷懒甸与筑造九城，未做任何干预，也未予过问。1109年（睿宗四年）12月，睿宗曾派都官郎中李国琼为特使到契丹，通报了高丽将业已占领并加以治理的九城归还女真之事。1110年1月，辽国派卫尉卿李逢辰到高丽祝贺睿宗的诞辰，同时，交给睿宗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写道：“卿（指睿宗）出动人马前去征伐，严守职责扫荡敌人，是有功劳的。利用征伐的机会，接受敌人的投降，得以开拓疆土筑城设垒，也是恰当之举。”很明显，辽国同意高丽征伐女真，设置九城和把占领区据为领土。

然而，27天后，高丽使臣李国琼从契丹归国时，所捎回的契丹王诏书却指出：“卿出动人马讨伐东北面的女真，修筑城郭阻遏他们的侵略，而且注重于修营，却因他们要求友好而撤离这些城郭，至情至理。”^①

辽国对此所持的态度至此已昭然若揭：高丽出动人马征伐女真，把征服之处收为领土，辽国认为这种举措无可挑剔。至于高丽后来撤离这些城郭，辽国也认为这样处置，善莫大焉。

三、九城的范围

睿宗出动兵力征伐女真，在其处筑造了九城，然后又曾动员南部百姓迁徙于这些城郭，以之为高丽的领土。关于这一地区的范围，学者们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咸关岭以南的咸兴平野说。

第二，吉州乃至磨云岭以南和定平以北说。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卷13，睿宗4年12月戊戌及5年正月壬寅。《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4年12月及5年正月。

第八章 睿宗筑九城及其领土政策

第三，图们江以南定平以北咸镜道一带说。^①

第一种咸关岭以南的咸兴平野说，是池内宏作了实地踏查与考证之后提出的看法。他漠视有关的史料，把实实在在的地名硬是挪用于他处，从而故意缩小了其范围。

第二种吉州乃至磨云岭以南和定平以北之说，是丁若镛提出的。他对有关的史料作了批判，而自己所作的考证却缺少说服力。

第三种图们江以南定平以北的咸镜道一带之说，是《高丽史》编纂者们的说法，也是学者方东仁和金九镇的观点。

以上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时至今日，已确实难以定夺。看来，有待今后作深入的研究。然而，我谨提出如下几点，认为其范围当时已延及图们江以北地区：

第一，曷懒甸究竟是哪个地区？中国台湾出版于1962年的《中国古地名大辞典》这样写道：“曷懒路是金国设置的，亦称哈懒路。《清一统志》将其易名为海兰路。它在珲春东南面……是今天咸镜北道的镜城。北起图们江，南至高丽的定州，当年均属其管辖。”

第二，《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二的疆域条记载道：“元朝的海兰府、明朝的海兰卫和金朝的海兰路，均似是一个地方。现在，从宁古塔到图们江的朝鲜边界为六百里，其南面与北面均有海兰河……看来，这里似是当年海兰路一带的境界。”

第三，林彦所著的《宁州南厅壁记》^②记载道：“其地三百里，东至大海，西北面有盖马山，南面与长州、定州二州相邻

^① 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韩国史·高丽》4，第316页，该书出版于1984年。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134页到13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95，列传9，尹穰传。《东文选》卷44。

……”。这里所说的“其地三百里”，是个问题。其地应从伊位界算起。伊位界，是现在的吉州。这样一来，其地包括咸镜道和吉林东部。

第四，兵马副使朴景绰当年在上呈尹瓘的报告中写道：“再深入敌境设置城池，即使现在易于治理，以后也恐难把守。”兵马使金汉忠则在其报告中写道：“外城未战，内城如不完备，今后如何保护百姓？”这两份报告中所说的“深入敌境”与“外城”，均在伊位界（现在的吉州）以北。

第五，《金史》斜卯阿里传写道：“高丽军队第一次侵入曷懒甸，被浑坦（女真的将军）父子在木里门甸击退。浑坦和石适欢曾在徒门水与高丽军交战。”木里门甸是钟城，徒门水则是图们江。

第六，《高丽史》卷九十五，列传九之“尹瓘传”写道：高丽军北进，完颜部女真加以反击之时，尹瓘曾向睿宗奏报：“我军兵力损失甚众。由于业已开拓的地区辽阔，九城相去遥远。”从这一记载看来，九城的规模决不像池内宏所说的那样只相当于一个郡。

第七，《世宗实录》地理志之咸吉道庆源都护府条记载道：巨阳城系当年睿宗出兵征伐曷懒甸时由尹瓘命人所筑造。这座巨阳城，现在属于庆源管辖。由此可知，当时曾进出于图们江。

以上的记载看来，睿宗发兵北伐时所进击的范围与筑城的地区，不是只局限于咸镜道咸兴郡及与之毗邻的新兴郡的一部分和兴源郡的一部分，不是只囿于那么狭窄的地区，而是包括图们江对岸在内的广袤地区。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 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第一节 金、辽战争与高丽拥有保州

尹瓘率领高丽军队攻打女真，在曷懒甸（咸兴地区与间岛地区）设置了九城，后来又将这九城归还给了女真。四年后，亦即1113年（睿宗八年），完颜部酋长乌雅束去世，其弟阿骨打继兄成为完颜酋长。

阿骨打兴起于按出虎河畔。^①他在完全控制了女真各个部族之后，于翌年趁契丹的势力变得衰弱之机，起兵征伐契丹。

阿骨打和女真军队都想摆脱契丹的羁绊，实现女真的独立，其意志可谓相当坚定。唯其如此，它从战争一打响，就长驱直入打败了契丹的军队。阿骨打的军队首先在宁江州^②击溃了契丹军萧兀纳的抵抗，然后渡过混同江（现在的松花江），在出河店

^① 这条河流，是从今哈尔滨的东面分流而流入松花江的阿勒楚喀河，又称阿什河。明代的金水河也与按出虎水是同样的意思。所谓按出虎，就是女真语的“金”的意思。参阅《金史》卷24，地理志。《金史》载为阿求游、按出游、安求虎、案出许等。参阅《水道提纲》卷25。

^②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0年正月。《高丽史节要》卷14，睿宗10年正月。参阅《辽史》卷89，萧兀纳传。参阅松井等著《金国在满洲的疆域》之上京路会宁府条，该文刊载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于1913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3篇，见其第164页。

(现在原珠赫城，在伯都纳的东南面)又大胜契丹的军队。

1115年(睿宗十年，辽天庆五年)1月，阿骨打摆脱了契丹的统治建国，自称皇帝，定都于会宁(现在的哈尔滨东南面)，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

契丹在屡战屡败之后，曾一再要求高丽出兵援助，一边等候高丽援军，一边抗御金军。高丽虽然一向与契丹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内心却一直把契丹视为夷狄，对之始终保持警戒心。加上已经与之经历过三次悲惨的战争，又围绕保州的归属问题仍在争执不休，对契丹的积怨已经相当之深，怎会同情其陷于困境甚至派出援军呢？当时，高丽看到金国的势力日益强大，自然不会随意倒向契丹或金国，而是采取了袖手旁观观望战争发展趋势的态度。

这年1月，高丽为了答谢契丹派来横宣使，特地派尚书李焘和侍郎黄君裳去契丹。4月，契丹王道宗趁他们归国之机，让他们带去一封外交文书给高丽睿宗，诏书中写道：“近以边臣驰备，小寇扰民，方行有罪之诛，是议偏师之举……适当春事，有虑农妨，姑务练修，别期进取。”^①

8月，契丹又派使臣到高丽，通知高丽辽将伐女真，请高丽派兵助战。^②睿宗当即召集大臣，商议为契丹出援兵之事。大部分重臣考虑到高丽正在向契丹派出生辰使、落起复使和横宣使等使节，丽、辽的友谊不宜有所损害，而主张派援兵援助契丹，只有拓俊京、韩冲、金富弼、闵修和金富侁(金富弼四兄弟为：富弼、富侁、富弼、富仪)对此表示反对。“辽将伐女真，遣使来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0年4月壬寅。《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0年4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0年8月庚子。《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0年8月。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请兵。王会群臣议，皆以为可。富侂与弟富弼……等言：国家自丁亥、戊子兵乱（指1107年至1108年，亦即睿宗七年至八年，尹瓘与吴延宠率领17万大军赴东北边界征伐女真，并筑起九城）之后，军民仅得息肩。今为他国出师，是自生衅端，其利害恐难测也。”^①

当时，从两面夹攻金国军队的契丹军队被打得大败，不仅宾州沦陷，连要冲之地咸州也被金军占领。高丽见此局势，实在无法出兵援助契丹

这年11月，契丹天祚帝为挽回败势，出动了70万大军，自己亲至松花江下游的弛门督战，想借助高丽的一臂之力，合力攻打金军。于是，契丹派利州管内观察使耶律义和大理少卿孙良谋到高丽，送去督促高丽出兵的国书。此诏云：“昨以女真不恭，王归问罪。……况尔兵戎，早经点阅，便可即时而先出，毋或相应以后时，仍伤使人，就观进发，勉图忠效，唯在敬从。仍赐缎匹诸物。”^②

耶律义等到高丽请发援军，呆了几天不见动静。第6天，亦即11月25日，耶律义进便殿（阁门）劝睿宗快快出兵。睿宗当时又曾听取重臣们的意见，重臣们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契丹使臣耶律义见情况不妙，当即告退，于次日离开了高丽。

当时，契丹要求高丽出兵的具体部署是：高丽军队攻打金国的东南面，契丹天祚帝自己则率军从西北面的长寿路进击，两面夹攻金军，给予金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显示契丹的威势。然而，就在契丹耶律义等急不可耐地督促高丽出兵的前一天，亦即

^① 参阅《高丽史》卷97，列传10，金富侂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0年11月甲申。《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0年11月。

11月24日，高丽北路兵马使向契丹作了这样的通报：“高丽派往契丹的生辰使、落起复使和横宣使等三位使臣，由于无法进入契丹之境，只得带着外交文书归国。”

高丽此时之所以不肯毅然出兵援助契丹，是因为8月间契丹要求高丽出兵时，金富佺等以国内尚有难处而加以反对，而且言之有理。再者，当时契丹国内动荡不安，契丹军队屡战屡败的情报，也不断地由地方官吏、来往的使臣和边境的百姓提供给高丽朝廷，高丽自然不能不慎重行事。不仅如此，1116年（睿宗十一年，辽天庆六年，金收国二年），辽国东京的渤海人起来造反，杀死留守萧保克，供奉官高永昌则趁机自称皇帝，定国号为大元，年号则定为隆基。辽国本身乱成了这个样子，高丽不得不静观局势的发展，以确定其方略与打算。

金军长驱直入，侵入契丹的领土，一连拿下契丹数座城郭。只有来远城（这是契丹为切断女真向宋朝朝贡的通道而在鸭绿江心岛上筑造的城郭）和抱州城（也就是保州。在鸭绿江东面，契丹筑起此城后，高丽曾多次要求契丹撤出该城）依然在固守，拒绝向金军投降。此城被困，孤立无援，粮食接济不上。城中的契丹军无计可施，便收集各种物质，向高丽边界官员提出愿意廉价将这些物品与高丽交换粮食。然而，高丽官员不仅断然予以拒绝，而且禁止百姓与契丹军进行物物交换，严禁粮食外流。翰林学士金黄元得知此事后，向睿宗奏道：“幸灾乐祸，非仁；以邻为壑，不义。请允卖粮食给其二城，允百姓与之买卖。”睿宗始终想把保州城收回，未接受这一建议。

1116年（睿宗十一年，辽天庆六年，金收国二年）3月，金军占领契丹的要塞之后，集中兵力围攻久攻不下的来远城与把州城（即义州、保州），二城断绝了粮食。高丽睿宗听说辽国来远、抱州二城为女真所攻，城中食尽，派人送去一千石，而来远统军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坚持不受。^① 契丹军队的指挥官之所以在高丽的都兵马录事邵亿奉命送来一千石大米时不予接受，一是对高丽反对交换粮食余怒未息，二是已不想继续固守二城。

当时，契丹遭到金军的巨大打击，已陷入危亡的境地。金国阿骨打于这年4月派阿只到高丽，说明金国日益强盛和契丹每况愈下越来越衰弱的情况。次日，高丽总管国家行政事务的中书门下省向睿宗奏道：“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宗主国）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年号，但用甲子从之。”^② 睿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断绝了与契丹的特殊关系。

事态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来远城与抱州城的百姓再也住不下去，有几百人赶着羊与马前来投化高丽。次日，又有20多名百姓赶着200多只羊投化高丽。

东方的局势发生了突变，高丽睿宗便于7月召集各位大臣和给仕中丞（从四品）以上的官吏议事，亲自传述了有关北方的情报，从而制订了有关来远城与抱州城的对策。8月间，金国将军撒喝率军攻打契丹管辖的来远城与抱州城。就在二城行将陷落，契丹指挥官耶律宁想率军逃走之时，高丽睿宗派枢密院知奏事韩嫩如说服耶律宁到高丽。耶律宁以高丽国王未下手谕而不想到高丽。韩嫩如将这种情况奏报睿宗，睿宗当即想令枢密院具公文送之。群臣奏曰：“彼求王旨，其意难测请止之。”睿宗乃遣使到金国，请曰：“抱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金主对使者说：“尔其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1年3月乙未。《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1年3月。

^②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1年4月。

自取之!”^①

高丽认为抱州是其国土，要金国允许其收回，金国太祖之所以毅然答曰“尔其自取之”，是因为当时金国正在尽全力征伐契丹军队，避免与高丽发生冲突。当时，金军想征服辽东，为金国打好建国基础，而劲敌契丹军队正集结于辽河西岸意欲反攻，局势很有可能发生逆转。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太祖生怕高丽出兵袭击抱州，使金军受到两面夹攻，进而变得十分被动，故而慷慨地答应了高丽的要求，以“尔其自取之”敷衍了事。

金国太祖在对高丽使臣作了上述答复之后，随即向攻打来远与抱州的指挥官撒改和乌蠢等发出这样的命令：高丽如来攻打保州，让胡刺古与石显对付他们。如果无法机动行事，要牢牢守住边防。金太祖当时的打算是，根据高丽对金国采取的态度而最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1年8月庚辰：“金将撒喝攻来远、抱州二城，几陷。其统军耶律宁欲帅众而逃。王遣枢密院知事韩徽如诏谕，宁外无王旨，辞。徽如驰奏。王欲令枢密院具劄子送之。宰臣谏官奏曰：‘彼求王旨，其意难测。请止之。’王乃遣使如金，请曰：‘抱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金主请使者曰：‘尔自取之。’”《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1年8月。参阅《金史》本纪2及《金史》高丽传收国2年闰正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求保州，诏自取之。”所记述的是1116年1月的事实。《金史》有年代的记事内容，有错漏之处：(1)若这一事实发生在同年正月，那么高丽就是在金军攻打保州之前，就提出了归还保州的要求。(2)同年3月，金军攻打抱州、来远之时，高丽曾让邵亿援助契丹军队一千石大米。其实这也未把时间记述清楚。与《金史》相比，《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记载为8月，才是正确的。学者三上次男在其《完颜阿骨打的侵略与金国的建立》(见《金代女真研究》第10章“保州、开州的攻占”2，第353页)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认为《高丽史》的记载是正确的，确在8月。然其发表于1939年的《金初丽、金关系》(刊载在历史学研究会出版的《历史学研究》第9卷第7期，第381页至382页注6)一文中却又说应是在《金史》所记载的正月。他对此解释为何前后矛盾，我们不得而知。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406页和第407页注1，也认为发生在正月，其理由是《高丽史》的月次是错误的。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做出抱州是否归于高丽的决定。

金军之所以先是急于攻打鸭绿江来远与抱州二城，而后又允许高丽占领抱州，是想切断高丽与辽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尽一切可能不伤害高丽的感情，使高丽转而亲金，进而使高丽与金国结盟，达到双方夹攻契丹，彻底打败契丹军队的目的。

这时，契丹军指挥官命人捎信向高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去年，我们因生女真（亦即金国）侵扰和高永昌在东京造反僭称皇帝而未能备足粮食。现在，官府虽有粮食，军人不愁无粮，但百姓家无存粮，只好向你处暂借大米5万石，待明年秋收之后一定归还。”高丽睿宗当即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结果，睿宗让判兵马使金缘向契丹指挥官通报：“倘若将二城的高丽人和物品还给高丽，便可借给粮食。”经过几次交涉，契丹指挥官未将二城的人与物交还高丽。

这时，金军攻占契丹的开州（亦即凤凰城），又去袭击来远城与大夫、乞打、柳白三大军营，烧毁了契丹的全部战舰，活捉了契丹的守船者。于是，契丹指挥官耶律宁与来远城史常孝孙等率领其官员，乘坐140只船，来到江边投书于义州地区的宁德城，书中写道：“女真背叛，东京渤海人亦接着背叛，以致道路不通，城外粮食无法收割，不少人缺粮，甚至无米可食。他们居住在高丽国近处，我们为之向高丽国借粮却未能如愿。于是，城内百姓只好去后方州城求粮，以致现在才回来与高丽归于和好。我们已把土地分交给此州的幸存者而离开这里。你们之间好生交接，今后任由你们按王命行事。”他们把来远、抱州二城还给高

丽，兀自经由海上逃之夭夭。^①

常孝孙唯恐百姓难以幸存而率领州民乘船逃跑，把来远、抱州二城还给高丽。高丽将军金仁存随即派将士占领了二城，得到不少武器与物资。判兵马使金缘当即上奏折禀报高丽朝廷。睿宗闻讯大喜，将抱州更名为义州，设置防御使，以鸭绿江为境界。这样一来，来远城与抱州（又称保州）完全成为高丽的领土。^②

第二节 高丽的亲宋外交

高丽在契丹得势时采取对辽亲近政策，金国强大起来后，又不得不违心地与之友好。然而，高丽还是仰慕宋朝的文化，一直在暗地里与宋朝保持交往。

1109年（睿宗四年，宋徽宗大观三年，辽乾统九年）6月，高丽派往宋朝的使臣金商佑、韩讷如和慎安之等归国时，捎回了宋朝的外交文书。宋徽宗在这份诏书中写道：“卿治国有方，对宋谨遵问候之礼，事大之诚意溢于言表。相信卿今后也会忠诚如昔，始终不渝。”这份诏书还附有给高丽睿宗的起居表、告奏表、祝圣寿表和国信，之外还有太后起居表、告奏太后表和祝太后寿

① 参阅《高丽史》卷96，列传9，金仁存传：“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马使，措置军务。契丹来远城刺史常孝孙惧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来远抱州二城归于我。仁存遣兵据其城，收兵仗物货甚多，遂拓地界鸭绿江焉。”参阅《高丽史》125，列传38，奸臣1，崔弘宰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141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2年3月辛卯：“我兵入其城，收兵仗及钱货宝物甚多。金缘具状驰奏。王大悦，改抱州为义州，置防御使，以鸭绿江为界，置关防。”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表等等。

宋朝国力过于文弱，始终强大不起来，常受契丹与金国的侵扰，在政治与军事上无法帮助高丽，在精神上仍把高丽视为后方和友好国家。高丽对于宋朝的这种态度毫无反感。

1110年1月，宋朝派兵部尚书王襄和中书舍人张邦昌到高丽，分别捎来了徽宗的诏书与密谕。诏书对高丽一如既往派使臣越海朝贡表示谢意，让使臣带去衣带、绸缎、金银器皿、弓矢和鞍马等作为答谢。而徽宗的密谕则极其重要，所写的是：“听说高丽王已受到北朝（契丹）的册封，又知高丽与南北两朝（宋朝和契丹）保持友好又逾百年，真是义如兄弟，宋朝也就不拟对高丽王进行册封。宋朝对高丽已无权可言，仍以真王（独立国家）之礼对待高丽国王。”此密谕系宋徽宗亲笔所写，而契丹皇帝则从来未写过亲笔手谕给高丽国王，高丽文宗与肃宗等也未曾受到过宋朝这样的礼遇。这一密谕提到了这些，因而非同寻常。

高丽睿宗在宋朝使臣于翌月归国之时，让他们捎去了回信。睿宗在回信里感谢宋徽宗格外关心他和亲笔写信给他，同时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小国服怀于大国，况详敕墨，兼奉谕音。垌于臣衙直去权字。所谓册立之命，正朔之颁，已曾禀受于大辽，不欲别行于上国。以示酌中之义，致宽顾北之忧，睿眷稠重。”

睿宗还对宋徽宗的密谕作了这样的答复：“崇宁（1102—1106年）中，国信使刘侍郎（刘远）、吴给事（吴拭）奉圣旨咨闻行册礼事，先考（肃宗）以当国地接大辽，久已禀行爵命正朔，所以未敢遵承上命，以实恳辞，举国惶恐未之暂安。今闻国信，尚书舍人所传密谕……皇帝无不鉴照，常欲优加异恩……已

去权字……即是宠国。王以真王之礼，拜命之始。……”^①

当时，由于高丽已接受了契丹的册封，宋朝便未对高丽国王再进行册封，而把高丽视为独立的国家，予以真王（独立国家）的待遇。高丽睿宗对宋朝的这种宽容大度深表感谢。

1115年（睿宗十年，宋政和五年）7月，睿宗派吏部尚书王字之和户部侍郎文公美到宋朝，对宋徽宗表明了其心意：“高丽很早就钦慕中华文化，从开宝至神宗年间（968～975年）常想派使臣与学子去天朝学习中华文化，却不幸中断了一段时间，中华文化的输入也就因而减少了大半。”睿宗请求宋朝接受高丽选派的金端、甄惟底、赵爽、姜就正、权适等五名进士到国子监留学。

翌年6月，王字之等从宋朝回到高丽，向睿宗转达了宋徽宗对高丽恭顺事宋的赞许，并说宋徽宗已准许金端等五人到宋朝的国子监留学深造。

过了三年，即1117年5月，高丽使臣李资谦从宋朝回国时，金端等三人学成之后与之一同归国。他们都参加过宋朝的科举考试，而且全都中榜。而姜就正与甄惟底则已在宋朝过早去世，未能与其余三人一起归国。

1118年（睿宗十三年，宋重和元年）7月，高丽因国王与世子患大脉疮肿而请求宋朝派三四名名医去高丽。宋朝当即派了秉义郎阎门底候曹谊和医生杨宗立、杜舜举等七人到高丽。当时，宋朝有感于高丽一直不懈怠于朝贡，特派名医为高丽国王、世子及百姓治病造福。高丽还曾派郑克永和李之美等到宋朝，对权适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5年7月戊戌。参阅《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5年7月。《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崔弘宰传。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141页。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等留学生在宋朝得以深造和研究表示感谢，虔诚地期望永远保持与宋朝的友好交往。^①

第三节 金国事大要求与高丽断然拒绝

金国对高丽拥有保州表示默认。在此之后，高丽与金国的关系，有一个阶段曾经相安无事。

金国在占领辽东地区之后，用了两年的时间，一方面攻占北面的长寿州，另一方面打败了契丹将军耶律宁指挥的驻屯于辽西的大军，从而使金国的根基大大巩固。

在这以后，金国注重于国内的整顿、民众休养生息和军队的休整训练，在对外方面未引起过任何事端。

金国的对外和平政策也适用于高丽。金国当时想加强与高丽的友好往来。1117年3月，金国派阿只等5人到高丽，以国书提议与高丽建立特殊的关系。金主阿骨打的这封国书写道：“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轶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拒之。蒙天之佑，获殄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3年7月戊寅、辛巳、甲申，8月戊午。《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3年7月、8月。《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2年3月。

灭之。唯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①

金主阿骨打的这封国书，说明了金国攻契丹的来龙去脉，提到金国曾奉高丽为“父母之邦”。而今金国强盛起来了，竟与高丽称兄道弟，自己称兄而以高丽为弟。金主阿骨打在国书一开头就大言不惭地写上“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这种傲慢无理是有悖于道义的。阿骨打还自称皇帝，却以睿宗为王，以上与下的概念故意刺激高丽。截至当时为止，高丽视女真族和其他蕃族为蛮族，本着宗主国的立场对之恩威并施赏罚兼用，甚至给予封官晋爵。而今金国竟敢如此无理公然藐视高丽，高丽怎能不感到万分愤慨！

睿宗收到这封国书，便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大臣们一听，无不气愤，有的大臣不仅坚决反对金国这种假惺惺的提议，而且主张把金国特使斩首示众。这时，金富弼的弟弟金富仪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依臣看来，历史上汉朝对匈奴，唐朝对突厥，都曾或者俯首称臣，或者以公主和亲，不计一时的屈辱。而今，宋朝与契丹也是以伯叔、兄弟相比，代代友好相互往来。……暂时屈服于夷狄，亦即圣人所谓的以权驭道，对于保存国家不失为一种良策。成宗捍卫边防失策，致遭契丹入侵，此乃前车之鉴。但愿为长期的安宁着想，保存国脉而无后悔之虞。”大臣们一听，都嗤之以鼻，认为纯系胡说。睿宗也就未予接受。

在《高丽史》年表中，曾记载此时金国曾遣使持表与高丽媾和。这不过是金国一厢情愿把金国与高丽关系定格为兄弟关系，向高丽提议“以成世世无穷之好”而使高丽愤怒的一种手法。然而当时金国日益强大，契丹日趋衰弱，高丽无法与契丹结盟携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2年3月癸丑。《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2年3月。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去征伐金国，无法共同抗金。

1119年2月，“金主遣使来聘，致书曰：‘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孛木报谕。’”^① 金主阿骨打此时已不可一世，将这封书信所要通知的事说成是诏谕，好比是皇帝对诸侯和臣子下令一般。历史上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而阿骨打也自称朕，高丽在其心目中似乎已是其附属国。

这年8月，高丽派中书主事曹舜举作为特使去金国，带去了一封回信。高丽的这封回信，对金国的傲慢无理作了一针见血的揶揄。回信指出：“金国的根源乃是高丽。”金主阿骨打一看，未予接受，退回高丽朝廷。

这封回信所说的高丽是金国之根源，《高丽史》已作了富有说服力的阐明。《高丽史》在叙述金国的风俗之后，认为与匈奴完全一样。《高丽史》叙述了金国的领域及向高丽朝贡的历史，然后写道：“或谓古代我国平州（现在的平山）和尚令俊逃到女真，居住在阿只古村，有学者说他成为金国先祖。或谓平州和尚金幸子克守，起初娶阿只古村女子为妻，生下儿子古乙太师，古乙太师与其妻生下活罗太师，活罗太师有子数人，长子是该里钵，盈歌就是该里钵。在活罗太师诸子之中，盈歌堪称出类拔萃，深受部族人们爱戴。盈歌去世后，其长子乌雅束继位。乌雅束一死，其弟阿骨打继位。”当然，这一事实有待进一步求证，而正史已把它作为一种说法记载了下来。当时，民间一般都认为金国始祖是高丽人的后裔。

这封回信说，辽东本是高句丽故土，高丽继承高句丽而立国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14年2月丁酉。《高丽史节要》卷8，睿宗14年2月。

之后，自太祖以来一直视高句丽故土为高丽国土，一直奉行旨在收复高句丽故土北方政策。

这封回信既说明金国始祖是高丽人的后裔，又指出金国占领的领土乃是高丽土地。金太祖一阅，自然不予接受。实际上，截至当时为止，女真一直以高丽为父母之邦。1109年（睿宗四年）6月，东女真的使节要弗和史显等到高丽，哀求归还睿宗派兵北伐而筑造的九城时，也曾说过：“昔我太师盈歌尝言：我祖宗出自大邦（高丽）……今太师乌雅束亦以大邦为父母之国。”^①不仅如此，金太祖建议两国成为兄弟之国时，也说过：“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金太祖阿骨打之所以不接受睿宗的国书，是因为高丽与金国在外交上有着尚未解决的悬案。

作为高丽来说，哪怕金国当时已变得那么强大，俨然成为一股新兴势力，而在其心目中，金国总像是其子女一般。再者，高丽始终认为蕃族是蛮族，素来鄙视。而金国用武力赶走契丹势力，以辽东广袤地区为基础建成大帝国之后，已摆脱了以往惯例的束缚，构建了新的国际秩序，一心只想君临于高丽头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立场，后来便成了两国在外交方面的巨大绊脚石。

此后在金太祖在位期间，高丽与金国再未有过使臣往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萌芽。

这年11月，高丽重筑从长州到定州再到元兴镇的千里长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4年6月庚子。《高丽史节要》卷7，睿宗4年6月。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城，^①城墙高达三尺以上。这是高丽为防止金国从东北面入侵而采取的未雨绸缪的措施。金国派习显到高丽，要求停建这一工程。高丽置之不理，声称“只是补修原有的城墙”，照样修筑不误。这样一来，两国之间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只因金国自重自律，而未使事态扩大。

1120年（睿宗十五年，金太祖天辅四年），金国的咸州都统司以兵分屯于保州、毕里围二城，请增民。金太祖未予同意，却下诏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②

这样一来，高丽与金国之间有关东北面曷懒甸的划界和西北面保州问题，重起纠纷。

高丽与金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睿宗末年为止，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在此期间，金国的国力渐臻强大。1121年（睿宗十六年，金天辅五年）底，金国与宋朝结盟，大举征伐契丹。金军从泰州口攻打契丹，一路上势如破竹，并占领了契丹的上京、中京二道。金军乘胜追击逃亡中的契丹王，占领了契丹的西京道。翌年3月，金军占领契丹的西京。率军亲征的金太祖，挥军进入了契丹的燕京。契丹天祚帝逃往西夏，金军紧接着又乘胜追击。

当时，高丽睿宗已寿终正寝，仁宗已即位。金国太祖撒手人寰之后，继位的是太宗。金太宗命人把金国上述战果通报给高丽仁宗。《金史》对此的记载是：“复以辽帝亡入夏国报之。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高

^① 参阅卢启铉著《高丽睿宗的九城构筑与领土处理》，该文刊载在大韩国际法学会出版于1989年的《国际法学会论丛》34-1，见其第68页到69页。

^② 参阅《金史》卷135，高丽传。毕里围在何处，不很明确，似是在义州地区。

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亲丧，辽主未获。”^①

翌年5月，高丽与金国的海军终于在高丽东海岸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金国有两艘船到高丽的近海捕海狗和海冬青等。高丽海军发现后，当即出动14艘舰艇截住它们，处死了全部船员，缴获其全部武器。这也是高丽对日益嚣张的金国的一种惩罚和对之持强硬态度的表露。对此，金太宗认为仅仅因这种小小事件而大动干戈不值得，便对其军队下令：今后如无命令，不许与高丽军队发生冲突。这一事件，也就算告一段落。

当时，高丽对金国的态度很强硬，而金国也还不具备征服高丽的武力。然而，却有一份虚假的谎报险些使两国之间的关系一下子趋于紧张。

1123年（仁宗元年，金天会元年）6月，东南海道部署使朴景麟向高丽朝廷报告：金国有30艘兵船入侵高丽。高丽朝廷命令杨齐宝率海军抗御。杨齐宝搜索至庆州，未见到有任何金国兵船入侵的迹象。后来才知是朴景麟的谎报。从此事可窥当时高丽对金国的态度是多么强硬。

自睿宗十一年以来，只要有女真人前来归化，高丽便全部接受，或为之安排谋生之处，或赐给一定的官职。其中有技艺者，必妥善用之，进行将掖。于是，前来投化的女真人有几万名之多。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技艺，他们被安置在开城，得以充分发挥其特长。

高丽这样接受女真人的归化，金国不是将其视为百姓平常的迁徙，竟然认为这是严重问题。1123年7月，金国同知南路都统鹞实答在巡察辽阳府一带之后，向金国朝廷汇报了高丽接受背叛金国逃亡者且加强国境警备的情况，强调高丽此举旨在攻打金

^① 参阅《金史》卷135，高丽传。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国。于是，金国于10月让南路军帅阁毋率领1000名全副武装将士到合苏馆路孛董（合苏馆路是昔日合苏馆女真的根据地，在今辽东半岛），在海岛（指其附近海上的岛屿或长山列岛）摆起阵势，专门对付高丽的行动。

实际上，高丽在1119年（睿宗十四年）虽然增筑了长城，增强了海军，接受了来自女真的归化者，但并非想攻打金国，而是为了防备金国的侵略。对于高丽的这种态度，金国太祖之弟、继太祖之后即位的太宗于1124年（仁宗二年，金太宗天会二年）说过：“接受归化者，是高丽方面的大错。与高丽进行一切交涉，任何人不得违反常规。如果高丽军队来侵，当然应当抵抗并将其击溃。但倘若是我方先去侵犯高丽，那么，即使打了胜仗，也要受到处罚。”^①

接受金国的归化者，在高丽看来不算是什么大问题，而金国却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此事后来成两国外交上重要的悬案，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此时，金太宗考虑的是宋朝，一心只想越过万里长城入侵宋朝，一心只想同宋军作战，因而未对高丽采取积极的攻势。金太宗深知，如果与高丽的关系搞得太僵，双方变成死敌，高丽势必会与宋朝结盟，进而南北两面夹攻金国。于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结果，他便努力对高丽维持现状，使金国在关键时刻不致有后顾之忧。

^① 参阅《金史》卷3，太宗本纪，天会2年。《金史》卷135，高丽传。

第四节 宋、金密约与契丹的灭亡

宋朝屡遭契丹侵略，被占去了大量国土，尝尽了屈辱性外交的滋味。此时看到金国越来越强盛，便想借助金国的实力夹攻宿敌契丹，把契丹完全打倒，进而恢复失地。

为了与金国结盟，宋朝认为首先要借助与金国毗邻的高丽力量。于是，宋徽宗继续接近高丽，向高丽大送秋波。1116年（睿宗十一年，宋政和六年）6月，高丽使臣王字之和文公美回国时，宋朝给高丽送来了著名的大晟乐。7月，高丽派谢礼使李资谅到宋朝，宋徽宗召一行人赐御宴并作诗示之，命和之。李资谅将还，密谕曰：“闻汝国与女真接壤，后世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资谅奏曰：“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丑，不可通上国。”宋宰臣闻之曰：“女真地多产珍奇，高丽素与互市，不欲分利于我，故沮之。陛下于高丽爱之如子，今负德如此，可遣一介之使招女真，不必借高丽。”^①李资谅等诚心诚意的建议，当时被宋朝朝廷完全误解。

宋徽宗在李资谅归国时，让其带御制亲笔信给睿宗。开京安利寺落成时，其殿额也是宋徽宗亲笔所书。

宋徽宗不顾李资谅的建议，而按照其大臣们的建议，派使臣从海路去金国，建议两国结盟从南北夹攻契丹，其代价则是：宋朝每年交给契丹的岁币转交给金国，除了幽云十六州之外，契丹

^① 参阅《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11年6月乙丑、庚寅，7月己酉。参阅《高丽史》卷95，列传8，李子渊传附李资谅。参阅《高丽史概要》卷8，睿宗11年6月、7月。

第九章 金初的丽、辽关系与国际均衡的再调整

所占宋朝土地归金国。这就是宋朝与金国的密约。

1121年（睿宗十六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年底，宋朝与金国出动军队开始夹攻契丹。高丽刚刚即位的仁宗，一面观望东方的局势，一面对前来高丽曾为已故睿宗治病即将返回的两位宋朝医生说：“契丹已与宋朝结为兄弟之邦，它的存在对于宋朝是一面盾牌，而金国乃是一只猛虎，与之交往，对宋朝不利。你们回去后，把我的这种看法转告徽宗，建议他速速在这方面采取对策！”^①仁宗的这一忠言，与李资谅对宋徽宗所作的建议，同样是出自苦心的忠言。这也说明，高丽对金国丝毫不信任，不存在任何幻想。

结果，宋朝与金国的盟军从南北夹攻契丹。宋军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而金军则长驱直入攻占契丹城池，于1125年12月活捉契丹天祚帝，至此，契丹宣告灭亡。当时，契丹皇族耶律大石逃往中亚，在起儿漫（SamarKand）建立西辽国，使契丹的命脉得以续传。

宋朝借助金国的实力收回了燕京。然而，宋朝摸不清金国的底细，在统治燕京时竟起用投降的契丹官吏。金国认为这是宋朝对它的不信任，金太宗为此勃然大怒，立即撕毁与宋朝的密约，出动大军攻陷燕京，直逼宋朝的首都汴京。宋朝只好向金国投降，双方签订了叔侄盟约，亦即金国是叔父，宋朝是侄子。

^① 参阅《宋史》卷487，高丽传。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 与拥有保州

第一节 高丽改变对金政策与宋朝要求借道

金国在攻打契丹之时，尽一切可能不触动高丽。然而，在高丽以其北方政策加强防备之后，金国又要求高丽臣服。1125年（仁宗三年，金天会三年）5月，高丽派司宰少卿陈淑和尚衣奉御崔学鸾为特使到金国。金国却以高丽未呈国书又未称臣为由，不接待他们。

在这以后，金国对高丽的压力日益加大，仁宗为此于1126年（仁宗四年）3月，召集百官商讨对金国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文武官员认为金国是蛮族，对之事大万万不能。然而，李资谦和拓俊京说：“金国昔日是小国，臣服于契丹与我们。然而，时至今日，它已一下子变得相当强大，灭掉了契丹，打败了宋朝，政治上的根基已很牢固，又增强了军事力量。由于它与我国毗邻，现在的局势已逼得我们不能不对它以小事大。小国服从大国，以小事大，是先王之道。我们还是应当先派使臣前去，以礼待之。只有这样，才是上策。”仁宗觉得他们说有理，接受了这一建议。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当时，朝廷由李资谦和拓俊京掌权，他们专断独裁，诸事说了算。他们这么一夺，百官即使表示反对也无济于事。尤其是外戚李资谦，在25天之前发动了政变，将仁宗挟持到了他的府邸。他已一手遮天，谁还敢同他唱对台戏（后来，这次政变因拓俊京背信弃义而归于失败）。起初，李资谦也曾认为对金国事大不可取。然而，到了这时，他转而力主必须对金国事大。李资谦这一帮人是否与金国有所勾搭不得而知，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掌权之后看到金国的国力已很强大，如果与之对抗，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而不顾国家的体面，得出了非事大不可的结论。

于是，仁宗改变原有的北方政策，于这年4月，“遣郑应文和李侯如金称臣，上表曰：实帝王之高，致宣天地之冥扶。伏念臣脊土小邦……”^①仁宗虽然只好对金国称臣，却未使用金国的年号，一直到仁宗二十年（1142年）7月，才第一次使用金国的年号。

不久，金太宗派宣谕使同宣枢密院使高伯淑和乌至忠到高丽，以书函对仁宗作答：“已上表称臣进贡土产……以小事大，社稷安宁……兀自俯首称臣，良有自知之明。未以武力加以威胁，也无玉帛之恩动之以情，能自动前来效忠，均是诚意可掬。”

高伯淑出发到高丽时，金太宗让他转告高丽：“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②

由此看来，金国确实未曾用武力迫使高丽就范，也未加以收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4年4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4年4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144页。

^② 参阅《金史》太宗本纪，天会4年7月条。

买和引诱，而是高丽兀自乖乖称臣。所以，金太宗对此加以嘉赏。很显然，高丽的北方政策转变为对金国事大，是当时高丽执政者李资谦一伙对政局深作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

如前所述，宋朝在这时遭到金国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被迫与金国签订了叔侄盟约。然而，宋朝决心与金国决一雌雄，并于1126年（仁宗四年，宋钦宗靖康元年）7月，派侯章和归中孚等60多人到高丽，向仁宗呈上国书。国书写道：“诃料金人出兵入侵，攻陷燕京，骚扰国境，祸延京师。朕方即位，即遇此难，诛为惊之，以致无暇与高丽王议论此事。”国书在通报宋朝的危急情况之后，提出了恳切的要求：“金人者，固尝臣属于王，以丛尔海隅之丑，背天逆神，灭绝契丹，遂陵中国，淫暴滋甚……朕以其劫质肃王而去，第命将士，驱逐出境，方将起天下之兵，问罪小丑。王其率励师众，相为表里，以行天诛……”^①

然而，这时高丽已奉行对金国的事大政策，而且刚刚对金国俯首称臣，当然无法同意宋朝的这一提议。于是，高丽向宋朝使臣侯章等一行讲明了高丽的处境、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高丽的北方政策，婉拒了宋朝的提议。仁宗在让侯章转呈宋钦宗的国书中写道：本该从命兴师，怎奈小国“本非胜国，近经灾孽，焚尽畜藏。其于储待资粮，缮修器械，必也整齐而后动，固难造次而可图。况又贼势凶强，未宜轻触虜之险隘，岂易长驱？然帝命之临门，理无回避，俟王师之制敌，少助威灵……”^②

高丽突然放弃蔑视金国、钦羨宋朝的政策，婉拒宋朝的提议，实际上是在权衡国际局势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从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4年2月丁卯。《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4年2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4年7月癸未。《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4年7月。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文化上和精神上着眼，高丽当时确实是出之于无奈。所以，同年9月宋钦宗即位之时，高丽以祝贺为名，派金富弼和金周衍等到宋朝，旨在摸清宋朝对金政策、军事实力和与金国作战能否打赢的底细。

宋朝对高丽的期望本来很大，遭到高丽的婉言拒绝之后，自然也就十分失望。所以，宋朝明州御史胡舜陟甚至曾把金富弼一行视为间谍，强烈反对其入境。加上当时宋朝连汴京也已被金国占领，金富弼一行便无法完成此行的使命，只好从宋朝明州匆匆回国。

如前所述，契丹第二次入侵高丽时，高丽曾派特使向宋朝求援。当时，宋朝估计高丽必来救援，早就准备好婉拒的借口，待高丽使臣一到，果然婉拒了高丽的请求。这次高丽婉拒宋朝的提议，不能算是高丽对宋朝的报复，而是高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着眼，确实无法出兵。同时，高丽的深思熟虑是：如果不顾国家的安危，只顾报答以往的恩德就稀里糊涂卷入毫无取胜希望的战争，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事实上，就在金富弼一行不得已逗留于宋朝的明州金军闯入宋朝的京都汴京之时，高丽边防将领却将一份假报告传到高丽京都，说什么“金人兵败如山倒，宋军乘胜追击，金军没有招架之力。”郑知常和金安等为这种荒诞的小道消息所迷惑，竟然提出这样的主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出兵助宋立功，王之功勋将万世彪炳中国史册。”当时，高丽仁宗在西京，闻讯立即派近侍与金仁存协商，经过分析，金仁存认为应当保持冷静。金仁存说：“小道消息往往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决不可贸然兴兵触怒强敌。金富弼等到了宋朝很快会回来，等他们回来一问便知。”金富弼等归来后，仁宗一问，才知这个小道消息纯系谎报，情况正好相反。

当时，边防将领的报告如果确凿无误，高丽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呢？值得玩味。

宋朝仍不死心，还是对高丽抱着一线期望，便于1128年（仁宗六年）6月，又派国信使杨应诚、副使韩衍等到高丽，再次提议两国夹攻金国，而且提出了借道的问题。

宋朝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要高丽允许宋朝使节杨应诚等通过高丽领土进入金国，与金国代表进行媾和谈判，同时想拯救出业已被金国劫持而去的徽宗、钦宗和肃王（徽宗之子，被金国抓去做人质。关于宋朝二帝被掳事件参见下一节）。当时，杨应诚等转呈给仁宗的宋朝国书，强调了高丽与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宋朝对高丽的恩惠，说明宋朝正处于危殆之中，特别是想到徽宗与钦宗被劫持的靖康之耻，更是心如刀割。接着，国书写道：“现派使臣前来，一为问候国王，二为跨海去金国探问二帝。……贵国曾经说过，去金国的道路崎岖险峻难以行走。而过去金人常派使臣到贵国朝贡，可见还是有路可通。时至今日，如是无法通行，似乎说不过去。也许贵国生怕金人经由此道派来使臣，可是，自从金人攻占契丹之后，其使臣可经由河东与山东，不必一定经由此道。”这份国书继续写道：“贵国也许怕金人因而寻衅滋事，然而，杨应成等这次只带了110人，纯系一支非武装人员。他们只是带着国书与礼物去谈判，绝不是去与金军交锋。贵国只需在他们一行跨海到其国境之时，先向金国通报一声，询其可否成行。如果金国认为我们的人数太多，随行者可随其意愿减少。如此这般，对贵国决不会有什么不利之处。”^①

仁宗当即以国书作答，其内容为：“高丽多年来确曾深蒙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6年6月丁卯、己巳。《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6年6月。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朝的恩典；宋朝二帝被掳，未能尽快去宋朝慰问，心中实在感到歉疚。我们本想跨海去金国迎接二帝，怎奈金国已不是昔日零零散散到处为家的女真，而是业已灭掉了契丹的强虏，强迫我们以事契丹之礼而对它事大。我们不得已只好从之。最近，金国猜忌我们亲宋，在其国境大筑城池，集结军队，很有可能兴兵来犯。这份国书接着写道：“金国如闻使节假道入京，必猜疑生事。非将如此，必以报聘为答，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则我将何辞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则小国之保全难矣。而淮南两浙缘海之地，得不虑其窥觊耶？苟为不然，小国岂敢恬不从命？……”^①一言以蔽之，高丽表示婉拒。

高丽作此婉拒，归根结底是为了本身的安全，也是理所当然的。就在宋朝派杨应诚等到高丽交涉借道一事而成行之前，中国浙东（浙江东面）官吏翟汝文就曾反对派使节去高丽交涉这样的事情。他说道：“宋朝如果可以通过高丽而与金国进行交涉，金国岂非也可通过高丽而覬覦吴越（两浙地区）。很显然，高丽必然会反对这样的借道。作这样的交涉，只能徒自被高丽嘲笑而有辱王命，舍此无他！宜慎重行事。”

这年8月，宋使臣杨应诚等回国之时，高丽仁宗亲自接见了他们，再次说明了如上的原由。杨应诚答道：“贵国君臣必以为有害而不从，只欲使人还归，是终不许也。”他未接受仁宗致宋朝的国书，也未接受任何礼物而离开了高丽。^②

杨应诚等归国，禀报了与高丽交涉的结果，宋朝君臣一听，一个个万分激愤。尤其是右仆射黄潜善甚至主张首先出兵征服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6年6月。《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6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6年8月庚午。《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6年8月。

丽，给高丽一个下马威。

杨应诚一行忿然归国之后，高丽意识到问题的深刻性，于五天后派礼部侍郎尹彦熙急赴宋朝，上表解释道：高丽如果让宋朝借道去金国，金国如果也以与宋朝交涉为名向高丽提出借道的要求，高丽敢加以拒绝吗？高丽如果不得不让金国不断地借道来往，那么，就不仅仅是高丽的安危成了问题，而且会给南宋带来弥天大祸。高丽这次虽然实在是无法接受宋朝的要求，而慕华之心是永恒不渝的。高丽实在是为金国所逼，而不得不如此，请天朝多多鉴谅。这样的解释，与高丽仁宗对杨应诚一行所作的说明是完全相同的。

1128年（仁宗六年，南宋建炎二年）12月，尹彦熙归国时，南宋高宗让他捎回了一封给仁宗的国书。这封国书写道：“朕向高丽借道，是想救我的父兄（即徽、钦二帝）。看了高丽的答函，不禁感慨系之。朕对高丽仁宗的恭劝很赞赏，但愿仁宗莫忘边防之屏卫！”高宗的惆怅之情，溢于言表。

1130年（仁宗八年，南宋建炎四年）4月，南宋派进武校尉王政忠到高丽，说明宋朝因受金国侵略，业已迁都于杭州，今后边境一告安定，望高丽对南宋应尽之礼一如既往。7月，南宋使臣王政忠归国时，仁宗致南宋高宗国书中道：“由于金国肆行侵略，国境异常混乱。而南宋又已迁都至杭州，距离更加遥远，以致无法像以往那样密切交往。但愿宋朝得以复兴。”国书回避了对南宋要求朝贡的直接答复。

翌年4月，宋朝的都纳（对外贸易商人的头头）卓荣到高丽通报：宋朝将军黄夜叉率领大军渡江大败金军，金军尸体狼藉遍野，仅投降者就有3000多名。这样一来，从两浙至江北的地区已告平定，宋高宗在越州已改年号建炎5年为绍兴元年，志在复兴宋朝，振兴中华。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仁宗把卓荣的书函给大臣们传阅，说道：“宋朝派侯章与归中孚来求援，我们未能应承。杨应诚前来借道，我们也未予答应。今又有卓荣书函通报，今后高丽与宋朝的传统友好关系会是怎样呢？”崔弘宰建议派使臣到宋朝，进一步把高丽的情况说清楚。其他大臣认为卓荣的通报很难令人置信，高丽不能出兵去参加打不赢的战争，不能因为过去有特殊关系，就出兵援助业已越来越衰弱的宋朝。

1132年（仁宗十年，宋绍兴二年）2月，高丽派礼部员外郎崔惟清和阁门祗候沈起到宋朝，表达了歉疚之意，一是因为徽宗与钦宗被掳后未能及时问安，二是因为杨应诚作为国信使奉命至高丽借道，未予提供方便，三是因为王政忠前来打招呼而未能竭尽礼节。同时，向南宋表示高丽绝对不会忘记传统的友好关系。这年5月，崔惟清等归国时，宋高宗让他带给仁宗的国书，只是说到希望高丽继续派使节来宋朝加强交往。南宋囿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势，无法对高丽采取强硬的态度。^①

宋朝在受到金国蹂躏的同时，并未淡忘与高丽的关系，继续大送秋波。1135年（仁宗十三年，宋绍兴六年）6月，宋朝派迪功礼吴敦礼到高丽，对仁宗说道：“听说最近贵国西京发生叛乱，如果难以镇压下去，宋朝愿派10万大军相助。”这年1月间，妙清等肆行叛乱，随即被捕处决。此乱之平定已达5个月之久，而当时宋高宗本身却因军队被金国打败而朝不虑夕，根本没有帮助高丽的能力，却因对高丽的迷恋，而故意虚张声势。吴敦礼归国时，高丽的有关官员对他说：西京的叛军早已被镇压下去，高丽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镇压一切叛乱，无需宋朝派援兵。也就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10年2月辛巳，5月癸未。《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10年2月、5月。

说，在感谢南宋关心的同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南宋的要求。这年9月，高丽派卢显庸和文承美等到宋朝，告之以西京的叛乱已被完全平定。此举旨在堵住南宋之口，免得它又提到拟派援军的问题。^①

1136年（仁宗十四年，宋绍兴七年）9月，高丽派使臣金稚规和刘待举到宋朝的明州，明确地告之高丽在军事上实在无法助宋朝一臂之力。两位使臣带给明州的书函写道：“最近，宋朝商人陈舒持公文前来说道：‘现在夏国（即西夏）派使臣前来，说是要与宋朝使臣一起到高丽，商讨三国共同征伐金国之事。我特地把他的亲笔信带给贵国，请在秘密协商之后给予答复。’回溯起来，高丽已与宋建交二百年，引进了宋朝的文物制度，两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特别亲密。然而，金国与我国毗邻，我们不得不与之和平共处。如果金国得知高丽与西夏和宋朝商议联合攻打金国，那么，金国便有可能以此为借口而出兵讨伐我们。果真如此，高丽将是岌岌可危。高丽一旦危在旦夕，宋朝的两浙与淮河流域便与金国相邻接，对宋朝可谓绝对不利。倘若宋朝出动军队向我们借道伐金，那么，金国也必然会利用这条道路攻打宋朝。这样一来，宋朝沿海各县必将是鸡犬不宁，生灵涂炭。前次杨应诚使臣前来，说是借道只是为了加强与金国的来往，而不是以之为出兵的征途。我们之所以加以拒绝，别无他意，只是如前所述，万望多多予以谅解。”

宋朝的明州对此回复道：“之所以派吴敦礼带着诏书到高丽，后来派商人陈舒到高丽，是因为……靖康年（1126年）的变故发生后，使臣的往来渐趋不便。最近，夏国的密使前来协商，故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13年6月己未，9月乙亥，癸巳。《高丽史节要》卷10，仁宗13年6月、9月。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而派吴敦礼前去。由于你们与金国的国境相毗邻，两国是邻国，只是让他去看一看是否能到金国境内向徽宗和钦宗请安。至于出兵联合攻金，取道贵国一事，纯系吴敦礼个人之言，决非朝廷之谕旨，请勿两相混淆。”这一回复，阐明了宋朝的立场。^①

后来，南宋朝廷形成了对金国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对立。主战派的岳飞等率领北伐军攻打金军，而主和派的宰相秦桧则根据金国的指使，下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北伐军，并将岳飞父子处死。而其代价，则是金国将徽宗的尸体和高宗生母宁德皇后还给了高宗。

1141年，南宋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和约，南宋每年向金国交纳银绢等贡品，高宗向金国俯首称臣，两国以淮北为界。

第二节 金国对高丽的强硬斡旋与保州归属问题的重提

1126年（仁宗四年，金天会四年）4月，高丽向金国上表称臣。6月，金国通过高伯淑向高丽宣谕：（1）高丽对金国的态度，要像过去对契丹一样事金。（2）如果将保州路和国境地区百姓之中原归化于高丽的金人全部归还金国，金国可以将保州送给高丽。

这年12月，高丽派卫慰卿金子鏐和刑部郎中柳德文到金国上谢宣谕表，仁宗在表中曰：“高伯淑至，密传圣旨：保州城他，许属高丽，更不收复。功以句丽本地，主彼辽山。平壤旧墟，限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14年9月乙亥，15年4月癸卯。《高丽史节要》卷10，仁宗14年9月，15年4月。

于鸭绿。累经变迁，逮我祖宗，值北国之兼并，侵三韩之分野，虽讲邻好，未归故疆……当臣父先王时，有大辽边臣沙乙河来传皇帝赦旨曰：保州本高丽地，高丽收之，可也。于时理其城地，实以民户。当此之时，虽小邦未尝臣属上国，而先帝特欲宠绥邻藩，沾以训辞，赐之旧土。”^①

此表感谢金国将保州归还高丽，但仍委婉地说明保州本是高丽的旧土，高丽拥有它不仅理所当然，而且高句丽的旧土还曾以辽山为中心。

此表显然不属于金国所希望的那种誓约的形式，金国对此大为不满。翌年，亦即1127年3月，高丽使臣金子镠归国时带回的金太宗亲笔信，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金太宗的亲笔信这样写道：“卿在金之擢人（向天下传述王意的官职）呈谢宣谕表之前便说明高丽愿意臣属。当此卿更加忠诚畏天，着实可嘉，朕将施恩赐地。此次进献贡物，只是上了谢表……反而以户口为借口，尚未交呈誓封（从属国的盟誓）。……朕的谕示是，倘若国境未定，所得到的土地又将以何为据？”这一诏书表明，金国对于保州问题旧话重提，并非仅是计较高丽国王未上呈誓书，而是对高丽对保州问题的态度以及业已归化于高丽的女真人收容等问题的解决表示不满。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形式问题，而实质问题则在于金国的国力已经强大，而金子镠一行又在金国引发了蛮行事件（此事在本节之后面加以说明）。

此前的1125年（金天会三年），金军潮水般大举入侵宋朝。不到两年，攻陷宋朝的汴京，灭掉了北宋。1127年（金天会五年）1月，金军掳走宋朝的徽宗与钦宗二帝（在前一节中已经言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4年12月癸酉。《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4年12月。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及)，把他们带到金国腹地囚禁起来。这样一来，金国的国威已经波及满洲（指中国东北一译者注）、蒙古和中原。

这年8月，金国派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居瑾和秦州团练使张淮等到高丽，告之以如下的事实：（1）北宋为了收回被契丹夺去的燕云十六州，约与金国结盟夹攻契丹。（2）后来宋朝的徽宗与钦宗毁约，金军将他们掳劫至金国。（3）将宋朝的燕王、越王等470多名宗亲抓获作为人质。（4）册封宋朝大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建都于金陵。金国之所以把这一切向高丽通报，旨在不用武力就使高丽乖乖屈服。

1128年（仁宗六年，金太宗天会六年）12月，金国派锦州管内观察使司古德和卫尉卿韩昉到高丽，告之金国已于8月26日将被劫持到金国腹地的宋朝两个皇帝降了职，将徽宗赵佶降封为昏德公，将钦宗赵桓降封为重昏侯。这两个使臣又将金太宗口谕传至高丽。这些口谕主要是就如下四个事项与高丽协商，要求高丽以国书作答：

第一，保州拥有权问题。

金国的主张是：“不想收复保州，拟交给高丽。但是其前提是：高丽要按照先王的礼典（旧法）恭恭顺顺拥戴金国。然而，几年过去了，高丽却未把以臣事君的正式誓表交给金国，在答书（亦即谢宣谕表）里也隐匿户口，未发世代忠诚于金国的盟誓。正如皇帝宣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留下划定国境的证据，日后以什么作证。”

第二，隐匿户口问题。

当年被高丽威逼而不得不服从于高丽那些边境地区金国百姓和金国逃至高丽的百姓，其数量相当之多。高丽说他们都已亡故，我们无法置信。

第三，金人越江耕作问题。

今年8月14日，高丽的安北都护府致函金国的来远城。来函的内容是：“金人不顾金太祖下的诏书及金太宗通过高伯淑下的诏书，不顾金太祖与金太宗已将保州赐予高丽的事实，却依然越江到昌州、朔州务农种地，请予刷还或领回。”然而，金国派高伯淑等到高丽所说的是：倘若高丽遵守旧例，便将保州赐予高丽。当时所说的是保州城，未说保州城一带的地区。何况时至今日尚未界定国境？须知，高丽所要求的地区乃是两国之间尚未界定的地区，这类问题不能轻率地让边境地方官随意处理。

第四，关于金子鏐一行人行凶事件问题。

1125年（仁宗五年，金天会五年）2月，高丽谢恩使金子鏐等一行来到金国时，其随行人员打伤了金国百姓。按照金国法律，伤人者要给予受害者以充分的赔偿。而时至今日，当时所议定的牛、马、银等还未送来。

金太宗要求高丽就这四个问题作出答复。如果高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仁宗必须首先向金太宗上呈以臣向君盟誓的誓表。高丽如果提交誓表，金国将下达承认这一盟誓的誓诏。然后，两国可专门就国境问题等进行协商。协商之时，不仅可以制订长久的政策，而且可以宽大处置，以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①

此外，还提出了将误人和潜入金国的高丽人以及马匹等交还给高丽等事例。这些事例有：当年3月5日，有两匹无主之马闯入金国境内，为了找到马的主人，有关人员不得已进入高丽。8月14日，金铁衣等6名高丽人在海岸流浪之后进入金国，金国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6年12月壬申。《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6年12月。参阅三上次男著《完颜阿骨打的侵略与金国的成立》，见其《金代女真的研究》一书的第10章第366页至369页。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将他们遣返高丽。8月14日，高丽人崔颇喜逃到金国，金国有关人员将其抓送回高丽。

金国强盛之后，抓住保州问题推行其强硬政策，旨在把高丽变成其附属国。然而当时金国正在绞尽脑汁对付南宋，暂时未对高丽采取重大行动，只是要求高丽上呈誓书，以便加强高丽与金国事大关系，防止高丽与宋朝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

金国使臣司古德当时宣读一道口谕，内容是：“贵国就保州赐予而表示谢意的国书中有言：‘举邦国以乐输传子孙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悃无他，这不过是轻泛之语。如今宋朝与夏国在上呈契丹与大金国的誓表里，说的是：‘若沦此盟，社稷为子孙不绍’或‘神明殛之，无充昨国’……金国为了与高丽永远修好，才下此谕示。使节回国之时，望告知金国。”^①从这一口谕，也可以知道金国当时多么重视高丽的誓书，非要高丽将其以小事大的事实用誓表固定下来不可。

这个誓表问题，对于高丽说来，由于事关国内问题，无法使金国如愿以偿。高丽朝廷多次通过金国的使臣，对金国做了回答。高丽虽已向金国上表称臣，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只是做做样子。实质上，高丽根本未把金国视为宗主国，视为上国。对此，高丽在向金国解释时只好这样辩解：高丽过去同契丹和宋朝建交达二百年之久，在未呈交誓表的情况下，一直尽到了蕃臣之礼。所以，对金国也是这样，不用呈交誓表也可以小事大。

^① 参阅《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6年12月壬申。《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6年12月。

金国的使臣韩昉却十分固执，强逼道：“誓表朝会一言决耳。”^①

由此可知，高丽不得不对金国以小事大，却尽一切可能回避上表称臣。换言之，高丽对于金国，不想受过去未有之惯例的束缚，亦即不愿受誓表的拘束。在高丽朝廷内，当时反对上表的势力不仅单纯表示反对，甚至主张干脆出兵征伐金国。妙清和郑之常等，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的主张终于还是在金国势力的威逼和韩昉等的强逼下化为泡影。

在高丽仁宗给金国的答函中，高丽与金国的关系终于定了下来。当然，这封答函也体现了高丽巧妙的解释、不肯让步的领土意识和卑而不屈的品格。

高丽仁宗的答函如下：

第一，关于保州问题。保州原是高丽的领土，后来被契丹夺走。由于先皇帝（指金太祖）的特殊关怀，保州还给了我们。金太祖又通过金国使臣高伯淑说过不将保州收回，我们对此深表欢迎，而且上誓表表示感谢，表示将传子孙永志不忘。盟誓往往是在敌国不相信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现在金国已统一天下，高丽将竭尽自己的义务，按照高伯淑提出的条件行事。现在高丽呈上誓表，金国朝廷一定会下誓诏，定下长久之策。洵是感激不尽，静候金国的回音。谨派使臣将此誓表呈上。

^① 参阅《金史》卷125，列传，韩昉传：“充高丽国信使。高丽虽旧通好，天会四年奉表称藩而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而昉复至高丽，移誓再三。高丽征国中读书知古今者，商榷辞旨使酬答专对，凡涉旬乃始置对，谓昉曰：‘小国事辽宋二百年无誓表，未尝失藩臣礼。今事上国当与事辽宋同礼，而屡盟长乱圣人所不与，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贵国必欲古礼……’高丽人无以对，乃曰：‘徐议之。’昉曰：‘誓表朝会一言决耳。’于是高丽乃进誓表如约。”参阅三上次男著《完颜阿骨打的侵略与金国的成立》，见其《金代女真的研究》一书的第369页。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第二，关于隐匿移居者的户口问题。这是臣（仁宗）的父亲睿宗在位时，亦即高丽向金国称臣之前发生的事。当时，臣还年幼，对此一无所知。高伯淑作为使臣前来小国时，曾予以谅解，让臣等好生治理他们。臣对此表示感谢，并以谢表表示了谢忱。现在，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臣实在难以理解。

第三，关于金子鏐作为使臣去金国之时，对部下管束不严，以致于发生了高丽人崇吉打伤金国人的事件。他们回国之后，我当即撤销了金子鏐的官职，没收了他的田地，让他回到故乡，并且处决了崇吉。按照高丽的法律，将罪犯处决或流配之后，不再罚其赔偿。然而，贵国却要他赔偿马、牛和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万望再加深思熟虑为荷。

第四，越境耕作问题。金太祖在位时，曾让边臣沙乙河以诏书将鸭绿江定为两国的境界。当时，贵国有言：“从今以后，高丽国境内的草与树枝，金人不得砍采。”尤其是金太宗有圣谕：“高丽只要依旧章好生拥戴金国，就把这块土地赐给高丽。”而现在却说只把保州城赐给我们，未把保州城周边的土地赐给我们，这怎能说是贵国以仁德爱护小邦呢？小邦边防的官吏看到金国人民越过鸭绿江到小邦的昌州、朔州土地上务农之时，曾由当地官府发文请求贵方，让他们作罢。时至今日，贵国反而提出了金人越境耕作的问题。小邦一向信赖大朝，这样一来，叫我们如何才好？

第五，关于拯救与遣返高丽人的问题。在来远城捡到两匹无主之马，当即还给了我们。贵国的东路巡检使在海岸救起渡海遇风而漂流的金铁衣等6人，把他们交给我们。崔颇喜畏罪带领妻子儿子带马潜逃，贵方抓获他们并将其遣送回来。这些都是可喜之举。连这等小事也不疏忽，命令官员一一好生处理，可以说更是善莫大焉，值得道谢。

从以上的五点答看来，高丽以其辞辩佯装糊涂，以其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所答与金国的要求相去甚远却又不失风度。高丽在国力上不如金国，而它多年来介于列强之间艰难生存所积累的娴熟的外交手腕，却是建国不久的金国所望尘莫及的。

金国最关注的是高丽的誓表，所强求的也是高丽的誓表。而在这个问题上，高丽在金国使臣归国之后，不仅未曾提到誓表，而且干脆未再提及。高丽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一年之后，也就是1129年（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0月，仁宗指示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供职的官员善为处理边务，让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加强了军事设施。然后，才派使臣到金国递上了誓表。也就是说，这年11月，高丽派卢令琚与洪若伊到金国，将誓表交给了金太宗。这份誓表，列举中国周朝和春秋战国的故事，说明如果互相猜忌不思齐心协力，即使山盟海誓也无济于事。孔子说过，即使没有盟誓，只要注重胥命，并通力合作，反而更能同舟共济。这份誓表说，高丽一见金国立国，立即在其他各国之先派使节前往祝贺，金国也对高丽特别惠予照顾，洵是值得感谢。有这样的情谊，实际上已无再作盟誓的必要，因为在金国建基之后，高丽与金国的关系可谓特别密切友好。这份誓表，以这样天衣无缝的措辞，使金太宗读罢很放心，却无法挑剔。

这份誓表最后写道：“谨当誓以君臣之义，世修藩屏之职，忠信之心，有如皦日，苟或渝变，神其殛之。”^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7年11月丙辰。《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7年11月。

第三节 保州居民的管辖权问题

高丽所上呈的誓表，与金国周边其他国家上呈的誓表，内容是一样的，无非是按照金国的要求，表示誓守君臣之义和藩屏之职。

然而尽管如此，金国又提出了其他问题，使高丽与金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保州及其周边居民的管辖权。

1130年3月，高丽使臣卢令琚等归国时带回的金太宗诏书中，有这样的句子：“有所合谕事件，具如别录，至当深省，以善后图。”^①

这一别录，令人记起高伯淑和司古德等金国使臣业已交涉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提到高伯淑被派到高丽交涉时说过：“保州（现在的义州）是空城，日后到该城可将约定之事一一提出，倘若还有恳切之求，理当将其割赐。”金子鏐来到金国时所上呈的高丽表章佯装糊涂地说：至于归化户口的归送问题，为期已久，情况已发生变化，人已全部死去而无幸存者，望酌情处理。金国对此无法接受，所以提出要高丽上呈誓表、世代忠诚和确定国境，以便保存好证据。

这一别录接着提到：司古德等去高丽交涉时，我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高丽对此的回答却是：“先王在生前一次也没有谈到过归还户口之事。”这一别录强调指出：从誓表看来，文意可谓郑重其中，却只字未提归还户口一事。如将前后新旧的户口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8年3月己未。

一起计算，其数字不可能很少，而且不可能全都已经死亡。除了当时死亡者、后来病死者以及去向不明者（倘若真是已死，该有遗骸在），如能将现在尚存的一切后裔及妇女一个不漏地调查清楚并登记造册，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好生考虑。如果不予办理，你们所上呈的誓表叫人怎能相信？这一别录的措辞表明，金国与金太宗在这方面的态度相当强硬。

卢令琚等在金国欲起馆回国时，金太宗派节度使班资成传旨云：“昨来赵家父子背信，因发军生擒在此，降封昏德君、重昏侯。”说的是宋朝的靖康之变，却是旨在通过卢令琚传话而威胁高丽。

班资成又对卢令琚等说道：“虽表内誓意尤重，不录远近累次胁从投化户口之语。既推诚誓，礼合专使上表，却行附带，于礼不可。至如表内，事理了当，也合恕容。回次使副，申复国王。后次具录远近新旧胁从投入户数，随表进来。”^①

由此可知，在誓表问题解决之后，金国把归化户口问题作为双方交涉的重点。实际上，在户口问题的背后，还有个保州的拥有权问题有待最后解决。

金太宗之所以这样重视归化户口问题，将其作为高丽与金国的外交悬案，金国的开国功臣、金皇室宗亲在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是他十分关注自金太祖以来七年间逃亡在外的女真人的问题，而向金太宗提出了建议。从其建议看来，金国所要求送还女真人的范围，不是只局限于攻打保州城前后时期逃走者，而是上溯于金国建国之前，包括乌蠢、讹谟罕等及其子孙。金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而实际上作为金国来说，失去了这一机会，以后就无法实现归化户口的回归了。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8年3月己未。

第十章 高丽对金的事大政策与拥有保州

1130年（仁宗八年，金天会八年）12月，高丽派左司郎中金端去金国，要求不提归化于保州的女真人的户口问题。仁宗的回书写道：“况念人物投来之事，是臣父先王未获臣事上国时，薄物细故，而责之若此……法先王绥远之经，用大汉释逃之制，特允至诚之请。”金太宗诏曰：“省所上表。……言念忠勤，不忘喜叹，所告奏事，续当报谕。”^①这样一来，金国开始不再那么步步追逼高丽解决女真人投化的户口问题。

从1115年（睿宗十年，辽天庆五年，金太祖收元元年）到1130年（仁宗八年，金天会八年），在15年间一直成为重大的外交问题的保州拥有问题，终于以保州成为高丽的领土而算告一段落。

保州问题，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事关高丽与金国国力的重大事件。金国以其国力为背景，搞的是实力外交，但它毕竟建国不久，在外交上没有什么经验，采取的是直来直去速战速决的办法。而高丽虽然在国力上不如金国，却积累了一套斡旋于列强之间求存的经验，在外交上足以玩弄金国于股掌之上，时而抬举金国，时而使问题模糊而转嫁责任，采取的是迂回式战略。

高丽拥有保州之后，鸭绿江成为高丽与金国的边界，高丽江东领土连成了一片。

在这以后，高丽仁宗在位期间，每年都派贺正使、生辰使到金国。根据情况，还派去特礼使和横宣使。金国也派相应的使臣到高丽，两国之间弥漫着和平气氛。

1136年（仁宗十四年，金天会十四年），宋朝使臣陈舒带着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8年12月乙酉。《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8年，12月。

书函到高丽，提议由高丽与西夏和宋朝联合，借道给联军一同攻打金国。同年9月，高丽派金雉规与刘待举到宋朝的明州，正式对此动议表示拒绝。高丽加以拒绝的理由是：“高丽与金国毗邻，不得不与之和平共处。如果金国得知高丽与宋朝和夏国商议组成联军欲攻金国，便会以之为借口出兵攻打高丽，高丽的命运就难以预测。倘若高丽遭殃，宋朝的淮河和江浙便与金国邻接，宋朝的安全也就成了问题。所以，宋朝如果向高丽借道去攻打金国，金国也会向高丽要求借道攻打宋朝。这样一来，宋朝更是防不胜防。考虑到这一切，请体谅我国的难处，毋致高丽与金国众怨。”^①

高丽仁宗就像金富弼所称许的那样，不想兴师动众与外国交战。在金国强迫高丽成为其属国，对之俯首称臣之时，他力排会议，兀自主张向金国上表称臣。尤其是当大臣们鄙夷地称金国为胡狄之时，他说道：“以小事大，怎可这样睥睨人家？”由于仁宗采取这样的北方政策，高丽与金国的边境便得以相安无事，不致大动干戈，以免生灵涂炭

其结果，1142年（仁宗二十年，金皇统二年）5月，金国派大府监完颜崇礼和翰林直学士田穀到高丽，第一次册封仁宗为高丽国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14年9月乙亥。《高丽史节要》卷10，仁宗14年9月。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 与维持现状政策

第一节 妙清、郑知常的征伐金国论

1130年（仁宗八年），保州（现在的义州）归属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142年（仁宗二十年），金国册封仁宗为高丽国王。自那以后，高丽经第18代国王毅宗、第19代国王明宗、第20代国王神宗、第21代国王熙宗和第22代国王康宗，直到第23代国王高宗即位的1213年，在大约70年间，高丽虽然在内政方面明争暗斗、政变迭起、武臣跋扈、党争激烈和民乱烽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吵吵嚷嚷无有休止，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是相安无事的平稳时期。

当时，高丽在外交史上值得关注的，是妙清和郑知常这一派的征伐金国论，金国对频繁而又多事的高丽王位继承问题的干预，以及高丽对南宋慕华政策的推行。

高丽太祖统一后三国之后，立志继承高句丽国的雄风，推行安抚高句丽遗民、恢复高句丽故土的北方政策，以之为遗训传其后裔。他的这一遗训，被其后裔沿袭和实践了一段时间，后来看到以高丽的国力打败不了大陆上的契丹和金国等强大国家的势

力，便只好囿于保住保州和维护鸭绿江沿岸国境。

当时，妙清、白寿榘和郑知常这一派人士，^①曾努力实践高丽太祖的遗志，维护国权，张扬国威，使民族正气更加昂扬。

有些史家认为妙清、郑知常这一派反对以金富弼为代表的金氏一派，并宣扬荒诞无稽的阴阳图讖说，认为开京气数已尽，主张迁都西京，进而图谋掌握政权。他们制作了一块大打糕，抹油使之浮在江岸，继而立之于大同江，欺骗世人说这是神龙出现的征兆。史家把他们视为蛊惑人心的团伙。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表现，然而他们却有称帝建元，主张独立自主，进而号召国人齐心协力征伐压迫高丽的金国，体现高丽人气概和雄心壮志的另一面。

这里笔者仅打算提及他们所主张的实现自主独立的北方政策，亦即他们所倡导的对外政策。

1128年（仁宗六年），妙清等向仁宗提出这样的建议：从西京的林原驿看来，乃是阴阳学上所说的大花势（或称大华势）的好地方，应在这里建造宫阙。如果把王宫迁到这里，便可统一天下，金国也会带着礼物前来投降，周围的三十六国^②均会对高丽俯首称臣。

^① 妙清是西京术僧，后更名为净心，精通阴阳之术。白寿榘是日官，亦即阴阳师。郑知常则是出身于西京的文臣。他们以图讖说惑世愚民，据说曾想让高丽迁都西京，以掌握国家实权。尤其是郑知常于仁宗5年因弹劾权臣拓俊京而曾被放逐。另一方面，他在经筵上大讲古文学，尤精于诗文，在当时以文臣驰名于世。他虽然不尽同于阴阳家妙清，却向往于政治革新，积极倡导迁都西京，由此与妙清意气相投，并曾举荐过妙清。

^② 三十六国之说，也见诸中国史籍。实际上与具体的数字无关，并非实指，而是周围各国之谓。《韩非子·五蠹篇》有言：“徐偃东处汉东地，方五百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张华在其《博物志》中引用了徐偃王志：“自称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后汉书》卷77，班超传：“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1129年2月，西京新宫落成、仁宗前去巡视之时，妙清等竟请求仁宗称帝建元，国学生（一般史书视其为妙清的党羽）也呈上建议书，支持妙清等的请求，要求与刘齐在中国建立的大齐国结盟，从东、西两面夹攻金国，以征伐和灭掉金国。

妙清这一派的对外政策是这样一种北方政策：主张摆脱向金国这样的大国称臣上表的屈辱处境，显示大高丽的雄心壮志，使国王改变懦弱的性格，继承高丽太祖决心再建后高句丽的遗志。这种政策，在国内主张称帝建元，在国外主张联合中国的大齐征伐金国。这可以说是利用西京，大华势图讖说大做文章，其目的却在于怂恿仁宗迁都西京以利于其争权夺利，同时张扬高丽国民当时对金国的同仇敌忾心，以使高丽在国际上确保独立自主的地位。

首先，称帝建元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应当说实现起来其难处会少一些。尹壻子尹彦颐，与妙清一党毫无关系，却对此深表赞成。尹彦颐的论据是：这种做法提倡的是独立自主，与金富弼等事大主义者所说的“惹恼金国论”截然不同。他认为建议仁宗称帝建元，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弘扬一种旨在提高高丽国王地位的精神。高丽太祖使用的是天授这一独立自主的年号，光宗所使用的也是光德这一独立自主的年号。在此之前，高句丽、新罗、渤海以及泰封国也都搞独立自主的建元。然而，中国从未因而出兵加以干预。他力劝仁宗大胆地称帝建元。

当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称帝建元的热潮。1115年，金国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收国。1116年，渤海人高永昌在契丹东京自立称帝，定年号为隆起。1123年，契丹天祚帝逃至西夏，其次子梁王雅里自立为帝，年号为神历。同年1月，契丹奚回离保自立为奚皇帝，年号定为天复。同年8月，契丹都统萧干，在奚王府（现在的潢水）自立，定国号为大奚，自称神

圣皇帝，年号定为天嗣。金国灭掉契丹之时，亦即 1125 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沙马勒坎特建立西辽国，自称天祐皇帝，年号为延历。金国灭掉北宋时，亦即 1127 年，立宋朝大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过了三年，亦即在 1130 年，业已投降金国的宋朝将军刘豫在金国扶植下，定都大名府，自称大齐皇帝。同年，宋钦宗之弟康王在河南应天府即位，年号定为建炎，史称南宋。

当时，在国际上确实有许多称帝建元之例，而且都是自称皇帝，自定年号。对于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加以干预和制止的金国，不仅本身一建国就称帝建元，而且帮助其走卒称帝建元，建立了一些小国。而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尹彦颐等在高丽一提出称帝建元的建议，便遭到事大主义代表金富弼等的坚决反对。金富弼等反对这样做的论据是：尹彦颐与妖僧妙清等沆瀣一气，有意触怒金国，不听仁宗谕旨，非人臣之道。金富弼甚至建议仁宗给予尹彦颐严厉处罚。

尹彦颐实际上根本未与妙清和郑知常等勾结，而且不同意所谓西京在阴阳学上是“大华”之说，对白寿翰与妙清也未予推荐。而金富弼等见他们提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建议，便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动向和国家的自主性，拙劣地归罪于反对自己的一派，要求仁宗对妙清、郑知常、白寿翰、尹彦颐等进行处罚。

妙清等提倡国家在国际上要有自主性，努力适应国际局势，这种精神是值得予以很高评价的。但是，他们把它与天道运动混为一谈，并且以之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却是大错特错。他们发动叛乱后，定国号为大为，定年号为天开，便可知其所提倡的国家自主性与独立性同他们的政治野心混杂在一起。妙清等之所以提出要与中国齐国联合夹攻金国，进而灭掉金国，是因为他们得到金国将出兵征伐高丽的情报而采取的一种积极举措。

如前所述，1127 年（仁宗五年，金天会五年），金军占领宋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朝首都汴梁，掳走徽宗与钦宗之际，高丽边防将领得到错误的情报，谎称金军大败，宋军正长驱直入攻打金国。当时，郑知常和金安等一听，曾向仁宗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出动军队援助宋军攻打金国，仁宗立下的功勋由此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史书。

当时，仁宗在西京听到这个建议后，曾听取了金仁存的意见。金仁存答道：“小道消息与实际情况往往相去甚远，决不可一听传闻就兴兵惹恼强敌。再说金富弼尚在宋朝，待他归来问明情况再作决定也不迟，还是等他归来后再说为好！”^①于是，仁宗未接受郑知常等的建议。然而，当时，郑知常与妙清等人的征金论已甚嚣尘上。

1131年8月，仁宗召集大臣们讨论了军事问题。13天后，西北兵马使向仁宗奏报：金太宗率领3万名将士到达东京，不知其为何故。仁宗一面命令台省（门下省）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一面于8月21日让持礼使阎门祗候庾僎到金国东京打探实情。8月27日，又派兵部郎中王洙到金国，祝贺金太宗诞辰，并进行多方面接触^②。9月，庾僎因金太宗未至东京而未能晋见，只好起程回到高丽。12月，仁宗又派庾僎作为持礼使到金国东京。

从这种情况看来，金太宗当时确曾率兵3万抵达靠近高丽方面的东京。而1132年（仁宗十年，金天会十年），金国将南路及南京路的两军帅司合并，将之升级为东京路都统司，专门驻屯于

^① 参阅《高丽史》卷96，列传9，金仁存传：“金兵入汴，边报妄传金人败北，宋帝乘胜深入，金人不能拒。郑知常、金安等奏曰：时不可失。……”这一事实，在本书的第9章第1节已经言及。

^②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9年8月壬申、乙酉、辛卯、癸巳：“乙酉，西北兵马使奏：金主率兵三万到东京，其意难测。王命台省知制诰各上封事。辛卯，持礼使阎门祗候庾僎如金东京。”参阅《高丽史节要》卷9，仁宗9年8月。

东京。以对付高丽。^①这一事实说明，当时，金太宗确曾出动过兵力。

不仅如此，庾夔作为持礼使到金国东京时，身为书状官而随行的崔逢深原是武臣，曾对金国居高临下对待高丽和高丽受到金国的种种限制而大为不满。他在跟随庾夔到金国之前，直门下省安稷崇、右谏议李伸、中书舍人林存和左司谏崔诚等向仁宗奏曰：“东京持礼使书状官崔逢深本武举人，书状非其任……又尝大言：‘国家与我壮士千人则可入金国掳其主来献。’其狂妄如此，窃恐生事，不宜遣之。”史料记载道：其“伏阁门固争三日，不允。”^②也就是说，仁宗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还是派崔逢深为书状官到了金国。

由上可知，对妙清等提出的征金论，不能视之作为一种单纯的党争。^③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尹彦颐 and 崔逢深，其实也是征金论者。从仁宗知道崔逢深的情况后依然让他作为书状官到金国，与庾夔观察金国动静这一事实看来，可知当时高丽的国民，除了事大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征金论。

1158年（仁宗十二年）8月，太史监候刘元度曾向仁宗建议道：“白州（黄海道延白）和兔山的半月罔是我国的中兴之地，如在此建造宫阙，只需七年时间即可平定北虏（即金国）。”仁宗派平章事崔允仪进行现场甚力查之后，不禁想在该处破土动工。

① 参阅三上次男著《金初的都统司及其军帅司》，该文刊载于《满洲史学》第2卷3期。

② 参阅《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9年9月丁酉。

③ 这些人的党派之争，可参阅如下著述：三上次男著《金初高丽与金国的关系》，该文刊载在历史研究会出版于1939年的《历史学研究》第9卷第4期，见其第378页至380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437页至438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濑野马态著《关于高丽的妙清之乱》，该文收辑于《濑野马态遗稿集》一书。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从这一史实，也可以看出征金论是当时高丽朝廷和多数高丽人共同的想法。

然而，妙清等在制订征伐与灭掉金国计划时，欲与中原的大齐国结盟却是毫无说服力的。金国于1125年（仁宗三年，金天会三年）灭掉契丹之后，于1130年（仁宗八年，金天会八年）在中国山东齐州建立一个国家，国号为大齐。它是由金国扶持的宋朝降将刘豫自立为皇帝，而窝窝囊囊统治中国黄河以南金国占领区的傀儡政权，这就是妙清等异想天开打算与之结盟的大齐国。它纯系金国卵翼下的傀儡小国，其国力虽是未知数，却可想而知。它对金国的态度虽不明确，却八九是个附庸。妙清等当时竟会物色这样一个傀儡国作为高丽的盟国，要不是信息不灵情报有误，便必是另有特殊的原因。可惜，现在已无确切资料可查。如果纯粹是因为信息不灵而欲与中原的大齐国结盟，那么妙清等的判断可谓大错特错矣。

第二节 金国对高丽王位继承问题的态度

在高丽国王去世或因发生政变等原因，而需要有人继承王位之时，金国对此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实际情况。

1146年2月，高丽仁宗病逝。仁宗在弥留前留下遗言，由太子王昞继承王位。王昞作为太子很自然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毅宗。当时，金国派使臣到高丽祝贺毅宗即位，也就是在这年10月，金国派清州防御使乌延遵礼和少府少监乌居仁到高丽，在仁宗灵前祭祀。三天后，又派同知中京路都转运司事萧谦到高丽吊慰。过了三天，金国派签书会宁府使曹克到高丽，命令起

复。所谓起复，就是国王命令那些父母死后尚在服丧中的官员到官府视事。当时，高丽毅宗尚在为仁宗服丧。金太宗根据高丽的丧俗，以大国对小国的关注，派人让毅宗照常临朝处理国事。

两年后，亦即高丽毅宗二年5月，金国派完颜慎之到高丽，命令毅宗落起复。7天之后，金国太宗派大理卿完颜宗安和礼部侍郎蔡松年到高丽，册封毅宗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王。^①

1170年（毅宗二十四年，金大定十年）9月，高丽发生武臣政变。这年8月，毅宗去普贤院上香，当进入院门、群臣告退之时，武臣李高等一拥而上，杀死侍候毅宗的文臣和宦官，武臣郑仲夫等挟持毅宗回到王宫。9月戊寅晚，毅宗一进入康安殿，郑仲夫等又杀死国王10名内侍和10名宦官。毅宗坐在修文殿上，镇定自若，边饮酒边让臣子演奏音乐，至深夜才回到寝殿。这时，李高和蔡元想弑害毅宗，却被梁叔挺身阻止而作罢。

另一方面，巡检军竟然凿开仓壁，偷走宫廷的金银财宝。

翌日，郑仲夫等用一匹马把毅宗放逐到巨济县（现在的巨济），又将太子放逐到珍岛县。就在这天，武臣郑仲夫、李义方和李高等率领将士拥戴毅宗的弟弟翼阳公王皓登极，成为后来的明宗。

刚刚即位的明宗，于这年10月派工部郎中庚应圭带着国书到金国。当时带去的国书有两份，即前王毅宗和新王明宗国书各一份。以前王名义写的表章，当然是郑仲夫等代为提笔，所写的是：“臣久病不愈，身体渐渐衰弱，常常昏迷，浑身无力，虽经医治，怎奈药石无灵……现已卧床不起，危在旦夕……臣的父亲

^① 参阅《高丽史》卷17，世家毅宗即位年10月戊戌、庚子、壬寅；2年5月甲子、庚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1，仁宗24年10月；毅宗2年5月。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留下遗嘱，让臣在易王位时移位与弟弟。臣子王泓年纪幼小不甚聪睿，就是长大之后也恐有不少毛病，难以善理政事……臣弟皓，有才有德……臣将在某月某日将军国事务交与他，特此，先行奏明。”

很显然，这封奏表完全是郑仲夫一伙的虚构，根本不是被逼退位的毅宗肺腑之言，也不符合其实际情况。说毅宗因病不能理政完全是捏造。说上代国王留下遗言让毅宗弟继位，也纯粹是胡说。诬蔑毅宗子不甚聪睿，更是居心叵测。吹捧毅宗之弟皓德高望重堪继王位，更是胡编乱造不知羞耻为何物。

刚即位新王的奏章，胡说先王毅宗年逾半百重病在身，无法上朝理政，然后写道：“臣与先王毅宗是同母亲弟，王兄认为臣足以继承王业，说定于某月某日让臣担负起军国事务，臣坚辞不受，怎奈无以回避，只好负此重任。本该事先上奏，怎奈路途遥远，而黎庶又一日不可无王，乃根据众臣之意，临时承受分封国的分寄，特此奏报。”

翌年5月，金世宗趁高丽特使庾应圭回国之便，给高丽回诏，允许前王毅宗让位。回诏首先抚慰毅宗道：“卿登上王位已届二纪（一纪为12年），堪为藩屏。近来，不见常派使臣前来，仅以奏表报告，不知卿有何变故，心下实在为卿担忧。今见卿的封章，才知卿久病不起，唯恐耽误国事，而遵先父之命将王位传给弟弟，让他承担重任。卿此言虽然言之成理，朕却不敢置信。且后，朕当指派使臣前往，了解此事的内幕。”

庾应圭带着毅宗与明宗的表章与封章到金国时，金国不知高丽发生了政变，而派大宗正丞耶律胤祝祝贺高丽毅宗的生辰。他一人高丽国境，高丽边防官吏便说毅宗已经让位，而不让他去京城。耶律胤一行得知情况后，只好返回。金世宗听了耶律胤的奏报，又听了庾应圭的说明，已经明白高丽毅宗乃是被逼让位，实

有其苦衷。

这年7月，金世宗派询问使完颜靖等到高丽，对毅宗的让位内幕作了调查。他们抵达后的第二天，明宗设宴为他们洗尘。两天后，又为他们设初参宴。他们全都予以谢绝。由此可知金国的使臣对高丽新王相当不满，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过了两天，明宗接过金世宗的诏书，但它是写给前王毅宗而不是给明宗所写。诏曰：“卿抚有尔邦，践修世美。及当兹岁，付上封章告厥疾已，旷于保鬻，谓其子不能于负荷述前人之遗囑，让毋弟而相传，尚忧未出于诚心，是用往颁于诏问。使驛来复，奏牍宜详。”^①

8月，金国询问使完颜靖谢绝了明宗在大观殿摆设的宴会，希望尽早履行其使命。他向新王明宗第一次询问让位之内幕时，明宗答道：“前王让位后已避身于他处，病势加重毫无起色，即使金国让他复位，他也无法再登王位。他避身之处路远又险峻，使者难以来往。”所说的又是一派谎言。这样一来，金国使臣未能见到前王毅宗。明宗伪造了一封前王的奏章交给完颜靖，完颜前对此事无法了解得更详细，只好悻悻然归国。^②

高丽明宗从金国使臣的态度中感到自己的王位不稳，便尽一切努力去博得金国的欢心。这年10月，他派礼部侍郎张翼朝和都部书黄公遇作为告奏使到金国，开始对金国进行说服。张翼朝完成了这一使命，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172年（明宗二年，金大定十二年）2月，告奏使张翼朝等归国时，金世宗让他捎回去诏书，承认新王明宗的即位。这份诏书写道：“卿逖居侯土，望重邦人，因常公耳以为心，适会友于

^① 参阅《高丽史》卷19，世家明宗元年7月癸未、甲申、丙戌、己丑。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2，明宗元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9，世家明宗元年8月甲辰。《高丽史节要》卷12，明宗元年8月。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之遭疾，累封章而敷奏，述逊让之由来。摄位从宜，投诚有请。意欲承家而保国，义当垂诏以加恩。肆因使介之还，姑用俞音之布，续当遣使册命。”^①

这年5月，金世宗派大府监上轻车都尉乌古论仲荣和翰林直学士张亨到高丽，册封明宗为高丽王。金世宗的册封诏书写道：“逊位难言之磊落，兄弟相续古已有之。竟欲代代积福积德，必须时时不遗话柄。从众人所思之一致，派使臣前往施惠布恩。尔皓当怀远大之志，常思责任之重，永理贤明之政……适逢兄王病重难愈，从公而思让位，当知其意不负其望……今派使臣封尔为开府仪同三司高丽国王，永为藩屏。”明宗还接受了金世宗所赐之冕服、金印、象辂、鞍马、绸缎和弓矢等物。

这年8月，高丽派大仆卿金暄到金国，对金世宗的册封深表感谢。继位问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对于高丽发生采取不义之手法篡夺王位之事，金国始而态度强硬，派使臣到高丽调查，不承认明宗的继位，继而因新王明宗及其身边的大臣对金国特别恭顺，采取一系列举动谄媚于金世宗，于是金国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干预到这种程度，已树立了大国的体面，又考虑到要高丽永远作为其藩屏，便顺水推舟承认了明宗的继位，册封明宗为高丽王。

其次，高丽第19代国王明宗与第20代国王神宗进行王位交接时，金国的干预也非同小可。

1197年（明宗二十七年）9月，崔忠献兄弟举行祭祀，祭告上苍已废黜明宗的王位。明宗既无能又碌碌无为，对近侍及佞臣偏听偏信，随意赏赐金银财宝，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崔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9，世家明宗2年2月己酉。《高丽史节要》卷12，明宗2年2月。

献兄弟为了纠正当时文武百官及贵族社会的腐败与土地制度的紊乱，为了纠正诸州郡滥收苛捐杂税，向明宗呈上了《封事十条》，^①而明宗却置若罔闻。于是，1197年（明宗二十七年）9月，崔忠献兄弟将明宗软禁于昌乐宫，将太子王璘放逐于江华岛。紧接着，他们迎立明宗之弟平凉公王旼，定其子王渊为太子。

为了使新王神宗的继位正当化，使金国不致前来干涉，他们决定尽快把此事奏报金国。这年10月，他们派考功员外郎赵通到金国，以前王明宗和新王神宗的名义上表，报告金国章宗有关高丽王位变动的之事。

前王明宗的封章是这样写的：“微臣冒昧，以微薄之力继承藩封，在东海之滨聆听教诲多年。而今上了年纪，突患顽疾，一只脚麻木萎缩，步行需他人扶持，兼之双目昏眊，近在咫尺之物亦看不清楚。看来，此系年迈所致，非药石所能疗效。”27年前，明宗靠郑仲夫等发动政变被扶上王位时，命人以已被流配的毅宗名义所写的上呈金国的封章，其让位的借口也是健康与疾病，二者何其相似！紧接着，封章写道：“国政繁忙，表奏堆积如山……虽然是小邦，亦不可一日无主。回想起来，父王临终前有遗训，敦嘱，将家业交与弟弟。是以遵嘱将王位这一重责交给弟弟。”这样的措辞，简直可以说是抄袭了毅宗的封章。正如27年前毅宗的封章与明宗的封章都是发动政变的郑仲夫等人与明宗

^① 1196年（明宗26年）5月，他们上呈给明宗《封事十条》，以革新政治和实现高丽中兴为目标，内容包括：淘汰腐败堕落的官吏；根据文籍还原大地主大官僚所占有的公用田；公正处理公私租赋；根绝权势人家的弊病；禁止诸道向王家送贿；禁止僧侣出入宫廷；禁止王室向民间发放高利贷；录用地方上正直的官员；禁止大臣们过奢侈生活；砍去对寺刹除裨补之外的一切开支等等。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炮制的一样，明宗这时的封章与神宗的表章也是崔忠献等人和神宗所炮制，与前王毫无关系，前王被完全蒙在鼓里。

为了把王位传给神宗，第19代国王明宗虽有儿子王侯（后来成为第22代国王康宗），崔忠献兄弟却说其愿意辞让给叔叔。所以，明宗的封章最后写道：“臣同母弟暲德高望重众人宾服，他不仅能好生治理下国，而且堪作上朝之藩屏。是以，臣已于九月二十三日让弟暲担负起了治国之重任。”

神宗的表章则是这样写的：“臣谨俯伏奏报：臣之兄皓于大朝先帝（指金神宗）在位时即位，至今已理政近三十年，对上朝未有失礼之处。而今年逾花甲，病入膏肓，服尽百药毫无效验，只愿卸下重，任安度余生。他按照臣之父王稽（即仁宗）的遗愿，于九月二十三日委臣以军国重任。臣接位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皇帝龙颜不悦，不同意这次王位之继承，现斗胆上表章奏闻。如蒙息怒认可，臣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新王神宗向金国章宗呈递上满篇谎言的表章之后，于翌月大赦国内罪人，对历代先王万分虔诚，去各地慰问80岁以上的长者，向孝子烈女颁赏，为大臣以下的官员晋级，一心想加强国内的政治体制。

翌年（1198年）5月，被派往金国的特使赵通归来，所捎回金章宗的诏书是对前王的答函。诏书的内容是这样的：卿统治高丽已久，突然宣称退位，朕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从呈上的封章看来，卿病已重，难于继续视事，乃遵照父王之遗愿，让弟弟继位担负繁重之责。诏书最后写道：“虽若出于卿诚，顾

^① 参阅《高丽史》卷20，世家明宗27年10月丙子。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3，明宗27年10月。

未孚于朕听，续遣信使，往咨其详。”^①

对于高丽崔忠献兄弟等发动政变势力所呈上的外交表章，金章宗不仅未拆阅，而且未予作答。看来，金国对这次高丽王位继承的疑窦极深，对新王和政变势力支持与否相当慎重。

这年6月，金国委派大理卿孙侯为宣问使，到高丽了解此次王位继承问题的内幕，欲彻底弄清真相。

当时，金国的宣问使孙侯出席高丽的大臣会议，与高丽方面有这样的对话：

孙侯：前王明宗交出王位，非出之于其本意。他为什么要让位？你们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高丽方面：以前王的名义呈给贵国章宗的封章已说得清清楚楚。

孙侯：这次，我带来了章宗给前王的诏书，却不能通过你们的手转交，我要见到前王后亲手交给他。你们让我见一见你们的前王！

高丽门下侍郎赵永仁：前王已经去南方疗养疾病去了。那里离这里很远，得走30天左右才能到达。您如果想把诏书面交给他，恐怕得等上两、三个月。还是把章宗的诏书交给我们吧！我们会替您转交。

孙侯：如果真是离得这么远，我也就只好打消亲手面交的念头。

其实，这是新王手下的那些大臣和发动政变的崔忠献兄弟等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知道金国这位特使对高丽地理一无所知，便以这样的谎言欺骗这位特使。作为一国的特使，能在他国

^① 参阅《高丽史》卷21，世家神宗元年5月丙午。《高丽史节要》卷14，神宗元年5月。

第十一章 征伐大陆论的提出与维持现状政策

呆上两、三个月吗？孙侯肯定不会这样固执下去。当时，前王明宗并未去遥远的南方，而被软禁在开城的昌乐宫。他被崔忠献幽禁了五年，在昌乐宫含恨歿世。

金国宣问使孙侯不知大臣们在蒙骗他，竟然信以为真，便在第二天把章宗的诏书交给了新王神宗。这封诏书写道：“久抚海邦，遽形诚恳，自以婴疾，难于奉藩，乃追述于父言，且并陈其子让，欲令母弟传授爵封，谓其能事于上朝，已俾摄行于国政。骤达予听，未察所从，特命使以即谏，庶得卿之诚素。具详奏牍，无或隐情。”^①

金国宣问使到高丽后始而分外强硬严厉，似乎必欲知晓内幕而作罢。然而，高丽大臣们以距离遥远和时间过长的谎言，使他不得不让步，交出了金国章宗写给前王明宗的诏书。当然，这封诏书绝对不会传到明宗的手里，只能落到发动政变的崔忠献兄弟之手。

第三节 高丽对金国的维持现状政策

政变的发动者崔忠献等以种种手法瞒天过海，终于将金国的宣问使孙侯打发回国，而走赢了这一步棋。紧接着，高丽对金国大送秋波，采取了以小事大的攻势。也就是说，高丽于翌月派礼部郎中白汝舟作为特使去到金国，请求金章宗对新王神宗进行册封。同行的侍郎郑邦辅则带去了大量的贡物。毫无疑问，崔忠献等所采取的是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两面攻势。特使白汝舟以其三寸

^① 参阅《高丽史》卷21，世家神宗元年6月癸酉。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4，神宗元年6月，7月，9月。

不烂之舌甜言蜜语，许愿说高丽新王决心使高丽成为金国的藩屏，会对金国竭尽犬马之劳；而副使郑邦辅则以珍贵的土产取悦金章宗，使金章宗对高丽新王神宗有了好感。这年9月，高丽又将户部侍郎郑世冲派到金国，祝贺金章宗的生日。

1199年（神宗二年，金承安四年）2月，被派到金国的特使白汝舟回到高丽。他带回了金章宗给神宗的诏书。这封诏书写道：“卿比饰使骀，肃驰城奏，备叙兄让，兼征父言，虑有旷于抚封，垆从权而摄事。诘其端绪，亦既合符。兹复贡于款诚，冀获承于世爵，载稽公义，奚畀俞音，续当遣使册命。”^①

4月，金国派大理卿完颜愈和尚书兵部侍郎赵琢为封册使到高丽。他们刚一抵达，高丽神宗即以山珍海味款待，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从那天起，全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16天后，高丽神宗在大观殿接过了金章宗的诏书。这份诏书写道：“待至卿兄疾病日益深重，卿兄不顾其儿而将王位托付与卿。露章（不同与封印的表章，不加封印）上呈，知卿深意可嘉。兹派使臣完颜愈册封卿为开府仪同三司高丽国王，永为金国之藩屏。”神宗看后不禁心中窃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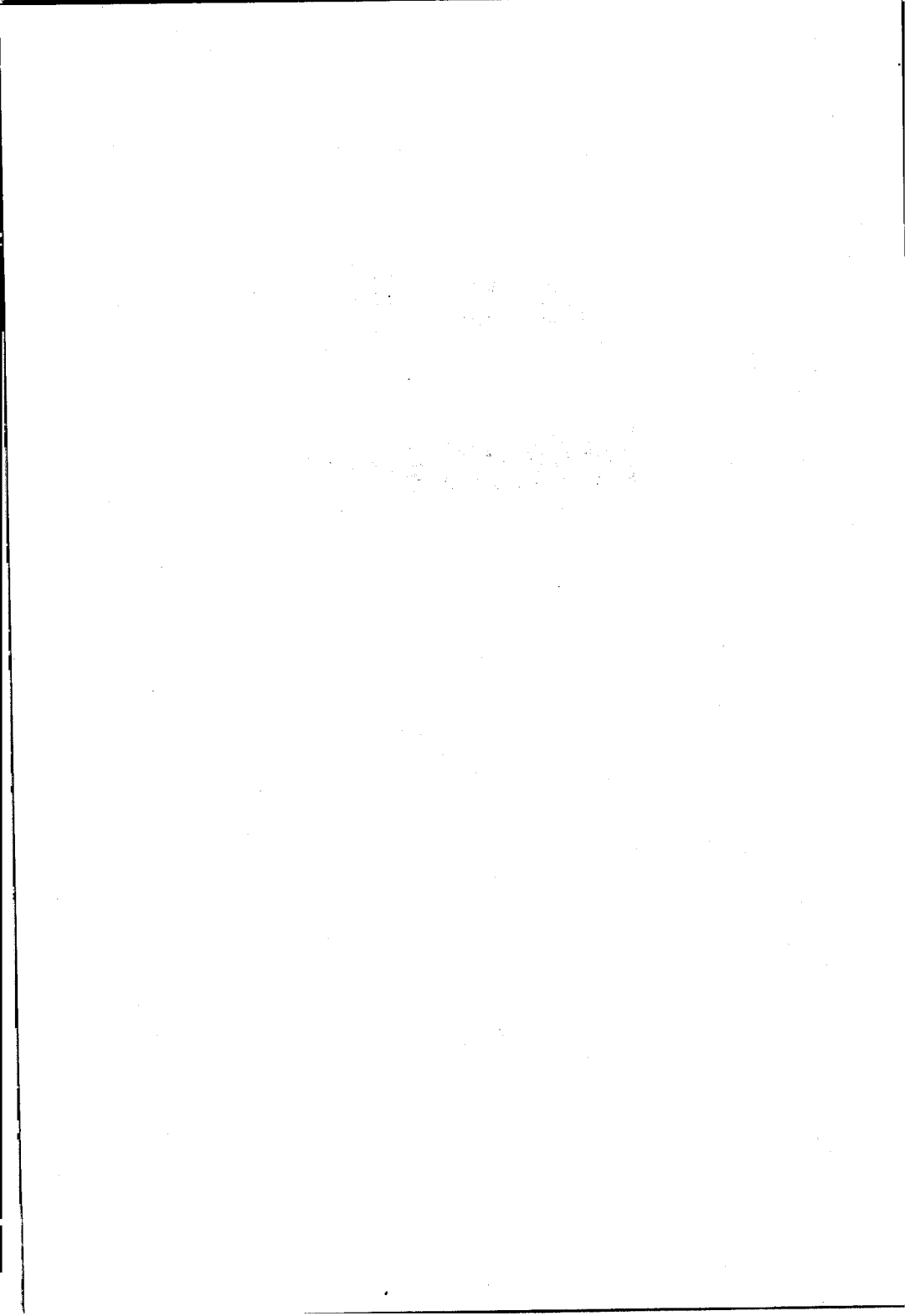
这年7月，高丽派大将军金陟候与礼部侍郎王仪到金国，对金国对神宗的册封深表谢忱。7天之后，又派侍郎郑邦辅到金国，献上了大量的礼物。这样一来，这次所谓的让位之事遂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高丽对金国的想法与态度实际上一点也未改变，还是把它视为野蛮的夷狄，依然一直在设法摆脱它的羁束。

^① 参阅《高丽史》卷21，世家神宗2年2月甲子。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4，神宗2年2月、4月、5月。

第二篇

对元抗争期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 与丽、蒙关系

第一节 蒙古崛起与国际局势的变化

高丽第 23 代国王是高宗（1213～1259 年）。他即位之年，金国则是宣宗完颜珣即皇位，并改年号为贞祐，同时将这种情况向高丽作了通报。高丽则派郎将卢育夫到金国，奏报高丽康宗的去世。当时，高丽还是按照以金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按照以往的惯例对金国事大。

然而蒙古的崛起，使国际秩序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说，蒙古族作为中国东北海拉尔附近的游牧民，一直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和克鲁伦河上游不儿罕山麓。1206 年（高丽熙宗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统一整个蒙古各部落各种势力，登上了大汗（亦即皇帝）的宝座，号称成吉思汗。后来，他率军征服四方，建立了世界性大帝国元朝，后谥为元太祖。

元朝兴起金国衰落之时，元太祖将其征服的矛头首先指向南方，接受了西夏（现在在中国鄂尔多斯地区和甘肃省西北部）的投降，随即侵略金国，攻占了河北地区与河东地区，向金国的首都燕京（现在的中国北京）进军。金宣宗只好嫁皇室岐国公主到蒙古和亲，维持了暂时的和平。不久，金国把首都迁至汴京（现在

的开封)。蒙古太祖得知后，起兵南下，于1215年攻陷燕京，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土地，声势十分显赫。

蒙古势力愈加强盛，金国则愈加衰弱。金国各地因而纷纷举起反旗，尤其是曾经臣服金国的契丹人更是趁势纷起叛乱。

最早举起反旗的是耶律留哥，他原是金国北方的千户。他于蒙古太祖六年（高丽熙宗七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亦即1211年反金，翌年正月在隆安（现在的农安）率10多万军队一起投降蒙古。1212年3月，他被其部下拥戴为辽王，定年号为元统，拥有辽东诸州郡，定都于咸平（今开原）。

1213年，金国女真人蒲鲜万奴为辽东宣抚使，率军讨伐耶律留哥，反被耶律留哥奇袭而大败。1214年，耶律留哥率军攻陷金国的东京（现在的辽阳），再次大败蒲鲜万奴率领的金军。

耶律留哥后来多次置部下劝其立国的好意于不顾，率领一部分军队悄悄向西部转移。这年11月，他遇见了结束南方征伐回到北方的成吉思汗，当即向成吉思汗投降。成吉思汗见其对自己相当忠诚，遂于1215年让他带一部分军队回去恢复其故土。^①

另一方面，被耶律留哥屡败的蒲鲜万奴，趁木华黎攻打辽西地区之机反金，于1215年自立为大真国天王，定年号为天泰。

^① 参阅《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38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第416页。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参阅池内宏著《蒙古之征伐高丽》，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24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研究》第10期，见其第120页。参阅箭内互著《蒙古之经略高丽》，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社于1918年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4辑，见其第228页。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03页至204页。参阅池内宏著《金末的满洲》，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2年的《满洲地理历史报告》第8辑，见其第2页至3页和第38页至39页。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3年闰7月。参阅《元史》卷1，太祖7年壬申。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不久，蒙古军队结束对辽西的征伐，渡过辽河，侵入辽东，蒲鲜万奴连忙向蒙古军投降，其子被蒙古军扣为人质。蒲鲜万奴由于在与辽王耶律留哥的争斗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蒙古军队撤走之后远走东陲，以图们江流域为根据地，于1217年自立，定国号为东夏。

耶律留哥统治过的契丹部众在耶律留哥逃往西方之后颇为彷徨，其部将耶厮不奋起统率群龙失首的他们，于1216年（高丽高宗三年，蒙古太祖十一年，金贞佑四年）春天，在澄州（辽宁的海城）立国，自称大辽收国王，定年号为天成。不久，他在内江中被部下杀死，其部将乞奴继任，自称监国。后来，乞奴死于金山之手。金山自称国王，定年号为天德。过了不久，统古与手刃金山而自立，而喊舍复杀统古与自立为王。屈指数来，耶厮不在位70多天，金山张牙舞爪了两年，统古与和喊舍不到两年就不得善终，无一例外都是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而消失。^①

第二节 契丹遗族军队的入侵

上述这支契丹遗族军队从咸平转移到澄州，在澄州盘踞了一段时间。乞奴等虽然自立收国，实际上不是国家，只是个势单力薄的徒众。因此，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契丹遗种或旧辽国人。1216年（高宗三年，蒙古太祖十一年，金贞佑六年，宋嘉定九年）

^① 参阅《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统古与复杀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杀之，亦自立……耶厮不僭号七十余日，金山二年，统古与喊舍亦僭二年。”

秋，耶律留哥率领的蒙古军队打败了这支契丹遗族军队。这支契丹军队被撵至东方，在开州（凤凰城）又同金军厮杀了一次。由于军力处于劣势，只好后退至鸭绿江沿岸地区。

这时，高丽北界兵马使将金国东京总管府的信函上呈高丽朝廷。这封信函称：蒲鲜万奴聚众叛乱，金国打算征伐他们，他们已逃往深山僻壤。以后，他们将闯至高丽。倘若其闯入高丽，须加严防，并将他们逮捕押送到金国来。这封信函还提出：“金国将出动大军征伐，却担心军粮补给与军马不足，想由高丽予以补给。不知可否，请速回答！”高丽当即予以拒绝。^①

金国本着“患难相救，忧乐相同”目的向高丽提出这种要求，是想与高丽结盟以讨伐契丹人的这支军队。而高丽在处于国际局势大变动的时期，不肯轻易援助金国，而是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

然而，当时金国因兵乱粮食奇缺。金国百姓纷纷带着贵重物品至高丽的义州、静州等处换取粮食，兑换的比率为一铤银子换4石至5石大米。

这样一来，高丽的商人便群起牟取私利。朝廷或处之以严刑或没收其物品，也不能使他们稍自收敛，醉心于黑市交易者不绝如缕。于是，金国官吏率领军队到国境向高丽提出抗议：“为何置往日的友谊于不顾，不向大金供应粮食？”高丽对此采取未置可否的态度。

金军勃然大怒，抓走了10多名高丽地方官吏。然而，被抓去的这些官吏在途中均得以脱身逃回。

正当高丽与金国的关系处于这种状态时，契丹遗族军队王子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高宗3年闰7月丙戌。《高丽史节要》卷14，高宗3年闰7月。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金山与金始让其将领鸡儿与乞奴率领数万（《元史》说是9万）将士跨过鸭绿江，闯入高丽的宁州、朔州和定戎（即义州）。他们攻陷义州的宁德镇，包围了安州、义州、龟州三州，同时从麟州、龙州侵入铁州和宣州（现在的宣川）。

这时，契丹军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给他们以谋生的土地与粮食如果不答应，便继续进攻。他们给高丽的通牒中写道：“在辽建国二百多年，被女真所侵犯也已历时一百多年。辽国被女真攻陷的城池如今几乎都已收复，只有婆婆路（现在的九连城附近）尚未收复。我们已对之原封未动照常任用。百姓也像以往一样安居乐业。倘若高丽不投降，大军到处，鸡犬不宁，决不留情。”^①

金国和契丹遗族军队都向高丽施加压力，前者要求供应粮食和马匹，共同攻打叛军，后者则要求提供落脚点与粮食。^②然而，面对一团糟的乱世，高丽不会倒向任何一边，只能保持中立，同时齐心协力击溃来侵之敌。高丽军队在朝阳镇（现在的价川）和昌州（现在的昌城）、成州（现在的成川）与敌人交锋，打死了不少敌人。^③

这时，金国又秘密地派使者到高丽，再次建议高丽与金国组成联军，夹攻契丹遗族军队。金国根据其需要，所要求的只是以来远城为中心的局部地区的联防，并非注重夹攻，而是希望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3年8月乙丑、乙巳、辛未。《高丽史节要》卷14，高宗3年8月。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这里的六哥，系耶律留哥之误。参阅李齐贤著《益斋集》卷6，门下侍郎平章事金公行军记。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金就励传。参阅《续资治通鉴》卷160，宋宁宗嘉定9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3年9月壬午、壬辰、己亥。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金就励传：“尔不送粮助我，我必侵夺汝疆。”《高丽史节要》卷14，高宗3年9月。

支援其兵马与军粮。高丽所给予的答复是：“契丹军队早就想侵入我境内，现已多次被我们击退。如果万奴的军队继续执迷不悟，我军势必要分别对付契丹军与万奴军，契丹军队便有可能重又猖獗。倘若契丹部队转而侵犯金国，则后果不堪设想。请大朝预先配备兵马，遏阻万奴军的侵犯，使之无法闯入我国之境内。我军则挡住契丹部队，不让这些贼徒闯入大朝。”高丽的意思很明确，不同意夹攻，而主张各自努力击溃敌军。^①

说得更清楚些，就是高丽认为，与其组成联军共同对付契丹遗族军队，不如高丽与金国各负其责，金国军队负责攻打万奴军，使之无法入侵高丽的领土，而高丽军队则负责征伐契丹遗族军队，使之根本不可能闯入境内无恶不作。

然而，契丹遗族军队于1217年（高宗四年，金兴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3月侵犯牛峰县（现在的黄海道金川）。5月，攻陷东州（现在的铁原）。接着，侵占了桃源驿（现在的长湍），并致书高丽云：“与其两国交战，让无辜的老百姓遭殃，不如快快派可信的大臣持降书前来求降！”契丹遗族军队继而入侵原州，遭到原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后退至横川。不久，他们复陷原州。

金就励率军在忠州与原州之间追击契丹遗族军队，契丹遗族军队后退至麦谷和朴达岗。金就励军随后赶到，大败之。契丹遗族军队越过大关岭，逃至东海岸的溟州（现在的江陵），复于7月逃至登州（现在的安边）。但在登州亦无法久留，只好经咸州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3年9月戊子，4年5月甲申：“戊子，金来远城移牒宁德城，约与夹攻契丹，仍索兵马军粮。”《高丽史节要》卷14，高宗3年9月，4年正月条。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现在的咸兴)逃至女真的土地。^①

当时，在高丽与金国之间横亘着一条长城。这条长城从定州(现在的定平)东面的都连浦，经过定州与咸州之间，而近乎成一条直线直至鸭绿江边的义州。其时，金国葛懒路居民几乎都是女真人，而咸平平原是高丽领土。

为什么契丹遗族军队有可能很快就在高丽领土长驱直入呢？有如下几种原因：第一、高丽明明已遭到侵略，权臣崔忠献却骄傲自大。每当有人来报边疆有敌人入侵，他便责怪其“何以用小事烦驿骑惊朝廷”，甚至把来报者贬回家乡。所以，边将们只好等敌兵已攻陷二、三城之后才向朝廷告急。^②第二，高丽的北边有杨水尺(亦称禾尺)，这些人从后三国到高丽时期一直从事低贱职业。他们或是女真人俘虏，或是归化人后裔，没有籍贯，不服赋役，逐水草而居，或从事狩猎或制作柳条包出售。戏子、白丁和妓女，都是他们的后裔。当时，这些杨水尺充当契丹遗族军队的向导，使契丹遗军对山川要塞和道路远近相当了解。第三，高丽军队的精锐部队都成为崔忠献父子的家兵。被调去与契丹遗族军队作战的官军都是老弱士兵。

契丹遗族军队逃至女真的土地上，随即在曷懒甸地区纠集女真人，于这年11月又大举南下入侵到定州附近。当时，金就励将军身患疾病，无法上前线指挥，契丹遗族军队趁虚而入，占领豫州(在定平的南面)和和州(现在的永兴)等几个城郭。随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4年5月癸未、癸巳、己亥、丁丑、庚辰。《高丽史节要》卷14，高宗4年5月。参阅箭田互著《蒙古之经略高丽》，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18年的《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4辑，见其第229页。参阅李齐贤著《益斋集》卷6，门下侍郎平章事金公行军记。

^② 参阅《高丽史》卷129，列传42，叛逆3，崔忠献传。

又攻陷东海岸的宁仁和长平，包围宣州（现在的德源），打败代替金就励将军指挥军队的文汉卿的军队。^① 这样一来，铁岭以北数城于11月落入了契丹遗族军队之手。1218年（高宗五年）4月，契丹遗族军队大举入侵，占领肃州和永清（现在的永柔），其来势汹汹不可一世。

另一方面，高丽与金国有了一点小摩擦。这年6月，高丽北界分道将军丁公寿报告：“女真叛乱者黄旗子贾裕到大夫营构筑阵地，要求与丁公寿会晤和协商。我把他们迎入营地设宴慰劳，趁他们喝醉之机，活抓了贾裕等7人，将其20多名部下全部处决。金国元帅亏哥下得知贾裕被俘，亲自来向我道歉，要求双方和好，供应他们粮食与马匹。”高丽朝廷接到这一报告后，给了金方大米300石。

8月，契丹遗族军队占领了杨州（在延州与博川之间）和谷州（现在的谷山）。高丽以赵冲为西北面元帅，以金就励为兵马使，于9月1日进行反击。双方在洞州（现在的瑞兴）交锋，高丽军队俘获了敌将。高丽军队在成州（大同江流域的成川）等候好几个道的官军集结，然后一举占领了江东城（在大同江左岸，是成川与平壤之间的要冲）。^②

就这样，契丹遗族军队的再次南侵，曾使高丽处于困境。高丽最后总算抵挡住了他们。然而契丹遗族军队最猖獗之时，曾经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1，列传14，文汉卿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5年4月丙寅，6月己未，8月癸亥、己巳。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赵冲传。《高丽史》卷103，列传16，李勣传。《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5年4月、6月、8月。参阅池内宏著《金末的满洲》，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1年的《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一书，见其第66页至68页。当时，契丹遗族军队的指挥者是喊舍。他是继耶律留哥、金山、乞奴、鴉儿、统古与之后的第6任头领。

占领了庆尚、忠清、全罗等三道之外的高丽诸道地方。

第三节 蒙古军及万奴军来援与丽、蒙协约

这时，蒙古以木华黎^①为先锋，几乎结束了蒙古军的南征北伐，只是在经略辽东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在此之前，木华黎率领的部队在蒙古太祖十一年秋天，席卷辽东半岛诸城，金人和契丹人因而都已远遁鸭绿江边。其中，契丹遗族军队渡过鸭绿江闯入了高丽。以咸平为根据地的蒲鲜万奴也离开该处逃至东陲。这年年底，辽东地区也几乎被纳入了蒙古势力范围。

然而，蒙古当时未能久占辽东地区。辽西锦州城被木华黎率军占领之后，不久又被金人夺回。蒙古太祖十三年5月，蒙古军队又占领了锦州城。之后有两年之久，蒙古对此城不理不管。于是，辽东半岛锦州等城又被金国夺去。直到1224年，亦即蒙古太祖十九年，这一地区才完全成为蒙古领土。

1218年（高宗五年，蒙古太祖十三年）12月1日，蒙古成吉思汗与东真国王蒲鲜万奴联合，以讨伐契丹遗族军队为名，派军队进驻高丽，这是蒙古侵略高丽的肇始。也就是说，蒙古让元帅哈真和札刺率领一万名军队，同东真国王蒲鲜万奴指派的由完颜子渊率领的两万名军队一起，以讨伐契丹遗族军队为借口，攻

^① 征服中原和经略辽西的蒙古军总指挥木华黎（1170～1223年），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各部落的功臣之子。他号称太师国王，又被称为拥皇帝。

打高丽的和州、猛州（现在的猛山）、顺州（现在的顺川）和德州（现在的德川），在洗劫四城之后，向契丹遗族军队的总部，亦即喊舍所在的江东城进军。^①

蒙古与东真（亦即万奴）之所以能够结盟，是因为蒙古太祖胸怀经略辽东的雄心壮志，以之为其称霸全球的一个环节。刚好契丹遗族军队正蹂躏辽东和高丽，他们便趁机出兵。而蒲鲜万奴自立而自称东真大王之后，继续侵略四方扩张地盘，想以这次出兵防御金军的反击，从根本上消除其心腹之患。

也就是说，把鸭绿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的女真族联合起来服从统一的管辖，是蒲鲜万奴的梦想。而蒙古太祖的野心则是根绝金国在辽东的势力，使蒙古永远占有辽东。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蒙古与东真便联合出兵进入高丽。这两个国家在以金国为敌，决心平定契丹遗族军队和向高丽施恩行惠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尽管蒙古与东真军队过去曾经较量过一次，两国却还是得以结盟而共同出兵于高丽。

从这支盟军经和州、猛州（在永兴和孟山交界处孟州岭的东面）、顺州、德州（德川和成川之间的可仓）四城来到江东城看来，可知他们是从万奴的根据地布尔哈通河流域与海兰江流域南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5年12月己亥：“蒙古元帅哈真及札剌率兵一万，与东真万奴所遣完颜子渊兵二万，声言讨丹贼，攻和猛顺德四城，破之，直指江东城。”《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5年12月。东真是东女真的略称，高丽把它作为万奴国号东真的别称。参阅池内宏著《蒲鲜万奴的国号》一文，该文刊载在《东洋学报》12—4，见其第67页到70页。参阅池内宏著《金末的满洲》，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1年的《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见其第70页。参阅高柄翊著《蒙古、高丽兄弟盟约的性质》，该文刊载在白山学会出版于1969年的《白山学报》第6期，见其第39页至40页。蒙古在征伐外国时，其惯例是3月到4月做准备和作出决策，8月出兵。此处说是12月入侵高丽，应是8月出兵。参阅赵琪编《蒙鞑备忘录》（蒙古史料四种校注本）军政条。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下，经葛懒甸越过定州的长城，经过上述四城来到了高丽军队与契丹遗族军队对峙的江东城。

当时刮暴风，兼又下雨雪，他们不仅很难进军，而且给养跟不上。喊舍率契丹遗族军队死守江东城，蒙古军队的哈真便派翻译官赵仲祥与进士任庆和（都是高丽人，是哈真从德州带到江东城来的）带信给高丽军司令官赵冲将军，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契丹部队逃至贵国已呆了三年之久，至今尚未被消灭，皇帝（指成吉思汗）特派大军对之进行讨伐，望贵国速速为我们补给军粮。”这封信还说，成吉思汗作了指示：高丽与蒙古应当成为兄弟之邦。

高丽朝廷接到赵冲的有关的报告，以尚书省的名义对哈真的要求作了这样的书面答复：“蒙古在我们遇到困难之时出兵前来援救，我们一定满足贵军的要求。”赵冲据此让判官金良镜率领1000名将士给蒙古军送去了1000石粮食。哈真又提出：“两国结为兄弟，当白国王受文牒来，则我且还奉皇帝。”^①当时，高丽朝野人士均认为蒙古人是最凶恶的野蛮人，又与高丽从未打过交道，因而全都对之既害怕又不敢相信，都不愿与之结成兄弟之邦。然而赵冲力排众议，说服了大臣们，让大家不多必疑。

1219年（高宗六年，蒙古太祖十四年，金兴定三年）正月14日，赵冲与金就励将军同蒙古的哈真和东真国的子渊等一起，率军包围江东城。喊舍见大势已去，只好自杀，其部下大开城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赵冲传：“遣通事赵仲祥与我德州进士任庆和来牒元帅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尔国，于今三年，未能扫灭，故遣兵讨之。尔国唯资粮是助，无致欠阙，仍请兵。’其辞甚严。且言：‘帝命破贼之后，约为兄弟。’于是以尚书省牒答曰：‘大国兴兵，救患而封凡所持指，悉皆应副。’冲即输米一千石，遣中军判官金良镜率精兵一千护送。……宴慰曰：‘两国结为兄弟，当白国王受文牒来。则我且还奉皇帝。’”

门，涌出投降。这时，喊舍妻子及其亲信兵 100 多人被斩首示众，其余 50000 名军卒、妇女及官员则得免一死。^①

1219 年 1 月 20 日，哈真与赵冲、金就励一起设宴，共约两国永结兄弟之好，子孙万代莫忘今朝。之后，将 700 名契丹男女和被契丹俘获的 200 名高丽人交给高丽，其余人均被哈真的军队带走。赵冲将契丹的俘虏分送到各州县，让他们在空地上定居务农。后来，这些地方被称为契丹场。^②

契丹部队投降 10 天之后，蒙古的哈真派蒲里堡完等 10 人到高丽京城，请求双方互相永远和好。高丽高宗让侍御史朴时允接待他们。然而，蒲里堡完等要求国王亲自接见他们，否则他们不进迎宾馆。高丽派翻译官向他们一再解释，说从未有此前例。他们被说服后才骑马进入馆门。蒙古使节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就显得如此无知和蒙昧。

次日，高宗在大观剽接见蒙古使节。他们一个个身着皮衣冠，带着弓箭进入高宗所在的宫殿，驽悍无礼。蒲里堡完来到高宗面前，从怀里掏出书函，抓住高宗之手，把书函塞到高宗的手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2，世家高宗 6 年正月辛巳。《高丽史节要》卷 15，高宗 6 年正月。参阅《元史》卷 208，高丽传：“（高宗六年）十四年正月……注书崔逸以结和牒文，送礼刺行营。”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的第 208 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 103，列传 16，金就励传。所谓兄弟本是亲属之间的关系，而在亚洲国家之间也缔结这种兄弟之盟。国家之间的附属关系，有父子、兄弟、叔侄等等，如宋辽之间所缔结的澶渊之盟（1004 年），宋真宗便称辽国之承天皇后为“叔母”。宋真宗与辽圣宗的年龄相差颇大，却结为兄弟，以兄弟相称。参阅《辽史》卷 14，本纪圣宗和 22 年 12 月戊子。参阅《金史》卷 60，交聘表上，世宗大正元年。《金史》卷 87，斡石烈志宁传。《元史》卷 208，高丽传。参阅高柄翊著《蒙古、高丽间兄弟盟约的性质》，该文刊载在白山学会出版于 1969 年的《白山学报》第 6 期，见其第 62 页至 63 页。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里。高宗不禁大不悦，群臣也惊惶得不知所措，却不敢贸然近前。侍臣崔宣旦边哭边说：“何人让此等丑虏走近至尊之身边？倘若发生荆轲之变，^①怎生上前阻拦？！”他要蒲里岱完等退下。这样一来，蒲里岱完等才换上高丽的衣冠，来到殿前向高宗施揖礼，却未施跪拜礼。^②

当时，高丽与蒙古之间以赵冲和哈真为代表签订了协约。协约的内容有：（1）为了报答蒙古军队平定契丹部队之乱的大恩，高丽向蒙古行投拜之礼（即附属国之礼）。（2）高丽每年向蒙古纳贡。（3）由于当时金国军队尚在辽东严阵以待，在蒙古与高丽之间往来不甚安全，蒙古每年派到高丽的使臣将不超过10人。（4）由于使臣去蒙古必须经由万奴之境，亦即必须经由东真国，高丽要向东真国交纳一定的贡物。^③

高丽与蒙古签订的是兄弟盟约，之所以让高丽使臣去蒙古朝贡，而且必须走迂回之路，经由蒲鲜万奴之境，道路崎岖难行和途中有可能遭到金国之袭击固然是缘由，但是这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借口。主要是因为蒲鲜万奴也附属于蒙古，蒙古想多收高丽和蒲鲜万奴岁贡。而不论是来自蒲鲜万奴的还是来自高丽的土产，亦即贡品，均由贡献官代皇帝掌管。高丽有一次朝贡时，高丽朝贡使未被迎入蒙古境内，这是因为当年蒙古附属金国之时，也曾

^① 所谓荆轲之变，指的是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去胁迫秦王把其所掠得之地还给诸侯。他带樊於期首级与燕国地图交给秦王，打算趁机刺杀秦王终未遂而被杀害。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6年正月庚寅、辛卯。《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6年正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11月。《元史》卷208，高丽传：“箭刺（札刺）与（赵）冲约为兄弟，冲请岁输贡赋，箭刺曰：尔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09页。

向金国朝贡。而蒙古朝贡使未被允许进入金国境内，只是把贡品放在边境就得返回国内。蒙古此时是仿照金国之先例。契丹与宋朝于1004年结成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要向契丹纳贡，也只是把物品放在边境就返回。蒙古之所以不准高丽的使臣入境，不是仅仅因为“途中有危险”，而是自己过去曾被金国羞辱，此时却沿用起了金国的这种做法。^①

蒙古的哈真等签订好这份协约，于2月22日归国之时，赵冲等因在此期间已与他们增进了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把他们送到义州。哈真让41名东真人留在义州，叮嘱道：“尔等学习高丽语，以待吾复来。”^②由此可知，蒙古当时对高丽的野心非同一般。

如上所述，蒙古军队这次远征契丹部队，虽然也可以说是为了征伐曾经统治过蒙古部族的契丹酋长，更旨在让万奴臣服，同时准备把高丽变成兄弟之邦式的附属国。

^① 参阅高柄润著《蒙古、高丽兄弟盟约的性质》，该文刊载在白山学会出版于1969年的《白山学报》第6期，见其第58页。参阅池内宏著《金末的满洲》，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1年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0辑，见其第84页。参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9：“黑鞑（蒙古）皆臣属于金，每岁其主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量行答赐，不使人其境也。”参阅赵珙著《蒙鞑备录》：“且其国每岁朝贡，则至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人境，鞑以逃沙漠，怨入骨髓。”参阅《契丹国志》卷20，澶渊誓盟，“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6年2月己未。《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6年2月：“且以东真人四十余人留义州，曰：‘尔等学习高丽语，以待吾复来。’”

第四节 蒙古使臣行径及其遇害

自高丽与蒙古签订协约以来，蒙古前来高丽接受贡物的受贡使，经由现在的间岛（指中国吉林东部一译者注）与咸镜道（曷懒甸地区，万奴的统治领域）到高丽已成惯例，但其使臣的人数却不按协约的规定，总是超过10人之限的规定，而且超出不少。1221年（高宗八年，蒙古太祖十六年）8月，派出了22人（蒙古人13名，东真人8名，妇女1名）。9月，派了24人（蒙古人23名，妇女1名。）10月，派出了7人。12月派出了20人（蒙古人3名，东真人17名）。1222年8月，派出了31名。1224年1月，派出了10名蒙古人。11月，有10名蒙古人来到高丽。^① 1220年（高宗七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和1223年，未派一人到高丽。由此可知，两国签订于1219年的协约，蒙古在执行时完全是心血来潮随意为之，并不受协约的拘束。

由于协约上未曾明确规定贡物的品目与数量，蒙古往往不是提出过分的要求，就是任凭使臣个人说了算。

就在蒙古的哈真等人签订协约返回蒙古的1219年7月，风传蒙古军队将在秋天又来入侵高丽。高丽信以为真，曾派户部侍郎崔正芬等8人去北方各城检查兵器与军粮的准备情况，采取了将小城并入大城等措施，以对付蒙古军队的来袭。^②

1221年8月，蒙古根据丽、蒙协约的规定，派了著古与等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高宗的有关年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6年7月。《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6年7月。

高 丽 外 交 史

13名蒙古人、8名东真人和1名妇女到高丽。当时，著古与等将蒙古国书交给了高宗。除了那个妇女，其余21名蒙古人与东真人竟然全都想登上大殿交国书。而高丽的规定是：前来的使臣中，只能由其代表，亦即由一位主要的使臣上殿。双方的意见有此分歧，竟然交涉了几个钟头，直到日落时分才达成协议，由八人上殿。他们把蒙古皇太子，亦即蒙古太祖四弟铁木哥干赤斤的信函交给高宗。信函中要求进贡的物品是：水獭皮10000领、细绉3000匹、细绉2000匹、绵子10000斤、龙团墨1000支、毛笔200管、纸100000张、紫草5斤、荳花、蓝筍、朱红各50斤，雌黄、光漆、桐油各10斤。著古与等交罢信函下殿时，分别把他们带来的物件扔在高宗面前。它们都是高丽在设宴之前送给他们的粗布和细布。他们不出席高丽专门为他们摆设的宴会。他们还交给了札刺和蒲里带（疑为蒲里堡完）的书函各一封，也是要求高丽献纳水獭皮、绵和细绉等物品。^①

这年9月，高丽东北面兵马使报告朝廷：蒙古又派来了使臣。高宗得知后，召集大臣们到大观殿，垂询如何迎接再度前来的蒙古使臣。高宗很气愤，想在加强防备搞好防御的同时，干脆不接待他们。诸位大臣说道：“他们人多势强，倘若不予接待，他们势必以此为借口兴兵来侵。届时，寡不敌众，弱难胜强，怎好以卵击石？”高宗一听颇为不悦，感到大臣们一个个太软弱。这场讨论结束后，过了7天，以这可为首的蒙古使臣一行23人和1名妇女来到高丽，还是督促上交贡物。^②紧接着，喜速不花等7名蒙古使臣于10月到高丽。12月，又有3名蒙古使臣和17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8年8月己未、甲子。《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8年8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2，世高宗8年9月壬午、丁亥、癸巳。《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8年9月。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名东真人到高丽督促贡物的准备工作。

1222年（高宗九年）8月，蒙古派31名使臣到高丽。1224年（高宗十一年）1月，蒙古使臣札古也（亦即著古与）等十人来到高丽。当时，东真人未在其内。三天之后，东真使者带两封国书给高宗。一封写的是：“蒙古成吉思汗与其将士们在遥远的地区驻扎过久，已不知其情况如何。而讹赤忻（成吉思汗五弟铁不哥斡赤斤）贪婪暴戾，迫使东真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另一封则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东真希望在青丹（亦即北青）设置榷场（即互市），贵国在定州设置榷场，像以往那样双方互通有无进行交易。”

高宗把大臣们召集到崔瑀宅，讨论如何接待只隔三天先后来到京城的蒙古与东真使臣。东真国使臣的到来，使高丽知道了有关蒙古的信息，尤其是蒙古与东真的断交，高宗感到很满意。而对于同东真国互设互市的问题，高宗则不想加以理睬。

在对高丽来说，当时与蒙古的关系不是没有问题。蒙古使臣带着贡物回去时，高宗命令直门下省马希援把他们送到西京，对他们接待很符合礼节。然而，蒙古使臣一到鸭绿江边，便把细布等扔掉，只带水獭皮返回蒙古。^①

1224年（高宗十一年，蒙古太祖十九年）11月，蒙古使臣著古与等10人来到高丽。由于蒙古已与万奴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们不是经由万奴的领土，而来到义州附近的咸新镇，亦即进入了高丽的西北面。他们在高丽逗留了9天，就带着贡物离开西京渡过鸭绿江而去。这一次，他们也是只带走水獭皮，而将此外的细布等扔在野外。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高宗11年正月丙午、戊申、癸丑。《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11年正月。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使臣著古与（亦即札古也或札古雅）在途中不知被谁所害，死于非命。蒙古方面得知后，怀疑是高丽策划的阴谋。这一事件，终于使高丽与蒙古的关系恶化到断绝国交的地步。^①

到底是谁杀死了蒙古使臣著古与呢？史料未作记载。蒙古方面的人士推测这是因为著古与等在高丽的所作所为太不像话，有的高丽人实在忍无可忍，便杀死了这伙使臣的头头著古与。然而，真正杀害了著古与的凶手，似乎是金国的将军亏哥下或蒲鲜万奴方面的人。

从1232年（高宗19年，蒙古太宗4年）11月高丽致蒙古的国书看来，可知著古与被害的来龙去脉。这份国书明确指出，此乃金国或东真国有关人所为。它这样写道：“甲申年（1224年），蒙古使者著古与未经蒲鲜万奴领地，而从婆娑路来到高丽。我们依例对他这一行使臣接待得很隆重，并把贡物交给了他们。后来蒙古使者前来高丽者渐趋罕见。我们感到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后来过了很久，才听说是亏哥下在途中拦住著古与，并将他杀害。这件事发生后，亏哥下穿起蒙古服装率军侵入我国北边，蹂躏我国的三城。万奴也攻占了我国东边的二城，其军队的服饰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1年11月乙亥，12年正月癸未：“十一月乙亥，蒙古使著古与等十人，至咸新镇。”“十二月癸未，蒙古使离西京渡鸭绿江，但贡国赆獭皮，其余细布等物，皆弃野而去，中途为盗所杀，蒙古反疑我，遂与之绝。”参阅《元史》本纪，太宗3年8月：“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往讨之。”《元史》洪福源传：“壬午冬十月，又遣著古与等十二人，窥覘纳款虚实，还遇害。”《元史》卷208，高丽传：“十九年二月，著古与等复使其国。十二月又使焉，盗杀之于途。”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12页。参阅箭田互著《蒙古的高丽经略》，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4，东京大学1918年版，第261页至274页。

第十二章 蒙古崛起与丽、蒙关系

与亏哥下的军队一样……万奴曾向蒙古使臣信口雌黄地撒谎：‘高丽背叛了蒙古，你们千万别上那里去。’然而，蒙古使臣不信。使臣著古与为了了解此事的原委，曾派手下人穿上高丽服戴上高丽武器，埋伏于两国的山沟里，窥察有关的行踪。后来此人走出山沟射了一箭后遁去。之后，万奴的人对著古与同行的人说道：‘高丽人的行径与此相同，显然已经背叛蒙古。别再往前走，算了吧！’一再劝蒙古的使臣回蒙古去。逃到我们这儿的王好非，原是万奴的麾下，他知道此事。我们向他详细了解此中的底细，才知道了如上的事实。”^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9年11月。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第一节 撒礼塔入侵

1224年（高宗十一年，蒙古太祖十九年）11月，蒙古使臣著古与在归国途中遇害。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死他？当时，谁也搞不清楚。在扑朔迷离之间过去了几年。尽管后来高丽曾向蒙古讲明事实真相，蒙古却依然认为，是高丽人杀死了著古与。

当时，蒙古太祖结束了对西域的征伐，正在凯旋途中。后来，他又率军亲征西夏，却于1227年7月驾崩于征途中。这样一来，有一段时间蒙古无暇与高丽就其使臣遇害之事进行外交交涉。

蒙古太宗继位之后，于1231年（高宗十八年，蒙古太宗三年）率军讨伐金国。同时，让将军撒礼塔（又称撒里塔或撒里台）率军到高丽，追究蒙古使臣遇害的责任。

撒礼塔率领的军队于1231年8月29日渡过鸭绿江，包围了著古与被杀死的义州咸新镇。这是撒礼塔的第一次入侵。蒙古军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队入侵的借口，是对蒙古使臣被害一事进行惩戒。^①

蒙古军的这次入侵，持续了大约 30 天。蒙古侵犯高丽，虽然以蒙古与遇害作为事由，却不过是一种借口。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蒙古当时想征服全球，侵犯高丽只是其这种野心的一个部分。当时，蒙古军队已征服了西城与西夏，打垮了金国，控制了辽东，下一个征服的目标便轮到了高丽。

撒礼塔率军包围咸新镇，攻克铁州之后，威胁高丽道：“我们是蒙古兵。高丽快快投降，否则大军屠城，鸡犬不留！”副使全侗顶不住这种威胁，诱使防守将军赵叔昌（赵冲之子）大开城门，投降蒙古军队。赵叔昌投降之后，还充当蒙古军的走卒，写信给义州东面朔州的宣德镇，劝其守将打开城门迎接蒙古军队。蒙古军队见赵叔昌很有利用价值，不论进军到何处都以赵叔昌为马前卒。^②

这时，洪福源（高丽人，初名福良。大纯（亦名大宣）之子，荣丘之父）率领 1500 名居民投降撒礼塔，成为蒙古军队的走狗，在蒙古军攻打高丽诸州郡时充当向导。^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3，世家高宗 18 年 8 月壬午：“秋八月壬午，蒙古元帅撒礼塔围咸新镇屠铁州。”《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8 年 8 月。参阅《元史，本纪》太宗 3 年 8 月：“是月，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遣其弟淮安公请降。撒礼塔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参阅《元史》卷 149，王荣祖传：“太祖十九年春正月……己丑……伐高丽国，围其王京。高丽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纳贡。”在《元史》中有不少日期是错的。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 212 页。

②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8 年 8 月。参阅《高丽史》卷 130，列传 43，叛逆 4，赵叔昌传。

③ 参阅《高丽史》卷 130，列传 43，叛逆 4，洪福源传。

蒙古军向东南进军，入侵龟州与西京，^①因高丽的军队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接着，它攻陷了黄州（现在的黄川）、凤州（现在的凤山）、宣州（现在的宣川）和郭州（现在的郭山）。10月1日，两名蒙古人带着通牒到平州（现在的平山），被平州官吏抓住扣押起来，随即报告朝廷。朝廷就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大臣们有的说：“将他们处死！”有的说：“对之审问，问其事由！”高宗派殿中侍御史金孝印‘去蒙古军营，质问蒙古军队何以要侵略高丽，蒙古军队的头领答道：“我军刚到咸新镇时，就说过降者不杀。如果高丽不投降，我们就不走。如果投降，我们就到东真去！”’^②蒙古军队自入侵之日起就要求高丽投降。

10月21日，高丽的左、右、中三军在安北城（现在的安州）与蒙古军交锋。太集成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率军与敌军英勇战斗。而身任城主知兵马者却袖手旁观。结果，高丽军队损失大半，李彦文、郑雄、蔡识等将军战死，安北城也随即沦陷。高丽因而派北界分台御史闵曦和兵马判官去见撒礼塔，表示愿意用食物慰劳蒙古军队。撒礼塔说：“尔国能坚守则坚守，想投降

^① 金庆孙和朴犀在龟州大战中的功绩已永垂青史。这次战斗持续了30天，有时打肉搏战，有时打智谋战。每一次，敌人都抵挡不住高丽军队的进攻。蒙古兵在车上装草木，让士兵隐蔽于其间，或用牛皮把士兵裹在其间，而以之冲锋时，高丽军队使用炮车把溶化了的铁液射到其车上，把它烧毁。敌人出动15台大炮车前来进攻，金庆孙和朴犀这两位将军就在城上筑台，把石块扔向敌人的炮车，迫使敌人退却。蒙古兵在柴火车上涂上油，把它点燃起来，举着它进攻时，朴犀将军命令士兵用湿泥团把这些火把灭熄。蒙古军见每次进攻均不能得逞，慨叹道：“此城虽小，却能抵挡住大军进攻。真是天助，非人力所能为。”蒙古军只好解围而退。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8年10月壬申、癸酉、辛巳，11月癸巳：“乃曰：‘汝国能固守则固守，能投降则投降，能讨战则讨战，速决了也。汝职为何？’对曰：‘分台官人。’曰：‘汝是小官人，叫大官人速来降。’”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8年11月。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便不必犹豫。如果想打下去，就快快前来交锋。”他询问闵曦担任何职，闵曦说自己是北界分台御史，他叮嘱道：“你官卑职小，是个小官人，说话不算数。快快回去叫尔国的大官人，前来投降！”

蒙古元帅撒礼塔在要求高丽投降的同时，命令蒲桃、迪巨和唐古等三位将军率军向南挺进。后者立即率军攻入平州城。他们得知蒙古使臣系在此被害，便血腥报复，杀掉州官的同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鸡犬不留。

12月1日，蒙古军离开平州，包围了高丽国都开城。霎时，高丽人心惶惶。崔怡（或称崔瑀）以家兵自卫，家兵都很精壮，而守城的官军则都是老弱者。

与此同时，东北方面的和州（现在的永兴）派人报告朝廷：东真军队入侵和州，抓走了宣德都领。东真并非正式对高丽宣战，而是见蒙古队入侵高丽，也来作一次挑衅。

这样一来，高丽朝廷不能不作屈辱性的媾和。12月2日，高丽又派闵曦前去试探和交涉。翌日，闵曦与两名蒙古使臣来到京城，高丽朝廷派知阁门事崔珙前去迎接。撒礼塔又增派了三名使者参加和谈。

12月4日，高丽高宗接见了这五位使臣。^①他们交给高宗一份通牒。通牒援引了著古与被害事件，断言他系被高丽人用箭射死，并说蒙古太宗有言：“高丽若不降，灭之！”通牒劝高丽快快

^① 这些蒙古使臣穿着毛衣戴着毛冠，佩着弓箭，就想去晋见高宗，这在高丽官员看来实在是太放肆无礼。于是高丽朝廷让他们换上紫罗衫和束带。他们加以拒绝，只是披上了一件宽大的外衣。

投降。^①

高丽高宗见蒙古方面既追究著古与被害的责任，又敦促高丽投降，便派淮安公王佺（显宗第七世孙）去撒礼塔处，向他进献了土产，又在内殿宴请蒙古使者。高丽还通过使臣向唐古、迪巨和撒礼塔之分别送了五斤白银、10匹苧麻布、2000匹粗布和马鞍、马缨等。然而，蒙古方面并不满足，又向广州、忠州、清州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②

12月23日，蒙古让赵叔昌引领9名蒙古使臣，交给高丽方面一份通牒。它指出这次撒礼塔率领大军征伐高丽，是为了就著古与的被害而问罪，并且写道：“崔瑀送来的信函，不符吾意。我们需要金银和珍珠、水獭皮，快送来20000或10000匹马。再者，我军离家已经多日，衣裳已破，快送来100万套军衣，送来10000匹马供大小官员做坐骑，还要给蒙古皇帝送来王孙、公主和郡主，送来高丽高官之子女，送来王府和大臣的男女各1000名。”并称这一切应尽速办到，勿耽误时日才是。^③

根据这一要求，高丽于4天之后，亦即于12月27日给唐古送去了银壶、托盘、马、苧麻布和马鞍等。4天后又给蒙古太宗送去了黄金70斤、白金1300斤、襦衣10000领、马170匹。同时，给撒礼塔送去了黄金12.8斤、金酒器7斤、白银297斤、银酒食器共437斤、银瓶116具、纱罗锦襦衣16领、紫纱裤子2领、银镀金腰带两条、绸布襦衣2000领、水獭皮75领、配金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高宗18年12月壬子：“蒙使毛衣冠，佩弓剑，我朝赠紫罗衫束带。令更衣，不从，只表着之。宴慰之，蒙使献王文牒一道，牒曰：‘圣旨差撒里打火里亦（撒礼塔）军去者，问你每待投拜待厮杀……’”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8年12月乙卯、丙辰、丁巳、壬戌、丁卯。《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8年12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8年12月甲戌。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鞍马 1 匹和散马 150 匹。不仅如此，还给他们的妻子和麾下的 14 名将军也送了不少礼物。

高丽以背叛祖国的赵叔昌为大将军，同蒙古使臣一起到蒙古，向太宗呈上国书。国书如下：（1）感谢蒙古在契丹军队入侵高丽时所给予的援助；（2）杀害使臣著古与的凶手，绝不是高丽人，而是邻寇；（3）捆绑阿土等，是误以为他们是契丹人或东真人，后来听他们说蒙古语才知他们是蒙古人，当即释放了他们；（4）至于投拜（即投降），早在哈真（又称河称）和札刺来到之时，我们就已投拜过了。现在蒙古使臣前来，要求保持像过去一样的友好。（5）今后，我们决心使两国更加友好相处，亲睦无间。^①

当时，高丽无法抗御残暴无度的蒙古军，只好作如上的媾和。然而，高丽表面上信誓旦旦要与蒙古增进友好关系，实际上则是怀着满腔的郁忿和充满敌视的信念。这种内在情愫，充分体现在《君臣盟告文》里。它写道：“残暴无度的蒙古军队无缘无故侵犯我国，蹂躏我国边防，残杀我国人民，逼近京城，不可一世，凶残有如捕食之饿虎。高丽全境生灵涂炭，尸体狼藉，血流成河。君臣虽想加以遏阻，却仓皇失措无计可施，只能抚膝长叹，对天唏嘘。”^②

蒙古元帅撒礼塔率军占领高丽诸州郡之后，以其 72 个达鲁花赤（地方官吏）管理其行政事务，到 1232 年（高宗十九年，蒙古太宗四年）1 月 11 日才撤军。当时，高丽派淮安公王佖、首宰金就励和大将军奇允肃饯送撒礼塔的军队。朴犀率领军民固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3，世家高宗 18 年 12 月丙辰、丁巳、甲戌、丁丑、庚辰。《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8 年 12 月。

^② 参阅李奎报著《东国李相国全集》卷 25，辛卯（高宗 18 年）12 月 8 日《君臣盟告文》。

守龟州，经高丽朝廷说服其投降，才不得不向蒙古投降。崔椿命死守慈州拒不投降，崔怡劝其投降，他誓死不从，并因而声名卓著。^①

第二节 迁都江华与撒礼塔再次入侵

1232年7月6日，高丽的高宗离开开城。次日，亦即7月7日，他迁都江华。他这样做，为的是对蒙古抗战到底，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

高丽迁都于江华，有如下几种因由：

第一，蒙古使臣横行无忌。

这年2月27日，淮安公王佺把撒礼塔等送走之后，与蒙古使臣都旦及其随行人员24人一起回到京城。都旦大言不惭地宣

^① 参阅《元史》本纪，太宗3年8月。《元史》卷120，列传，吾也而传。《元史》卷149，列传，移刺买奴传。《元史》卷154，列传，洪福源传：“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里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暉乃遣其弟淮安公请降，遂还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朴犀传。《高丽史》卷103，列传16，崔椿命传。达鲁花赤，是蒙古语总督、知事之谓。当时这72个达鲁花赤究竟是怎样配置的，不详。达鲁花赤只有72人，如配置于高丽各京、府、州、县，人数是不够的。倘若只是留下掌管当时被蒙古军占领的40多城，则又有所剩余。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参阅《元高丽记事》。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称：“我是来总揽和统管高丽国事的。”气焰十分嚣张。^①。

第二，实在无法满足蒙古的过分要求。

让我们看一看当时蒙古提出的几种苛刻的要求吧：蒙古想迁徙高丽百姓到开州馆（凤凰城）和宣城山下定居务农。对此，高丽提出其人民与家畜均很不足，连现有的土地都耕种不过来，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蒙古还要求高丽抽出 30 艘船和 3000 名水手到蒙古去。对此，高丽指示西京都领郑应卿，派水手们乘坐 30 只船，从龙州浦（现在的龙川）到了蒙古。

这年 4 月，高丽派上将军赵叔昌去蒙古，在上表称臣的同时，给蒙古皇帝和撤礼塔献上了罗绢、绫绸各 10 匹，以及各种金银酒器、水獭皮、字画、扇画和马鞍等。同时，给撤礼塔的 16 个部将也送了各种礼物。

从高丽朝廷给撤礼塔写的信，就可知撤礼塔当时提出的无理要求和干涉，可知高丽所处的困境与郁愤。这封信有如下的内容：

（1）关于献给蒙古皇帝的 1000 领水獭皮。我国业已抓到的水獭已用光。为了收集水獭皮，有关人员跑遍了全国仅得 977 领，不足部分请多多鉴谅。

（2）关于选送国王的公主和郡主以及大官们的童男、童女各 500 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王族子孙不多。由于国土狭窄，

^① 都旦的行径，难以一一列举。都旦如想进入宫殿里，高丽朝廷视之为了不得的事，连忙命人关上广化门不让其进入。都旦进入宫城后，竟敢与高丽国王并排坐在一起。他认为负责迎接他的闵怀迪接待得不好，竟敢出手打闵怀迪。一次，他嫌客馆太寂寞，想迁至官宦人家住。后来，给了他一套金酒器和 80 匹紵布，方才作罢。他本是契丹人，生性奸诈，曾敦请蒙古兵至江东城，是使其国家灭亡的罪人。参阅《高丽史》卷 23，世家高宗 19 年正月戊辰、丁丑；3 月甲申、丙戌。《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9 年正月、3 月。

官员们也只有一个妻子，故而年幼的子女也很少。如果把他们都进给蒙古，日后王位谁来继承？朝廷的事情谁来经办，谁来应付蒙古下达的各种差事？

(3) 关于选送各种工匠。我国工匠自古以来就奇缺，加上他们往往因饱受饥饿之苦和疾病折磨而死去，蒙古兵入侵时又被杀害了不少，现在已无工匠可送上。

(4) 关于选送刺绣的妇女。我们从来就没有会刺绣的妇女，故而无人可送。

(5) 关于委托赵叔昌调查义州民户一事我们已对义州做过调查。但是，该处的守城者与百姓乘桴逃走者和在江海上被大风刮落水中淹死者不少，现已无法查清正确的数字，无法作确凿的调查。

(6) 关于把蒙古撤军时剩下的马全部送回一事。贵军撤走时剩下的瘦马病马，我们用心到各处寻找，发现只有 15 匹。我们已派人好生喂养，等下次派人去贵国时将它们送回，决不会有所闪失。^①

蒙古对高丽如此苛求，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敌军的弱点。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善于以骑兵为主的肉搏战，在水战方面则极差，而高丽迁都于江华岛，便可扬长避短。在撒礼塔再次率军入侵时，亦即去年 9 月蒙古兵入侵黄州、凤州（现在的凤山）时，黄州和凤州的官吏带领百姓避难于黄州的铁岛，敌人只好望洋兴叹。这年 12 月，义州咸新镇府使全闲向朝廷要了一只船，避难于蔚岛（现在的龙川郡），蒙古军队无法追捕他。在宣州、昌州、云州、博州、郭州、孟州、抚州、泰州和殷州等地也是如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9 年 3 月甲午，4 月壬戌。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此，百姓避难于岛上，便不会遭灾蒙难。根据这样的经验，为了谋求国家的安全，高丽高宗与朝廷遂决定迁都于江华岛。^①

对于这样的迁都，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是不宜一下子放弃定都 300 年的都城。然而，执掌实权者崔怡，在昇天府副使尹璘、录事朴文祥、宰枢郑敏和崔怡岳丈太集成等的支持下，武断地做出了迁都的决定。

在此期间，蒙古在高丽北界的龙岗和宣州增加了 4 名达鲁花赤。蒙古还以高丽对其国书所定事项未付诸实施为借口，拘禁了高丽使臣池义深。高丽对此很愤慨，让内侍尹复昌到北界各省没收达鲁花赤的弓箭。尹复昌想把不听招呼的达鲁花赤处死，却反而在宣州被达鲁花赤所杀害。西北巡抚大将军闵曦得知后极其忿怒，让司录崔滋温谋杀了这个有血债的达鲁花赤。西京的人们得知这一信息，不禁惶恐，忧心忡忡道：“杀死了蒙古的达鲁花赤，西京定会像平州（现在的平山）那样被蒙古兵荡平。”有的人甚至对朝廷的军队有了反感。^② 当时，由于前次撒礼塔率军入侵，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3，世家高宗 19 年 5 月己酉，6 月甲子，7 月壬午，8 月己酉。

^② 对于蒙古军队的水战能力，也有另外一种看法。也就是说，蒙古军队曾远征西域乃至欧洲，抓了一些工兵技术人员做俘虏，以之为水军，充实了其兵力。蒙古军队还把俘获的高丽水军利用起来，建立了水军。所以称蒙古军队不能海战，攻克不了高丽江都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参阅朱采赫（音译）著《对于蒙古与高丽史的研究和商榷》，该文刊载在出版于 1989 年的《白山学报》第 8 期。蒙古军队于 1284 年到 1286 年攻打越南时，其海军曾多次遭到越南海军的攻击，竟致全军覆没。从这一史实看来，其海军的实力很弱应是确实的。参阅卢启铨著《韩国外交史论》一书的第 278 页至 286 页，该书由大旺社出版于 1984 年。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6，高宗 19 年 5、6、7、8 月。

雕成于高丽显宗之时的大藏经板已被烧成灰烬。^①

这年7月，有9名蒙古使臣来高丽，只呆了4天就匆匆回国。9月，高丽高宗就蒙古的来牒写了回函。从这封回函可知蒙古的通牒都提了些什么要求。这封回函的内容有：

(1) 蒙古责怪高丽，说4月间高丽的复函以花言巧语蛊惑人心为能事，蒙古军队一撤离就迁都于海岛。高丽这样变心，会不会是误听宋立章与许公才等荒诞无稽的蛊惑呢？蒙古表示怀疑。对于蒙古的责怪与怀疑，高丽的这封复函解释道：最近，宋立章确实说过蒙古将出大军征伐高丽，我们对此不能不相信。我（指高宗自己）大吃一惊，百姓也很害怕，纷纷逃之夭夭。百姓都逃跑了，叫谁来为蒙古服务呢？

(2) 对于因杀害达鲁花赤而正在被缉捕者一事，我深信贵国深知达鲁花赤在我国京城受到了极好的接待，我们从未违悖过他们的意旨。

(3) 蒙古方面认为高丽如果真心投降蒙古，就会对蒙古人表示欢迎，否则就会让军队杀害蒙古人。复函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迁都于岛上，是怕贵国的军队到我们的领土上来。我们投降于贵国的诚心，过去和现在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国好生爱护小国。

(4) 对于国王出迎之事，去年11月，我们派使臣（指闵曦）谈判，贵方让我们改派大官，我们便派出了大官，没让国王去迎接贵方的使臣。然而，贵方又让崔令公（即崔瑀）出迎。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办才好呢？但愿贵方能体谅我们的困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9月壬午：“显宗时，板本毁于壬辰蒙兵。”参阅池内宏著《蒙古的征伐高丽》，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14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研究》第10期，见其第184页的注2。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15页。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境，对我们多多宽容和谅解。

(5) 关于委派赵叔昌与兵马使宋立章一事，赵叔昌与宋立章从贵国归来时不幸都染上疾病，至今尚未痊愈，无法立即委派他们前往。宋立章此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动摇人心，使得百姓纷纷逃跑，也使我们不得不迁都，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赦，因此，我们早已让他返回故乡。现在根据贵国的要求，我们已派人到岛上把他抓回，特此告知。^①

高丽上呈蒙古的陈情书有如下几项内容值得玩味：

(1) 对蒙古欲出兵攻打万奴（即东真），而要求高丽派出援军的问题，高丽的答复是：高丽原是小国，前年又遭到蒙古军队的蹂躏，现在剩下的百姓已不多，幸存者也都是老弱病残，实在无法应命去助贵军一臂之力。

(2) 对于蒙古让高丽高宗亲自到蒙古朝觐蒙古皇帝的问题，高丽的回答是：自从蒙古太宗即位以来，高宗就应当去蒙古，只是小国的王位不可一日无王，是以无法成行，还请多加原谅。

(3) 关于对高丽人口进行调查而向撒礼塔报告的问题，高丽的答复是：高丽百姓听说蒙古军队又将入侵，都惊惶不安纷纷逃往深山僻壤。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交给撒礼塔，高丽叫谁把贡物交纳给贵国呢？万望多多加以谅解。^②

从上述的答复看来，与其说是想答应蒙古的要求，不如说主要是加以辩白和请求谅解。高丽迁都于江华岛之后，如果不善于水战的蒙古军队敢于前来侵犯，高丽显然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是决心加以反抗。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高宗19年9月。参阅《元史》，列传，洪福源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9月。《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9年9月。

高 丽 外 交 史

蒙古太宗得知高丽权臣崔怡等主张实现强硬的抗蒙政策，便于1232年8月，命令撒礼塔率领蒙古军再次入侵高丽。^①这便是撒礼塔第二次入侵高丽。洪福源竟率领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助纣为虐。^②

撒礼塔率蒙古军一闯入高丽，首先就抓住高丽迁都江华岛一事大做文章，要求国王高宗离开江华岛出陆，高丽不肯答应。同时要求崔令公（即崔怡）出陆，高丽自然予以拒绝。^③于是，撒礼塔暂停攻打开京与江华，挥军南下，攻打汉阳山城（现在的汉城）。年底，攻打水州（现在的水原）的处仁城。在这次战斗中，高丽军的和尚金允候英勇无比，一箭射死了侵略者撒礼塔。^④

当时，高丽给东真国送去了一份国书，它充分地体现了高丽对蒙古的看法和对丽、蒙战争的策略。它写道：“蒙古也者，既残忍而又精于猜忌，尽管与之敦睦也无法相信它。高丽与之和好，决非出自本意。然而，在己卯年（高宗六年）迫于江东的形势而不得不与之媾和。几年前，蒙古军队前来之时，他们撕毁盟约，背信弃义，胡作非为，我们曾不问究竟是谁之错而以礼相待如初。如今，我们已迁都于海上，他们兴兵打了进来，我们待之更加优礼，他们对我们的土地却蹂躏得更凶恶，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州郡或者关起城门坚守城池，或者互相搞好联防静观其变。而他们却更加贪得无厌，一心只想攻占。有时，我们

① 参阅《元史》本纪，太宗4年8月。《元史》，洪福源传与高丽传。

② 参阅《元高丽记事》太宗4年条。《元史》卷208，高丽传。

③ 参阅《东国李相国全集》卷28的《答蒙古官人书》（壬辰9年），《答沙打官人书》（壬辰11年）和《陈情表》。

④ 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金允候传。《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9年9月。《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9月。参阅《东国輿地胜览》10，京畿龙仁县处仁城条。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17页。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的百姓忍无可忍，出城与之战斗，他们的不少官兵或被打死或成为我们的俘虏。今年12月16日，我们在水原的处仁部曲小城与之接战，射死他们的魁首撒礼塔，抓到了不少俘虏，蒙古军的其余兵卒一哄而散。蒙古军因而大挫元气，有回师之势。当然，他们不是聚集起来一同回去，而是或先或后自东或自北撤离，何时全部撤离完毕不得而知，他们向何处奔逃亦无法知晓。敬请贵国（东真）为我们秘密侦察为荷。”^①

撒礼塔被高丽军队射死后，继之指挥蒙古军队的副帅铁哥（亦称帖哥或特尔格）率领残兵撤走。

第三节 唐古入侵

蒙古军队由于统帅撒礼塔战死而从高丽撤走后，高丽于1233年（高宗二十年，蒙古太宗五年）3月，曾派司谏崔伶到高丽古讨论善后之策，却因道路被阻而返。4月，蒙古太宗列举高丽的五罪而让其部属知晓。这所谓的五罪是：（1）平定契丹逆贼、派人杀死塔刺（指著与古）之后，从未派使臣来蒙古。（2）蒙古太宗命令使臣带其谕示到高丽，高丽不予接待，使臣只好悻悻而归。（3）明明是高丽人杀死了著古与，却谎称著古与系为万奴的百姓所杀。（4）蒙古太宗让高丽高宗入朝，他竟敢抗拒不来而与大臣一起躲到岛上。（5）让你（指高丽的高宗）调查百姓户口速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高宗19年12月。参阅《元史》本纪，太宗4年条：“太宗四年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元史》，洪福源传和高丽传也称撒礼塔“中流矢卒”。

速报告，却顶着不办，所报来的是虚假数字。^①

高丽在射死蒙古军队统帅撒礼塔，迫使敌军撤走之后，为了收复被蒙古占领的北部几个州县，于10月派上将军郑毅（一名郑颢）和朴禄全为宣谕使去西京，想让叛徒洪福源回心转意。西京人毕贤甫和洪福源不仅不回头，反而杀死了两位宣谕使。高丽权臣崔怡大怒，点起3000名家兵，让北界兵马使闵曦与之同行，去攻打洪福源等，于12月讨伐了西京的叛军，活捉毕贤甫，将他押往京都。崔怡命人将毕贤甫腰斩暴尸于街示众。洪福源逃往蒙古后，高丽将其父亲洪大纯（一名大宣）、弟弟洪白寿以及其子女全部逮捕，其残党也被活捉，全部转至海岛上。西京遂成空城。^②

蒙古太宗称赞高丽叛徒洪福源对蒙古忠心耿耿，让他到辽阳居住，跟随他的高丽人也都被安排到辽阳地区聚居。翌年，蒙古任命洪福源为官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他受封后，绞尽脑汁让高丽人归附。

当时，蒙古在高丽的势力暂时处于衰退状态。蒙古所设置的72名达鲁花赤的归宿虽无明文记载，却在撒礼塔战死之后悄然匿迹。他们或被编入军队，或回到了蒙古。

另一方面，高丽遭到蒙古军队的侵略之后，由于朝廷已迁至江华岛，北方诸城池相当混乱，防守也十分松散。所以，蒙古军队如果再度入侵，西京与王京很快又会落入其魔掌。尤其是此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0年3月、4月。《元高丽记事》是《经世大典》中的一篇，是《元史》高丽传的原据，载有五罪的全文。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0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0年5月，12月。《高丽史》卷121，列传34，忠义郑颢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66页至567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时，东真国也已被蒙古军队所占领，高丽西北面与东北面均已与蒙古相邻接，更有可能遭到敌人的侵略。

1233年（高宗二十年，蒙古太宗五年，金天兴三年，宋瑞平元年）9月，蒙古并吞东真国。翌年1月，金国也被蒙古所灭。由于要处理东真国与金国的善后问题，蒙古无暇顾及及其他。在一年间，蒙古未因撒礼塔的战死与洪福源的败走而对高丽采取任何措施。

1234年（高宗二十一年，蒙古太宗六年）秋天，蒙古在答兰答八思（Karakorum，即现在的 Erdenidsu 以北十里之处）召开大会。会后，一部分征战宋朝的军队开赴南方。1235年，其余的征宋军与西域征伐军也分别出动。唐古（一名唐兀台）率领军队于闰7月侵略高丽的安边都护府。^①唐古（前次撒礼塔入侵时来过的三个元帅之一）率领的蒙古军的侵略，从1235年7月到1239年4月，历时大约4年。

唐古指挥的蒙古军队以已经在辽阳落脚的高丽叛徒洪福源为向导，向东面进军。当时，其军队里有移刺买奴、王荣祖和吾也等将军。8月，蒙古军队长驱直入，攻陷龙岗、咸从、三登。9月，它与东真军队会合，攻克龙津镇（现在的德源）和镇溟城。10月，占领洞州（现在的瑞兴）。当时，高丽的夜别抄动员砥平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2年闰7月丙子：“西北面兵马使报：蒙兵侵安边都护府。”《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22年秋闰7月。

县百姓在深夜奇袭蒙古兵，打死不少敌人，夺得不少军马。^①

在此前后，蒙古的另一支军队从原东真国的领土上出发入侵高丽，在高丽东北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236年（高宗二十三年，蒙古太宗八年）6月蒙古兵又绕过鸭绿江，分别驻屯于北界的高丽各城，其先锋部队进入黄州、信州和安州。10月，蒙古军侵犯全州与古阜。1237年，蒙古军暂时休整。1238年4月，蒙古军占领庆州，烧毁黄龙寺。

当时，高丽诸城军民奋力守城，连女真人和汉人也参加了守城斗争。^②高丽还派出夜别抄，督励各地的守军抗御敌军，同时将百姓转移到山城和海岛，采取了清野战术。

这年12月，高宗派将军金宝鼎和御史宋彦琦到蒙古，要求蒙古撤军。翌年亦即1239年4月，蒙古派遣南可阿吧等20人到高丽下诏书，允诺可以命令唐古率领的蒙古军队撤出高丽，而其条件则是：“若能钦依元降诏旨，躬亲赴阙，所有一切，法制宣谕了毕，即当班师。尔等违背诏书辄来奏告，乞令军马回程，于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2年8月辛亥、癸丑，9月癸亥、辛未、丙子、戊寅，10月庚寅、辛丑、辛亥。当时，高丽军第一次大获全胜见诸历史记载：“九月戊寅，东真兵陷镇溟城。李裕贞等击蒙兵于海平，败绩，一军尽没。……辛亥，夜别抄与砥平县人夜击蒙兵，杀获甚多，取马骡来献。”参阅《高丽史》卷81，兵志1，五军条。《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22年8月、9月、10。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67页。

^② 参阅《东国李相国全集》卷28的《密告女真汉儿文》。当时，高丽朝野相信大藏经板佛力曾使契丹军不战自退之说，故而从显宗到文宗时期制作了大藏经板。大藏经板被蒙古军烧毁之后，此时又有人表示愿意再度制作大藏经板，祈祷让敌军退去。当时所谓部队，多则有三百名将士，少则指两骑至三骑。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理未应。”^①

然而，蒙古兵撤走之后，高丽国王并未到蒙古朝觐。从这年夏天到翌年年底，蒙古先后四次派使臣到高丽，催促高宗到蒙古朝觐，而高丽则先后五次派使臣去蒙古，说明高宗无法成行。^②双方使臣来往情况如下：1239年6月，高丽派卢演等到蒙古；8月，蒙古派甫加波下等137人到高丽；12月，高丽派新安公王佺和宋彦琦到蒙古，1240年3月，蒙古派豆满阿叱到高丽，高丽派卢演到蒙古；4月，高丽派金成宝到蒙古，6月派金守精去见蒙古军统帅唐古，蒙古则派多可、坡下道、阿叱等17人与新安公王佺来高丽；12月，高丽又派宋彦琦到蒙古。

1241年（高宗二十八年，蒙古太宗十三年）4月，高宗回避蒙古要他亲自朝觐的要求，让永宁公王埈冒充王子率10名贵族子弟到蒙古作人质。王埈当时才20岁。他随蒙古将军吾也而到蒙古的首都和林，与蒙古太宗会晤，然后到辽东与蒙古王女结婚，住在叛徒洪福源的家里。洪福源死后，他按照蒙古世祖的指示，统管在蒙古的高丽裔军民，在沈州（现在中国的沈阳）度过了一生。^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5年12月，26年4月：“二十六年夏四月，蒙古遣甫阿叱等20人赍诏来谕亲朝，王迎于梯浦馆。是月，蒙兵还。”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25年12月，26年4月。《元高丽记事》有这样的记载：“十一年己亥四月，奉旨遣宝鼎僚属校尉黄贞元、义州别将朴希实从诏使先还。五月一日降诏，征噉入朝曰：‘若能钦依元降诏旨，躬亲赴阙，所有一切，法制宣谕了毕，即当班师。尔等违背诏书，辄来奏告乞令军马回程，于理未应。’”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及《高丽史节要》卷16的有关年月日。其月日与史实有不符之处，需作进一步考证。

③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8年4月。参阅《元史》，地理志，沈阳路。《元史》，列传，王佺传。王佺20岁那年被送去作人质，去世于蒙古至元29年9月，享年61岁，一生怨愤。

高丽外交史

这年11月，蒙古太宗驾崩于漠北。从这时起到库里塔大会选定新的大汗为止，蒙古由皇后脱列哥那（乃马真氏）掌握大权。在这五年里（高宗二十八年11月到高宗三十三年6月），高丽与蒙古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蒙古太宗先后派军队征伐高丽三次，先后历时11年。第一次和第二次由撒礼塔指挥，第三次由唐古指挥。第一次入侵与蒙古媾和后，蒙古曾任命其达鲁花赤驻守于高丽。第二次入侵无此事。第三次入侵后，蒙古曾想又在高丽设置达鲁花赤，却因高丽反对而未能如愿。蒙古在第一次入侵后在高丽设置达鲁花赤，只是引起了高丽的反感。

第四节 阿母侃入侵

1246年7月，贵由成为蒙古的新合罕（即皇帝），是为定宗。定宗在其即位当年的冬天，命令阿母侃将军率领军队入侵高丽。

阿母侃以叛徒洪福源为走卒，侵入高丽西海道南边，在盐州（现在的延安）、威州（现在的熙川）、平虏镇（宁远郡德化面）摆下阵势。在江华岛的高丽朝廷于8月派起居舍人金守精到蒙古军营，犒劳蒙古军。阿母侃在率军入侵之前，于前年冬天派了400名蒙古兵，经由高丽北边诸城到遂安县，以抓水獭为名，对高丽的山川地理进行了侦察。不仅如此，这支侦察队还把躲藏在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山区的高丽百姓全部抓走。^①

蒙古定宗这次派阿母侃率军侵略高丽，所找的借口是高丽在定宗即位时未纳贡。唐古率领的蒙古军撤走后，蒙古多次派使臣到高丽催促高宗离开江华岛，高宗置之不理。蒙古定宗遂抓住这两点兴师问罪。

这次的丽、蒙战争从1247年7月到1253年4月，持续了大约6年。在这期间，蒙古军入侵4次，占领了14个城池。^②

高丽对于阿母侃这次率军入侵，在和、战两个方面都动了脑筋。首先，1248年2月，高丽派枢密院使孙汴和秘书监桓公叔到蒙古，交涉了蒙古军撤兵事宜。3月，又命令北界兵马使卢演动员北界各城百姓到海岛暂避，准备与蒙古军打持久战。^③ 10月，黄海岛按察使报告：“有40名夷狄骑兵以抓水獭为借口渡过清川江入侵！”高丽朝廷得知这种情况后，将开城的贵族全部送至江华岛。

这年10月，高丽又派郎将张俊贞和祗候张晔到蒙古谈判，让蒙古军队撤出高丽。^④

在阿母侃率军侵略高丽期间，蒙古定宗于1249年1月撤手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4年7月、8月乙巳。《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34年8月。参阅《元高丽记事》，定宗皇帝2年丁未，“命将阿母侃与洪福源一同征讨，攻打威州平虏城。”参阅《元史》，列传，洪福源传：“定宗命阿母侃将兵，与福源共打威州平虏城。”

② 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1页。

③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5年2月、3月。《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35年2月、3月。当时，有百姓集结的海岛不只是江华岛，西海岸诸海岛都有百姓，定州郡的苇岛也是如此。

④ 当时，高丽朝廷把贵族们派到开城，轮流派出守卫开城。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5年10月壬午、壬辰。《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35年10月。

人寰，高丽掌握实权者崔怡则死于1249年11月。在高丽，崔怡子崔沆继其父执掌高丽的军政大权。而蒙古政坛在进行了剧烈的夺权斗争之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于1251年6月登上大汗的宝座，他就是蒙古的宪宗。

宪宗即位后，蒙古为了收拾丽、蒙战争的局面，也像高丽一样从和、战两个方面大耍手腕。1249年（高宗三十六年）4月和6月，高丽先后派金子珍和安戩作为使臣到蒙古。由于两国之间协商进展得不够顺利，蒙古军于9月入侵东州（现在的铁原）、东城和杆城。高丽指谕朴天有带领别抄兵击败了蒙古兵。

1250年1月2日，高丽派崔章著和崔滋到蒙古。据3月间从蒙古归来的崔章著报告，蒙古要求高丽“将宗亲与洪福源父子送到蒙古！”6月，蒙古使臣多可和无老孙等62人到高丽，了解高丽朝廷离开江华岛的状况，到昇天府馆，要求高丽国王到江外迎接他们。然而这分明意味着投降。高宗未去，派去年闰6月从蒙古归来的新安公王佺把他们迎接到江华岛。6天之后，高宗在寿昌宫设宴款待蒙古使臣。^①

这年12月，蒙古使臣洪高伊等48人前来高丽，下榻于升天馆，提出要高丽国王出迎。只要国王出迎，他们便回国。于是，高宗于翌年，亦即1251年1月在梯浦宫设宴款待洪高伊等。洪高伊在宴席上说：“尔国北边已被破坏得很惨重，就像住宅没有了篱笆一样，又怎能迁都回旧京（即开城）呢？必须兀自以大江为天堑巩固国防。我回国后一定奏明皇后（定宗之后，宪宗尚未即位），使她对东方不致这么厌烦而东扰。”他真可算是比较体谅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7年6月庚子、乙巳：“蒙古使多可、无老孙等六十八人来审出陆之状，到昇天府馆，责王出迎江外。王不出，遣新安公王佺迎入江都。”参阅震坛学会编《高丽史·中世篇》一书的573页。

第十三章 丽、蒙战争（一）

高丽其时的处境。^① 6天后，高宗命令接待官设宴款待洪高伊等。洪高伊想准确地了解高丽朝廷的意向，便问道：“尔国既降欲就陆，何以城为？”意思是询问为何在江华岛上筑城。接待官答曰：“宋贼船往来，故如城以备，实无他也！”^②

4天后，洪高伊等回国。高丽权臣崔沆向高宗敬酒，并在宫中设宴，祝贺与蒙古使臣谈得投机并将其顺利打发回蒙古。也就是说，不想离开江都的国王和大臣们以巧言和虚言蒙骗了蒙古使臣而求得暂时的安宁，竟摆设酒宴加以祝贺。

于这年6月登上皇帝宝座的蒙古宪宗，于10月派将困和洪高伊等40人作为使臣到高丽。他们见到了高宗，告之以蒙古宪宗的即位，要求高宗到蒙古朝觐宪宗，并还都开京。

高宗为此召开重臣会议，讨论如何就这两个要求对蒙古作答。一部分重臣建议让太子代替国王前去朝觐，以收拾高丽面临的事态。另一部分重臣则认为可以国王年迈有病为借口加以婉拒。倘若对方的态度强硬，届时让太子代替国王去朝觐，也为时不晚。

于是，高丽对蒙古第一个要求的答复是：国王老迈多病，无法亲自去朝觐。^③ 对于蒙古提出的第二个要求，亦即出陆还都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38年正月壬戌：“王在梯浦宫宴洪高伊。高伊谓曰：国之北鄙，残破已甚，与家无藩篱，何可复都旧京？宜据江以自固。我当归奏皇后无令东扰。”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世家高宗38年正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38年正月丁卯、癸酉：“丁卯，王命馆伴宴蒙使，蒙使曰：尔国既降欲就陆，何以城为？对曰：宋贼船往来，故如城以备，实无他也。”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38年正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8月戊午：“帝虑国王，称老病不朝，欲验真否，王之来否，限六日再来报。”

问题，高丽于1252年1月派使臣李峴到蒙古进行交涉，高丽朝廷对他说：“他们如问及高宗的出陆，可答之曰：今年6月。”蒙古宪宗询问时，李峴果然这样回答。蒙古宪宗遂未让李峴回国。^①

李峴被扣留后，高丽于5月在打算建造宫阙的昇天府白马山麓筑城郭，给人们以高宗与朝廷将出陆的假象。然而时至6月，高丽并未像李峴向蒙古宪宗所说真正出陆。

7月，蒙古宪宗派多可、阿土等37名使臣到高丽，对他们说：“汝到彼国，王出迎于陆，则虽百姓未出，犹可也。不然，则待汝来，当发兵致讨。”蒙古的这一计划，被尚在扣留中的李峴和与之同行的书状官张镒知道，跟随多可到高丽的张镒将这个情报秘密地报告了朝廷。高丽高宗待多可等使臣到来后，派新安公王佺出迎，把他们迎至岛上的梯浦馆，高宗接见了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洗尘。宴会尚未结束，多可等以高丽国王不从蒙古皇帝之命，怒而拂袖返回昇天馆。^②

尽管如此，高丽国王还是根本无意朝觐蒙古皇帝，亦即无意投降于蒙古。然而，蒙古却坚定不移地通过高丽国王亲自朝觐蒙古皇帝这个要求，要求高丽对蒙古投降。

^① 参阅《高丽史》24，世家高宗39年正月丙午，5月。参阅《高丽史》129，列传42，叛逆3，崔忠献传，附崔沆。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38年10月乙巳，丙辰：“乙巳，蒙古使将困等人江都。丙辰，王命宰枢及文武四品以上议答诏。或言太子亲朝，或言王老病未得亲朝为辞，待更诘，遣太子亲朝未晚。”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38年10月。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39年7月戊戌：“蒙古使多可、阿土等三十七人来，帝密敕多可等曰：‘汝到彼国，王出迎于陆，则虽百姓未出，犹可也。不然，则待汝来，当发兵致讨。’多可等至，王遣新安公王佺出迎之，请蒙使人梯浦馆。王乃出见。宴未罢，多可等以王不从帝命，怒而还升天馆。”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39年7月。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第一节 也古入侵与王子充人质

蒙古一心想通过高丽国王的出陆与亲赴蒙古朝觐蒙古皇帝而接受高丽的投降，未能如愿之后，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便由外交交涉变成了诉诸武力。

1253年（高宗四十年，蒙古宪宗三年）4月，在被蒙古军队抓到蒙古的高丽百姓之中，有人得以回到高丽。他对人们说：“阿母侃与洪福源曾向蒙古宪宗奏报：‘高丽在江华岛上筑城，不想出陆，毫无投降之意。’于是，蒙古宪宗命令其弟松柱率领一万将士，经东真攻入高丽的东面境界，命令阿母侃和洪福源率领蒙古军队入侵高丽北面的边界。现在这两支部队都驻扎在大伊州。”^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4月甲寅。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2~223页。

这年4月，蒙古宪宗命令也古率军征伐高丽。^①也古于5月派遣职阿豆等16人到高丽探问了高丽的局势。高丽高宗在江华岛的梯浦宫（现在的升天浦附近）接见了他们，赐给他们不少金银财宝。

也古虽然接受了蒙古宪宗领兵出征的命令，却听取被扣留在蒙古的高丽使臣李颯的意见，等候秋收时期到来，到7月间才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②

当时，高丽的防护别监权世候率领军民守卫椽山城。此城防守固若金汤。1252年7月蒙古使臣怒不可遏归国之后，高丽朝廷估计蒙古必然出兵，便派出将军们到各山城率领军民防卫，权

① 参阅《元史》本纪，宪宗2年冬10月：“命诸王也古征高丽”。这一记载年月也与史实不符。也古，在《元高丽纪事》和《元史》的宪宗纪、洪福源传、王埙传里，记载为耶虎，王荣祖传则记载为也忽。1241年，被称为王子而到蒙古充人质的永宁公王埙，此时随也古来侵，率军包围忠州。为此高宗曾写信给他，说道：‘当年让你充作人质时，你是怀着为国牺牲的壮志而去的。你被扣留12年之久，我知道你有不少苦楚，但你怎能背叛国家而成为敌人侵略我国的马前卒呢？’高宗在信中忠告他道：‘快让你忠诚于祖国的精神复萌，解除对忠州的包围，赶快回头反戈一击。’然而，永宁公并无回心转意的迹象。1253年（高宗41年），蒙古弄清永宁公不是高丽王子，却高度评价他对蒙古的献身精神，以阿母侃的300匹马送给他做礼物。叛徒洪福源依附蒙古，带领蒙古军侵略与搜刮祖国高丽，为高丽人民所不齿。这个家伙瞧不起永宁公，永宁公的夫人（蒙古王族）大怒，向蒙古宪宗告发洪福源，宪宗将洪福源处死。参阅《高丽史》卷90，列传3，宗室1，显宗朝平壤分传附永宁公王埙。《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5月丙申，7月甲申：“七月甲申，北界兵马使报：蒙兵渡鸭绿江。”《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李颯传：“使于蒙古，被留二年，说也窟曰：‘我国都介于海岛，贡赋皆出于州郡。若于秋前奄袭州郡，都人必窘。’遂受金牌，导也窟而来，随蒙古兵谕降诸城。”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3页。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世候受命捍卫棕山城。北面边界诸州由于多次蒙受战乱；其老百姓已迁徙至开城或黄海道，守城者寥寥无几。所以，也古的军队一过鸭绿江就进驻西海海岛。8月，他们占领被认为坚不可破的棕山城，屠杀城中的4700多名百姓，把妇女儿童作为俘虏分给了其士兵。^①

另有3000名蒙古兵侵入东面边界，进驻和州（现在的永兴）与高州（现在的高原）。他们是松柱麾下的军队，经东真国故土越过铁岭，闯入东州（现在的铁原）。东州山城的防护别监白敦明率领军民抗敌，却因指挥不当而失守。^②

也古一方面领兵入侵，另一方面派人到高丽朝廷转达蒙古宪宗的诏书。该诏书列举六事责备高丽高宗，声称：“由于尔等抗旨不恭，特派皇叔也古（一名也窟）率军征伐。如能遵旨，可以收兵。倘若继续违抗，严惩不贷。”

蒙古宪宗所谓的六事，是当时蒙古征服其他民族与地区之后统治形态的表现，包括：（1）纳质（人质）；（2）助军（出动军队帮助蒙古军队）；（3）输粮；（4）设驿；（5）供户籍数；（6）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1，列传14，文汉卿传附权世候。权世候在防御蒙古兵时，棕山城四面皆是高耸的岩壁，只有一条路仅可通单人单骑。他以此城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常常酗酒疏于防备，时而口出狂言轻视蒙古兵。蒙古军队驾炮攻城门，攻破之后，向里面射箭，箭如雨下。又驾起梯子，爬到城上射火箭，使得城中房屋被烧毁。然后蒙古兵从四面涌入，此城终被其攻陷。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1，列传14，文汉卿传附白敦明。白敦明作为东州山城的防护别监，把百姓赶入城内，禁止其出入。州吏告之曰：“水稻尚未收割，在敌兵到来之前，应当组织百姓轮流到城外收割水稻。”白敦明不予理会，反而责备这位州吏。于是，人心愤慨都欲杀死白敦明。蒙古兵兵临城下，白敦明想以600名精兵抗战，而兵卒不想参战，纷纷逃走。金华监务知道此城必被攻陷，带领州吏逃之夭夭。蒙古兵终于攻进城内，杀死白敦明及此州的副使、判官以及金城县令等，而将妇女和小孩抓走。

置达鲁花赤。此六事的形式，蒙古也用之于当时的越南。^①

高丽当即派郎将崔东植到驻屯在土山（现在的祥原）的蒙古军营，对也古说道：“我们自臣服蒙古以来，忠心耿耿遵命唯谨，只求千秋万代无忧无虑。没想到贵国大军又打了进来，不知是何缘故，以致举国失措。但愿大王体谅我们的苦心，可怜生民涂炭。”也古对崔东植说：“高丽国王自称老病不能入朝，蒙古宪宗甚是关心，想确认是否属实。你们的国王到底能不能到蒙古来朝觐？限你六天时间前来作答！”崔东植答道：“如今正遭难，我们的主上怎能很快去贵国呢？”也古反问道：“那你怎么就能前来？”^②

当时，被扣留在蒙古军中的永宁君王埈和业已被扣留在蒙古达两年之久的李岷分别致函权臣崔沆。永宁君王埈在信中写道：“蒙古皇帝吩咐我：‘尔回国去，说明朕的旨意，让你们的国王和朝廷出陆。’因此，我于6月初到也古大王处作了详细的报告，然后随军来到了这里。……蒙古皇帝还命令也古，倘若国王出迎，即可撤军。现在，国运危在旦夕，倘若国王无法出迎，也可由太子或安庆公（高宗次子，元宗弟弟）出迎。这样，他们一定会收兵。倘若这样做蒙古军队还是赖着不走，灭了我一家亦可。万望切勿生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李岷在信中写道：“我已

① 参阅《元高丽纪事》卷11。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3年12月乙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3年12月。《元史》卷209，安南传，至元4年9月。参阅卢启铨著《安南的对元战争与外交政策》，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84年的《韩国外交史论》一书的第270页至294页。参阅高柄翊著《蒙古与高丽的兄弟盟约的性质》，该文刊载在《白山学报》第6期，见其第70页至71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8月戊午、己未。《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8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2页。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在此羁留了两年。从蒙古的情况看来，与过去所闻很不相同，他们并不是随便草菅人命。……今年，蒙古皇帝所下的谕旨并非那么难以办到，为何国王就不能出迎？……现在，如能让东宫太子或安庆公出迎，辅以真心相告，他们肯定会撤兵，仰公深思明裁！”^①看来，他们两人在蒙古军的军营中商议后，才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建议。

翌月（8月）庚午，高丽高宗召集大臣们商议，垂询道：“怎么办？是让东宫（高宗的世子）还是让安庆公（高宗的次子王湑）带一名三品官去向蒙古军队求降？如果不这样，又该怎么办？”大臣们都认为应当出迎。然而，权臣崔沆说：“每年春秋两季均已向蒙古纳贡，又曾前后三次派使臣前往，至今有300人尚未归来。到了这等地步，现在即使出迎也已无济于事。倘若蒙古军把东宫或安庆公扣下，然后兵临城下强迫我们投降，届时如何对付？”大臣们一听，改口说：“侍中（指崔沆）言之有理！”遂做出决定，干脆不出迎。^②

9月，高丽派大将军高悦去见也古，对他说道：“高丽决不会抗旨，正在做出陆的准备。……而今，大军入境，举国惊恐不知所措。倘若大王回师，让我们安下心来，则主上便可亲率臣子出迎聆听教诲。这种情况，只要大王派一两名使臣打听，便可知分晓。”说罢，献上了许多金银财宝。同时，又给阿母侃送了物品，请也古转交。

也古扣留了高悦和崔东植，打发李松茂回去，说道：“尔去把全国各城的降表拿来见我！”高宗听了李松茂的奏报，召集大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9，列传42，叛逆3，崔忠献传附崔沆。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8月庚午。《高丽史》卷129，列传42，叛逆3，崔忠献传附崔沆。

臣商议，然后向也古作了这样的回答：“大军如若撤走，君臣必然出陆。否则，州县无法降服（亦即割让）。”

15天后，高悦与也古交涉完毕，回高丽朝廷奏报：“也古坚持其主张，声称如果国王出降，蒙古军立即撤走。否则，较量较量再作道理。”看来，也古在这一点上丝毫不肯让步。^①

也古边与高丽方面的使臣协商，边继续挥师进攻。就在此际，高丽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忠州和甲申有过接战。高丽军队守住了城池。而春州城、杨根城（现在的杨州）、天龙山城和襄州城则被敌军攻陷。^②

面对蒙古强硬的出陆要求和作战的失利，高丽朝廷开始动摇。10月，高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讨论如何才能使蒙古军队撤走。大臣们认为最好是让太子出降，权臣崔沆也不敢再坚持己见，表示同意。高宗见大臣们的态度如此明朗，便在8天之后派永安伯王僖和仆射金宝鼎去向也古送上了降表，并向阿母侃、弓悦、王万户和洪福源等分别送了土产品。^③

这时，也古在忠州患上了疾病，请占卦者占卜，占卜者说的是：“久居于此，难以返回。”于是，也古让阿母侃与洪福源继续留在高丽，自己则率领1000名骑兵退回蒙古。当时，永安伯王僖等到开城的保定门外，为也古饯行，送给他不少礼物，请他让蒙古军队全部撤离。而他还是那句话：“只要国王出陆迎接我国的使者，我们就回师。”他当即派了蒙古大等10名使者到高丽朝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9月戊寅、甲辰。《高丽史节要》卷17，世家高宗40年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9月乙酉、癸巳、丙申，10月丙午、己酉、甲寅、丙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9月、10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10月辛未，11月戊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10月、11月。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廷进行交涉。^①

高丽高宗出江华岛，在昇天府新落成的宫殿里迎接蒙古使臣蒙古大。蒙古大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高丽王早能这样，高丽百姓每天可以少死几千乃至几万名。”他还说：“也古的话就是蒙古皇帝的话。我所传述的也是也古的话，还是快快出陆吧！”高宗一听，又回到了江华岛的宫殿里。也古又派胡花到高丽朝廷，传述了设置达鲁花赤和拆毁城墙的要求。胡花却趁机向高丽朝廷索求金、银、水獭皮和苧麻布。

于是，高宗致函也古作了这样的答复：“回想起来，我从未出迎过使者。尤其是在天冷风厉之时，我这老病之躯怎能渡海？然而，我还是按照皇帝的指示，率领群臣迎接了蒙古的使臣，因为我相信大王的一诺千金，会让蒙古军撤走。而今，听说皇帝要在这里驻军上万，还要设置达鲁花赤。果是如此，怎能保证绝无后患？叫我怎生了无忧虑地回到开城？但愿将这一切作罢。至于拆毁城墙一事，从我国的风习着眼和从防备海盗看来，均属不可取之举，请收回成命为荷。”高宗又致函胡花，答道：“所要之金银自古以来非我国所产，一时难以筹措。水獭皮与苧麻布，在此战乱之后，百姓已四下逃散，也无法筹集。故而只能送上若干，还请多多谅解。”^②

进入这年12月之后，高丽加紧了高丽太子到蒙古朝觐蒙古皇帝和蒙古军撤走的问题的交涉。高丽高宗接见了阿母侃等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11月庚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11月。《元史》记载：蒙古让也古撤走其率领的高丽征伐军，是因为他怀着私怨率军袭击过塔刺儿。《元史》本纪，宪宗3年正月，“诸王也古以怨袭诸王塔刺儿营。……罢也古征高丽兵，以札刺儿带，为征东元帅。”此处的年月有错，与史实不符。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11月丁酉、戊戌。《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11月。

使臣，当面答应让次王子安庆公王湑到蒙古朝觐。于是，蒙古军队首先解除了对忠州的包围。

安庆公王湑果然如约到了蒙古。1254年正月3日，安庆公先到蒙古军的军营，设宴款待蒙古军将领，请他们欣赏音乐，品尝美酒佳肴，同时要求其撤军。于是，阿母侃和洪福源在也古回蒙古一个月之后，率领蒙古军队撤出了高丽。^①

高丽朝廷在蒙古军队撤走之后，根据情节轻重对在这次战争中有叛国行为者一一作了处置。在大臣会议上，大臣们纷纷提出：“李岷身为宰相竟然叛国事敌，应当诛其一族。”于是，将李岷绑赴人山人海的市场上斩首示众，没收他的全部家产。他的儿子李之瑞、李之松、李之寿、李之柏和李之年全部被扔到海里溺死。他的妻子、姐妹、女儿、女婿则被发配至荒岛之上。^②敌人来犯时不加抵抗竟乖乖投降的天龙城别监赵彦邦和黄骊县令郑臣旦也被流放于荒岛。

安庆公到达蒙古后，蒙古才知他是真正的王子，而前次到蒙古去的永宁公王焯则不是真正的王子。这样一来，便引发了新的问题。当时，黄骊县人闵称向蒙古的宪宗告密，说道：“王焯不是高丽国王的亲儿子。蒙古撤兵后，高丽朝廷诛杀了李岷的三族，向蒙古俯首投降的各城将军也都已被处决。”蒙古宪宗一听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12月壬子、壬戌、壬申；41年1月丁丑。《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0年12月，41年1月。《高丽史》卷99，列传12，崔淮清传附崔璘。让安庆公到蒙古交涉撤军一事，起初高宗不允。崔璘独自向高宗进谏：“爱护子女，不分贵贱，尽人皆然。……而今，百姓得以幸存者十中仅有二三。蒙古军如不撤走，百姓无法务农，只好向敌人投降。尽管江华岛可以保存，而国将不国。”高宗觉得他说得中肯，才答应让安庆公去蒙古。大臣们主张让金宝鼎陪同安庆公前往，高宗让崔璘取代金宝鼎。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12，叛逆4，李岷传。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十分恼火，开始追究王缙与高丽朝廷的责任。

蒙古宪宗向王缙问道：“你为什么自称王子？”王缙说：“臣从小在宫中长大，一向管国王叫爸爸，管王后叫妈妈，以为自己是他们的亲生儿子。现在前来的使臣崔璘是当时送我来做人质者，可向他垂询！”宪宗询问崔璘，崔璘说：“王缙是国王的爱子，但是不是亲子。当时上呈的表文写得很清楚，不妨查一查。”蒙古宪宗说：“爱子与亲子有何不同？”崔璘答道：“所谓爱子，就是抚养他人之子，爱之有如己出。如果自己的亲生儿子，何必称之为爱子？”蒙古宪宗把高丽上呈的表文一看，见上面写的都是爱子，便没再提及这个问题。^①高丽朝廷行文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故而未露破绽。至于李岷等被处决一事，蒙古对高丽朝廷进行了追究。这一点容后再加说明。

在忠州战争中，金允候作了不屈不挠的抵抗。忠州城当时被围困了70多天，军粮已经吃尽。金允候激励百姓道：“只要大家肯齐心协力，不分贵贱给予官爵！我会向朝廷奏明大家的功劳。”他把百姓的卖身契付之一炬，把缴获的牛马分给百姓。结果，军民戮力同心，终于使忠州城未被敌人攻陷。^②

第二节 车罗大两度入侵与金守刚的外交手腕

蒙古将军车罗大也率领军队侵略过高丽。他的第一次率军入侵是从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蒙古宪宗四年）7月到1255年

^① 参阅《高丽史》卷99，列传12，崔惟清传附崔璘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16，金允候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17页。

2月。高丽因此损失惨重。

蒙古的这次入侵，借口是要高丽答应蒙古的两个要求：把京都迁回开城和国王到蒙古朝觐蒙古皇帝。蒙古认为高丽口头上表示把京都迁回开城，实际上则是顶着不办。其意思很明显：也古军队的撤出，旨在检验高丽的诚意，看高丽如何满足蒙古提出的要求。

高丽在安庆公王涓（高宗次子）到蒙古后，于同年3月又派秘书少卿李守孙和四门博士金良莹到蒙古（他们被扣留蒙古达3年之久，死于蒙古懿州）。闰6月，又派中书舍人金守精到蒙古。他们的使命，是感谢蒙古撤军，增进两国友谊，使两国永不交战。然而，蒙古并不满足于安庆公的朝觐和这些使臣的来往，认为高丽国王到升天府的出迎是伪装出陆，是假象，而处决李岷等叛徒则是对蒙古明目张胆的反抗。于是，蒙古宪宗下令再次出兵攻打高丽。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蒙古宪宗四年）7月，据从蒙古归来的安庆公随行人员闵仁解报告，当时，蒙古的宪宗已决定由车罗大带兵入侵。^①

1254年春天，蒙古宪宗命令车罗大（又叫札刺儿带、割刺鰓）领兵，以高丽叛徒洪福源为向导，再次征伐高丽。车罗大接到命令，在辽东地区做好了出征的准备。

这年7月7日，安庆公王涓的随行人员闵仁解与蒙古使臣多可等50人来到高丽。闵仁解立即把自己得到的蒙古军由车罗大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7月丁巳。参阅《元史》本纪，宪宗3年正月条：“以札刺儿带（车罗大）为征东元帅。”4年春条：“遣札刺亦儿部人火儿赤（火儿赤系职名，有箭筒士之意）征高丽。”5月条：“是岁，改命割刺鰓（车罗大）与洪福源同征高丽。”这三种记载，所记述的是同一种事实。第一种记载的年月与事实不符，第二种记载的“春”与史实相符，第三种记载转述了《经世大典》（无高丽纪事）的资料，却把4年错记为5年。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率领即将入侵的情报报告朝廷。高宗得知这一信息，立即从江都（现在的江华）来到升天府新建的宫殿，接见了多可等蒙古的使臣。多可等把蒙古宪宗的诏书交给高宗。蒙古宪宗的诏书写道：“高丽国王虽然已经出陆，而侍中崔沆、尚书李应烈、周永珪、柳璩等并未出迎，这能算是真正的出陆吗？”接着，他对高丽处决投降蒙古的官吏一事表示抗议。于是，高宗让并未被处死而只是被流放于荒岛的赵邪彦和郑臣旦出来见多可等，说明高丽并未做得那么绝。^①多可等无话可说，答应回去后奏明宪宗，让蒙古军撤走。

据西北面兵马使报告，车罗大的5000名侵略军于7月22日跨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尽管蒙古使臣多可等已经许诺：“我们一走，蒙古大军也会回师”，而这支侵略军在多可等走后刚刚过了一两天就闯入了西海道。^②多可等人是蒙古在车罗大与高丽叛徒洪福源等率领蒙古军队从辽东出发踏上侵略征途时派出的使者，派他们到高丽的目的，是了解高丽的屈服程度，为这次侵略制造借口。于是，高丽国王与朝廷未迁回开城，国王自己也未去蒙古朝觐，这便成了蒙古军队再次入侵的借口。

车罗大率领蒙古军队的这次入侵，从1254年到1259年（高宗四十六年，蒙古宪宗九年），前后持续了6年，继撒礼塔两次入侵之后而发生的唐古率军入侵（蒙古太宗七年到十一年），时间刚好一样长。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7月丁巳、戊午年。《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1年秋7月。参阅《元高丽纪事》宪宗4年甲寅：“改命割刺解与洪福源同征高丽。”

^② 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24页。《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1年7月：“多可还，附表请罢兵时，多可给云：吾归则大兵可回，国家信之。”

7月29日(戊辰),有3000名蒙古骑兵在峡溪(现在的新溪)摆下阵势。8月7日(丙子),蒙古兵迅疾来到广州。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分别派出80名夜别抄在庆尚道和全罗道捍卫开城。

8月19日(己丑),车罗大带着到过蒙古的安庆公王湑在开城附近摆阵,让王湑回到江都。王湑一到江都,便派人禀告父王:“臣久为腥膻所熏染,待过了一夜之后再晋见父王。”高宗说:“你走后,为父祷告上苍,求助菩萨,只望早日再见到你。而今你幸而生还,何必在宫外过夜!你把穿着的衣服焚化,换上干净的衣服,快快前来与为父相见!”于是,王湑当即得以进宫。高宗见了儿子不禁泪流满面,左右近侍也泪如雨下。这充分表明高丽君臣当时对蒙古的侵略多么愤慨,对自己的处境却又多么无可奈何。^①

蒙古军队于8月20日(庚寅)派军队到槐州城(现在的槐山),散员张子邦率领别抄军将其打败。

8月22日,高丽高宗命大将军李长到蒙古军指挥所的普贤院(现在的长湍),向车罗大、余速秃、甫波大等蒙古将军和永宁公王湑和洪福源等赠送了金银财宝。李长归来后奏报:“车罗大云:君臣百姓出陆,则尽剃其发,否则以国王还。如一不从,兵无回期。”^②

蒙古的要求,本来就是要国王亲自到蒙古朝觐,而不是要王子入朝。看来,这一次的态度比以往要强硬得多了。所谓剃发,就是要高丽百姓在发式方面与蒙古人一样。蒙古想让高丽在风俗方面大变革,沿用蒙古的风俗。

^① 参阅《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安庆公湑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8月壬辰。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高丽当然无法就范。于是，蒙古于9月把原东真国军队投入东北面的进攻，而车罗大则率军攻打忠州山城。当时，山城的高丽军民在风雨交加中同敌军奋战。蒙古军攻打不下，转而攻打尚州山城。僧侣洪之在山城射死敌人的第四个头目，又歼灭了许多敌军，敌人只好解围而去。^①

10月，高宗派参知政事崔璘到车罗大设在峡川的指挥所，要求蒙古撤军。崔璘经过多次交涉，于12月返回朝廷奏报：“车罗大言：‘崔沆奉王出陆，则兵可罢。’”从这种情况看，蒙古的意志还是十分坚定，不似以往那样易于松动。蒙古的态度如此强硬，高丽的受害程度也就可想而知。这一年，被蒙古军抓走的高丽男女共有206800多名，百姓蒙受战祸而死去者难计其数，敌人所攻打过的州郡都变成了废墟。在蒙古军队的多次入侵中，高丽此次受害最深，被掳人数最多。^②

这时，到公山城（现在的大邱）避难的高丽百姓已经绝粮，城里饿殍遍地，老弱者尸体填满了坑洼与沟壑。有的百姓出于无奈只好把婴孩放在树下含泪而去。由于兵祸与饥饿的折磨，触目可见骸骨遍于原野。从蒙古兵手下逃出的百姓，涌向江都者络绎不绝。都兵马使给难民们每天发一升米，而死者仍是难以数计。由于全国尽罹兵祸，税赋自然锐减，各州县只好让有能力耕作者去耕种撂荒地及无人耕种之田，以便收些租税弥补经费。江华岛上的梯浦、互浦、狸浦和草浦则筑起了堤防，尽一切努力生产军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9月辛丑、己酉、癸丑，10月戊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1年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12月甲午：“崔璘还奏曰：‘车罗大言：，崔沆奉王出，陆则兵可罢。’”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25页。

粮。^①

参知政事崔璘进行的撤军交涉总算有了一些成效，蒙古宪宗指示车罗大撤回蒙古军，略微减少对高丽的压力，以便再次考验高丽方面对出陆与朝觐的态度。于是，一部分蒙古军跨过鸭绿江而归。车罗大的指挥部设在开城的保定门外。

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蒙古宪宗四年）正月，崔璘又奉命到蒙古交涉撤军之事。崔璘首先向宪宗呈交了土产，然后上呈了请求蒙古撤军的国书。它写道：“天朝皇帝胸襟宽厚比天地……如能尽快回师，怜悯高丽生灵，则我们感恩戴德，出陆理政，永世拥戴蒙古天朝。”

17天之后，车罗大派阿豆、仍夫等4名使者到高丽，督促出陆与朝觐的事宜。高丽朝廷设宴款待这些使者，要求蒙古尽快撤军。蒙古军队再一次相信了高丽对朝觐与出陆的承诺，撤离了高丽。

蒙古军队一走，高丽解除了开城的戒严，允许避难于各个郡县山城和海岛上的百姓自由行动。^②

当时，蒙古军并没有完完全全撤至高丽的领土之外，正如北界兵马使所奏报的那样：“蒙兵屯义州静州之境，自兄弟山至大府城，弥漫原野。”^③大府城系鸭绿江上的岛屿，即原来的大夫营。

^① 参阅《高丽史》卷79，志33，食货下，高宗43年2月。《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2年3月丙午，4月癸巳。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2年正月乙卯，2月辛未、甲戌、甲午，3月丙午。《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2年正月、2月、3月。此际，高丽登州（现在的安边）的夜别抄，袭击驻屯于淮阳与安边之间铁岭的蒙古军，将其全部歼灭。

^③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2年4月辛卯：“北界兵马使报：蒙兵屯义州静州之境，自兄弟山至大府城，弥漫原野。”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高丽以其对朝覲和出陆的许诺，而使蒙古军队撤离了高丽绝大部分领土，然而高丽这一次也还是未能兑现诺言。高丽认为出陆和朝覲意味着投降，在表面上可以用上国、大国、皇帝陛下和感恩不尽等好话去讨夷狄的欢心，也可以小事大，而在内心深处则根本没有俯首称臣和投降之意，这就是高丽当时掌权的武臣们的气质和自主精神。然而，本着静观高丽履行诺言与否的试探用意而撤军的蒙古军队，见高丽无意履行诺言，便在撤军两个月之后，亦即1254年（高丽四十一年，蒙古宪宗四年）5月，又大举入侵高丽。这是车罗大指挥蒙古军队的第二次入侵。

蒙古军队300多名骑兵气势汹汹侵入龙冈、咸从等地。5天之后，蒙古军队进军到了高州与和州。6月，高丽派侍御史金守刚到蒙古作根本性的长期交涉。8月，蒙古军占领清川江流域，接着抵达昇天府（现在的丰德）。高丽顿时宣布京城戒严，进入战时状态。^①

9月，前年正月作为使者到蒙古的崔璘，与6名蒙古使节一起回到高丽。崔璘向朝廷报告：“车罗大与永宁公率领大军到达西京（现在的平壤），其先锋部队已至金郊驿（现在的金川）。”10月，蒙古军翻越大院岭，进出于忠州。在忠州，高丽军队与敌人接战，歼敌1000多名。

这次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过去所没有进行过的水战。1255年12月，蒙古军第一次出动其水军攻打槽岛，但遭失败。翌年1月，他们又用水军攻打高丽的几个海岛。高丽将军李广和宋君斐率领300名水军南下，挡住了敌水军的去路。蒙古军得知这一信息后，考虑到这是第一次水战，为了不致挫伤士气，准备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2年5月丁未、辛亥，6月甲戌，8月壬午、戊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2年5月、6月、8月。

了各种装备应战。

将军李广未能取得什么战果，率领水军而归。而将军宋君斐则将蒙古军队引诱至灵光的笠岩山城，大败蒙古军。6月，将军李阡率领200名水兵在温阳与敌人接战，歼敌几十名，抢回被俘的100多名高丽男女。忠清道巡问使韩就在牙山出动9艘船攻打蒙古军，却失败而归。8月，车罗大、永宁公与洪福源等率领军队到江华岛的甲串江，欲出动大量水军攻打江华岛，后来考虑到可能无法取胜而退至守安县（现原金浦）。高丽的别抄军在艾岛把敢于来侵的60名蒙古水兵悉数歼灭。就这样，尽管蒙古军队想以其不强的水军促使高丽朝廷出陆，但其水军根本发挥不了威力，吃了不少苦头。^①

高丽军队与一部分百姓不顾自身安危，一直英勇为国抗蒙，而高丽的一部分官吏则趁战争之机拼命以权谋私。就在车罗大率领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的1254年2月，高丽朝廷委任都察库判官高鼎梅为黄骊（现在的骊州）、利川、川宁（现在的始兴）、阳根（现在的杨平）、竹州（现在的安城）和阴竹（现在的利川）的苏复（苏生与回复）别监，高鼎梅毫无苏生与回复之意，日夜沉迷于酒色，醉心于搜括百姓的财物，搜刮民脂民膏。车罗大第二次率领蒙古军来侵时，高丽朝廷向六道委派了宣旨使用别监。由于这些家伙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这六个道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有苦无处诉，反倒盼望蒙古兵前来把这些贪官污吏赶走或打死。^②

另一方面，高丽继续与蒙古交涉蒙古军队撤走之事宜。1256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3年正月丁巳；4月庚寅，6月庚申，壬午，8月辛巳，10月己巳。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2月癸未；43年2月丙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3年2月。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年3月，高宗派大将军慎执平到车罗大的指挥所，进行这方面的交涉。4月间，他离开车罗大的指挥所向高丽朝廷报告：“车罗大与永宁公都这样说：只要国王亲自出迎或派太子到蒙古朝觐宪宗，蒙古便立即撤军。否则，无论高丽朝廷怎样巧舌如簧百般辩解，蒙古军队都不会撤离。”慎执平说，蒙古方面已退而求其次，不那么固执，一定要国王出迎与到蒙古朝觐，而只求太子出陆与到蒙古朝觐蒙古皇帝不可。现在，车罗大与永宁公驻扎在潭阳，而洪福源则驻扎在海阳（现在的光州）。^①

就这样，车罗大率领的蒙古军队态度一直都很强硬，继续攻占高丽各城。高丽高宗见势不妙，连忙召集大臣们商讨如何让敌军撤走。大臣们想来想去，除了让国王出迎与太子到蒙古朝觐蒙古皇帝，别无妙策，便一个个默不作声。高宗看出此中缘由，便说道：“只要能令蒙古兵早日退去，我怎能吝惜儿子的出迎？”高宗下定这样的决心之后，于翌日又派大将军慎执平到车罗大的指挥所，向车罗大传述高宗的决心：只要蒙古军撤走，愿意接受蒙古提出的要求。换言之，高宗的许诺，就是先撤军后出陆。^②

高丽的别抄军此时在义州以少胜多，以300名将士打败了1000多名蒙古军。在仁川，别抄军歼敌100多名。^③

慎执平到车罗大的指挥所进行有关交涉之后，于5月间回来向高丽朝廷奏报：“车罗大勃然大怒，吼道：‘高丽如果想保持友好，为何歼灭我军那么多士兵？已经死了的也就算了，活捉去的快快遣返给我们！’说完，他派来了30名蒙古使臣。我把这30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3年3月己酉；4月壬申。《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3年3月、4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3年4月癸酉、乙亥。《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3年4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3年4月戊寅、庚辰。

个人带了回来！”

9月，前年作为使臣到蒙古作撤军交涉的金守刚，成功结束了交涉，从蒙古返回高丽。他在蒙古首都和林城晋见了蒙古宪宗，与之进行了交谈。他要求宪宗把侵略高丽的蒙古军队撤回。宪宗说：高丽朝廷尚未从江华迁回开城，蒙古无法撤军。他便就此与蒙古宪宗进行了谈判。

他据理力争，所作的富有说服力的雄辩是：蒙古军闯入高丽攻打城池，弄得鸡犬不宁，高丽朝廷才不得不迁入江华岛，这好比野兽被猎手追捕，不得不进入其洞窟。猎手带着弓箭守候在其洞窟前，躲藏在洞窟里的野兽敢出来吗？再打个比喻，冰雪覆盖着大地，地脉被封冻得严严实实，草木之芽又怎能萌生呢？蒙古宪宗一听，觉得金守刚说得很有道理，比喻恰当，逻辑谨严，称赞道：“你是个称职的使臣。我们两国应当结好，永远友好往来！”宪宗答应立即撤军。

果然，宪宗派徐趾到车罗大的指挥所，命令其把军队撤出高丽。

车罗大于9月率领军队撤走。高丽于10月解除了京城的戒严。^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5，金守刚传：“王遣守刚如蒙古进方物。守刚从帝入和林城乞罢兵。帝以不出陆为辞。守刚奏：‘譬如猎人逐兽入窟穴，持弓矢当其前，困兽何从而出。又如冰雪惨烈，地脉闭塞，草木其能生乎？’帝然之，曰：‘汝诚使乎！当结两国之好。’遂遣徐趾，来命罢兵。”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3年9月己丑、庚戌，10月辛未。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6页。

第三节 车罗大第三次入侵与王子出访蒙古

蒙古为了使高丽投降，采取了和、战两面手法。高丽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但是，高丽并不想答应蒙古的要求，只想让蒙古撤军。

蒙古军队离开高丽后，高丽高宗及其大臣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满足蒙古的要求，而且其大臣们在1257年（高宗四十四年，蒙古宪宗七年）1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年年受他们的侵略，费尽力气以小事大，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今后，每年春天不必再按规矩派使臣去致意，更不必去进贡。

这年闰4月，高丽权臣崔沆死去，其庶子崔頊继其之后掌握高丽朝廷的实权。5月，高丽朝廷又派前次曾到蒙古说服蒙古宪宗而使蒙古撤军的起居注金守刚到蒙古，说服蒙古永远不再派军队侵略高丽。^①

高丽为了让蒙古军队撤离，一方面派使臣去蒙古侵略军的指挥所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则派使臣到蒙古首都，向蒙古皇帝进行直接交涉。金守刚所肩负的就是后者这一艰巨的使命。

蒙古军的侵略已经中止了，高丽依然派使臣去蒙古斡旋，这似乎令人不易理解。但是，认真分析便不难理解。因为，1256年9月蒙古军撤走之时，车罗大率领的军队并未回到辽东，而且像前次撤军时一样，驻屯在鸭绿江以南及其附近，继续威胁着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4年1月丙辰、闰4月甲午、5月戊午。《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4年1月、闰4月、5月：“遣起居注金守刚、郎将秦世基如蒙古。”

丽。

5月初，高丽朝廷派金守刚到蒙古完成其使命，仅仅过了8天，便在江都接到了来自西北面兵马使的报告：有30多名蒙古骑兵跨过清川江侵入龙冈和咸从。翌日，又接到东北面兵马使的报告：有3000多名原东真国骑兵侵入登州（现在的安边）。这样一来，高丽只好再一次在京城宣布戒严。

6月，车罗大部将甫波大指挥的蒙古军进军到了南京（现在的汉城）。高丽派李凝要求其收兵，甫波大说：“我们的去留，取决于车罗大对你们的处分。”紧接着，他率领蒙古军侵犯稷山（现在的天安）。另一方面，西北面兵马使报告：蒙古军队已兵临西京（现在的平壤）城下。

车罗大以高丽久久不兑现诺言为由，挥军南下，而其军队之所以没有跨过鸭绿江的痕迹，是因为它驻屯在鸭绿江以南。高丽使臣金弼到车罗大的指挥所作交涉时，车罗大在安北府（现在的安州）。金弼与之协商之后，回到江都向高丽朝廷报告：“车罗大曰：‘王若亲来，我即回兵。又令王子入朝，永无复患。’”^①

大臣们经过讨论，请高宗派王子到蒙古朝觐并媾和。于是，7月，首先由神宗之孙永安公王僖带着100个银瓶、酒和水果等到车罗大的军营造访。永安公在与车罗大交涉之后向高宗奏报：“车罗大说：‘如果王子前来，蒙古军撤至凤州（现在的凤山）。’”高丽大臣们知道战争已使人民朝不保夕，为不致生灵涂炭，请求高宗派太子亲自朝觐蒙古。高宗拒不同意。高丽朝廷只好派金弼去向车罗大说：“只要蒙古军队一撤走，太子便会去蒙古朝觐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4年5月己丑、丁卯、癸未，6月癸巳、乙未、辛未、壬子，7月丙辰、壬申。《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4年7月。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古皇帝。”车罗大应允，并说：“我们回师后，让王子同松山等一起来蒙古朝觐！”

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后，车罗大命令军队停止了对昇天府与甲申江的侵略，让其军队退至盐州（现在的延安）。在此之前南下的甫波大部队也奉命撤走。^①

5月间到蒙古进行交涉的使臣金守刚，为了见到蒙古的宪宗，到即将亲征宋朝的宪宗行营，恳切地请求他命令蒙古军队撤离高丽。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后，他于9月与蒙古的使臣一同归国。宪宗通过其使臣命令蒙古军队撤走。^② 蒙古宪宗答应撤军的前提条件，毋庸讳言还是高丽国王的朝觐与出陆。

11月，高宗召集大臣们，商讨王子去蒙古朝觐的问题和防备蒙古军队的问题。大臣们的看法很一致，高宗也就只好答应让次子、安庆公王湑于12月去蒙古。

如前所述，在蒙古宪宗刚刚即位的1252年，也古率领蒙古军侵略高丽，亦是以也古的蒙古军撤走和安庆公王湑去蒙古朝觐而告一段落的。在此之后的4年间，亦即蒙古宪宗4年至7年之间，蒙古宪宗之所以让车罗大率领军队重又侵略高丽，说到底是要高丽高宗去蒙古朝觐皇帝并还都开京。然而，高丽君臣依恃江都这一固若金汤的天然要塞，就是不想在这两大问题上让步。这次让安庆公王湑去蒙古，还是未让太子去。而车罗大也知道安庆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4年7月癸酉、戊子、壬寅、戊午：“永安公僖自车罗大屯所还云……车罗大曰：太子到日，当退屯凤州。”“戊子……宰枢又遣金轼告车罗大曰：待大军回归，太子亲朝帝所。车罗大许之曰：回军后，王子可与松山等偕来。”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4年9月壬申：“金守刚还自蒙古。守刚恳乞回军，帝许之，仍遣使与守刚偕来。”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金守刚传：“又遣守刚。帝方自将伐宋。守刚谒行营，恳乞罢兵，帝又许之，仍遣使与守刚偕来。”

公王诹去蒙古朝觐宪宗的价值，决心进一步迫使高丽屈服。于是，他的撤军是不彻底的，蒙古军队依然驻屯在鸭绿江南岸。

第四节 车罗大第四次入侵 与高丽太子朝觐

蒙古宪宗答应金守刚提出的要求，通过使臣让车罗大撤军，而车罗大所执行的只是临时性的撤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蒙古要高丽朝廷出陆，以及国王或太子去蒙古朝觐宪宗。然而，高丽朝廷拒不出陆，在朝觐问题上也只是让安庆公王诹亦即让高宗的次子去应付。高丽的这种态度，自然无法使蒙古满意，蒙古便酝酿再度入侵高丽。1258年（高宗四十五年，蒙古宪宗八年）2月，车罗大竟然在义州筑起城墙。

这年3月，高丽发生内讧。大司成柳璈、别将金仁俊和朴希实等杀死了权臣崔姪，使国王又得以实实在在亲自掌握政权。^①然而，由于崔氏一家在朝廷独断专行已久，国王的权限已大大缩小。所以，在这次政变之后，高宗依然无法完全控制朝廷。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3月丙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3月。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蒙古宪宗趁高丽政局混乱，命令洪茶丘^①带领一部分军队跟随车罗大攻打高丽。车罗大于4月22日派1000名斥候骑兵闯入遂安，被高丽的夜别抄所阻。4月30日，车罗大派使者至高丽朝廷，探听高丽朝廷是否出陆的虚实。高宗便把政厅迁至升天府，让文武百官在其间视事，另一方面着手修理宫阙与官厅，制造出陆的假象。5月5日，高宗在将士们的护卫下渡海来到升天府的新宫阙，接见了车罗大派来的波养等9名使者。^②

前年9月到12月之间，亦即金守刚从蒙古回到高丽，安庆公王诤与车罗大进行蒙古军队撤离高丽交涉时，车罗大曾命令其部队撤出盐州，退到高丽北陆，以此向江都的高丽朝廷施加压力。而高丽高宗刚刚亲自执掌实权，实际上还未能完全控制局面，就承受了蒙古军施加的压力。他虽不像过去崔氏武臣独裁时那样采取强硬的反蒙政策，但也不知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更好。

1258年（高宗四十五年，蒙古宪宗八年）6月11日，车罗大让手下的将军余愁达和甫波大分率1000名骑兵，占领了嘉州（现在的嘉山）和郭州（现在的郭山），同时派波乎只等6名使者

^① 洪茶丘（1244～1291年），叛徒洪大纯之孙，叛徒洪福源之子，洪君祥之兄。洪家满门均投降蒙古助纣为虐，使高丽吃了不少苦头。高宗5年，蒙古派哈真率军在江东城攻打契丹兵，洪大纯投降蒙古。其子洪福源于高宗18年撒礼塔率军入侵高丽时投降于蒙古。后来，洪福源多次随同蒙古军队入侵高丽。洪茶丘是归化于蒙古的武将。1261年，继父洪福源之后担任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官。他曾带领士兵进入凤州，建立屯田总管府。1274年，担任监督造船军民总官，进入高丽，使老百姓备受骚扰。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1744页，该书由百万社出版于1975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4月己酉，5月甲寅：“四月己酉，王闻车罗大遣使，来觐出陆之状。是日，出文武百官于昇天府，移市肆，修宫阙、官僚家户”“五月甲寅，王以兵卫涉海，御昇天府阙，引见车罗大密使波养等九人。”《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4月、5月。

到高丽。波乎只等传达车罗大的话：“蒙古皇帝传旨：‘高丽如果真心实意出陆投降，不伤其一鸡一犬。否则大军立即攻打江华岛。’只要国王与太子至西京投降，我们立即回师！”高宗说道：“我这老病之身，已不胜长途劳顿了！”6月18日，高宗又派永安公王僖和金宝鼎去见车罗大。^①

这时，蒙古军经由西京到达盐州、白州等地，占领了平州宝山驿。刚好金宝鼎陪同余愁达派来的8名使者回来，向在梯浦馆的高宗奏道：“余愁达语臣云：‘皇帝以高丽之事，属我与车罗大：汝知之乎，吾以尔国降否，决去留耳。国王虽不出迎，若遣太子迎降军前，即日回军。否则，纵兵入南界。’对曰：‘太子当来见耳。’”^②由此可见，经过双方协商，蒙古军统帅已同意以太子迎接取代国王出迎。

高宗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略微让步，派金宝鼎去对余愁达说：“将军可领几名骑兵去白马山见太子。”余愁达问道：“究竟是我该去见太子，还是太子该来见我？”金宝鼎说：“太子不敢有劳大官人前去，只是他怕大兵。”余愁达说：“太子如想见我，可在猫串江边会晤！”就这样，双方围绕究竟是由太子去见余愁达，还是由余愁达前来见太子的问题，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决定双方在白马山下或猫串江边这样的第三场所会晤。

高丽大臣们见余愁达想在远离昇天府之处会见太子，深恐发生劫持或伤害太子等意外事故，便让翻译康禧带着酒和菜肴去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6月己丑、乙未、丙申。《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6月庚子、甲辰、丁未：“丁未，幸梯浦馆，宝鼎奏曰：余愁达语臣云：‘皇帝以高丽之事，属我与车罗大：汝知之乎，吾以尔国降否，决去留耳。国王虽不出迎，若遣太子迎降军前，即日回军。否则，纵兵入南界。’对曰：‘太子当来见耳。’”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慰劳余愁达的部下，窥察他们的动向。紧接着，高丽又派员外郎李祿綏去对余愁达说：“太子突染小疾，待痊愈之后再来见大人。”换言之，高丽原想让太子去见蒙古军队的统帅，此时已改变了主意。不几日，余愁达派使者到高丽朝廷，说道：“余愁达将军说过，即使国王不能出迎，太子可前来交涉。太子还是不来，这是瞧不起我的表现。现在，我们再作一次让步，再派使者前往，看看你们的国王到底是让使者生还，还是让其死在你们那里。”显然，余愁达在向高丽下达了最后通牒。高宗对此既不能亲自出迎，又不让太子出降，只能派使者前往与对方舌战，作一番顺理成章的辩白。

员外郎李祿綏从余愁达军营回来后奏报：“余愁达说他已知高丽食言，只好用武力解决一切。”^①

接着，车罗大的军队进驻开城，闯入昇天府、交河（现在的坡州）、峰城、守安和童城（现在的金浦），肆意烧杀抢掠，鸡犬不留。另一方面，车罗大派蒙古大等15名使者到高丽朝廷。蒙古大说：“只要太子出降，我们就回军！”高宗说：“太子卧病不起，怎能出迎？”断然拒绝了蒙古大的提议。此时，太子王侯并未卧病。蒙古军队将领遭到这样的拒绝后，攻势更猛，攻克了西海道的嘉殊窟（现在的中和）和阳波穴。9月，300名蒙古兵在甲申江（现在的江华）外摆下了阵势。^②

1258年9月，安庆公王诃与蒙古使臣一起归国。10月，高丽派全光宰到车罗大的军营，设宴款待其部将，要求其回军。当时，无论是高丽派特使到蒙古晋见宪宗当面进行交涉斡旋，还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7月壬子、乙卯、戊午、庚申。《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8月癸未、庚寅、戊戌、己亥、乙巳，9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8月、9月。

在国内派使者去车罗大军营请求其收兵，蒙古的态度毫不改变，就是要高丽国王或太子出降或去蒙古朝觐宪帝。11月，高宗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对付蒙古军队侵略的良策。

另一方面，蒙古的散吉、普只等率领军队入侵高丽的东北面。高丽当即让高州（现在的高原）、和州（现在的永兴）、定州（现在的定平）、长州（现在的定平）、宜州（现在的德原）、文州（现在的文川）等十五州百姓避难于猪岛（现在的永兴郡）。东北面兵马使慎执平率领军民奋战，却因力单难敌，只好转移到竹岛（德原郡）。

12月，蒙古散吉和普只的军队入侵古和州（现在的永兴）。龙津县（现在的定平）人赵暉和定州（现在的定平）人卓青在朔方道的登州（现在的安边）、文州（现在的文川）等地密谋后，竟然带领蒙古军杀害了东北面兵马使慎执平、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夜别抄军，后集市引领蒙古军攻打江原道的高城。和州以北的疆土，也随之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随即在和州设置双城总管府，以铁岭为国境，将登州以北、定州以南的地区置于他们的管辖之下，任命赵暉为总管，卓青为千户。不仅如此，高丽百姓冒着危险在江华岛以外的陆地上所种的农作物，全部被蒙古军队所收割。于是，高丽朝廷在多方面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在这期间，高丽只好以猪岛和竹岛为中心，与蒙古军队抗衡。^①

12月29日，高丽朝廷终于决定接受蒙古所提出的各项要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12月己酉、甲辰。当时百姓奋然而起，杀死官吏反对政府而投靠蒙古的事例有不少。高宗45年5月，博州人民曾揭竿而起反对朝廷，亦属此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5年10月。参阅《高丽史》卷103，列传43，叛逆4，赵暉传。参阅方东仁著《双城总管府考》，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82年的《关东史学》第1期，见其第25页至29页。参阅津田左右吉著《元代高丽的东北境》，刊载在1913年出版的《朝鲜历史地理》第2期，见其第255页至257页。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8页。

第十四章 丽、蒙战争（二）

求。高丽派将军朴希实、赵文柱、朴天植等作为特使到蒙古，到达鲁花赤曰：“本国所以未尽事大之诚，徒以权臣擅政，不乐内属故尔。今崔婁已死，即欲出水就陆，以听上国之命。而天兵压境，譬之穴鼠为猫所守，不敢耳。”^①他们明确地表示只要蒙古军队撤离高丽，国王一定出陆，太子一定去蒙古朝觐宪帝。他们把以往未能做到的责任推卸于权臣崔婁等。实际上，高丽毫无屈服于蒙古之意，此次也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借口而已。

此时，蒙古宪宗正率军亲征宋朝。朴希实和赵文柱等翻越蜀山（原文如此一译者注），不畏长途跋涉，才于3月15日在河南陕州（现在的陕县）见到了蒙古宪宗。宪宗对朴希实说：“贵国国王每次都说假话，不守信用。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朴希实把高宗国书所写的意思说了一遍，请求宪宗下令撤去西京和义州的蒙古军队，让高丽百姓安居乐业。蒙古宪宗说：“高丽如果与我们同心同德，会厌恶蒙古军队留在高丽吗？我们的军队只是驻屯在西京以外的地区，如果高丽朝廷早点出陆，他们不会进入高丽境内。现在，高丽太子尚未离开高丽，你们与我们的使节一同回去。如果太子已入我国境内，让他单骑前来见我！”关于高丽朝廷的出陆，宪宗说：“高丽还要搬运木石建造宫阙，我们的撤军就以三年为期吧！等到宫阙竣工了，高丽朝廷再出陆，君臣也就有了新的议事之处。”显然，宪宗对与高丽的交涉持消极的态度。过了几天，宪宗将其诏书交给蒙古使臣尸罗门，让他与朴希实一起到高丽。^②

朴希实和天植等将军去蒙古，作了相当具体的交涉。1259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5年12月甲辰。《高丽史》卷58，志12，地理3；东界条：（和州）“高宗时，没于蒙古，为双城总管府。”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即位年8月辛巳。

年3月，别将朴天植从蒙古归来后，同车罗大的使者温阳加大等9人一起到江都。朴天植向高宗奏报：“朴希实、赵文柱去车罗大的指挥所说道：‘我国历来由权臣擅权，未能按蒙古的要求办事。如今，崔珥已被杀死，朝廷将迁回旧都，太子也将去蒙古朝觐。’车罗大等一听笑逐颜开，说道：‘太子如来，4月初是好时光，就定在4月初到蒙古朝觐吧！’”

高宗接见了蒙古的使臣温阳加大，对有关的具体细节作了协商。温阳加大要求将高丽太子去高丽朝觐的时间确定下来，高宗采取拖延战术，说道：“5月间，让他去吧？”温阳加大听了大为不悦，怒而催促道：“蒙古军的进退取决于太子的行期，倘若定在5月，岂不是太迟？”高宗无计可施，只好同意太子于4月去蒙古朝觐。温阳大有感于高丽屡次爽约，不是不守诺言，就是以种种借口偷梁换柱，决心这次使高丽不再故伎重演，便要求与太子会晤。高丽太子会见了蒙古使臣温阳加大，当面把去高丽朝觐的时间定在4月27日。这样一来，蒙古军队便撤离了高丽。

高丽太子的朝觐问题，是高丽与蒙古之间的悬案。这一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之后，高丽朝廷命令各州县的守令率领避难百姓离开海岛返回故乡，并妥加安置，使百姓安居乐业，专心务农，使民众不致有他顾之忧。^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1月丁未，2月庚寅，3月壬子、癸丑、丙子。《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6年1月、2月、3月。

第十五章 丽、蒙媯和与 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第一节 太子出访蒙古

高丽太子王僎出访蒙古的出发日期提前到了 1259 年 4 月 21 日。他的随行人员有参知政事李世材和枢密院副使金宝鼎等 40 人，并携带高宗的国书和礼物。^①这份国书说到：高丽在前一时期由于权臣主管军事和一切国务，因而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它写道：“正如陛下所知，臣（高宗）老迈多病，无法入大朝朝觐，故而让太子前往。太子之躯即我之躯，臣之意即太子之意。但愿陛下明察臣意，更加施恩布惠于高

^① 当时百官都到郊外饯行。四品以上文武官员每人赠银一斤，五品以上官员每人献出布帛，以充当太子一路上的费用。300 多匹马来驮国书，马匹还是不够用，便硬是把行人的马匹买下凑数，以致后来骑马的贵族渐少。从这一事实，可以窥知经历 30 多年战祸之后高丽的困境。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7，高宗 46 年 4 月太子出发的日期之所以比协商的日期提前，是因为高宗已患重疾。太子尽快完成这一任务后，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承担。参阅《高丽史》卷 24，世家高宗 46 年 3 月辛未，4 月甲申。《高丽史节要》卷 17，高宗 46 年 4 月。

丽。”^①

5月3日，太子抵达辽阳时，北界兵马使向高丽朝廷报告：侵略高丽蒙军统帅车罗大受其部下阿豆、仍夫和三弥等之迫害而暴卒。当时，与车罗大一起侵略过高丽的余愁达和松吉在辽阳（即东京）又想率领蒙古大军侵略高丽。太子与松吉会晤，就这样的苗头作了会谈。由于即将去蒙古，太子也就只希望早日晋见蒙古宪宗，使高丽与蒙古的战争永远结束，使高丽朝廷与百姓不再蒙受战祸。

从这年6月李世材与余愁达和松吉派遣的周者和陶高等一同到高丽时，李世材向高宗所奏报的情况，可知太子在这期间的活动情况：5月16日，太子到虎川，适逢大雨滂沱，路上积水随行人人员劝太子等到雨霁再走，太子不听，要大家继续前行。走了一天到达辽阳。刚刚落脚，就听辽阳的人们议论纷纷：“大军明天开赴高丽！”太子当即派李世材与金宝鼎，给余愁达和松吉送去了50斤白银。5月19日，太子与松吉会晤。松吉说：“蒙古宪宗将率军亲征宋朝，命令我们去征伐高丽。你来这里干什么？”太子说：“我国多亏宪宗和大官人的恩典得以保存，我先来看望大官人和诸位官人，然后去蒙古朝觐宪宗。”松吉问：“高丽朝廷已经迁离江都了吗？”太子答道：“州县百姓已经离开海岛，王京则等宪宗对我国做出处罚之后再搬迁。”松吉说：“王京还在岛上，蒙古怎能罢兵？”太子说：“贵国许诺：高丽太子若到蒙古朝觐，便永远罢兵。现在，我已起程去大朝，如果贵国不罢兵，高丽百姓会害怕得纷纷逃走。以后再加说服，又有谁会听从？高丽又怎会听从大官人的吩咐？”松吉等这才连连点头，认为说得在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4月甲午。《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6年4月。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理，答应不发兵。李世材又向高宗奏报：蒙古让周者等使者前来高丽，是为了让高丽拆毁江华岛上的城墙。^①

事实正是如此。蒙古使臣周者与陶高一到高丽，就督促高丽朝廷拆毁江都宫城。高丽朝廷出于无奈，只好出动士兵把江华岛宫城拆掉。蒙古使臣亲眼看到江华岛的宫城已拆毁，便踏上归程。途中，听说其外城尚在，又返回江华岛要高丽朝廷把江华岛里里外外的城墙都拆掉。高丽不得不照办。^② 蒙古使者离开高丽12天之后的1259年6月30日，在位46年之久的高宗结束了命运多舛的一生，与世长辞。^③

1259年（元宗即位年，蒙古世祖即位年）8月，去年12月29日作为特使被派往蒙古的朴希实和赵文柱两将军与蒙古使臣尸罗门一起回到高丽。蒙古宪宗在给高丽的诏书中写道：“如卿所知，卿回王京之后，该考虑这么一个问题：过去（从蒙古太宗合罕在位之时到宪宗即位之前）向蒙古投降的高丽人该不该遣返？”尸罗门所传述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增设从高丽到蒙古途中的驿站。当时，两国往来完全靠马匹运送军政要员及文书，蒙古方面认为高丽境内的驿站太少，满足不了这种运送上的需要。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6月庚辰。《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6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6月壬午、癸未、乙酉、己丑、庚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6年6月：“乃遣周者、陶高等来坏城郭，遂坏江都内城。周者等督役甚急，诸领府兵不堪其苦，注曰：若知如此，不如不城。城郭推折声疾如雷，街童巷妇皆为之悲泣。”

③ 对于高宗，史官评曰：“高宗在世时，内有要臣勾心斗角，擅执国命，外有女真蒙古兴兵进犯，年年不止。当时，国势岌岌可危。然而高宗小心守法，忍辱负重，而保住了江山社稷。最后，国政也重归王室执掌。敌人来侵犯时，高宗激励官兵和百姓英勇守城。敌人退走后，他派使者与蒙古通好。由于他派太子去蒙古，自己并未亲自去朝觐，高丽的社稷未亡，得以永远传祚。”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年末。

古愿意遣返高丽的俘虏，是想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要求高丽境内增设驿站，则是想更加有效地统治高丽。从此时起，蒙古对高丽的敌意已显露端倪。^①

继朴希实归国作了奏报之后，高丽派往蒙古的特使相继归国，也都奏报了与蒙古所作交涉的结果。9月，朴天植同蒙古也速达的使者加大、只大等9人一起归国。加大说：“我们想观察和确认水内（即江华岛）与陆居（即出陆）的情况。”为此，加大到乔桐（现在的江华），只大则前往安南（现在的富川）。^②

11月，李世材与蒙古使臣於散等4人归国。李世材在蒙古交涉撤军之事时，叛徒洪福源之子向蒙古宪宗奏报：“高丽的出降（指走出江华岛向蒙古投降）是假的，不是出之于真心实意。”这个家伙企图以打这样的小报告而使高丽难堪。李世材当即向宪宗解释，指出洪福源之子这样造谣中伤，别有用心，请宪宗一笑置之，切莫相信。于是，宪宗派使者於散等到高丽，了解高丽朝廷的出陆情况。於散考察这方面的情况之后，所追究的是为何出陆姗姗来迟。朴希实回答道：“我最近同尸罗门晋见了蒙古皇帝。宪宗谕示我们：‘尔国准备木石建造宫阙需时三年，我们也限期三年罢兵。你们可等宫阙建成之后再出陆。’”

高丽朝廷于这年11月动员将士30领，^③在开城建造新的宫阙。^④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即位年8月辛巳、乙酉。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即位年9月丙辰、辛酉。《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即位年9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81，志35，兵1。兵制每领有正军访丁人1000，望军丁人600，军官80名。

④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即位年11月癸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即位年11月。

第二节 太子与忽必烈会晤及达成协议

1258年春天，蒙古宪宗率军亲征宋朝，进军于四川，其弟忽必烈（后来的世祖）则领兵攻打鄂州（湖北武昌）。

1259年，蒙古宪宗驻军在巴县东部的钓鱼山，率军攻打合州（四川的巴县）。

这样一来，去蒙古朝觐的高丽太子便从蒙古的燕京出发，向宪宗所在的钓鱼山行进。他这一行人，经陕西长安附近的京北和陕西潼关到达甘肃固原县时，惊悉蒙古宪宗驾崩的讣音。

蒙古宪宗病逝于钓鱼山的行营里。当时，蒙古王室就帝位的继承有过激烈争夺。在蒙古本土镇守和林（蒙古太宗、定宗、宪宗在位时的首都）的宪宗末弟阿里不哥，受到了一些将帅的拥戴。然而，率军攻打鄂州的忽必烈（宪宗二弟）答应宋朝提出的媾和要求后，急忙返回首都争夺王位。

到底该谁登上蒙古王位？到底该追随哪一位有可能登上皇帝宝座者？蒙古诸侯将相当时曾难以定夺，举棋不定。高丽太子当然也不能不持观望态度，不知该与谁商谈结束战争的问题。然而，睿智的太子果断地认为忽必烈将继承王位，便向南面而行，经湖南到湖北，刚好与北归的忽必烈相会于道旁。

忽必烈意外地见到高丽太子，不禁喜出望外，说道：“高丽远在万里之外，唐太宗御驾亲征也曾使之屈服。而今其世子来投奔我，这岂非天意？”便邀高丽太子一同去开平府。^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3月丁亥。《高丽史节要》卷18，无宗元年3月。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31页。

高丽外交史

1260年(元宗元年,蒙古世祖元年)2月25日,太子在开平府惊闻父王去世的噩耗。忽必烈得知后,让高丽太子快快归国,并任命束里大为高丽达鲁花赤(官吏),与太子同行。他自己则于3月下旬在开平府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亦即成为蒙古皇帝,是为蒙古世祖。高丽太子则于3月归国,4月在康安殿即位,^①成为高丽元宗。

高丽元宗凭借自己与蒙古世祖建立的牢固个人关系,为了维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3月丁亥,4月戊午。高丽太子从蒙古回高丽时,蒙古江淮宣抚使赵良弼劝忽必烈说:“高丽虽是小国,有山海之阻,蒙古出兵讨伐20年,它仍未屈服。……只要王好生对待,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得到一个国家。”陕西宣抚使廉希宪也作了同样的劝告。于是,忽必烈便有了以仁德使高丽太子悦服,从而使高丽归入股掌之中的意图。实际上,蒙古世祖正是从这时起,根据他们的意见把高丽国王作为一国之王好生对待。另一方面,高丽朝廷让太子去蒙古商讨结束战争事宜之后,待高宗一去世,便拥戴太子王俣登上王位,在太子归来之前,让太子之子王湛掌管军国庶务。当时,考虑到太子去蒙古,既有可能平安无恙归来,亦有可能被扣为人质,故而采取了这样双重措施,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王位顺利继承。太子到达开京时,同他一起到达的蒙古官员束里大和康和尚为了考验太子,曾开了一些玩笑。白州的苏复别监金守禅向蒙古的也速达告发:“高丽把京都迁回旧京是假的。”也速达一听,对高丽王室很不信任。这样一来,人们对去蒙古朝觐的太子能否顺利即位便心生疑窦。所以,高丽当时让太子之子王湛掌管军国庶务,乃是让他在非常之时能登上王位。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6年12月壬寅,高宗遗诏。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正月戊寅,2月乙丑,3月甲申。蒙古世祖一面派荆节等25名使者到高丽,一面在诏书中写道:“半年不到高丽发生内讧,边将要求戒严,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真是内讧,权臣为何不自立,而拥立世孙?倘若说传闻有误,世子为何不回国而滞留于国境?难道说这是因为世子归国超过了期限,其左右股肱之臣忧心忡忡而想出计策?”这段话,令人难以释然。参阅《高丽史》卷25,元宗元年4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11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84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李齐贤著《栎翁稗说》前集(一)。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护和发展高丽的国权，派使臣到蒙古商讨履行出陆诺言、撤走蒙古军队和遣返高丽俘虏等问题。蒙古世祖于4月24日派荆节和其多大到高丽转交国书，就高丽提出的这些要求作了答复。这份诏书写道：“卿已归款（即归顺），朕已册封卿为国王，让卿回到高丽。朕看了卿的表章和边将的奏报，知道了一切，拟作如下处置。”

蒙古世祖是这样处理有关的问题的：

第一，关于由海入陆使人民安居乐业问题。蒙古世祖对此深表欣慰，认为时值农作物成长之时，应当不误农时，不误秋收，好生抚恤业已衰残的百姓。

第二，关于撤军的要求。蒙古世祖的答复是：如果继续驻军，大军压境，免不了有所骚扰。朕已命令将帅即日回军结束征伐。朕的慈怜之心天日可鉴，切勿疑惧。

第三，关于遣返去春2月起的战俘与逃亡者一事。蒙古世祖说业已责成有关人员立即开始遣返。他们回国后，要好生加以安置和救护。

第四，关于处理罪犯的问题。蒙古世祖说，贵国也有犯罪者，可按此前下达的赦文行事。若是军人，哪怕只抢掠了一钱一线，在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必须依法予以处置。

高丽元宗与蒙古世祖在各自即位之前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各自即位后，对于对方提出的要求，尽一切可能予以满足，甚至不惜破格。

这年4月29日，高丽派永安公王僖急匆匆到蒙古，祝贺世祖即位，同时通过表文与陈情表，对世祖使高丽提出的要求一一

得到解决而深表谢意。^① 蒙古当即遣返了高丽的战俘。蒙古还在其多大等使臣去高丽的前一天，亦即4月23日，将金宝鼎、金大材等高丽使臣及其余人员100多名送还高丽。其多大等传达了蒙古世祖充满关怀的答复。5月间，蒙古又将高丽的440多户逃亡者及战俘送还高丽。^②

永安公王僖作为使臣去蒙古时，蒙古世祖对他说道：在过去的40年里，高丽一直蒙受蒙古的侵略却依然诚心以小事大，真值得称赞。现在向蒙古朝贡的国家已达80多个，而蒙古最器重和最优待的则是高丽。所以，蒙古一一答应了高丽提出的要求。这年8月，永安公归国时，蒙古世祖让他捎回去了三封诏书与手谕。

其中的一封诏书是对高丽提出的要求的回答。诏书写道：(1) 衣冠（即服制）按本国（高丽）风俗穿戴，不必改循蒙古风俗。(2) 行人（即使者）除蒙古朝廷正式委派者之外，可禁止其入境。(3) 迁都回开城的时间可酌情而定。(4) 鸭绿江流域的蒙古军队，于今秋撤走。(5) 业已设置的达鲁花赤（孛鲁合反儿，孛靛鲁）、行人等，已命令其迎回鸭绿江西岸。(6) 自愿留在蒙古的十多名高丽人，将让他们回到高丽。前来蒙古的高丽使臣，有几人已不知其去向，蒙古会派人对此进行调查。今后若有人逗留不走，蒙古不予允许。

另一封诏书的内容是：今年5月19日，蒙古世祖改年号为中统，特此通知。

还有一封手谕则说已将虎符、国王印玺及衣服、弓、刀等一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4月辛酉、丙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4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8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4月庚申，5月壬申。《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4月、5月。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并送去。^①

上述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达鲁花赤束里大于8月回国，驻屯于西京的蒙古军随即完全撤出了高丽，蒙古又遣返了190多名逃往蒙古的俘虏。^②

9月，高丽派正言田文胤到蒙古，祝贺蒙古世祖使用新的年号，对世祖赐予高丽元宗的符印表示感谢。

1261年4月，高丽元宗派太子王谏到蒙古，祝贺蒙古世祖平定了阿里不哥之乱，^③ 祝愿永宁公归国时所传述的世祖亲征西域（亦称万里征伐）大获全胜，祝贺高丽正言田文胤所传述的世祖一举平定北方之捷。高丽太子王谏在蒙古逗留了半年。这样一来，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友谊达到了极致。^④

与此同时，蒙古答应了高丽使臣提出的如下要求：（1）女真人常常侵犯高丽国境，抓走百姓，蒙古方面今后将对之彻底进行遏阻，不让这类事再发生。（2）每年高丽派往蒙古的正规使臣，由于路途太远得骑马，结果不少人在途中失踪。对此，今后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8月戊申、壬子。《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8月。《元高丽纪事》，世祖皇帝中统元年6月。此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蒙古世祖允许高丽开京之迁，迟速量力。在此之前，滞留高丽的蒙古使者束里大曾多次督促高丽迁都开京。这样一来，这一压力算是云消雾散。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6月庚戌，7月丁亥、戊子、己丑，8月癸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6月、7月、8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29页至230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8月辛酉，9月甲午。《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8月、9月。

③ 阿里不哥，是蒙古宪宗末弟。宪宗去世后，他与其二兄忽必烈在帝位的继承方面竞争失败后，竟在和林自立了大约四年。世祖于此时将其叛乱平定。

④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2年4月己酉，9月癸亥。

方面将责成达鲁花赤和地方官员派人护卫高丽使臣。(3) 高丽将其特产鹰鹞(鹰的一种)献给蒙古, 蒙古将按其数量回赠铺马(即驿马)。(4) 高丽进献鹰鹞, 常受蒙古人干扰, 蒙古方面今后将命令达鲁花赤和地方官员确认鹰鹞的数字, 不准任何人干扰高丽的进献。^①

第三节 拒绝蒙古“六事”与元宗出访蒙古

蒙古征服其他民族与其他地区之后, 强迫其做好“六事”, 这是其统治其它民族与地区的一种方式。蒙古想让高丽遵照这“六事”行事, 从而而乖乖就范。

1262年(元宗三年, 蒙古世祖中统三年)12月, 高丽郎中高訥从蒙古归国时, 带回蒙古世祖给高丽元宗的诏书。这份诏书写道: “对于远近各附属国, 我们一贯按祖制办事, 亦即要求必须做到如下六事: 送人质; 搞好对百姓的户口调查; 设驿站; 出动军队支持与帮助蒙古军队; 运送粮食; 补助蒙古军队的军粮。也可以这样说, 这六事是附属国对蒙古应尽的义务。”^②

高丽做为附属国, 按理应当遵从这六项要求。然而, 高丽在内心毫无服从蒙古的念头, 其独立自主的意志不容动摇。于是, 高丽又派郎中高訥到蒙古。当时, 高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是: 蒙古如果提出枝节问题, 如蒙古人陆子襄妻子的问题, 可作出明确的解释。而倘若蒙古提出“六事”, 你可默不作声。高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 世家元宗3年7月壬寅。《高丽史节要》卷18, 元宗3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 世家元宗3年12月乙卯。《高丽史节要》卷18, 元宗3月12月。《元高丽纪事》世祖中统3年12月。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带去的高丽国书这样写道：“说到陆子襄的妻子，也许有人会说‘为何抗命不把她送来？’……我们派人四出寻找，终于找到了她。她已另嫁他人，而且生下了一个小孩，现在又身怀六甲。其小孩尚年幼，无法成行。我们已把这种情况告诉蒙古使臣，使臣说等孩子长大一些了再送回。所以，未把这孩子送回。”^①

蒙古提起“六事”，高洵机智地避而不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转而重点叙述有关陆子襄妻子的问题。

对于蒙古提出的有关“六事”的要求，高丽根本不想照办，因而它也就成了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悬案。

翌年3月（甲午）高洵归国时，没有得到蒙古的任何答复。由于高丽未按“六事”办事，又未就此作任何奏报，蒙古世祖勃然大怒。龙颜既然不悦，高洵自然只能空来空往。

高丽见情况不妙，连忙于4月派朱英亮、郑卿甫等到蒙古，献上了水獭皮500领、丝绸100匹、白麻布300匹、表纸500张、奏纸1000张。同时，详细地就“六事”作了通报。

也就是说，尽管条件不那么好，有些百姓力不从心，高丽还是奉命早早设了驿站（亦即置邮）。尤其是在北界，驿站设了不少，一个个紧相连接，蒙古使臣在来来往往时都已亲眼目睹。至于其他事项：（1）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百姓生活已苦不堪言。他们用艾杆苦房，散居于山沟。如果现在就去调查户口，他们惊魂未定，势必又作鸟兽散，不如从长计议为好。（2）战乱之后年年歉收，饥饿使得百姓幸存者百有一二，粮食作物也是十亩仅有一二亩有点收成。要处于这种窘境的百姓为蒙古军送粮，岂不有损于蒙古军之威容？（3）百姓家无存粮，怎能胜任千里运粮之劳？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3年12月丁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3年12月。

只有在黎民安居乐业和家业收成正常之后，才谈得上这些，请给予时间从长计议，方可妥作安排。

由于在战后高丽确有难言之隐，朱英亮与郑卿甫等虽用语言文字表现了双方的宗属关系，却回避了与财政负担和主权有关的事情。

8月，朱英亮从蒙古归国时，带回蒙古对此的答复函。复函写道：“使者来告：高丽待百姓安居乐业之后再实行六事。这种说法符合事理，望好自为之。”蒙古给高丽送去了500只羊。^①

另一方面，蒙古在放松督促高丽还都开城的同时，重提高丽元宗去蒙古朝觐世祖的问题。蒙古世祖在其即位后的五年间征服欧洲、接受各国降表之后，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高丽。1264年（元宗五年，蒙古世祖至元年）5月，派使臣胡都、多乙者、礼部员外郎赵泰和康和尚等到高丽，斩钉截铁地言明附属国国王到蒙古朝觐，乃是千古不易之大典，要高丽遵从。亦即必须朝觐一次。这不是蒙古对高丽一国的强求，而是对一切宗属国所下的命令。

当时，高丽元宗召集大臣们商议，听取众臣意见。大臣们深恐元宗到蒙古朝觐之后，难以安然无恙地归国，一个个犹豫不决。只有李藏用说：“元宗如去朝觐，两国便能真正和好，否则难免又起战事，弄得鸡犬不宁。”金俊反问道：“国王前去朝觐，万一发生意外，如何处置？”李藏用断言：“决无意外，必然平安无恙。”他还表示如果发生变故，愿以一死谢罪。于是，大臣会议得出结论：元宗应去蒙古朝觐。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4年4月甲寅，8月甲子。《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4年3月、8月。参阅《元高丽纪事》世祖中统3年10月29日。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86页。

第十五章 丽、蒙媾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9天之后，蒙古使臣之中的胡都与康和尚先行归国，高丽让国学祭酒张溢和郎将康允绍与之同行，送去请将元宗去蒙古朝觐的日期延宕至秋后的国书。延期的理由是：高丽在近30年间因兵祸而导致饥饿不绝、流行病蔓延，国民死去大半，幸存者散居深山海滨，耗时四五年也难以使他们复原。这种状况蒙古使臣有目共睹，一问便知。

元宗在当世子时曾到与蒙古交涉结束战争之事，并与蒙古世祖私交甚笃。元宗惊悉失父王去世而归国时，蒙古世祖曾邀请他到蒙古造访。元宗与他约好：等到离散的国民重回故土安居乐业之时，必再走访重叙旧谊。尽管如此，元宗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重振独立自主的精神，一直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不去蒙古，不得已把日期推迟至秋后。高丽采取惯用的手法，隆重接待蒙古使臣，博得其欢心。然而，逗留在高丽的蒙古使臣多乙者和赵泰却仍督促元宗起程，至七月初一才归国。他们在鸭绿江中的城郭大夫营等了一段时间，听说元宗在秋后一定会起程访蒙古，才释怀回到蒙古。^①

这年8月，元宗接受世子和文武百官的饯送之后，带着李藏用等随行人员，踏上了出访蒙古的漫漫旅程。9月，他抵达蒙古首都，谒见了蒙古世祖。蒙古世祖以礼相待，两次宴请元宗及其随行人员。蒙古中书省也设宴款待元宗与其随行人员，并赠送了大量的礼物。

于是，高丽按照蒙古的要求，做到了蒙古附属国国王的义务，亲自朝觐。蒙古世祖大喜，命令其驻屯于高丽的一切蒙古军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5年5月庚辰、己丑，7月癸酉。《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5年5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86页。

队撤离高丽。^①

第四节 高丽拒不还都与丽、蒙双方媾和

高丽元宗访问蒙古之后，果然安然无恙回到了高丽。这次出访，只是高丽在形式上从属于蒙古的一种表现。实际上，高丽毫无从属蒙古之意。高丽未按蒙古要求的“六事”办事，一直未还都开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蒙古世祖得知高丽的这种实况，于1268年（元宗九年，蒙古至元五年）2月安庆公王涓从蒙古归国时，表露了其遗憾之意。他对安庆公说，既然尔国诚心降服于蒙古，为何偏偏不送来人质，不动员士兵帮助蒙古军队，不出动百姓运送军粮，不查报户口。他在责备高丽不照“六事”办事之后，强调四年前元宗访问蒙古后安全返回，得益于世祖本人的特别关切。当时元宗曾对世祖说：只要蒙古军队悉数撤离高丽，三年后一定还都开城。然而，蒙古军队已撤离多时，却不见高丽有还都开城的动静，这是为什么？蒙古世祖对此大为不满，洵是溢于言表。

蒙古世祖的不满不止于此。蒙古使臣到高丽，高丽有提防蒙古使臣别有所图之嫌。世祖认为这有损礼仪。世祖还责怪高丽朝贡的贡品数量不如以前，而且贡品粗劣可厌。世祖还威胁道：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5年8月癸酉，9月庚子；9年2月壬寅：“二月壬寅，安庆公涓还自蒙古……令屯田军马尽还。”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32页。

第十五章 丽、蒙媯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真降之意如是耶？相战，人所不好。尔欲好战，当约其地也。”^①

这年3月，高丽为了迷惑蒙古，障其众目，在开城设置了出陆都监这样的朝廷机构，佯装在做出陆的准备工作。然而，蒙古世祖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声称决不被高丽蒙骗。他派于也孙脱和孟甲到高丽，捎去表示抗议的诏书。

这份诏书，责备高丽元宗口口声声以小事大对蒙古忠贞不贰，实际上则以种种借口顶着不办实事。他责问道：高丽的政事难道一味听任大臣们左右？卿甘愿受大臣们的蛊惑而置蒙古的要求于不顾？不然，就是故意佯装不知而不闻不问！他写道：“卿提出蒙古军队如果撤走，三年之后一定还都开城。而今，我们撤军早已完毕，高丽朝廷为何还迟迟不出陆？至于设驿站，也是敷衍了事，其余六事至今拖延不办。我们就要征伐宋朝，高丽应当尽力出动军队和舰船，应当为我们储备军粮。还有，关于由达鲁花赤着手调查高丽户口一事，卿意下如何？可让金俊与李藏用直接向朕报告。”

后来，李藏用跟随蒙古使臣于也孙脱到蒙古，对世祖所提及事项，一一作了阐明。他解释的要义是：（1）关于出陆与还都，已设置了出陆都监，正在加紧进行。（2）关于出动军队助蒙古军队征伐宋朝，尽管高丽军民人心涣散，一定尽力准备哪怕是少量军队备用。（3）关于舰船，也会尽力出动一部分。（4）至于运送军粮，我们也将尽力提供人力。（5）调查户口一事，由于一直忙于准备出陆而无暇顾及。今后，一俟调查完毕，自当将结果呈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2月壬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2月。

报。^①

以上这样的答复，不过是高丽在表面上对蒙古做做样子而已。也就是说，高丽的出陆还都完全是有名无实。至于助军、出动舰船和运送军粮，既然蒙古让高丽尽力而为，高丽只准备做点象征性的表示。调查户口属于国家机密，高丽口头上答应今后进行，实际上则是顶着不办。

8月，高丽让大将军崔东秀同蒙古使臣吾都止一起到蒙古。从崔东秀当时上呈蒙古的奏章看来，高丽的态度是：对蒙古的要求，略作具体的呼应。该奏章写道：“三十年的战祸，使高丽的幸存者少得可怜，而在他们之中，罕有壮丁与勇猛之士。在这种情况下，助军仅能准备一万名。至于舰船，现在正在准备材料，打算建造一千艘。”

蒙古对高丽有这种表示，感到颇为满意，派脱朵儿到高丽检查助军的人数和监造舰船。蒙古自有其打算，如果济州也在建造舰船，那就不必多舌，否则，让济州单独建造一百艘兵舰。蒙古还通知高丽：今后蒙古征伐宋朝与日本，将出动高丽的这些军队和舰船。^②

就这样，丽、蒙之间结束了战争，双方彻底实现了媾和。

从1231年撒礼塔率军侵略高丽，到1254年车罗大率军入侵止，高丽遭受了蒙古军队六次入侵，有20多万人丧生。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州县村屯化为废墟。

1270年，去蒙古燕京朝覲的王子王俱回高丽即位，是为元宗，之后过了八年，高丽朝廷才将首都从作为39年临时首都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3月壬寅，4月丙戌。参阅《元高丽纪事》，世祖至元5年5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8月、10月戊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8月、10月。

第十五章 丽、蒙媯和与高丽国王出访蒙古

江华岛迁回开京。在此之前，在这方面曾一直受到蒙古的干预。不过，高丽对于蒙古，任何时候都采取事大不服的态度。也就是说，表面上似在以小事大，实际上则一直在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一直不肯屈服蒙古的颐指气使。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 蒙古军再次出动

第一节 林衍废黜元宗与蒙古的干预

元宗即位之后重用金俊。元宗之所以器重他，是因为他对先王高宗忠心耿耿，杀死了权臣崔嬭，使朝廷军政大权得以重归于王室。再者，他积极拥立元宗，使王权再度巩固如初，不致有名无实。

后来，金俊摇身一变而成为权臣，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一家人和家臣渐渐飞扬跋扈腐化堕落，横征暴敛，国民恨之入骨。

金俊对蒙古深怀敌意。1268年（元宗九年）3月，蒙古派使臣到高丽督促助军（六事之一），同时发出调令将金俊父子及其弟金冲（一名承俊）召调到蒙古。金俊得知后，多次向元宗提出这样的建议：将捎来调令的蒙古使臣处死，然后躲到海岛上去。然而，元宗未予同意。于是，金俊与将军车松佑商议如何处置此事。车松佑说：“龙孙（即国王）并非只有今上（现在的国王）一人，龙孙实在多得很。昔日，太祖也是以将军的身分起事而建立了高丽王朝。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很明显，这是在暗示金俊不妨杀死元宗发动政变。然而，金俊的部下、都兵马录事严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守安及金冲反对这样做，金俊也就不敢贸然下手。

此后，金俊越来越厌恶蒙古，存心抗拒蒙古的指令。元宗见他变得这样，转而对之厌恶不已。^①

当时，枢密副使林衍在日常事务中常与金俊意见不一致，两人之间的关系甚僵。林衍先下手为强，同金镜和崔璵商议，一同杀死了金俊。然后，林衍又将与之同谋的金镜、崔璵以及崔璵的弟弟崔琪处死。

元宗十年6月18日，林衍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我为王室除掉了权臣，而国王却让金镜等来杀我，我不能坐而待毙，得采取措施与诸位共图大事。凡是不愿与我共事者，一律放逐于荒岛。”他这么声色俱厉威胁，大臣们不敢表示非议。然后，他让大臣们一个个发表看法。侍中李藏用主张叫元宗让位，参知政事俞千遇表示反对。

次日晚，林衍将前将军权守钩、大卿李叙和将军金信佑等反对派一一拘捕，然后捏造了他们的罪状，诬蔑权守钩出身贱人而爬上了高位，李叙奸污其妻前夫之女，金信佑与父亲之妾通奸，并将他们全部处死。

这年6月21日，林衍将高宗次子、安庆公王涓接进王宫，让他登上王位，从而废黜了元宗。当时，侍中李藏用力主废黜元宗。司空李应烈则像车松佑向金俊进言那样对林衍说：“龙孙（即国王）并非只一人，何必只让今上做国王？”他怂恿林衍发动政变，林衍从而壮了贼胆。^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金俊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197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林衍传。《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6月辛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6月。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198页至199页。

十七天之后，林衍派中书舍人郭汝弼到蒙古，将元宗的让位说成是国王自愿。当时，林衍以元宗名义写的表章是这样写的：“臣（即元宗）……不知何故，从去年起灾变迭生，时至今日臣又染病，百般医治无效，不日即将辞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元子已在蒙古尚未归来，该将重任托付谁人？……臣父援引祖上典故曾经教诲臣：王位需易人时，应是兄终弟及。臣弟安庆公王涓年轻有为，臣已于6月22日将国事托付于他。”

林衍又以安庆王涓的名义给蒙古世祖写了一份表章，写道：“兄种（指元宗）由于无暇疗养，常常生病，朝不保夕，不知何日辞世，故而让臣即位为王。臣大吃一惊，连连辞让，兄对臣说：‘先王平日叮嘱兄终弟及，兄不能违悖父王的遗训。’臣不得不冒昧即位。”^①

元宗名义写的表章，毫无疑问并非出之于元宗之手。而且，业已被废黜的元宗根本不知有这种越俎代庖的无耻行径。

蒙古方面见让位者的说明与继位者的自白没有出入，当时收下了这两份表章。但是，随后即估计此中必有权臣在背后操纵，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高丽太子根本不知国内已发生政变，其父王已被赶下了王位，从蒙古踏上了归国之征途。林衍知后，让20名夜别抄埋伏于义州，准备在途中将归来的太子逮捕。

7月24日，太子抵达婆娑府（现在的九连城）时，静州官奴丁五孚（《益斋集》记载为丁五甫）偷偷渡过鸭绿江，将国内发生政变的情况一五一十奏报太子，说道：“林衍已经废黜元宗而让安庆公王涓即位。他深恐太子归国生事，而在义州埋伏了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7月辛亥。《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7月。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20名夜别抄，想对太子下毒手。请太子千万别回国。”太子一听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太子随行人员中，大将军郑子琦认为官奴说的是假话。不能轻易置信。罗裕则说不妨观望局势，再作道理。金富允认为应当加以肯定，太子决不可贸然落入罗网。

太子的另一个随行人员、诸校郑仁卿跨过鸭绿江悄悄进入国内打听后，赶快回去奏报太子，说官奴丁五孚所报确是事实。丁五孚又奏报：“林衍指使去蒙古的告奏使郭汝弼，此时正逗留在灵州，不妨去会一会他。”于是，太子命令手下的人把郭汝弼叫来。陪太子回高丽的7名蒙古使者一听，从灵州把郭汝弼抓来。太子当面一审问，才知静州官奴丁五孚所说的一切句句是真。太子不知自己回国之后会有什么杀身之祸，便转身回到了蒙古。

太子回蒙古之后，在义州埋伏了夜别抄的林衍这才知道情况已经不妙，不仅事情已经败露，而且蒙古必会了解这一切。他不知太子与蒙古会采取什么反击的措施，终日惶惶不安，心惊肉跳。^①

高丽太子匆匆回到蒙古都城，把国内所发生的政变奏报世祖。世祖大怒，开始对高丽进行干预。

蒙古让斡脱儿不花和李滽等，同高丽太子的书状官金应文一起到高丽。他们来到高丽，捎来蒙古世祖措词严厉的诏书。这份诏书指出，高丽发生了大臣废黜国王，擅立国王之弟的变故，然后写道：“高丽国王即位以来，未曾听说有什么过失。即使有些过失，也只应进谏。如果国王不听忠谏，即可报告蒙古，听候朕的处置。尔等不这么做，却由大臣擅自废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份诏书措辞十分强硬，警告高丽朝廷：倘若国王、世子、王族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7月丁卯。《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林衍传。《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

有人遇害，决不轻饶肇事者。这份诏书命令高丽朝廷彻底调查此事，将情况呈报蒙古世祖。

斡脱儿不花等在高丽了解事实真相。林衍说这次废立不是他所为，因为高丽的惯例凡是掌权者均可废立国王，并狡辩说他在高丽位居七名有权有势者之下。

翌月，也就是这年9月，日暮途穷的林衍派枢密院副使金方庆和大将军崔东秀到蒙古，呈上了狡辩的表章。它与刚刚废立国王时所上呈的元宗封章与安庆公王诰的表章如出一辙，所说的还是老一套，还是说让位的元宗身患重疾，按照先王的遗训而让位，而新即位的安庆公王诰则是迫不得已而继位。^①

11月蒙古派兵部侍郎黑的和菑来道、徐仲雄等12人到高丽，获取高丽国内发生政变的证据，弄清这一大事的真相。其另一个任务就是让国王王植、新即位的王诰和发动政变的头头林衍到蒙古去。如果不按期到蒙古，就让业已被派到高丽与蒙古边境的头鞞哥国王（辽阳行省丞相、蒙古诸王之中的第一级，亦即国王）指挥的军队进击高丽。蒙古还威胁说：这次进击，所到之处将鸡犬不留，夷为平地。

权臣林衍一听大惊，惊惶得让重臣们以无记名方式进言，为其对付蒙古的通牒献计献策。同时，把蒙古使臣黑的请到家里，设宴款待，并尽力说服。然而，黑的的态度非常坚定：务必让元宗复位。

林衍出于无奈，连忙召集群臣，商讨废黜新王王诰而让元宗复位的问题。

被废黜的元宗见蒙古的态度如此坚决，林衍等政变势力则已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8月戊戌，9月庚戌，11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8月、9月、11月。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软弱无能，便鼓起勇气对林衍等进行反击。他在住所宴请黑的，让黑的坐至上座，黑的边辞让边说：“王太子即将与蒙古公主结婚，我们乃是蒙古皇帝的臣子。王已是蒙古皇帝驸马的父亲，我们怎敢不顾礼节而造次？”

蒙古朝廷及其使臣黑的如此拥护元宗，元宗复位也就再没有遇到什么刁难。^①

第二节 李藏用的外交手腕

1264年（元宗五年）蒙古让元宗到蒙古朝觐时（上面已经言及），元宗曾集思广益征求大臣们的对策。大臣们经过讨论，竟举棋不定无法定夺。因为他们前怕狼后怕虎，既顾忌国家的体面与元宗的安全，又怕不去朝觐而引发蒙古出兵干涉。后来，是侍中李藏用果断地认为元宗应当去朝觐，并为此开展了很出色的外交活动，从而显露了其过人的才华。

当时，他与其他大臣的看法不同，认为元宗倘若去蒙古访问，蒙古便会与高丽达到和解，对高丽实行柔化政策。而如果拒而不往，则会招来灾祸。他力主元宗去蒙古朝觐，对蒙实行亲近政策。他所倡导的这种政策，在当时来说，既富有进取性又有一定的冒险性，颇有胆识。

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向优柔寡断的林衍，当时曾担心国王去蒙古会发生意外，而李藏用坚定不移地说：“国王前去蒙古朝觐，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11月壬子、庚申、壬戌、癸亥、甲子。《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林衍传。《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11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00页。

很多问题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万一真会有什么变故，自己愿负全责，以一死谢国人。”由于他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当时，朝廷才统一了认识：由国王去蒙古朝觐世祖，增进两国的友好。^①

元宗去蒙古朝觐时，林衍之子林惟干及其心腹一同随行。当时，永宁公王焯已在蒙古多年。他是显宗之孙。1241年奉国王之命，假装成王子到蒙古作人质。后来，蒙古皇帝发觉了此事，知道了他的真实身分。1255年，他奉蒙古宪宗之命，曾经跟随车罗大率军打入高丽。蒙古军队的铁蹄在高丽各地蹂躏了大约一年，而且对高丽京都构成了威胁。后来，他被任命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2000多户，负责治理沈州。1270年，高丽的林衍发动叛乱时，蒙古世祖应元宗的出兵要求，让他率领蒙古军队又进入了高丽境。而在当年元宗出访蒙古时，他曾企图依恃蒙古的势力继承高丽的王位，因而多方非难高丽朝廷。他与蒙古的大臣们在一起，当着高丽元宗及其随行人员的面说道：“高丽有军队38领，一领有1000人，合起来是38000人。如果让我去高丽，我会把这些人带回来，为蒙古政府效劳。”

蒙古的史大臣听了此言，曾把李藏用叫到身边确认这一事实。李藏用说：“我们高丽的制度大体上是如此，只是近几年由于屡遭兵乱与歉收，死去了不少人。虽然在制度上规定一领为1000人，实际上却已做不到。这就好比是蒙古的万户牌子头（受元朝管辖的万户牌子），其数量往往达不到一万户。”他还态度强硬地答道：“请允许我同王焯一起去高丽检查一番。倘若王焯说得对，可以杀我的头。如果我说得在理，那就把王焯的头砍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林衍传。《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5年8月癸丑。《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5年8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32页。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下来!”王谔在一旁听到了他说这番话，只好默不作声，不敢再在这个问题上置喙。

史大臣又问起高丽州郡的户口到底有多少，李藏用答道：“我不清楚。”因为这是国家的机密，说了就是泄密。如果高丽的户数一确定，军兵、军粮、驿站等的负担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李藏用故意耍模糊手法，不作明确的答复。史大臣又问他：“你作为国家的股肱重臣，怎么连自己的国家有多少户人家也不知道？”李藏用指着身旁的窗格子反问道：“您是一国的丞相，可知它有多少个？”史大臣只得承认：“不知道。”李藏用接着说：“我国各个州郡的户口自有专门的部门掌管，即使是身为宰相的大臣，又怎能知道其不断发生的变化呢?!”史大臣一听，无言以对。

当时，王谔邀请李藏用到他家做客，设家宴盛情款待。有个唱曲者，即席引吭高歌吴彦所谱的曲子《高人月圆》和《春从天上来》。当时，李藏用悄悄地低声跟着哼唱，歌词与音节都唱得很正确。王谔站起身来握住李藏用的手，感慨万千地说：“您不懂汉语，却懂得此曲调。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可谓相当之高。”于是，对李藏用更加敬重。蒙古世祖听其部下谈到了有关李藏用的种种佳话，便管他叫“阿蛮灭儿里干李宰相”。其他大臣则称他为海东贤人。有的蒙古人甚至命人画下李藏用的肖像画，以对之顶礼膜拜。^①

1268年（元宗九年），蒙古世祖为了向高丽下达助军（亦称授军）的命令，想掌握有关高丽的基本状况，便让李藏用到蒙古作一番说明。李藏用到蒙古后，蒙古世祖对他说：“我下命令让高丽助军，高丽不报告军队的数字，稀里糊涂敷衍了事。然而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

绰早就对我说过，高丽有军人四万名，另有杂色军一万名。日前，我给高丽发了诏令：高丽国王所在之处不能没有军队，可留下一万军队捍卫国王，其余四万名将士着即开来蒙古助战。高丽接到命令后奏报：高丽没有五万名军人。王绰说这是谎言，而且说倘若不信，可派使臣去高丽进行核实，让王绰也去。核实之后，如果真有四万名军人，李藏用应当受罚，否则，诬告者应受处罚。高丽如果不加隐瞒，将军人数如实报来，朕怎会下那样的命令？”于是，蒙古世祖把王绰叫到身边，对之说：“你与李藏用一起，把这个数字搞清楚！”又对李藏用说：“你回高丽去，把高丽军人的真实数字给朕报来！否则，朕将出兵讨伐高丽！如今朕已把高丽看成一家人，万一高丽有何事故，朕岂会袖手旁观？对于那些不来朝贡的国家，朕将发兵加以征伐。高丽出兵助蒙古军队作战，乃是履行其义务。你回去之后，对尔国王说：‘赶快制造战舰一千艘，使之能运四千石大米到前方！’”

李藏用一听，在心里寻思：高丽在战后百废待兴，这样的负担实在太重，无法加以承受。于是，向蒙古世祖奏道：“陛下有令，小国怎敢不依？只是，倘若严加督促，恐怕连造船的材料也很难备足。”他一方面承担下这一义务，另一方面请高丽世祖莫派人督促，旨在使用延宕的手法，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蒙古世祖窥出了他的用意，说道：“成吉思汗在位时，河西王献女请求和亲，奏道：‘皇上如果出兵攻打女真，臣愿作陛下的右手，倘若出兵攻打回教，命令其协助征伐。’河西王到头来却未出兵。成吉思汗大怒，发兵征伐河西，将河西一举灭掉。不知高丽知道这个史实吗？”蒙古世祖这样说，无非是胁迫李藏用乖乖地为其效劳，不可有二心，知趣就范。

李藏用当即说道：“高丽过去有过四万军队，而三十年来经过战祸与疾病，几乎损失殆尽。一些城屯号称有千户或百户，都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已有名无实。”蒙古世祖说：“自古以来，有死必有生，高丽还有妇女，岂能都没有生育？尔也许是年迈之故，虑事已不周啦！措辞怎能总是不着边际？”李藏用辩白道：“自从蒙古军队撤走以来，高丽确实也有出生之人，只是都还很年幼，难以弥补军人之奇缺！”

蒙古世祖又说道：“据说天气好时，从高丽到宋朝只需两天到三天。从高丽到日本，则可以朝发夕至。高丽人和日本人都是这么说的。……高丽为何总是抓住未出生者做文章？”当时，在座的永宁公王绰想就高丽的助军发表看法，李藏用对他说：“在至尊（指蒙古世祖）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有失体统，不如派人前去高丽确认为上。”蒙古世祖很欣赏李藏用辩白的逻辑严谨和爱国之忧，便让永宁公别多嘴，往事不必重提。^①

就这样，永宁公王绰作为人质在蒙古呆了不少年头，不仅不体谅祖国战后恢复之艰辛，反而想让高丽出动全部军队帮助蒙古侵略军横行霸道，其卖国嘴脸真是昭然若揭。

然而，李藏用以其外交手腕制止了王绰的卖国行径。当时，在东方儒教圈内搞外交，以实理为基础，很重视名分。为了正名，在逻辑上必须于理不悖。为了阐明事理，旁征博引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交通不发达，文明设施又奇缺，当时在国与国之间，信息是十分不畅的。唯其如此，在外交上便往往由合理的逻辑左右胜负与成败。从这个角度着眼，李藏用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娴熟于名分外交，无愧为出色的外交家。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

第三节 蒙古设置东宁府与元宗的复位交涉

林衍发动政变，废黜了元宗，将元宗的弟弟王涓推上王位之后，仅仅过了三个月，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和韩慎，便与李延龄（前校尉）、桂文庇和玄孝哲（《元史》地理志记载为玄元烈）等密谋，纠集龙岗、咸从、三和等地民众，于1269年（元宗十年）10月3日，以诛杀林衍为名，发动了叛乱。^①

崔坦等杀死咸从县令崔元，闯入椴岛，^②杀害了分司御史沈元濬、监仓朴守奕和京别抄等，以椴岛为其叛乱的根据地。在江都的高丽朝廷闻讯后，任命李君伯为北界安抚使，玄文革为逆贼防护将军，带兵前往镇压，却因力不从心而无法克敌。崔坦等起兵占据西京，并由此北上，占领了龙州（现在的龙川）、灵州（今义州地区）、铁州（现在的铁山）、宣州（现在的宣川）和慈州（现在的慈山）等地。

叛贼崔坦控制西京以北的地区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只能是投靠蒙古，便向蒙古出发。当时，蒙古使臣脱朵儿（又记载为多打尔）奉命踏查耽罗（济州），以便为蒙古征伐日本做好准备工作，正滞留在大夫城（一名大富城，即辽时的大夫营，位于鸭绿江中义州与婆娑府的交会处）。崔坦在大夫城会见了脱朵儿。脱朵儿问及崔坦来蒙古的原因，崔坦谎称：“高丽朝廷打算迁入江华岛与蒙古对抗，而且想杀尽北面边境地区几个城池的百姓，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10月乙亥。《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10月。

^② 椴岛，是大同江附近的岛屿。高宗在位时蒙古兵曾入侵，西北面兵马营与西京留守一起迁至此岛。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我们感到气愤，便杀死了这几个城池的官吏。我们来蒙古，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大朝的忠心。”当时，叛贼崔坦等通过脱朵儿要求归附蒙古，愿把西京以北的54城和慈悲以北黄海道的六城拱手献给蒙古。^①

后来，崔坦派李延龄会晤脱朵儿，谎称高丽朝廷将派兵攻打崔坦等，请蒙古派3000名将士支持他们。蒙古对高丽领土覬觐已久，当下便于1269年11月6日命令驻屯在辽阳的忙哥都（又叫蒙哥都、孟格图）率领2000名蒙古军队帮助崔坦。1270年（元宗十一年，蒙古世祖至元七年）1月，忙哥都作为高丽安抚使率领2000名蒙古军队进驻西京（现在的平壤）。

高丽元宗此时正在再一次去蒙古朝觐的途中，一听说蒙古军队又进驻高丽，于1270年1月让随行的崔东秀带着他的国书先到蒙古请求撤军。他的国书写道：“崔坦等以高丽朝廷派军队对他们进行剿灭为借口，向大朝请到了2000名援兵。而今，臣作为高丽的国王，再一次去大朝朝觐。国家已无发号施令之人，谁敢下令让军队出动？崔坦等的借口，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有出兵的必要，等臣去大朝朝觐皇帝说明情况之后，再派兵到高丽也为时不晚。现在，岂有让蒙古军队进入高丽境内，使老百姓惊慌失措的必要？高丽朝廷之所以从未对发动叛乱的崔坦等问罪，乃是因为他已归附于蒙古，在真相大白之前唯恐因而引起高丽与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6年11月癸卯：“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掣西京五十余城来附。”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正月朔。《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崔坦传。参阅池内宏著《高丽元宗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面》，该文刊载在1925年出版的《白鸟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参阅津田左右吉著《元代高丽西北境的混乱》，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13年的《朝鲜历史地理》第2期。参阅方东仁著《东宁府设置小考》，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84年的《关东史学》第2期，见其第77页到78页。

大朝之间的纠纷。”这份国书措辞婉转，实际上则是抗议蒙古方面听信一面之词，派兵帮助崔坦等反对高丽朝廷。^①

2月1日，元宗在蒙古首都燕京觐见了蒙古世祖，与世祖就“林衍废立事件”的真相交换了意见。当时，元宗只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未言及林衍所发动的政变，而太子与李藏用等则如实地揭露了政变的来龙去脉。元宗要求世祖收回出兵高丽的成命，莫受崔坦花言巧语的迷惑。

翌日，亦即2月2日，元宗又拜见了世祖。在交谈之中，元宗提出了两点请求：一为求婚，另一为请求蒙古罢兵。

第一，元宗很关注高丽世子与蒙古公主的婚姻。当时，高丽世子也陪父亲到了蒙古。以缔结王室婚姻来增进高丽与蒙古千秋万代的友好关系，是元宗搞友好事大外交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第二，高丽朝廷出陆回都开京，从治安上着眼，很有必要请求蒙古派一些蒙古兵助威。在已逝的甲子年，亦即1264年（元宗五年，蒙古至元元年）元宗访问蒙古之时，曾许下诺言：“尽快出陆，还都开京。”然而，归国之后即因权臣林衍反对而未能如愿。由于有这样的苦衷，时至此时，元宗请求世祖向高丽派出一些蒙古军队，一来好铲除权臣，二来好说服江华岛和其他海岛上的百姓同朝廷一起离岛出陆。

蒙古世祖收到元宗的这些请求之后，过了几天，通过永宁公和洪茶丘等高丽叛徒，将诏书交给元宗，就其请求作了答复。世祖的此份诏书，同意元宗的派兵要求。对于元宗为其子求婚则表示将慎重考虑，慢慢再予以解决。诏书写道：“根据蒙古的法律，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正月辛丑。《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正月。《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崔坦传。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471页至472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

第十六章 高丽内讧与蒙古军再次出动

通婚即是合族。若是真心交亲，无理由加以拒绝。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婚姻问题，却与其他事情混在一起提出，似乎过于仓促。若有真意，可在回国之后，正式派遣使臣前来正式求婚。”洪茶丘等在把诏书交给元宗时说：“蒙古世祖的女儿都已结婚，元宗若为世子求婚，世祖得与其诸兄弟商议之后，才能给予答复。”^①

然而，蒙古世祖于2月7日否定了元宗访问蒙古的第一天亦即2月1日提出的一项请求，亦即关于撤走2000名蒙古军，使之不再帮助崔坦叛国的请求。蒙古世祖在给崔坦颁发金牌的同时，决定以慈悲岭作为高丽与蒙古的国境，慈悲岭以北地区属于蒙古，蒙古在此设置了东宁府。蒙古世祖进而任命崔坦为东宁府总管。元宗当即对此表示反对，要求归还高丽领土，蒙古世祖未予同意。^②

慈悲岭以北的领土归属问题，有一个时期曾显得相当复杂。1275年（忠烈王元年，蒙古至元十二年，宋孝恭德祐元年），蒙古将东宁府升格，称之为东宁路总管府。这年2月，蒙古增派1400名蛮子军到高丽的海州、盐州和白州。3月，元宗想去西京避暑，竟然也需经蒙古的批准。蒙古于1271年亦即蒙古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后来，高丽曾多次要求蒙古归还慈悲岭以北的领土。1290年（忠烈王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3月，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2月甲戌。

^② 参阅《高丽史》26，世家元宗11年正月己酉、辛亥，2月辛未、丁丑、庚辰。《高丽史节要》18，元宗11年1月、2月：“一月丁丑……崔坦请蒙古兵三千来镇西京。帝赐崔坦金牌。……有差诏令内属改编，东宁府划慈悲岭为界。”“二月庚辰王上表，请西京复属。……遽回异趣，伏望许还诸城。”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32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591页和612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高 丽 外 交 史

世祖才下令撤销东宁路，将慈悲岭以北的地区归还高丽。从1270年到1290年，高丽慈悲岭以北地区曾作为蒙古的东宁路，归属于蒙古达21年之久。^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2月庚午，3月辛卯；16年3月丁卯：“二月庚午，元遣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来，分处海、盐、白州。”“三月辛卯，时王请避暑于西京，帝许之。”“十六年三月丁卯，帝诏罢东宁府，复归我西北诸城。”参阅池内宏著《高丽恭愍王朝征伐东宁府考》，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18年的《东洋学报》8—2。参阅吉川弘文馆出版于1963年的《朝鲜史研究》中世篇3，第233页到234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25页。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第一节 出陆还都与要求归还西京以北领土

高丽元宗在蒙古进行外交交涉之后，于1270年（元宗十一年，元至元七年）2月16日踏上了归途。这时，国内又发生了一大变化，这就是权臣林衍的病死。

林衍深知元宗到蒙古后，会请求一些蒙兵帮助王室，压制其抗蒙路线的推行，又生怕很快就会还都开城，便处心积虑反对这一切对他不利的措施推行。他派指谕智甫大带领军队到黄州布阵以待，又让三别抄之一的神义军进驻椒岛（现在的松和郡），还派夜别抄到各个岛屿，强制百姓迁至岛上居住。他以这一切对付蒙古以其军队帮助国王出陆还都的同时，使用了人海战术。在这个过程中，他急急如丧家之犬，不免急火攻心而生了背疮。这样一来，在元宗归国之前，他便于2月25日因背疮恶化而死去。^①

元宗到蒙古出访时，任命顺安侯王惊为监国。顺安侯王惊拗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林衍传。

不过林衍死党的压力，只好让林衍次子林惟茂任教定别监，^①继承了林衍的权臣地位。其先，林衍生怕其擅行废立的真相被元宗向蒙古世祖告发，便让其长子林惟干随同元宗出访蒙古，旨在牵制和监视元宗的一言一行。

5月11日，元宗在归国途中驻蹕大夫营，让将军郑子琦和大将军李汾禧先行归国，向重臣们说明元宗还都旧京的决心，事先作一些部署。郑子琦等向大臣们所传述的元宗说明如下：“蒙古世祖让头辇哥国王和赵平章等带兵护卫寡人归国，对寡人说：‘只要一回国，就能让百姓迁回旧都，安居乐业，一如往昔，我们蒙古军队立即撤回。倘若违抗命令，违抗者及其妻子都要成为俘虏。’”郑子琦等说，这也是世祖的旨意。郑子琦与李汾禧还传达了元宗的指示：“现在的出陆，不循旧例，从文武官员到山村百姓，都得带妻儿老小出陆。要准备好粮食粮，好生加以说服，莫让百姓惊恐。国家安危系于出陆，每一个人都要遵旨。”很明显，这一次，元宗对出陆还都已是坚定不移，不容任何人把它当作儿戏。

然而，年幼无知的林惟茂却像其父一样抗旨不办，竟派水路防护使和山城别监将百姓赶进山城或岛屿，又让大将军金文庇率领夜别抄在乔桐岛布阵，准备抗御蒙古军队。

元宗归国之后，一方面说服部分官员离开了林惟茂的团伙，另一方面在5月14日晚上，让宋松礼、御史中丞洪文系（林衍的女婿、林惟茂姐夫）等率领夜别抄冲进林惟茂的家里，抓获林惟茂及崔宗绍（大将军；惟茂的姐夫），推至市场斩首。然后，

^① 教定都监，是权臣崔忠献于1209年设置的官府，负责掌管劣行的揭发、人事行政和税收等。其长官为教定别监，必须是将军才有资格担任此职。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170页，该书由百万社出版于1975年。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将其死党成员流放荒岛，将林惟干、林惟武提解至蒙古。林惟干后来在蒙古的升天府被斩首。^①

林惟茂及其党羽被铲除后，元宗于5月23日在江都召开重臣会议，正式决定还都旧京，公布了还都的日期，并张榜于全国，动员百姓出陆。然而，还是有一些势力反对还都旧京。尤其是三别抄不赞成还都，打开国库，随意发放粮食。元宗让上将军郑子均到江华岛说服三别抄，但未能如愿。

高丽朝廷决定还都后，于5月26日派员外郎李仁成将太祖像从江华岛侍奉到开城。5月27日，元宗与妃嫔一起到开京，住入沙坂宫。文武百官也都会集于开京，后由于官厅尚未再建，只好分别在篷里供职。^②

6月5日，蒙古头辇哥国王让朵刺歹率领2000名士兵进入江华岛。当时，元宗唯恐朵刺歹及其军队会把留在江华岛上的善良百姓视为搞叛乱的三别抄一伙，会把他们随意杀害，曾劝他们千万别开赴江华岛。然而，朵刺歹还是率军进入了江华岛，放任士兵掠夺财物，弄得人心惶惶。^③

8月1日，世子王谏派枢密院副使元傅和上将军宋松礼到蒙古，告之以裴仲孙发动叛乱的消息，同时要求蒙古归还其设置东宁路总管府的西京以北领土。当时，元宗上呈蒙古世祖的表章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5月丙午年、乙卯。《高丽史》130，列传43，叛逆4，林衍附林惟茂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5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5月壬戌、乙丑、丙寅，6月己巳。《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5月、6月。当时（6月），将军裴仲孙与指谕卢泳禧等率领三别抄逼迫承化侯王温称王，肆行谋反的勾当。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裴仲孙传。

③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6月癸酉，7月己亥。《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6月。

样写道：“年前，小邦西北面总管幕下吏崔坦，杀西京分台御史……等，遂胁西北鄙诸城，以树其党，即诣帝所饰辞妄诉，意欲分疆自异……而此褊小土地，又割西京以北诸城别作疆界。……伏惟圣慈，归我旧境。”^①然而，蒙古未置可否。

元宗自江华还都开京之后，8月间，蒙古头辇哥派人烧毁江华岛内的民宅、粮食及一切物质，以防止高丽朝廷再次入海迁都于岛上。9月，蒙古的达鲁花赤进入江华岛检查实际情况，确认已无法再迁都于岛上。

这年闰11月，元宗派朴恒和崔有济作为贺正使到蒙古，告之高丽已完全还都开京。^②

1271年（元宗十二年，至元八年）7月，蒙古将黄海道的银波庄、三进江分割出来，使之属于西京。元宗当即向蒙古中书省提出抗议。元宗的表章写道：“银波庄、三进江，本西海道所属，今西京人托言，头辇哥国王来在西京时，已籍两处人民……伏冀一依帝命，使彼人民，悉复属矣。”^③

然而，高丽关于将归西京管辖的黄海道银波庄三进江重新归属黄海道的要求，和将银波庄、三进江民籍复属黄海道的要求，并未引起蒙古的重视，蒙古对之未做任何答复，可谓置若罔闻。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8月戊辰：“遣世子谏如蒙古上表……年前小邦西北面总管幕下吏崔坦……伏惟圣慈，归我旧境。”《高丽中节要》卷18，元宗11年8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8月戊寅，9月戊午，闰11月乙酉。《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8月、9月、11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7月丙寅：“秋七月丙寅，西京又欲割西海道银波庄三进江为属县，王又报中书省曰……。”

第二节 三别抄之乱和丽、蒙军队攻陷珍岛

元宗身为世子时，曾经到蒙古访问，路遇即位之前的世祖忽必烈，从而使高丽与蒙古的战争得以结束。元宗即位之后，又先后两次到蒙古会见世祖，使高丽与蒙古的关系得以更加紧密。在外交方面，元宗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他邀请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又决定出陆还都于旧京，这种做法却未能得到三别抄的支持。

三别抄，是崔怡（一名崔瑀）执掌朝廷大权时组建的。当时，京都有许多盗匪出没，气焰相当嚣张，使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为此，崔怡募集勇士，使之夜出巡察，使盗匪再也不敢飞扬跋扈。于是，这些夜巡的勇士们被称为夜别抄。所谓别抄，系特种部队之谓。

当时，盗匪不仅仅在京都为非作歹，在其他各地更是十分猖獗。于是，崔怡让别抄分赴各地维持秩序，其数量也就渐渐增加，分成左别抄与右别抄。另一方面，被蒙古军队抓走的高丽人，有不少逃回高丽，崔怡把他们组成一支部队，称之为神义军。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又被称为三别抄。

三别抄的俸给由国库支付，因具有国家军队的性质，而非私人之兵丁。然而，历代的权臣都别有用心地利用三别抄，以之作为私兵。尤其是在权臣之间争权夺利之时，更是毫无例外地动用三别抄。蒙古军队入侵时，三别抄负责守卫江华岛，在全国各地采取游击战术，使蒙古军队为之大伤脑筋。唯其如此，三别抄对元宗邀请一部分蒙古军队前来保护其还都旧京的做法很是不满，对一贯向元宗和世子施加压力、迫使元宗出陆还都的蒙古则更是

十分不满。

1270年(元宗十一年)5月29日,元宗让将军金之氏到江华岛,将三别抄解散。6月1日,将军裴仲孙和指谕卢泳禧以朝廷这一解散令为导火线,率领三别抄发动了叛乱,拥戴承化侯王温(高丽第8代国王显宗次子平壤公王基的第7代孙,永宁公王焯之兄)为国王,设置官府,与元宗的朝廷和蒙古对抗,而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①

裴仲孙等肆行的这次叛乱,组建了新的朝廷,与刚刚还都于旧京的开京朝廷对峙,进而不承认向蒙古屈服的元宗是高丽国王。他们的这种做法,与林衍废黜元宗、拥立永庆公王焜,在性质上可以说如出一辙。由裴仲孙率领的三别抄,为了抗拒蒙古的颐指气使,甚至建立了国家体制,另搞一套。

三别抄在江华岛见许多官吏、军卒已返回陆地,自知难以守住江华岛,便纠集1000多艘舰船,将公家和私人财物装到船上,又把百姓和奴婢赶上舰船,于6月2日至3日南下,足迹遍及西海道一带的岛屿,于8月19日进入珍岛,以之为其根据地。三别抄之所以选中珍岛驻屯,有如下三个原因:(1)在抗蒙方面必须掌握制海权;(2)该岛靠近陆地;(3)该岛能够容纳大量百姓。

三别抄以珍岛为其大本营之后,筑造了龙藏城,修建了巨大的宫殿,使珍岛具有都城的规模,得以向四面八方发展其势力。在海上,三别抄管辖南海、彰善(属于晋州的岛屿)、巨济等庆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5月戊辰,6月己巳。《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裴仲孙传。《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5月、6月。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474页到475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94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尚道沿岸和济州等 30 多个岛屿，俨然像个海上王国。尤其是南海岛由三别抄的另一头头刘存奕指挥，堪称其第二据点。从陆地说来，他们控制了长兴和合浦（现在的马山）、金州（现在的金海）、东莱等全罗道和庆尚道的沿岸要塞以及罗州和全州。于是，三别抄尽一切可能把陆地的百姓和物资往岛上输送，以便充实其实力。

三别抄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心怀畏惧，不敢与之较量。全州副使兼全罗道讨贼使、参知政事申思全由于不敢带兵前去讨伐三别抄，被朝廷免职。李杉弃城而逃，也被朝廷免职。尤其是锦城山城（现在的罗州），三别抄将它围攻了七昼夜，充分显示了三别抄的实力。^①当时，庆尚道与全罗道向京师纳税往往利用水路而不走陆路。三别抄就在珍岛将这些钱物劫走，从而增加了其收入。

有些州、郡风闻三别抄势力已大为壮大，甚至投降了三别抄。有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官吏认为承化侯也是真正的国王，甚至前去珍岛晋见他。^②

事态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蒙古自然不会坐视，随即积极地对三别抄进行讨伐。蒙古之所以如此主动积极，是因为它在说服元宗使高丽成为其外藩方面有所失误，而这对蒙古世祖制订征战日本的计划则更是利害攸关。然而，蒙古军队由于不善于水战，蒙古便不让其军队单独征伐三别抄，而是与高丽军队组成了联军。高丽朝廷的军队由金方庆指挥，蒙古军队由元帅阿海（后来改由

^① 参阅《东国輿地胜览》卷 37，珍岛，古迹条龙藏城之注释。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8，元宗 11 年 8 月 9 日。《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2 年 3 月。《高丽史》卷 103，列传 16，金应德传。《高丽史》卷 130，列传 43，叛逆 4，斐仲孙传。《高丽史》卷 103，列传 17，金方庆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 103，列传 16，金应德传。

忻都和史枢)负责指挥。

高丽与蒙古联军多次进攻珍岛,却屡战屡败。1271年(元宗十二年)正月6日,元宗让员外郎朴天澍同蒙古使臣杜员外一起,带着元宗的规劝信与蒙古世祖的诏书(虽是给元宗看的,却是让元宗说服三别抄归降的外交通牒)去说服三别抄。

对于元宗的规劝信,三别抄所作的礼节性答复是:“唯命是从!”而对于蒙古世祖的诏书则极力加以反对,而且把蒙古的使臣杜员外扣留了下来。

2月10日,蒙古方面给呼图克堡尔(忽都答儿)下手谕,让他去说服三别抄。对于蒙古所采取的这种怀柔手段,三别抄采取的是拖延战术,以要求联军撤走为归顺的条件,同时要求直属蒙古管辖,而让三别抄专门管理全罗道。蒙古方面当然不会同意三别抄提出的这种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①

蒙古打消了对三别抄采取怀柔政策的念头,根据元帅忻都的建议,制订了在雨季到来之前占领珍岛的计划,决定对三别抄肆行总攻。为了给以实实行这一计划,蒙古方面于4月19日让在蒙古的永宁君王埙的儿子王熙和王雍各自带领900名蒙古士兵,又要求高丽出动将士600名和400艘兵船(为了攻打珍岛附近的三别抄,早就驻屯了260艘兵船,另外又征发了140艘兵船),预先调拨军粮。高丽朝廷的军队老弱无用,无法以之滥竽充数,便只好征募文武散职、白丁、杂色和僧侣以充数,以之为地方军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正月:“朴天澍还自珍岛,贼劝留伴行密使杜员外,以诏还附天澍曰:‘此诏非谕我也,不敢受。’唯答国书曰:‘唯命是从。’”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8年3月己卯:“中书省臣言:高丽叛臣裴仲孙,乞诸军退屯,然后内附,而实都(忻都)未从其请,令愿得全罗道以居,道隶朝廷。诏以其饰词,迁延岁月,不允。”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队。如此这般组成的高丽与蒙古的联军，于5月15日对珍岛发起了总攻。

三别抄由于在此前对高丽和蒙古联军的作战中取得了屡战屡胜的战绩，竟然瞧不起对手而疏于防备，加上被蒙古的怀柔手段迷惑，竟然放松了警惕。结果，它经不起联军的攻打而开始溃散。洪茶丘率领蒙古大军发动猛攻，三别抄作鸟兽散。洪茶丘抓住被推戴为王的承化侯王温及其子王桓，将其斩首。裴仲孙与卢泳禧也似乎死于乱军之中。金通精见势不妙，慌忙率领三别抄残兵逃往济州，以图东山再起。

金方庆率领军队追击逃亡的三别抄，缴获了几十艘战舰，抓获一万多名男女。然后，将珍岛上积存的4000石粮食及金银财宝和兵器等运往京师。蒙古军队也抓到了不少俘虏。^①

在这次战斗中，蒙古军队用上了各种进攻用的武器。尤其是火枪和火炮，对这次取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

第三节 三别抄在耽罗坚持抗战与蒙古管辖耽罗

金通精率领三别抄进入济州之后，筑造了内城与外城，在海岸上修了长城，使其根据地变得牢固了许多。

从1271年到三别抄灭亡的1273年（元宗十四年），在这三年间，金通精率领三别抄袭击长兴、井邑、康津、泰安和马山等地，绑架官吏，掠夺战舰，放火抢粮，掳掠一时。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4月丁巳、丙子、丁丑，5月癸亥。《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4月、5月。参阅《东国輿地胜览》，济州古迹条，缸波头古城注。

^② 参阅《元高丽纪事》至元8年5月。

然而，济州岛毕竟与江华岛和珍岛不一样，它离陆地太远，加上三别抄的头头死去很多，剩下的这些头头与兵卒只能在海上活动，尚不足以去陆地骚扰。^①

如何对待三别抄在济州的这种活动呢？起初，高丽与蒙古的意见相左。高丽主张出动丽、蒙联军，一鼓作气迅速把济州岛上的三别抄剿灭。而蒙古方面则主张劝降，认为剿灭它，自己也会有所损失，而劝降则可不费一兵一卒而达到目的。

1271年11月，高丽派李昌庆去蒙古，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逆贼余党闯进济州，在诸海岛作恶多端，有来陆地为非作歹之虞。不如合力加以剿灭，以绝后患。”

1272年3月，高丽任命琴熏为济州逆贼招谕使。琴熏带着元宗的招谕文向济州进发。琴熏等经过楸子岛时，被三别抄的金希就和吴仁凤等活捉。金希就等对琴熏说：珍岛挨剿的怨恨，刺骨浸肌终身难忘。言讫，当即把元宗的招谕文烧掉，把琴熏塞入一条破旧的小船让其返回，并将其随从全部杀死。琴熏坐着那条破船在海上漂流了五天，才侥幸回到开京。这充分说明，想劝说三别抄就范，根本无余地可言，此路完全行不通。^②

1272年6月，高丽派郎将李有庇到蒙古奏报，高丽朝廷力不从心，难以独力剿灭三别抄逆贼。从3月到5月，三别抄在长兴、咸平、海南、康津等处抢走了20艘船和3200石粮食，杀死12个无辜百姓，抓走了24人。5月14日，从三别抄那里逃回的卢孝悌说：三别抄想让390名士兵分乘11只兵船去庆尚道和全

^① 三别抄在这三年间的活动事项，可参阅如下资料：《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3月癸卯，5月辛酉、丁丑、壬子，6月戊子，8月丙戌、壬申，9月戊辰，11月己巳；元宗14年1月丙子，3月癸酉。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宗元宗12年11月癸未；13年3月丁卯，5月辛酉。《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2年11月；13年3月和5月。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罗道的造船所（蒙古为了征伐日本，命令高丽为之造船）抢船。高丽通过李有庇向蒙古提出建议：以驻屯在金海的蒙古军队防护全罗道的造船所，再从驻守在庆尚道的 2000 名官军中抽调一部分到全罗道。这样，就不仅可以保护好造船所，而且足以在海岸地区御敌。在这个基础上，蒙古如派精锐部队到高丽军中增强战斗力，则一定能一举剿灭这伙盗贼，从而大功告成。^①

然而，蒙古对待三别抄的策略与高丽不同，想一举说服三别抄投降。1272 年 8 月，蒙古派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洪茶丘一起讨论剿灭济州三别抄的计策。洪茶丘的建议是：“金通精有不少同伙在开京，可让他们先去招降金通精。如果金通精不肯就范，再兴兵攻打也不迟！”蒙古世祖认为言之有理，接受了这一建议。蒙古的策略，说到底还是先劝降后用兵。

洪茶丘派金通精的侄子郎将金赞和李邵，以及三别抄将军吴仁节的亲戚恒文伯等 5 人去济州，旨在说服金通精等投降。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不仅未能说服金通精，金赞反而被扣留在济州，其余 4 人则全部被金通精下令处死，一个也未留下。^②

蒙古认识到劝降这一招不管用，之后便与高丽组成联军，开始攻打济州岛的三别抄。1272 年 11 月，蒙古以其驻屯在盐州的 2000 名屯田军（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详细说明）、2000 名汉军和 6000 名高丽军队，组成了拥有一万名将士的联军。蒙古还要求高丽出动 2000 名水兵。

1273 年（元宗十四年）2 月 20 日，高丽的金方庆将军首先率领 800 名骑兵，与蒙古将军忻都和洪茶丘等一起出征。4 月 28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3 年 5 月丙寅、丁丑，6 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 19，元宗 13 年 5 月、6 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3 年 8 月丙戌。《高丽史》卷 130，列传 43，叛逆 4，裴仲孙传。《高丽史节要》卷 19，元宗 13 年 8 月。

日，丽、蒙联军奇袭济州。联军突破外城，大射火矢，火焰腾空，三别抄立即溃不成军。金通精带领 70 多人逃往山中，随后见已走投无路，便全部自尽。他的部将李顺恭和曹时适乖乖举手投降。

金方庆将军率军冲入内城，将三别抄的魁首金允叙等 6 人斩首，活捉其党羽 35 人，其余 1300 名军卒沦为俘虏。

在出榜安民让济州岛原有居民安居乐业之后，蒙古将军忻都在济州驻屯了 500 名蒙古军队。金方庆也在岛上驻屯了 1000 名高丽军队，然后一齐凯旋回到开京。^①

这样一来，抗蒙势力的最后一座堡垒终于被摧垮，三别抄从此销声匿迹。

然而，蒙古对高丽的领土依然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这年 6 月，蒙古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使其屯镇军增至 1700 名，在岛上收取租税。蒙古在高丽西京以北地区设东宁府总管之后，又在济州设置达鲁花赤，开始管辖济州岛。当时，失里伯麾下的 1700 名屯镇军，并非都是蒙古军队。蒙古军队仅有 500 人，金方庆的军队有 1000 人，另外还有 200 人是失伯里带到岛上的。蒙古任命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意味着这 1700 名军人全部由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4 年 2 月己丑、壬辰、丙申，4 月庚戌。《高丽史》卷 104，列传 17，金方庆传。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失里伯统率。^① 这也就是蒙古在耽罗的达鲁花赤。不久，失里伯被召回蒙古，蒙古以孙摊为耽罗国达鲁花赤。^② 当时，耽罗国招讨司改称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官府。1284年（忠烈王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又改称达鲁花赤总管府。

蒙古世祖在三别抄进驻耽罗之前就很关注耽罗。他曾视耽罗为高丽的属地，而在高丽附属于蒙古之后，考虑到耽罗乃是征伐日本和南宋的要塞，便想加以充分利用。唯其如此，他于1268年命都督领脱朵儿、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检查了蒙古命令高丽准备的兵力和舰船。当时，脱朵儿等首先踏查了黑山岛，然后踏查了耽罗。^③

蒙古的这三个使臣到这年12月才回蒙古去。在此之前，王国昌与刘杰仔细地巡视了黑山岛，刘杰巡视了造船情况。脱朵儿在归国前检查了军队的备战状况。

早在三别抄在耽罗建立根据地之前，蒙古世祖就已将耽罗与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10年6月：“戊申，经略忻都等兵至耽罗，抚定其地，诏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尹邦宝副之。”《元史》卷208，高丽传附耽罗传：“至元十年正月，命经略使忻都、史枢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讨耽罗贼党，六月平之（系4月之误论）。于其地立耽罗国招讨使，屯镇边军千七百人。其贡赋咸进毛施布百匹。招讨司后改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按抚司。”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12年7月：“以高丽军千人屯耽罗，其留戍四百人，从之还家，从之。”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4年闰6月丙辰。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12年6月：“以孙摊为耽罗国达鲁花赤。”

③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10月庚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10月。参阅《元高丽纪事》（《元经世大典》之一篇）附耽罗传，至元6年7月5日至7月20日条。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宋史》卷487，高丽传。参阅池内宏著《元世祖与耽罗岛》，该文刊载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出版于1927年的《东洋学报》第16期，见其第137页到138页。

黑山岛视为军事要冲，1273年（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三别抄一被剿灭，他就在耽罗设置了招讨司，使耽罗像高丽西北面的东宁府一样成了蒙古的直辖领地。只是由于这里在其征伐南宋与征伐日本方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蒙古才于1276年（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在这里设置了牧场，放牧了160匹马，并将罪犯流配到这里。蒙古在这里设置招讨司之后，招讨司被先后改称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和达鲁花赤总管府。蒙古人在这里往来频繁，但都经由高丽。

1293年（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蒙古世祖驾崩。这年5月，高丽忠烈王不失时机请求蒙古的新任统治者成宗，将耽罗还给高丽。成宗欣然应允。于是，高丽于1294年闰4月任命崔瑞为济州牧使，到耽罗上任。^①

1277年（忠烈王三年，元至十四年），蒙古在济州设牧马场，并派遣了牧子牧胡管理牧马场。这个牧场一直到高丽末期，都由蒙古的牧胡一手经营。

第四节 蒙古统治高丽与西京以北地区的归还

高丽与蒙古的战争结束后，蒙古为了统治高丽，迫使高丽国王到蒙古朝觐皇帝，又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如前所述，1269年（元宗十年），叛徒崔坦投降蒙古，献上西京及北界五十四城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0年5月甲寅。《高丽史》卷31，世明忠烈王21年闰4月癸丑。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高丽王上言：‘耽罗之地，自祖宗以来，臣属其国。林衍逆党既平之后，尹邦宝充招讨副使，以计求经朝廷，乞仍旧。’帝曰：‘此小事，可使还属高丽。’自是遂复隶高丽。”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和慈悲岭以北北海道六城之后，蒙古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东宁府，把这一地区划入了蒙古的版图。

1270年（元宗十一年）2月，元宗去蒙古朝觐时，曾上表章要求将西京及其以北地区还给高丽。这份表章写道：“权臣已除，臣将率领江华岛臣民还都旧京。崔坦等理应放下武器，回到高丽怀抱，怎可裂土以治？此乃违规悖本之妄行。天子以四海为家，义披五洲。诸侯则应当安慰百姓，捍卫疆土。伏望许还诸城，俾属本国。”^①

这年8月1日，元宗让世子王谌到蒙古，再次上表请求归还西京以北地区。此表章这样写道：“年前，小邦西北面总管幕下吏崔坦……遂胁西北鄙诸城，以树其党，即诣帝所。……而此偏小土地，又割西京以北诸城，别作疆界……伏惟圣慈，归我旧境。”^②

当时，在蒙古卵翼下卑躬屈膝的高丽叛徒们，对祖国高丽犯下了种种罪行，掠取了不少财物。在蒙古的高丽人，有人曾请求蒙古朝廷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③对此，元宗曾给蒙古世祖呈上表章，表示坚决反对。它写道：“据说有人请求在高丽设置屯田机构，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小国林衍发动叛乱，朝廷派兵平定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年11年2月庚辰：“王上表，请西京复属。其略曰：‘伏望许还诸城，俾属本国。’”《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2月。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432页的东宁府条，该辞典由教育图书社出版于1989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8月戊辰：“遣世子谌，如蒙古上表……伏惟圣慈，归我旧境，不报。”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8月。

^③ 屯田经略司，是管理屯田的机构。所谓屯田，就是蒙古为了筹措其驻屯于高丽的军粮与财政不足而开拓和耕作的田地。参阅李弘植编《国史大事典》第449页的屯田及屯田经略司条。

之时，在蒙古的高丽人之中有人也曾发动叛乱而南下。还有一些对高丽积怨甚深者，想趁高丽混乱之机，发兵大肆抢掠。……请求在高丽设屯田经略司者，可谓故伎重演，又想东来高丽再大捞一把。他们名曰屯田，实则欲施残害（亦即侵害）。倘若蒙古误信其言，他们会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元宗在表章中提出：如果蒙古不予阻止，那么，蒙古要求高丽履行的六事，高丽也将无法履行，请酌情处理。^①

翌年2月，高丽派印公秀将军到蒙古，请求世祖罢屯田之议。高丽国书写道：“据说蒙古将派军人到高丽屯田。……我国储存的粮食，在还都旧京时已被逆贼抢光，所剩无几。运给蒙古驻军及军马的粮食，已必须到京乡各地挨家挨户筹集，可谓甚是艰难。至于耕牛，都城历来不加饲养，非到山乡寻求不可。忠清道和全罗道，因罹三别抄逆贼之祸，已无耕牛可觅，只能去庆尚道要一些，而该处也不多。”^②

这年3月，蒙古决定在高丽屯田，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蒙古朝廷给高丽所下的通知写道：“忻都与史枢已奉命出任行经略使，去凤州（现在的凤山）等地扎军营屯田。屯田需有牛6000头，除了东京（辽阳）等地业已运给的3000头之外，其余的农具、种子、饲料与军粮，一律由高丽供应！”对此，高丽一一述说了其难处。

高丽派郑汝弼到蒙古，介绍了高丽当时的实际困难：（1）高丽的京都，养牛者微乎其微。山野农民虽然饲养耕牛，养得多的也不过只有两头，而贫穷者无牛，只得以犁耕田，或者雇人带牛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正月丙子。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2月乙卯。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2月。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来耕田。(2) 农民年年耕作，交完租税，从口粮中留下一些粮食作为明年的种子，只够自家使用。所以就是由朝廷出面收取，也不可能收集多少。(3) 高丽储积的军粮，已被逆贼抢掠一空。后来，又得继续为留屯的军马和追讨的军马提供粮食。今后，恐怕难以继续提供。(4) 种子、牛饲料和军粮的需要量共达几万石。现在，三别抄在全国海岸地区大肆掠夺，甚至在珍岛设立了大本营，庆尚道和全罗道的税粮已无法通过水路运到京都，而陆路则本来就不通。这样，在这方面可谓难处多多。

当时，高丽对于蒙古的要求，总是一方面说明自己的难处与窘境，一方面表示将力所能及地尽力照办，^① 仿佛十分竭诚对待毫不怠慢。实际上，则是敷衍了事，不愿意为之效力。

蒙古当时派军队到高丽讨伐珍岛的三别抄，这方面所需的军粮与牛粮是应当由高丽朝廷供应的。然而蒙古的屯田军同样需要耕牛、农具和种子，蒙古竟强求高丽一定要满足其要求。

这年4月间，高丽趁蒙古官员沈浑归国之机，请他转达高丽对蒙古朝廷的答复：对于蒙古送来绸缎以抵3000头耕牛的代价，高丽朝廷表示感谢。高丽朝廷与蒙古的经略使史枢达成的供应量为耕牛1010头，农具1300台，种子1500石。现在，已供应了990头耕牛，其余的耕牛和尚未供应的农具与种子，将尽力而为，加以供应和调拨。

高丽朝廷的有关官员还对沈浑说：高丽由于连年遭受战乱与内患，百姓苦不堪言。倘若蒙古世祖亲眼目睹这种惨状，反而会责怪高丽国王未将百姓的真实状况如实奏报，反而会怪罪于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元宗12年3月丙寅、癸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3月。

朝廷。^①

蒙古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高丽是在夸大其词，故意把情况说得那么严重。于是，蒙古世祖于6月派断事官只必哥等6人到高丽，责问道：“你们派印公秀前来说明情况，他一再叫穷，说是难以满足蒙古的要求。我们派史枢前来调查，提出强烈的要求，你们又说将按蒙古所要求的数字一一调拨，这不是矛盾百出吗？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同时，只必哥又说：高丽百姓乃是蒙古皇帝的子民，你们不能过于让他们难堪，倘若蒙古世祖亲眼看到高丽百姓的实际处境，反而会追究有关人员谎报民情，不关心民瘼。他强调指出：两国已经成了一家人，今后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要老老实实报告情况。

其实，当时，高丽确实没有能力满足蒙古提出的要求。高丽以实实在在的的数字向蒙古说明了这种情况。

8月，高丽派印公秀到蒙古递交国书，其中写道：“高丽国库已很空虚。蒙古驻屯在高丽的军队所需粮食，靠剋扣官吏奉粟供应。然而，就是这样也还不够，只好向百姓征收粮食，现已征收了四五次。今年到秋天为止，蒙古要求调拨的军马粮食为十五万多石，起初，高丽勉为其难。而到现在，高丽已捉襟见肘无法再加供应。高丽百姓缺粮，往往只好以草根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督饬得多么严厉，百姓也已实在交不出粮食。现在，蒙古驻军虽说是六千名，而他们的家属和兄弟常来常往，我们也得为之供应粮食。不仅如此，攻陷珍岛之后，所抓到的俘虏也不能不让他们吃饭，得供应粮食给他们。蒙古驻军门千人，其军马以每人三匹计算，共有一万八千匹，每匹每天得供应五升粮食。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4月丁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4月。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从十月到明年二月，需要供应的军马粮食，按蒙古石数为十三万五千石，高丽石数为二十七万石。四千头耕牛，每头每天按五升计算，从十月到明年三月，所需供应的粮食，蒙古石数为三万六千石，高丽的石数为七万三千石。这样一来，我们既无法救济处于饥饿的高丽百姓，也无法满足蒙古驻军对粮食的需要。情况就是如此，实在无法再调拨粮食，请多加鉴谅。”^①

这年12月，蒙古的忻都从凤州来到京都，指责高丽不继续调拨军粮而使其军马饿死不少，向元宗追问为何调拨军粮如此迟缓的原因。高丽朝廷认为从京都到凤山路途遥远，运送军粮极其艰难，请蒙古军队转至盐州（现在的延安）和白州（现在的白川）屯田。然而，蒙古方面对此表示反对。蒙古的屯田经略使始而严加督促，后来亲眼看到高丽的实际情况，了解百姓生活的惨状，不得不向蒙古朝廷报告：“两度去高丽朝廷督促运送军粮，却还是未予调拨。由于牛与马已死去十分之二三，只好将业已收到的400多石种子作为牛和马的粮食。现在，牛与马继续死亡。今后如果继续供应不上，所有的牛与马将悉数死亡，开春谈不上春耕。”于是，蒙古只好改在盐州和白州屯田。从高丽来说，这样一来运送粮食给他们，总算方便了不少。^②

蒙古想要维持其屯田军的屯田，其军粮必须由高丽供给。蒙古根本不考虑高丽的种种实际情况，一方面将到去年秋天为止的调拨军粮时间延长至今年，另一方面则通知高丽朝廷要给每名蒙古军人增加一斗粮，即给每名蒙古军队供应十斗粮。这样一来，高丽被弄得更加束手无策。1272年（元宗十三年）4月，高丽派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6月丙寅，8月丁巳。《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6月、8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12月甲午、丙午，2月戊午，丁未；13年1月辛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12月。

郭汝弼到蒙古作奏报：“以庚子年（高宗二十七年）到今年四月底，高丽共为蒙古军队调拨粮食 1091999 石 6 斗，为牛马调拨饲料四十三万两千零五石六斗，为蒙古使臣供应大米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一石，为蒙古驻屯军供应种子十万五千石。”这就是已往 32 年间高丽为蒙古所调拨的粮食总量。接着郭汝弼指出：时至今日，高丽已难以筹集两国所商定的粮食数量。每月为蒙古驻军每人供应三斗粮食，已经勉为其难，如果每人再增加供应一斗，还要给攻陷珍岛后抓到的俘虏供应粮食，那么，这样的要求是不恰当的。当时蒙古从女真那里得到了七千石粮食的援助，稍减轻了高丽负担。然而却要由高丽派人运粮，这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运距很远，中间是没有人烟的地带，食宿极其困难。而高丽已无那么多牛和马，其艰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实在无法承担运输这七千石粮食的重任。^①

1272 年（元宗十三年）6 月，高丽派郎将李有庇到蒙古商议对济州岛上的三别抄采取最后剿灭举措时，向蒙古朝廷提到有关调拨军需品的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该调拨给东宁府经略使的粮食，从今年正月到 3 月 17 日已给凤州的 500 多名军人提供足了粮食，高丽已履行完自己的许诺。今后，东宁府应自力解决口粮问题。第二，盐州（现在的延安）和海州等地的蒙古种田军（亦即屯田军），冬天由于没有适宜居住过冬的帐篷，住进了民宅。然而，春天到来后，他们竟然还住着不走，得让他们尽快搬出民宅。第三，济州的高允大等 6 名老百姓于去年 9 月前来归顺高丽招讨使金方庆将军的麾下，而蒙古招讨使忻都则一直要将他们归于其麾下。现在，我们正在说服济州岛百姓离开三别抄的魔爪而前来归顺。如果他们知道归顺后将归蒙古军管辖，他们会继续前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3 年 3 月丁巳。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来归顺吗？所以，请蒙古朝廷命令忻都今后不再管辖前来归顺的济州人。第四，高丽给蒙古军供应粮食，到今年夏秋之交算是期限已满。请给予明确答复：究竟到哪一个月，高丽可以停止粮食的供应。

蒙古的东宁府经略使根本不把高丽的实际情况放在眼里，而继续督促高丽朝廷调拨军需品。1274年4月1日，金方庆将军向高丽朝廷奏报：蒙古的忻都一再强调：讨伐济州三别抄的军队粮食必须够吃三个月。而要做到这一点，得用全罗道官员的禄奉来充当。高丽朝廷闻报，只好命人把庆尚道庚午、辛未（1270年～1271年）两年所收的租税全部调拨到讨伐军那里。^①

在完全荡平济州的三别抄之后，蒙古为了实现于1274年正月征伐日本的计划，一方面要求高丽赶造300艘战舰，另一方面任命洪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员总管，负责监造这些战舰。洪茶丘要求高丽出动35000名技术人员和民工。这些人员从1月15日开始造船，洪茶丘督促甚急，不让造船人员有喘息的时间。

高丽朝廷见民工及技术人员忍受不了，特派别将李仁到蒙古说明实际情况，要求取消这一指示，李仁上呈的国书谈到了有关情况及要求：

(1) 造船工程已由1月15日开始动工，共计出动了35000名技术人员和民工。一人一天吃三餐，三个月里共需准备粮食34312石5斗。

(2) 1月19日，接到蒙古的命令，声称忻都指挥的4500名蒙古军队去金海，需军粮1570石，加上驻屯处的军粮和造船监督洪茶丘麾下500名士兵的85石粮食，一律均得由高丽供应。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6月壬子；14年4月癸未。《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4年4月。

(3) 留守济州的官军和高丽士兵 1400 名的七个月口粮已经供应完毕，总共供应了粮食 2904 石。

(4) 在罗州的奥鲁阔端赤的军粮 8000 石与马料 1325 石，也让我们调拨。

(5) 至元 10 年（元宗十四年，公元 1273 年）12 月，蒙古命令我们给济州 10233 名老百姓供应粮食。

(6) 最近拨来的军马的马料，高丽政府负担不了，只好向百姓征收了好几次。

(7) 前年建造战舰，去年 4 月大军进入济州讨伐匪徒，5 月底才归来。这样一来，百姓根本无法务农，秋天没有收成，只好让官吏与富有百姓负担，共筹粮 40000 多石。

(8) 金海、全州、罗州的驻军及济州军民的粮食，高丽朝廷实在难以供应。

(9) 蒙古要求高丽每月负责供应凤州（现在的凤山）驻屯军的缺粮 2047 石和牛料 1001 石七斗。而种田军（即屯田军）的耕牛、农具、种子、青黄不接之粮以及至元九年（1272 年）不够的粮食等等，我们都已供应过了。

去年，由于遭受水灾与虫灾，粮食作物大大减收，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因此，只好请求将以上所列举的各项粮食全部免交。^①

如上所述，蒙古自西京设置东宁府，把高丽慈悲岭以北的地区归于其统治以来，给高丽施加了种种压力，甚至设置了屯田军，强迫高丽为之调拨军粮和牛马的饲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高丽，使高丽陷入困境。1290 年（忠烈王十六年，元至元二十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5 年 2 月甲子。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9，元宗 15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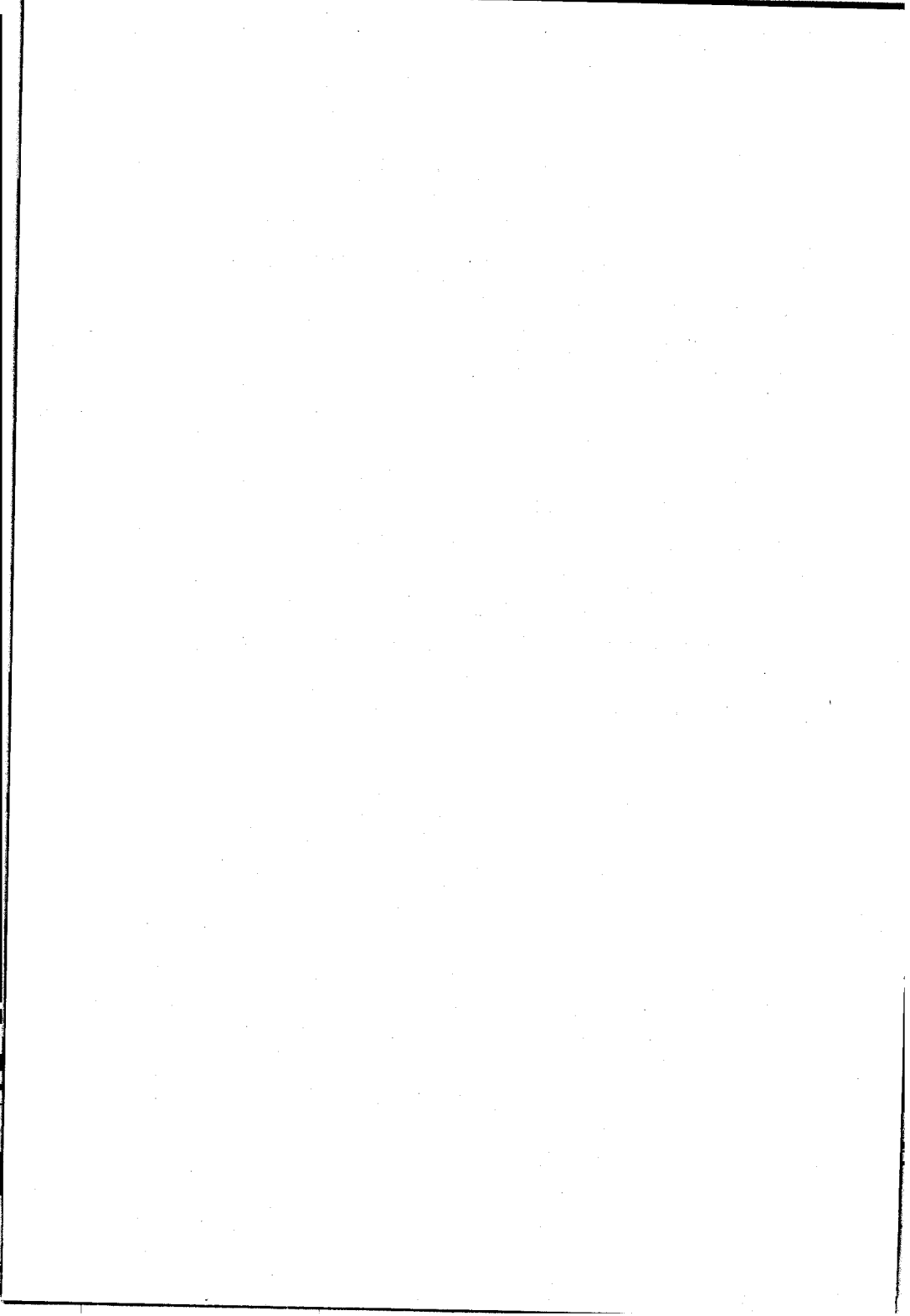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还都开城与蒙古统治高丽

七年) 3月, 忠烈王从蒙古归国。他于 1289 年 11 月到蒙古, 世子与公主同行, 又一同归国。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 忠烈王向蒙古成宗提出归还要求, 成宗欣然答应将其东宁府所管辖的西京以北土地全部还给高丽, 东宁府则迁往开原。此后, 高丽需向蒙古军队调拨军粮的问题, 也因而得到了解决。^①

蒙古的东宁府迁至开原, 并将西京及其以北各个城池还给高丽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蒙古在高丽东北面所设置的双城总管府的情况。1258 年(高宗四十五年) 12 月, 蒙古车罗大率领军队侵略高丽, 要求高宗去蒙古朝觐。车罗大部将散吉大王和普只官人等率领将士进驻古和州(现在的永兴)。当时, 龙津县(现在的定平)人赵晖和卓青向蒙古投降, 将古和州以北土地献给蒙古。蒙古在此设置双城总管府, 任命赵晖为总管, 卓青为千户, 由他们负责管辖铁岭以北的地区。从此, 这一地区被蒙古统治了近一百年, 至 1354 年(恭愍王五年) 5 月才归还高丽。^② 至于蒙古设立的耽罗总管府的情况, 前已经述及, 在此不再复述。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0, 世家忠烈王 16 年 3 月丁卯: “王及公主世子, 至自元, 帝诏罢东宁府, 复归我西北域。”《高丽史节要》卷 21, 忠烈王 16 年 3 月。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 第 472 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史世篇》, 第 612 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 24, 世家高宗 45 年 12 月己丑。《高丽史》卷 39, 世家恭愍王 5 年 5 月丁酉: “罢征东行中书省理门所……改鸭绿江以西八站……收复双城等地。”



第三篇

衰退期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第一节 高宗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译音，系蒙古的官职名称，总督或知事之谓。《元朝秘史》谓噜合臣。长春真人的《西游记》称之为塔剌忽只。^①清朝的赵翼对之作了这样的说明：“达鲁花赤，掌印办事之长官，不论职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县，皆设官。”^②

蒙古太宗在位时高丽与蒙古的战争，亦即所谓蒙古太宗的高丽征伐，前后三次，历时十一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高丽与蒙古的战争，蒙古军队由撒礼塔（撒儿台）指挥。第三次战争，蒙古军队由唐古（唐兀台）任元帅。第一次战争结束、双方媾和时，蒙古在高丽设置了其官吏，亦即达鲁花赤。第三次战争一结束，蒙古又决定设置达鲁花赤，经高丽提出反对而终未设。也就是说，蒙古太宗在第二次命令蒙古军队入侵高丽之后未设达鲁花赤，至

^① 参阅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1, P70. 达鲁花赤，亦可译为镇守官、断事官、地方官厅长官。达鲁花赤有两种：一是直接治理被占领区的百姓；二是干预整个国家的事务。

^② 参阅《二十二史劄记》卷29，蒙古官名。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58页至559页，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蒙古世祖至元七年之后，复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①

高丽与蒙古双方最早商定在高丽设蒙古的达鲁花赤，是在1231年（高宗十八年，蒙古太宗三年）12月。高丽高宗派其弟与闵曦，到设在安州的蒙古军队的大本营要求媾和。12月5日，蒙古军队统帅撒礼塔（撒里台）接受这一建议，同意讲和。双方在谈判中商定，蒙古可在高丽的京、府、州、县设72位达鲁花赤，监督高丽的行政，同时，蒙古还可在高丽留下一些守备军。翌年正月11日，蒙古兵撤离高丽。在这一个多月里，如果说蒙古军队真正任命了达鲁花赤，但因时间过于仓促，当时似乎只是作了任命。这些达鲁花赤的上任，则是以后的事了。

这72名达鲁花赤究竟驻扎在高丽的哪些地方，史料未作详细记载。当时，蒙古军大约占领了高丽40个州县，如果每个地方安排一位达鲁花赤，72人似乎太多。若是给高丽所有的京、府、州、县都安置一位，却又显得人数太少。所以，很可能当时主要设置在高丽北部的几个州县。

这些达鲁花赤究竟是蒙古朝廷所设，还是蒙古军元帅所设，史料未作记载。高丽正史也对此只字未提。连高丽末年的学者李齐贤对此也这样写道：“国史既无其文，问之遗老，亦莫之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8年12月壬子；19年正月壬辰。参阅池内宏著《元朝驻高丽的达鲁花赤》，该文刊载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都出版于1929年的《东洋学报》18-1，见其第277页。参阅箭内互著《蒙古的高丽经略》，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1918年出版于东京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4，见其第251页。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此尤可惑者也。”^①

依笔者看来，蒙古的达鲁花赤最早实质上来到高丽，是在1232年（高宗十九年，蒙古太宗四年）2月。当时，统管高丽事务的都旦来到了高丽。这个都旦，是在高宗之弟、淮安公王佖作为使臣到蒙古呆了一个时期之后回到高丽时，与蒙古的24名使臣一起抵达高丽的。当时，他听说高宗想迁都江华岛，便对高丽官员说道：“我奉命前来这里总管高丽国事！”说完，就想不顾一切规定与礼节进入宫城。高丽朝廷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命人关紧广化门，命令右承旨庾敬玄前去制止都旦进入宫城。然后，高丽大臣们在宫城里大摆宴席。

都旦认为他应该参加宴会，并与高丽国王并排坐在一起。高丽方面很想加以制止，后经研究，才在傍晚时分允许他出席宴会。都旦对此大为不满，竟于3月间以迎送判官郎中闵怀迪在宾馆对他接待不周为借口，而将闵怀迪活活打死。三天后，他又声称在宾馆独住甚为孤寂，提出要迁至民宅。高丽朝廷连忙送给他金制酒碗和80匹夏布，才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原是契丹人，为人奸诈，曾请蒙古兵攻入契丹江东城（现在的江东）全歼契丹军

^① 参阅李齐贤著《栎翁稗说》前集（一），引用元朝《经世大典》说明道：“又言，太宗三年，遣撒塔等讨之。其王（高宗）又降，置京府县七十二达鲁花赤而班师。……其所谓达鲁花赤，朝廷之所命耶，将帅承制自治置耶？府县之小即不论，二京达鲁花赤必非微者，亦不书名，何也？且以达鲁花赤若是之多，其置之与杀之，国史既无其文，问之遗老，亦莫之知，此尤可惑者也。”参阅《元高丽纪事》太宗3年12月。《元史》卷208，高丽传。《元史》，洪福源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59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队，杀死了本族不少的同胞。^①

这年4月，高丽派上将军赵叔昌和侍御史薛慎到蒙古，上呈高丽国王的表章，献纳了高丽大量特产。然而，高丽君臣一直视蒙古人为野蛮人，视为夷狄，毫无投降与服从蒙古之意。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想把蒙古势力驱逐出高丽，不想受到蒙古的干涉。当时，龟州的朴犀将军与慈州的崔椿命将军始终坚持抗战，未对蒙古军队屈服。直到蒙古军队撤走之后，他们才奉国王之命打开城门，龟州城于3月打开城门，慈州城至5月才把城门打开。他们的精神，使高丽大臣们深信高丽能够抵御蒙古军队的侵略，转而倾向实行长期的抵抗政策。唯其如此，从这年2月起，各地就传开了将迁都江华岛的风闻。5月间，高丽朝廷遂在讨论对蒙古军队的战略时，有一些大臣主张捍卫开城坚守到底。到了6月，主张迁都江华岛的大臣占了优势，高丽朝廷决定迁都江华岛，决心与蒙古侵略军对抗。

这年5月，蒙古的四名达鲁花赤来到了龙冈和宣州等北面边界地区。他们到任后越来越胡作非为。7月，高丽朝廷派内侍尹复昌到北面边界各城，没收了达鲁花赤的弓箭。史料所载的没收弓箭，到底是指没收其武器还是剥夺其兵权，尚不得而知，总之反映了高丽朝廷和百姓对蒙古的敌意。结果，尹复昌在宣州为达鲁花赤所杀。8月，西京巡抚使、大将军闵曦为履行职责巡抚西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2月戊辰、辛未、丁丑，3月甲申、丙戌：“二月戊辰，淮安公佺与蒙古使都且，上下节二十四人来。丁丑，王欲移御杨堤坊别宫，都且问之曰：‘我因都统高丽国事，差使到此，将入处大内。’朝议难之。……都且欲与王连坐，又欲仍处于内。……三月甲申，以馆迎送判官郎中闵怀迪不能支对，杖杀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9年2月、3月。参阅池内宏著《元朝驻高丽的达鲁花赤》，第282页。参阅池内宏著《蒙古的征伐高丽》979页，该文刊载在《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0期，见其第131页至137页。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京，曾想发动将领谋杀西京的达鲁花赤都旦。居住在西京的人们闻讯说道：“如果谋杀了达鲁花赤，西京便会像平州（亦即平山。1231年〔高宗十八年〕11月，蒙古军队攻进平州山城，杀死州官，血洗此城）一样被蒙古军队屠城。”遂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官府叛乱。

高丽朝廷对于这次企图杀害达鲁花赤的事件，作了这样的解释：北面边界有一两个城池的叛徒糊里糊涂惹恼了该城的达鲁花赤，使之杀害高丽百姓，却造谣说高丽国王派去的内侍策划谋害达鲁花赤。这位内侍并非是要去杀害达鲁花赤，而是去侍候蒙古使臣，以便陪使臣进开城，这位内侍与企图杀害达鲁花赤之事毫无牵连。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辩白。实际上则是高丽国王得知蒙古的达鲁花赤杀害高丽平民，便派内侍尹复昌去没收其武器，不许其胡来。于是，也就有了闲曦谋杀达鲁花赤的图谋。

这年9月，高丽朝廷对蒙古朝廷的质询作了这样的答复：“九月……又称达鲁花赤交死则死，留下来如今你每拿缚者事，右达鲁花赤，其在京邑者待遇甚谨，略不忤意，大国岂不闻之耶？……容或有不如国教者，予亦不能——知之，惟上国明考焉。”^①尹复昌欲杀达鲁花赤，反被达鲁花赤所杀，蒙古朝廷以国书追究此事，高丽朝廷所作的答复未提到尹复昌被杀之事，而是进行了上述辩辞，吐露其苦衷，并恳请蒙古朝廷谅解。

对于此后达鲁花赤的情况，以及蒙古已经指派的72名达鲁花赤的去留及命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西京人洪福源和毕贤甫投降并逃到蒙古之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9年5月己酉，7月壬午，8月乙酉，9月，11月，致蒙古答书。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60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尤其是撒礼塔（撒儿台）战死之后，蒙古的达鲁花赤们便各奔东西，有的被编入军队，有的则悄然而归。因为，当时在高丽的蒙古军队有统帅指挥，设置在高丽的几个总管府又各有总管，达鲁花赤们已无所事事。

还有的学者认为，达鲁花赤之所以一下子在高丽销声匿迹，是因为他们奉蒙古世祖之命，与李鲁合反儿和拔都鲁等一起撤离了高丽。^①

1252年（高宗三十九年，蒙古宪宗二年）7月，蒙古将军也古为统帅，带领李岷、洪福源和永宁君王绰，率领蒙古军队来到高丽。当时，蒙古宪宗让永宁君王绰带一封信给崔沆，命其出陆。宪宗还对永宁君说：“你与李岷一起去高丽，传述朕的命令，劝崔沆出陆。”李岷当时根据宪宗的这一谕旨，规劝高丽北面边界的几个城池投降蒙古，自己则成为达鲁花赤，率领业已投降的东州与春州的百姓去攻打忠州城，围攻了70多天，还是未能让忠州城的军民向蒙古投降。

其实，蒙古设置达鲁花赤，也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蒙古宪宗四年）11月，蒙古的也古（亦称也窟）一方面敦促高丽朝廷出陆还都，另一方面向高丽朝廷通报蒙古将增设达鲁花赤。高丽朝廷对此的回答是：增设达鲁花赤难免会有后患，而且会影响到高丽朝廷的还都旧京。^②也就是说，

^① 参阅《元史》，洪福源传：“唯洪福源留屯”。参阅《高丽史》卷23年，世家高宗20年5月：“西京人毕贤甫、洪福源等，杀宣谕使大将军郑毅、朴禄全，举城叛。”参阅箭内互著《蒙古的高丽经略》第291页的注29与注33。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元年8月壬子。《元高丽纪事》世祖中统元年6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32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0年11月丁酉。《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李岷传。

高丽反对设置达鲁花赤。

第二节 元宗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高丽与蒙古在战后媾和，实际上就是高丽向蒙古投降。在处理善后过程中，蒙古派遣达鲁花赤之事，又提上了议程。此时派遣达鲁花赤到高丽，无论是对哪一方来说，都似乎已是顺理成章之举。

1260年（元宗元年，元世祖中统元年）2月，元宗访问蒙古后踏上了归途，而蒙古的束里大和康和尚等达鲁花赤则跟随元宗来到高丽。奉命迎接国王的参知政事李世材等本来打算在西京迎接国王。哪知他们到达西京时，国王一行人已经由西京向开京进发。达鲁花赤束里大勃然大怒，说道：“国王归来，为何迎接来迟？于琬所言，确实不假！”他作为蒙古的达鲁花赤，指责高丽重臣怠慢国君，一个个放肆得不把国王放在眼里。

束里大同高丽元宗抵达开京，一同来到知天府外。当时，不知束里大是想看看高丽国王把他视为高于国王的蒙古代表，还是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达鲁花赤，故作谦虚地让国王先走。元宗则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的想法是如此复杂，兀自走进了升天府。哪知束里大等竟然十分不悦，当即佛袖到城外。元宗当即命人去请束里大进城和进升天府，而身为达鲁花赤的束里大却以彼此合不来为借口，拒绝进城，声称将返回蒙古而到鸟山。为了使他消气不致贸然回国，元宗派御史中丞金洪就和将军白永贞去其下榻之处，

送给他 30 斤白金。他收此贿赂后才回到升天府。^①

束里大与康和尚见到元宗，对他们所受到的隆重接待表示感谢，并劝元宗出陆。当他们看到高丽朝廷表示了出陆还都的意向后，先行到开京。这时，被蒙古军队抓到的三名三别抄逃走后又回来归顺。束里大厌恶他们，认为他们在两国之间反复无常尽说假话，妨碍两国的友好，下令将他们斩首。^②

此后过了数月，高丽人金宝鼎走访束里大。束里大对他说：“高丽国王从蒙古归国时，曾对蒙古世祖说：‘臣一回高丽，立即还都开京。’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还想不想还都？你们到底有几个脑袋？而我只有一个脑袋，所以有畏惧之心。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可等待的呢？我立即回蒙古去！”束里大实际上是在强迫高丽朝廷赶快出陆还都。^③

这年 7 月，达鲁花赤束里大派人到高丽朝廷说：“旧京的宫阙与民宅几乎都修建好了。束里大这就去西京。永宁公如来，束里大就同他一起回来，否则就回蒙古去。你们献给蒙古皇帝的宝物和送给也速达的礼物，可让束里大捎回。束里大来时带来的马几乎死尽了，快送 50 匹马给他。”

高丽重臣们当即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经过讨论，大家认为靠大臣们出面，不足以阻止束里大回蒙古。由于束里大已有了一肚子的火气，只好由国王亲自去挽留他。这些大臣知道，高丽未遵守出陆还都的诺言，已是理亏，如果国王不出面，后果不堪设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5，世家元宗元年 2 月乙丑，3 月甲申、乙酉、丁亥。康和尚不是蒙古人，原是晋州人，小时被抓到蒙古，后来改名为康守衡。

② 参阅《高丽史》卷 25，世家元宗元年 3 月乙未，4 月庚子。《高丽史节要》卷 18，元宗元年 3 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 25，世家元宗元年 6 月庚戌。《高丽史节要》卷 18，元宗元年 6 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想。

于是，元宗屈尊到束里大下榻处。束里大与元宗坐在同一张酒桌边，命人摆上酒宴。他在交谈中举止无礼，态度冥顽不化。元宗深知束里大在这种情况下赌气回国，会给高丽惹来许多麻烦，因而明知束里大不讲礼节，也只好忍辱负重请他继续逗留。束里大说他的去意已定，不想再呆下去。

15天之后，束里大依然留在西京，却给元宗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质问道：“王曾聆听蒙古世祖的面谕，难道还在留恋江华岛舍不得离开？王是否想定都于他处？对于不出陆的主张，王是赞成还是反对？是不是王的文武百官喜欢呆在江华岛上？”千言万语概括为一句话，还是强求元宗及高丽朝廷出陆还都，警告高丽朝廷勿再拖延。

翌日，元宗接见束里大与康和尚等，同他们一起传阅了永安公王僖从蒙古回国时捎来的蒙古世祖圣谕。蒙古世祖诏书的内容主要有：(1) 通报世祖的年号已改为中统。(2) 衣饰制度可按各自国家的风俗行事。(3) 使节必须委派朝廷级的重臣。(4) 迁都开京可尽力而为。(5) 所设置的达鲁花赤、孛鲁合反儿、孛都鲁(都是官职)等一律向西转移。

蒙古世祖的诏书，有关达鲁花赤有两种重要的谕示：第一，当时，高丽所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出陆还都问题。蒙古世祖让达鲁花赤在这个问题上，按照高丽的筹备情况，敦促其尽力而为再尽快完事。当时，高丽最不想做到的就是出陆还都，却又不好对付蒙古方面的催促。而今，蒙古世祖下了这道命令，高丽朝廷便可

量力而行度时而为。第二，世祖决定召回在高丽的达鲁花赤。^①

1262年（元宗三年，元中统三年）7月，蒙古世祖向其达鲁花赤发出指令：为高丽使臣来往于蒙古提供方便，不许从中作梗；还要积极协助高丽，将其献给蒙古的鹰鹞顺利送至蒙古。^②从这一情况看来，可知尽管蒙古世祖两年前发出了“原设达鲁花赤一行人等，俱敕西迁”的指令，此后还是在高丽留下了一些达鲁花赤。

1268年（元宗九年，元至元五年）2月，蒙古世祖向逗留在蒙古的高丽元宗之弟、安庆公王湑追问的具体事项，传到了高丽朝廷。此中之一是：高丽如果真心投降，就应当助军，亦即派军队参加蒙古的征伐，还应当派人为蒙古军队运粮。此中之二就是要达鲁花赤好好调查一番：高丽为何不进行民众户口调查。由此可知，蒙古派到高丽的达鲁花赤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高丽的户口。紧接着，蒙古世祖派北京路总管兼大定府尹于也脱脱到高丽，其使命就是：督促高丽做好设驿站、助军（为蒙古征伐宋朝提供军队与战舰等）、运粮等“六事”，询问高丽元宗对达鲁花赤进行户口调查的看法和态度。^③

这也就说明，蒙古达鲁花赤的任务，是督促做好“六事”。由此可见，达鲁花赤在高丽实际上权力是极大的。

1270年（元宗十一年，元至元七年）5月，蒙古任命脱朵儿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宗元宗元年7月戊子，8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元年8月。《元高丽纪事》，世祖中统元年6月：“复降诏，谕诏曰：“卿表请附奏六事，一皆允。……元设达鲁花赤一行人等，俱敕西迁。”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585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3年7月壬寅。

^③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9年2月壬寅，3月壬申，4月丙戌。《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2月、3月、4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为达鲁花赤。9月，脱朵儿去江华岛作了实地调查，了解江华岛的现状，观察高丽朝廷出陆的意向。脱朵儿一上任，高丽朝廷便设宴款待他，对他接待得很隆重。他看到一向采取拖延战术的高丽确已做好了出陆迁都的准备工作，便于10月要求娶一个良家姑娘做其儿媳妇，高丽朝廷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这说明尽管蒙古世祖于1260年答应让高丽根据自身的情况兀自行事，实际上到了1270年已在加紧敦促高丽尽快出陆还都。

1270年12月，高丽世子王谌从蒙古回国时，蒙古任命不花和孟祺为断事官，让他们同高丽世子一起赴高丽上任。他们同世子一起抵达高丽京都时，元宗曾迎至郊外。当时，达鲁花赤脱朵儿已在高丽，为何蒙古又要加派断事官，难道断事官与达鲁花赤是不同的官员？当时，蒙古到高丽上任的达鲁花赤不止一名，而是有一些。断事官与达鲁花赤会不会是官名不同，而实际上则都是蒙古的中级官员呢？这有待学者们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从元宗亲自迎接到郊外看来，会不会是当时在高丽看来，断事官不花和孟祺的重要性比达鲁花赤脱朵儿更大呢？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轻率得出定论。^①

1271年（元宗十二年，元至元八年）1月，崇谦、功德、官奴等形成集团，想杀死达鲁花赤和高丽朝廷的重臣，与珍岛的三别抄沆瀣一气，联手驱逐蒙古的势力，彻底铲除以事大为能事、一味对蒙古阿谀奉承的朝廷重臣。队正宋思均得知这种情况后，向元宗告密，元宗让将军崔文本与曹子一率领军队立即逮捕他们。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5月丙午，9月丙午、戊午，闰10月乙酉，12月乙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5月、11月、12月。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

然而，此事并未到此了结。洪茶丘为了对高丽肆行报复，公报私仇，一直在窥伺时机。他在审问崇谦等时，诱其捏造反蒙之举系受高丽朝廷指使，并以此为企图起兵攻打开城的借口。他曾就此事与达鲁花赤脱朵儿作过秘密协商，而脱朵儿则以沉默对此表示反对。

元宗派知枢密院事李玄原和上将军郑子琦去达鲁花赤脱朵儿处求助。脱朵儿和洪茶丘等一起，召集高丽的大臣们，对崇谦等10余人进行审讯，崇谦等都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同高丽朝廷毫无关系，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密谋。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才算迎刃而解。^①

达鲁花赤脱朵儿其人自有其可取之处。这年2月，他对元宗说：蒙古驻军中，驻屯于南方的部队会骚扰州郡，使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应当派人前去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元宗当即派张镒去庆尚道，朱悦去全罗道，郭汝弼去忠清道，努力保护当地的百姓，使之不受蒙古军队之骚扰。作为达鲁花赤，这样的事情本该他自己去处理，或者由他去与蒙古驻军的司令协商解决，而他却向高丽元宗提出建议，由高丽方面出面加以解决，真是罕见的事例。

当时，脱朵儿为其儿子物色媳妇，声称其儿媳妇必须出之于高丽大臣之名门。高丽大臣们一听，甚是畏惧，争先恐后把女儿嫁给本国合适的人家。高丽朝廷只好让宰相家的两三个闺女作为候选者让脱朵儿挑选。脱朵儿认为金链的女儿很漂亮，选中她为其儿媳妇。^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1月癸巳。《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附洪茶丘。《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正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2月辛亥、庚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月2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这年4月，有人向达鲁花赤告密，诬称有个团伙打算在4月8日的燃灯会那天搞叛乱。脱朵儿信以为真，曾避身于城外，一连几天未回城。16天后，他奉蒙古世祖之命，与高丽重臣们商议之后，将杀死江华岛窄梁守备军士兵的唐城人洪泽斩首，将其同伙洪均庇等笞杖数十。这年5月1日，他与高丽大臣们检阅高丽军队后，出动了500名高丽军队去讨伐三别抄。当时，连带兵者每人也只能有一匹马。于是他们在行军途中，竟然去抢夺行人的马。脱朵儿确认在这些士兵中无一人是大臣们的子弟之后，让大臣们把自己的马让给出征的士兵们骑。^①

史料还留下了一些有关当时蒙古断事官的记载。这年4月，断事官沈浑回蒙古之时，高丽朝廷请他捎去一封致蒙古世祖的奏章。奏章说断事官沈浑处理“六事”非常认真，并用统计数字说明他收集了大量的耕牛、农具和种子。奏章写道：“高丽百姓都是皇帝（指蒙古世祖）的子民，这些耕牛、农具、种子被搜括一空，百姓何以维持生计？他们只能束手待毙。而且，此处百姓的赋役很重，已无力负荷，达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这份奏章，旨在奏报蒙古断事官的榨取过于苛重。也就在同月，蒙古又派来了只必哥等6名断事官。蒙古世祖通过他们指责高丽装穷叫苦，责令断事官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按原定数字把耕牛、农具、种子如数收齐上交。13天之后，高丽趁断事官只必哥等归国之机，再一次向蒙古世祖详细吐露了筹措耕牛、农具、种子的艰辛与难言之隐。

当时，高丽还向蒙古中书省告发了叛徒李黄秀的罪行，请蒙古当局对李黄秀进行处置。李黄秀是逆臣林衍的内侄，同林衍一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4月庚子、乙卯，5月癸亥。《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5月。

起参与了废黜元宗的事件。他因而被捕入狱，却趁机越狱潜逃至蒙古，与逆贼洪茶丘沆瀣一气，又与洪茶丘来到高丽。他贼性难改，继续作恶，在随蒙古军讨伐三别抄时，抓到 100 多名男女，以之为自己的奴隶，还抢掠到 150 多套衣服、大量的大米大麦以及一些战船。高丽朝廷明知其罪行，却奈何他不得，只好借助断事官只必哥和达鲁花赤脱朵儿之手追究其罪行。他与其同伙一一招供了其不法行径。然而即便如此，高丽朝廷仍无法处罚他，只得向蒙古中书省告发他，请求蒙古处置。这一事实说明，洪茶丘和李黄秀等宵小背叛高丽逃到蒙古之后，不仅卖身求荣，而且倚恃蒙古对他们的信任滥用权力，回到高丽变本加厉，以权谋私，对高丽和高丽百姓犯下了滔天恶行。^①

珍岛三别抄被剿灭之后，这年 9 月，高丽朝廷委派特使到达鲁花赤脱朵儿和蒙古军队司令忻都所在的鸟山，请求将逆贼之外的高丽百姓还给高丽。忻都不同意这样做，达鲁花赤脱朵儿则强烈主张释放无罪百姓。结果，忻都只好释放了一部分无辜百姓。这年 12 月，达鲁花赤脱朵儿病逝于高丽。

12 月，已经抵达高丽的副达鲁花赤焦天翌声称兵器不得由个人收藏，责令高丽人交出其在攻打珍岛时所持有的一切武器，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2 年 4 月丁巳，6 月甲午、戊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19，元宗 12 年 6 月。本来就有达鲁花赤脱朵儿，又有断事官赴任，它与达鲁花赤是否相同或者达鲁花赤不仅是一人，而是有数人，或是名目不同而实际上则完全相同？这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断事官不花等到高丽时，与达鲁花赤脱朵儿赴任时不同，由国王亲自出迎。在高丽看来，也许断事官比达鲁花赤更为重要。达鲁花赤长期滞留高丽，负责处理综合性的事务，断事官则似是专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来。元宗 12 年 6 月，来自蒙古的断事官沈浑，也称达鲁花赤。看来，达鲁花赤与断事官又似是相同。参阅《高丽史》卷 27，世家元宗 12 年 6 月丙申。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由驻扎在盐州（现在的延安）的蒙古军兵营负责统一加以管理。^①

1272年（元宗十三年，元至元九年）4月，蒙古任命李益为达鲁花赤。他被派到高丽时，元宗亲自到城外迎接他。^②

李益到任后，史料所记述的达鲁花赤的活动不多。1273年2月，一向以折磨高丽为能事的叛徒洪茶丘从蒙古一回到高丽，便与达鲁花赤李益和马绛进入高丽的三宫，商议如何征讨尚在济州岛盘踞不肯投降的三别抄。3月，李益以西海道战舰损失过多为由，追究按察使禹无锡的责任。

在这个月，蒙古使臣赵良弼去日本访问太宰府之后，因无法去日本京都而返回。他在归途中来到高丽。元宗当即接见了，对他的风尘仆仆表示慰问之忱，还送给他3斤白银和10匹夏布。达鲁花赤李益也向他送了礼。赵良弼对李益说：“你在高丽拚命搜括，高丽百姓怎样度日？”他没有收受李益的礼物。由此可知，达鲁花赤李益是个以权谋私的宵小，在政治方面则毫无作为。而赵良弼在蒙古朝廷就对此早有所闻，故而不愿与之深交。

蒙古与高丽联军剿灭济州岛三别抄之后，蒙古于同年闰6月在济州设置了达鲁花赤。8月，元宗去蒙古祝贺蒙古世祖的生日。当时，达鲁花赤率领其部下站在元宗的右侧，上将军康允绍曾为林衍和洪茶丘的走狗，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当时带领其同伙也在一侧。这些家伙都身穿蒙古服站得笔直，却不向元宗行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9月庚午，12月己亥。脱朵儿为人慎重宽厚，爱护百姓，从不违法乱纪，处理事务公正无私。因此，元宗对他很尊重。他患病之后，高丽国医为之诊病用药，脱朵儿谢绝，说道：“我已病人膏肓，治亦无益。如果我服下你们开的药而死去，一些以诬告高丽为能事者便会造谣说是高丽把我毒死的。”终未服药而死去。他去世后，高丽人都为之惋惜，对他怀念不已。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4月癸卯。

礼。元宗怒不可遏，却管束不了这些恬不知耻的叛徒。

9月，副达鲁赤焦天翌任期届满，离开高丽回到蒙古。

11月，蒙古中书省令达鲁花赤杀死如前所述图谋谋反的于琬。

12月，新任达鲁花赤到高丽上任，元宗到宣义门外迎接他。^①这位新到任的达鲁花赤究竟是谁不详，史料未作记载。从李益当时仍在任上看来，他似乎是史料所记载的副达鲁花赤周世昌。

第三节 金方庆将军与达鲁花赤

金方庆从小就很会念书，写得一手很漂亮汉字的。他为人正严谨慎，嫉恶如仇，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

1270年（元宗十一年）6月13日，元宗任命金方庆为逆贼招讨使，与蒙古军队一起追击三别抄。当时，高丽朝廷以参知政事、中书门下省从二品申思侓为全罗道招讨使，负责沿岸州、县的防御。然而，高丽朝廷的军队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毫无威力可言。三别抄进入珍岛盘踞，不时地骚扰州郡，而申思侓身为全罗道招讨使却毫无剿灭逆贼的念头。有人探问其故，他说：“我已身为宰相，就是再破贼立功，还能被提升当什么大官？”后来他到罗州，听说敌人已经登陆，慌忙逃往京城。全州副使李衫也弃城而逃。高丽朝廷查明此事，随即罢免了这两人的官职。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9月甲子；14年2月己丑，3月辛酉、庚午、乙亥，闰6月丙辰，8月甲子，9月辛巳，11月乙卯，12月丙子。《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臣1，康允绍传。《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4年2月、6月、8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金方庆代替申思佳，与蒙古元帅阿海一起，率领 1000 名将士攻打三别抄。逆贼们包围了罗州。金方庆分兵去全州，却在途中听人说罗州与全州人在一起议论投降，而全州人甚为退缩之事。于是，他独自骑马昼夜兼程到南方，给全州写了封信，宣称：“某月某日将率领一万名大军攻打全州，尔等快快准备军粮迎接大军入城！”信的内容很快就从全州传到了罗州，敌人一听，终于解罗州之围退去。从此，三别抄再也不敢随意到各地烧杀掠夺。

金方庆见讨贼使、上将军边胤和将军曹子一、孔恰愉等眼睁睁坐视敌人攻打锦城而不去解救，便及时向朝廷奏报，请求将他们发配荒岛。元宗对之宽恕，只是将他们降了官职而已。孔愉与宦官过从甚密，经宦官为之斡旋，他们这伙人均被从轻发落。

金方庆与蒙古军队统帅阿海一同驻扎在三坚院，指挥军队包围了三别抄的巢穴珍岛。当时，敌人在其缴获的舰船上画了奇形怪状的野兽，让这样的舰船列满大江，野兽画像倒影映在水面，随水波一蠕动似是要飞向岸上一般。这样一来，高丽与蒙古联军心生恐惧，自然就失去了战斗力。而贼军在双方每次交锋之时必先擂鼓呐喊，然后趁势冲锋掌握主动权。这时，潘南人洪赞和洪机向阿海告状，诬蔑金方庆与孔愉等与敌人里通外合，阿海大惊，把金方庆等抓起来，交给达鲁花赤审讯。

达鲁花赤脱朵儿让金方庆与洪赞对质。达鲁花赤脱朵儿审讯金方庆后，阿海便让 50 名士兵将金方庆将军押送去京都。一路上，凡是看到金方庆将军处境的人无不为之大喊冤枉，有的人为之放声大哭。达鲁花赤经过对质与审讯，对元宗说：“赞等所言诬妄。宜系狱，释方庆。”元宗即请达鲁花赤复令方庆讨贼复授

上将军，慰谕遣之。^①

元宗让金方庆再去率军讨贼，又授予金方庆以上将军的官职时，并非要得到达鲁花赤的同意，而是因为金方庆还要率军与蒙古军队一起讨贼，需要让蒙古方面知道金方庆这位高丽军队的统帅是无辜的，所以必须与达鲁花赤商议，使之将情况通报蒙古军队，树立金方庆将军带兵的威望。

1276年（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月，有人匿名投书于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声称：“贞和宫主失去宠爱后，让女巫诅咒公主（齐国大长公主，名忽都鲁揭里迷失，元世祖之女。元宗十五年忠烈王作为世子在蒙古时与之结婚。忠烈王元年，她被册封为元成公主），诬蔑齐安公王淑（显宗第七子）和金方庆等43人，与李昌庆、李汾禧、朴恒、李汾成等图谋不轨，欲重回江华岛。”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当即拘捕了齐安公王淑和金方庆等，让大臣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审讯。这时，柳墩与诸大臣一起与公主会晤，澄清了事实，随即逮捕了贞和宫主，而将金方庆等全部释放。

翌年，也就是1277年（忠烈王三年，元至元十国年）12月，抱有私人成见的前上将军韦得儒、中郎将卢进义和金福大等向蒙古军队统帅忻都告状，说什么“金方庆及其子金忻、女婿赵抃、义子韩希愈以及孔愉、罗裕、安社贞、金天禄等400多人，图谋摒弃国王、元成公主和达鲁花赤，而去江华岛谋反。蒙古军队征伐日本后，高丽朝廷规定所有武器都交到官府，而金方庆对此置之不理，与其亲戚一起私藏武器于私宅。他还私造战舰，放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方庆与阿海屯三坚院，对珍岛而阵。贼于所掠船舰，皆画怪兽。……达鲁花赤言于王曰：‘赞等所言诬妄。宜系狱，释方庆。’王即请达鲁花赤复令方庆讨贼，授上将军，慰谕遣之。”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在潘南的昆涓与珍岛两县，企图聚众谋反。他的住宅原在达鲁花赤官舍的近处，却偏偏迁往孤卿洞居住。金方庆在征伐日本时，让不善于水战者当水兵、梢工、水手，影响了战果。他让其子金忻守卫晋州，又让幕客田儒把守京山府，让其义子安迪材驻守合浦，让其另一个义子韩希愈掌管舰船，旨在举事谋反，其人极其阴险恶毒。”

蒙古军队统帅忻都一听大为吃惊，当即率领 300 多名骑兵，同达鲁花赤石抹天衢一起，到京城向忠烈王报告了此事。元宗与公主虽然明知这纯粹是诬告，却不得不命令柳璈、元傅、李汾禧、韩康、李柅等与忻都、石抹天衢等一起，采取种种办法审讯金方庆。与韦得儒一起写告发状纸的宫得时等四人对柳璈和元傅等说：“我们四人不识字，韦得儒欺骗我们说：‘你们同我一起告发金方庆，会立功的。只要在这张状纸上按个手印，就有官当，就有赏钱，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禁不住他的威逼利诱，就按了手印署了名，却不知他真的告发了金方庆将军！”韦得儒还向忻都告发：“乙亥年（忠烈王元年，1275 年）间，金方庆对我说：‘你们应当助我一臂之力，把官军都杀死，进江华岛共展雄图！’元帅如果不信，可让他来与我当面对质！”金方庆将军为人正直沉着，一向沉默寡言，得知韦得儒的诬告和无中生有，看着韦得儒等，气愤得说不出话来。柳璈说道：“韦得儒！你已以八大罪状说金方庆蓄意谋反，你现在所说的金方庆的蓄谋，可以说更为重要，为何偏偏不写在告发状纸里？！”金福大和宫得时等害怕韦得儒和卢仁秀报复，明知这是诬陷金方庆，不敢抬头正视柳璈、元傅等和金方庆。

倒是金天禄无所畏惧，环顾韦得儒、卢进义、金福大、卢仁秀等之后，痛斥道：“你们真是猪狗都不如！攻打珍岛时，韦得儒与卢进义违反军纪，中赞（指金方庆）没收了你们的赃物交给

官府。于是，你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现在，你们终于跳出来了，竟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大臣。像你们这样的宵小，如果不遭天诛地灭，那么就真是无天无地，老天爷没有眼睛啦！”

金福大等 14 个说道：“是韦得儒甜言蜜语骗我等签名，状告金将军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出于无奈而昧了良心！”

情况已经十分明显，案情完全水落石出。元宗确认这一事件纯属诬告，当即释放了金方庆等。达鲁花赤也窥出这是一起报复诬告案件，完全同意宣布金方庆等无罪。^①

当时，洪茶丘对祖国高丽怀恨在心，听到了有关金方庆这一案件的传闻，竟添油加醋向蒙古中书省诬告金方庆等，使得这一案件又无法了结。

蒙古方面随即让高丽国王与元成公主一起提审金方庆。忠烈王出于无奈，只好与忻都、洪茶丘一起审讯金方庆及其儿子金忻。当时，洪茶丘用铁丝捆住金方庆的头，让手下人猛敲，还让金方庆终日一丝不挂罚站。当时，天气很冷，金方庆浑身冻成漆黑。忠烈王对洪茶丘说道：“此事忻都与石抹天衢已经审讯过了，已经完全结案，没有必要再审。”洪茶丘却置若罔闻，继续不断拷问，使金方庆一次次昏厥过去。然而，金方庆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不能向暴力屈膝。结果，他被发配到大青岛，其子金忻被流配于白翎岛。

洪茶丘还不死心，派人去蒙古诬告道：“金方庆囤积粮食，建造船只，大量窝藏武器，意在图谋不轨。请皇帝派军队进驻开城以南的要塞，并在各州县设达鲁花赤。将金方庆及其子、女婿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8，世家忠烈王 3 年 12 月丁卯。《高丽史》卷 104，列传 17，金方庆传。《高丽史》卷 104，列传 17，柳墩传。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 610 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 1973 年。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与家属抓回，以之为奴隶，再将其田地悉数没收，作为军粮。”

印侯奉命到蒙古奏报金方庆被流放的事实，蒙古皇帝向他问道：“金方庆所藏匿的武器究竟有多少？”印侯答道：“46辆副车！”副车，是挂在帝王玉辇之后的牛车。蒙古的世祖说：“金方庆想靠这点武器谋反能行吗？高丽州县的租税都已运至京城，用于造船运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听说金方庆在京城建房居住，倘若想谋反，何必建造私宅？”少顷，世祖下达诏令：“让洪茶丘火速回蒙古。高丽国王俟夏后前来向朕详细报告此案的来龙去脉！”

韦得儒和卢进义对洪茶丘说道：“朝廷想举行谈禅法会以诅咒蒙古！”洪茶丘向达鲁花赤石抹天衢转述了这一诬告，并派人到蒙古向中书省告发。

忠烈王得知此事，让将军卢英去蒙古说明此事的真相。蒙古中书省平章哈伯说：“这点小事，叫我们如何去奏报皇帝？你快回去，让你们的国王来蒙古，当面向皇帝奏明！”

卢英回到京都一奏报，忠烈王当即让金方庆父子和韦得儒，卢进义同他一起到蒙古。卢进义见事情对他已不妙，生怕到蒙古后真相大白没有好下场，途中在姚家寨咬碎舌头而猝死。他在弥留之时对大家说：“我被韦得儒所害而到了这等地步！”韦得儒一听，也日夜寝食不安，常常仰天长叹。

忠烈王到达蒙古后，向世祖陈述了金方庆被诬告的几个受冤屈的事实：(1) 被诬为想去江华岛谋反，以杀害公主、国王和达鲁花赤；(2) 征伐日本时，金方庆麾下存藏一些武器，征伐结束后未及时交给官府，却被诬为金方庆所为。(3) 诬告者说有证据可以证明金方庆想聚众谋反，反对忻都。(4) 诬告金方庆在吴木江囤积粮食。(5) 诬告金方庆在潘南等地集结了舰船。(6) 有关谈禅法会之事。

忠烈王对这些诬告一一作了充分的阐明和驳斥，一心想让金方庆摆脱这种诬陷的困扰。忠烈王又让达鲁花赤向世祖详细地说明有关的情况，请世祖作出圣裁。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韦得儒生怕自己所作的诬告暴露，丢人现眼下场不妙，便干脆也嚼断舌头而自尽。

就这样，金方庆得以洗雪罪名而复职，后得以在高丽与蒙古联军征伐日本之时立下大功而留芳青史。

当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例：洪茶丘向蒙古中书省建议在高丽京城以南地区也设置达鲁花赤。由于兹事体大，蒙古中书省只好奏请世祖亲自处理。于是，在高丽的达鲁花赤也只是向世祖奏明了自己的看法，供世祖垂询，使世祖得以做出决定。这件事的处理，未按正常的程序进行，^①一开始就逾越了达鲁花赤这一层次。

第四节 忠烈王在位时的达鲁花赤

1274年（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6月，元宗与世长辞，在蒙古的世子王谏赶回京城，于8月即位，是为忠烈王。

忠烈王收到蒙古世祖准其即位的诏令之后，举行即位仪式登极，接受群臣祝贺，并设宴款待蒙古使臣。在盛宴上，蒙古使臣以高丽国王是蒙古皇帝的驸马，而让忠烈王南向坐上座，自己则向东而坐次席，达鲁花赤坐在三席上。

忠烈王劝酒时，蒙古使臣连忙鞠躬接过酒盅，喝完之后又向忠烈王行礼。然而，达鲁花赤却站立着接过忠烈王敬的酒一饮而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尽，并未行礼。蒙古使臣见此情景说道：“高丽国王乃是天子驸马，你怎敢这副模样？倘若我们归国奏明皇上，你吃罪得起？”达鲁花赤答道：“公主（指蒙古皇帝世祖之女，忠烈王王后齐国大长公主，一名元成公主）不在座，我才如此。这是先王（元宗）在位时所定的先例。”

这说明尽管蒙古使臣和达鲁花赤不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如高丽国王，而只因忠烈王是蒙古皇帝的驸马而让高丽国王坐上座。这还说明，在先王元宗在位之时，达鲁花赤对高丽国王并未给予最高的礼遇。

这年12月，蒙古派黑的到高丽任达鲁花赤。翌年2月，副达鲁花赤周世昌去世。^①

1275年，达鲁花赤黑的禁止高丽百姓持有弓矢。在高丽与蒙古联军征伐日本之时，为了增强战斗力，高丽百姓有不少人持有武器。后来，怕这样一来有可能不时出事故，又怕百姓对蒙古和高丽朝廷不满可能振臂而起进行谋反，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禁令。

7月，达鲁花赤黑的归国。元宗复位时，黑的曾带蒙古皇帝诏书到过高丽。此人生性狡猾，令人难以信任。他当上达鲁花赤之后，态度相当傲慢，忠烈王曾多次劝说，他却当成耳旁风。他在归国前，忠烈王与公主都曾加以挽留，他却我行我素，还是非起程不可，不把忠烈王与公主的话当成一回事。

公主生怕黑的回国后大说高丽的坏话，便趁同知枢密院事许珙与将军赵仁规作为圣节使去蒙古之机，派式笃儿与之同行，负责窥察黑的的行径。然而，黑的归国后并未搞什么名堂。当时，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忠烈王即位年8月戊戌，12月甲寅；元年2月己酉。

济州的达鲁花赤想派使者监督高丽军队，高丽朝廷一方面确立高丽军队的军纪，另一方面反对这种做法。^①

1276年（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正月1日，蒙古统帅忻都与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分别赠送忠烈王一匹骏马作为礼物。正月26日，忠烈王和公主同达鲁花赤一起，在猫串观看了打猎，增进了与达鲁花赤的友谊。

这年3月，有人向达鲁花赤投书，说什么“右正言李仁挺伙同100多人图谋谋杀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当即派人逮捕李仁挺，给他戴上脚镣，要他招供密谋的内容，然而，这是子虚乌有的诬告。达鲁花赤闻一风就如此惊慌而且这样对待李仁挺，受到了很多人的非难。而达鲁花赤则诘难道：“高丽国王宣旨，竟敢使用朕和赦这样只有皇帝才可用的词，这不是僭越是什么？”

忠烈王一听，赶忙让金义中赞金方庆和左承宣朴恒向达鲁花赤作解释，说道：“国王怎敢僭越？这只是按照祖传之规矩办事而已。今后决不会再用这样的词语！”

从那以后，高丽把宣旨改为王旨，朕改为孤人，赦改为宥，奏改为呈。这表明了皇帝与国王的格差，表明了上国与从属国的关系，在当时，这样的指称非同小可，搞错了便会被视为有僭越皇帝权威之嫌。高丽这么做，无疑是瞧不起蒙古，而蒙古达鲁花赤发现后，岂能容得？于是，他公开加以干预。^②

这年7月，高丽朝廷让大将军印公秀陪蒙古的达鲁花赤到洪州，命人挖金。结果，只挖到3两钱。由此可见，当时蒙古达鲁花赤干预的范围之广。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7月甲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元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2年正月丁卯、壬辰，3月甲申。《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2年1月、3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另一方面，忠烈王派金方庆等到蒙古中书省，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的一项是：达鲁花赤张国纲为人清廉，为高丽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而今他的任期届满，请中书省批准他继续留任，造福一方。高丽朝廷的这一请求，当即被蒙古中书省接受。然而，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却似乎做了不少坏事。蒙古使臣曾至高丽调查过他的犯罪事实。由于他未自己主动坦白交代，被蒙古中书省拘禁起来。忠烈王闻讯派朴球到蒙古中书省，为之说情，他才得以被释放。^①

都兵马使当时向国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尚州、清州、海阳、珍岛等州常有盗贼扰民，应给这些州的州官降等；有些人跟随盗贼进入济州，这些人应当被关进监狱。忠烈王只批准了后面的建议，亦即将歹徒收狱监禁。当时，各地有不少人曾与三别抄同流合污，忠烈王为此特地任命将军崔有淪出任人物推考别监，同达鲁花赤张国纲一起到合浦，考察官吏的优劣，追究为非作歹者的罪责。

1270年（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8月，蒙古任命塔刺赤为济州达鲁花赤，让他带160匹马到济州，兼营畜牧业。11月，由于高丽百姓之中仍有人拥有弓矢，达鲁花赤再次禁止百姓拥有兵器。实际上，有些人私藏弓矢，与如前所述匿名诬告金方庆等43人企图进江华岛谋反的事件，也不无关联。^②

1277年（忠烈王三年，元至元十四年）2月，达鲁花赤石抹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2年7月癸丑、甲寅，8月丁卯、丁亥。《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2年7月、8月。达鲁花赤张国纲似乎是在忠烈王元年7月到达高丽（这是《高丽史》第一次对此所作的记载），如果说此时其任期已满，那么，蒙古达鲁花赤的任期似乎为一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2年11月丙辰，12月壬戌；3年正月甲寅。《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2年11月、12月；3年正月。

天衢对忠烈王说：“王为何远君子（善良仁慈者）而近小人（无赖汉）？”看来，当时，蒙古的达鲁花赤对高丽国王的人事任用也曾进行干涉。

这年3月，高丽朝廷对前年蒙古要求高丽采金一事说明了实际情况。当时，有人向蒙古告密，说高丽产金。蒙古朝廷信以为真，命令高丽朝廷组织百姓采金。忠烈王与达鲁花赤商议之后，派官员到蒙古，将前次采到的两钱两分黄金全部献给蒙古。蒙古官吏也忒古奉蒙古廷之命向高丽朝廷传旨：蒙古眼下不必急用黄金，这二钱二分黄金留给公主与忠烈王用。而高丽朝廷则要把每年所生产的黄金数量报告蒙古。于是，高丽朝廷只好与达鲁花赤一起派官吏到洪州产金之处组织百姓采金。当时，出动了11446名百姓采金，采了70天，采得黄金七两九分。蒙古中书省得知之后，让也忒古传达蒙古朝廷的命令：所生产的这些黄金全部由高丽留用。由上可知，蒙古当时干预了高丽的黄金生产，对其开采抓得很紧，达鲁花赤甚至驻扎于采金现场，很不放心。^①

1278年2月，忠烈王与公主去蒙古访问，朝觐了世祖，就达鲁花赤制度和高丽与蒙古之间的政治悬案等，交换了意见。其中，有如下的重要对话：

第一天，参加交谈的有蒙古皇帝、忠烈王和忻都。

忻都：高丽大臣隐匿了不少户口，从而减免了不少赋役，请陛下加以制止。还有，高丽的官制，有一些领与府可予废除，可由军队对之加以治理。

皇帝：这是卿与高丽国王商议之后提出的建议？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3年3月丙子，12月丁卯。《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3年3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忻都：不！没有商议过。

皇帝：那么，朕不允许这样做。

忻都：请问国王，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丽国王未作回答。

当然，这就表明忠烈王反对这样做。忻都对此极其忿恨。9天之后，忠烈王让高丽朝廷给蒙古皇帝呈上奏章，阐明有关金方庆和谈禅法会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有牵连的问题。

这年7月，甲申日，忠烈王又与蒙古皇帝在一起作了如下的交谈：

忠烈王：日前，听说蒙古北伐，臣曾请求回高丽征收租税以支援大军，而陛下以路远为由未予准许。现在，臣前来朝觐，请陛下允许臣从军报效陛下圣德！

皇帝：（边笑边说）北方人阴谋搞乱蒙古的边防。现在，他们已被蒙古军队歼灭了。

忠烈王：日本是岛国夷狄，恃其地理天险不肯投降蒙古，胆敢与高丽蒙古联军对抗。高丽对蒙古的恩德无以为报，倘若陛下允许高丽再造舰船备足军粮，去讨伐日本，必能大获全胜。

皇帝：卿回国后，同大臣们好好商讨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之后，把商议的结果告诉朕。

忠烈王：陛下让公主与臣生活在一起，臣真是感恩不尽。公主到高丽后，高丽变得生机盎然。然而，洪茶丘往往从中作梗，使得臣与公主在理政上多有不便。像洪茶丘这种人，只宜搞军事，可他偏偏要干预高丽的国政，而且独断专行。在他看来，在高丽他主张南方设达

鲁花赤，这是不妥的。蒙古如果一定要在高丽驻军，请陛下派鞑靼（蒙古族）与汉儿（汉族）组成的军队前来，多少不限。洪茶丘率领的部队，请陛下尽快召回蒙古去！

皇帝：这好办！……有史以来，只有尧舜禹汤能行帝王之道，其后则往往是王弱臣强，国王连请食都得仰给于臣子。古时候，有个国王喜欢吃羊肉，大臣们给他一些，他就能吃上一顿，大臣们如果不给他，他就吃不上。宋朝的度宗，是在朕这里的幼儿（指业已投降元朝的宋恭帝）之父，任凭贾似道独裁。贾似道让宋度宗赶走其爱妾，其爱妾不得已跟上了贾似道。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惧怕大臣而抛弃了爱妾，这像话吗？卿的父亲怎么就制止不了林衍的独断专行呢？朕听说卿也往往听信大臣的谗言。像这个样子，倘若能够治理好国家，那倒也无妨，而如果治理不好国家，卿不感到羞愧？

忠烈王：这是洪茶丘在诬蔑我。

皇帝：不只是洪茶丘，很多人都这样说。卿还是与大臣一起，好好起用有能力治国者而委以重任吧！

忠烈王：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向忻都告密，说金方庆聚众谋反，忻都便带兵进京抓住金方庆等进行审讯。审来审去，确实没有任何劣迹。只是其手下有个参加过征伐日本的将领，结束征伐后未把武器交还给官府，这次才追究其责任，处之于杖刑。金方庆虽然没有聚众谋反的事实，当时身为吏部判书（冢宰）而未检举这个匿藏武器未交者，也就被判以渎职罪而被流放到了荒岛。这也是那些对他不满的人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的结果。今后，如有这样的不法者，臣一定加以重罚。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皇帝：这是卿作为国王应当做的事。（一面吩咐内侍下令把洪茶丘尽快召回，一面继续问道）忻都此人如何？

忠烈王：忻都是蒙古人。应当说，人还不错。但是，只要洪茶丘从中捣鬼，他就稀里糊涂分不清是非。这样一来，尽管他是蒙古军队的统帅，也无法叫人加以信任。臣请陛下把洪茶丘及其部队召回蒙古朝廷，而派蒙古军人与汉儿军人组成的蒙古军队代替他们，不知可否？

皇帝：可以！

忠烈王：（对哈伯平章说）王京（开城）达鲁花赤的任期届满。郎哥歹很早就来往于高丽，如能任命他继任开城的达鲁花赤，则他必能成为陛下的左膀右臂，能使陛下放心。

哈伯对蒙古皇帝说：此事可行！

皇帝：让他当达鲁花赤岂非大材小用，郎哥歹是何等人物！（向康守衡问道）高丽的服饰如何？

康守衡：臣穿蒙古衣裳蒙古帽子。在迎接蒙古的诏书和过节日时才穿高丽服装行事。

皇帝：人们以为朕禁止穿高丽服装，朕怎么会那样做呢？尔国之礼节，朕怎么会一下子就加以废除？^①

紧接着，忠烈王谈到了如下几点：（1）高丽国内一有人投书告发，达鲁花赤便凭其个人好恶对被告发者进行拷问，国人对此很反感。今后，最好是再有这种情况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己巳、丁丑、甲申。《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7月。

发生时，先由高丽方面派人进行调查和讯问。(2) 济州的达鲁花赤随心所欲设置驿站，请加制止。(3) 高丽国内一发生什么事，必先向达鲁花赤请示而后呈报蒙古，有时难免迟迟未报。今后，可否不经由达鲁花赤而直接呈报蒙古中书省？(4) 达鲁花赤在高丽照搬蒙古的制度，在多处设了巡马所，夜夜作巡行，禁止人们来往，或把来往者抓去。请把这些被关押者全部释放。忠烈王还向蒙古皇帝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请任命陛下真正信得过的蒙古人担任高丽的达鲁花赤！”

蒙古世祖听了之后说：“为什么一定要设达鲁花赤，卿完全可以好自为之！”

在这次交谈过程中，忠烈王就这样趁机向蒙古世祖告发了高丽叛徒洪茶丘和蒙古驻高丽军队统帅忻都的所作所为和失德之处，报告了达鲁花赤的不称职，从而要求以后任命德高望重者担任高丽的达鲁花赤。

蒙古世祖听取了忠烈王的倾诉之后，几乎全部接受了女婿的建议。

此后达鲁花赤并未在高丽销声匿迹，是达鲁花赤的活动已不像过去那般活跃，对高丽的内政干涉和越权行为也较以前减少了不少。^①

忠烈王在与高丽世祖交谈之时还谈到了崔坦。他谴责崔坦背叛了高丽。他说，东宁府原是高丽祖宗的京都。崔坦等的籍贯不在东宁府，却占据它为非作歹。他请求世祖把东宁府这块土地交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壬辰、戊戌：“王曰：愿得上所亲鞬鞞一人为达鲁花赤。帝曰：何必达鲁花赤，汝好自为之。”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还给高丽。^①

这年9月，忠烈王从蒙古归国时，在途中遇到了正在归国途中的达鲁花赤张国纲。张国纲对忠烈王致意之后，说道：“我的任期早已届满，早就应当归国，经国王向蒙古朝廷斡旋而延长了任期。等我任职七年之后，达鲁花赤和蒙古军队如能悉数归国，那是高丽之洪福！”

张国纲为人公正清廉，做了不少益于高丽的事。

三天后，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回蒙古，写信请忠烈王为他美言几句。然而，他在高丽担任达鲁花赤期间未做一件好事，真是乏善可陈，忠烈王当然未能使他如愿以偿。^②

从此，在高丽的国土上，只有济州的耽罗达鲁花赤还留任，其余地区再未设达鲁花赤。忠烈王与蒙古世祖会谈时，世祖倾听了女婿提出的要求，曾经说过如下这句话：“为什么一定要设达鲁花赤？卿完全可以好自为之！”

当时，在高丽与蒙古之间，还存在高丽的领土问题和蒙古军队对待高丽人的问题。

忠烈王在离开蒙古归国途中，于8月派别将李逢到蒙古，要求将遂安与谷州归还高丽。这一交涉结束后，李逢于10月归国向忠烈王奏报：蒙古世祖不仅答应将谷州与遂安归还高丽，而且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壬辰：“东宁府原是小邦祖宗京都。崔坦等非其乡贯，夺而处之，祖宗祠宇祭享皆废。伏望还其尺土，俾修考祠，尊奉圣旨。”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9月丙戌、己丑。张国纲所言之在任7年，不是从刚上任算起或从重任算起的年数。当时，忻都率领的元军依然留在高丽。达鲁花赤石抹天衢属于洪茶丘一党，他也曾参与迫害无罪之忠臣金方庆。

下令将殷粟也还给高丽。^①

忠烈王在蒙古时，还向世祖谈到了蒙古军队以种种借口让高丽人为其当奴隶的事实。蒙古的哈伯和孛剌对忻都说：“你的部下有人把高丽百姓视为妻党（妻子之亲戚或同伙），皇帝陛下一直严禁这样做，你任凭部下如此，难道不怕王法？”哈伯和孛剌还对忠烈王说：“在征伐珍岛与耽罗之时，蒙古军队抓到了不少俘虏。对于这些人，王莫再争讼！”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蒙古军队在征伐珍岛和耽罗三别抄时所抓到的那些俘虏，亦即高丽人可另作别论，而蒙古军队以妻党为借口奴役一些高丽人则是在严禁之列。

于是，忠烈王对蒙古军人可偕同的高丽人数做了规定：“若诸军挟带人物，除父母许嫁妻室外，余皆勿与。”^②

1278年（忠烈王四年，元至元十五年）12月，忠烈王又到蒙古朝觐世祖。

世祖问忠烈王：“据忻都和茶丘奏报，在高丽的镇边种田军（即屯田军）回国时，其妻子均被高丽官吏所扣留不予送还，真有此事？”忠烈王答道：“夏天，臣归国时，曾派官吏调查过官军（蒙古军队）妻妾的婚姻档案有无，只按照礼节作了必要的调查，决无随意扣留之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8月丁巳：“遣别将李逢如元，请归遂安、谷州。”《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10月戊寅：“郎将李逢还自元。帝归我谷州、遂安、殷粟。”《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2年正月辛未：“元归我遂安、谷州。”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辛丑、丁未：“丁未……分拣人物，命曰：‘若诸军挟带人物，除父母许嫁妻室外，余皆勿与。’”

事。”^①

这个问题，是忻都与洪茶丘为诬陷忠烈王而故意捏造的，但未能影响蒙古世祖对忠烈王的信赖，影响其翁婿关系。

第五节 耽罗道的归属问题

三别抄将其根据地与大本营从珍岛迁到耽罗岛（济州岛）之后，与高丽和蒙古对抗了大约三年，之后便被高丽借助蒙古军队之力而完全剿平，其时是1273年（元宗十四年，元世祖至元十年）。

这年6月28日，蒙古世祖在耽罗设招讨使，失里伯奉命出任此职。^②也就是说，耽罗岛成了蒙古的直辖领地。当时，耽罗岛驻军有1700名。这1700名军人不是专门从蒙古派来的，也不全是蒙古人。其中，蒙古军人有500名，高丽军人有1000名。当时，为了管理好耽罗岛，驻屯了这1500名军人。后来，失里伯上任时，又带来了200名蒙古军人。所以，蒙古虽然在耽罗道设置了招讨使，而招讨使失里伯却指挥不动所有的驻军，只有他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12月辛卯。《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5年正月丙寅。

^② 参阅《元史》，世祖本纪，至元10年6月戊申：“经略忻都等，兵至耽罗，抚定其地（去四月）。诏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尹邦宝副之。”《元史》卷208，高丽传附耽罗：“至元十年正月，命经略使忻都、史枢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讨耽罗贼党。六月（系四月之误）平之，于其地，立耽罗国招讨司，屯镇边军千七百人，其贡品咸进毛施（孛）百匹。招讨司后改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

带来的那些军人，才听从他调遣。^①

就这样，蒙古对耽罗一直实行达鲁花赤制度。1275年（忠烈王十二年，元至元十二年），招讨使失里伯应召回蒙古。逊摊（孙摊）任达鲁花赤，耽罗国招讨司改称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后来，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称为军民按抚使，^②其时为1284年（忠烈王十年，元至元二一年）正月。

平定三别抄之乱后，蒙古世祖之所以立即在耽罗设达鲁花赤，以之为直辖地，是因为世祖早在三别抄盘踞于耽罗之前，就很关注此处。耽罗，是高丽与南宋和日本进行交往的重要地方，其在地理、交通和军事上的战略价值，蒙古世祖是了然于心的。然而，蒙古不能不认为耽罗是高丽的领土。^③所以，蒙古世祖于1269年（元宗十年，元至元六年）7月5日，派千户脱脱儿、王国昌和刘杰赴高丽地界，检查耽罗等处道路，整点军兵船舰，令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21年（高丽忠烈王10年）7月：“塔刺赤言：‘头辇哥国王出戍高丽，调旺速等所部军四百以往。今头辇哥已回留军耽罗去，其妻子已去。宜令他军更戍’。伯颜等议：‘以高丽军千人屯耽罗，其留戍四百人，从之还家。’从之。”

②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12年6月：“以逊摊为耽罗国达鲁花赤。”《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8月：“济州达鲁花赤遣使来，督戍卒。”《元史》卷133，失里伯传：“至元七年，迁昭勇大将军为耽罗国招讨使，奉旨入见上都，改管军万户。”

③ 参阅《元史》卷208，高丽传附耽罗：“耽罗，高丽与国也，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日本冲要，亦注意焉。”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高丽国王选知晓海道与地理的好官领引前去。^①这样一来，蒙古世祖积累了有关耽罗的知识，为其将耽罗划为其直辖领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前，亦即1268年7月，蒙古也曾委派脱脱儿、王国昌和刘杰作为使臣到过高丽。当时，他们也曾整点过高丽将军队，督励过兵船的制造。他们要高丽准备1万名军队，建造1000艘兵船。当时，他们的使命是：耽罗如果与高丽一起建造兵船，当然不能再强加给什么任务，倘若不是与高丽一起制造兵船，则要耽罗独自建造100艘兵船。高丽准备的这些军队和兵船，无疑是蒙古准备用之于征伐南宋与日本的。他们还踏查了去黑山岛与日本的路径。蒙古未忘让高丽派官吏护送他们，协助他们完成所肩负的使命。^②

也就是说，蒙古世祖在1268年与1269年曾先后两次派同样的三个使臣到高丽，检查高丽业已准备和正在准备的军队与舰船，进而视察了黑山岛与耽罗岛。世祖第一次派他们到高丽时，

^① 参阅《元高丽纪事》（《元经世大典》的一篇）附耽罗条：“世祖皇帝至元六年七月五日，枢密官奉旨：‘差千户脱朵儿、王国昌、刘杰赴高丽地界，相视耽罗等处道路，整点军兵船舰，令高丽王选差知识海道地面好官领引前去……卿所备军兵船只，并先行相视耽罗等处道路，卿所备军兵船只，并先行相视耽国等处道路，卿当应付，大船可选堪委见职正官，务要引送道达，以副朕怀。’”

^② 参阅《元高丽纪事》，世祖至元5年7月20日条：“诏都统领脱脱儿、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捷）等使高丽，与其来朝者大将军崔东秀偕行，八月至其国（《高丽史》记载为十月），植（元宗之讳）出升天府迎之，盖谕以阅军造舰也。逾日，卿遣东秀来奏，备兵一万、造船一千只事。今特遣脱脱儿、王国昌、刘杰诣彼整阅军数，点视船舰，其所造船只听其指挥。如耽罗已与造船之役，不必重烦。如其不与，即令别造百只。其军兵船只整点足备，或往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讨。临时制宜，仍仰差去官，先行相视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护送导达。”

之所以特别指定了耽罗岛的造船数字，是因为他在委派使臣到高丽之前，早就关注这个海岛，深知它是海道的要冲，必须充分加以利用。

《高丽史》在元宗九年（1268年）十月条记载了蒙古两度派使臣到高丽的史实。这年12月，脱脱儿、王国昌、刘杰等14人离开了高丽。在此期间，王国昌和刘杰等带领高丽官吏巡视了军队。刘杰则检阅了西海道的造船进展情况。也就是说，1268年7月，来到高丽的蒙古使臣为了视察那些岛屿，曾一丝不苟地按蒙古世祖的谕旨办事。然而，对于翌年7月他们巡视耽罗岛的史实，《高丽史》却只字未提，未予记载。

其实，1269年冬高丽逆臣崔坦等内附蒙古事件，是与脱脱儿有关联的。这年10月初，崔坦等以铲除林衍为名，在西北肆行叛乱。他们杀死西京留守和西北面的首领，准备渡过鸭绿江向蒙古投降。他们在江心的大夫城（亦即大富城）会晤了到高丽的蒙古使臣脱脱儿。脱脱儿询问他们去蒙古的目的，崔坦等回答说带领义州、麟州等鸭绿江边诸城的首领投降蒙古。当时，脱脱儿立即从大夫城转身回到蒙古，向世祖奏报了这种情况。^①

1269年冬天，肩负着某种使命来到高丽国境的脱脱儿，就是这样一听到崔坦等将把高丽西北面诸城池献给蒙古，而转身去向蒙古世祖提供这一新的信息的。由此看来，他并未履行他原来肩负的使命，或者说，他原来所肩负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当时是不那么明确的。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元6年11月癸卯：“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掣西京五十余城来附。”参阅池内宏著《元世祖与耽罗岛》，该文刊载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出版于1927年的《东洋学报》第16期，见其第136页至141页。参阅池内宏著《高丽元祖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面》，该文刊载在《白鸟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从《元高丽纪事》记载看，脱脱儿的使命是来高丽视察耽罗。他是蒙古世祖所派遣的几名使者之一。他在高丽国境得知崔坦等内附蒙古的意念之后，之所以立即转身赶回蒙古，首先向世祖提供这一有利于蒙古的情报，是因为他深知通报此事，让世祖作出决策，远比视察耽罗更重要。由此看来，《高丽史》未记载这次蒙古使臣视察耽罗道，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278年（忠烈王四年，至元十五年）9月，将军朴义从蒙古回到高丽。当时，他带回蒙古中书省的一份指示，这份指示对此作了说明：“耽罗达鲁花赤塔刺赤建议将耽罗罪犯关禁在高丽荒岛上，这并不是蒙古世祖的主意。”在此之前，高丽曾向蒙古提出了保障耽罗火田民生活的问题。这份指示对之作了回答。这说明蒙古也注意到耽罗火田民被压制这一事实。

1280年8月，忠烈王又去蒙古朝觐世祖。同月，元卿从蒙古回高丽，带回了蒙古中书省的一份指示。它命令耽罗的达鲁花赤兀自动员其所属的铁工建造战舰，不必依靠高丽造船。

1282年（忠烈王八年，元至元十八年）1月，蒙古撤销了设立于高丽的征东行中书省。2月，蒙古派遣了1400名蒙汉军人驻扎耽罗。这年12月，蒙古让高丽官吏管理耽罗镇戍军，由高丽主管耽罗的军事权。

1287年（忠烈王十三年，元至元二四年）11月，蒙古派塔刺儿担任耽罗达鲁花赤。这一记载，意味着塔刺儿在其任期届满之后重又被任命为耽罗的达鲁花赤。^①

塔刺儿虽然继续担任达鲁花赤，但是已不能像以往那样一手遮天处理耽罗的事务了。因为，第一，忠烈王是蒙古通，王后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3年11月癸巳：“元遣塔刺儿来，为耽罗达鲁花赤。”

蒙古公主，高丽王室与蒙古王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友谊也特别深厚。第二，忠烈王已经先后六次朝觐与会见过蒙古世祖：第一次当他还是世子之时；第二次是忠烈王四年4月到7月；第三次是忠烈王四年12月到5月1日；第四次是忠烈王六年8月到9月；第五次是忠烈王十年4月到9月；第六次是忠烈王十三年9月到12月。第三，忠烈每次朝觐与会见世祖，都作为女婿向岳父敞怀交换了意见。有关两国之间的许多悬案，世祖都满足了忠烈王的要求，一一给予加以解决，使忠烈王充分维持了体面，其在大臣与高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因而大大提高。比如，忠烈王七年3月，他与忻都、洪茶丘讨论政务，他坐在南面的上座，忻都与洪茶丘坐在东面，上下级关系十分明显。此前，蒙古使臣与高丽国王总是在东面与西面相对而坐，双方处于同等地位。^①

然而，达鲁花赤塔刺儿本性难移，干尽坏事。其具体罪状，史料未作记载，故不详。而1292年（忠烈王十八年，元至元二十九年）3月，蒙古右丞阿撒曾到高丽调查过其罪状。由于情况属实，蒙古于1293年（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年三十年）9月，将他远远发配到交趾。负责调查过其罪状的阿撒，则被任命为耽罗的达鲁花赤。^②

1294年，蒙古世祖驾崩，太子随即即位，是为成宗。忠烈王与公主一起于这年4月参加了成宗的即位大典。5月，忠烈王向蒙古成宗提出了如下的四项要求：（1）将耽罗还给高丽。（2）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7年3月丙辰。《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7年3月。高丽国王的地位虽然得以提高，但这是高丽附属于元朝前提下的提高。

^②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19年9月乙丑。《高丽史节要》21，忠烈王19年9月。

第十八章 蒙古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

归还高丽被虏人民。(3)对公主进行册名。(4)添加高丽国王的爵名。

蒙古成宗几乎全部满足了忠烈王的要求。他的回答是：“耽罗还隶高丽。己未年（元宗十二年，元至元八年，亦即公元1271年。高丽朝廷于这年出陆还都，蒙古在高丽开始屯田）以来被虏及流徙人，可遣使与辽阳行省分拣归之。公主册名，其议以闻。国王爵名，既已累降，且待来年。”^①于是，耽罗还给了高丽。

这年11月，忠烈王赏赐给耽罗的王子文昌裕与星主高仁旦以红鞞、牙笏等贵重物品。因为，耽罗又完全归属于高丽。此后，高丽依然继续向蒙古进贡马匹。

翌年，高丽将耽罗改称济州，设置牧使。而蒙古的达鲁花赤则一直有名无实地设置在耽罗。^②

1301年（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3月，蒙古又在耽罗设置了军民万户部。后来，又设置了耽罗总管府，对这块土地依然未放弃占有的野心。对此，高丽曾上书蒙古，请求撤销耽罗总管府，耽罗重属高丽；但仍设置万户部，由达鲁花赤负责治理合浦和马山。蒙古朝廷回文，答应蒙古只在耽罗设万户府，耽罗隶属于高丽。^③

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至大元年）3月，蒙古虽委派达鲁花赤到济州，但已流于形式，其职位与权限已可有可无了。^④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0年5月甲寅：“王以四事奏于帝：请归耽罗……”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12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0年11月庚戌、乙卯。

^③ 参阅《高丽史》32，世家忠烈王27年3月癸卯，5月庚戌。

^④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3月壬戌。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 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第一节 忠烈王与元成公主的联姻

高丽与蒙古之间的臣属关系确定之后，为了增强两国之间的纽带，王室之间的通婚便提上了日程。而忠烈王与蒙古世祖的女儿元成公主（齐国大长公主），忠宣王与蓟国大长公主，忠肃王与濮国长公主、曹国长公主和庆华公主，忠惠王与德宁公主的结婚，便是两国王室联姻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忠烈王与蒙古世祖的女儿元成公主（原名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的结婚，是两国王室通婚的开始。有关他们结婚的交涉，早就非正式地开始了。早在忠烈王还是世子之时，此事就提上了议程。1269年（元宗十年，元至元六年）11月，为了谴责林衍肆行的废黜国王的政变，蒙古兵部侍郎黑的奉命来到高丽。他在高丽元宗的招待宴会上，一方面一再谦让不坐上座，一方面说：“现在，皇帝陛下已答应了高丽王太子与蒙古公主的婚事。我们都是皇帝的臣子，国王已是皇帝陛下驸马的父亲，我怎敢与国王平起平坐？”由此，可知两国王室的第一次通婚已成事实。^① 在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11月壬戌。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此之前，亦即这年4月，高丽世子曾到蒙古。在逗留期间，得知林衍在国内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后，他请求世祖出兵高丽以惩戒林衍。蒙古世祖为了商讨高丽国内的问题，在高丽世子逗留蒙古首都燕京期间，特地邀请高丽元宗到燕京。当时，世祖与元宗进行了有关两国王室之间通婚的非正式商谈。

1270年（元宗十一年，元世祖至元七年）2月，被林衍废黜的元宗，在蒙古出面干预从而得以复位后，应蒙古世祖的邀请来到蒙古首都燕京。他在说明高丽朝廷尚未能从江华岛还都旧京缘由的会谈中，将表章上呈蒙古中书省，正式请求两国王室通婚，以增强两国友好纽带，以使两国关系永固。

元宗在表章中，谈到自己当世子时曾出访过蒙古，即位时深受蒙古的恩典，被林衍发动政变废黜后又多亏蒙古相助，才得以复位，并对这一切深表感谢。他还谈到“夫上邦请婚大朝，是为永好之缘”。却又深恐失礼而不敢启齿，今适值世子在此，如蒙恩准，“则小邦万世永倚，供职唯谨。”

几天之后，永宁公、康和尚和洪茶丘等这些在蒙古的高丽叛徒，对元宗假传圣旨说：高丽国王所请，蒙古中书省已奏闻，圣旨云：“鞑靼法通谋合族，真实交亲，敢不许之？然今因他事来请，似乎欲速待其还国，抚存百姓，特遣使来请，然后许之。朕之亲息，皆已嫡人，议于兄弟，会当许之。”^①他们虚张声势乱传圣旨，真不知羞耻为何物。

这些高丽叛徒从中作梗，企图破坏两国王室之间已经很有眉目的通婚，其敌意昭然若揭。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1年2月甲戌：“夫小邦请婚大朝，是为永好之缘……则小邦万世永倚，供职唯谨。”“越数日，永宁公、康和尚、洪茶丘来，言中书省已奏闻……若请婚则圣旨云：鞑靼法……会当许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1年2月。

翌年，亦即1271年1月，元宗特派枢密院使金链去蒙古，通过上呈元宗的奏章，正式为其世子向蒙古皇帝世祖之女求婚。元宗当初在燕京向世祖提出此事时，世祖让他先归国，好生治理百姓，然后再派特使来燕京，正式向其女求婚，元宗这次正是遵旨而为。

这年6月，高丽元宗派世子和20名贵族子弟以及100名官吏到蒙古，为的是按规定完成世子与蒙古公主的订婚。这年10月，就在世子归国之前，世子随行人员、枢密院副使李昌庆从蒙古首都回到高丽，向元宗奏报：蒙古世祖已答应了这门亲事。

翌年，亦即1272年2月，世子从蒙古归国。这时他已按照蒙古风俗，穿上了蒙古服装，留起了蒙古发式。这也许是他为了与蒙古公主结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是蒙古方面对他的要求，然而无论如何，还是说明他作为高丽王子缺乏主体性，缺乏这种主体精神和气质。^①

这年12月，世子为了与公主结婚而赴蒙古。当时，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美其名曰充当结婚费用和旅费。据史料记载，大库付出黄金3斤7两，长兴库支出白金437斤7两，兴王寺支付白金150斤，安和寺支付100斤，普济寺支付70斤，高级官吏亦即宰枢承宣以上的官员每人送白银一斤。^②世子在蒙古燕京停留了一年零四个月，到1274年（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5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10月辛丑；13年12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10月；13年12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79，食货志2，科敛条，元宗13年12月。《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4年10月癸丑：“遣别将金链，赍世子盘缠银二百五十斤如元。”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月，才与蒙古世祖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完婚。^①

忠烈王以蒙古公主为王妃，所采取的步骤和按照蒙古风俗办事之举，使高丽大臣和百姓相当不悦和反感。

蒙古，迎接公主回高丽。同时，又派齐安公王淑和知枢密院使郑子珩到蒙古，对世祖把女儿下嫁忠烈王深表谢忱。^②

10月，齐国公主一人高丽国境，忠烈王便到西北面迎接。他去迎接公主时，见随行的李汾禧等未留蒙古式的辫发（亦称开剃。根据蒙古风俗，称这种发式为怯仇儿）曾加指责。当时，李汾禧答道：“臣等并非不喜欢这种辫发，而是在等候百姓群起效尤，再从众例。”

忠烈王在两年前从蒙古归国之时，就已留了蒙古式辫发，穿上了蒙古服装。大臣们无意沿袭夷狄风俗，也不想学忠烈王的这种模样。此时一受忠烈王的指责，只好以难以服众为借口而巧妙地加以搪塞。

忠烈王命令随行人员、知御史台事李分成先行回京，让所有的妃嫔、宫女和大臣们的夫人都来迎接公主，又让一部分随行人员滞留于龙泉驿。然后，他带着留着蒙古式辫发的大将军朴球向开京进发。

7天后，忠烈王在肃州见到了公主。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年15年5月庚辰。《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5年5月。《高丽史》卷28，忠烈王条庶文。如前所述，元宗在元朝亲自向元世祖请求两国王室联姻时，永宁公和洪茶丘等曾说元世祖之女业已结婚。当然，他们说的是谎言。他们深知两国王室联姻对他们不利，因而绞尽脑汁妨碍两国王室联姻。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元宗即位年9月己丑、戊戌。《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5年9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52页。参阅青柳南冥著《朝鲜四千年史·高丽史记》一书的第178页，该书由京都大阪屋号书店出版于大正6年。

11月，忠烈王与公主一起抵达开京。这时，俞千遇对张镒说：“王倘若穿着蒙古服装进城，百姓见了会大吃一惊，恐怕会有种种想法。”于是，他请求忠烈王穿高丽礼服进入开城。然而。忠烈王置若罔闻。俞千遇只好请康允绍和简有之去劝说，而忠烈王还是不肯听此忠言。

忠烈王与公主一起乘花轿入城。老人们见此情景十分激动，相互拍手称庆：“厮杀了一百多年，总算又看到了太平盛世！”^①

高丽与蒙古两国王室的联姻，确实加强了两国的纽带关系。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少。

首先，人们见蒙古风俗传入高丽，不免为之忧心忡忡。

这年12月，大臣们议论道：“金侍中（指金方庆）如果归来，一定会留起蒙古式辫发。其实，留什么发式还不是一个样，我们为什么就不知赶这样的时髦呢？”大臣们见宋松礼和郑子琦都已留着蒙古式辫发参加大臣会议，也都争相效法。只是抄奴、所由（司宪府的一种使丁）和电吏等下级人士未赶此时髦，依然保持原有的发式和衣着。

印公秀常常劝元宗学习蒙古的风俗，改变衣饰和发式。元宗说：“我不能一下子就突然改变祖制，改变风俗。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自便。”他看到大臣们纷纷仿效蒙古的风俗，不免悲从中来。^② 1278年（忠烈王四年）2月，忠烈王竟下令让全国百姓穿蒙古服装、留蒙古发式、戴蒙古帽子。^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即位年10月辛酉、甲子，11月丁丑。《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5年10月、11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即位年12月丁巳。《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5年11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2月丙子。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4年2月。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1276年（忠烈王二年）12月，发生了匿名信事件。这也就是贞和宫主诅咒公主的事件。与此同时，齐安公王淑和金方庆等43人被诬聚众谋反。

贞和宫主又称贞信府主，是始安公王纲的女儿。忠烈王即位后，封她为贞和宫主。自从齐国公主到高丽之后，她一直住在别宫，忠烈王不到她处。有人见她十分孤寂可怜，便趁机居心叵测地投书于达鲁花赤石抹天衢的官舍。石抹天衢收到这封匿名书信，立即将情况向忠烈王与公主通报：“宫主失宠后，让巫女诅咒公主。”公主让忽刺歹、三哥和车古歹等把宫主抓起来，封了宫主的仓库。当时，柳璈向公主哭谏，公主方知这是匿名检举者的谎报，命人立即将宫主释放。^①

两国王室之间联姻的又一大弊端，是跟随公主前来的蒙古人胡作非为。1277年（忠烈王三年）2月，金议府向忠烈王奏报：“公主的怯怜口及官员获得大量的赐牌地（国王赐给王族及功高大臣的土地与奴婢。在高丽时期，这些人恃仗赐牌之势兼并了大量土地）后，不交租税，请将他们的赐牌收回！”然而，忠烈王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2年12月丙子。《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贞信府主传。《高丽史》卷105，列传18，柳璈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54页至255页。

未加接受，生怕触怒齐国公主。^①

这就是高丽与蒙古王室之间的第一次联姻。

高丽采取这种的联姻举措的好处有：（1）密切了两国之间的关系。高丽曾多次遭受蒙古军队的侵略，从此可以不再受此荼毒。（2）懦弱的高丽王室有了蒙古王室作靠山，可以不怕权臣作乱，从而保持王室的权威。比如，林衍废黜元宗，便因蒙古的干预而未能得逞。林衍之子林惟茂犯上作乱，高丽王室在蒙古支持下粉碎了他的阴谋。（3）高丽罪犯与叛徒们动辄依附蒙古，借蒙古之势中伤诬陷高丽国王与高丽国，可以说干尽了不事。而两国王室联姻之后，他们的势力渐渐衰弱。

蒙古采取这样联姻举措的收获有：（1）通过这样的联姻，更易于统治整个高丽。（2）便于把王室成员分封于新开拓经略的地区，因而也易于使蒙古势力渗透高丽朝廷，从而更牢固地控制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3年2月己巳。《高丽史节要》卷19，忠烈王3年2月。《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臣1，印侯、张舜龙、车信、卢英传。怯怜口，即齐国公主的私属人，主要人物有：印侯，蒙古人，原名忽刺歹，到高丽后成为中郎将。忠烈王授予他将军一职，让他改名。由于当时与大将军印公秀过从甚密，便借用其姓，改名为印侯。后来，哈丹来侵时，他立下了大功。张舜龙，回回人，原名三哥。随齐国公主来高丽后，成为郎将，后来被晋升为将军。车信，原名车忽解，其母是齐国公主的乳母，后随公主来高丽，成为其侍臣，不久被提升为上将军。卢英的原名为式笃儿，本是河西国人。其官职为将军。他写得一手好字，为人忠厚，与印侯和张舜龙等一样。印侯、张舜龙、车信等拥有大量的赐牌地。

第二节 忠宣王与高丽大长公主的联姻

继忠烈王之后成为高丽第 26 代国王的忠宣王，其王后是高丽大长公主宝塔实怜。她是蒙古世祖长子真金（被追尊为裕宗）的长子晋王甘麻刺（被追尊为显宗）的女儿，也是金枝玉叶。

忠烈王和齐国大长公主的长子王璋（蒙古讳益智礼普化），生于忠烈王元年，忠烈王三年即被册封为世子。陶醉于蒙古风俗的忠烈王，于 1289 年（忠烈王十五年）2 月 15 日，在长子 15 岁时便为他娶西原侯王瑛之女为妃，是为静妃。1295 年（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5 月，忠烈王派赞成事印侯到蒙古，向蒙古王室的公主求婚。紧接着，高丽朝廷又派左承经柳庇到蒙古，请求蒙古封忠烈王为太师中书令，为公主刻印章和为世子改印章。蒙古既未答应高丽世子的婚事，又未应允高丽朝廷所请求的这三件事。

1294 年（忠烈王二十年）正月，蒙古世祖驾崩。蒙古成宗于 4 月即位。尽管高丽世子当时在蒙古，又已是 21 岁的青年，成宗仍不同意两国王室之间联姻。^① 忠烈王得知成宗拒绝了世子的求婚，便于 1295 年（忠烈王二十一年）8 月将世子从蒙古召回，让他于 10 月与赵仁规的女儿结婚。^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1，世家忠烈王 21 年 5 月丁亥。《高丽史节要》卷 21，忠烈王 21 年 5 月：“遣赞成事印侯如元，请世子婚。又遣左承旨柳庇，请加王太师中书令，降公主印章，改世子印章。帝皆不允。”

^② 参阅《高丽史》卷 31，世家忠烈王 21 年 8 月戊午，10 月甲子。《高丽史》卷 105，列传 15，赵仁规传。

这年12月，忠烈王又让世子到蒙古。1296年（忠烈王二十二年）正月，派副知密直事柳庇到蒙古，再一次为世子求婚。4月，让大将军刘福和到蒙古，随身带去大量金银，作为世子的聘金和婚礼所需费用。由此可知到了此时，两国王室之间的这一婚事的商谈有了头绪。8月，金延寿从蒙古回到高丽，忠烈王从而得知了世子与蒙古王室女儿的结婚日期，以及蒙古成宗对自己的邀请。9月，忠烈王与公主一起抵达蒙古燕京。

1296年11月，世子与蒙古晋王甘麻刺的女儿宝塔实怜结婚。她后来于1333年（忠烈王二年，元延佑二年）12月卒于蒙古，蒙古于1343年（忠惠王四年）追尊她为蓟国大长公主。世子即位为忠宣王之后，其嫔妃还有：生世子王镒的蒙古女人也速真，亦即懿妃；宗室西原侯王瑛的女儿静妃；府院君王奎的女儿顺和院妃洪氏；中赞王琪的女儿顺妃许氏；文衍的女儿淑妃等。赵仁规的女儿赵氏为王妃。^①

结婚之后过了两年，蓟国大长公主（以下称蓟国公主）才于1298年（忠烈王二四年，元大德二年）从蒙古第一次来到高丽。当时，蒙古成宗让太子阿木罕和丞相雍吉剌歹护送她到高丽。忠烈王和百官到京城郊外迎接，所用的仪仗和所奏的音乐，同迎接国王的仪式一样。

这年正月，世子王璋（古讳为谚）即位，是为忠宣王。当时，赵妃与蓟国公主同为王妃。蓟国公主来到高丽后，忠宣王对之十分宠爱。赵妃失宠后，对蓟国公主妒忌不已。

蓟国公主窥出这种情况后，用畏吾儿文（亦称回鹘文。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2年正月壬申，4月丁未，7月乙未，8月戊午，9月丁亥，11月壬辰。《高丽史》89，列传2，后妃2，忠宣王蓟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2年12月。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原无文字，八思巴首创蒙古文后，往来文书依然使用畏吾儿文）写成信函，让随行而来的阔阔不花与阔阔儿两人到蒙古交给皇太后，报告了自己的处境。信中写到赵妃诅咒蓟国公主，不让忠烈王宠爱她。忠宣王知道情况不妙，让朴景亮向阔阔不花与阔阔儿询问所带走信件的内容，两人不予回答，而且动手殴打朴景亮。忠宣王害怕事态扩大，连忙禀报业已让位的忠烈王。忠烈王了解情况后，一方面到蓟国公主那里进行慰问，另一方面把没收到的都成器、金繡、玄宗柱和张佑等的财产与家人分给阔阔不花、阔阔儿和章吉彻里等蓟国公主的随从，并把金繡的妻子给予阔阔不花，想以此使蓟国公主息怒。然而，蓟国公主还是派阔阔不花、阔阔儿和大将军金精、吴挺圭等到蒙古，报告了她当时的处境与心情。^①

当时，有人将匿名信投入宫廷，说什么“赵仁规的妻子让女巫诅咒蓟国公主，使国王不爱蓟国公主而宠爱其女儿。”

蓟国公主勃然大怒，派人把赵仁规及其妻子投入监狱，把赵仁规的儿子赵瑞、赵珪、赵珩，以及女婿朴义、卢颖秀的妻子也关押起来，同时派章吉彻里到蒙古，将匿名信报告蒙古朝廷。金方庆等大臣生怕蓟国公主的妒忌引起两国在外交上的纠纷，连忙求见蓟国公主，请她别派章吉彻里去蒙古，她不予置理。忠宣王也派人去求蓟国公主顾全大局，她仍是我行我素。

到蒙古的阔阔不花等，同蒙古太后的使臣一起来到高丽，宣布蒙古成宗的命令：将赵妃的亲信崔冲绍、朴瑄和将军柳温关押到巡马所，将赵妃也关押起来。蒙古还派使臣审问了赵妃的父亲赵仁规，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100余人。结果，赵仁规被押往蒙

^① 参阅《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宣王条，蓟国大长公主传及赵妃传。《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4年正月庚子、辛丑、丙午。

古。被视为诬告者的赵仁规妻子，禁不住残酷的拷打，被迫违心地承认了所谓的罪行。^①

蒙古又派使臣前来高丽，抓走了赵妃与宦官李温。蒙古太后派了五个和尚和两个道士到高丽做道场，为薊国公主避邪祛灾。蒙古太后还派洪君祥到高丽，设宴款待忠宣王，强迫忠宣王与薊国公主同床共枕。当时，人们说：“忠烈王娶薊国公主为妃之后，对夫妇之道很不满。薊国公主于是萌生妒意，唯恐嫔妾与忠烈王共枕之后生下王子。”

这年8月，蒙古声称忠宣王年轻无知独裁专行，不宜执政，让业已让位的忠烈王复位。忠宣王与薊国公主则应召到蒙古。

实际上，赵仁规夫妇根本未离间过忠宣王与薊国公主的夫妻关系，也从未设法让忠宣王偏爱其女儿赵妃。写匿名信诬告赵妃诅咒薊国公主的是司宰主簿尹彦周，尽管尹彦周的罪行已调查得一清二楚，而薊国公主还是向蒙古朝廷诬告了赵妃，并使事态恶化，让高丽与高丽王室处于难堪的境地。

忠烈王以蒙古公主为王妃，加强高丽与蒙古两国王室之间的纽带，是想使高丽对外不受蒙古侵略，并防止在蒙古的那些颇有实力的高丽叛徒肆意干涉高丽内政对高丽肆行榨取。对内方面，他想藉以加强王权，杜绝武臣发动政变，防止奸臣依恃蒙古的势力搞阴谋诡计，搅乱朝政。他深知自己以蒙古公主为王妃虽然也有一些副作用，但确实有助于王权的巩固，尽管也为高丽引进了一些蒙古风俗。于是，他让儿子忠宣王也以蒙古王室的女儿为王妃。

然而，薊国公主作为高丽王妃，却不知自重，经常与宫内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89，后妃2，忠宣王条，薊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卷105，列传18，赵仁规传。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男女淫乱。于是，忠宣王对她自然心灰意冷，高丽王室也认为无法让她继续作为王妃。尤其令人侧目的是，她去蒙古之后，竟然呆了四年而不回高丽。^①

1301年（忠烈王二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5月，忠烈王派知都金议司事闵萱到蒙古，请求让宝塔实怜公主（薊国公主）改嫁。忠烈王的表章写道：“本以为公主只是去蒙古的宫阙小住，没想到竟然逗留了四年。臣早就想言及此事，只是唯恐有逆圣上之意，而未敢启齿。倘若夫妇不和睦，那就谈不上有后嗣……一切定于天命（即元成宗的命令），臣谨请求变更这一匹配。天心则帝心，帝命亦天命，臣静候裁。”忠烈王的请求之意十分恳切。

闵萱到达蒙古燕京后，只是把高丽朝廷要求在耽罗设万户府的表章交给了蒙古中书省，其请改嫁薊国公主的表章则不敢进呈，而后回到高丽。^②

忠烈王认为淫乱而又轻妄的薊国公主不宜为王妃，便于1303年（忠烈王二九年）9月亲自奔赴蒙古，想与成宗协商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蒙古不让滞留于蒙古的忠宣王回国的问题；二是将薊国公主改嫁瑞兴侯王瑛（高丽第20代国王神宗次子襄阳公王恕之孙、王瑛次子）。10月，忠烈王刚刚抵达西京，蒙古便派人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5，列传38，王惟绍传：“时宝塔公主失爱于前王，徙居祗候司。”《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薊国大长公主传：“公主素不谨，每与内僚诸人乱……”。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7年5月庚戌：“遣知都会议司事闵萱如元，请改嫁宝塔实怜公主。表曰：‘其请改嫁公主表；萱不敢进而还。’”《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薊国公主传：“二十七年，闵萱表请改嫁公主，萱不敢进而还。”

劝其改变日期，忠烈王只好返身回到京都开城。^①

忠烈王见瑞兴侯王瑛长得英俊，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便让他与薊国公主往来，使他们建立感情，以便达到让薊国公主改嫁他的目的。

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的更替王位，同出身蒙古王室的蒙古王妃密不可分。忠烈王先后去蒙古十二次：第一次到第六次如第18章第5节所述；第七次是在忠烈王十五年11月到十六年3月；第八次是在十九年10月到二十年5月；第九次是在二十二年9月到二十三年3月；第十次是在二十六年4月到7月；第十一次是在二十八年12月到29年5月；第十二次是在三十一年11月到三十二年5月。他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亲元派。忠宣王在当世子时去过蒙古八次：第一次在忠烈王四年4月到7月，与父王同行；第二次是忠烈王十年4月到9月，也是与父王同行；第三次是在十三年9月到12月，还是陪父王同行；第四次在十五年11月到十六年3月，也是陪父王前往，第五次在十六年11月到十八年4月；第六次在十八年7月到二十一年8月；第七次在二十一年12月到二十三年6月；第八次在二三年10月到二十四年1月。忠宣王登上王位只主政了7个月便被迫下野。忠烈王

^①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27年5月庚戌；29年9月庚午，10月乙未。《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薊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卷105，列传18，洪子藩传。《高丽史》125，列传28，奸臣1，王惟绍传及宋邦英传。《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9年9月庚午，10月。《高丽史》卷105，列传18，赵仁规传。《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神宗条襄阳公附瑞兴侯瑛传。参阅李齐贤著《栢翁稗说》前集卷2。参阅《牧隐文稿》卷20，郑氏家传。参阅李齐贤著《益齐乱稿》卷9上。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33页到634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朴真爽著《中朝友谊三千年》一书的第163页，该书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70年。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复位后，他被召往蒙古当了十年之久的人质。

当时，在蓟国公主事件发生的同时，出现了离间忠烈王与忠宣王的事件。王惟绍、宋邦英、宋璘、吴祁等在两位国王之间搞阴谋诡计，旨在争权夺利。1305年（忠烈王三一年）11月，忠烈王应蒙古成宗的邀请到蒙古作第十二次访问。王惟绍、宋邦英、韩慎和宋璘等利用这个机会，让其党羽宋均与金忠义奏报忠烈王：“前王（指忠宣王，当时在蒙古）并不安分守己，总在埋怨殿下。殿下虽然慈爱有加，却足以惹祸毁身。殿下未曾想到了丁酉年的一切吗？”丁酉年，即忠烈王二十三年。在这一年的5月，王妃齐国大长公主去世。10月，忠烈王向蒙古请求传位给世子。这一奏报，似乎是在关心忠烈王，实际上则是在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之间煽风点火，意欲使父子俩不和而后快。

一天，忠烈王跌倒在地，牙齿受到损伤，好几天吃不了食物。王惟绍又利用这个机会，使忠烈王迁至蓟国公主（这时已失去忠宣王的宠爱，住在王的祗候司）的住所居住，却委托乳媪和宦者李福寿对元朝皇后说前王不喜欢蓟国公主，曾逼迫过蓟国公主。王惟绍自己出马向蒙古左相阿忽台和平章八都马辛告发说：“由于前王平日不知孝顺父母，又与公主不和睦，我国国王很生气，早就想让在蒙古作人质的瑞兴侯王璘继位。前王本应悔悟，洗面革心，懂慌得孝道，好生对待老父，哪知我国国王居住在他的住所期间，却依然伺候不周，致使我国国王跌断了牙齿。我国国王虽不因此生气，却实在窝火。前王曾想剃发为僧，而蒙古方面不允许。看来还是应当让他剃发为僧，而让瑞兴侯王璘娶公主为妻。这样，才称我国国王之心意。”蒙古的阿忽台和八都马辛听后信以为真，表示同意。

王惟绍自以为得计，见了蒙古的右丞相塔刺罕，也假借忠烈王的名义告了前王。塔刺罕对此说道：“益知礼普花王（前王忠

宣王的蒙古名字)是蒙古世祖的甥侄,宝塔公主则是宗室之女。废掉嫡妻让其再嫁,符合道义吗?”王惟绍又把向左相阿勿台告发过的那一套重述了一遍,塔刺罕听罢说道:“瑞兴侯王璵是高丽国王的儿子吗?”王惟绍答对不上,其离间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关系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①

1306年(忠烈王32年)11月,崔有济等到蒙古中书省揭发了王惟绍的罪行。中书省命人逮捕王惟绍等,把他们关进监牢。事情发展到了这等地步,高世、金文衍和秦良弼请忠烈王速速归国。忠烈王对此表示反对,说道:“我听说前王曾想派人在路上等我,抓住我后仍到江里去。我虽年已老迈,却想多活几年。”高世等70人只好上书蒙古中书省,谴责王惟绍的罪行,拥护忠烈王,请求让他归国。蒙古中书省将情况向蒙古成宗奏报,请求不准许忠烈王归国。忠烈王生怕反对派又搞新的阴谋诡计,而不想归国,为此服下一种药而患上了痢疾,从夏天到秋天起居不正常,无法到户外活动身子。

情况到了这步田地,薊国公主得知王惟绍等因罪行败露被起訴,不禁勃然大怒,命人把金文衍叫到其住所处以杖刑。然后,命人把守忠烈王住所的大门,禁止那些在告发王惟绍等状纸上签名者出入于忠烈王的住所,并严加监视。^②

对于忠烈王来说,齐国大长公主于1297年(忠烈王二十二

^①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1年11月戊午,12月癸巳;32年11月甲午。《高丽史》卷122,列传35,官者李淑传。《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王惟绍传。《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1年11月,32年11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35页至636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②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2年11月。《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王惟绍传。《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2年11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35页到636页。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年) 5月去世, 薊国大长公主亦即忠宣王王妃于 1298 年(忠烈王二十四年) 1月从蒙古到达高丽, 1298 年 1月至 8月忠烈王让位与忠宣王继位不顺, 以及 1307 年蒙古成宗的驾崩, 都是对忠烈王致命的打击。于是, 忠烈王与忠宣王都滞留在蒙古。高丽政坛的争权夺利, 渐渐变得对以薊国公主为王妃的忠宣王有利。

1307 年 2 月, 忠宣王对高丽朝廷的人事作了重要变动, 忠宣王的亲信崔有滄、柳庇、李混、金沈和许评等 80 多人入阁。忠宣王秉承蒙古太子的意旨, 将王惟绍、宋邦英、韩慎、宋麟等关入监狱, 让忠烈王入住庆寿寺。从此, 忠烈王无所事事, 高丽政权又完全被忠宣王掌握。^①

后来, 忠宣王正式复位。过了五年, 薊国公主与忠宣王一同归国。他们回国时盛况空前, 豪华奢侈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315 年(忠肃王二年), 薊国公主又去蒙古, 而且最终死于蒙古。

第三节 忠肃王与三公主的联姻

忠肃王王涛是忠宣王的次子, 母亲是蒙古女人也速真。他生于忠烈王二十年, 亦即 1294 年 7 月。1313 年(忠宣王五年) 3 月, 经蒙古皇帝同意, 他即位为国王, 年仅 20 岁。

忠肃王于其即位那年的 8 月, 与益成君洪奎之女结婚, 是为德妃, 后来成为明德太后。她于 1315 年(忠肃王二年) 1 月生下王子王楨(后来成为忠惠王), 后来又生下恭愍王。她相当聪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2, 世家忠烈王 33 年 3 月辛卯。《高丽史》卷 125, 列传 38, 奸臣(1), 王惟绍传。《高丽史节要》卷 23, 忠烈王 33 年 3 月。

慧，为人贤良淑娴，深受忠肃王宠爱。^①

1316年（忠肃王三年，元延佑三年）2月，忠宣王在蒙古向泰定帝请求准许两国王室继续联姻。泰定帝应允，让忠肃王到蒙古。其时，母后蜀国公主于1315年12月在蒙古去世，1316年2月，其灵柩从蒙古运至高丽。忠肃王在其葬礼就绪之后才到蒙古。1316年7月，忠肃王在蒙古与营王也先贴木儿的女儿亦怜真八刺公主结婚，她就是濮国长公主。^②

濮国长公主于1316年冬天同忠肃王一起从蒙古来到高丽。1318年（忠肃王五年）12月，蒙古营王偏妃曾到高丽看望其女儿，亦即高丽王妃亦怜真八刺公主。她来高丽之行，不仅是蒙古王室之妃来高丽与女儿重叙母女之情，而且对促进高丽与蒙古王室及两国之间关系的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蒙古营王偏妃于翌年（忠肃王六年），亦即1319年的4月归国，而亦怜真八刺公主却于9月去世。她死后，高丽派元尹任子松到蒙古报告公主的噩耗，又派郎将李麟起向蒙古营王报丧。蒙古皇太后闻讯，派於先不花到高丽，吊唁公主的去世。^③

翌年，亦即1321年（忠肃王八年），蒙古中书省对濮国长公主猝然辞世有疑窦，派李常志为特使到高丽，将公主侍女胡刺赤女子与僕母韩万福关押起来，追究公主的死因。韩万福说：“去

^①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即位的序文，即位年8月壬午，12月己卯；2年1月丁卯。《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条，明德太后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即位年序文。

^②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2年11月壬子；3年2月丙子，7月戊申。《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2年12月；3年2月、7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5年12月戊申；6年庚寅，9月丁未，11月丁亥，12月己未。《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条濮国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5年12月；6年9月丁未，11月，12月。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年8月，国王与德妃在延庆宫亲密，濮国长公主心生妒意，被国王打了一顿，打得鼻孔流血。9月，国王在妙莲寺也殴打了公主，幸亏於先夫介等上前阻止，才把公主救了出来。”

蒙古使臣李常志感到有必要对胡刺赤女子和韩万福作进一步的调查，便把她们抓起来，带回蒙古。^①

紧接着，高丽让白元恒与朴孝修等上书蒙古中书省，辩白说韩万福等的陈述纯系无中生有的诬告。然而这一事件似乎未在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上引起什么复杂的问题。

1324年（忠肃王十一年，元泰定帝元年）8月，忠肃王在已有德妃的情况下，在濮国长公主死去五年之后，在蒙古与顺帝之子魏王阿木哥的女儿金童公主结婚，她就是曹国长公主。翌年5月，忠肃王与曹国长公主从蒙古归国。正是在这一天，忠宣王在蒙古燕京撒手人寰。曹国长公主于这年7月生下王子，亦即龙山王子。10月，她突然死去，年仅18岁。然而，高丽与蒙古王室及两国之间并未因此遗留下什么问题。^②

忠肃王把王位让给儿子忠惠王之后，在蒙古与蒙古女人伯颜忽都结婚。忠肃王复位后，于1333年闰3月与她一起回到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8年8月癸丑条，确有忠肃王移御德妃宫的记载，许万福的例示是有根据的。但是，9月的殴打事件则于史无据可证。

^②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11年8月戊午；12年5月辛酉，8月癸卯，10月丁酉。《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条曹国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11年8月，12年5月、8月，10月丁酉。1335年（忠肃王后4年），李谷（李穡之父）考虑到元朝要求高丽提供女子的副作用很大，曾上书建议元朝朝廷不再要求高丽提供童女。读了李谷的奏章，令人难以平静，当时这方面的惨状使人不忍卒读。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28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高丽史》卷109，列传21，李谷传。《高丽史节要》卷25，忠肃王后4年12月。

她就是庆华公主。庆华公主与忠肃王到高丽时，蒙古太子（宁宗于七岁夭折，皇太子尚未即位）派院使阿也赤为之送行，许多蒙古官员也前往饯送。看来，庆华公主也是蒙古王室的公主。

忠肃王于1339年3月去世后，其长子忠惠王两度在永安宫设宴款待庆华公主，庆华公主也设宴回请了忠惠王。宴会结束后，忠惠王佯装喝醉未离开，等到天黑之后进入了庆华公主的寝室。庆华公主大惊而起身，忠肃王却让宋明理等按住公主，使她不能动弹，并且捂住她的嘴，随后对她非理。

次日，庆华公主由于差赧难当，想买马骑回蒙古去。忠惠王命令李俨和尹继宗等去马市，禁止开市营业，使她买不到马。

这一丑闻传到蒙古，蒙古派使臣头麟等到高丽，向庆华公主敬了御酒以示慰问。然后，把忠惠王抓起来押往蒙古。^①

忠肃王与忠惠王父子的关系颇为复杂。忠肃王曾让位与儿子，后来又复位。这样的让位与复位，与蒙古朝廷的倾轧是分不开的。1328年（忠肃王十五年）4月，忠惠王作为高丽世子到蒙古当宿卫。当时，丞相燕贴木儿与太保伯颜在蒙古朝廷里争权夺利。这两个权臣的倾轧，自然对高丽有影响。也就是说，丞相燕贴木儿看到高丽世子（后来的忠惠王）之后很高兴，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子而爱护有加。忠肃王一让位，他就向蒙古顺帝（于1333年，亦即忠肃王二年6月即位）建议由高丽世子王楨继位。然而，蒙古太保伯颜厌恶燕贴木儿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对王楨也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好感。

^①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后2年闰3月丁酉，后8年3月癸未。《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2年7月甲子、丁卯，8月甲午。《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条，庆华公主传。《高丽史》卷130，列传44，叛逆5，曹颀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后2年，闰3月；后8年3月癸未。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忠肃王复位时，事态已发生逆转，燕贴木儿已经死去，伯颜对王祜很冷淡。于是，忠惠王王祜当时便与燕贴木儿的子弟及回鹘少年一起饮酒作乐，放荡不羁。他与一个回鹘女子有染，平日往往不像个宿卫的样子。伯颜见他如此堕落，管他叫泼皮（无赖），向顺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高丽的王祜平日举止放荡，常常不值宿卫，应当把他送回其父那里，让其父好生管束！”蒙古顺帝觉得言之有理，表示同意。

1336年（忠肃王后五年），蒙古顺帝让王祜回高丽去。1339年3月，忠肃王去世。忠肃王也常常骂他像个泼皮，对之十分厌恶，但是临终时还是把王位交给了自己这个长子。然而，蒙古的伯颜表示反对，他也就因而有一段时间未能即位。^①

忠惠王经历这样的过程即位后，竟敢奸污父王忠惠王的王妃、自己的继母庆华公主，遂被抓往蒙古，于1340年（忠惠王后元年）正月被关在刑部。这年3月，蒙古脱脱大夫向蒙古顺帝提出建议：还是把忠肃王释放回高丽，让他复位为好。这年4月，蒙古的丞相伯颜因犯罪而被流放于阳春县之后，忠惠王被释放回高丽即位。^②

庆华公主在忠惠王被抓到蒙古之后，倚恃蒙古的势力，参与高丽政事，有一段时间掌管人事任免大权。她让赞成使郑天起主持征东省的事务，金之谦主持权征东省的事务，任命金资主管提调都金议使司，让其亲信掌握了高丽朝廷的实权。她于1344年（忠惠王五年）去世。

^①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2年正月甲子。《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兆年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后元年正月辛未，3月甲子，4月癸巳。《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兆年传。《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后元年正月，3月癸巳。

忠惠王重又即位后，酷爱打猎，喜欢摔跤，与大臣们在一起不拘上下之礼节，尤其厌恶儒生。王祜蒙古讳为普塔实里，系忠宣王的长子，母亲是明德太后赵氏，生于忠肃王二年，亦即1315年正月。于忠肃王十五年（1328年）2月作为世子到蒙古担任宿卫。1329年10月，忠肃王让位。1330年2月，他在得到蒙古承认后登上王位。

忠惠王即位后，于当年3月与镇西武靖王焦八的长女亦怜真班结婚，立之为王妃，她就是德宁公主。她生下忠穆王与长宁公主。忠惠王复位仅5年，即于1344年死去，年仅30岁。他的长子王昕于8岁即位，是为忠穆王。德宁公主在宫中耐不住寂寞，与出入于宫廷的裴佺和康允忠有染。有人写匿名信揭发裴佺的罪状，德宁公主召集全体大臣宣布：“从今以后，不许裴佺在我身边走动！”实际上，此后裴佺在公主宫中走动得更勤。公主在忠穆王（在位4年）、忠定王（在位3年）在位时垂帘听政。由于德宁公主是忠定王的嫂嫂，忠定王对她很恭敬，无法阻止她参政。她命令德成府院君奇辙与王煦摄政征东省事，在人事任命方面一直大权在握。^①

第四节 恭愍王与鲁国公主的联姻

恭愍王讳颀，古讳为琪，是忠惠王的同母弟。1341年（忠惠王后二）年5月，奉蒙古顺帝之命去蒙古担任宿卫。当时，他曾被称为大元子。忠穆王即位后，他被封为江陵府院大君。忠穆王一夭折，国人想立他为国王，而蒙古却让忠定王继承王位，他

^① 参阅《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惠王条德宁公主传。《高丽史》卷124，列传37，奸臣2，裴佺传及康允忠传。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则仍然在蒙古朝廷当宿卫。忠肃王在位时，他敬重尹泽。忠定王元年，亦即1349年，尹泽与李承老等上书蒙古中书省，请求让他继承王位。

1349年（忠定王元年），他在蒙古与蒙古宗室魏王之女宝塔失里结婚，她就是微懿鲁国大长公主。他即位后成为恭愍王，鲁国大长公主同他一起来到高丽。

鲁国大长公主不仅受恭愍王专宠，而且议政参政，不愿静守宫室。1352年（恭愍王元年）1月，恭愍王想亲往太庙（即，供奉高丽历代国王牌位宗庙）主持祭祀，判书云观事姜保根据阴阳说认为国王今天不宜亲往。都堂（议政府的别称）对姜保此说很不满意，指责道：“祭祀太庙乃是国家大事，你为何胆敢阻止国王去太庙？”然而，奸臣们却就此向鲁国大长公主（有人说是明德太后）告密。公主当即向大臣们说：“你们如敢怂恿国王去太庙，我饶不了你们！”结果，恭愍王未能参与这次祭祀。^①

由于公主信仰佛教，恭愍王与和尚普虚（有的史料记载为普愚）过从甚密，在佛事上花了不少时间，捐了不少钱物。1356年（恭愍王五年）3月，恭愍王与公主陪王大妃明德太后到奉恩寺听普虚讲经，士大夫家妻女也云集听讲，所捐的贵重物品堆积如小山。恭愍王还让普虚进内殿讲经说法，使公主与太后欣慰得落泪。公主施舍给奉恩寺玻璃盘与玛瑙汤匙。^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恭愍王元年正月庚申所记载的不是鲁国公主而是明德大妃赵氏。《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肃王条明德太后传记载的也是明德太后，即王大妃赵氏。参阅《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恭愍王条微懿鲁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元年正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3月丙戌。《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微懿鲁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3月。

恭愍王即位后，由于与蒙古王室有亲戚关系，得以肃清炙手可热的奇氏一伙，讨伐了红巾贼，撤销了业已设立达百年之久的蒙古双城总管府，恢复了被蒙古侵占的一些领土，业绩可谓相当突出。然而，他与鲁国公主却未能得子，不免常常为此忧心忡忡。1359年（恭愍王八年）4月，高丽宰相向公主建议：“王即位业已九年，尚无太子，请善择良家之女作为国王后宫。”公主应允。经过广泛挑选，选中著名文人李齐贤之女为王妃，即惠妃。与惠妃结婚，非出自恭愍王之意，而且不久公主为此后悔不已，竟至不思饮食。于是，出入于内殿的奸臣与宫女开始妒忌惠妃。

1361年（恭愍王十年）11月，为了躲避红巾贼之乱，公主跟随恭愍王与太后到南方，渡过临津江到达兜率院。在这里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之事，公主只好弃车骑马。^①

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闰3月，恭愍王为了躲避红巾贼，曾避难于安东。红巾贼被平定之后，恭愍王回京城途中驻蹕于兴王寺。这时，金镛秘密指使其党羽50多人侵犯恭愍王行宫，史称“兴王之变”。当时，护卫恭愍王的人一个个闻风而逃。所谓“兴王之变”，就是金镛指使金守、曹运等50多人深夜闯入兴王寺，杀死守门者，然后进入寺内，互相以宰臣自称，口口声声说他们系奉蒙古皇帝之命而来，杀死了恭愍王的侍卫金汉龙、金议评理王梓、宦官姜元吉以及七八名卫兵，直闯恭愍王的寝室。宦官李刚达背起恭愍王藏匿于太后的密室。恭愍王在密室里以毛毯蒙身不敢大声喘气。事态到了这样狼狈不堪的程度，公主倒是把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10年11月丙寅。《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明德鲁国大后传及微懿太长公主传。《高丽史》卷111，列传24，洪彦博传。《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10年11月。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寝室门关上，坐在门边躲过了这场劫难，表现出镇定自若的气度。

宦官安都赤长得酷似恭愍王。他忠于主子，躺到恭愍王的床上。逆贼等冲入国王的寝室，一见安都赤，以为是恭愍王，立即杀死了安都赤。他们自以为得计，连忙撤走，去向其头头请功。这些逆贼还将右正丞洪彦博杀死在官邸之中。

然而，事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金辅仅仅作乱 22 天就被逮捕，先是流配于密城，然后于 4 月被处死。^①

1365 年（恭愍王十四年）2 月，公主终于怀孕。然而，在分娩时不幸竟难产而死。

公主死后，恭愍王念念不忘，一心只顾佛事，竟让和尚辛吨为之理政。

第五节 蒙古顺帝与奇氏联姻及其后遗症

高丽国王娶蒙古王室公主为王妃，凭着这样的联姻，影响了两国的关系和国内的政局。同样，高丽之女成为蒙古王妃后，在增强两国之间友谊的同时，也以其影响力给予了高丽以不容忽视的影响。

1275 年（忠烈王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0 月，蒙古派岳脱衍和康守衡作为使臣来到高丽。当时，蒙古世祖在其诏书中写道：“高丽所有姓王的人，都要同姓者为妻。这究竟是何故？而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0，世家恭愍王 12 年闰 3 月辛未、癸巳，4 月己未。《高丽史》卷 89，列传 2，后妃 2，微懿鲁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卷 111，列传 24，洪彦博传。《高丽史》卷 22，列 35，安都赤传。《高丽史》卷 131，列传 44，叛逆 5，金辅传。《高丽史节要》卷 27，恭愍王 12 年闰 3 月，4 月。

高 丽 外 交 史

今，我们已是一家人，应当可以通婚。”由此可知，截至当时为止，高丽只是以蒙古王女或王室之女为妃，而未把女嫁到蒙古。^①后来，高丽设置了结婚都监（亦称寡妇处女推考别监），它是应蒙古之要求而设立的官府，以选拔献给蒙古的贡女为其使命。

1274年（元宗十五年），蒙古为处理蛮子军（投降蒙古的宋朝士兵）的结婚问题，要求高丽提供一些美女。起初，高丽选送低贱人家的女儿去蒙古。从忠烈王即位后开始，送往蒙古的是民间独身女人、破戒僧女儿和逆贼妻子等妇女。高丽（以忠烈王在位时为主）送往元朝朝廷的女子如下表：

年月日	内 容	备 考
元宗 15 年 2 月 (1274 年)	元朝为了解决蛮子军的婚姻问题，派来媒娉使肖郁，带来 1640 段绢。抽调了 140 名女子送去	高丽设置结婚都监，负责把逆贼之妻和僧侣之女送至元朝朝廷
忠烈王 2 年 闰 3 月 (1276 年)	元朝为归附军 500 名士兵找妻子	
忠烈王 3 年 11 月 (1277 年)	派俞千遇送去 10 名女子	元朝朝廷只选中了崔甸与崔之守之女，将其余 8 人送回
忠烈王 6 年 11 月 (1280 年)	金洵赵允璠的女儿嫁给元朝的阿合马	
忠烈王 10 年 9 月 (1284 年)	塔刺赤求婚，内侍郑孚的女儿嫁给塔刺赤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8，世家忠烈王元年 10 月辛丑。《高丽史节要》卷 19，忠烈王元年 10 月。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 626 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 1973 年。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忠烈王 15 年 8 月(1289 年)	同知密直司事蔡仁揆把女 儿献给元朝朝廷	
忠烈王 19 年 10 月(1293 年)	忠烈王与公主去元朝首都, 带去良家女子 3 人	
忠烈王 24 年 8 月(1298 年)	孛鲁兀归国时,大将军姜纯 把女儿嫁给他	
忠烈王 26 年 5 月(1300 年)	上将军高世奉命到元朝献 童女	
忠烈王 26 年 7 月(1300 年)	忠烈王献两名童女和 3 名 闾童给元帝,献 1 名童女给丞 相完泽	当时,忠烈王在元朝 首都
忠烈王 27 年 1 月(1301 年)	安西王阿难达派使臣要童 女。送韩孙秀之女给他	
忠烈王 27 年 2 月(1301 年)	脱脱大王派人前来要童女	
忠烈王 28 年 7 月(1302 年)	派大将军秦良弼到元朝朝 廷献童女	
忠烈王 31 年 2 月(1305 年)	派护军郑恭到元朝朝廷献 童女	
忠烈王 31 年 3 月(1305 年)	派王惟绍到元朝朝廷献童 女 10 名	
忠烈王 31 年 9 月(1305 年)	安西王阿难达派使者前来 要童女	其使者为妇女
忠烈王 31 年 12 月(1305 年)	忠烈王将齐安公王淑之孙 女献给元朝皇后	
忠烈王 33 年 6 月(1307 年)	派同知密直司事秦良弼到 元朝朝廷献童女	
忠烈王 33 年 10 月(1307 年)	元朝派宦者及典酒李彦忠 到高丽选童女	

高 丽 外 交 史

忠烈王 33 年 11 月 (1307 年)	派同知密直司事秦良弼到 元朝朝廷献 8 名童女	
忠烈王 33 年 11 月 (1307 年)	派都金议参理金深到元朝 朝廷献 10 名童女	
忠烈王 34 年 4 月 (1308 年)	宦者撒勒奉元皇后之命到 高丽选童女	撒勒系高丽龙官人
恭愍王 3 年 5 月 (1354 年)	庆阳大君卢颐把女儿献给 元顺帝	因而被封为元朝集贤 殿学士

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 627 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 1973 年。

受到蒙古皇帝宠爱的第一个高丽女子,是蒙古世祖的宫女李氏。她善于弹琵琶,蒙古世祖因而对她十分钟爱。受到蒙古皇帝宠爱的第二个高丽女子,是化平君金深的女儿在麻实利(蒙古名字)。她是蒙古仁宗的偏妃,泰定帝即位后被推奉为皇后。

另一方面,忠惠王的女儿长宁公主(德宁公主所生)嫁给了蒙古的鲁王。蒙古灭亡后,她在北京失踪。她是恭愍王的侄女。恭愍王得知其失踪,派尚书成准得报告明朝,请派人寻找。明太祖接到这一奏报,派宦官通报全国,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她。她靠明朝帮助回到高丽后,恭愍王得知其所作所为,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从辛屯秘密让左司议大夫吴中陆上呈的奏章中可知一二。这份奏章写道:“夫人(指长宁公主)本应从一夫。从义理上说,也不能再嫁他人。她本是王家的后裔,在蒙古之时,其妇道便早就受到了非议。这是我国的羞耻。蒙古军队往北逃走时,她不守节操不自尽,却成了明军的俘虏,也是一种羞耻。明朝朝廷考虑到她是我国祖宗的后裔,将她还给了我们。殿下应当如何对待她呢?倘若容恕之,如何面对祖宗?如何遮掩国人的耳目?”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请将她置之边防，保全其生命。”^①

由此看来，长宁公主嫁给蒙古王室，不仅无助于维护两国王室与两国的友好关系，反而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高丽女子嫁到蒙古之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均引起问题的，要算是奇辙的妹妹。奇辙的妹妹奇氏（蒙古名字为完者忽都），原是蒙古皇室的宫女，后来极受顺帝宠爱，竟使顺帝打破蒙古王室“不得以蒙古人之外的女人为正后”的家训，册封她为第二皇后。她生下了皇太子爱犹识里达腊，使蒙古皇室的宗统得以延续。当时，奇皇后势力在蒙古末期的30年里，可谓炙手可热。

奇辙的父亲奇子敖娶典书李行俭的女儿为妻，生下了轼、辙、辘、轴、轮。奇轼早夭。最小的女儿被选去做蒙古顺帝的宫女，后来被封为第二皇后，生下了皇太子爱犹识里达腊。忠惠王在位之时，蒙古派资政院使高龙普和太监朴贴木儿不花到高丽，追赠奇子敖以功臣（即秉德承和毓庆）称号，追封安王，称之为庄献。同时命令翰林学士欧阳玄为之拟墓碑文。1342年（忠惠王后三年）6月，蒙古又封其妻李氏为荣安王大夫人，在其府第的大门上挂上“贞节”的牌匾，常派使臣送衣送酒作为礼物。^②

蒙古给奇子敖的儿子们封了官职。奇辙被封为元朝行省参知政事（系中书门下省从二品官职）。奇辘被封为元朝翰林学士。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3年1月己亥。《高丽史》卷91，列传4，公主，忠惠王条长宁公主传。此外，1369年（恭愍王18年）9月，北元的吴王通过高丽使臣禹碑请婚。这年10月，恭愍王派大将军崔伯和柳云到元朝，将金逸云之女嫁给北元的吴王。之后，崔伯又来迎淮王之女，却因崔伯死于途中，淮王未把女儿嫁出。参阅《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8年9月乙亥，10月乙酉。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3年6月己亥，8月辛丑；4年4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70页。

高丽则任命奇辙为正丞，封之为德城府院君。奇辙则被封为德阳君。蒙古奇皇后的兄长倚仗其势力，在高丽作威作福十分放肆，连他们的亲信也仗势欺人，无法无天。

奇辙把家族纠集在一起，为母亲荣安王大夫人设宴，其餐具与珍馐佳肴均极其奢侈。看到这种场面的人们叹道：“真是有史以来所罕见！”内侍田子由之妻李氏是奇氏亲戚。忠惠王到她家视事，竟然奸污了她。不久，田子由携妻一起逃走。^①

1343年（忠惠王后四年）8月，李芸、曹益清和奇辙等在蒙古中书省上书，奏报忠惠王骄奢淫逸，请求控制并规诫之，使高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此之前，李芸之兄李俨同和尚波哥景有隙，波哥景向忠惠王奏道：“李俨常常责怪臣，对臣说：‘你以为国王是什么人，我可不怕他！’”忠惠王大怒，命人将李俨的奴仆收监。李俨为此想向忠惠王解释，忠惠王动手打他，他大声说：“殿下为何侮辱我？殿下得以即位，谁为殿下出力？”^②这就是说，奇辙这一伙人曾借助于奇皇后之力，使忠惠王得以登上王位。这也是他们平日骄横不羁的一大原因，总以为他们有恩于忠惠王。

这年11月，蒙古派大卿朵赤和郎中别夫哥等6人到高丽，其借口是告郊颂赦，亦即在郊外祭天祭地，请上苍原宥。忠惠王

^① 参阅有关史料。忠惠王奸淫可谓无耻至极。忠惠王2年5月丙寅，他奸污岳父洪戎的继室黄氏，同月庚午，奸污庶母寿妃权氏，同月辛未，奸污宦者刘成之妻印氏，同年8月丁亥奸污南氏。忠惠王后2年3月戊申，听说醴泉君权汉功之二室康氏貌美，便让护军朴伊伊赤去把康氏带进宫中。由于朴伊伊赤先行奸污康氏，忠惠王大怒，把朴伊伊赤与康氏一起杀害。忠惠王后4年3月丁卯，忠惠王去大臣裴佺家里，竟与其妻及其妻之弟金晋之妻通奸。5月乙丑，又与尹桓之妻柳氏通奸。

^②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后4年8月庚子。《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后4年8月。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原想托病不去迎接，奇辙的党羽高龙普说：“蒙古皇帝常常提到殿下在日常生活中不检点。倘若殿下不去迎接这些使臣，蒙古皇帝对殿下会更加不信任。”于是，忠惠王率领百官穿得整整齐齐到郊外欢迎他们。蒙古使臣朵赤与乃住等当场把忠惠王捆绑了起来。忠惠王大放悲声，呼唤高龙普塔救。高龙普责怪蒙古使臣，蒙古使臣们拔刀相向，把忠惠王的侍从也抓了起来，百官一见吓得四散奔逃。当时，左右司郎中金永煦、万户姜好礼、密直副使崔安佑和持平卢俊卿和两名勇士当场被杀，受伤者则更多。最后，朵赤等让忠惠王骑在马上，一同奔向蒙古。忠惠王曾请求稍事停留，朵赤等拔剑相向，威胁忠惠王快乖乖上马。

当时，万户权谦和罗英杰成了押领官。高龙普、朴贴木儿不花和诸军万户李中敏、金珠庆、金上琦等带着弓箭搜索了忠惠王亲信之宅。朵赤等在离去之前命令高龙普负责治理国事，德城府院君奇辙和理门洪彬主管权征东省。这一事件，是奇辙等倚恃奇皇后的势力，同蒙古豪门勾结所制造的事变。^①

奇辙之弟奇辘毆打过在宫室管烛火的人。奇辙妹夫廉敦绍策划霸占他人的妻子之后，假传王命将他人的妻子抢走奸污了三天。奇辘为人凶暴，曾被整治都临抓去处以杖刑。奇辙的亲戚奇三万仗势夺人田地，于1347的（忠穆王三年）3月被整治都监抓去处以杖刑致死。蒙古听说奇三万被打死，派工部郎中阿鲁、刑部郎中王胡刘等到高丽，审讯将奇三万处以杖刑致死的徐浩等人。蒙古使臣阿鲁（一名河鲁）等给徐浩戴上枷锁，对之进行审讯。奇三万之弟奇善财责骂徐浩：“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哥哥多次与你的妻子私通，而将他打死以泄私愤？”徐浩说道：“我的妻子出身于贵族名门，怎么有那样的丑行？只有贱妾才会不顾羞耻而

^①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后4年11月甲申。

乱来!”奇善财的母亲出身卑贱，徐浩这么说是在讽刺奇善财。蒙古派直省舍人僧家奴到高丽，又将徐浩拷打了一顿。^①

忠穆王夭折后，德宁公主（忠惠王妃，蒙古镇西武靖王焦八之女）命令奇辙与王煦^②摄理征东省之事。王煦曾多次上书蒙古顺帝，请求处决高丽国内这些架空国王而无恶不作的宵小，但顺帝充耳不闻。

奇辇也干了不少坏事。恭愍王外出时，他想骑马与恭愍王并行说话。恭愍王只好吩咐侍卫莫让奇辇靠近。

赵日新决心铲除奇氏一门恶势力，于1352年（恭愍王二年）9月把前赞成事郑天起和崔和尚等10人请到家里密商。之后，他们与街上的恶汉们趁深夜袭击奇氏兄弟，却仅仅杀死了奇辇，奇辙等侥幸逃走。赵日新随即带领这些人包围了恭愍王的别宫，杀死侍卫，威胁恭愍王打开御宝库，逼迫恭愍王任命他为右正丞，任命郑天起为左正丞。赵日新执政后飞扬跋扈不久，于这年10月，被金添寿奉恭愍王之命处决。^③

荣安王大夫人倚仗女儿奇皇后的势力，在高丽享受殊荣。忠惠王经常去她家设宴款待。具体的日期有：忠惠王三年6月己未，8月辛丑，四年4月甲辰；恭愍王二年正月丙子，三年正月辛未，四年9月壬寅。恭愍王曾以国书向蒙古顺帝提出这样的请求：“荣安王大夫人世代均系名门大家，德布四方，宜按蒙古的规定大摆孛儿扎（子孙大摆筵席为老人庆祝），并请陛下为大夫

^①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穆王3年3月戊辰。《高丽史》卷110，列传23，王煦传。《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

^② 王煦原名权载。忠宣王极其器重他，把他认为义子，并赐改名王煦。他在忠宣王、忠肃王和忠穆王在位时对国王和王室均极其忠诚。他为人刚直庄重，毕生从未妄言狂语，与奇辙等完全不同。

^③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元年9月己亥、庚子，10月辛丑。《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赵日新传。

第十九章 丽、蒙王室的通婚外交及其后遗症

人李氏进行旌表。”于是，蒙古于1353年（恭愍王四年）8月，派蛮蛮太子和定安平章等到高丽，为她摆设了孛儿扎筵席。从此，高丽每年都为荣安王大夫人大摆筵席。^①

奇辙为人极其傲慢，目空一切，目中无主。恭愍王以监察纠正办事不力而命人杖击之，并处以流放。奇辙责备恭愍王乱来，而将这位监察纠正释放。

奇辙从蒙古回高丽，探望其母荣安王大夫人后，写了一首诗称赞国王。在这首诗里，他未对国王称臣。1356年（恭愍王五年）5月，蒙古派奇辙之子完子不花到高丽，将奇后的父亲荣安王改封敬王，并追尊其三代为王，同时封奇辙为大司徒。^②

当时，到蒙古去的高丽妇女以貌美和贤淑闻名，所到之处均大受宠爱。奇皇后在宫中“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③

恭愍王在位时，把女儿献给蒙古皇太子的权谦，和把女儿献给蒙古皇室的卢頊，均因女儿受到蒙古皇室的宠爱，而受到奇辙的赏识，奇辙与他们沆瀣一气，妄图统治高丽。他们检查了各个道的兵器，假派蒙古使臣到高丽散布流言蜚语，策划在高丽各地滋事。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2年8月庚子；4年8月癸亥。《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5月戊子。《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

^③ 参阅明朝人权衡著《庚申外史》：“至正十八年，祁（奇）官多畜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1353年（恭愍王2年）8月，蛮蛮太子与平章定安来高丽，临走前太子与金允藏之女订婚，然后把她带走。在此之前，元朝皇帝的实迺皇子到高丽，与万户林淑之女订婚，然后把她带到燕京。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2年8月庚子、丁巳。《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2年8月。

恭愍王得知他们这一阴谋诡计，借口举行宴会，邀请这些人参加。恭愍王让密直姜仲卿、大将军睦仁吉、于达赤和李蒙大等带领将士埋伏在侧。等到宴会一结束，恭愍王转身回宫。姜仲卿等便下手，将奇辙当场打死，权谦连忙逃走，没走多远便被抓住而打死，其余的人跑得更快。姜仲卿等紧追不舍，与之在街上交战。姜仲卿带领人马袭击卢项的府邸，把躲在家里的卢项当场杀死。

恭愍王随即下达王旨，声称“奇辙、卢项、权谦等仗势凌辱国王，有恃无恐地残害百姓，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我因与蒙古王室结亲，一向按他们所言行事，而他们反而图谋不轨，必欲置国家于危殆而后快。好在天地有知，祖先有灵，正直之臣齐心协力，终于使他们一个个罪有应得，自取其咎。他们这一团伙的逃逸者和奇唯杰、完子不花、卢济、权恒、和尚等也是罪不容赦。……被奇辙等所抢夺的人和土地，一律归还本人。”

随后，这些逃走的罪人都被捉拿并处死。这些家伙所抢夺的人丁与土地，也都一一归还原主。^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5月丁酉。《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卢项传、权谦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5月。《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江阳公滋附沈王暠传。高丽女子嫁到元朝王室从而在高丽引发问题者，是卢项的女儿。恭愍王在位时，卢项把女儿献给元朝王室，元帝因而任命他为元朝集贤殿学士。卢项的女儿后来成了太子妃。卢项以元太子和女儿太子妃的势力为背景，竟与奇皇后之兄奇辙狼狈为奸，妄图夺取高丽王室的政权，结果都死于非命。这样一来，元朝奇皇后与元太子埋怨恭愍王不留面子，想废黜恭愍王，并把沈王王暠之孙笃朵不花扶上王位。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第一节 征伐前的丽、蒙、日关系

蒙古在中国北方兴起后，企图实现统一中国、称霸世界梦想，并计划征服远东边界的日本。蒙古期待高丽成为其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向导。另一方面，占据远东一隅小岛的日本，并没有估计到蒙古的巨大力量，拒绝服属蒙古。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高丽的立场是微妙的。高丽在对蒙战争中虽然失败，不得不表面上服从，但骨子里排外独立的意志（或者称之为事而不服或卑而不屈的表现）在强烈地起着作用。另外，在高丽的对日政策上，虽然只允许一年一度两艘船装载礼物来进献，但因倭寇侵入频繁，有时还借蒙古力量予以剿灭。

仔细分析这种情况，便可知这时倭寇侵犯高丽，曾给高丽带来沉重灾难。

倭侵犯当从1223年（高宗十年，日本后堀河贞应二年）5月侵犯金海开始，之后继续侵犯。高丽为了从根本上阻止倭寇的侵入，向日本派遣了特使朴寅。朴寅携带的高丽国书中说道：由于倭人时常侵犯高丽郡州，国家受灾深重，为此，通过特使送外交文书，希望日本严加查处，管束倭寇，禁止侵入。

日本接到这一国书后，随即查处侵犯高丽的倭寇，并处以刑

罚。^①

1263年（元宗四年，日本龟山弘长三年）4月，高丽还以洪泞（大官署丞）和郭正府（詹事府录事）为特使派遣到日本，致国书要求禁止倭寇的侵略。

国书的要点如下：“自两国交通以来，岁常进奉，一度船不过二艘，设有他船枉凭他事，滥扰我沿海村里，严加征禁，以为定约。越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贵国船一艘无故来入我境内熊神县界勿岛，略其岛所泊我国贡船所载多般谷米并一百二十石、绸布并四十三匹将去。又入椽岛，居民衣食资生之具尽夺而去。于原定交通之意，甚大乖反。今遣洪泞等，赍牒以送，详公牒，并听口陈，穷推上项夺攘人等，尽皆征沮，以固两国和亲之意。”^②

洪泞等同年八月回国时，从日本收回倭寇掠取的谷米二十石、大麦三十石、牛皮七十领。

1265年（元宗六年，日本龟山文永二年）亦因倭寇侵入高丽的沿海村屯，高丽使命令将军安洪敏率三别抄军御之。

1280年（忠烈王六年）倭寇再次侵入固城漆浦，抓走渔夫。高丽遂派遣将军韩希愈防守诸道，又选拔忽赤、巡马等二百人分守庆尚、全罗道海岸。倭寇又侵入合浦（今马山），抓走二名渔夫。于是，政府派遣大将军印侯、郎将池瑄到蒙古，通告倭寇不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0年5月条。《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4年4月甲午、乙丑条。《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14年5月条。《东鉴脱满》安贞元年5月14日壬辰条记载称查出倭寇九十名。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4年2月癸酉条，4月甲寅条。《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4年4月条。《平户记》，仁治元年4月12、17日条。青山公亮著《日丽通商管见》，载《白鸟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青山公亮著《日丽交涉史研究》，该书由明治大学出版于昭和三十年，第16~32页。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上），第20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第20页。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断侵入。蒙古接到这一通告后，通过当时从蒙古返回高丽的柳庇送来回信。信中说，高丽要以高丽军防御倭寇。^①

但是，另一方面，蒙古为了帮助高丽，任命月鲁不花为三南廉访司，对倭贼进行了讨伐。月鲁不花在前进途中于铁山被众多倭贼包围，因不肯投降倭寇，结果同八十多名部下一起战死。

下面看一下高丽和蒙古的关系。蒙古从高丽高宗五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三年）开始征伐高丽，到1259年（高宗四十六年，元宪宗蒙哥合汗九年）便告一段落。也就是说，高宗因为无力抗拒蒙古而在三十年的抗争中屈服，所以接受了将都城从江华岛迁到旧都开城和将太子送到蒙古作为人质这两个条件，结束了战争。根据这一定约，同年4月将太子王偁（以后的元宗）送到蒙古，但高宗未及迁都到开京而于6月病逝（蒙古宪宗也于7月在攻打南宋合州城时阵亡）。然后，次年4月，太子王偁经蒙古世祖（宪宗之后即位）同意即王位，是为元宗。

元宗也没有将都城迁到开城，因此即位以来多次受到蒙古令其迁都开城的督促。所以，这时的丽蒙关系，是为实行高宗四十六年讲和条约中最重要的将复旧都（将来迁都城到旧都开城）而进行的交涉。由此可见，高丽对蒙古还没有真正降服或者服从。

第二节 高丽在蒙日间的中介作用及其意图

蒙古世祖忽必烈正在势如破竹地征服世界，并试图把君临天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6年5月癸卯、甲戌条。《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6年5月条。《元史》卷146，列传32，月鲁不花传。

下的中国天子的传统理想付诸实践。蒙古欲以其影响将日本置于它的支配之下，蒙古期望在用武力征服日本之前，日本以服属之意自愿向蒙古入朝。蒙古希望由高丽来担当这个中介。

蒙丽战争虽以高丽屈服蒙古而告终，但高丽骨子里并不服蒙古。另一方面，三十年的战争结束后，高丽的国基还没有得到牢固恢复。这时高丽便断定如果蒙古征伐日本，必定会给高丽带来更大的负担，因此，决定开辟这个不经过战争而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即接受担当中介的要求。

1266年（元宗七年）11月25日，蒙古按照高丽人赵彝^①的建议，为了让日本同意入朝（即投降），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以黑的（兵部侍郎）、殷弘（礼部侍郎）、伯德（司议官）、孝生（司议官）等为特使，派遣到高丽。

这些特使所携蒙古国书中写道：“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高丽王，即元宗）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与日本）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②

这意思是说，要求高丽不要提出任何理由，为蒙古的对日外交充当先锋，因为这一使命会成为高丽王对蒙古忠诚的表示，所以期望高丽国王积极努力。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赵彝传。《元史》卷6，世祖本纪，至正3年8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7年11月癸丑。《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7年11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39页。池内宏著《元寇新研究》，《东洋文库论丛》（15）。相田二郎著《对蒙古侵略的研究》，昭和三十三年，吉川弘文馆。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高丽召开君臣会议，会上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并于同月 28 日命令宋君斐（枢密院副使）、金赞（侍御使）等，同蒙古特使一起前往日本。^① 宋君斐虽然同蒙古特使等一起前往日本，但到巨济岛后，因波涛险阻，没有踏上渡日之路而返回。这是高丽外表上好像服从蒙古，但内心里却不甘心的又一佐证。通过高丽送给蒙古的文书，就可以明显看出。

文书中写道：使臣到达巨济的前海，“遥往大海，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文书还补充道：“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②

这表明高丽为抑制蒙古征服者的姿态导致日本受到屈辱，反而可能激怒日本，进而使蒙日关系恶化，从而殃及高丽，遂采取了推倭政策。

蒙古世祖征服世界的欲望，不可能就此中止。次年（元宗八年，元至元四年）6 月，蒙古又派遣黑的等携带国书到高丽。同年 8 月，元宗接受这一国书。国书指责高丽以种种理由，对为蒙古使臣去日本充当向导拖沓，并要求“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

高丽接到蒙古国书以后，因难以拒绝蒙古世祖的要求，而感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6，世家元宗 7 年 11 月己亥、丙辰条。《高丽史节要》卷 18，元宗 7 年 11 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 26，世家元宗 8 年正月条。《高丽史节要》卷 18，元宗 8 年正月条。Willam E. Griffis, Korea, The Hermit Nation, W. H. Allen & co, London, 1882 年，第 73 页。

到左右为难。高丽派遣重臣李藏用给黑的送文书，欲使蒙古停止对日交涉。文书梗概如下：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且彼岂不闻大朝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然而不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为，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①

蒙古接受高丽的这种建议以后，元宗不得不任命潘阜（起居舍人）和他挺（书状官）为使节，派遣他们携带蒙古的国书和高丽的国书兀自去日本。这一行于1267年（元宗八年）1月1日到达了日本。潘阜一行将蒙古的国书和高丽的国书传递给日本的大宰府。

蒙古的书函中写道：日本……“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即动员军队），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国书提出日本过去曾向中国派遣使臣以结和好（投降），而如今为何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投降）的问题，并告之以蒙古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霸世界，日本理当知道这一形势。意思是说，为了使其知道这两件事实，派遣使臣告诉蒙古的现状和意图，要让日本对蒙古采取入朝的形式，并使其服属。另外，这文书末尾说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意为如果日本不入朝并服属，那么蒙古就要动用军队，可以说是一种胁迫。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8年8月条。青山公亮著《日元之间的高丽》，《史学杂志》32-8，第23页。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高丽的国书中写道：“我国臣事（以臣侍奉的事情）蒙古大国，稟正朔（沿用蒙古月历的意思，这也是臣服的意思）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视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即元宗）云：‘日本与高丽为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屡通中国，故特遣书以往。勿以风涛阻险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某官某，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因为王子以天下为家，故外即无——作者注）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酌焉。”^①

这是高丽向日本通报蒙古强大和高丽已臣服于蒙古的事实，由此认为日本也会派遣使臣到蒙古臣服，且对其有利，故劝告日本与蒙古通好。

这些文书经过日本的镰仓幕府，^②于2月7日报告到京都。接到文书以后，日本政府觉得蒙古国书无礼，而且末尾说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这句让人不愉快，所以甚至考虑过要拒收国书，结果不仅没有答复蒙古，还决定不答应其要求。

潘阜一行在日本逗留六个月进行交涉，因从日本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便于7月8日归国。高丽将归国的潘阜派遣到蒙古，通告了在日本的交涉结果和日本不接受蒙古要求的情况。

元宗的书函写道：“向诏臣以宣谕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玺书，并赍臣书（即高丽元宗的书函）及国书，以前年九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8年8月丙辰、丁丑。

② 日本先于高丽开始的武臣政治，肇始于明宗时代，虽然武臣源赖朝在镰仓设置幕府，掌握了兵马统帅权。但在1266年（元宗7年）7月，惟康亲王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当时亲王年仅三岁，由此北条时宗便掌握了实权。

月二十三日发船而往。至今年七月十八日回来云：‘自到彼境，便不纳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博多）者，凡五月，馆待甚薄。援以诏旨而无报章，又赠国赈，多方告谕竟不听，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领而还。’未副圣虑，惶惧实深，辄兹差充。陪臣潘阜等以奏。”^①这说明潘阜一行没有到过日本的京都（中央政府），而且在太宰府（九州）逗留五个月期间受到虐待，结果毫无所获返回。

蒙古世祖接到潘阜特使从日本毫无所获而返回的报告后，同年11月，又派遣黑的等赴高丽，给高丽施加压力。蒙古世祖并不相信没有同蒙古使者一起赴日，而只有潘阜等高丽使臣赴日的事实。而且这次黑的返回时带来的国书是非常不信任且又强制性的内容。国书中写道：“向委卿（高丽元宗）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取信？今复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日本），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②11月17日，世祖第三次派遣黑的等到高丽，强迫其实践以前所提出的要求。

高丽曾多次受到督促，使其引导蒙古来的使臣到日本，但高丽并没有照此执行。这如前多次指出，是高丽对蒙古没有真心屈服的证据。高丽对蒙古人不甘服从的事实，通过如下几点，可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7月丁卯：“自到彼境，便不纳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馆待甚薄。援以诏旨而无报章，又赠国赈，多方告谕竟不听，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领而还”。青山公亮著《日元间的高丽》，第30页。《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秋7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11月丁卯，“今复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高丽史节要》卷18，世家元宗9年11月条。

更为清楚地看出。

第一，安庆公涓（元宗之弟）从蒙古归国时，蒙古世祖送来文书。文书写道：“尔王奏云：‘我国地窄，今西京人排屯田军民尽令还归，则当召集残民力民，三年然后复都旧京。’今屯田军民尽还，果还旧京乎？”

高丽曾请求在平壤一带屯田的蒙古军队撤回蒙古，如果蒙古答应这一要求，高丽允诺三年后把都城从江华迁到开京，但蒙古军民撤退已过三年，而高丽仍未迁都到开京。这是高丽内心里不服蒙古的证据，虽然败战，但独立、主权意识在强烈地起着作用。

蒙古皇帝在此文书中紧接着反问说：“朕使至尔国，则尔使人围守。真降之意，当如是耶？尔国来聘，朕亦使人守汝使乎？”^①

至此，蒙古也亲身感觉到如下实情：高丽虽然败给蒙古，但没有完全屈服；虽然表面上称臣，但实际上仍在奉行独立路线。

第二，黑的等特使来高丽时携带的蒙古世祖国书中，蒙古指责道：“向委卿（即高丽元宗）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这是指1269年12月，蒙古为了使黑的、殷弘等安全到达日本而委托高丽当向导时，高丽借口东海波涛险恶，且高丽与日本没有外交交涉，使得使节在去日本途中返回。对此，蒙古深表不满。

也就是说，高丽内心里不服从蒙古，虽然有害怕冲破险恶浪涛而渡东海之因，但主要是因为感到日本不会轻易地臣服于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2月条。《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安庆公涓传。

古，高丽欲尽量回避其中介作用。^①

第三，蒙古以北京路总管于也孙脱、礼部郎中孟甲为使臣派遣到高丽时携带的国书中还写道：“朕惟天道难谄，人道忠诚。而卿（高丽王）之事朕，率以饰辞见欺，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朕亦不以诚遇卿也”。然后接着指责道：“向卿自请，撤兵三年，当去水就陆。撤兵之请，既已从之，就陆之期，今几年矣？以前言无征，是用为问。卿意必日舍险即夷，则虑致不虞。或未取信，听其所止……”。^②

高丽因为受到蒙古的侵入，舍弃开京。进入江华岛，长期抗战，最后投降以后，不得已按照蒙古的要求，答应舍弃江华岛，迁都到开京。高丽答应如果蒙古军队先撤出高丽，高丽将在其三年以后迁都到开京。但后来蒙古军队撤退以后，高丽仍没有迁都。所以，蒙古对此极为不满。

蒙古的想法是，如果高丽对蒙古从内心里尊敬或者名副其实地投降，那么就不会不遵守双方约定的事项。蒙古撤军以后，高丽拒不执行出陆还都的承诺，竟以高丽舍弃四海环抱的要塞，将都城迁到容易受外寇侵入的平地开城，恐有变故为借口，这难道是作为已投降的高丽应有的借口或者姿态吗？

对蒙古抱有上述想法的高丽，为引导蒙古第三次派遣的黑的、殷弘使等到日本，劝导日本臣服蒙古，于1268年12月4日，派遣申思佺、陈子厚、潘阜等，联合出使日本。

丽蒙联合使节一行在日本没有得到任何报章，遂于1269年（元宗十年，元至元六年，日文永六年）3月16日，与塔二郎和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11月丁卯条。《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12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3月壬申条。《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3月条。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弥三郎两名日本人同行，回到高丽。同年4月3日，高丽元宗复派丽蒙联合使节团偕同这两名日本人到蒙古。^① 这两名日本人是怎样地位的人，不甚清楚。只是蒙古世祖称赞申思侏一行出使日本的功劳。接着，蒙古世祖向日本人强调日本从很早以前就侍奉中国，并说虽然现在也希望日本向蒙古入朝，但这不是强迫的，希望日本尽早入朝。^②

同年7月，蒙古派遣这两名日本人到高丽。9月，高丽派遣携带丽蒙两国国书的特使到日本时，也一同送走了这两名日本人。这时，高丽特使让同行的日本人先期说明蒙古对日本的要求，即入朝的要求。同时，特使亦劝告日本正视向蒙古入朝问题的深刻性，说明蒙古要求入朝是形式，仅仅是为了蒙古的大国体面，并无其它利害关系；如果连这个面子也不给留，日本将会大难临头。但是，就连这个要求也被日本冷冰冰地拒绝了，蒙古征伐日本，不得已提上日程。

第三节 第一次征伐日本

派遣使节使其入朝的和好政策，与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促其投降的征伐政策，是蒙古对日本实行的双重政策。蒙古决定让高丽担当这两面政策的中间人乃至先锋。友好政策方面是引导蒙古使臣出使日本或者实现日本对蒙古入朝，在前一节已经做了说明。其次，在对日本的征伐政策方面，是让高丽担当其战争准备。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3月辛酉，4月戊寅条。《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10年3、4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10年4月甲子条。A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 James Scrath Gale, Seoul, 1924年, Chapter XX, 第3页。

以前蒙古使臣于也孙脱到高丽来指出所谓六事时，要求助军和粮食供应，这便是高丽的任务。其时蒙古使臣携来的蒙古世祖文书中写道：“今我朝方向罪（攻打）于宋。其助士卒舟舰自量，能办多少，所输粮饷，则就为储积。”^①

1268年（元宗九年）4月5日，高丽按照蒙古的要求，在蒙古使臣归国时，让李藏用同行，并携带高丽元宗的国书。国书写道：“其就陆之事，则已于古邑，复其居以经营。助师之命，则虽是残民，随所有而检备，其办舟舰输粮饷之事，则惟力是任，亦期将供。其或请达鲁花赤供户版之事，则方始出排，诚未暇于修葺，俟其毕就亦当从……讫有所成，而小臣（元宗自己）将率以造。”^② 接到此书后，蒙古世祖向李藏用提出了如下要求：“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由是，高丽也分担了助军和储备军粮的任务。^③

1267年（元宗八年）7月，前往日本的使臣潘阜毫无所获而归，然后到蒙古转告此事。接着，高丽派遣崔东秀到蒙古，这是为了传达以前蒙古通过李藏用要求的关于高丽军事准备的答复。崔东秀说准备了一万名军队和一千艘战舰，蒙古遣使都统领朵朵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3月壬申，“今我朝方向罪于宋。其助士卒舟舰自量，能办多少，所输粮饷，则就为储积”。《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3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9年4月丙戌条。《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9年4月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102，列传15，李藏用传。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儿到高丽确认其事实，同时调查去日本的通路。^①

在基本结束征伐准备后，蒙古便决定进一步推进逼迫日本入朝的外交活动。

1270年（元宗十一年，元至元七年，日文永七年），蒙古以赵良弼为特使，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四十多人为随行人员，组成使团，派遣日本。1271年1月15日，这些人先行到达高丽，传达蒙古世祖的国书，指出由于林衍的叛逆行为，高丽对日政策上出现了差错，并说道：“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朝于必达……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即金海）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遂行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匱乏。”^②

这是要求高丽保证赵良弼等一定能够到达日本，同时让军舰在金海地方等待，说明这次派遣赵良弼一行出使日本，是非常重要的。

高丽认识到这次赵良弼一行出使的重要性，所以在他们出发以前，先派遣高丽特使到日本，使其做预备接触。这一先遣队于9月2日到日本以后，转告蒙古使节团要到日本来，并劝告其答应蒙古的要求，以图谋和好。如果这次不能结成和好，蒙古将征伐日本。也就是说，告诉日本这次蒙古使节团要求的内容，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③

接着，赵良弼一行同高丽的康允绍、徐称等一起，于9月

^① 参阅《元史》卷6，本纪6，至元5年7月丙子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40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正月己卯。《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正月条。

^③ 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42页。中村荣孝著《满鲜史研究》，第32页。

19日到达了日本。日本政府采取答应蒙古和好要求的态度，后来因为镰仓幕府主张不答应蒙古的要求，随之在指示各镇将军加强防卫的同时，使出奸计，往蒙古派遣伪装使节，派以弥四郎为首的12名日本人同赵良弼一行一起回国。1272年1月18日，赵良弼一行回到高丽。这时，高丽误认为这弥四郎一行是正式使节，遂将这12名日本人带回高丽。^①

赵良弼到达高丽后，认出书状官张铎一行带来的日本人是日本的伪装使节，于3月7日就将他们送回日本。蒙古对日本奸诈的态度，怒不可遏。但没有马上征伐日本，而再次采取了诱和政策，即1272年蒙古第二次派遣赵良弼出使日本。

赵良弼此时也未能到日本的首都，止步于九州大宰府而返。^②赵良弼一行谴责日本九州大宰府派遣伪装使臣的奸计和欺骗行为，并通告九州大宰府既然不肯接受皇恩，继续发生拒绝蒙古使臣进入京都等无礼的行动，就应该受到惩戒。然后，他们于5月末回到高丽，6月初向蒙古世祖报告日本的傲慢态度和其间在日本得到的情报，即日本君臣的爵号、国、郡的名称和数量、风俗和土产品等，同时建议对日本进行武力征伐。

1266年（元宗七年）蒙古第一次往日本派遣使臣要求其遣使入朝开始，到1272年赵良弼提出征伐的建议为止，七年间寻求日本入朝通好，日本一直拒不接受，所以蒙古世祖终于意识到用和平手段根本不能使日本服属。于是，蒙古始下决心动员军队，并向高丽派遣使臣，督促制造军舰。

蒙古以前曾镇压过在高丽发生的政变，又让高丽王出陆还都到开京，以便加强对高丽的控制。1270年6月，江都的三别抄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正月丁丑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3月癸酉条。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军起兵叛乱时，蒙古世祖曾派遣军队到珍岛大败之。这样，蒙古以每当高丽有事时给予帮助为代价，强迫高丽在征伐日本时走在前头。

1274年（元宗十五年）1月，蒙古派遣总管察忽到高丽，要求制造三百艘军舰。又让洪茶丘对此监督，并强迫其从1月15日开始作业。为此，元宗任命侍中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枢密院副使许珙为全州道指挥使，大将军罗裕为诸道部夫使，还征集了三万零三百名工匠，制造船舰。督造之严酷，史称：“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①

这年6月，高丽元宗逝世，忠烈王即位。8月，蒙古决定征伐日本，并派都元帅忻都（或者忽敦）到高丽进行检查；10月，都元帅忻都、洪茶丘（右副元帅）、刘复亨（左副元帅）率领二万五千名蒙、汉军，乘坐九百余艘战舰，于3日从合浦（马山）出发，征伐日本。这些战舰全系高丽制造，而且联合军中有八千名高丽军，其指挥官是金方庆。^②

丽、蒙、汉联合军于10月5日袭击对马岛佐须浦，斩首敌将宗资国，同时烧毁住家，击杀众多敌兵。接着，联合军于14日袭击壹岐岛，攻陷其城，斩首敌将平景隆。19日，占领筑前国松浦郡，并攻打博多。虽然不貳、大友等九州的诸侯与之迎战，但犹如螳臂当车。

蒙古军不仅有称霸世界的战斗经验，而且是使用火器的精锐部队，而日本只有一对一战斗（骑兵战）经验的幼稚战术，所以根本不是联合军的对手。尤其是高丽军英勇无比，在三郎浦大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5年正月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高丽史》卷105，列传18，洪子藩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即位年10月乙巳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第32页。

敌军，使蒙古将军忻都惊叹不已。虽然金方庆将军向忻都要求继续在陆地同敌人交战，但忻都却说此时还是回船舶为好。^① 当晚上却突然刮起暴风，联合军战舰随风暴漂流，大多数战舰触礁沉没，遭受重大的损失，于11月27日回到合浦。由于这一暴风，联合军损失惨重，据记载，未能返回的联合军竟达一万三千五百名。^②

金方庆等于12月28日回到开城，次年1月4日，忻都返回蒙古。

第四节 第二次征伐

在征伐日本遭受重大损失后的第二年，即1275年（忠烈王元年）1月，忠烈王派遣金方庆、印公秀等到蒙古，传达高丽的立场，说高丽因为镇压三别抄之乱和去年对日本的征伐，财政极为拮据。如果今后再拟征伐日本，高丽难以担负战舰和军粮之资，所以希望等待适当的时机征伐日本为好。^③

抱着征服世界野心的蒙古世祖，决不肯因为在攻打小小的岛国日本遭到失败而停止征服计划。尽管高丽有这种恳切的要求，蒙古还是于2月9日派杜世忠、何文著等为使臣派遣到日本。这时，高丽让徐贲与他们同行。

^① 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第34页。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4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即位年11月己亥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第34~35页。参阅中村荣孝著《有关文永弘安两役史料之解释》，《日鲜关系史研究》，第105页。

^③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正月条。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这些人带去的蒙古国书无疑是自去年征伐军征伐日本来加以威胁，同时要求日本对蒙古人朝服属。^① 4月，这一行到日本传达国书。日本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强硬，同年9月，在龙口斩首了这四名使节和另外一名。但是，这一事实在高丽和蒙古并没有传开。

另一方面，蒙古于10月和11月曾两次要求高丽修造战舰、弓矢及箭镞等。^② 曾经紧急准备并督促对日本征伐的蒙古世祖，于1276年1月10日突然通告高丽，停止制造战舰及箭矢等。^③

世祖并不是就此停止对日本的征伐，而是仍然有征伐计划，只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关于对征伐日本计划的延期，可以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对南宋的征伐不顺利。从前年9月开始宋军拼命抗拒。于是，以潭州的李玘将军抗战为代表，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誓死守城的军民。他们表现出誓死不降北方蛮族蒙古的汉民族气节。

第二，如前所述，高丽提出了对日本停止征伐的要求。因为高丽是已经入朝服属的国家，加上忠烈王是蒙古世祖的女婿，而且世子时开始长期在蒙古逗留，所以两人之间私人亲密感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高丽和蒙古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歃血为盟关系。在这样的处境下，蒙古不能不考虑高丽的立场。

^① 参阅震坛学会《韩国史·中世篇》，己酉文化社1973年，第607页的注释1。中村荣孝著《日丽元在文永弘安两役间的关系》（第一辑），《史学杂志》37-6，该书由史学会出版，第38页。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第39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10月壬戌条。《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元年11月癸巳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2年正月丙子，“帝命除造战舰及箭镞”。

第三，派遣到日本的特使没有归还，也没有消息。蒙古世祖派遣到日本的杜世忠等已经被日本杀害，但蒙古全然不知这一事实，反而以为他们正在进行交涉。

第四，将军耶律希亮同南宋降将曾经讨论了对日本征伐的时机，这时所有南宋降将主张立即征伐日本，独有希亮认为再等一些时机征伐也不晚。其原因是若投降的宋军用于对日本的征伐，宋、辽、金三百年间的战争，亟须休养生息，如果现在就要参加征伐，宋士卒的士气还没有稳定，而且军队的配备和整顿也需要时间。^①

迟了再征伐的时机。

高丽自从接到蒙古世祖关于停止战舰及箭矢等准备之通告的1276年（忠烈王二年）1月10日以来，没有因为征伐日本问题而受到牵累。这时蒙古世祖只有征伐日本的计划而任命洪茶丘为征东都元帅，而对高丽却没有关于军舰或军粮等的要求。^②

1277年，在高丽发生第二次金方庆诬告事件（参照第七章），蒙古便要求对高丽国王入朝解释。因为金方庆是大人物，对国有大功，故高丽国内猜忌者众。尤其是征东都元帅忻都欲在高丽横行霸道，但最忌惮金方庆，视之为眼中钉，殊为憎恨。因此，金方庆在元宗十一年平定三别抄之乱时受到诬陷（第一次诬陷），在忠烈王三年当首宰相（即侍中）时又一次受到诬陷，奸臣韦德儒、金福大、卢进义等向蒙古将军忻都诬告说，金方庆要

^① 参阅《元史》卷180，列传67，耶律希亮传。

^② 据记载，元世祖于忠烈王4年又一次试图征伐日本，为此就要把西海道的米运来补给洪茶丘军，让百官交出粮食以供洪茶丘军，但因金方庆诬告事件未能付诸实施。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3年12月丁卯；4年正月己亥条。《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正月条。《东国通鉴》，忠烈王3年12月条。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10页。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除掉国王和蒙古公主及达鲁花赤，将来到江华举行叛乱。

接到这个诬告以后，忻都和洪茶丘对金方庆父子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受到拷问的金方庆始终没有屈服，只好把他流放到大青岛。

这样，忠烈王在接到蒙古世祖要弄清有关金方庆谋反事实的通告以后，于1278年4月带着公主和世子前往蒙古。7月3日，忠烈王会见蒙古世祖，说明了洪茶丘的恶毒和金方庆的无罪，并就征伐日本问题交换了意见。

对此，忠烈王说：“日本一岛夷耳，恃险不庭，敢抗王师。臣（即忠烈王自称）自念无以报德，愿更造船积谷，声罪致讨，蔑不济矣”。^①

意思是说，高丽从蒙古得到的恩惠浩大但还没有报答；当日本依仗其隔海而居、海路险恶，敢于抗拒蒙古世祖时，如果将来蒙古让高丽造船积谷，高丽将义不容辞，声讨致罪日本。

第一次征伐日本结束以后，忠烈王曾向世祖请求：因为镇压内乱和征伐日本消耗了国力，所以请世祖收造船和军粮的成命，将来伺机实施。三年过后，忠烈王强烈主张征伐日本，并承诺负担必要的军需物质。

对此，我们有必要关心以下两点：

第一，向日本“声罪致讨”，决不是高丽独力为之，而是同蒙古联合讨伐。高丽即使以倭寇小规模侵入，尚无奈接受蒙古援助，可见高丽国力尚难独力伐日。

第二，“愿更造船积谷”，也不是指组织丽、蒙联合军出征时，高丽负担全部军舰和军粮，而是高丽尽力而为。第一次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甲申。《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7月条。

蒙、汉联合军出征时，高丽亦是如此。

在忠烈王对征伐日本提出强烈建议两周后的7月17日，蒙古世祖接受忠烈王关于金方庆的无辜和洪茶丘的恶毒。接着忠烈王对蒙古世祖要调回驻扎在合镇浦（马山）蒙古军的问题表示反对，要求其继续驻扎。^①

如果以征伐日本为前提，没有必要撤退驻扎的军队。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说忠烈王反对蒙古军撤退，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蒙古世祖要求忠烈王回到本国以后，与诸大臣协议征伐日本的问题，并通告其结果，而且对高丽征伐日本的积极态度表示满意。

忠烈王之所以极力主张征伐日本，可能是考虑到第一次征伐已经过了三年时间，高丽财力有所恢复，军民的士气有些振作。而且忠烈王首先考虑到由于倭寇频繁的侵入，百姓屡被骚扰掠夺，所以其意旨在将国民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忠烈王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打算减少类似筹措军需物质的牺牲。因为忠烈王在当世子时，长期逗留在蒙古，和蒙古世祖也亲密无间，又熟悉世祖的人品和性格，便利用这一关系，为高丽利益服务。

1280年（忠烈王六年，日弘安三年），忠烈王又向蒙古世祖提出关于征伐日本的建议。这就是：（1）以镇戍耽罗的高丽军补充征伐日本的军队；（2）出发时，减少丽、汉军，让阔里贴格儿再增加蒙古军；（3）不再授洪茶丘以官职，根据其业绩给赏，还要让阔里贴木儿和忠烈王自己管理征东省业务；（4）对高丽军官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4年7月戊戌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高丽史节要》卷20，世家忠烈王4年7月条。《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8月条。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也赋予阶级（总管、千户、总把等）；（5）以中国沿海军民补充艚工和水手；（6）派遣蒙古按察使，激励为战争准备不辞劳苦的高丽百姓；（7）忠烈王将亲自到合浦为出征军饯行。

蒙古世祖照此接受了这七项建议。^①

蒙古世祖把征伐日本作为其称霸世界的一部分，一定要付诸实行。只是世祖等待首其条件的成熟而已。

另一方面，南宋由于临安城失陷，已经走向灭亡，1279年（忠烈王五年，元至元十六年）2月26日，随着崖山的失陷，南宋完全灭亡。南宋灭亡后的2月27日，世祖指示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城，修造用于征伐日本的战舰六百艘。^②

南宋降将（投降于蒙古的宋将军）范文虎接到这一指示，就要求自己担当征伐的责任，并建议：“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③蒙古世祖同意这一建议，并让南宋降将指挥征伐日本。

范文虎得命后，以自己的名义，派遣其部下周福、栾忠和翻译陈光等带着私信到日本。此信的内容是告诉南宋已灭，同时劝导日本因事态紧迫，也要入朝。^④

因为日本毫无入朝之意，就称此信无礼，并将这些使者在博多斩首。但是，蒙古世祖和南宋降将却全然不知这一事实，等待着这些人预定返回的4月份。因等得不耐烦，于是到7月3日，如前所说，高丽忠烈王极力主张征伐日本。在蒙古世祖灭宋统一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4年8月己未条。《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8月条。

② 参阅《元史》卷10，本纪10，至元16年2月甲申条。

③ 参阅《元史》卷10，本纪10，至元16年8月戊子条。《北条九代记》弘安2年6月25日条。

④ 参阅《勘仲记》，弘安2年7月25日条。

中国的基础上，高丽也带头主张征伐日本。这样，征伐日本的条件有了很大的转机。

在这种气氛中，刺激蒙古世祖的是，得到四年前派遣到日本的杜世忠、河文著等同高丽的翻译官一起在日本被杀的消息。^①

蒙古世祖本来打算等到军备整顿就绪和条件成熟后出征，后来因为日本的傲慢无礼，特别是听到杀害特使的消息而受到刺激，便踏上了第二次征伐日本之路。1280年秋，蒙古世祖邀请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南宋降将范文虎和高丽忠烈王等，达成最后协议，然后对拟议六年之久的征伐日本计划付诸实施，实行动员和确定作战的具体计划。首先是扩大征东元帅府，设立了征收日本行中书省，这可以说是要把日本变成蒙古附属的蒙古世祖的意志，这就从征伐机构的名称改为征收（征服而收回）中也可以看出。

1281年1月，蒙古世祖下达了征伐日本的动员令。远征军的兵力由以丽、蒙、汉（即华北）人组成的四万名、战舰九百艘的东路军，和由蛮子军（旧南宋军）十万名和战舰三千五百艘的江南军编成。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金方庆担任指挥，江南军由范文虎、夏贵担任指挥，总司令官是阿刺罕（因途中得病而换为阿答海）。征伐军除战斗装备以外，又准备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和耕作用的犁、镐等。由此可知，一旦占领日本后，就计划派遣屯田军驻扎。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5年8月辛丑条。《元史》卷208，日本传，至元18年2月条。杜世忠等乘船避开扣留和监视而逃亡，把使臣和高丽人翻译被害的事实报告高丽政府，这是前年八月。接到这一报告后，高丽转告元正是此时。《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5年8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47页。《关东评定众传》，建治元年条，“九月七日斩首，是则永为绝和亲、不通问之策。”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东路军5月3日离开合浦，21日攻打日本壹岐岛等九州沿岸的诸岛，6月5日攻打博多湾，6月8日登陆志贺岛，但这时因丽、蒙军之间疾疫流行，损失甚重。

江南军于稍后的七月下旬，与东路军会师，攻打肥前、平户，并占领鹰岛。闰7月1日夜，刮起台风，联合军战舰多遭损毁沉没。虽然诸将帅乘坐剩下的舰船逃回，但许多士兵淹死、被杀或被俘，损害惨重。这时，据各岛的统计，高丽军军士九千九百六十名和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中，生还者只有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①第二次征伐日本，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第五节 第三次征伐日本计划与高丽的劝阻

此后，蒙古世祖仍不肯抛弃征伐日本的计划，每有机会便试图出征。

1283年（忠烈王九年，元至元二十年）1月，世祖任命阿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使其负责募兵和造船，并命高丽准备二十万石军粮，预定8月出兵征伐日本。但是，6月在蒙古内部因百姓不堪忍受频繁的军资筹措发生骚乱，蒙古世祖便停止了这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7年11月壬午条。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上），第40~41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Griffis, *ibid*, 第73页。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篇》，第249页。池内宏著《元在高丽之行省》，《东洋学报》20-3，第219~354页。山口修著《关于文永弘安之役的经过》，《日本历史》152号。山口修著《元寇研究——合战篇》，《东洋学报》43-4，第52~74页。

一计划。^①

1285年4月，蒙古世祖又要集中高丽和中国江南各地的战船征伐日本。但是，根据刘定（吏部尚书）的奏请，中断此计划，而只专心于对中国南方的征伐。

1292年（忠烈王十八年，元至元二十九年）9月，蒙古世祖派遣洪君祥（洪茶丘之弟）到高丽，重新协商征伐日本问题。10月，忠烈王派遣金有成、郭鳞两人到日本，通过国书举出高丽和宋的存亡事例，向日本晓以利害，并劝告其向蒙古入朝。^②

这时，忠烈王同第二次征伐日本时不同，而采取派遣金有成等到日本怀柔的方法，是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因为忠烈王十六年和十七年间高丽受到在中国漠北起兵叛乱的乃颜余党哈丹的侵入。哈丹兵从中国满洲向高丽的东界大举侵入，过铁岭，攻陷杨根，忠烈王甚至曾临时避难到江华岛。高丽军同蒙古援兵在燕岐（今公州与清州之间）会合，大败并驱逐南下的哈丹军（在第二十四章中将详述）。

第二，因为这时征伐日本的准备到了高丽要单独负担的处境。蒙古的丁右丞向世祖建议说：“江南战船，大则大矣，遇触剧毁，此前所以失利也。如使高丽造船而再征之，日本可取。”

^① 参阅《元史》卷208，列传95，日本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18年8月丁未，10月庚寅，“八月丁未……如使高丽造船而再征之，日本可取。帝问征日本事，洪君祥进言曰：‘军事至大，宜先遣使，问诸高丽，然后行之。’帝然之。冬十月庚寅，以太仆尹金有成护送日本人供驿令……仍致书曰：‘小邦与贵国隔海为邻，昔贵国商人，时或来往于金海……我国原自祖先，臣事大元，其来尚矣……予为世子时，继父亲朝皇帝……承袭宗器，不失国号，君臣社稷礼乐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旧，百姓按堵，乐业安生，实输诚事大故也。且宋朝军民不为不多，金汤，不为不固，不知有唐虞之大统，自大而不庭，皇帝亲征，天兵奄至，宋之君臣仓卒失措……’”。

第二十章 丽、蒙联合军征伐日本

对此，蒙古世祖廷问征伐日本之事，洪君祥进言说：“军事至大，宜先遣使问诸高丽，然后行之。”蒙古世祖肯定了这一建议。^①

蒙古世祖征伐日本的意志虽很坚定，但国内意见不一致，为了筹措征伐日本的军事力量，绞尽脑汁。这时，有了让高丽独力担当筹措征伐日本经费的建议。世祖便接受这个建议，并向高丽协商，忠烈王对此表示同意。

这样，高丽因为哈丹的侵略而受害，加上要独力担当征伐日本的军费筹措，出现了战略上的差池，即忠烈王原本期望在本国的防卫上想利用蒙古的势力，但已经不可能。所以，选择了派遣特使到日本怀柔的策略。^②但是，日本对此不仅反对，而且更加巩固了国防。

1293年8月，蒙古为征伐日本，派遣特使到高丽，督促造船和军粮的备置。忠烈王为了同蒙古世祖直接协商对征伐日本的理解问题，于10月到蒙古。但因蒙古世祖于1294年（忠烈王二十年，日永仁二年）1月22日去世，征伐日本的计划便成为泡影。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8年8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8年8月条。

^② 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第85~86页。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第一节 征日本行省的设置及其职能

蒙古的地方制度，有作为路、府、州、县上级机关的行中书省（略称行省），这是承袭了金朝制度。金朝时称之为行中书省事，相当于中书省的临时办事处。到蒙元时代，遂成为定制。

行中书省的权力相当大，它总揽特定地区的行政大权，下辖路、府、州、县，治理边防，处于同都城中书省（即中央机关）对等的地位。蒙元初，管辖地方或征伐时管理有关军民事项的机构，均称为行省。

中统、至元（即蒙古世祖时代）初期，即1260至1294年，分立行中书省，但有职无吏。其首脑均为丞相，发号施令。其后，改为某处（即地方名）行中书省，管理财政、粮食、兵力和装备、驻军及农政、水运等诸项重大事务。行省共有河南江北等处十一个行中书省，其中包括称为征东行省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

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是1283年（忠烈王九年，元至元二十年）蒙古为征伐日本，指示高丽忠烈王设置的。本想用军队组织来管理高丽，但征伐日本失败回师以后便废止。1299年（忠烈王二十五年，元成宗大德三年），重新设置了此行省。这时，虽然按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照蒙古的法规治理，但后来接受高丽忠烈王的建议，废止此行省，使高丽地按照高丽的法规治理。1314年（忠肃王元年，元英宗至治元年）重新设置此行省，使高丽王兼领此机构首脑即丞相，而丞相虽然对其麾下的官吏有选定的权力，但要向蒙古中书省报请。此机构管辖沈阳，并统有二府一司五道。^①

蒙古在高丽的行省，作为治理对日本的蒙古征伐军机关，虽屡次设废，名称一直称为征东行省，但其机能却不尽相同。

1274年（元宗十五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率领二万名蒙、汉军参加第一次征伐日本的蒙古军三个将帅，是都元帅忻都、右副元帅洪茶丘和左副元帅刘复亨。这三个将帅先前虽然作为屯田军经略使，在高丽负责为征伐日本的屯田，但仍然以元帅出征。这三个将军在征伐日本中没有成功，结果撤退到蒙古。

其后，这三个将军重新被起用，洪茶丘从副元帅晋升为都元帅以后，同忻都一起各自代表都元帅府驻扎在高丽，亦驻扎在沈阳附近。

1280年（忠烈王六年，元至元十七年）8月，蒙古世祖召集关于征伐日本的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后来任征伐军司令官的范文虎（以宋的降将依附于蒙古的人）、忻都、洪茶丘（高丽出身）和受蒙古指示而到蒙古的高丽忠烈王等。会上决定了关

^① 参阅《元史》卷91，百官志，“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国，命高丽国王置省，典军輿之务，师还而罢。大德三年，复立行省，从中国之法治之。既而王言其非便，诏罢行省，从其国俗。至治元年复置，以高丽王兼领丞相，得自奏选属官，治沈阳，统有二府一司五道。”高柄翊著《历代征东行省研究》（上，下），《历史学报》14（1961年），19（1962年），《东亚交涉史研究》，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70年，第190~195页。池内宏著《元在高丽朝之行省》，《东洋学报》（20-3）1933年，参见《满鲜史研究》（中世篇3），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1963年，第140~145页。

于征伐日本的一般计划，除忠烈王以外的三个将军也各自被授予行中书省事的职务。会后回到本国的忠烈王也于同年12月被补任为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①行中书省事的任命就意味着行省的设置。

这是为征伐日本而设置的征东行中书省，此名称表现为多种。即称为征日本行省或者日本行省，这是因为当时称征伐日本为征东或东征。征东行省虽然是征日本行省的别称，但正确的名称是征收日本行中书省。第一次征伐日本失败后过了六年，计划重新征伐日本的蒙古世祖，为了显示征伐日本之意，还加上了“征收”的名称。这是表示如果征伐日本成功，蒙古军便对日本实施军政占领的计划。因此，行省从设置到战争结束，未在一一定的场所，而是同江南、东路两军的本部一起，治所不定。高丽忠烈王成为行省的长官，说明行省的一部分曾经在高丽。^②

1281年（忠烈王七年，元至元十八年）8月，蒙古的征东军再次战败，征伐日本以失败告终。战争一结束，当年12月便废止了日本行中书省。^③其后1282年（忠烈王八年，元至元十九年）2月，蒙古世祖试图第三次征伐日本，督令造船，于次年正月又设置了行省。这时，蒙古世祖为了征伐日本，指示高丽要准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17年8月，“高丽王（即忠烈王）来朝，将益兵三万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李庭、张拔突（张禧）为参知政事，并行中书省事”。《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6年12月辛卯，“赵仁规、印侯还自元，王迎诏于城西门外，帝册王为开府议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赐印信”。池内宏著《元在高丽朝之行省》，《东洋学报》（20—3），该学报由东洋协会出版于1933年，第304页。

^② 参阅池内宏著《在高丽朝之行省》，《东洋学报》（20—3），该学报由东洋协会出版于1933年，第305页。

^③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18年12月己亥；19年正月丙寅，“罢日本行中书省”，“罢征东行中书省”。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备二十万石米，以备军粮，并任命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4月，蒙古世祖还任命高丽忠烈王为征东行省左丞相。^①

1284年（忠烈王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初，由于中国南方发生骚乱，不得已停止征伐日本，遂又废止行省。这时，蒙古世祖收回征东省的印章。高丽忠烈王为祝贺蒙古世祖的尊号而到蒙古，正是这一年，忠烈王征东行省左丞相的印章，被蒙古世祖直接收回。^②

废止第二次征日本行省以后约过半年，从1284年10月左右开始，世祖又重新慢慢推进对日本的征伐，于1285年10月第三次设置了行省。这时，以阿塔海为左丞相，刘国杰和陈岩为左丞，洪茶丘为右丞，拟征伐日本。^③但蒙古世祖于次年，即1286年（忠烈王十二年，元至元二十三年）1月，由于日本伺海险顽抗，而且百姓极为疲困，便又停止征伐日本。这是蒙古世祖接受刘宜的建议后而停止的。

关于这第三次行省的废止虽然没有记录，但通过原任左丞的刘国杰此后转任湖广行省的左丞，可见这时征东行省已废止。而且这第三次征东行省，高丽忠烈王并没有参与。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20年正月己丑，4月癸卯条。《元史》，日本传。《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8年正月己亥；9年4月辛卯，6月癸未条。

②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至21年5月壬子，“拘征东省印”。《元史》卷162，列传，刘国杰传，“二十二年，罢征东省，除金书沿江枢察院”，此处22年为21年之误。《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10年4月庚寅，“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

③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2年10月癸丑，“立征东行省，以阿塔海为左丞相，刘国杰、陈岩并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震坛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614页。

第二节 设立于高丽的征东行省

1287年（忠烈王十三年，元至元二十四年）5月，蒙古世祖给忠烈王授予行尚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① 这同过去的征日本行省（或征东行省）不同，是按照新的官制运用于高丽忠烈王的，因为平章政事是其行省的唯一长官，同过去的左丞相不同。1288年2月，蒙古又任命忠烈王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②

1287年4月（忠烈王任平章政事的前一个月），蒙古发生乃颜叛乱。乃颜（领有兴安岭地方的太祖之弟铁木哥干赤斤的玄孙，其根据地在洮儿河下游地域）纠集东方诸王发动了叛乱。对此，蒙古世祖亲自征伐，6月生擒乃颜，7月扫荡其同伙，接着8月返回都城，当时称此出征为征东。

乃颜之乱以后，在蒙古又发生大的叛乱，那是漠北的沈王海都（太宗第五子合失之子）之乱（在下一章将详细阐述）。乃颜之乱也是依靠海都为后援而发动的。海都第一次攻略蒙古边防是1288年（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月。2月和3月，蒙古世祖曾经让李庭将军对其征伐，并任命李庭为尚书左丞。蒙古授予高丽忠烈王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亦是由于这一叛乱而任命的。

^①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24年5月，“授高丽王暉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元于此年闰二月实施政府机构改制，在中书省外设尚书省，任命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委之以财政上的全权。又以中书省的六部为尚书六部，同时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4年4月乙卯，“郎将金精还自元，诏以王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元史》，本纪至元25年2月己卯，“以高丽国王王暉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因此，1288年2月蒙古任命忠烈王为左丞相的行省，是在其前一年（1287年）5月根据蒙古的新制度，担任平章政事长官职务之行省的延续。这里新加上“征东”的名称，将忠烈王从平章政事提升为左丞相，使之成为同先前三次设置的征日本行省同等的资格，其目的在于利用高丽征讨海都的叛乱。

1289年（忠烈王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初，蒙古世祖派遣使臣张守智等到高丽，要求筹措并输送十万石粮食，以救济因海都及乃颜余党叛乱而造成的辽东地方荒芜和百姓穷困。^①

1291年（忠烈王十七年，元至元二十八年）5月，由于桑哥等的失误，尚书省又恢复为中书省，因此行尚书省成为行中书省，而忠烈王的官名改成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②这只是单纯的名称变更。

蒙古在本土设置的行省，是直属于中书省的地方行政机构。高丽的行省由国王任其长官，所以形式上国王好像是蒙古的一个地方官，但因高丽是独立执行国政的王国，征东行省几乎不过是形式上的存在。任高丽王为行省事，意味着高丽国土形式上被视为蒙古的一个行政区域。

1288年，高丽王和行省向蒙古各自派遣了使节。同年7月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5年2月丙寅，“去岁，辽东调遣军马，人民被扰，田禾未收，例皆阙食……辽东与高丽接境，乞令本处，措办粮十万石”。《元史》，本纪世祖至元26年正月，“遣参知政事张守智、李天英，使高丽督助征日本粮”。这里的“日本”当视为“征东”之误。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7月癸丑条。《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9月己亥，“元遣洪重复，授王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元史》，本纪世祖至元28年5月癸丑，“罢中书省事，皆入中书，改尚书右丞相……为中书右丞相……征东行尚书左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王暭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

17日(庚子),高丽派遣安戩(知密直司事)到蒙古祝贺圣节(元皇帝的生日);同月19日(壬寅),行省派遣宋立(中郎将)到蒙古也祝贺圣节。这种情形在蒙古世祖时尚少见,而到蒙古成宗时代,即1295年重新出现。即1295年(忠烈王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贞元年)7月27日,高丽王府派遣金之淑(判三司事)到蒙古祝贺圣节;同年8月2日(甲辰),征东行省为了祝贺圣节,另外派遣牛廷信(员外郎)到蒙古。

高丽的王庭和行省各自派遣使节到蒙古,一直持续到1298年。蒙古世祖从1288年高丽、行省各派来贺使以后,在以后的六年期间,为了便利高丽起见,未让高丽单独派使节。成宗即位以后,复又接受高丽为蒙古成宗派来的圣节使和贺正使。

1298年11月,蒙古成宗在要求忠烈王退位时,将开府议同三司、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附马、上柱国、高丽国王爵号传给世子源,到次年2月8日忠烈王重新复位为止,世子享有此爵号。1298年1月,世子源即位,是为忠宣王。

那时,忠宣王始任征东行省事,接见大臣及行省的左右司所属官吏,按照蒙古的仪式行事。^①可见,行省分为左右司,也有若干官员。虽然说是左右司,但实际上没有分成两个司。那是因为往年以贺圣节使去蒙古的张瑜官名为左右司都司,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另外,征东行省的官员虽然是由蒙古任命的,但也不过是名誉职务。

东征时为了管理其事务,蒙古在高丽设置的征东行中书省以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24年2月戊午朔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4年2月条。池内宏著《元在高丽之行省》,《东洋学报》(20-3),该学报出版于1933年,第317~320页。《高丽史》卷39,恭愍王世家五年冬10月戊午条。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14页。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高丽历代国王为其丞相（长官），有时也有由担任省官的蒙古官吏掌握全权，并干涉高丽事务的情况。

征东行省在其丞相下有平章司、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司等职务。后来，也有都镇抚司、理门所、儒学提举司等机构。

1290年到1299年（忠烈王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至成宗大德三年）期间，高丽的行省大致如此。

第三节 蒙古成宗在位时征东行省的变质

忠烈王复位以后，高丽的政局不稳，忠烈王也未能加以有效统治。其时的赵妃诬告事件，忠宣王官制改革后遗症，忠宣王母后安平公主逝世时宫女无比为首的四十余众流放事件等，使高丽的政情骤起波澜。

1299年（忠烈王二十五年，元成宗大德三年）5月，蒙古中书省报告：“哈散奉使高丽，回言：‘其国王不能弹压其众，朝廷差官（同高丽王）共理之，可也。’臣等议，宜复立征东行省。”蒙古成宗对此表示同意，任命阔里吉思（福建平海省平章政事）任命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还任命耶律希逸为左丞。^①

忠烈王在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可从如下事实看出。先前发生赵妃诬告事件（参阅第八章第二节）时，同忠烈王一起审问韩希

^① 参阅《元高丽纪事》，大德3年5月庚子，“中书省奏：哈散奉使高丽，回言：‘其国王不能弹压其众，朝廷差官共理之，可也。’臣等议，宜复立征东行省，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元史》本纪，成宗大德3年5月庚子，“复立征东行中书省，以福建平海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平章政事”。《高丽史》卷31，世家世烈王25年10月甲子条。朝鲜史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258页。

愈的哈散，为了向蒙古成宗解释，在印侯等刚到蒙古都城燕京后，自己也回到燕京，并向蒙古成宗报告说韩希愈的阴谋纯系诬告。哈散的这一报告，通过其后派往高丽的使臣逮捕韩希愈、李英柱、元卿等，对包括印侯在内的诬告者和被诬告者进行对质，结果就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忠烈王按蒙古朝廷的意旨释放以前流放的韩希愈等时，对他们也曾解释过印侯的诬告事件。对忠烈王的这种处事，蒙古得出结论，认为是其无政见、无魄力是无能的表现。

这样，蒙古使臣以忠烈王政治上无能为借口上奏蒙古中书省，5月19日蒙古中书省经成宗裁定后，向高丽派遣特命官吏，使其同高丽王一起参与处理高丽国政。由此，原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奉命调到征东行省，其使命是与忠烈王一同处理高丽国政，这也是蒙古对高丽内政进一步干涉的结果。^①

此后，随着征东行省任务的变化和行省官吏的增加，蒙古欲按照蒙古的法度治理高丽内政。因此，阔里吉思对高丽吏治不正、腐败等弊端和有悖蒙古的制度，即高丽色彩浓厚的制度，欲进行改革。^② 官制和礼制的改革，虽然在高丽世子源（忠宣王）即位以后，对此曾一度大力推进，但因其废位遂成为泡影。据平章政事阔里吉思向蒙古的报告，当时高丽国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吏四千五十五员，这些人衣食皆取之于民，其民之负荷

^① 参阅《元高丽记事》、《元史》高丽传。《元史》本纪上记载的“复立征东行省”，不是设置新的行省，《高丽史》世宗上记载的“增置行省”，也不是新设置的行省，而只是在忠烈王兼任的征东行省左丞相之下，元官吏的平章政事和左丞增加了人员。池内宏著《元在高丽之行省》《东洋学报》（20-3），第335页。参阅北村秀人著《关于在高丽的征东行省》一文，该文刊载《朝鲜学报》（32），出版于1964年。

^② 参阅《元史》，百官志，“中国之法，统之”。《元史》卷134，阔里吉思传。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之重，可见一斑。在举行大会（冬季的八关会和正月的燃灯会）时，其排场和奢华比肩蒙古的朝仪，犹是国王超过皇帝。^① 阔里吉思又向蒙古报告说：“金仪司官不肯供报民户版籍、州县疆界。本国横征暴敛，民少官多，刑罚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

另外，阔里吉思还要改革高丽的奴婢制度。阔里吉思决定，对身为高丽的奴婢，父母中只有一方是良人者，如愿意免奴婢身分，就要使其成为良人（平民）。这时，高丽的大臣对此谁也不敢反对，唯独金之淑表示反对，说：“世祖皇帝尝遣贴兀来监国，有赵石奇者诉良，贴兀欲用上国法事，闻世祖诏，从本国旧俗。此例具在，不可变更。”于是，阔里吉思再也不敢谈论这件事情。^②

当时，高丽判断如果按照阔里吉思的意思废除奴婢法，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忠烈王于1300年（忠烈王二十六年，元大德四年）10月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向蒙古成宗要求以公文阻止这件事情，希望能够继续遵行现有高丽的风俗习惯和法度。国书说：“若许从良，后必通仕，渐求要职，谋乱国家。若违此诫，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于其八世，户籍不干贱类，然后乃得筮仕。凡为贱类，若父若母，一贱则贱。纵其本主放许为良，于其所生子孙，却还为贱。”现在新任的阔里吉思不

^① 参阅《元史》，高丽传，“大德4年2月，征东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言：‘高丽国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员，衣食皆取之民，复苛征之。又其大会，王曲盖龙宸、警蹕，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仪，僭拟过甚。’”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8，列传21，金之淑传。这帖帖兀就是1270年（元宗11年，元至元7年）带着重要任务到高丽的东京行尚书省事头鞞哥一行中的一人诸之豆，又叫彻彻都。

了解高丽的法制，而要变更奴婢制度，所以要求对此予以阻止。^①

不仅如此，忠烈王在同年4月因蒙古皇太后的死亡吊丧，曾去过蒙古，当从蒙古成宗处得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允诺。忠烈王继续在蒙古逗留，同年7月2日忠烈王同蒙古成宗进行了面谈。结果，8日蒙古成宗通过右丞相完泽“传旨云：高丽国王所奏风俗百事，许令依旧。”这一问题，便告一段落。^②因为阔里吉思试图进行高丽奴婢制度改革与变，是推翻高丽风俗的事情，所以忠烈王为了保护国家制度，带头劝阻了这件事情。

但是，其后蒙古成宗又再次反对保存奴婢制度。于是，忠烈王8月归国后，为了重新阻止此事，10月将前述国书又送到蒙古。

蒙古成宗为了直接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于11月6日召回阔里吉思。接着，同月19日高丽派遣崔有澹（赞成事）到蒙古，使其对高丽保存奴婢制度的缘由作了说明与交涉。崔有澹的这一交涉成功以后，成宗重新接受了高丽的意见。^③

同月，忠烈王给蒙古成宗和中书省送文书，要求对奴婢制度变更与否以明文给予明确的回答。其中送给中书省的文书写道：“自来驱良种类各别，若有良人嫁娶奴婢者，其所生儿女俱作奴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10月丁酉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4月戊午，7月甲戌，“甲戌，帝使人敕王曰：‘凡有所言，既闻奏。’”同年7月乙亥，“王诣阙。”同年7月辛巳，“帝命右丞相完泽传旨云：‘高丽国王所奏风俗百事，许令依旧。’”

^③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11月癸卯、庚申条。《高丽史》卷110，列传23，崔有澹传，“时行省平章阔里吉思欲革本国奴婢之法，有澹奏请仍旧俗。帝从之”。《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6年11月条。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婢，若有本主放许为良，所生儿女却还为贱。昨于至元八年（1271年），有本国达鲁花赤衙门欲改本俗，体例呈奉，到至元九年（1272年）正月初八日，省掾周承行中书省劄，付该都省相度，合从高丽王，依本俗施行，以此本国驱良公事，止依本俗旧例理断，到今不曾改例。今有征东省官，欲改本俗体例。为此，已于今年六月，亲赶上都上表闻奏……伏望都省善为闻奏，乞令依旧省俗施行。如蒙不准，必须变改旧例，除以前年分已成婚聘所生儿女者，止令依旧住坐外，自今以后，诸奴婢不交嫁娶，招占良人为夫妇，似不争竞。然此合行，启禀都省照样定似，希明文回示。”^①

由于蒙古成宗调回阔里吉思，高丽忠烈王派遣崔有济到蒙古，要求以文书答复。蒙古终于同意用高丽法度处理高丽的奴婢制度，这一问题总算告一段落。

高丽趁机向蒙古要求废止行省。当初，蒙古任命阔里吉思和耶律希逸为平章政事和左丞，以增加征东行省人员时，高丽还不大清楚这是永久增加人员，还是为治理某种特别事件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先前作为圣节使随行人员派往蒙古的柳楠回来后，向忠烈王报告说：“大德三年（1299年）九月二十六日（《高丽史》为十月甲子），奏奉圣旨，添设省官者，非为改其国俗，亦不欲恒置。但以一二恶人故，似闻百姓骚扰，将使与王作伴镇安之耳。王今未知朕（蒙古的成宗）意，可具悉为文草奏，然后降答，使明知朕意。”忠烈王听到这一报告以后，以为是一时的增加人员，所以非常高兴，没有为此担心。^②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行省不是一时的机关，而是永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11月丙寅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11月丙寅条。

久的机关，而且极大地干涉了高丽内政。于是，忠烈王经过反复斟酌后，趁阔里吉思变更奴婢制度流产之际，着手让蒙古召回阔里吉思。1301年（忠烈王二十七年，元大德五年）2月，蒙古成宗应王昺（即忠烈王）之请召回行省蒙吏。换言之，此系阔里吉思同高丽不睦而被召回。^①

阔里吉思作为行省大吏，在高丽任职期间，不仅试图变革奴婢制度，而且在处理实际案件时循例蒙古法制。1300年（忠烈王二十六年，元大德四年）5月，阔里吉思还对高丽人直接施行了刑罚。这时，有一个叫天固的僧侣，朱书语于瓦龟背，并埋在惠宿寺石塔下，不久自掘云：“此龟甚神异”，以眩惑众人。阔里吉思抓此僧侣，擅自施以杖刑。东京留守罗允非但未依法惩处之，反而轻信妖术，阔里吉思以此罪将其囚禁在行省里。

同年柳庇（判密直）向阔里吉思告发宋玠（右中赞）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出阔里吉思专擅的一面。柳庇告状说：“长吏张汉烈以皇太后崩告玠，玠曰：‘此喜讯也。’玠言大逆不道焉。我与金深、金延寿共闻，不敢不报。”阔里吉思竟将柳庇及其所言及的所有人等及其亲戚，如柳庇、金深、金延寿、张汉烈、郑真、李安雨等，囚禁在行省监狱与宋玠对辨，还曾经将宋玠的儿子宋璘（右副承旨）、宋瑑（郎将）、宋瑞（将军）囚禁在巡马所。

阔里吉思独断权力，贪财好色，办事不公。在高丽从宰辅以下，无论是谁如果稍微违背其意志，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予以囚禁或施以杖刑，所以没有人不向他行贿。基于宋案的严重性，蒙古便往高丽派遣塔察儿和王泰亨等，同忠烈王一起在行省鞫问宋

^① 参阅《元史》，本纪成宗大德5年12月，“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以不能和辑高丽罢”。这十二月是二月之误。《元史》，高丽传，“（大德）5年2月，罢行省官，诏谕高丽国王王昺”。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58页。

第二十一章 征东行省的变迁及其作用

玠。等到张汉烈等供认此言无据以后，宋玠才终于得免。^①

施行刑罚本为高丽王权，但阔里吉思却对此干预和专擅，尤其趁忠烈王去蒙古不在国的机会专横跋扈。

1302年（忠烈王二十八年，元成宗大德六年）1月，忠烈王在蒙古报告皇帝，称阔里吉思将奴婢处理为良人之断，违背蒙古皇帝旨意，便命令田民辨正都监将其归还本主。^②此后，阔里吉思被免行省平章事，并被召回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宋玠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6年5月辛丑；28年正月戊申条。这时忠烈王在元朝，未在国内。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 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第一节 忠烈王让位与蒙古的干涉

从二十五代王忠烈王开始，高丽从属蒙古的倾向越来越浓，高丽王娶蒙古皇室之女，使丽、蒙王室成为一家，高丽便成为蒙古的驸马国（女婿之国）。此后，高丽历代王的谥号不再称祖或宗（例如象太祖、光宗等）谥号，而称为忠烈王或忠宣王等。蒙古对高丽的王位继承也多加干预，而高丽也认为理应经蒙古同意才能成为王。研讨丽、蒙之间的高丽王位继承问题，成为研究丽、蒙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①

忠烈王（其讳为昀或曙，元宗长子，其母为顺敬太后金氏）于1298年将王位传给其长子璋（或讳谡），七个月后重新复位，在位凡三十五年，七十三岁逝世。1308年，忠烈王将王位又传给其长子谡，是为忠宣王。忠烈王在位期间，曾经历将王位让出复又复位等波折，这既与王室内纠纷有关，与蒙古的干涉也是分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2年7月乙未，“初，国家虽用宋辽金正朔，然历代之谥，皆称为宗。及事元以来，名分益严，而昔汉之诸侯，皆从汉得谥。故王表请上升王尊号，又请追谥高、元二王。诏从之”。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不开的。

1295年（忠烈王二十一年，元成宗贞元年）8月，从蒙古回来的世子源担任判都金议密直监察司事（高丽都金议使司的最高官职，从一品，中书令的后身，忠烈王时改都金议令而为之），作为行政首脑参与了国政。世子源“为世子，入侍元朝，与姚燧、赵孟頫诸公游间，或闻朝政，其议论有足观者。及其即位，避上国之制，改易官名，谨侯度也。正田赋，立盐法”，谥于王道。^①世子仁慈聪明，年少气锐，志向非小。

忠烈王到了六十岁的高龄，便沉湎于酒色之中，而把政事全部委托给近侍办理。

世子（后来的忠宣王）于同年11月在去谒见忠烈王的途中，遇百姓诉苦申冤，方知是贪官污吏掠夺土地和百姓，国家不加制止以至生灵涂炭。这说明当时国家纲纪紊乱、权臣无道和生灵涂炭。世子见此情景，于同年12月又去了蒙古。

1296年（忠烈王二十二年，元元贞二年）12月，世子在燕京（蒙古都城）娶蒙古成宗晋王甘麻刺之女宝塔实怜公主为妻，是为薊国大长公主。世子在蒙古娶公主时，同忠烈王及其王妃齐国大长公主（安平公主）一起在蒙古。忠烈王同王妃齐国大长公主，在蒙古燕京呆了一年后，于1297年（忠烈王二十二年，元大德元年）回到都城开城，这已是5月5日。齐国大长公主（世子生母）在寿宁宫游幸时，见到芍药花盛开，命侍女折一枝来。她欣赏良久，忽痛苦不已，归国不到三天便得病，于5月20日在贤圣寺逝世。世子一听到讣告，立即从蒙古赶来参加了母后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即位年序文。参阅《高丽史》卷34，忠宣王条末尾。《高丽史》卷122，列传35，崔世延传（这里有关于世子年少气锐的说明）。

葬礼。^①

世子认为其生母齐国大长公主突然去世，系宫女无比所为，便对忠烈王说：“殿下知公主所以致疾乎？必嫉恨母后之近侍巫蛊所致，请鞠之。”王犹豫不决地说：“且待服阙。”但世子断定母后之死系宫女无比及其党羽所为，便派人逮捕无比，并将宦官陶成器、崔世延、全淑、方宗氏和中郎将金瑾、将军尹吉孙、李茂，以及官人伯也真等囚禁，鞠问无比嫉咒公主之事，巫女和术僧都供认不讳。于是，世子下令斩首无比、陶成器、崔世延、全淑、方宗氏、金瑾、伯也真等，并流放其党羽四十余人。然后，世子见已故崔文（进士）的妻子金氏有姿色，就将其纳于父王（即忠烈王），这大概是在杀死无比以后慰劳父王。^②

在齐国大长公主治丧期间，世子此举令人惊讶。不过世子早就看不惯官人无比及宦官崔世延、陶成器等勾结的不法行径，且其往年司职判都金议密直监察司事时，非常了解国王的软弱和国王宠侍们所作的坏事，故借此机会大开杀戒，一举清除了擅权的内侍们。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2年11月壬辰；23年5月丁卯、壬午，6月丙午条。《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忠烈王条薊国大长公主传。《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2年11月；23年5月丁卯、壬午，6月丙午条。

^② 无比以泰山郡人柴氏之女被选入宫。忠烈王往来于都罗山时，以必定跟随并留此地之乐，所以人们称她为都罗山。由于无比得到忠烈王专宠，故依附她的人在宫内外横行霸道。《高丽史》卷122，列传35，宦者崔世延传。《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3年7月戊子，8月乙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3年7月、8月条。当时，宦官得到忠烈王的宠爱，掌握实权。如崔世延因其妻狠毒善嫉，怒而自行阉割，成为阉者。崔世延知道宦官陶成器深得忠烈王及公主的宠爱。便依付他人入了宫。其后，崔世延得到比陶成器更大的宠爱。不到数年，崔世延被授予将军的官职，并且滥用权势，横行霸道。以致时人竞相自行阉割愿成为宦官者。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这年8月29日，世子在故陵办完齐国大长公主的丧事后，于10月4日又去了蒙古。

三天后的10月7日，忠烈王派遣赵仁规、印侯、柳庇等到蒙古祝贺皇太子的出生，同时奉上请求蒙古允将王位传给世子源的文书。此文列举了忠烈王在位期间丽、蒙两国之间亲密关系后，说道：“既和殊尤之坠眚，庶几终始以输诚，乃因闺室之相离（齐国公主的去世），哀伤有甚，加以春秋之方耄，疾恙交攻，如一朝僵，仆以莫兴，其庶务割裁之谁任。窃见臣之世子源，夙成干肩，入卫阙庭，荷恩已配于皇支……将俾之嗣位，退以摄生，庶免忧勤，释千钧之重担……兹切呼吁，佇垂矜察。”^①

忠烈王欲传王位给世子的念头由来已久。早在他即位年的10月，在蒙古世祖的强迫下为征伐日本派了东路军，但因台风大败而还；1281年（忠烈王七年），金方庆等同蒙古兵一起第二次征伐日本，复又失败；而1290年哈丹内侵，被迫迁都到江华，1292年又还都开京。经此磨难波折，加之内侍宠幸被斩，使他对政治感到厌倦，所以要让位给世子。

1298年（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正月，世子源从蒙古返回，五天后蓟国大长公主到高丽。迎接世子妃蓟国大长公主的仪式非常隆重，好像迎接国王一般。三天后忠烈王向国民下达退位教书，虽然世子呈书辞让，忠烈王坚持退位。^②

第二天，即正月19日，蒙古好像事先有准备似派王维诏谕高丽百姓说：“迩者，高丽国王王距表陈：‘春秋方耄，忧恙交攻，虑庶务之烦劳，期息肩于重负（王位），乞令世子源袭爵。’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3年10月丙申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3年10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4年正月丙申、庚子、癸卯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4年正月丙申、庚子条。

……矜其诚恳，特赐俞允，授世子……高丽国王，加授王……上柱国逸寿王，以示优崇之意。”蒙古又对忠烈王说：“载惟忠恳，宜赐允从。卿虽耆年，国之重务，尚资训导，迄用有成。于戏，令始令终。”于是，两天以后的21日，忠烈王传位给世子，退居张舜龙宅弟，号为德慈宫，世子在康安殿即位，是为忠宣王。

就私人关系而言，蒙古皇室对忠烈王来说是岳母家，而对忠宣王来说，既是岳母家，又是外婆家。在既是岳母家又是外婆家的蒙古皇室看来，由于年迈的父王专宠内侍，不满自在情理之中，看不下去宠臣的不正作为。而世子似乎在蒙古即已图谋即位，而蒙古好像事先对此表示了同意。这让人联想到退位不是忠烈王自己的意思，而是出自世子的贪欲。因为忠烈王派遣使臣到蒙古请求让位的日期，和蒙古对此表示同意的日期，竟然只差一天。^①

第二节 忠烈王复位与蒙古的干预

忠宣王即位伊始，即锐意政治革新。忠宣王九岁那年，父王忠烈王将要去忠清道游猎时，曾含泪劝阻说：“今兹百姓困穷，又当农作之时，父王何为远猎？”可见，忠宣王自小体恤百姓，痛恨腐败行为，甚至连太上王（即忠烈王）不当要求也加以劝谏。有一天，太上王为太王妃金氏之奴婢向忠宣王求请内传（又称内旨、内命，国王未经朝议下达的指示）时，忠宣王便以“臣于即位之日，为民请命于天，革去宿弊，内传其一也。臣不敢奉

^①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4年正月癸卯、甲辰、丙午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4年正月条。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命”，加以婉拒。^①

他以这种气势，断然实行了官制改革，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同年5月，忠宣王下教书宣言：“唯宰执之数，信于古制，公家议论，多少异同，事事稽带，宜当减省……孤当即位之初……随时沿革，古亦有之，载按历代官职，不涉上朝官号者，而易置之，或罢不急之司，合于一局。”^②

1296年（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6月2日，当蒙古派遣以阿里灰（右丞）为首的洪重喜（洪茶丘的孙子）等一百余人使节团到高丽鞠问赵仁规（忠宣王，亦妃赵氏之父，蜀国公主嫉妒加罪赵妃报告元室以后，元室派了这一使节团）时，阿里伙同元卿一起到监察司，没收了新制定的官制文书。^③参与没收官制文书的元卿，是太上王（即忠烈王）的嬖幸之一。元卿在鞠问赵仁规时，作为蒙古使臣一行前来，而且同蒙古使臣的代表一起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24年3月乙卯条。《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4年3月条。

^② 高丽官制，宰相统率六部，六部统率寺、监、仓、库，就简去繁，官卑先于官尊而作为德目。省五枢七，以为限制。后此制渐废，省和宰扩大到七八个。自事元以来，为应急计，金议和密直总是议会于都评议司，这样参与国政的人达到了六、七十名。于是，六部有名无实，百司（下部衙门）分散，没有统制，政事废弛。参阅《高丽史》卷76，志30，百官1。《高丽史》卷33，世家忠烈王24年5月辛卯条。《高丽史节要》22，忠烈王24年5月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烈王24年6月丁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4年6月条，“元又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左丞杨炎龙来，凡每乘传者百余，鞠赵仁规，遂往金议府词林院，仁规所受批判。又往监察司，收新定官制。阿里火遂以仁规如元。”元卿善蒙古语，因而曾多次随忠烈王如元，但善谄媚。印侯作为齐国公主的私属人随行回来当了宰相，元卿为了借助于印侯的权势，让儿子善长娶印侯的女儿，以后还成为印侯的一派，因喜欢惹是生非，给国家造成了危害。《高丽史》卷124，列传37，嬖臣2，印侯传。

没收忠宣王的新政策文书。这是他怂恿蒙古使臣的，还是受忠烈王的唆囑，亦是蒙古措施，不得而知。

忠宣王早在蒙古宿卫时，留心观察蒙古的新措施和官制，即王位以后，准备对蒙古制度去粕取精，亲揽政务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革新，以一扫高丽的宿弊。但忠烈王顽固维护旧制度，而且不喜欢革新的重臣，元老们起来也坚决反对。因此，忠宣王要贯彻自己的意志，遇到了强大的守旧阻力必须首先除掉这些不满分子。忠宣王即位七个月以后，由于王和王妃之间不和，而且固执保守的重臣、元老极力反对忠宣王，加之奸臣王惟绍、宋邦英等策划的阴谋导致蒙古干涉高丽内政，使忠烈王重新复位。

同年8月10日，蒙古派遣孛鲁兀到高丽。此前，蒙古邀请忠宣王夫妇在8月到蒙古，而孛鲁兀就是为此督促忠宣王夫妇启程而来。

10月17日，忠宣王同薊国公主一起去蒙古，太上王也为饯行而赶来。18日，在金郊驿举行了送别宴会。这时，孛鲁兀按照蒙古成宗的命令，取下忠宣王玉玺，把它转交给逸寿王（即忠烈王）。于是，忠烈王复位，而忠宣王去蒙古宿卫。忠宣王在此后的十年间，在蒙古同武宗（1307年5月即位）和仁宗（1311年3月即位）形影不离，相交甚密，直至再次即位。

19天后，忠烈王回到都城，接受孛鲁兀转交的蒙古成宗的文书。文书中说道：“谕前高丽国王王。前以卿表请，授位于世子源，是用诏源往嗣王爵，国事仍命听卿训导。今闻莅政以来，颇涉专擅，处决失宜，众心疑惧。盖以年未及壮，少所经练，故未能副朕亲任之意。今遣使诏卿，依前统理国政，且诏源入侍阙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庭，使之明习于事。”^①

由此看来，蒙古在观察年轻的忠宣王即位后推进的官制改革、赵妃和蓟国公主之间的猜忌事件、重臣和元老们的反抗等情形后，认为忠宣王尚年轻、经验少，尚不适于治理国家，所以就闪电般地把王位还给了太上王忠烈王。

在蒙古丞相完泽根据其派吉丁等调查的情况所作的报告中也说，高丽王源因恣意改官制而致犯罪。^② 忠宣王改官制时，擅自改设中央机构（省、院、台），又随意废止根据蒙古指示设立的机构，然后改编金议府、密直司、都评议使司等。

这里所说的吉丁到底是谁呢。

赵妃猜妒事件时，蓟国公主为了向蒙古报告此事而派遣的人中有叫彻里的人。其后，彻里比鞠问赵仁规的蒙古官吏早到一天（即6月1日），三天以后，即6月4日又回到蒙古。但是，7月3日，他又返回高丽传达了蒙古关于让忠宣王源和公主在8月到蒙古的指示。看来，向完泽报告有关忠宣王僭越不法的吉丁可能就是彻里。^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烈王24年7月丁亥，8月甲子、辛未、癸酉条。《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4年7月、8月条

^② 参阅《元高丽纪事》，大德3年正月10日，“丞相完泽等奏：高丽王源有罪，遣吉丁等往诘问之。今吉丁回言：世祖时，或言高丽僭设省院台，有旨罢之。其国遂改立金议府、密直司、监察司……”《元史》本纪，成宗，大德3年正月壬辰（十日），“安置高丽陪臣赵仁规于安西，崔冲於、群昌并笞而遣之，以正其附王源擅命妄杀之罪。”

^③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24年5月甲辰，6月丙辰、己未，7月丁亥条。《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24年5、6、7月条。参阅池内宏著《元在高丽之行省》，该文刊载由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出版于1933年的《东洋学报》20-3，第328页。

高 丽 外 交 史

高丽官制的变革

元宗		忠烈王
三省	中书→中书门	金议府
	门下→下省	
	尚书	
六部	吏部 礼部	典理司
	兵部	军附司
	户部	版图司
	刑部	典法司
	工部	废止
枢密院		密直司
都兵马使		都评议使司

高丽官职名称沿革

	元宗	忠烈王
丞相名称	门下侍中	金议中赞
各部长官	尚 书	判 书
各部次官	侍 郎	总 郎

如前所述，蒙古官吏来鞠问赵仁规的时候，如果说是太上王忠烈王的近侍元卿引蒙吏到监察司没收了官制改革的文书，那么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元卿是因厌恶忠宣王的新政策，而把不利于忠宣王的各种资料交给了彻里。由此忠宣王的废位便成为必然，元卿帮助彻里收集到了认定忠宣王有罪的证据。

蒙古在父子之间重易王位以后，对重新复位的忠烈王作了要求严正且笃实国治的指示，同时通告其今后要遵守的事项：(1) 毋擅自变更蒙古既定的官制；(2) 对高丽已经变制的，要立即改正；(3) 今后，对命官犯罪者要调查其内容，并向蒙古报告，高丽不得随意处斩。蒙古加强对高丽的控制，派遣了阔阔出（元世祖庶子，一名宁王）和哈散。^①

这样，父子之间王位反复的期间，便产生了忠烈王派和忠宣王派，而且这两派之间的阴谋和中伤甚重，高丽国内外尽人皆知。1304年（忠烈王三十年）四月，蒙古参知政事忽怜（因高丽人吴析、石天补囚禁在蒙古监狱，因为这一伙人胡乱编造母国的事情，说谎话而毫无所惧，为处理此事情到高丽来的蒙古使臣）在高丽突然患病，而且病势危笃，有一个人熬了药来看护他。但是，忽怜却说：“汝奸臣执命，父子相图，故帝（即元成宗）遣我来监，我若饮药死，其得无后言乎？况死生有命，虽良药奚为。”然后，竟然拒药而死。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忠烈王和忠宣王父子之争，以及其臣下（奸臣）互相阴谋和中伤尤甚的情形。^②

《高丽史》在评价忠烈王时说道：“当忠烈王之世，内则权臣

^① 参阅《元史》，本纪成宗大德3年正月壬辰，“所篡事宜条例于后，先朝已定官府及受宜人员，毋得变更；中间有所擅自更易者，即行改正；命官有罪，须具事情本未奏，毋得辄行杀戮。”

^②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0年4月丁未，5月丙辰，6月丙戌；31年2月庚辰条。《高丽史节要》卷22，忠烈王30年4、6、月；31年2月。

擅政，外则强敌来侵。一国之人，不死于虐政，则必歼于锋镝，祸乱极矣。一朝上天悔祸，诛戮权臣，归附上国，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之至也，父老喜而相庆曰：‘不图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师，敷奏东方之弊，帝既谕允，召还官军，东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为之日也，奈何骄心遽生，耽于游畋，广置鹰坊，使恶小李贞辈，侵暴州郡，溺于宴乐，唱和龙楼，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听，宰臣台省论之而不从。及其晚年，过听左右之谗，至欲废其嫡而立其侄。其在东宫，虽曰：‘明习典故，读书知大义。果何用哉？呜呼！’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非忠烈之谓乎！”这的确可以说是对忠烈王中肯的评价。

第三节 忠宣王再即位与蒙古的干涉

忠宣王因蒙古使臣闪电般地夺取玉玺，转交给父王逸寿王（即忠烈王）使其复位，所以他被迫让出王位到蒙古，同留居潜邸的蒙古日后的武宗及仁宗（均在其即位以前）一起，相伴十年。在这期间，因拥立武宗即位有功，而于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5月第一次被封为沈阳王。高丽时代因为沈阳、辽阳等地多居住高丽遗民或战俘，故该地域成为特殊地域，不仅是丽、蒙两国的要地，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蒙古为使高丽人负责治理此地，封了这个爵位）

忠烈王于同年7月去世，8月忠宣王从蒙古到高丽，在寿宁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官即位。^① 忠宣王的这次再即位，是在父王遗训和蒙古王室信任之下进行的，非常顺理成章。

忠宣王一即位，即行奖罚分明、废止同姓婚姻、大赦天下等德政，相比以前的官制改革，这一次更加注重在政治上同蒙古保持一致。但忠宣王于即位的1308年4月到蒙古后便不复归国，以至次年4月，大臣们上书恳请忠宣王回国。然而，忠宣王因同蒙古皇帝、皇后、皇太子关系亲密，没有接受高丽大臣们的这一要求，仍旧滞留在蒙古，不肯回国。^②

1310年（忠宣王二年），忠宣王还是继续滞留在蒙古，甚至让杨学士撰写希望传位给世子的文书送给蒙古。但在近侍们积极劝阻下，忠宣王未能实现传位给世子的意旨。同年5月世子监及其仆从金重义等被杀，好像是因让位世子问题而遭诬陷所致。^③

忠宣王于1308年即位那年到蒙古时，命令齐安大君淑担任征东省事。他留居蒙古，一呆就是五年，治政是以传旨（坐在蒙古传文书或者口谕）来施行的。因此，实际代行政事的则是金议政丞崔有滄和权清臣。

1309年（忠宣王元年）4月，崔有滄等向在蒙古的忠宣王上书要求回国，但忠宣王对此没有答应。对忠宣王拒不回高丽，继续滞留蒙古，蒙古的仁宗和皇太子也觉得不妥，遂于1312年（忠宣王四年）1月，向忠宣王下达令其归国的命令。但是，忠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34年5月戊寅，7月己巳，8月癸丑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5、7月己巳，8月甲寅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复位年11月壬申；元年4月己卯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复位年11月壬申；元年4月条。

^③ 世子监为妃也速真（元室之女）所生，忠肃王的同母兄。这时，世子监同忠宣王一起在元都燕京。《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2年正月己丑，5月乙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2年1、5月条。

宣王对此百般推脱，还让朴景亮动员蒙古大臣请求蒙古仁宗说：“今方农月，请待秋成”，并得到了同意。

过一年后，忠宣王仍不愿归国而滞留燕京，以至1313年（忠宣王五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月，在燕京的高丽人进行活动，要求忠宣王归国。当时，在燕京的密直司事李思温、化平君金深等商议说：“帝及太后屡诏王之，王无意于行，令本国岁输布十万匹、米四万斛（一斛为十斗），他物不可胜纪，漕转之弊益甚。诸从臣皆羁旅思归。而权汉功、崔诚之同掌选法，利其赂遗，朴景亮为王腹心，累蒙赏赐，营置产业。王之不归，实由三人，盍除之奉王以还。”

于是，金深等通过蒙古太后住处的幸宦买撤，成功地动员了蒙古徽政院使失列门。金深等列举权汉功等三人的罪状，并得到大护军李揆、护军金彦等数百人的署名，向蒙古徽政院陈情。失列门诈称太后令，把权汉功等三人囚禁于监狱。忠宣王闻讯大怒说：“如等不告我，辄诉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然后通过蒙古太后的婢女也里思班，向太后诉苦，权汉功等也上下行贿求请。太后便释放权等三人，流放金深、李思温至甘肃省临洮。^①

忠宣王在位的五年，一直滞留在蒙古。1313年（忠宣王五年，元皇庆二年）3月，忠宣王将王位让给次子江陵大君焘，自己被蒙古任命为沈王，以其侄子延安君嵩作为沈王世子。

忠宣王将王位传给世子后，仍想留在蒙古，但因蒙古坚决拒绝，只好于4月同世子一起回到高丽。然而他于次年（1314年）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5年正月条。《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5年2月丙子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周鼎传、附深传。《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权汉功传。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1月又到蒙古。^① 忠宣王执意滞留蒙古，一是同宝塔实怜公主关系不睦，被强行召到蒙古以后，十年期间在蒙古生活，对本国思念逐渐淡漠；二是同海山（后来蒙古的武宗）、爱育黎力八达（后来蒙古的仁宗）曾经同甘共苦，最后因为同爱育黎力八达一起，为海山即皇位立功而同皇室相交甚深；三是因为本人好佛问学，对政治和权力欲渐失兴趣所致。^②

蒙古仁宗罢免右丞相秃鲁，任命忠宣王继之。但忠宣王推却说：“臣小国藩宣之寄，犹惧不任，乞付于子，陛下许之。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贪荣。”^③

1316年（忠肃王三年，元仁宗延佑三年）3月，忠宣王启奏蒙古仁宗，将沈王位传给其侄子沈王世子焘，然后自称大尉王。1319年（忠肃王六年，元延佑六年）3月，忠宣王经蒙古仁宗之许游览南方时，曾经经过江浙，到过普陀山（佛教名山）。这时，他让随行的权汉功、李齐贤等写了游览山川的纪行文。1320年（忠肃王七年，元延佑七年）3月，再游江南，此为恐元朝朝廷政局动荡，避难而去。同年9月，忠宣王虽然回到燕京，但蒙古仁宗想强制遣他到本国。忠宣王对此仍百般托辞，终未归国。

蒙古仁宗10月将他囚禁在刑部，后因忠宣王已削发，便监禁在石佛寺。12月，蒙古仁宗将忠宣王流放到吐蕃撒里吉之地。1323年（忠肃王十年，元延佑十年）8月，蒙古泰定皇帝一即位，便大赦天下，随即召还忠宣王到燕京。忠宣王于1325年

^①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5年3月甲寅条。焘为忠宣王兄江阳公滋世子，滋为贞和宫主（宗室始安君姻之女）所生，非元公主所生。所以未能即位。《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元年正月丁未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5年3月条。

^② 参阅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部出版于1985年，第542页。

^③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5年3月甲寅条。

(忠肃王十二年) 5月在蒙古燕京去世。^①

《高丽史》评价忠宣王说：“忠宣为世子，入侍元朝，与姚燧、赵孟頫诸公游间，或与闻朝政，其议论有足观者。及其即位，避上国之制，改易官名，谨侯度也；正田赋，立盐法，知所本也……王既受命复位，谄事妇寺，淹留燕京，至于五年。国人困苦供馈，从臣久劳思归，至谋相陷，愿亦厌之，再诏归国，无以为辞，乃逊位于子焘，又以侄暲为世子。父子兄弟卒构猜嫌，其祸至于数世而未弭。貽谋之不灭如此，吐蕃之窟，非不幸也”。

第四节 忠肃王、忠惠王的王位反复与蒙古的干涉

忠肃王（讳焘，蒙古讳阿剌纳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为蒙古女也速真）生于1294年即忠烈王二十年7月出生。5岁那年，即跟随忠宣王到蒙古。1313年3月应忠宣王之奏请蒙古仁宗，20岁时便顺利即位为第二十七代王。同年4月，忠肃王侍忠宣王和母后，离开燕京来到高丽（虽然上王要求仍然留在蒙古，但因蒙古不应，不得已赴高丽）。其时，蒙古仁宗和皇太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5年3月甲寅；忠宣王条忠肃王3年3月辛亥；忠肃王6年3月；7年4、9、10、12月；10年8月；12年5月条。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有关年月条。忠宣王被流放到吐蕃，也与宦官伯颜秃古思（曾为尚书朱冕家奴，自行阉割而成为宦者。因某种因缘，在东官侍奉元仁宗）从中诬告、进谗言有关。《高丽史》卷122，烈传35，宦者伯颜秃古思传。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及朝廷派遣了许多护送人员。^① 其规模是一百四十辆马车。

同年5月，忠肃王下教说：“孤赖皇帝之洪福，荷父王之至恩，已于三月二十四日受传国印，又于其月二十八日受宣命讫。载惟上之事父，下之长民，任大责重，夙夜忧惧，罔知攸济。其令诸道朔膳，先献父王，文武官僚贺谢辞见，并于父王先行”。^②

这以后，忠宣王于1314年1月再赴蒙古燕京，但在那里仍参与和控制本国的内政。忠宣王使忠肃王即王位后，将官吏任免权交给权汉功、崔诚之、李光逢等行使，国库调也交给了两个近侍。忠肃王不明施政的人情世故，同后辈们一起吃喝玩乐，过着放荡的生活。官吏任免的口谕比令状还多，政治至为颓败。田制和税制大为混乱，权臣避逃租税，奢华无度，而百姓苦于租税，痛苦不堪。

忠宣王干政时，国库还算充盈，忠肃王的臣侍们尚不敢僭越。而自忠宣王在蒙古被流放以后，这些宦侍们如金英甫、山积、吴佛老等，推翻忠宣王旧制，驱逐旧臣，国库开始枯竭。1321年，这些奸臣让愚昧的忠肃王打头阵，将忠宣王的功臣权汉功、蔡洪哲、李光逢等囚禁，然后处以流放。这是忠肃王的奸臣们驱逐忠宣王的功臣，旨在图谋独霸权力的举动。

从同年4月忠肃王到蒙古后，在蒙古的伯颜秃古思家起居，伯颜秃古思恰是在蒙古诬告忠宣王者，从这一点来看，可知忠肃

^① 这时，蒙古仁宗遣丞相纳剌忽、宦者遥授平章李伯贴木儿等三十六人，皇太后遣恻薛丹、纳怜等十八人，中书省遣直省舍人脱脱贴木儿等十六人，徽征院遣也先不花等三人，中政院遣察罕贴木儿等三人，宣政院遣八哈思、和尚等十六人，护送了忠肃王一行。《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即位年4月丙戌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即位年4月丙戌，5月丙午条。《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即位年4月丙戌，5月条。

王一派同蒙古的伯颜秃古思是有联系的。^① 忠肃王到蒙古后，因为不允许其从蒙古归国，不得已在蒙古滞留了五年，这则是前王忠宣王一党的图谋结果。

1324年（忠肃王11年）1月，蒙古泰定帝向忠肃王重颁国王玉玺，并使其回国。但是，忠肃王当时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在同年8月与蒙古魏王阿木哥（武宗庶兄）之女金龙公主（曹国长公主）结婚后，于第二年1月，同金龙公主一起回国。^② 1329年（忠肃王十六年）10月，忠肃王因厌倦理政，便使金之镜到蒙古，请求文宗将王位传给世子禎。第二年1月，蒙古文宗封高丽世子禎为王，是为忠惠王。

忠惠王（讳禎，蒙古讳普塔失里，忠肃王长子，母曰明德太后洪氏。王于1315年即忠肃王二年一月生，1328年即忠肃王十五年二月，以世子在蒙古宿卫）于1330年2月从蒙古接受国王玉玺；3月，同蒙古的镇西武靖王（关西王）焦八（世祖第七子奥鲁赤之孙，掣思班）的长女亦怜真班公主（德宁公主）结婚；闰7月回国（这时忠肃王已到蒙古）；8月，在康安殿即位。

忠惠王即位以后，不理政事，寻欢作乐，淫荡无度。忠惠王的失政立即传到蒙古。而在蒙古朱帖木儿和赵高伊（在蒙古居住的高丽奸臣）等趁机向蒙古明宗诬陷说：“辽阳行省与高丽谋，欲奉妥欢太子（妥欢帖睦尔，后来的顺宗，于忠惠王即位一个月

^①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8年4月丁卯、壬申条。《高丽史》卷108，列传21，崔诚之传。《高丽史》卷108，烈传21，蔡兴、洪哲传。《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权汉功传。《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兆年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8年4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6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11年正月甲寅，8月戊午条。《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11年正月甲寅，8月条。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前的7月被流放到高丽黄海道长渊大青岛)叛”。^①

据此诬陷，蒙古明宗决定恢复滞留在蒙古的前王忠肃王之位，于1332年（忠惠王二年）2月使前理门郎中蒋伯祥到高丽。蒋伯祥等携带的蒙古明宗国书中写道：“已于正月三日命上王复位。”对此，忠惠王和左右近侍都大为失色，不知所措。蒋伯祥收回国玺，并封锁诸国库。这样，前王忠肃王重新即位，忠惠王为上王，应召到蒙古。^②

重新即位的忠肃王仍然留居蒙古，1333年（忠肃王后卷2年）3月，蒙古右丞相燕帖木儿向皇太后、皇太子妥欢贴睦尔（1332年8月蒙古文宗去世，10月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宁宗旋在同年12月去世。皇太子于翌年6月即位，是为顺帝）建议说：“高丽邻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请令还国。”皇太子妥欢贴睦尔接受这一建议，并督促忠肃王回国。忠肃王原深受蒙古文宗信任，故久居蒙古，文宗去世后，忠肃王无法再留居蒙古。

1333年闰3月，忠肃王同庆华公主一起回国。1339年（忠肃王后七年）3月，忠肃王去世，前后在位凡二十五年。他天性聪颖严肃，喜好文学，治绩上也有所作为，但因喜游乐、狩猎，最后给前王忠惠王党以蠢动的机会。

《高丽史》的编纂者评忠肃王说：“自烈、宣、肃、惠，世历四代，父子相夷，至与之讼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后世。且（忠

^① 1331年，即忠惠王元年12月，元派遣枢密院使尹受困等，召还妥欢贴睦尔太子。其后，太子即位成为顺帝。《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元年12月甲寅；2年正月庚辰条。《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元年12月；2年正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即位年12月甲寅；同2年正月庚辰，2年甲子条。《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即位年12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65页。

肃王)父子,天性亲孝,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他无足观者。忠肃晚年遗弃国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竖,威福下移,若子若孙,皆罹凶夭,可胜叹哉。”^①

前王忠惠王性情狂暴,淫荡成性,纵是别人的美貌妻妾,不论亲疏贵贱,必奸淫强占,仅纳入后宫者即多达百余人。^②

1339年忠肃王死后,前王忠惠王指使李揆等,采取各种方法,谋求复位。同年6月,忠惠王使权溥向蒙古中书省上书恳请复位;9月,派遣韩帖木儿不花、金仁沅、卢英瑞等到蒙古奏请复位。同年11月,蒙古派遣头麟、九通到高丽,向前王忠惠王传国玺,忠惠王由是复位。但蒙古并没有把国事交给忠惠王,反而交给了乐安君金之谦和前金议评理金资。

不仅如此,蒙古丞相伯颜因忠惠王奸淫庆华公主事件,甚至将忠惠王与曹颀一起带到蒙古对质,还将忠惠王囚禁到刑部。伯颜一失势,蒙古脱脱大夫奏请蒙古顺帝释王复位,于是,1340年4月忠惠王回国。^③

忠惠王即使忍受这种耻辱,也继续率领群小百官嬉戏、赛跑和赛马,且因夜间微行而被恶小凌辱。新建宫殿时,自己上墙督

^①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条末尾。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汉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页。

^② 忠惠王淫荡成性。忠惠王2年五月丙寅,奸淫丈人继室黄氏;庚午,奸淫庶母寿妃权氏;辛未,奸淫宦者刘成妻印氏。八月丁亥,王虽然将南氏嫁给卢英瑞,但是其后数次到她家与之通奸;甲午,同母后庆华公主发生了关系。后2年十一月己丑,强奸内侍田子由妻李氏;后4年二月丙寅,抢夺奸臣林洪甫的侍婢;三月己卯,通奸裴佺妻及之弟金瑤妻;后5年五月己丑,通奸尹桓妻柳氏等,不胜其数。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宣王条末尾及各项有关年月日。

^③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肃王后8年3月癸未,6月壬辰,9月丁卯,11月丙辰;忠惠王后元年11月辛未,3月甲子,4月癸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后元年1、3月条。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励，还极尽掠夺黄铜、铁锅、农具等之能事。^①

蒙古为了惩戒忠惠王的胡作非为，于1343年（忠惠王四年）11月，派遣大卿采赤等到高丽。采赤、乃住等在传毕蒙古顺帝国书后，当即擒获忠惠王，蒙古使臣亦拔刀要逮捕忠惠王的侍从，群小百官逃之夭夭，金永熙、姜好礼、崔安佑、金善等被砍倒在地，持平卢俊卿和勇士二人被杀，被砍伤者甚多。采赤等即掖忠惠王载马驰去。

12月，大臣举行会议向蒙古中书省上书请求赦免王罪。但蒙古将忠惠王流放到揭阳（在今广东）。揭阳县离燕京二万余里。蒙古顺帝在流放忠惠王时说：“尔王桢为人上，而剥民已甚，虽以尔血啖天下之狗，犹为不足。然朕不嗜杀，是用流尔揭阳，尔无怨我往哉”。这时，元子让裴佺向王献一袭衣服，而王无一人肯从行者，遂黯然亲持衣服离去。

忠惠王在赶揭阳途中，于1344年1月在岳阳（今湖南省岳州）去世。对于这一死因，有被鸩杀说，也有说食橘而死。高丽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没有一个人为之哀痛，而市民反而欢呼雀跃，以为可以重见天日。

《高丽史》评价忠惠王说：“忠惠王以英锐之才，用之于不善，昵比恶小，荒淫纵恣。内则见责于父王，上则得罪于天子，身为羈囚，死于道路，宜矣。虽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3年3条。《高丽史》36，世家·忠惠王4年3月辛未、甲戌、乙亥、丙子条。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汉城大学出版部1985年版，第554页。

如不我听，何哉”。^①

第五节 忠穆王即位与蒙古的干涉

忠穆王（讳昕，蒙古讳八思麻朵儿只，忠惠王长子，母为德宁公主。王于忠肃王后六年即 1337 年 4 月生，后到蒙古宿卫）在 8 岁时即忠惠王五年即 1344 年 2 月，蒙古高龙普抱王以见蒙古顺帝，蒙古顺帝问：“汝学父乎？仰学母乎？”对此，忠穆王回答说：“愿学母。”蒙古顺帝感叹其天性好善恶恶。

父王忠惠王被蒙古像囚犯般劫走后，流放到离燕京二万里的揭阳，并在途中暴死，所以，王位继承问题尚未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决定表示不学放荡淫乱的父亲，而是学蒙古王室德宁公主的王昕继承王位。一因其作为前王的长子合乎名分，二是对丽、蒙关系有利。^②

1344 年（忠穆王即位年）4 月，政丞奇辙、万户权谦和前总郎卢永奉国玺到忠穆王在燕京的行宫。随后，忠穆王从蒙古回到高丽。蒙古第二天派遣桑哥持文书到高丽，文书说：“近者，高丽国王宝塔失里（即忠惠王）肆为无道，荼毒境内，民不堪命，来诉京师。今正厥罚，迁之岭表。然念自其（忠惠王）先世事我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6，世家忠惠王 4 年 11 月甲申，12 月丁未、癸丑；5 年正月戊辰条。《高丽史》卷 36，世家忠惠王条末尾。《高丽史》卷 104，列传 17，金方庆传附泳吨传。《高丽史》卷 109，列传 22，李兆年传。《高丽史》卷 122，列传 35，宦者李龙普传。《高丽史节要》卷 25，忠惠王 4 年 11 月甲申，12 月癸丑条。《高丽史》卷 110，列传 23，李齐贤传。《高丽史》卷 110，列传 23，王煦传。《高丽史》卷 110，列传 23，金伦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 37，世家忠穆王即位年 2 月丁未条。《高丽史节要》卷 25，忠惠王 5 年 2 月条。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列圣，罔有二心，一朝后嗣，不克继承，遂失世爵，在朕奚忍？……乃命其子八秃麻朵儿只仍袭高丽国王，布朕德泽。”5月蒙古派遣李麻、秦瑾，来册封高丽王，说：“特授……嗣封高丽国王。”并正式予以承认。随后，高丽忠穆王遣密直全恩义到蒙古表示谢意。^①

这时，以蒙古奇皇后宗族奇辙一党在高丽横行霸道。奇皇后知道后，便派遣兵部尚书傅花、同知资政院朵儿赤到高丽传皇后的意旨。其文书云：“凡吾亲戚，勿倚势夺人田。民如有违异，必罪之；法司知而故纵，亦当罪之。”

忠穆王即位以后，设置整治都监，严肃处理不法腐败的官吏。这样，奇辙的二弟辘自知其罪而逃跑，但阳光道按廉金玕将其抓到都监，处以杖刑。奇辙的亲戚奇三万也因依仗其权势肆行不法，抢夺民田，所以整治都监（1347年，即忠穆王三年为改良田地而临时设置的衙门，次年废除）对其加以杖刑，并解至巡军（正式名称为巡军万户部），^②二十天后伤重死去。为此，奇三万之妻向行吏衙门所诉冤，忠穆王便把整治官徐浩、田禄生等囚禁。对此，金永吨（一名金那海）告王说：“殿下何囚整治官。”王回答说：“三万夺人田五结，何至于死？”金永吨说：“三万怙势纵恣，奚止夺五结田！”于是，王召问理门河有源，金永吨便说：“我等亲奉帝命，先治元凶，浩、禄何罪恶。”遂自囚于行省监狱，王命其出狱。

^①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穆王即位年4月乙酉、丙戌，5月申午、丁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5，忠穆王即位年4月乙酉、丙戌，5月条。

^② 高丽时代的衙门，掌捕盗和禁乱。忠烈王时设，与禁军任务相类，兼与外敌作战事，亦守卫刑狱。后来，巡军制得到发展，1316年即忠肃王3年在主要地方设置三十三个巡捕，巡军万户部为这些巡逻军的总管。金道珉著《国史大事典》，教育图书出版社1989年，汉城，第734~735页。

1347年（忠穆王三年）10月，蒙古以奇三万之死为理由，派遣直省舍人僧家奴到高丽，将整治官白文宝、申君平、卢仲孚、徐浩和田禄生等处以杖刑。^①奇皇后为防止贪得无厌的宗亲依仗自己的权势在国内专横跋扈，便传来懿旨。这本是好事，但却导致依据懿旨查处奇皇后宗亲不法行为的整治都监的整治官们受辱的结果。

另一方面，1348年（忠穆王四年，元至元八年）3月，忠穆王派遣宁川府院君李凌干到蒙古祝贺圣节，并请求赐予忠惠王谥号，但蒙古顺宗并未同意。^②

这是由于在第二十四代元宗以前，高丽国王去世后的谥号原由百官或者国王自定，自忠烈王后开始先向蒙古请谥号，再由蒙古赐予。忠惠王直至去世后五年即1348年，仍未赐谥号，故忠穆王派遣使臣去请谥号。

忠烈王以后蒙古向历代高丽国王赐予谥号的情况来看，忠烈王是在去世二年后的1310年（忠宣王二年）被蒙古赐予“忠烈”谥号。^③忠宣王是在去世（1325年）十九年以后的1344年（忠惠王五年）1月被蒙古赐予“忠宣”谥号。^④忠宣王的谥号被晚赐，不单是因为丽、蒙关系的恶化或者是忠宣王自身的问题，更

①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穆王即位年8月丙戌；3年3月戊辰，10月甲午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传附金永吨传。《高丽史》卷110，列传23，王煦传。《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撤传。《高丽史节要》卷25，忠穆王3年3月、10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穆王4年3月壬寅，“李凌干如元，贺圣节，仍请忠惠王谥，帝不允”。《高丽史节要》卷25，忠穆王4年3月壬寅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条末尾及忠宣王2年7月乙未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2年7月条。

④ 参阅《高丽史》卷34，忠宣王5年条，附忠肃王12年11月，“元赐谥忠宣。”

第二十二章 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蒙古的干涉

多是由于其间蒙古内政动荡的结果。

蒙古其间换了几个皇帝，1307年（忠烈王三十三年，元大德十一年）5月，蒙古成宗去世，皇侄怀宁王经过斗争之后即位，是为武宗。1311年（忠宣王三年，元至大四年）1月，蒙古武宗去世，3月皇太子即位，是为仁宗。1320年（忠肃王七年，元延佑七年）2月，仁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英宗。1323年（忠肃王十年，元至治三年）9月，英宗去世，皇叔晋王即位，是为泰定皇帝。1328年（忠肃王十五年，元天历元年）7月，泰定帝去世，9月次子怀王即位，是为文宗。1329年（忠肃王十六年，元天历二年）4月，文宗让位周王，周王即位，是为明宗。同年8月，明宗去世，文宗复位。1332年（忠肃王后元年，元至顺三年）8月，文宗去世，10月明宗次子郯王即位，是为宁宗。同年12月，宁宗仅七岁去世，1333年（忠肃王后二年，元顺帝元统元年）6月，顺帝即位。

这样，蒙古皇室由于皇帝早夭或皇位争夺频繁，导致对外政策混乱。因为此缘故，忠宣王迟迟未赐谥号。

1339年3月，忠肃王去世，去世后的第五年即1344年（忠惠王后五年）12月，被蒙古赋予“忠肃”的谥号。

忠穆王因为其父忠惠王去世5年也仍未被赐予谥号，尽管派使臣去请过谥号，但蒙古仍未同意。蒙古不同意给高丽王赐以谥号，这是第一次。直至忠惠王去世23年后的1367年（恭愍王十六年，元至正二七年）1月，蒙古才赐予忠惠王“忠惠”的谥号。^①

第二十八代忠惠王被蒙古拒绝赐予谥号，其长子忠穆王去世

^①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5年末。《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6年正月丁亥条。《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6年正月条。

后被赐予谥号时，仍未被赐予谥号，直至其次子第三十代王忠定王受谥号时才被同时赐予谥号。这可能是对忠惠王在具备国王的德望、救济民生、同蒙古圆满地建立邦交关系等方面没有完成国王的任务，反而嬉戏、淫乱、残暴、诛东等无节制行为，故惩罚之。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第一节 沈阳王的册封

据传是在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5月20日，即朴瑄从蒙古回来后，蒙古武帝封前王忠宣王^①为沈阳王的。

忠宣王王璋被封为沈阳王的情况如下。忠宣王在即位7个月以后退位，即由蒙古武宗派遣李鲁兀到高丽命令忠烈王复位，同时召忠宣王和公主（薊国公主）到蒙古。忠宣王在退位年的8月17日（辛未）同公主一起到了蒙古。

蒙古皇帝之所以召回忠宣王夫妇，表面上是为了缓解忠宣王和公主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由于忠宣王尚年轻（25岁），没有治国的经验，放回蒙古，其扩大眼界。

在蒙古滞留的前王忠宣王，与即位前的蒙古武宗、仁宗同伴起居，昼夜相随。不久，蒙古成宗指定的皇太子德寿去世，1307年（忠烈王三三年，元大德十一年）正月8日，成宗享年四十二

^① 忠宣王讳为璋，古讳为源，蒙古讳为益智礼普化。忠烈王长子，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所生，是元世祖的外孙。《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5月戊寅条。

岁去世，其后。蒙古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发生了纷争。同年5月，皇侄怀宁王即成宗之兄答剌麻八剌子海山（khaishan）抢先即皇位，是为武宗。

武宗即位前，有武宗拥立派同阿难答（一名阿难达，安西王，Ananda）之间的纷争。蒙古成宗去世后，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伯颜、中枢院使怯烈道兴等暗地里进行活动，让皇后伯要真（一名伯牙吾）出面，以皇室惯例为借口，拥戴阿难答。这就是拥立蒙古世祖之孙阿难答的一派。

对此，武宗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他们抢先斩杀反对派首领阿忽台、怯烈等，然后拥戴当时在北方立功的怀宁王（即海山）。5月，怀宁王在上京首先废黜太后伯真，并在东安州用毒药将其毒死，又在都城将安西王阿难答、齐王明里铁木儿等用毒药毒死。然后于同月21日即位，是为武宗。^①

蒙古成宗去世以后，从亲疏或者嫡庶等关系上看，登极的顺序不应是武宗，而应是安西王阿难答。阿难答是世祖之孙，而武宗是世祖的曾孙，尤其阿难答由曾摄政的皇后所推荐，所以武宗有僭越之嫌。

在这场皇位继承的纷争中，因为高丽忠宣王同即位前的武宗和后继其位的仁宗过从甚密，昼夜相随，所以是参加拥戴武宗即皇位的武宗派，并立了功。由于这一功劳，忠宣王被蒙古武宗册封为沈阳王。^②

我们对《元史》中记载的忠宣王被册封为沈阳王一事，有必

^① 参阅《元史》卷22，本纪武宗1，太宗11年春条。《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1，忠烈王24年8月壬申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3年3月，“时前王与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怀宁王海山为帝”。

^②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1年，忠烈王33年条。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要进行研究。^① 因为王珣就是忠烈王，所以《元史》本纪和表记载为忠烈王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6月（戊午）26日被册封为沈阳王。但是，这与《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中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年）5月26日（戊寅）忠宣王被册封为沈阳王的记载不同。^②

忠宣王退位后，通过成宗的介绍住在都城燕京，同武宗及仁宗一起起居，而且在武宗即位时拥戴有功，并凭借其功劳被册封为沈阳王。这些在时李齐贤的著书^③中也有记载。因此，被册封为沈阳王的并非是忠烈王，而是其子忠宣王。

另外，还有在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7月忠烈王去世前四天，因其病危，高丽朝廷派遣尹韩连（礼宾）到蒙古向沈阳王禀报这一记载。所以沈阳王只能是王璋即忠宣王。忠烈王去世后，其遗教中也说道：“今遇沉痾，累旬未差，但思一见沈阳王，尝寄书促来，大期奄至，岂容相待……”^④

因此，这时被册封为沈阳王的人肯定不是忠烈王，而是蒙古世祖的外孙忠宣王。而且可以说，被册封为沈阳王的时期是从

^① 参阅《元史》卷22，本纪武宗大德11年6月戊午，“进封高丽王珣为沈阳王，加太子傅驸马都尉”。《元史》志180，表3，诸王表沈王条，“高丽王珣，大德11年，以驸马封”。

^② 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5月戊寅，“朴瑄还自元，帝以前王定策功，封沈阳王”。《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34年5月戊寅，“元以定策功，封沈阳王，制日……中书省左丞相、驸马王璋、世祖外孙……进封沈阳王”。《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5月，“朴瑄还自元，帝以前王定册攻……进封沈阳王”。

^③ 参阅李齐贤著《益齐乱藁》（九）上，“有元赠敦信明义，保节贞亮，济美朔顺功臣，太师开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忠宣王世家”。

^④ 忠烈王34年7月丙寅，“王疾笃，遣礼宾尹韩连，以报沈阳王。”参阅《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7月己巳条。丸龟金作著《元与高丽关系的一段落》，《青丘学丛》18，1935，青丘学会，第10~11页。

1307年（忠烈王三十三年，元大德十一年）5月武宗即位，到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至大元年）5月朴瑄从蒙古回来传前王被封为沈阳王消息为止的某一时段。

第二节 沈阳地区与高丽的关系

关于沈阳路，有必要首先进行研讨。日本学者松井等的论文作了如下说明：

沈州虽然在金代也有同样名称，但在元代称沈阳，明代称沈阳卫，清初称盛京。其后顺治十四年（即1656年——作者注），设置奉天府。沈阳名称还是以俗称之。《辽东志》卷一中记载，城南边浑河为旧沈水，沈阳名称因此河川而得名，还有从浑河分流绕城重新流入浑河之小河川，被称为小沈水。浑河的名称在辽代已有之，此前称此河川为沈水，其由不详。^①

松井等认为，沈阳名称源自旧河的俗称或者其支流沈河。接着又作了说明：

又《辽史》中称沈州为挹娄旧地，渤海时期设置沈州。《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提及的渤海府州名称中无沈州，中属挹娄旧地称为定理府，其下设置了定州和藩州。挹娄和肃慎，是满洲东北部族。故《辽史》称沈州为挹娄旧地错误明显。若《辽史》认

^① 参阅松井等《辽在满洲之疆域》（16），沈州，《满洲历史地理》（2），该书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于1913年，第23~24页。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为渤海设置了挹娄旧地的藩州，那么同沈州相在，误认为沈州名称始自渤海时期。《辽史》记载太祖时期神册六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当为沈州名称出现之肇始。

松井等指出《辽史》称渤海在挹娄故土设置的“沈州”，是“藩州”之误。

此地辽金时代已经称为沈州，到了蒙古时期称为沈阳，此地很早即成为要地是清楚的。蒙古从漠北兴起，立志夺取中原，于是元太祖经略辽西和沈阳，以图断绝其同中原的关系。1217年（高宗三年，宋嘉定九年，金贞佑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蒙古太师木华黎占领辽西以后，向辽东半岛进军。这时，此地是金和辽契丹遗族的根据地，蒙古军东进占领诸城，金及契丹遗族便逃避到鸭绿江。其中契丹遗族过鸭绿江继续进入高丽领土，在义州至平壤一带周围诸城和村庄烧杀掳掠。

同年末，西京（平壤）也被契丹遗族包围，都城开城也受到威胁，高丽将军金就励在原州南部奋起反击，打退了契丹遗族。

另一方面，在咸平兴起的蒲鲜万奴（原为金辽东宣抚使）也因蒙古军东进所迫，躲避到东真。因此，沈州一时曾被蒙古军所占领。这时，蒙古太祖以惩罚在高丽领土上猖獗的契丹遗族名义，同蒲鲜万奴军（一名黄旗子军）携手，派军队攻入高丽北境。这是丽、蒙古接触的开始，当是1219年（高宗五年，蒙古太祖十三年）12月的事情（《元史·洪福源传》中说是太祖十二年丁丑，但应为十三年）。

高丽元帅赵冲和部下金良镜率领精兵一千名与蒙古军协力，第二年正月，兵马使金就励也与蒙古军合力，终于包围并攻陷金军的根据地江东城。这时，高丽掠夺了被抓在江东城的二百名高丽人和七百名契丹人。并且为了让其中的契丹人生活高丽，还

给安排了水田和旱地，这就是所谓契丹场。

这样，1225年（高宗十一年，蒙古太祖十一年）以后，蒙古几乎结束了对辽东方面的征伐。其后，在蒙古世祖时期设置了统治该地的行政机关，这就是辽东等处行中书省。

满洲指中国东北——译者注和高丽从古以来就交通频繁，高丽的西北面即从鸭绿江下游到辽阳地方的一段，尤其是高丽同满洲或者中原之间重要的陆上通路，于是成为交通上的要地。可以充分地了解到，由于这种缘故，高丽人同辽阳地方人之间的相互来往也相当频繁。通过1274年9月高丽元宗近侍尹秀离开原先生活过的沈阳，带着全部家族回来的记载，^①可以知道当时的高丽人既可以自由地到辽东生活，又可以自由地回来。

尤其是随着高丽逐渐扩大北方国境，以义州、静州、定州等地为中心，同沈阳、辽阳方面的契丹人、女真人频繁地进行了贸易。因为兵乱而物资贫困的金人带着贵重的宝物到义州（平北义州郡）、静州（平北义州郡），换走了高丽的大米。这时，金人和契丹人、女真人用一铤银换得高丽的四五石米。这种交易获利巨大，虽然国家严刑禁止，罚没全部所得，但仍屡禁不止。^②

这种冒禁交易的潜隐互市，在兵乱资竭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恳求之下，十分猖獗，屡绝不断。1224年（高宗十一年，元太祖十九年）1月，万奴也派遣使者到高丽，请求道：“本国（万奴）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平北），各置榷场（即互市），依前买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5年9月条。《高丽史》卷103，列传16，赵冲传。《高丽史》卷103，列传16，金就勋传。丸龟金作著《元与高丽关系的一段落》，14~1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年闰7月丙戌：“北界兵马使奏……自去年，金人因兵乱资竭，争贡珍宝，疑义静关外，互市丝谷，至以银一铤换米四五石，故商贾争射厚利，国家虽刑籍货，然犹贪渎无厌潜隐互市……”。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卖。”但高丽没有接受万奴的请求。第二年8月万奴军遂侵略高丽的朔州（平北）。^①这时，高丽东北面和北面均同契丹人和女真人不断地发生了冲突。

由于战乱频繁，契丹和女真流民逃亡到高丽，高丽人亦流入其境，导致双方各种交流频繁。我们不能忽视这时高丽深入到北方的懿州，通过佛事产生影响的事实，也就是在懿州的宝岩寺里有高丽王王尧编写的《银字藏经》和高丽王王昭写的部分《大般若波罗密多》。《银字藏经》题记载：“高丽王王尧，发心敬造，开晋开运三年丙午二月日”。《大般若波罗密多》的开头写道：“菩萨戒弟子高丽国王王昭，以我国光德四年岁在壬子秋，敬写此经一部”。意思是王尧（即定宗）、王昭（即第四代王光宗）为报答佛的恩惠而献了佛经。^②

太祖以来，尊崇佛教，并定为国教。上述两王（定宗和光宗）编写佛经并献到远在懿州的宝岩寺，从这时起，高丽对沈州、懿州即南满洲地方，伸出了开拓之手。

由于洪福源^③向蒙古投降，给沈阳和高丽间的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蒙古将军木华黎曾经征伐辽西和辽东。这时，蒙古太祖让哈真（一名合臣）和札刺（一名札腊或者割刺）两将帅攻击契丹兵布阵的江东城。由于这一攻击，洪福源之父洪大宣迎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1年1月戊申，12月8日辛卯条。

^② 参阅（金）王寂撰《辽东行部志》，明昌元年2月乙卯条。丸龟金作著，《元和高丽关系的一章》，《青丘学丛》18，1935年，第15页。此地之懿州在辽河西北新民府影武县附近，宝岩寺是当时有名的寺院。

^③ 洪福源祖先是汉人。唐代时，曾经派遣八名才士到统一新罗，其中一人是洪福源的祖先。洪福源的父亲洪大纯（又称洪大宣）在麟州当过都领，而洪福源曾经是神骑都领。参阅《元史》卷154，列传，洪福源传。《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

蒙军入城并投降蒙古。其后于1232年（高宗十八年，蒙古太宗三年）9月，蒙古太宗，派遣将军撒里塔（一名撒礼塔、撒儿台、撒里台，Sarital或者Sarita）讨伐时，洪福源首先率领投降的高丽人充当帮凶，又与阿儿秃等合力，到开城逼迫国王高宗派遣王弟怀安公到蒙古，终于使其请求讲和。

蒙古虽然接受这一请和邀请，撤退了兵力，但在以开城为首的诸州县设置了七十二名达鲁花赤。这时，洪福源曾经纠集北界四十余城^①的流民一千五百户，同蒙古征伐军一起入侵，其后只有洪福源驻扎在这里。洪福源同毕贤甫一起杀死郑毅（宣谕使大将军）和朴禄全，举城背叛高丽依附于蒙古。于是，高丽急忙派遣崔怡同北界兵马使闵曦一起，征伐洪福源等，终于抓获毕贤甫押送到开京，并处以腰斩，但没有抓到洪福源。洪福源逃亡到蒙古。

其后1235年（高宗二十一年，蒙古太宗六年），蒙古让洪福源带领降蒙高丽人迁移到东京（今辽阳）。1239年（高宗二十五年，蒙古太宗八年），赵玄习、李元佑等带领二千高丽人向蒙古投降，蒙古让他们也生活在东京（沈阳），并接受洪福源的指挥。

1354年（恭愍王三年，元至元十四年）11月，蒙古脱脱进攻高邮城（今江苏省）时，将原先居住在燕京的二万三千名高丽人作为先锋军。这说明当时在燕京的高丽人达到了三万以上。蒙古侵入高丽时，高丽叛逆洪福源每次都充当蒙古的帮凶，还在蒙

^① 参阅《元史》本纪，太宗3年8月条。《元史》卷154，列传，洪福源传。一说为征伐蒙古时洪福源纠集的“北界四十余城”是错误的，《元史》吾世而传中说的十余城和移刺买奴传中说的十四城接近于事实，四十城可能是十四城之误。参阅池内宏著《蒙古对高丽的征伐》。该文刊载在出版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25年的《朝鲜地理历史报告》10，第186页，参阅注释17。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古充任东京总管，活动于辽阳和沈阳之间，管辖生活在该地域的高丽军民。^①

设置在沈阳地方原衙门。1261年（元宗二年，蒙古中统二年）改沈阳地方的东京总管为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1263年以人质永宁公淳（或者淳）为按抚高丽军民总管，使其分领二千户，并治理满洲。值得注意的是，虽是治理了二千户，但二千户也只是辽东高丽军民的一部分。

1296年（忠烈王二十二年，蒙古元贞二年），合并两司（似为辽阳和沈州的二司）为沈州等路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在辽阳故城设置了治所。^② 洪福源率领北界诸城向蒙古投降以后，高丽军民大批迁徙辽东，蒙古将其安置在辽阳、沈州之间，并设置沈阳等路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同耽罗军民总管府一起，归属征东等处行中书省管辖。

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5月，蒙古武宗任命高丽忠宣王为沈阳王；1310年（忠宣王二年，元至大三年）5月，蒙古武宗命令沈阳路官吏不许僭越沈阳王直接向武宗报告，若有违反者将严惩。

沈阳等路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所属居民，可能不都是高丽人，但从高丽迁移的人为数甚多。下面看一下高丽人迁徙到沈阳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20年12月条。《高丽史》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元史》卷59，地理志11，沈阳路：“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阳”，“初创城郭，置司存桥治辽阳故城”。《元史》卷208，外夷传95，高丽条。《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3年11月丁亥条。《高丽史节要》26，恭愍王3年11月条。

② 参阅《元史》卷59，地理志11，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条。《元史》卷63，地理志15，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条。《元史》卷91，百官志41，百官7，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条。

等地的情况。

撒里塔军入侵高丽并包围开城的时候，即两国间使节进行和谈的1232年（高宗十九年，金天兴元年，蒙古太宗四年）3月，高丽派遣高丽通译使池义深等，向撒里塔送了国书。其文中说道：（阁下）阅淮安公使所蒙手简称“尔国选拣人户，赴开州馆（即凤凰城）及宜城山脚底，住坐种田”。窃思大国所以举义割与分地，将使吾民耕食不胜感怀，但因高丽人畜不足，本国耕地尚不能耕种，故恳请免召人户。高丽感恩，不顾本国人畜不足，仍派遣西京都领郑应卿等，应蒙古要求将三十艘船和三千名水手，从龙州浦（龙川）送至蒙古。^①

蒙古抓走的高丽人不胜枚举，下面是有关情况。

首先看一下蒙古军抓获高丽人的情况。1247年（高宗三十四年）8月，蒙古兵四百人进入北界的诸城，抓走在遂安县躲避的全部高丽人（其数未详）。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2月，蒙古七艘兵船在葛岛抓走了高丽人三十户。同年12月，高丽向山川神告祀时，告由文中说道：“比年人畜之被害驱掠者，已不胜要言……”。据当年的统计，被蒙古兵所虏男女足有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

1256年（高宗四十三年，蒙古宪宗六年）4月，玄风高丽人为避乱而分乘四十余艘船，结果全部被蒙古兵抓获掳走。^②

三别抄从珍岛败退以后，被掳走的高丽人甚众。1271年

^①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13年3月甲午条。《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5月戊寅条。《高丽史》卷33，忠宣王2年5月辛卯条。《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19年3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3，世家高宗34年8月乙巳条。《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2月己未，12月甲申、甲午条；43年4月戊辰条。《高丽史节要》卷16，高宗34年8月条；41年2、12月条。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元宗十二年，蒙古至元八年) 9月，高丽大臣们到蒙古将军脱朵儿和忻都的屯所鸟山，请求返还被掳走的高丽人，但忻都没有答应，脱朵儿释放了少数高丽人。11月高丽上书蒙古中书省，请求返还高丽逋逃人口。^①

被蒙古人私自掳走的高丽人的数量也不少。被私自掳走的高丽人当是被蒙古与人充为奴隶。1254年(高宗四十一年，元宪宗四年) 7月，蒙古使臣多可回去时谎称“吾归，则(蒙古)大兵可回。”因此高丽相信他，并让有关各州县盛情护送。这时，多可等掠走很多高丽人和物质。据1271年(元宗十二年，蒙古至元八年) 6月高丽向蒙古中书省送去的文书称：“黄秀自狱中解镣而逃走，入上国。今年随洪茶丘来，恣意肆恶，夺人田民及珍岛，驱掠男女百余人……”。同年8月，高丽王派遣印公秀到蒙古告谕文书中称：“逆贼所胁无罪之民……相告曰：‘……珍岛之民，怜其无罪，皆许复旧，吾属何罪，独不放释？’伏望圣，慈更”。1272年1月，蒙古人白平身负某种使命去高丽南方返回时，在珍岛掳走很多高丽贵族妻女。^②

高丽使节被当作人质抓到蒙古时，还有其随行人员被迫去蒙古的情形。

如1271年6月，蒙古将高丽世子湛当作人质带走时，尚书右丞宋玠等二十名以随行人员身份被迫去蒙古。^③

另有随着领土所属变迁而移民的情形。

^①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9月庚午，正月癸未条。《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9年9月、11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41年7月癸亥条；世家元宗12年6月戊申，8月丁巳条；世家元宗13年2月庚申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2年6月己亥条。《高丽史节要》卷19，元宗12年6月条。

如 1278 年（忠烈王四年，元至元十五年）5 月，当西北的诸州归属于东宁府时（唯有义州、静州、麟州等三州未属），高丽居民移居沈阳等地的也很多。同年 1 月，高丽向蒙古中书省请求道：“东宁府原是小邦祖宗京都，崔坦等非其乡贯，夺而处之……伏望还其尺土，俾修孝祠。曾奉圣旨，己未年（1259 年高宗出江都还都开城年）已来驱掠人，许令放还。年前又有省旨，北京东京路（东宁府）庚午年（1270 年崔，坦以西京以北地域依附蒙古之年——笔者注）以来逃诱掳掠之人，亦令推刷还之。目今，还者未见一二”。

再者，高丽人亦有因厌恶高丽而私自逃往沈阳的情况。1256 年（高宗四十三年，元宪宗六年）2 月，蒙古停止征伐后，高丽高宗为了收拢民心，派遣宣旨使到六道。因为这些宣旨使到地方掳掠百姓，百姓痛苦不堪，竟致反迎蒙古兵入侵，还出现部分人逃往蒙古或沈阳地方的情形。^①

这样，高丽人以各种形式到蒙古者甚多。于是，对生活在沈阳地方之高丽人的处理，成为丽、蒙两国间外交上的悬案。

1279 年（忠烈王五年，元至元十六年）2 月，高丽派遣少尹赵愉到东宁府，推进对己未年（1259 年）以来从西海地域亡命的高丽人推刷（召还，送还）工作。1285 年（忠烈王十一年，元至元二十二年）3 月，断事官和辽东宣慰使派遣使者到东真北面推刷本国的通逃人口。同年 4 月，中郎将池渲等从蒙古回来，传达了蒙古让己未年（1259 年）以来逃入蒙古领土的高丽人都刷还本国的要求。1286 年（忠烈王十二年）7 月，齐安公淑从蒙古回来，传达了推刷蒙古双城（即永兴）流民的要求。根据蒙古

^① 参阅《高丽史》卷 24，世家高宗 43 年 2 月丙子条。《高丽史节要》卷 17，高宗 43 年 2 月条。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的要求，8月高丽派遣金忻（副知密直司事）到东真推刷了部分流民。^①

1291年（忠烈王十七年，元至元二十八年）8月，高丽派遣将军金位良到蒙古，在东京（即辽阳）、沈州（即奉天）等地召还高丽人；第二年（1292年）1月派遣元卿到蒙古，往辽阳路召还从己未年（1259年）以来被掳走的高丽人。1297年（忠烈王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2月，高丽忠烈王在蒙古与蒙古世祖打猎时，忠烈王提及丽、蒙从元宗以来亲密关系后要求：“……乞自己未年（1259年）以来，被掳及流民，在辽沈者，悉令归国”。蒙古世祖答应了这一要求。蒙古为遵守这一约定，于同年4月派遣使者到辽阳路，遣返从己未年以来的俘虏和流民高丽，其数达到三百五十户。这是具体刷还的开始。^②

1302年（忠烈王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8月和1304年8月，高丽分别派遣白都勃罗和高世到高丽，调查在辽东和沈阳的高丽人。

如上所述，虽然蒙古决定遣返沈阳及辽阳等地的高丽人返回高丽，而且高丽召还了辽东的高丽人，但实际回来的人不过是少数，多数高丽人仍然在辽东散居或着群聚。

① 参阅《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5年2月己丑条；11年3月己丑，5月癸巳条；12年7月甲戌，8月戊戌条。《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5年2月条；12年7、8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8月己卯：“金位良如元东京、沈州等处，推刷人物”。《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8年正月丁酉：“遣元卿如元辽阳路，推刷己未年（1259年）以来被虏人物”。《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3年2月己亥：“奏曰……至于小臣薺降公主，世为东藩，乞自己未年（1259年）以来被虏及流民在辽沈者，悉令归国。帝许之。王感泣拜谢”。《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3年4月庚子，“元遣使辽阳路，推刷己未年（1259年）以后被虏及流民，归之凡五十户”。《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8月条；18年正月条；23年2、4月条。

高 丽 外 交 史

因辽东沈阳地域高丽人占多数，生活在这一地域高丽人中的洪福源和王綽，曾经围绕辽东高丽人的统治权进行过争夺，结果洪福源（东京总管）被永宁公綽（按抚高丽军民总管）的势力驱逐而死。^①通过这些事实，可知沈阳地域的高丽人何等地多，以至为了统辖在蒙高丽人的争夺是多么激烈。

下面对从 1274 年到 1347 年为止的 74 年期间，高丽政府经过二十八次进行的推刷情况，以表格来表示，仅供参考。

顺序	年月	推刷地点	推刷对象	比 较
1	1274.4	东宁府	躲避赋役逃亡者	高丽史卷 27，元宗 15 年（高丽向元要求）
2	1274.8	东宁府	逃亡者	
3	1276.11	元	人 物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 2 年（只提出要求）
4	1278.2	东宁府	人 物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 4 年
5	1278.7	北京， 东京路， 东宁府	己未年以来被掳的人，庚午年以来躲避拘留、被俘虏的人	高丽史卷 28，忠烈王年 4

^① 参阅《高丽史》卷 90，列传三，宗室一，显宗条，平壤公附永宁公綽传。《高丽史》卷 130，列传 43，叛逆四，洪福源传。洪福源因在元薄待永宁公綽而惹起綽妻子（元皇室之女）的愤怒以后，依元世祖之命，被勅使们踢死，还被没收财产。对此，洪福源的儿子洪茶丘记恨父亲的死，并在本国事图谋报复。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顺序	年月	推刷地点	推刷对象	比 较
6	1278.9	东宁府	人 物	高丽史卷 28, 忠烈王 4 年 (只提出要求)
7	1278.10	东宁府	人 物	高丽史卷 28, 忠烈王 年 4 (只提出要求)
8	1279.2	东宁府	亡命者	高丽史卷 29, 忠烈王 5 年
9	1280.1	东宁府	匠 人	高丽史卷 29, 忠烈王 6 年
10	1282.9	辽阳, 沈阳	人 物	高丽史卷 29
11	1282.9	东宁府	人 物	高丽史卷 29
12	1283.3	辽阳, 北京	流浪人	高丽史卷 29
13	1283.9	开元路	人 物	高丽史卷 29
14	1284.1	双 城	逃亡者	高丽史卷 29
15	1285.3	东真北面	逃亡者	高丽史卷 29
16	1285.3	中国全域	除逃亡者外安置在哪里	高丽史卷 29
17	1285.5	中国全域	逃亡者	高丽史卷 29
18	1286.7	双城	流浪人	高丽史卷 29
19	1286.8	东真	流浪人	高丽史卷 29
20	1291.8	东京, 沈州	人 物	高丽史卷 30
21	1292.1	辽阳路	俘 虏	高丽史卷 30
22	1294.5	辽阳	俘虏, 流浪人	高丽史卷 30

高 丽 外 交 史

顺序	年月	推刷地点	推刷对象	比 较
23	1297.2	辽阳, 沈阳	俘虏, 流浪人	高丽史卷 31
24	1297.4	辽阳路	俘虏, 流浪人	高丽史卷 31
25	1304.8	沈阳	人物	高丽史卷 32
26	1311.10	沈阳	人物	高丽史卷 34
27	1331.5	双城, 女真 辽阳, 沈阳	逃亡者	高丽史卷 36
28	1347.1	双 城	人口调查	高丽史卷 37

通过上述材料, 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

第一, 高丽人到蒙古, 主要是辽阳和沈阳地方。

高丽推刷的地方是十四处, 其次数是三十五次。其中辽阳、沈阳或者辽阳路达到 12 次之多。这里提到的东京路、辽沈、辽阳、东京、沈州、辽阳路、沈阳路等地, 虽然有多种名称, 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指今天辽宁省辽阳、沈阳一带 (这里如果包括东京路、东京等, 便达到 14 次之多)。高丽在此推刷超过全地城的 40%, 因而主要推刷地域是辽、沈地区。当时, 高丽人之所以多迁徙到辽、沈地域, 是因为该地域位于高丽和蒙古的交通要道, 同高丽的距离最近, 而且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①

第二, 移居辽阳、沈阳地方的高丽百姓多数迁徙到统制少、土地肥沃的地方去开拓、定居。

如上表所示, 在 28 次的推刷中, 属于逃亡者、亡命者、流浪民、导入者、流入者等类的人居多。

高丽从建国伊始, 恢复高句丽旧土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头等

^① 参阅朴真奭著《中朝友谊三千年》, 1984 年, 第 169 页。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课题，所以，高丽并未积极制止百姓流入满洲，在对蒙关系上只不过表示要推刷的意思，而且也并没有积极推进。1278年（忠烈王四年，元至元十五年）7月，高丽忠烈王同蒙古世祖直接会谈时，主张“东宁府原是小邦祖宗京都”，接着说：“北京、东京路、东宁府庚午年（1259年）以来，逃诱掳掠之人，亦令推刷还之。目今，还者未见一二。”而且忠烈王接着说：“其有累世居住，不便捷徙者，于东京路（辽阳）地团聚”。又说：“耽罗、珍岛攻破时，官军所虏，其有逃囚者，则推刷为然矣。攻破之后，齿役平民者，妄称虏获，据充驱役，甚是难。”这是忠烈王形式上说是推刷居住在辽东地域的高丽人，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召还的政策，反而主张要集体地居住在辽东。^①

其后1297年（忠烈王二十三年，元成宗大德元年）4月，蒙古成宗推刷己未年（1259年）以来被掳走的高丽人和流民，而归还的只有三百五十户。此后，由于蒙古国基动摇，大陆被战乱的阴影所笼罩，1359年（恭愍王八年，元至正十九年）11月，辽州、沈州地方的二千三百余户高丽遗民回归，高丽将其分散居住在西北郡县。^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4年7月壬辰：“东宁府原是小邦祖宗京都……又有省旨北京、东京路、东宁府，庚午年以来，逃诱虏掠之人，亦令推刷还之。目今，还者未见一二……其有累世居住，不便捷徙者，于东京路地团聚……”。《高丽史节要》卷20，忠烈王4年7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0年4月庚子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23年4月条。据《辽东志》，1368年（明建国年）在辽、沈地区居民中，汉人占十分之七，以高丽土著民归属女真人占十分之三（《辽东志》卷41，地理风俗，辽海书社刊）。又据《世宗实录》，1464年8月，梁诚之在向朝鲜政府上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的居住民家中高丽人占十分之三，西起辽阳，东至开州，南至海州和盖州，部落相互连接”。《世宗实录》卷34，世宗10年8月壬午条。因为这两条纪录是中国方面作的统计，所以，有可能故意减少了高丽人的人数。

通过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4世纪中叶，很多高丽人以日子好过的辽、沈地方为中心，移居到中国北方各地。第二，到了14世纪后半期，其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高丽，但大部分仍然居住在那里。第三，高丽形式上要推刷高丽人，但实际上默认他们居住在，打算以此作为恢复北方领土的前哨。第四，因为高丽也出现衰败迹象，不能采取后续措施，终未能够恢复领土。

可以说，蒙古就沈阳地域的现状和对高丽人统治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如下。第一，因为沈阳地域一带多居住高丽人，而且形成特殊区域，所以，蒙古为方便统辖，利用高丽王族进行统治。第二，如果出现高丽叛离蒙古的情况，或者不服从蒙古命令的时候，也有对此以沈阳王对付高丽的计划。第三，蒙古因为内忧外患频繁而不能控制高丽的时候，蒙古武宗可以个人关系亲密的沈阳王来取高丽王而代之。^①

第三节 忠宣王兼任沈阳王与洪重喜的纠葛

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5月，被册封为沈阳王的忠宣王定本国官制，并指示李混等将其告知本国。不清楚其官职是如何编制的，但就任其官职的人都是沈王忠宣王的

^① 参阅丸龟金作《元和高丽关系的一章》，第20页。这是指因为恭愍王远元近明，元不顾高丽国内形势力主废王，并拥立当时在元的曷的之孙沈王脱脱不花的情况。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近侍，而世臣旧官均被清除。^①接着，6月忠烈王接受沈阳王改定的官制，并将其公布施行。

忠宣王在被册封为沈阳王的同时，被任命为蒙古中书省参议政使而留居蒙古。1308年（忠烈王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7月10日，忠宣王听到父王忠烈王病势恶化的消息，接着，13日由于父王去世，遂急忙归国，后于8月28日遵照遗言即王位。10月26日，蒙古武宗派遣使臣册封复位的忠宣王为征东行中书省右丞相高丽国王，还使其仍旧兼任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上柱国驸马都尉沈阳王。^②因此，以沈阳王即位为高丽王的忠宣王在统治高丽本国的同时，还掌握了对沈阳路的支配权。

这时，蒙古武宗对在自己登基时立功的忠宣王赋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权力。其具体的行为是赋予沈阳王对沈阳地域的全部支配权，并为方便其直接管辖，蒙古武宗下严命指出，沈阳路官吏对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5月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5月条。《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4年5月丙戌，6月辛丑：“李混、崔钧、金元具与承旨权准，赍沈阳王所定官制及批判还自元，超资越序者，皆近幸权势，世臣旧官俱退闲”。《高丽史》卷108，列传21，李混传。忠烈王在忠宣王在元当沈阳王期间，制定本国官制并以官职送来时，不仅予以接受并颁布实施，还在次月即7月因为病势危笃，派遣礼宾尹韩连告诉儿子沈阳王（忠宣王），而且忠烈王的遗言中也有同沈阳王想见一面的恳切词句。《高丽史》卷32，世家忠烈王33年3月辛卯条；34年7月丙寅、己巳条。这时，高丽本国的官制及重要的人事，还是忠宣王（沈阳王）制定并执行的。丸龟金作氏虽然在其《元高丽关系的一章》（第20~22页）仅仅认为忠宣王作为沈阳王安排了沈阳的官制，但忠宣王（前王）作为沈阳王还改变本国高丽的官制，连人事问题是独断专行。

^②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即位年10月辛亥条。《高丽史》卷87，表2，年表2，忠烈王34年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10月，“元遣使来，册王为征东行中书省右政丞相、高丽国王，依前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上柱国驸马都尉沈阳王”。《高丽史》卷33，忠宣王条，忠烈王34年11月辛未条。

沈阳王的联络即对沈阳王的报告或者建议，一切不得隔越，不仅如此，还称对违反这一命令的蒙古官吏要治罪。^①

忠宣王既作为高丽王又作为沈阳王，好像同沈阳路的居住者也有过接触。1308年10月6日，王祭殡殿（迁陵前安放帝王棺槨的地方）巡幸寿宁官时，沈阳路人为王设宴，^②便说明了这一点。

忠宣王在位是从蒙古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开始到蒙古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为止的6年间。在这个时候，兼任了高丽王和沈阳王，这期间沈阳王的名称改称沈王。即1310年（忠宣王二年，元武宗至大三年）4月2日，使高丽国王兼任沈阳王的蒙古武宗给忠宣王赋予功臣称号，同时改册封为沈王。沈王同沈阳王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是换了名称而已。^③

忠宣王兼任沈王，便发生了洪重喜^④的谋略和挑战。洪福源一家经其子洪茶丘、洪君祥到其孙洪重喜止的三代，在沈阳、辽阳之间建立根据地，成为治理这一地域高丽遗民的权势家族。洪福源被杀（被踢死）以后，反而被蒙古追赠为嘉议大夫沈阳侯。^⑤但是，自从忠宣王被册封为沈阳王以后，这一地域的权势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2年5月，“帝命沈阳路官吏毋得隔越沈阳王奏请，违者理罪”。

②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34年10月辛卯，“王祭殡殿，遂行寿宁官，沈阳路人享王”。《高丽史节要》卷23，忠烈王34年10月条。

③ 参阅《元史》卷23，本纪武宗2，至大3年4月己酉条。《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中虽然没有关于改封的记录，但是，在忠宣王向江阳君滋之子哥传王位以后，经常记之为沈王。

④ 洪重喜，字万，洪茶丘长子，洪福源之孙。因洪福源轻视永宁君倬，激怒倬妻子，被元世祖的信使所杀。对洪福源的死，其子茶丘和君祥总是怀恨在心，后常诬陷本国高丽，其孙重喜也是如此。

⑤ 参阅《高丽史》卷154，洪福源传。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从洪氏一家逐渐集中到忠宣王，尤其是忠宣王在辽阳、懿州地方设置廨典库（高丽时代掌织物、皮革的衙门）、店铺，还分得田地和房屋等，经济势力逐渐壮大起来。洪氏的势力因忠宣王而被蚕食。因此，曾在此地有权势的洪氏一家便处在隶属于沈王的命运。^①

洪重喜不堪忍受这种状况，为了借蒙古武宗的力量，从此地驱逐沈王的势力，便开始诬陷忠宣王。1309年（忠宣王元年，元至大二年）3月21日，当蒙古欲用船舶材料建太后佛祠时，洪重喜、洪重庆兄弟等说：“白头山多美材，若发沈阳军二千伐之，流下鸭绿江，使高丽舟载以输便”。《高丽史》记载：“于是，遣辽阳省宣使刘显等来，令本国造船百艘，输米三千石，弊不可言。是时，二官之役方兴，造船之事又急，西海、义州、杨广之民尤受其害”。^②这是洪重喜等为使沈阳王痛苦而在蒙古策划的谋略，最后使高丽人遭受苦役。

同月24日，洪重喜还向蒙古中书省控告说忠宣王胡乱改变、废止高丽官制。忠宣王的命令是：“流窜之人皆免放，唯吴演、梁麟徙置镇边。前者，各衙门并省之时，士大夫多无故失职，或有劳降官者，予惟念之不置，可依旧勾当。又新设衙门官吏，各动其职，毋致为废弛。又前所革近侍茶房、三官五军，皆复之”。这是关于洪重喜等向蒙古中书省控告的对策。根据洪重喜兄弟的控告，蒙古中书省建议蒙古武宗让洪重喜和忠宣王（此时在蒙古）进行对质，但武宗没有答应。忠宣王终于扈从太后巡幸五台

^①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15年7月己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15年7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元年3月甲辰条。《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元年3月条。

山（山西省大同）。^①

洪重喜等的诬陷并没有就此而结束。先前，洪重喜曾经向蒙古中书省建议在高丽设置行省。^②这时，忠宣王依仗高丽世代侍奉蒙古的功劳，强调设置行省的不必要性，才勉强被制止。尽管如此，洪重喜于1312年（忠宣王四年，元仁宗皇庆元年）6月4日，又重新向蒙古请求在高丽设置行省。洪重喜的请求过去也未成功，而这次又被蒙古断然拒绝。事事诬陷母国高丽的洪重喜，终于招来蒙古武宗的愤怒，于1309年（忠宣王即位年）被流放到潮州。^③

第四节 沈王暠与忠肃王的对立

忠宣王虽然兼任高丽王和沈王，但以后两者分离。蒙古将高丽王同沈王分离对立，以牵制高丽，所以，高丽王同沈王继续处在纷争之中。这时，借助蒙古势力的高丽奸臣们的阴谋，对高丽的安危也带来不少影响。沈王暠如此，暠的孙子脱脱不花亦如此。

1313年（忠宣王五年，元皇庆二年）3月，忠宣王将高丽王位传给长子焘（后来的忠肃王），将江阳君滋的第二子，自己的侄子延安君暠定为沈王的世子。其后1316年（忠肃王三年，元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忠宣王元年3月条。

^② 行省是指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是元统治高丽的行政机关，1299年（忠烈王25年，元大德3年）设置。

^③ 参阅《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4年6月戊辰：“元降制，令高丽毋置行省。初，洪重喜诉于中书，欲立行省。王以祖宗臣服之功奏之，故帝有是命”。《高丽史节要》卷23，忠宣王4年6月条。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仁宗延佑三年) 3月9日, 将沈王位传给世子嵩。^①

嵩的蒙古名为完泽秃, 忠宣王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喜爱嵩, 因而在宫中抚养。嵩被封为沈王以后, 因为娶蒙古梁王的女儿为妻子, 便有了蒙古皇室的牢固背景。即因为嵩的丈人梁王(和晋王是同一个人)是忠宣王妃蓟国公主的哥哥, 自然也深受蓟国公主的信任。^②而且嵩的丈人是蒙古显宗, 内弟后来成为泰定帝(梁王为也逊帖木儿的长子)。^③

这样, 嵩觊觎高丽王位, 而百姓多拥护嵩, 加之嵩深得蒙古英宗的宠爱, 曹颀、蔡河中等便拥立嵩, 支持其谋夺高丽王位, 于是向蒙古千方百计谗诉忠肃王。^④

先前, 忠宣王在蒙古时因为从臣司仆正白应丘善于理财, 曾令其任职于沈王府。但白应丘由于讨厌沈阳王嵩而逃回本国, 嵩

① 参阅《高丽史》卷34, 世家忠宣王5年3月甲寅。《高丽史》卷35, 忠肃王3年3月辛亥:“上王(忠宣)奏于帝, 传沈王位于世子嵩, 自称大尉王”。

② 参阅《高丽史》卷91, 列传4, 宗室2, 江阳君滋附沈王嵩传, “王(忠宣)遂封嵩沈王, 尚元梁王女, 梁王蓟国公主兄也”。《高丽史》卷89, 列传2, 后妃2, 忠宣王条, 蓟国大长公主传:“忠宣王蓟国大长公主宝塔实怜, 元晋王甘麻刺女”。从以上可知, 梁王和蓟国公主是兄妹关系, 两个人是晋王甘麻刺的子女。

③ 参阅《元史》卷108, 诸王表, 梁王条:“甘麻刺, 至元27年封, 出镇云南, 29年改封晋王”。《元史》卷108, 诸王表晋王条:“甘麻刺, 至元二十九年, 由梁王改封, 出镇大斡耳朵。大德六年薨, 谥献武, 即显宗也。也逊帖木儿, 大德六年, 袭封, 至治二年, 立为皇帝”。被封为梁王的甘麻刺, 到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因此, 《高丽史》说的“梁王, 蓟国公主之兄也”中, 梁王采用的是旧名, 应为晋王。因此, 蓟国公主之兄是甘麻刺的长子也逊帖木儿, 《元史》卷29本纪中的泰定帝就是这个人。晋王表条中“至治二年, 立为皇帝”是至治三年之误。换言之, 沈王嵩是后来的泰定帝尚为晋王时娶其女儿的。

④ 参阅《高丽史》卷125, 列传38, 奸臣1, 蔡河中传。《高丽史》卷131, 列传44, 叛逆5, 曹颀传。

利用此事奏请蒙古英宗派遣员外郎阿都利，敕命忠宣王遣白应丘回沈阳，但忠宣王不肯听命，于是，高向蒙古英宗诬陷高丽忠肃王，说他亲手撕裂了蒙古英宗送来的国书。蒙古英宗闻之大怒，急令忠肃王入朝蒙古，并派翰林待制沙的等对其审讯，收回国王印。

高先派遣其臣下前护军朴龟到高丽，向宰相传了文书。其文中胁迫说：“尔王嗣位以来，酗酒嗜音，不迎帝使，不亲庶务。夜与群小就服微行，使幸臣尹硕、李宜风、孙琦等，假称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谗言，枉杀无辜，官人以私，不以贤劳。父王勋旧之臣，皆置散地或至流放，籍没其家。尔等反为逢迎，至使国纲大毁，事大之礼后于诸国，尔等自今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利赍去圣旨，尔国王非唯不行，又失所在（亲手撕裂的意思），沙的到日，明推以对”。^①

沙的等到高丽审问李允弼（式目都监录事）等，欲弄清蒙古英宗敕书的下落，李允弼说：“臣赍圣旨至王宫，授代言安珪，时有别贺徐允公见之。”提供了证人。沙的抓获阿都利、李允弼、安珪和徐允公回到蒙古。蒙古英宗命令宗正寺审问安珪等，当安珪称关于蒙古英宗诏书的保管问题涉及到忠肃王时，忠肃王不能说清其诏书的下落。于是，蒙古丞相伯颜怀疑忠肃王，而且对这个问题好长时间未下决断。因而忠肃王曾一度受到沈王一党阴谋的折磨。

忠宣王被蒙古皇帝流放到僻地，王焘（忠肃王）即位以后，沈王高为了将忠肃王赶下王位取而代之，继续施阴谋诡计。这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9年3月条。《高丽史》卷91，烈传4，宗室2，忠烈王条，江阳公滋附属传。《高丽史》卷87，表2，年表2，忠肃王9年条。《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蔡河中传。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62页。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时，正好郎将桓允全和百户金成万用船载二万匹布，献给在蒙古的忠肃王以充当资费；李恭（恭性忠直，忠肃王为世子时，因屡进直言，世子怒蹴其目而失明。世子即位为王以后，念其忠直骤加拔擢，使其在旁侍奉，故对王格外忠诚）和护军康吕为忠肃王探听沈王曷的动静。

曷知道此事后，为清除忠肃王的从臣，又进行了诬陷。曷派遣臣下杨成规到高丽，假皇帝之命责备宰相金利用，并没收所截钱财。又假借蒙古皇帝的命令，派遣人到高丽，说：“国王入朝时，中外仓库皆已告匮，乃抽敛大小人户，备盘缠以来，及被天谴至严。规免罪辜，赂事权贵，费尽钱物，又遣孙琦、安均等于本国，重敛于民。帝闻之，命刑部推征。国王曾不惩艾，与恶小前护军李恭，谋遣代言安文凯、郎将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户金成万等，复加横敛，割取民膏，连续转运。帝怒，已囚文凯于宗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万等发还，宜即杖海岛。汝宰枢不能谏正，反为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虽聚敛以送，固非国王所得擅用，徒增国怨耳。自今一皆禁断，违者奏闻痛惩。”由于这一胁迫，高丽朝廷（国王在蒙古）将桓允全、金成万、李恭和康吕流放到海岛。

沈王曷夺取王位的首要手段，是断绝本国向忠肃王滞留蒙古的行营输送钱财，有效地通过封锁本国的仓库来阻碍输送。

因为这是曷假借蒙古英宗的命令实行的，既可以充分估计到曷从蒙古得到信任的程度，也可认定蒙古英宗未觉察他们的阴

谋，充分说明他们推进得何等巧妙。^①

沈王暠一党借忠肃王在蒙古被流放的机会，加快了夺位步伐，阻挠上王复位及还国，进而希望上王长期被流放。由此，沈王暠一党又鼓动本国重臣阻挠向蒙古请求上王复位、还国的任何请愿活动，其主谋者是前赞成事权汉功。^②

另一方面，高丽本国百官向蒙古中书省上书呼吁赦免上王罪；1323年（忠肃王十年）1月20日，驷兴君闵渍、驾洛君许有全、兴宁君金具居等一行到蒙古，再次请求召还上王。虽然在蒙古逗留半年之久，期间他们为此曾多次恳请，但因沈王党的阻止，最后失败而归。这时，崔诚之、李齐贤留在蒙古，将上王还国的请求书交给郎中及丞相拜住进行交涉。根据这一请求，当年2月上王的流放地移到杂思麻（一名脱思麻，在今陕西省）。^③

这样一来，在高丽本国废黜忠肃王、拥立沈王运动甚嚣尘上。以前赞成事权汉功为首的拥立沈王暠一党，于1322年（忠肃王九年）8月21日召集百官到慈云寺，欲上书蒙古中书省。

①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9年正月条。《高丽史》卷91，列传4，沈王暠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9年1、6月条；10年3月条。《稼亭先生文集》卷12，尹宣佐墓志铭，“时王被留五年，财用匮乏，沈王之党知其然，封府库以沮输送，公檄察官赵瑄督责主者，输行乃行”。

②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9年正月条。1320年（忠肃王7年）12月4日，上王因伯颜秃古思谗言而被流放到远处吐蕃时，带着直宝文阁朴仁干、前大护军张元祉等十八人前往流放地，苦不堪言。1321年7月，上王在西蕃独知里通过崔有滄、权傅、许有全、赵简等捎信，表示忧国之意，并说利用国王年少的群小会兴高采烈，所以，要求诸重臣协力使王迅速还国。11月13日，重新联络崔有滄等，告诉上王于10月6日到达流放地的事实，要求迅速周旋自己的还国。

③ 参阅《高丽史》卷35及《高丽史节要》卷24中忠肃王的有关年月。李齐贤作《益齐乱藁》卷6，书。《高丽史》卷108，列传21，崔诚之传。《高丽史》卷110，列传23，李齐贤传。

第二十三章 沈王与高丽王

其请求书的草案中说道：“小邦（即高丽）厚蒙圣泽，民安其业。奸臣在王左右，流毒内外，百姓无辜，不堪其苦。素闻沈王鬻稟性慈善，望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孙也。顷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随王入都留滞，令国人上书乞王遄归，陪臣会议数月未就，代言庆斯万、护军金仁浚等以王命督，不获已署名。斯万潜授金之镜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议政府），伏乞详照”。

接着，于同月24日督促百官在请求书上署名，但署名未及半数，忽然天下大雹。于是，监察执义尹宣佐说：“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诉君，狗猪不为。”然后，唾之而去。这时台谏史翰及赞成事闵宗儒、彦阳君金伦等也没有署名。

赞成事闵宗儒说：“臣为君隐，其在其中。至如欺罔，是可忍耶？吾虽死，不为若卖。”彦阳君金伦也说：“臣无二心，职耳，何后悔之有？”

因拥立沈王运动推进不顺利，权汉功一伙（蔡洪哲、闵渍、赵瑚）秉承沈王旨意，将庆斯万、金仁浚、金之镜囚禁在巡军，遂于9月1日重新召集百官署名，但天又鸣雷闪电，下雹如李梅。权汉功等使民部议郎赵湜拿着请求书到蒙古呈中书省，被中书省拒收，又呈翰林院，但仍被拒收。^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权汉功传。《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9年8月丙戌，“前赞成事权汉功等欲请立沈王鬻，会百官慈云寺上书中书省”。《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9年8月己丑，“汉功等复会慈云寺署呈省，书未半，天忽大雨雹”。《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9年9月乙未，“汉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电，以雹大如李梅”。《高丽史》卷108，列传21，闵宗儒传。《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兆年传。《高丽史》卷109，列传22，尹宣佐传，“宣佐独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诉君，狗彘不为。唾之而去。由是，台谏文翰得不署名事，中书以其书归之’”。《高丽史》卷124，列传37，嬖幸3，金英甫传。《高丽史》卷110，列传23，金伦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9年8、9月条。李齐贤著《益齐乱藁》卷7。李基祚著《稼亭先生文集》卷12，尹宣佐墓志。

就在此时，在蒙古发生了弑杀英宗事件。1323年（忠肃十年，元至治三年）8月4日，英宗巡幸南方中到南波。这天晚上，御史大夫铁失、枢密院使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使赤斤铁木儿等谋叛逆，动员铁失麾下的阿速卫兵杀死丞相拜住，终于弑杀英宗。

此后，皇叔泰定帝即位。泰定帝一即位，便大赦天下。于是，上王也被赦免。接着，泰定帝许忠肃王归国复位，并还以高丽国王玉玺。

这样，蒙古夺走国王玉玺一年十个月以后，又重新还给忠肃王。随蒙古泰定帝宽宥特许忠肃王及其回国，王位始安定，而权汉功等拥立沈王运动也完全成为泡影。^①

与此同时，1322年3月，蒙古英宗借助沈王的谋略夺走忠肃王的国玺以来，约两年之久奸臣拥立沈王运动也成为梦幻泡影。以金元祥、赵延熹的流放为标志，对参加这一运动的三品以上高官们停止薪金，以及罢免拥立署名者，事态便迅速得以平定。^②

沈王曷倚仗受蒙古英宗的宠爱，又与伯颜秃古思等取得联系，诬陷忠肃王，使之被流放到遥远的吐番，并使蒙古英宗夺回忠肃王的国玺，企图在忠肃王回国以前迅速篡夺王位，并纠集不满高丽的一伙形成了一种势力。然而，多亏蒙古泰定帝的决断，这一阴谋便成了泡影。但沈王曷觊觎王位的阴谋并没有就此结

^① 参阅《元史》卷28，英宗至治3年8月癸亥条。《高丽史》卷25，世家忠肃王10年9月戊戌、丁巳条。《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10年9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11年2月壬子，4月壬午条。《高丽史》卷80，志34，食货3。《高丽史》卷105，列传18，赵仁规附延熹传。《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金元祥传。《高丽史节要》卷24，忠肃王11年2月条。

束，到忠肃王长子忠惠王继位后，再次发生了废忠惠王而拥立沈王的图谋。

第五节 沈王暲与忠惠王的对立的介入

忠肃王长子忠惠王性情豪放，沉湎酒色，不务政事，将国事委任于奸臣，喜欢嬉戏而违背君臣礼节，恣意做出随便罢免忠惠王臣下等昏君的行径。这样，忠惠王在位不过一年即不得不暂时退位（见第22章有关内容）。此中太保伯颜起了关键作用。

这时，随忠惠王从蒙古回到高丽沈王暲再次去蒙古时，在平壤同曹颀一起谋反，暲和曹颀派遣部下朴全到开城诈称“暲已为国王”，以引起混乱。对此，忠惠王派遣六十余骑兵到平壤抓获暲时，他已经逃亡蒙古。^①

另一方面，因为当了太史的蒙古伯颜支持沈王暲，沈王党的势力重又膨胀，发生了曹颀等袭击王宫的事件。

1332年（忠宣王二年）8月，忠惠王曾经奸污庆华公主（父王妻，忠宣王的异母）。庆华公主因为羞于此事，欲回蒙古。这时，曹颀托病不出，庆华公主便召见他，并详细讲了被忠惠王强暴的事实。曹颀同征东省官洪彬一起到了王宫，但由于诸小官堵住宫门，被迫返回。忠惠王听到消息，便追来招呼。曹颀却未予理会，到永宁宫召集百官，声言要驱逐群小，也即清除沈王的羁绊。

^① 参阅《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沈王暲传。《高丽史节要》卷25，忠肃王7年6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66页。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39页。

忠惠王率领万户丘天佑、全英甫等二十余骑到了永安宫，但不得进。于是，忠惠王使尹继宗、丘天佑招呼曹颀，但他没有出来。曹颀以前护军李安、张彦、吴云等为巡军首领官，将国王印放到永安宫，使前军簿总郎柳衍、左思补李达衷、军簿佐郎成元度、艺文检阅金得培守护。正好这时，金注庄从蒙古回来诈称“蒙古泰定帝许忠惠王袭位”，忠惠王听完非常高兴。

曹颀一伙听到这消息，慌忙逃走。忠惠王帖榜谕示说：“颀等不畏朝廷，佩执弓刀，胁聚国人谋逆，罪莫大焉。百官有能归正者宥”。

另一方面，国王使前判书李兆年治曹颀之罪。李兆年对征东省官及诸宰相说：“曹颀久为沈王臣仆，潜蓄异志，诸君胡助之。”曹颀听完这话便说：“我为政丞，见王荒淫无道之行，若不闻于朝廷，罪在我身。王虽欲杀我，我不惧。”然后，曹颀使闵珣在官门外停放连车，用来防备。

曹颀又同兴彬、申伯、黄谦及征东省官一起，使闵珣、吴云、李安等动员一千多名军士，于24日夜中袭击王宫，但忠惠王率领数骑侍臣来迎击，曹颀军士便败走。忠惠王乘胜追击，追到巡军的南桥附近。这时，李安射中忠惠王臂。同时，曹颀派人在连车边设布帐，用来防止流矢。先锋军打破连车攻入，曹颀势穷便跑入了永安宫。这时，亲信劝告曹颀逃避，但曹颀没有听从。于是，进入公主殿的王军追上射杀之，然后将尸体扔到巡军南桥下，并抓获李安、黄谦、朱柱、白文举、赵炎辉、张巨才等

囚禁到巡军。这就是曹颀之难。^①

同年11月2日，曹颀余党向蒙古告状，蒙古便派遣中书省断事官头麟、直省舍人九通等到高丽，12月拘捕忠惠王等回到蒙古。1340年（忠惠王后元年）1月，蒙古将高丽王囚禁到刑部。^②

这时，庆华公主也卷入朝政，她任命金之谦为权政丞，任命金资为提调都金议司事，又将赞成事郑天囚禁到征东省。但两天后，德宁公主（忠惠王妃，蒙古女）释放郑天起，并将他藏在宫中。两个公主都因蒙古女人成为高丽王妃，作为婆媳，均卷入了高丽的政治。^③

另一方面，被蒙古抓走的忠惠王和洪彬等受到蒙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宗正府、翰林院的各种审讯。曾经奸污过母后的忠惠王因为自己说不清曹颀之难而陷入困境。这时，洪彬解释说：“颀，王之奴，奴而欲伐其主，王法所不赦，王罪当从减。彬以先王遗命权行省事，事干邦宪者，彬实当之，王不当坐。”

忠惠王被蒙古抓走以后，国内辛辅和国老们齐集旻天寺，议上陈情书于蒙古情求赦免王罪事。陈情书的草拟由李齐贤负责。陈情书草案中记录了蒙古使臣抓走忠惠王的详细经过，历陈其间

^①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惠王条，忠肃王后8年8月甲午、庚戌，11月丙辰、丙寅条。《高丽史》卷108，列传21，洪彬传。《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兆年传。《高丽史》卷110，列传23，李齐贤传。《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忠烈王条，江阳公滋传附沈王嵩传。《高丽史》卷89，列传2，庆华公主传。《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曹颀传。《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8年8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6，世家忠肃王8年11月丙辰、丙寅条；忠宣王后元年正月辛未条。《高丽史节要》卷25，忠肃王8年11月辛巳、癸未条；忠宣王后元年正月条。

^③ 德宁公主在忠惠王和忠穆王时，在安牧家处理庶务。到了忠定王时也仍然参与政治，连国王也无可奈何。

高丽同蒙古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唤起蒙古念及高丽忠实侍奉蒙古的功劳，并说道：“使我宝塔实里王（忠惠王之蒙古讳）免离罪罟，游泳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风俗并仍其制”。但因很多国老没有参加，上陈情书之事终未成功。^①

蒙古抓走忠惠王一事，在百姓中间引起不安，以至丽、蒙国境义州、静州居民纷纷渡过鸭绿江逃亡蒙古。^②

曹颀事件，是假借拥立沈王暠，实为掌握实权，而利用蒙古太史伯颜拥立暠，以庆华公主为后援，以从中捕捉忠惠王的乱行而引起的谋反事件。事件表面上好像告一段落，但不能忽视庆华公主和德宁公主的反目和曹颀余党图谋报复以及伯颜在蒙古的谋划给高丽内政带来的不良后果。

另一方面，曹颀事件以后，沈王暠便去了蒙古。数年以后，忠惠王在蒙古的流放地岳阳县（湖南省岳州）去世后，暠回到高丽，终于1345年（忠穆王元年，元顺帝至正五年）7月14日死去。此后，暠之孙脱脱不花即沈王位，在恭愍王、禹王时又发生拥立沈王的阴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0，列传23，李齐贤传。

^②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后元年3月条。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第一节 蒙古乃颜叛乱与高丽援兵

由于蒙古在高丽设置达鲁花赤，故对高丽内政干涉加深，所以1274年（忠烈王即位年，元至元十一年）和1281年（忠烈王七年，元至元年十八年），高丽同蒙古一起曾两次征伐日本。高丽专心计划第三次征伐日本时，又出现了一个外患，就是1287年（忠烈王十三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在蒙古发生的乃颜叛乱，其余波便是哈丹的侵入。

1287年4月，在蒙古发生了乃颜（元太祖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干赤斤之玄孙）的叛乱。乃颜在管辖兴安岭东部地域期间（根据地为洮儿河），纠集东部蒙古辽东地方的诸王举行了大规模的叛乱。因为这叛乱是由王族引起的，所以蒙古世祖走上了亲征之路。

同年5月，关于乃颜叛乱的消息一传到高丽，忠烈王便派遣将军柳庇到蒙古，提议要动员高丽军帮助蒙古讨伐乃颜部队。这时，乃颜曾使高丽叛乱者庾超调查并科役从高丽逃亡到辽阳地方的军队，但庾超听到乃颜在蒙古举行叛乱的消息，便逃亡到高丽的金郊。这时，高丽派人惨杀了叛乱者庾超。

当忠烈王要派遣援军到蒙古时，部分大臣中也有人主张要等

待蒙古皇帝的请求。但印侯主张“父母家有变，奚暇待命”，慎重论便低了头。同年6月，出使蒙古返回的柳庇报告说蒙古世祖已经接受了高丽的援兵。^① 蒙古世祖亲征乃颜时接受高丽的援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忠烈王当即准备派遣援军，在立即检阅军士的同时，要亲自率领援军出征。首先忠烈王让韩希愈（左翼万户）率领军士先出征，而忠烈王三天以后出征。^② 然而过了三天以后，翻译金仁从蒙古回来，传达蒙古世祖夺已取乃颜根据地乃颜城的情报。同年7月，忠烈王接收蒙古战胜的捷报，以印侯为中军万户，亲率前军出征到开城卯山。这时，蒙古为了断绝乃颜军，并迅速促其降服，派遣东京总管康守衡和辽东宣慰使等到高丽，督促说：“王若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于是，忠烈王派遣将军柳庇和中郎将吴仁永到蒙古，报告忠烈王已经亲率军士出发的消息。^③

柳庇和吴仁永于8月从蒙古回来时报告：“帝亲征，乃颜擒之，拔其城，车驾还燕京，罢诸路兵。”蒙古督促高丽出征，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3年5月壬寅，“王闻乃颜大王叛，遣将军柳庇如元，请举兵助讨”。《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3年5月条。《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幸1，印侯传，“王闻乃颜大王叛，遣柳庇请举兵助征。宰枢或云：‘请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变，奚暇待命。’王从之”。印侯本来是蒙古人，初名为忽刺歹，同张舜龙、四信、卢英一起曾为齐国公主的怯怜口（私属人），后来官至将军，因为作恶多端，在《高丽史》中归为嬖臣。《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3年6月壬戌，“柳庇还自元，帝许助兵”。

^② 参阅《高丽史》30，世家忠烈王13年6月癸亥、己巳、癸酉、甲戌、己卯、丙子，“甲戌，韩希愈将兵启行”，“丙子，两府饯王于凉楼”。

^③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3年6月戊寅，7月庚寅、壬寅，“壬寅，东京总和康守衡、辽东宣慰使等，遣人来言曰：‘王或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王乃遣将军柳庇、中郎将吴仁永如元，奏亲将兵已发”。《高丽中节要》卷21，忠烈王13年6、7月庚寅、己亥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世史》，第256页。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为合兵归荡乃颜军的，但蒙古世祖向柳底等传达说忠烈王既已出征离开开城，就要求忠烈王顺路到蒙古燕京。^①之后，忠烈王到蒙古，12月归国。

1288年（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2月，乃颜余党在蒙古又发动叛乱。这次忠烈王并未派援军出征，并派遣将军吴仁永到蒙古说：“今东鄙未宁，请亲率征北兵，移镇双城”。吴仁永3月份从蒙古回来报告说：“帝以乃颜复叛，发兵亲征，以我国军戍东藩”。^②

蒙古世祖表示同意，并认为高丽王不能亲自率领北征军参战，守住东鄙也好，对消灭乃颜余党也有间接的帮助。

随后于4月1日，蒙古世祖任命忠烈王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以作为守卫辽阳、沈阳、高丽等蒙古东部地域的统帅。然后于4月16日指示说：“中书省奉帝旨谕塔出云：镇东藩事，当与高丽王共议。”于是，蒙古的塔出派人到高丽，要求“发兵五千及军粮，赴建州。”

高丽接到这一要求以后，感到建州距离本国有三千余里，山川险阻，道路不通，又比年积蓄殫竭，处境十分尴尬，遂颇感为难。于是，忠烈王便召集大臣们议论此事。群臣皆云：“从之，难堪；违之，则恐负前奏之意，莫若声言发兵助战，以缓运粮”。^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3年8月丁卯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韩希愈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4年2月辛酉，3月壬寅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4年，2月、3月，“二月……遣将军吴仁永如元。时北贼叛乱，我国宜起兵助征，而王难之。今东鄙未宁，请亲率征北兵，移镇双城。帝从之”。

③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4年4月乙卯朔、庚午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4年4月条。

由此可知，在第一次乃颜叛乱时高丽曾要求派遣援军，并且忠烈王打算亲率征伐军助战，相反，在其余党再次举行叛乱时派遣援军的想法也成了托词。

接着，5月吴仁永从蒙古回来传达：“帝命除建州运粮，以助征兵，移戍铁岭，国王宜留镇本国。”6月，蒙古派遣总管金之茂检阅高丽的兵器。^①

忠烈王在镇压乃颜及其余党叛乱时，打算到蒙古亲征助战，但蒙古谢绝了忠烈王的亲征，并挽留王在蒙古访问。而在1289年2月，蒙古派遣张守智（湖广等路行尚书省参知政事）等到高丽指示说：“据尚书省奏，去岁辽东（因为乃颜等的叛乱）调遣军马，人民被扰，田禾未收，例皆阙食。江南险远，船运粮斛，不敷给散。辽东与高丽接境，乞令本处措粮十万石，前来接济。”转而要求高丽接济给养。3月，高丽派遣吴仁永到蒙古，通告军粮已经都准备完毕。五天后，高丽使吕文就（监察司丞）等动员船四百八十三艘、运船人一千三百十四名，转运六万四千石米，接济补充蒙古军粮。

这样，随着乃颜及其余党的叛乱完全被扫荡，辽东忍饥挨饿的百姓都得到了救济。4月，蒙古世祖为嘉许高丽忠烈王忠义之举，特赏赐了金瓮。^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4年5月壬子，7月丁亥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4年7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4年9月戊申，10月庚午条；15年2月丙寅，3月丁亥、辛卯、己亥，4月己酉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4年9、10月，15年2、4月条。

第二节 哈丹入侵前的丽、蒙关系

1288年（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乃颜的余党哈丹同漠北的叛乱者海都（蒙古太宗之孙）一起，又一次举起了叛旗。蒙古世祖命令其孙铁木耳（后来的成宗）讨军。

1289年7月，蒙古世祖因为海都侵入边防，派遣阿且不花到高丽，请求动员高丽军队。高丽忠烈王接到这一请求以后，便命令洪子藩、赵仁规等召集军队的同时，动员了各道的军队。8月，忠烈王又一次指示印侯和金忻召集军士以后，命令金忻（万户）带领援军向辽阳行省出征。这时，蒙古派遣将军乃蛮歹在洮儿河流域大败海都及哈丹军。

10月，因未等及同金忻军会战，世祖命令停止援军出征的通报到了高丽。^①

被蒙古乃蛮歹军大败的哈丹军暂时停止对蒙古的反抗，并将其侵略方向转向了高丽。

1290年1月，从蒙古回来的将军吴仁永得到乃颜余党哈丹将要侵犯高丽的情报，并向高丽报告。高丽听到这一报告后，为了对付他们，第二天便召集了军队。然后，派遣中军万户郑守琪驻扎禁忌山洞（未详），左军万户朴之亮驻扎伊川，韩希愈驻扎双城（即永兴），右军万户金忻驻扎豢豸（高城地方），罗裕驻扎通川，以对付哈丹军的内侵。与此同时，3月蒙古阔梨帖木儿派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5年7月癸卯，8月戊申、乙卯、壬戌，10月庚申，“庚申，帝命罢助征军”。《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5年7月，“帝以海都兵犯边，欲亲征，遣阿且不花来征兵”；忠烈王15年8月，“遣万户金忻率助征军赴辽阳行省”。

遣蒙军到高丽参与守卫双城。

当哈丹将要侵犯高丽东北部的消息传来，高丽国内为东北地域的防备做准备的时候，忠烈王从蒙古返回（忠烈王是去年11月同公主、世子一起去蒙古的）。忠烈王回来的1290年（忠烈王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3月，蒙古太祖在废除管辖至今的东宁府的同时，将西北诸城复归高丽。为了守卫这个地方，忠烈王立即拜其总管韩慎和桂文庇为大将军，玄元烈为大仆尹，罗公彦和李翰为将军。^①

同月，风闻哈丹将要率军侵入，高丽朝廷人心惶惶，以赞成事洪子藩为首的大臣议请避难到江华。这时，金议中赞许珙同崔有滄一起反对迁都江华。其反对的理由是：“今王在京师，岂可信讹言，擅移国都。”然而，洪子藩等召集国老大臣们议论，因为都主张应当迁移，许珙对此无法阻止。许珙便对堂吏文证说：“众论如此，毋沮也。吾与尔守京，以待王命。”对此，诸大臣都说：“人谓许中赞镇定国家，今其误国乎？”许珙回到家里招呼子孙说：“吾当留此。若辈有不从我者，非吾子孙，必处之以法。”表示了死守国都的决心。

不久印侯从蒙古回来说：“帝闻复都江华，命王曰：‘其言若实，执首谋者以来。’”这样，许珙在防止外贼方面事先很好地把握了死守国都的主体意识和蒙古的意向。因为过去高丽曾迁都江华顽强地进行对蒙抗战，所以，蒙古有为其迁都开京而消耗不少国力的余悸。因此，蒙古不能同意高丽迁都江华。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6年3月壬子、丁卯，“丁卯……帝诏罢东宁府，复归我西北诸城”。《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6年3月，“帝诏罢东宁府，复归我西北诸城”。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55页。

第三节 哈丹入侵与丽、蒙古关系

1290年（忠烈王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5月6日（戊申），驻扎在高城的金忻和驻扎在通川的罗裕等，向朝廷报告说：“哈丹入海阳（吉州）界”。风闻入侵的消息传出一个时期，哈丹终于果真入侵。虽然哈丹一伙在辽东等地向蒙古举起了叛旗，但屡战屡败，不得已抛弃满洲，向高丽侵犯。其最初的入侵地是海阳（即吉州）。

16日，高丽派遣金延寿到蒙古，报告哈丹贼入侵高丽的消息。与此同时，高丽使将军韩慎带领西京军队到东界防御哈丹贼，以为防御国境增派兵力。^①

蒙古世祖接到哈丹贼入侵高丽东北界的消息，对高丽指示说：“讨贼军至高丽，则道路回远，宜自咸平府（即开元）出南京（即间岛）、海洋，截断贼道”。从这时在开元职事的达鲁花赤八秃满曾经派遣使者到高丽索取军粮来看，可知八秃满在同侵略高丽的哈丹贼作战时经受了粮食困难。

高丽军因挡不住哈丹贼猛烈的进攻，于同年20日（庚寅）派遣大将军柳庇到蒙古请求援军，同时告知为避敌将迁都江华，以持久战来抗敌。9月柳庇归国时，蒙古世祖全部答应了高丽的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6年5月戊申、戊午，6月丙子：“戊申，金忻、罗裕、郑守琪等，驰报哈丹入海阳界”，“戊午，遣将军金延寿如元，奏哈丹入寇”。《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6年5、6月条。

要求。^①

丽、蒙古联合军暂时击退哈丹军以后，首先将妇人将老弱者迁徙到江华，让诸州郡的百姓避难到山城和海岛。而且将国史、宝文阁和秘书寺的书籍转移到江华，将官人和太祖塑像迁徙到江华。11月，高丽又一次派遣柳庇到蒙古，报告哈丹贼侵入双城。蒙古便派遣平章事阔梨帖木儿到高丽，使其帮助高丽讨伐哈丹贼。阔梨帖木儿派人到高丽通告，要求“国王宜留京城，以犒吾军”，以图阻止迁都江华。^②

但是，哈丹军像洪水般地席卷高丽境，12月，数以万计的哈丹贼攻陷了和州（永兴）和登州（安边）。他们杀人为食，轮奸妇女，甚至脯而食之。

对此，高丽派遣印前去进行了防御。这时，蒙古使平章事薛阁干、梨帖木儿和右丞塔出等，率领一万三千名蒙古步兵援助高丽。这些援军于12月到达。他们到达十天以后的12月18日，忠烈王命令知都金议司事宋玠留守国都，自己避敌迁移到江华禅源寺。被哈丹兵气势吓倒的宋玠未及与蒙古援军协商，第二天就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6年8月庚寅，9月己未：“庚寅，遣大将军柳庇如元，乞师且奏，避贼江华……己未，柳庇还自元。帝悉从所奏”。《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6年8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55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6年10月戊戌，11月甲辰、丁未、戊申、庚戌、辛亥，“辛亥，元遣平章事阔梨帖木儿来助讨哈丹，阔梨帖木儿遣人来告曰：‘国王宜留京城，以犒事吾’。”《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6年10、11月条。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抛弃京都奔入江华，郑仁卿也抛弃西京逃亡到江华。^①

由于战争形势不利于高丽，高丽世子便谒见蒙古世祖（其前年的11月世子到蒙古），请求讨蒙古伐哈丹贼。于是，蒙古世祖命令那蛮歹大王率领一万名军士讨伐哈丹。② 2月，世子使将军吴仁永报告蒙古世祖，说哈丹贼攻陷北界诸城，并请求派遣更多援兵。尽管去年末和今年初先后共派遣二万三千名援兵，但未得捷报，高丽还在请求派遣更多的援兵。因此，蒙古世祖质问道：“尔国唐太宗亲征尚不克，又于我朝初未归附，我亲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

吴仁永答辩说：“古今盛衰不同尔。”蒙古世祖便告诉吴仁永哈丹军不习夜战，高丽应避免实就虚。^③

另一方面，1291年4月，忠烈王为蒙古援军诸将军，即河西国王、庆重郡王、薛阁干、阁梨帖木儿、塔出、白帖木儿设宴犒劳。这时，薛阁干对忠烈王说：“今江南漕运未到，若临敌，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6年12月癸酉、丁亥、戊子，“哈丹兵数万陷和、登二州，杀人为粮，得妇女聚鹿而脯之。遣万户印侯御之。癸酉，元平章事薛阁干、阁梨帖木儿、右丞塔出等，率步骑一万三千来。丁亥，王避兵于江华御禅源寺，命知都金议司宋玠留守王京。戊子，玠弃京城，奔入江华，郑仁卿亦自西京逃来”。《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宋玠传。《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6年12月条。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编》，第608～609页，624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55～256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正月癸亥，“世子谒帝，请讨哈丹。帝命那蛮歹大王将兵一万讨之”。《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正月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2月丁亥，“世子令将军吴仁永奏帝曰：‘哈丹陷北界诸城’。帝曰：‘尔国唐太宗亲征尚不克，又于我朝，初未归附，我亲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云：‘古今盛衰不同尔’。帝谕以夜战”。《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正月条。

乏食奈何？”又对赞成事洪子藩说：“尔为相国，钱谷皆若所知，宜随处支給。”

对此，忠烈王指示说：“难之。发内库所储，可支。”

八天后，忠烈王为迎接那蛮歹大王和塔出元帅设宴慰劳。这时，那蛮歹对忠烈王说：“王亦可亲出御贼。”但王借口老病（当时五十六岁）拒绝出征。于是，那蛮歹说：“贼入室，岂以老病自安乎？”但是忠烈王未置可否。此后，那蛮歹派人对忠烈王说：“昨日辱临劳慰，敢不深感；但御贼之事，不答而去，予实惑焉。邻人失火，尚往救之，况是自家事，其可坐视乎？”^①

薛阁干和那蛮歹所云筹措军粮和请忠烈王亲率军队征伐敌人，这从蒙古的立场上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筹措军粮问题，这对引入外国军队讨伐侵略军但未准备军粮的高丽来说，是个大难题。先前蒙古为征伐日本而让高丽筹措军粮，亦未免无理。但不顾因荒年国内没有蓄米，拿出国库粮充用，是国王敷衍了事的态度。关于忠烈王亲征的问题，以老病为借口而辞，实为拒绝亲征。从那蛮歹大王角度来看，或者从蒙古的立场上看，高丽国王或征东行省左丞相同蒙古大王是同样的资格。然而，那蛮歹是自己率领军士而来，且是为高丽而三缄其口打仗的，而既是同等资格又是当事者的高丽王，却不想为自己的国家打仗，所以对此表示了不满。当乃颜举行叛乱的时候，蒙古世祖不也是亲征，忠烈王不也是率领援军亲自参加征伐的吗？

无奈，忠烈王指示中翼万户韩希愈和右翼万户金忻出兵。哈丹贼如洪水猛兽般地侵入了开京。高丽十分着急，因而又一次派遣吴仁永到蒙古，报告哈丹贼侵入开京的消息。5月1日，哈丹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4月辛巳、戊子、己丑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4月条。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贼下燕岐山，薛阁干大军和高丽军在正左山（燕岐）下合击，大败哈丹军。^①

这时，金忻（金方庆的儿子）在豸县境界同哈丹贼战斗，后敌至铁岭，大战一场。防守万户郑守琪因惧敌退到金忻营。于是，金忻同郑守琪一起制定了歼灭敌人的计划。因为铁岭路窄，只有一个人勉强能通过，所以，敌人下马，鱼贯而登。这时，敌人非常饥饿，正好得到郑守琪扔下的粮食，饱食几天，然后终于越岭侵入义州道，所以金忻也只好暂时得以避敌。

这时，薛阁干率援军前来会合，金忻便率领右军和薛阁干等合兵，在木州同哈丹军对峙。金忻从巡逻兵高文吕处得到敌人在燕岐布阵的报告，便派遣木奴赤等二十八人同高文吕一起去探听敌情。随后连夜率诸军沿木州走，黎明时到达燕岐，敌人的阵营正好在左边山脚下。诸军奇袭并包围哈丹军，敌大惊，据险逃亡入山。诸军前后夹击，敌因腹背受敌，全部弃马躲藏到树林里。诸军五百名步卒争先攻击，敌人势穷而溃散。当诸军追击到公州江时，敌人的尸体散布三十余里地，溺死者众多，只有一千余骑精骑渡江逃亡，诸军获得其妇女、衣服、鞍马、宝器等不可胜计。随后派人到朝廷告捷，忠烈王便派遣金忻到竹田追讨敌人余党。^②

元冲甲亦战功卓著。哈丹贼越过铁岭侵入诸州县后，诸州县望风披靡，纷纷沦陷。敌人趁机在原州布阵，有五十骑骑兵劫掠雒岳城，元冲甲率六名步兵追击，结果夺取了敌人的八匹马。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4月甲申、壬辰、甲午，5月丁酉朔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4、5月条。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席·一般史·中世史》，第256页。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24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附忻传。

敌人都刺鬃秃、于乃孛兰等率领四百名军士到城下夺走了禄转米，元冲甲又率领仲山等七名敢死士冲入敌中力战，敌人溃退。正好别将康伯松等三十人，与州官吏元溥同安守贞等一百余名国学生一起合力助战，从西峰下来夹攻，敌人受惊逃跑，自相踩踏而死，被斩者竟达六十九人，被射杀者几乎达一半。^①

韩希愈亦战果累累。韩希愈指挥的部队同蒙古的薛阁干军一起在燕岐取得了大捷。战斗中，老的（哈丹之子）父子等约二千名敌骑兵突破包围逃亡。这时蒙古那蛮歹将军的使者对薛阁干说：“贼魁未擒，不可不追。”而薛阁干却回答说：“如圣旨则可，何用穷追。”这样，就没有追击歼灭敌人。忠烈王一度令韩希愈追击敌余众，旋即召还其留镇江都。^②

罗裕因为哈丹贼将要攻打江华，在平壤遇见敌人，斩哈刺和桑哥二将军，将敌人击溃。旋在燕岐大战败之，余众逃亡到女真地。随后王又派遣罗裕到交州道追击余众，但因老的（哈丹子）越过竹山再次入侵平壤，所以，罗裕下船欲从陆路去攻打他们，但老的设伏兵袭罗裕军，罗裕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军士后退，并勉强登船。但李茂（郎将）等十人未能登船。这时，罗裕督励尚未登上船的李茂等竭尽全力战斗，立下奇功，还呼喊着激励他们不要可耻地当俘虏。李茂等躲避到山上，而敌将分其众合围追赶，飞矢如雨。到了夜晚，李茂啃着囊中的干粮督励军士们说：“男儿当死中求生，毋恐。”然后，张弓搭箭射中敌将喉咙，敌将应弦而倒，敌人魂飞魄散，纷纷溃逃。李茂等大呼追击，斩获甚众。^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附折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韩希愈传。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56页。

③ 参阅《高丽史》卷104，列传17，罗裕传。

第二十四章 哈丹入侵

印侯虽然以奸臣记载在史书中，但其在哈丹入侵时功劳很大。哈丹第一次入侵的时候，忠烈王召集大臣们议论抵御敌人的对策，印侯就说：“上亲将出东界，以断贼路，贼发阑入近境，上人江华，令臣等将兵御之”。

对此，忠烈王回答说：“民惟邦本，予岂先避以扰民心。贼虽长驱而至，予为三军之殿，以全社稷。”断然表明了其用意，然后派遣印侯到前线去抵御敌人。印侯在燕岐战斗中，同韩希愈和金忻一起击破敌人，取得大捷。^①

5月3日，哈丹动员三千骑骑兵过了铁岭，到交州驻扎。28日，哈丹和老的父子欲与蒙、丽联军展开最后的决战。印侯、韩希愈、金忻将军率军力战，斩首一千余骑，迫使哈丹率领二千余骑突围而逃。5月9日，韩希愈等三将军派人报告交州山城大捷；10月，薛阁干也派遣使者到高丽廷报捷，同时报告了哈丹已经纠集分散叛军逃亡的消息。敌余众一千余人等，因不知哈丹败走的事实，于同月14日侵略古东州（铁原），但听到丽、蒙联合军在燕岐击破哈丹贼的消息以后，便过铁岭（淮阳和安边之间）逃走。17日，平壤人击破其余党二百人。^②

哈丹贼叛军败走，边境重新恢复了安定。同月29日，薛阁干回军；30日，那蛮歹军回师。于是，由于哈丹贼而发生的丽、蒙关系也告了一段落。尤其是因为薛阁干军令严肃，士卒震慑，所过秋毫无犯。薛阁干在燕岐战斗中同哈丹贼对峙的时候，出其不意，两战皆捷，重挫叛军，扭转了战局。当其得胜回师时，忠烈王嘉许其功绩，欲设宴以表惜别之情，但他说：“受命事毕，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4，列传36，印侯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5月己亥、甲辰、乙巳、丙午、庚戌、癸丑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5月条。

不可留。”旋即班师回朝。^①

为肃清哈丹叛军余孽，6月1日忠烈王派遣金忻到竹田，派遣韩希愈到忠清道，派遣罗裕到交州道（即江原道），扫荡哈丹余贼。6月5日，韩希愈报告哈丹贼余孽五百八十人投降。这时，哈丹子老的带领余贼奔向平壤，罗裕狙击敌人，即将李茂伺机袭击，斩敌首级无数。^②

这样，哈丹贼入侵经过一年半（1290年1月～1291年6月）的时间，完全被荡平。蒙古派遣使臣黄兴（万户）用四十七艘船将十万石江南米载运到高丽，称赞和慰劳了高丽军民的功勋。7月，蒙古还同意了忠烈王还都开京的请求。^③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5月条癸亥、乙丑、丙寅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5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6月丁卯朔、辛未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6月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7年6月条甲申，“甲申，元遣使运江南米十万石来赈……秋七月……丁未，帝许王以十月入朝，且允还都之请”。《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7年6月条。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24页。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一节 人员交流

在丽、蒙关系史上，忠烈王至忠贞王（1274～1351年）止约八十年间，人员往来特别频繁。随着蒙古侵略高丽，出现了军队的接触、俘虏和流民的移动等，有了王室之间及权势家之间的联姻和以贡女等进行的民族融合，有了归化人及其就职等。

围绕军队、俘虏、流民及联姻等进行的人员交流，已在前做了说明，这里仅说明归化人及其就职问题。

蒙古称霸欧亚，占有亚洲和欧洲的广阔领土，同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接触大大加强，而且同欧洲人的接触也多了起来。以西藏为中心的喇嘛教，由于受到蒙古宫廷的信任和庇护，势力开始强大起来。而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回回教，影响，超过了西方的基督教。法王使臣在蒙古世祖允许之下，在蒙古大都建起教堂，从事布教活动。

随着东西方以宗教为中心开始交流，不久其交流的领域扩大到天文、数学、医学、艺术等方面，从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这样，与和世界文化同呼吸的蒙古建立密切关系的高丽，不仅有蒙古人员往来，而且还有世界性的人员往来，

物质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①

蒙古及西域人归化到高丽者为数不少。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印侯。印侯本来是蒙古人，其初名为忽刺歹。曾为齐国公主的怯怜口（Keling kou，私属民或私属奴婢），当过中郎将（各领设置的二名正五品的武官职）。其后因忠烈王要任命他为将军（高丽时代正四品的武官职，在二军六卫的各营中分别设置一名，恭愍王时改为护军），所以欲改成高丽式的名字。^②忽刺歹对大将军（高丽时代属于二军六卫的官职，同上将军一起组成作为会议机关的重房，恭愍时改成大护军）印公秀说：“吾与尔善，盖借尔姓。”于是改名为印侯。^③

张舜龙、车信、卢英、闵甫、王三锡、梁载、崔老星、契逊、韩复（一名拜住）、罗世等也是归化人。

张舜龙本是回回人，初名为三哥，其父卿因侍奉蒙古世祖而当了必闾赤（蒙古语为 Bichagchi，书记的意思）。三哥曾为齐国公主的怯怜口到高丽，后被授郎将，后来升为将军，这时亦改名为张舜龙。^④

车信也是齐国公主的怯怜口，初名为车忽闾。其母曾没入于蒙古，居住在蒙古大都，因为受宠成为齐国公主乳母。齐国公主

① 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第641页。

② 当外国人迁将军以上正四品时，名字非改成高丽式不可。

③ 印侯依仗齐国公主的宠信作恶多端。印侯有时在州县官侍宴国王的时候，因不先给自己饮食而发怒；有时国王要向臣下赏赐物品，竟加以阻止；有时还抢掠百姓的蜡烛。但在哈丹贼入侵的时候，也曾立下战功。《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幸1，印侯传。

④ 张舜龙不满忠烈王忱于游猎，在寿康宫设置道场聚集僧徒，责备国王没有功德，还在国王前同赵仁规动武。《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幸一，张舜龙传。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嫁到高丽后，车忽阁成为嬖臣随之，后累迁上将军，官至赞成事。^①

卢英的初名为式笃儿，是河西国人（西藏系统的党项人，Tangut）。到高丽后，官升至将军。虽然他曾为使臣到蒙古，以后未及返回而死，但其品性温厚、聪敏，颇知书礼，同印侯、张舜龙等类不同。

闵甫本也是回回人，归化到高丽后，到忠宣王时当了平壤府尹兼存抚使。

王三锡本是南蛮人，品性狡诈、狂躁。曾经跟随商船到大都，寄人篱下。忠肃王在蒙古的时候，王三锡通过嬖臣的关节而得求见，受宠于忠烈王，并随王到高丽，以医术得到王的宠信，并为王师傅。^②

梁载初名为将，是燕南人，因为依附于王三锡而得以被任用，所以，高丽朝野疾恨尤甚。王三锡死后，梁载回到大都。忠肃王去蒙古时，梁载又同张伯祥一起在王左右谄媚侍奉，得到宠爱，并被册封为佑文君，还被授予任免官吏的重任。

崔老星是色目人（白色人种）的一名富商，本名为堂里厮。他也通过梁载的介绍而被封为怀主君，为避众议，批目（任命官

① 车信依仗齐国公主的宠信殴打别人，惹怒忠烈王而下狱。《高丽史》卷123，列传36，嬖幸一，张舜龙附车信传。

② 虽然王三锡忌陷忠良，卖官鬻爵，甚至廷责台官，但依旧受宠信。《高丽史》卷124，列传37，嬖幸2，王三锡传。

吏的裁定书) 诡称其“百四岁老人崔老星”。^①

契逊初名为百辽逊, 是回鹘人(又称回訖、回回或者畏兀儿, 现维吾尔族祖先, 是居住在西域的民族), 因其祖先世代居住在契鞞河(指现在外蒙古的色楞河), 故以契为姓。

契逊从高祖父岳璘帖穆尔开始归附于蒙古, 世代做官, 其父亲哲笃官升至江西行省左丞。蒙古顺帝时, 契逊中进士, 任翰林应奉文字宣政院断事官, 并作为端本堂正字给皇太子讲授经典。后因受到丞相哈麻的猜忌而出守单州, 后居父丧而寓居大宁。此间, 由于红贼攻进大宁, 恭愍王七年为避战乱而东迁高丽。恭愍王在蒙古的端本堂侍从皇太子时, 曾经同契逊见过面, 是老相识。因此, 契逊备受恭愍王的优待而得赐家宅, 并被封为高昌伯, 后来改封为富原侯, 还在富原分配到水田和旱地。契逊在恭愍王九年(1360年)死后, 其所著《近思齐逸藁》流传后世。

其子以高丽末、朝鲜初名臣契长寿为首, 有延寿、福寿、庆寿和眉寿等。尤其是长子契长寿的倭寇防御策, 是具有现实性的方案, 但因未能采纳而被埋没。契长寿还在李成桂废禡王而立恭让王时, 带着禡王让位的文书使明, 也曾参与李成桂的谋议, 因而优遇有加, 但终因附于郑梦周而被罢免和流放。^②

韩复是蒙古人, 初名为拜住。蒙古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擢为进士第一名, 官升至枢密院副使。恭愍王十九年(1370

^① 梁载掌管官吏任免权, 同宦官一起卖官鬻爵, 于是, 前来请托甚众, 贿赂公行。据说, 当时依附梁载一派用钱得到官爵者, 达到一百多名。另外, 内臣一伙由于受到贿赂, 一到夜晚, 就避开人们的耳目, 躲藏在乡下人家中行注拟(罢免、任命官吏的内申), 批目下来以后, 对有关系者因争位不已而又涂掉又是重新填入, 批目简直无法辨别, 人们称之为黑册工事。《高丽史》卷124, 列传37, 驛幸2, 王三锡传附梁载及崔老星传。《高丽史节要》卷24, 忠肃王16年9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112, 列传25, 契逊传附长寿传。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年)，李成桂攻破兀刺山城，其时韩复在城中，有人告诉韩复曾为蒙古科举状元，就被带来见王。恭愍王厚待他，还任命其为判典农寺司（判典农寺的最高官职，正三品官），后来，官升至大提学。王赐姓名为韩复。韩复憎恨辛旽，精心侍奉李成桂，同在蒙古一起科举进士的高丽人李仁复及李穡与之相从唱和，当时参加科举考试者之八股文常得到他的校正。^①

罗世也是蒙古人，后归附高丽。在恭愍王时因击走红贼而成为二等功臣，而且在讨伐倭寇中也有很多功劳。尤其是禡王六年（1380年）8月，罗世在镇浦（锦江入口）之战中，同沈德符、崔茂宣等一起，以一百艘战舰沉没五百余艘倭船，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官升至版图判事门下评理。^②

另一方面，高丽人中也有到蒙古科举考试合格而做官的人。在蒙古的科举及第的人中，首推崔澐。崔澐是崔致远的后裔，因科举及第而授世艺文春秋检阅主簿，并于1321年（忠肃王八年）在蒙古科举及第而授辽阳路盖州判官。到盖州上任不久，因为地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2，列传25，韩复传。

^② 门下府是高丽时代总括国家行政的机构。高丽初，合三省称为内议省；982年（成宗元年）改称中书门下省。1275年（忠烈王元年），根据元朝要求改为金议府，将尚书省并入。品阶的变动也很大，以1061年（文宗十五年）为基准，从一品，中书令及门下侍郎；正二品，中书侍郎平章事及中平章事、门下评理；从二品，参知政事及政堂文学、知门下省事；正三品，左常侍、右常侍；从三品，直门下；正四品，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从四品，给仕中、中书舍人；正五品（佚）；从五品，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人；正六品，左补谏、右补谏；从六品，左正言；正七品（佚）；从七品，门下录事、中书注书。

《高丽史》卷47，列传46，禡王6年8月条。《高丽史节要》卷31，辛旽6年8月条。《高丽史》卷114，列传27，罗世传。李弘植著《国史大事典》，该书由百万社出版于1975年，第501页。

僻、事烦，他干了五个月便托病回国。^①

安轴因科举及第而授全州司录、史翰、司宪、纠正，并于1324年（忠肃王十一年）在蒙古因科举及第而授辽阳路盖州判官。这时忠肃王被扣留在蒙古，安轴便对同事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然后上书蒙古，诉王别无他义。忠肃王由此深为嘉许，并破格起用为高丽成均乐正，因而得以从蒙古回来。^②

李谷和李穡父子也很有名。李谷因在高丽科举及第而官升至福州司录参军、艺文检阅。并1332年（忠肃王后元年）因擢为征东省制科，破格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同时担任了高丽和蒙古的官职，在蒙古授徵政院管勾，又转为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这时，因为蒙古多次向高丽要求童女，李谷便请求御史台制止。其请求书中首先阐明：“四方荒徼，风俗各异，苟使同之中国，则情不顺而势不行也。势不行情不顺而善治之，虽尧舜不能矣。”又说：“则闻高丽之人生女者，即秘之，惟虑不密，虽比邻不得见。每有使臣至自中国，便失色相顾曰：‘胡为乎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军吏四出，家搜户扃，若或匿之，则系累其邻里，缚束其亲族，鞭撻困苦，见而后已。一遇使臣，国中骚然，虽鸡犬不得宁焉。及其聚而选之，妍丑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饱其欲，虽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每取一女，阅数百家，唯使臣之为听，莫或敢违。何者，称有旨也……。”据说，蒙古接到这一上诉后，遂嘉纳其言。^③

李谷之子李穡于1354年（恭愍王三年）因在蒙古科举及第而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此后，

① 参阅《高丽史》卷109，列传22，崔濬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09，列传22，安轴传。

③ 参阅《高丽史》卷109，列传22，李谷传。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兼任本国高丽和蒙古的官职。1362年（恭愍王十一年），担任蒙古征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后又担任征东省左右司郎中。

李仁复为李兆年之孙，忠肃王时以十九岁及第，调福州司录、选补春秋供奉、除起居舍人，而忠惠王时，因为在蒙古中制科而授大宁路锦州判官。后担任征东行省都事，又兼省员外郎。

赵廉亦因在蒙古科举及第而被任命为辽阳等路总管知府事。

此外，归化蒙古的高丽变节者人在蒙古任官职者也很多，其中，蒙古世祖时作为征东元帅之一而征伐日本的洪茶丘，是高丽叛逆洪福源之子。洪茶丘之子洪重喜也虽然多次为蒙古立功而居蒙古要职，但对高丽却带来了很多的危害。然而，在蒙古显至集贤殿大学士的洪茶丘之弟洪君祥，却为本国立下了很多功劳。^①

除此之外，陆五襄、康和尚、吃折思八八哈思（八哈思为蕃师之意）等是在蒙古当喇嘛僧而出名的高丽人。其中，吃折思八本是珍岛人，1271年（元宗十二年）在丽、蒙军队讨伐三别抄时，被蒙古军俘虏到蒙古，后投帝师剃发为僧。^②

第二节 贸易

丽、蒙之间正式的物质交流，有国信物和答礼物。高丽向蒙古输出的有：以人参为主的药材和黄漆、松子，以及玩赏和狩猎用的鹞（鹰属的一种鸟类，隼）、鹞（鹰属的一种鸟类，松鹞鹰）、鹰（鹰属的一种鸟类），作为工艺品的瓷器、环刀、纸、花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0，列传43，叛逆4，洪福源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元宗20年7月乙亥条。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44页。

席、苧布、螺钿漆器，和其他如豹皮、熊皮、虎皮等。尤其是高丽青瓷在蒙古视为珍品，故蒙古中书省向高丽送来公文要求进献青瓷器，高丽朝廷也时常向蒙古送去画金瓷器。^① 也为了顺应蒙古皇室的需求，还曾经设置过专制螺钿漆器的钿函造成都监。^② 特别是蒙古时常派遣的捉虎使、捕鹰使、采珠使等，骚扰吏民尤甚。

高丽为了答应蒙古的朝觐、馈遗（赠送东西）、国赈（国家赠送的礼物）等要求，贪得无厌地抢夺百姓的财物，家抽户敛，征科万端。于是，户口日减，国势益弱，高丽的基业终于衰落下来。^③

高丽对蒙古除了正式的物质交流以外，凡国有大事，用度不敷时，就通过科敛（赋课而增收）使百姓和官吏分担，以补充其费用。其中由于蒙古要求而向吏民转征的情况如下。

1275年（忠烈王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3月，蒙古使臣索要白金，但因此时高丽国库枯竭，转而向百姓征收白金，并要求大臣从二品以上各出八两，三品出六两，四品出四两，五品出三两，六品出二两，以使臣之求。

1278年（忠烈王四年，元至元十五年）正月，令大臣分等次纳草料，以饷济蒙古军忻都、洪茶丘军马。8月，又令大臣分等次纳白豆（喂牲口用的豆），以饷济忻都和洪茶丘军马。12

① 因元世祖时不让进献镶金瓷器，故其后停止进献。赵仁规曾经向元世祖进献镶金瓷器，世祖问：“画金欲其固耶？”仁规回答说：“但施彩耳。”世祖复问：“其金可复用耶？”仁规回答说：“瓷器易破，金岂可复用耶？”仁规回答说：“瓷器易破，金岂随毁，安可复用？！”世祖称许仁规言善，遂命曰：“自今瓷器毋画金，勿进献”。

② 参阅《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13年3月甲辰条。

③ 参阅《高丽史》卷77，志32，食货1。金库基《新稿高丽时代史》，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第570~571页。

第二十五章 丽、蒙之间的文化交流

月，因为诸重臣请求亲朝，令大臣五、六品以上分等次交细苧布，以充国赈。1289年（忠烈王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2月，因辽东发生饥荒，蒙古便派遣张守智等到高丽，让高丽筹办十万石军粮，并在次年春前送到辽东。于是，忠烈王便命令群臣分等次交米，独免即重臣、承旨以上七石，致仕（退职）重臣和三品以上五石，散官（无任相）重臣三石，散官五品八斗，侍卫将军和六品二石，七八品一石，九品八斗，军官、百姓、公私奴婢分为五斗和三斗，而富商则分为大户三石，中户二石，小户一石，各道也要分等次输米，东界和平壤二道。

即便如此，仍未达到蒙古的要求，无奈同年3月又再次征收。这时再次令群臣分等次纳米，重臣、承旨十三石，致仕重臣和显官三品十石，散官重臣四石，致仕三品和东西四品七石，致仕四品三石，东西五品六石，致仕五六品一石，东西七八品参上副使及僧录职事二石，东西九品和参外副使一石，队正八斗，近侍左右番二十石，茶房左右番二十石，上都监和五军二十石，阿闍赤三十石，禁内子馆十五石，鹰坊四番一百石，大殿忽赤三番一百石，巡马左右番一百石，汉语都监和官阙都监各二百石，国赈色、元成殿僚属、世子府僚属各十石，世子府忽赤三番二十石，商贾五石，金议府密直、重房、将军房三十石，典理、监察、军簿、闲道、典法、六卫、五部、观候、司天、詹事府十石，通礼门十五石，杂类五斗，诸寺社二百石，四大业一百石。^①

高丽接受蒙古的苛敛刻求后，竭尽全力调遣军粮，3月派遣将军吴仁永到蒙古报告已动员的军粮数，然后派遣吕文就等以四

^① 参阅《高丽史》卷79，志33，食货2，科敛条。《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5年2月丙寅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5年2月条。

百八十三艘船和一千三百十四名运船人，将六万石米转运到盖州。^①

同年8月，蒙古海都（蒙古名 Kaidu，元太宗窝阔台第五子合失子，因对继蒙古大汗位的太宗弟拖雷子孙愤愤不平，先在阿里不哥争夺世祖帝位时参加阿里不哥一派，后又同察合台汗结成联盟，并自称大汗，长期同元室抵抗，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死去）的军士侵犯边境，蒙古世祖决定亲征，并派遣阿且不花到高丽请求援军。于是，忠烈王命令万户金忻率领北征军赴辽阳行省，还让显官和前致仕权务分等次交帛布，以餉付北征军。^②

高丽从蒙古输入的物质，有绫绢、器物、书籍、香药、骆驼、孔雀、鹦鹉等珍贵赏玩动物。蒙古的交钞（从宋开始到金、元时盛行的一种纸币）流通到高丽，尤为值得注意。蒙古交钞主要流通中统、宝钞、至元宝钞，还流通至大银钞。这些交钞的流通，对高丽经济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③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入

高丽时代从蒙古传入并对高丽以来朝鲜半岛的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的，是木棉和火器。

^①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5年3月丁亥、辛卯条。《高丽史节要》卷21，忠烈王15年3月条。

^② 参阅《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15年7月癸卯，8月壬戌条。《高丽史》卷104，列传17，金方庆附忻传。《高丽史》卷79，志33，食货2。

^③ 参阅《高丽史》卷79，志33，食货2，货币条。

一、木棉的传入

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文益渐（晋州江城县人）当了正言以后，身负使命到了蒙古，开始依附于德兴君（蒙古名为塔思帖木儿，曾削发为僧，忠定王三年即1351年逃亡到蒙古，高丽人崔濡说服奇皇后诬告恭愍王，立德兴君为王并授在蒙古的高丽人以官职，征发辽阳行省一万军队渡过鸭绿江到随州随川，结果被高丽军打败）。德兴君失势后归国（大约是1364年9月至1365年1月之间）。在归国途中，文益渐得到约十粒的木棉种子，回来后一半给其舅舅（一说为丈人）郑天益让他试种，其余自己试种。

这时，因为不懂得培养木棉的方法和技术，几乎枯死，仅剩一茎活着。经过繁殖，第三年终于繁衍。^①

木棉本来是以印度为原产地传播到四方的，在中国又称之为吉贝。宋代通过南方和贸易大量输入中国，元初开始在江南栽培木棉，后来逐渐传播到北方，进而传入高丽。

1296年（忠烈王二十二年）蒙古成宗向高丽忠烈王随行人员赏赐的物品中就有四百一十一匹木棉绢。虽然不能确定这批木棉是蒙古原产还是舶来品，但恭愍时代木棉绢进入高丽当是无疑。^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1，列传24，文益渐传。《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德兴君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31，世家忠烈王22年12月辛亥，“辛亥，帝赐王金四锭、金段二匹、绫素段五百七十八匹、绢四百八十六匹……仆从木棉绢各四百一十一匹”。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46～647页。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汉城大学出版社，1985的，第770页。

如上所述，文益渐从蒙古带来了木棉种子，栽培其种子的人是郑天益和文益渐，而制造取木棉种子的取子车和抽木棉丝的纰丝车的人，也是郑天益。^①

有人认为，郑天益在制造取木棉种子的取子车（取子架）和抽木棉丝的纰丝车的时候，除了本人的努力之外，还得到了部分外国人的协助。也就是说，郑天益得到从印度来的胡僧弘愿的协力，第一次制造了去核车和取子车等纺织器具，成为棉花和棉布生产先驱。^②

另有人认为，一位蒋姓的元朝僧侣帮助郑城益制造了去核车，并且教给他制棉花方法。从此以后，高丽始以利用棉花。其后，文益渐之孙文莱制造出抽丝机器，文英则发明了织布的方法。所以，后世的人们称抽丝机器“文莱”，称织出来的棉布为“文英”。另外，还有文益渐长孙承鲁当义城郡守，他另外买田地教民众耕种法，并让有关的官吏继承了其田地，由此义城棉花名扬天下。^③

其后，高丽的棉花栽培迅速得到发展。经过长期的岁月，1369年朝鲜已经把布作为对外贸易品向女真输出，1423年还输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1，列传24，文益渐传，“奉使如元，因留附德兴君，及德兴败，乃还。得木棉种，归属其舅郑天益种之。初不晓培养之术，几槁，止一茎在。比三年，遂蕃衍。其取子车、纰丝车，皆天益创之。”

② 参阅《太祖实录》卷14，太祖7年6月丁巳，文益渐传。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647页。朝鲜国立出版社编《朝鲜中世史》（上篇），该书由朝鲜国立出版社出版于1954年，第333页。朴真奭著《中朝友谊三千年》，1984年，第197页。

③ 参阅开辟出版社编《朝鲜的伟人》，该书由开辟出版社出版于1921年，第48~49页。朴真奭著《中朝友谊三千年》，第197页。

出到日本。^①

二、火药制造及火器的传入

对我们的影响不亚于木棉的科学技术的传入，是火药制造及火器。火药制造法是在北宋的仁宗时候发明的，到了元代西洋技术的传入，已经发展到将火药放到筒状的炮里边发射，因而其威力更大。虽然蒙古在征伐日本的时候也已经使用了火药，但是，将其制作技术作为军事机密，没有传授给高丽。

高丽后来知道了火药的威力，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开发。崔茂宣被称为火药制造法最初的制作人，他主张利用火药对付倭寇。于是，每当见到从中国江南来的商人时，他就询问火药的制造法。有一次，他碰到一位懂得焰硝技术的叫李元的人，就请到家里提供食宿，并向他请教其制法。经过数十日，终于得到了其制造法的要领。然后，崔茂宣就让家童对此熟悉并试验其效力，结果获得成功。于是，1377（禡王三年）10月，他向政府建议设置火桶都监。^②

火器中重要的有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六火石炮、火炮、信炮、火桶、火箭、铁翎箭、皮翎箭、蒺藜炮、铁弹子、穿山五龙箭、流火、走火、触天火等。

^① 参阅朴真爽著《中朝友谊三千年》，第198页。泽村东平著《朝鲜棉作业的产生和发展》，第31~32页。

^② 参阅《太祖实录》卷7，太祖4年4月壬午条。《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晫传（一），禡王三年十月，“始置火桶部监，从判事内茂宣之言也。茂宣与焰硝匠李元同里，相遇之，善遇之。窃问其术，令家童数人习而试之。遂建白，置之”。《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京都下，军器寺条。郑以吾著《火药库记》。金岸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汉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1页。

与此同时，他还召集中国人开发了制造战舰的技术。战舰和火器由于在当时具有现代化武器的性能，所以，对高丽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①

^① 金庠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汉城大学出版部 1985 年版，第 772 页。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第 648 页。李弘植《国事大事典》，百万社 1975 年版，第 1773 页，火桶都监条。

第四篇

复兴的企图与灭亡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00 AVENUE OF THE ARTS
NEW YORK, N. Y. 10029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00 AVENUE OF THE ARTS
NEW YORK, N. Y. 10029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第一节 恭愍王的对外政策

从公元 1352 年到 1374 年，恭愍王共在位 22 年。在这 22 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朝统治高丽和中国百年之后，国力衰微乃至灭之。而在中华大地上失去统治国家权利的汉族，建立了新兴国家明朝，以之取代了元朝，重又统治泱泱中华。在此期间，恭愍王秉承高丽太祖决心收复高句丽故土建立强国的雄心壮志，一心想使高丽实现中兴。1363 年（恭愍王十二年）5 月，恭愍王给高丽朝野下达这样的训示：“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僚应倾心鼎力相助，事事力求实效，杜绝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使我朝得以中兴。”^①

恭愍王讳颙，古讳祺，蒙古讳为伯颜帖木儿，系忠惠王之弟。生于 1330 年（忠肃王十七年）。1341 年（忠惠王后二年），蒙古顺帝派使臣到高丽，把他召到蒙古，充当宿卫。所谓宿卫，原意为值宿，亦即夜晚值宿保卫皇宫。而他到蒙古宫廷当宿卫，则兼有作人质和留学增长见识之双重性质。当时，人们称他为太元子。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0，世家恭愍王 12 年 5 月庚午。

高丽外交史

他后来得以即位为国王，有一段曲折的经历。1348年12月，高丽忠穆王夭折之后，王煦等派李齐贤到蒙古，以国书向蒙古朝廷作了这样的建议：“忠穆王逝世时年仅12岁，没有后嗣。小邦（高丽）与日本相毗邻，不可一日无国王。而今，王祺（即后来的恭愍王）系宝塔失里王（即忠宣王）同父同母之弟，正在蒙古，年已19岁。而王眡系宝塔实利王之庶子，现在本国，年仅12岁。他们二人之中，究竟谁登上王位更好，请予选定为荷。”^①

1349年2月，蒙古朝廷借高丽前知都金议事崔濡从蒙古归国之便，让崔濡通知高丽朝廷：命人护送忠惠王之庶子王眡到蒙古。高丽庆阳府院君卢瑱、前判三司事孙守卿、前赞成事李君佺和崔濡等料定蒙古朝廷已选中王眡，都想陪送他去蒙古。当时，高丽典法官与台谏商议之后，一致决定不让他们陪王眡去蒙古，而崔濡等却执意成行。同年5月，蒙古顺帝下诏书，指定由王眡继承王位，而王颢（即后来的恭愍王）则继续留在蒙古当宿卫。

在此之前，忠肃王早就嘱咐尹泽要扶植王颢登上王位，尹泽遂于1349年（忠定王元年）与李承老一起上书蒙古中书省，请蒙古朝廷让王颢继任高丽国王。^②王颢此时在蒙古已与蒙古王室魏王之女宝塔失里结婚，即后来的微懿鲁国大长公主。

1351年（忠定王三年）10月，蒙古朝廷有意让王颢继任高丽国王，特派断事官完者不花到高丽，查封所有的仓库和王宫，收齐国税后，回到蒙古。而忠定王则避身于江华岛一段时间之后，于1352年（恭愍王元年）3月饮毒酒身死。忠宣王之子、

^①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恭愍王条，即位年4月己卯。《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条庶文。

^②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定王即位年2月甲戌，5月戊戌，7月丙辰。《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条庶文。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忠肃王之弟德兴君塔思帖木儿妒忌恭愍王，曾想诬陷和杀害他，在其阴谋败露后只好逃往蒙古。^①

这年12月，王颙与其妻子宝塔失里一同归国。蒙古顺帝派太子失秃儿和直省舍人牙忽一同护送他们。王颙归国后，在康安殿即位，是为恭愍王。

恭愍王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头脑明晰，在群臣中威望很高，多次有望登上王位，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次继任国王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形势是：在中国，元朝与明朝的交替即将成为定局。而在朝鲜半岛，红巾贼与倭寇不时骚扰；一些别有用心权贵的倚仗奇皇后之势觊觎王位；国内的田制、税制亟待整顿，纪纲亟待加强。他身为国王，决心处理好国内外这一切难题。

外交政策首当其冲，而他在这方面的构想，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他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如下重要的举措：

第一，高丽太祖二十六年，太祖曾向大臣朴述愍口述了《训要十条》，这是高丽治国的政治指针。恭愍王即位后谨遵太祖的遗训。《训要十条》第四条遗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它明确训示：“我国一直羡慕旧唐遗风，文物艺乐一直谨遵唐制。殊方异寺的人们性格各异，文物艺乐自然也就不同。契丹乃是禽兽之邦，其风俗与语言不同，衣冠制度也迥然相异，勿加模仿。”所谓旧唐遗风，指的是中国汉族的文化与风俗。谨遵旧唐风，也就是慕华思想。高丽太祖只倡导中国汉族的中华文化，将倭寇、蒙古、契

^① 参阅《高丽史》卷37，世家忠定王3年10月壬午。《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条庶文。《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德兴君条。《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崔儒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267页。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60页到661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

丹、女真等蕃族一律视为禽兽，教导后裔决不可仿效他们的文物制度。然而，在此之后，高丽屡受蕃族侵略，甚至不得不接受其统治，尽管内心深处十分厌恶十分不满，表面上却不得不加以顺从，不得不引进其文物制度，受到其感染和感化，而且长达一百多年之久。恭愍王这样再一次强调太祖《训要十条》的重要性，是想摆脱蒙古的文物制度和影响，以及蒙古在政治上对高丽的干涉。他即位伊始，就在康安殿宣读了致全国官民的即位训书。它一开始就列举了与蒙古的独特关系。然而，这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要全国官员和官民谨遵太祖的《训要十条》。

第二，防御倭寇。他在其致全国老百姓的即位训书中，列举了在国内施政方面要做到的保存祖业、提倡孝行、优遇元老、宗庙祭享、山陵奉行、民意上达、重用谏官、确立僧侣制度、救济贫民、听取田民诉讼和山林绿化等事项。^①然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揭示了朝廷对倭寇的政策。他指出，倭寇常常入侵边防，烧毁民宅，抢劫漕船（亦即税米船，运送国家征收大米船），犯下了种种罪行，而朝廷对此一直未采取有力的对策。他宣布：今后，重赏在这方面采取对策者。凡是在这方面立功者，允许其入军籍，给以官职。自发募集兵丁赶走倭寇抓获倭寇者，如是文武贵族，可擢升三等。来民如果不愿做官，赏以银钱。州与郡遭到倭寇侵略后，官府要根据情节轻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未参加抗御者以从事赋役和罚款等处分。军人如敢逃避兵役，应按其情节轻重处以杖刑。^②

第三，力图摆脱蒙古的影响。恭愍王把蒙古视为夷狄，对其

^① 恭愍王在国内政治革新方面，打算采取各方面措施，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方方面面此不。

^② 参阅《高丽史》卷2，世家太祖26年4月。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元年2月壬寅。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文化评价很低，强调必须从政治上摆脱其干预与统治。为此，他停止使用蒙古年号，^①排斥和处决那些倚仗奇皇后势力为非作歹的高丽叛徒，撤销征东行省理门所和五万户部体复使等机构和官职，加强了对其所属官吏的控制。

第四，努力恢复高句丽故土。为了收复失地和恢复高句丽故土，他在东北面收复了双城（永兴）、三撒（北青）二地，在西北面不满足以鸭绿江为国界，想把江对面的沈阳与辽阳均纳入高丽版图。当时，元朝任命沈王统治沈阳这一地区，而且通常任命高丽国王或王族为沈王。恭愍王此时便受命兼任了沈王一职。

1356年（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10月，蒙古派中书省断事官撒迪罕到高丽，追究高丽于夏天入侵蒙古领土的责任。恭愍王就此给蒙古中书省上呈了一份表章。他在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时，充分体现了他的构想。当时，撒迪罕来到高丽后，一方面强调高丽与蒙古的关系多年来如何密切，另一方面谈到这年夏天高丽军队入侵蒙古疆域，破坏了蒙古的驿站，使得蒙古边境地带的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他说，如果这是高丽在仓促之间酿成的事态，一时无暇向蒙古通报，那么在事后也应及时通报。他在提出以上抗议之后说道：“当然，这件事已经过去，高丽也已对蒙古表示歉意，也就算啦！蒙古皇帝也已宽恕了你（恭愍王）的失察。从今以后，可千万勿再发生这类事情！”

对此，恭愍王专门派政堂文学李仁复到蒙古，通过其上呈蒙古中书省的表章，传述其外交政策。在表章中，他首先谈到由于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6月乙亥，高丽停止使用元至正年号。《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6月，“遂停用至正年号。”恭愍王18年5月，高丽曾表示要停止使用元至正年号，其实早在恭愍王5年就曾废止过。《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8年5月辛丑：“辛丑停用至正年号”。

国内叛逆们肆行叛乱，而且嚣张到了社稷将倾圮的地步，他实在抽不出时间把事情报告天朝。他感谢天朝朝廷对他未多加责备，相当宽容。

在说了上述礼节性的套话之后，他对蒙古中书省作了如下的通报：

(1) 高丽朝廷已铲除奇辙（奇皇后之兄，倚仗其妹权势在国内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无恶不作）一伙逆贼，撤销了这些家伙辜负蒙古之恩肆意牟取私利的理门所和都镇务司、儒学提举司、医学提举司等官府。

(2) 蒙古世祖征伐日本时，只设置了万户、中军、右军和左军，后来，增设了巡军，而合浦（马山）、全罗、济州和西京（平壤）等地万户府，都没有其管辖的军队，实际上名存实亡。而奇辙这一伙则利用它大搞名堂。所以，微臣已下令撤销了后来设立的五个万户府，只留下蒙古世祖设立的三个万户府。

(3) 蒙古朝廷派到高丽的使臣和蒙古府、寺院和监事派到高丽者，大多是在蒙古的高丽人。他们来到高丽后，不思广布蒙古之仁德，而是牟取私利、图谋报复、侮辱国王和大臣、霸占民女，而且赖在高丽不走，往往呆上一年多，请天朝制止他们的为非作歹。

(4) 撤销了蒙古枢密院派来的体复使，禁止蒙古的宣徽院、资政院、将作院、大府监、利用监和太仆司等机构派来的官吏胡作非为。

(5) 土产品也要定量。对高丽某些人私自输出的土产品进行限制。

(6) 女真人从泥城、昌城等地山谷闯入高丽境内大肆掳掠，请阻遏其胡作非为。

(7) 德兴君塔思帖木儿怂恿忠宣王庶子随意蛊惑百姓，请将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其人等遣送回国。^①

由于认为西北面和沈阳、辽阳都是高丽的领土，恭愍王曾于1356年（恭愍王5年）6月，派印珪率军越过鸭绿江，攻打过婆娑府（九连城）等八站。恭愍王始终坚持这样的主张：西北面鸭绿江那厢的沈阳与辽阳，乃是高丽的领土。^②

第二节 蒙古国内起义事件与高丽援军

追溯起来，在恭愍王即位之前，蒙古对高丽的干涉是令人寒心的。

13世纪后半叶，高丽忠烈王即位之后，蒙古对高丽大加干预。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③和行省，干预王位继承，甚至连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五年10月甲寅。《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10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6月，癸丑。《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8月己巳；11月丁亥；12月丁巳；20年闰3月己未；21年3月庚戌。

^③ 达鲁花赤是蒙古的官职，可译为镇守官、断事官、地方官厅长官等。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治理占领区百姓的达鲁花赤；另一种是干预整个国事的达鲁花赤。从元朝派到高丽的达鲁花赤看来，1231年（高丽高宗18年，元太宗3年）撒礼塔率军入侵高丽，曾在西京（现在的平壤）等地安排了72名达鲁花赤。这一事实，《元祖秘史》作了记载。这些达鲁花赤，属于前者。高丽投降元朝后，元朝于1270年（元宗11年）派了属于后者的达鲁花赤到高丽。此外，还安排了副达鲁花赤。这些达鲁花赤不是直接干预高丽的内政，而是对国王的错误进行忠告，解决居住在高丽的元朝官吏与高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处决对元朝犯罪的高丽人。然而，他们按元朝的命令行事，不像近代的总督那样可以独自行使职权（在第16章第1节已作了说明）。参阅李弘植著《国史大事典》，该书由百万社出版于1975年，见其第364页。

高丽国王休假也得经蒙古的准许。总之，高丽主权一直受到蒙古的多方制约。

高丽在武臣掌握政权后，不断对蒙古提出抗议，努力维护国家主权，确曾保持了独立自主的状态。然而，自从武臣独裁与三别抄的势力被摧毁之后，高丽朝廷变得很软弱，王室与权贵们沉湎于骄奢淫逸，一代代国王维护不了国家的主权，事事听任蒙古进行干预，乖乖地服从蒙古的调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不仅如此，有一个时期，高丽的王位变动十分频繁。

由于蒙古的干预，1298年正月，忠烈王让位，忠宣王即位并在位17年；1330年，忠肃王让位忠惠王即位；1332年，忠肃王复位，复位达8年；1340年忠惠王复位，复位5年；1344年，忠穆王8岁即位，在位4年；1348年，忠定王即位，在位3年；1351年，恭愍王即位。总的来看，这几代国王都可以说是短命的统治者，像走马灯一般更替得很快。

尤其是忠惠王作为世子在蒙古之时，与蒙古丞相燕帖木儿过从甚密，但与另一位丞相伯颜的关系则非常冷淡。忠惠王被废黜复又去蒙古时，燕帖木儿业已作古，伯颜则权重势大炙手可热，忠惠王备受伯颜的冷遇与蔑视。在此后的五年间，忠惠王自己也不争气，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影响极坏，竟然被从蒙古撵回了本国。三年后，忠肃王殁世。忠惠王采取送贿的手段巴结蒙古朝廷权贵，旨在重登王位。然而，蒙古丞相伯颜还是厌恶他，向蒙古皇帝推荐让沈王王暉继位。当时，沈王党羽为了不让忠惠王复位，曾怂恿沈王王暉与曹颀在平壤密谋动武，然后起兵袭击京城。失败后，曹颀被抓住处决，沈王暉则从平壤逃回到蒙古。沈王暉想以武力登上王位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他的党羽仍不死心，向蒙古中书省诬告忠惠王。蒙古中书省于这年冬天抓住忠惠王，进行了审讯。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这时，曾经鼎力扶助沈王的蒙古丞相伯颜罪行败露。权簿等便趁机多次上书蒙古中书省，请求让忠惠王复位。翌年3月，蒙古方才接受了权簿等人的建议，让忠惠王复位。然而，忠惠王复位后不是洗心革面，同以往一样依旧做尽坏事，弄得国库空空如也，而忠惠王私人仓库宝兴库却百宝杂陈。忠惠王手下的那些幸臣也趁机大捞一把，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对忠惠王的非难自然而然传到了蒙古中书省。忠惠王便又被蒙古使臣抓起来带到燕京，而后被流放于遥远的揭阳县。忠惠王最后死于该处。

忠惠王八岁的儿子王昕（王妃德宁公主所生）继父即位，是为忠穆王。他在位仅四年便夭亡。其同父异母之弟王晷（禧妃尹氏所生）继而即位，是为忠定王。蒙古朝廷对忠定王的叔父江陵大君王颙很欣赏，便于忠定王三年10月废黜了忠定王，由江陵大君取而代之，^①是为恭愍王。

由上可知，当时高丽一方面受蒙古的外来干涉，另一方面因朝廷内王室骄奢淫逸和逆臣趁机肆行叛乱，而呈现出穷途末路的迹象。恭愍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位贤君的胆略，采取各种举措，挽狂澜于既倒，力图实现国家的中兴。

另一方面，蒙古也像高丽一样，国势日益衰颓，末期败亡症状日渐清晰。由于多年来内乱不止外征不休，蒙古的财政已捉襟见肘。加上由于皇位频繁交替，每次登极的皇帝即位前，权臣必大肆骚动要尽手腕，纲纪也已松弛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蒙古世祖执政了三十二年。驾崩之后，成宗于1294年（忠烈王二十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即位。成宗在位13年，于

^① 参阅震坛学会编《韩国史·中世篇》一书的第639页至640页。该书由乙酉文化社出版于1973年。参阅《高丽史》有关王的有关年月条。参阅本书有关章节。

1307年（忠烈王三十三年）1月驾崩。成宗的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太子和右丞相答剌罕院使别不花，在与高丽忠宣王商议之后决定迎立怀宁王海山为帝，而左丞相阿忽台和平章八都纪辛等则主张拥立安西王阿达难，并为此企图使用武力。太子得知后，派人把阿忽台等抓了起来，指使大王都刺院使别不花和忠宣王杀死了阿忽台等。同年5月，太子等推戴皇侄怀宁王即位，是为武宗。^①

蒙古武宗听任脱脱等窃取权力为所欲为，他仅在位四年就于1311年（高丽忠宣王三年）1月去世。仁宗于同年6月即位。仁宗在位也仅仅9年，便于1320年仙逝，由英宗继位。仁宗和英宗在位时，铁木迭儿掌握了朝政大权，其义子铁失依恃父势飞扬跋扈，竟弑害了英宗。英宗在位仅仅三年。铁失于1323年迎立世祖的重孙泰定帝为皇帝。不久，铁失被处以死刑。泰定帝在位仅仅五年便于1328年7月殁世，武宗的次子怀王于8月即位，是为文宗。文宗以燕帖木儿拥立有功，封之为右丞相。燕帖木儿飞扬跋扈，文宗仅仅当了一年的皇帝便让位给周王，这就是明宗。明宗即位不久就于当年8月病死，文宗随即复位。文宗在位三年，于1332年8月撒手人寰。10月，明宗的次子郕王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时年仅7岁，只当了三个月皇帝即夭折。蒙古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顺帝，于1333年6月即位。顺帝在位期间，以伯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忠宣王条，忠烈王33年8月辛未。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颜为丞相，伯颜掌握了朝政大权。^①

皇帝本是一个国家的最高主宰，在国政的运行方面起着中轴作用。蒙古的皇帝如此频繁更迭，说明其国运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319年（忠肃王六年，元顺帝至正三年）起，汉族的各路英豪便在各地纷纷举起了造反的大旗。朱光卿在这一年自立于广东，定国号为大金。1348年（忠穆王四年，元至正八年），方国珍在浙江台州率众起义。1351年（忠定王三年，元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和刘福通在江南起义。徐寿辉则在安徽和湖北率众造反，气势颇大，自立为皇帝，定国号为天完。徐寿辉手下的得力助手陈友谅、倪文俊、明玉珍等领兵攻占了不少地方。陈友谅杀死徐寿辉，在江州（江西九江）自立为皇帝，定国号为汉。明玉珍领兵占领四川后，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建国，自称夏国王。

1353年（恭愍王二年，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在江苏地区起义，盘踞高邮（江苏省高邮），定国号为大周，自称诚王。1352年，郭子兴在安徽北部崛起，其部下有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等。

另一方面，高丽恭愍王即位初，倭寇常至高丽掳掠。蒙古中书省闻报，于1352年（恭愍王即位年，元至正十二年）4月，援助高丽不少弓箭与大刀等。6月，又应高丽朝廷的请求，援助各种各样的兵器。高丽朝廷对此表示了谢意。^②

然而，到了1354年（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6月1

^① 参阅《高丽史》卷33，世家忠宣王条，忠烈王33年。《高丽史》卷34，世家忠宣王3年1月庚辰，3月癸卯。《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7年2月丙寅；10年9月戊戌、丁巳；15年7月庚寅，9月壬申；16年4月、8月。《高丽史》卷35，世家忠肃王后元年8月、10月、12月；后2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即位年4月丁未，6月己酉，11月乙酉。《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即位4月、11月。

日，蒙古反而要求高丽派军队援助它。也就是说，高丽的平康府院君蔡河中自蒙古回高丽之后，转达了蒙古丞相脱脱对高丽的要求：“我奉命率军去征伐南方，请高丽国王派出精锐将士助战。”

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已风雨飘摇。河南的韩山童和韩林儿率众起义，声势不小。颖州的刘福通率领的起义军以红巾为标志，人称红巾军，声势浩大。刘福通与其部将关先生、沙刘二、王士诚等占领不少地方后，分兵赴山东建立了根据地。其余地区的汉族也都闻风揭竿而起。一些盗贼见有机可乘，加入了这一行列。总之，中国内地一片混乱，群雄并起，战乱不休。^①

这年6月10日，蒙古任命定住为右丞相，哈麻为左丞相，并且行文于高丽，说明他们将率领军队赵各地镇压叛乱。6月13日，蒙古派吏部郎中哈刺那海和崇文监少监伯颜帖木儿（高丽人，原名康龙舜）等到高丽，与柳濯、廉悌臣、权谦、元颢、罗英杰、印瑄、金镛、李权、康允忠、郑世云、黄裳、崔莹、崔云起、李方实和安佑等，募集了西京（平壤）水军300名和一些勇猛之壮士，于8月10日汇集于燕京，准备去攻打张士诚的起义军，脱脱对高丽朝廷发出的出兵援助要求，则由蔡河中作为贺千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3年6月辛卯：“平康府院君蔡河中还自元，传丞相脱脱言曰：‘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锐以助之。’”《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3年6月。《高丽史》卷111，列传24，廉悌臣传。《高丽史》卷111，列传24，柳濯传。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秋节使去蒙古回高丽之后，被高丽朝廷所欣然接受。^①

6月16日，蒙古派工部侍丞朴塞颜不花到高丽，向高丽的援军发放了六万支箭矢。6月21日，高丽给自愿参加援军者连升了三级，并且让百官和僧徒献马，给援军将士使用。这年7月，柳濯、廉梯臣和崔莹等40多人率领高丽2000名援军开赴蒙古。当时，经蒙古顺帝指名调去的将帅与宰相都是高丽的名流，援军士兵也都是精兵。恭愍王在他们开赴蒙古燕京之后，生怕高丽边防因缺乏人手而趋于虚弱，便从西海道募集了不少弓箭手，加强了高丽的警备力量。

这年11月，印安从蒙古回到高丽，奏报朝廷道：“太师脱脱率领八百万大军攻打高邮城，以柳濯等指挥的高丽援军和在燕京的两万三千名高丽人为先锋，在高邮城行将陷落时，鞑靼知院老长生怕高丽将士立功，竟然下了这样的命令：‘今天天色已晚，明日再攻下此城！’将士们只好退去。当晚，敌人加固城防。次日，我军再次攻城未能取胜。这有人弹劾脱脱，蒙古顺帝竟将脱脱流放于淮安。”作为高丽年轻将领参战的崔莹，先后血战27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3年6月庚子、癸卯。《高丽史》卷111，列传24，廉梯臣传：“蔡河中在元谋复相，会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说太师脱脱，请还国出兵助征，仍荐梯臣有勇略。梯臣知之，上疏自退。王亦逼脱脱势，以河中为政丞……”《高丽史》卷111，列传24，柳濯传：“元将南征红巾等贼，求勇士。蔡河中荐濯及廉梯臣等40余人有勇略。元遣使召之，濯等率兵千如元，从太师脱脱征高邮贼张士诚，连战，颇有功。”《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恭愍三年，拜大护军，与柳濯从元丞相脱脱等征高邮。”《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1，蔡河中传：“河中在元，谋复为相。会元南征红巾等贼，旁求勇士，河中请还国出兵助征，及荐政丞柳濯、廉梯臣等有勇略。遂与李寿山来传丞相脱脱言云：‘两国相互已久。今汉贼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锐以助之。’寿山宣帝旨于王曰：‘河中请谏可使。’河中亦传旨曰：‘寿山颖悟可使。’王期之，既而复为政丞。”

次，即将攻破高邮城。然而，脱脱一被诬告，高邮之战也就不了了之。^①

脱脱被流配之后，蒙古南征军由泰不花担任统帅。从此，蒙古军队的气势屡屡受挫，而汉族起义军的势力则日益壮大。

1355年（恭愍王四年，元至正十五年）1月，蒙古军队抓获韩山童与韩林儿，立即将他们处决，丞相脱脱这才得以免受责罚。

张士诚起义军战斗力很强。高丽援军攻打高邮等地，攻陷六合城（江苏省六合县），移师淮安路，在八里庄与张士诚起义军交锋。泗州、和州等地的起义军以八千只船包围淮安城，高丽援军与蒙古军队夜以继日血战，才把起义军赶走。没过多久，起义军又来攻打淮安城，高丽援军与之对阵，李权和崔源等六位将军阵亡。崔莹多处受伤，力战胜之。随后，征南万户权谦和元颢、印璠、崔莹等，于这年5月归国。^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3年6月辛亥，7月癸亥，11月丁亥。《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3年6月、7月、11月。当时，参劾脱脱者是平章政事哈麻（色目人）。翌年，脱脱被放逐于云南，不久即被杀。参阅《元史》顺帝14年10月丁卯、辛未：“丁卯，脱脱领大兵至高邮。辛未，战于高邮城外，大败贼众。……乙酉，脱脱遣兵平六合县。……十二月辛卯，监察御使袁赛因不花等启奏：‘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修。”

^②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4年正月庚午、5月壬子。《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参阅金库基著《新稿高丽时代史》一书的第589页，该书由汉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

第三节 恭愍王的反蒙政策

恭愍王于1351年即位。这一年，为蒙古顺帝至正十一年。其时，蒙古国势大衰。前面说到的朱光卿、方国珍、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在中国各地起义，郭子兴和张士诚等起义军的声势也不小。蒙古朝廷眼睁睁看着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般遍及南北各地，却已无力收拾这一局面。恭愍王以下高丽君臣，身受北方蕃族干涉与压制已久，也很想摆脱其羁绊，不再受那种低三下四的窝囊气。

要想摆脱蒙古的牵制和干预，首先就得铲除国内专门依恃蒙古势力飞扬跋扈的恶势力，就得在政治上摆脱蒙古朝廷的左右。于是，恭愍王决心摒弃蒙古的文化，亦即摒弃蒙古式的辫发与胡服，弘扬自太祖以来历代先王遵奉的高丽传统文化。1352年（恭愍王元年）1月，监察大夫李衍宗向恭愍王进谏道：“辫发与胡服非先王相传之制度，君臣不宜效仿。”恭愍王一听大喜，当即解开辫发，赐给李衍宗一套衣服，称赞李衍宗敢于进献忠言。辫发，蒙古语为怯仇儿，又称开悌剃头。所谓开悌，就是剃头至额，方其形留以其中。忠烈王四年二月，忠烈王命令高丽境内皆服上国蒙古衣冠，至恭愍王即位之时，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悌，已成习俗。^①

恭愍王有了这种想法，又听了带领高丽援军参加讨伐张士诚起义军之后归来的柳濯和崔莹等的奏报，深知蒙古势力已相当虚

^① 参阅《高丽史》卷72，志26，輿服1，冠服通制。《高丽史》卷27，元宗12年6月丙申。《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元年正月。

弱，便积极地推行反蒙政策。

恭愍王推行其反蒙政策的下一个课题是铲除奇氏一伙恶贼。奇氏一伙之所以敢于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在于依仗出身于高丽的奇皇后的势力。说起这一伙人的掳掠行径，实在是令人发指。

奇皇后本是奇子敖最小的女儿。当年，奇子敖把她作为贡女送到了蒙古朝廷。她十分机灵，博得了蒙古顺帝的欢心，蒙古顺帝的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因而很妒忌她。1335年，答纳失里皇后之兄唐其势因谋反被诛杀，答纳失里皇后也被丞相伯颜弑害。于是，蒙古顺帝想立奇氏为皇后，因丞相伯颜大加反对，顺帝也就只好作罢。

1340年（忠惠王后元年，元至元六年），伯颜失势被放逐后，蒙古顺帝终于立奇氏为第二皇后，第一皇后是伯颜忽都弘吉刺氏，史称完者忽都皇后。奇氏被立为第二皇后之后生下了皇太子爱犹识理达腊，蒙古顺帝遂册封奇皇后之父奇子敖为荣安王，赐给谥号。1343年（忠惠王后四年，元至正三年）10月，奇子敖之妻、奇皇后之母李氏被封为荣安王大夫人。^①在此之后，奇皇后之兄奇辙和奇辇等四人分别得到了蒙古和高丽的官爵，他们以奇皇后为靠山，权倾朝野。

从忠惠王在位时起，高丽国王便不时地去荣安王大夫人府邸拜访。据史料记载，忠惠王亦于其在位第三年8月辛丑、四年4月甲辰去拜望过。忠宣王于其在位之元年8月丁巳去拜望过。恭愍王即位后，也不得不去拜望她好几次。

1353年（恭愍王二年，元至正十三年）1月和5月，恭愍王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5，忠惠王4年冬10月：“元遣资政院使高龙普、太監朴帖木儿不花，赐王衣酒，又赠奇皇后父子敖为荣安庄献王。母李氏为荣安王大夫人。”《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高丽史》卷111，列传24，柳濯传。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又曾向荣安王大夫人请安。这年8月，蒙古派蛮蛮太子和安定平章到高丽。为荣安王大夫人摆设了孝儿札宴。举办孝儿札宴是蒙古的风俗，其内容是一家人和至亲聚集在一起祝贺子孙繁昌亲密。恭愍王应奇辙等的要求，请蒙古皇帝派蛮蛮太子和安定平章前来参与。恭愍王在表章中写道：“听说蒙古法律有所谓‘孝儿札’之说，将姻亚（女婿之父，是亲家，亦谓之姻。女人姐妹之丈夫，是连襟，亦谓之亚）之欢愉合在一起为子孙祝福。昔日已有此风俗，今日怎可不遵循？倘若陛下允许臣为太夫人李氏举办这一盛大宴会，广施圣恩，则奇氏九族（所谓九族，即曾祖、祖父、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这一直系亲属以及高祖四代孙之兄弟、从兄弟至三兄弟等旁系亲属，指的是同宗至亲和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将和和睦睦，济济一堂感恩不尽，发誓永远不忘圣恩，竭尽高丽之至诚，祷告苍天祝吾皇永远长青不老。”^①

顺帝当即应允，特派蛮蛮太子、定安平章等到高丽为荣安王大夫人设孝儿札宴。恭愍王与鲁国公主（蒙古宗室、魏王之女）也到延庆宫躬逢其盛。鲁国公主与太子坐在南面的上座，恭愍王坐在西面，李氏坐在东面。开宴之后，恭愍王坐在西面。李氏坐在东面。开宴之后，恭愍王满满斟一杯酒，跪在地上向太子敬酒。太子接过酒杯，站起身来一饮而尽。然后太子斟酒献给李氏。接着，太子向恭愍王与鲁国公主敬酒。宴会将结束之时，使者的仆人坐到西面的台阶上，护卫者们坐在东面的台阶上，争吃羊肉牛肉，比个高低，以之为娱乐，这是一种以吃得多加喝得快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2年1月丙子，8月庚子、乙巳、丙午。《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2年8月。

者为赢家的游戏。宴会结束之后，全体赴宴者下到庭院里，联袂而立，使者在西面，奇辙和权谦等在东面，分别唱跳蒙古歌舞。然后，齐集院子中央，抓住一匹绞丝，围立而且歌且舞，转上三圈到四圈。有人将这匹绞丝剪成一段一段分赐给众人。举办这个宴会，光是札花用的布就用去 5140 匹，其他物品也用了不少。于是，市面上的物价为之而暴涨。当时，公私宴会和齐筵一律禁用油、蜜和水果。由于国库业已空虚，只好由永福都监献出 2600 匹布。同时，让一些富翁献出了其他物品。

翌日，恭愍王去太子馆舍举行了防没宴。根据蒙古的法规，孛儿札宴用过的牛肉羊肉，应留在次日再一次设宴，称之为防没宴。从这时起，一直到奇氏败落时为止，蒙古朝廷派使者到高丽为大夫人设宴成了惯例。从表面上看来，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害处。高丽朝廷为此专门给大夫人李氏设立了李氏府，并且称之为庆昌府，对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①

奇皇后既机敏又聪明，极受蒙古顺帝的宠幸。她经常读《孝经》与历史书籍，以历史上各朝代皇后的贤淑为榜样。一有佳肴珍馐，她便让手下的人先拿去太庙供祖先享用，然后才吃，从未自己先尝过任何美味佳肴。正宫娘娘弘吉刺生过皇子真金，却于两岁时夭折。奇氏所生之皇子爱犹识理达腊于 1353 年（恭愍王二年，元至正十三年）6 月成为皇太子。这样一来，奇皇后在皇室中的地位便更加巩固。两个月后，亦即这年 8 月在高丽举行前面提到的孛儿札宴，实际上是上与太子的册立是分不开的。

奇氏一家人与蒙古皇室的关系很密切。1355 年（恭愍王四年，元至正十五年）1 月，奇辙由辽阳行省左丞被提升为辽阳行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8，世家恭愍王 2 年 8 月丙午，《高丽史》卷 131，列传 44，叛逆 5，奇辙传。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省平章政事。这年8月，皇太子爱犹识理达腊派月鲁帖木儿到高丽为大夫人李氏，亦即自己的外婆举行了宴会。^①

这时，奇辙写了一首盛赞这一宴会的诗，在诗中对恭愍王竟不以臣自称。9月，蒙古朝廷派资政院使姜金刚吉思到高丽为荣安王大夫人设宴。1356年2月，恭愍王到庆昌府探望荣安王大夫人。5月，奇辙在蒙古派其侄子奇完者不花到高丽，传元朝顺帝之命令，册封奇皇后的父亲奇子敖为敬王，并且追尊其祖上三代为王。这年4月16日，蒙古顺帝下令，加封奇辙为大司徒。^②

当时，与奇辙一伙沆瀣一气的还有权谦和卢頔等。权谦于1352年8月将女儿献给蒙古皇太子，而被册为大府监大监。卢頔于1355年5月把女儿献给蒙古顺帝，而成为集贤殿学士。他们都在蒙古廷受到了特殊的礼遇，真不知羞耻为何物。

奇辙与权谦和卢頔狼狈为奸。奇辙后见天下大乱，便暗自寻思：“平日作恶不少，已是民怨沸腾。倘若有朝一日失去了权势，恐怕保不住这条小命。”于是，他绞尽脑汁琢磨如何自保。他把至亲与心腹安排在机要的官位和要津，结党营私，妄图有朝一日掌握朝廷大权。为此，他们曾去各道检查兵器，假托蒙古使者之口传播小道消息，蛊惑百姓，伺机举事，夺取高丽政权。

恭愍王一方面常去荣安王大夫人府邸请安，为她设宴并祝福，另一方面密切注视奇辙兄弟的所作所为，注视蒙古朝廷对奇辙之父奇子敖及其三代祖宗的追封，注视着权谦和卢頔等依恃奇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2年7月乙亥；3年10月乙未；4年8月癸亥。《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4年8月。当时，恭愍王与李氏坐在南面，奇皇后之妹、赵希冲之妻坐在东面，奇辙和月鲁帖木儿坐在西面，宾主按规矩分别落座。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3年10月；4年8月癸亥，9月甲申、壬寅；5年5月戊子。《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3年10月；4年8月、9月；5年。《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

氏与蒙古皇室拉上姻亲关系的丑行和对朝廷的无礼行径气愤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尤其是他志在使高丽中兴，如果听任奇辙、权谦和卢颐等为所欲为卖国求荣，又怎能实现这一愿望呢？于是，他意识到当务之急，乃是铲除奇氏这一伙狐群狗党，扫除前进途中的绊脚石。

恭愍王得知奇辙、权谦和卢颐等妄图举事夺权之后，制订了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计划。他以设宴款待重臣的名义，让判密直洪义和宰臣裴天庆等去邀请奇辙、卢颐、权谦、奇有杰（奇辙之子）、奇完者不花（奇辙之侄子）、权恒（权谦之子）、和尚（舍人）和卢济（卢颐之子）等赴宴。奇辙与权谦首先到达。密直庆千兴、黄石奇和判事中青等秘密奉禀恭愍王：“他们二人已经到达，而卢颐父子及奇辙、权谦的儿子和侄子尚未到达，如果事情被泄漏出去，情况必然不妙，不如立即下手。”恭愍王觉得言之有理，便让密直姜仲卿、大护军陆仁吉、于达赤和李蒙大等将刀斧手一起动手。奇辙被当场杀死。权谦见势不妙，慌忙逃走，被追杀于紫门。奇辙的两名仆人也处决，其尸体被扔在朱桥下。奇辙与权谦死党见势不妙，狼狈不堪四处奔逃。禁卫四番的军士则一齐出动，用矛与剑与对手交战于路口街头。姜仲卿等率领军士冲进卢颐府邸，将卢颐杀死，暴其尸于北家洞街上。奇有杰与裴天庆一起一到王宫，在途中听说发生变故，立即逃跑并藏匿起来。奇完者不花、卢济、权恒、和尚及其同伙也都纷纷逃走，各自藏匿起来不敢露面。恭愍王当即命令京城内外有关官员带兵进行搜索与逮捕。奇辙、权谦与卢颐这三家的奴婢，也被全部抓了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起来。^①

当天，亦即5月18日，恭愍王发出教示：“奇辙、卢頔、权谦等人……倚仗权势，蔑视国王，陷害官吏，荼毒百姓，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孤与蒙古王室结亲，一向尽力迁就他们，而他们得寸进尺，竟然图谋不轨，必欲使国家岌岌可危而后快。多亏天地神明和祖宗英灵保佑，奇辙等均已罪有应得。其一伙之中的逃逸者和奇有杰、奇完者不花、卢济、权恒、和尚等也是罪不容赦……奇辙等所霸占的人和土地一律归还其主人。

此后，所有逃走的罪人全部被抓获和处决。被这一伙人霸占的土地和抢走的人丁亦悉数归还原主。^②

1356年（恭愍王五年）6月，恭愍王不再使用蒙古的年号至正。这是他摆脱蒙古桎梏的又一举措。当时，恭愍王所下达的教示是这样写的：“近几年来，国之不国。奇辙等一味仗势揽权，一手遮天，凌君害民，无视国法，控制官吏的任免和转补，左右政令……幸赖祖宗之灵，奇辙等均已伏法。释器（忠惠王之子）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权谦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5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69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今有奇辙、卢頔、权谦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创垂之法，席势以陵君，肆威以毒民，罔有纪极。予以连姻帝室，于其所言一皆勉从，犹为不足，潜图不轨，欲危社稷。幸赖天地祖宗之灵，辙等俱已伏诛。凶党之在逃者奇有杰、完者不花、卢济、权恒、和尚等，罪在不原……”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卢頔传。参阅池内宏著《高丽恭愍王对元朝的反抗运动》，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17年的《东洋学报》7—1，见其第118页。池内宏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奇氏民伙并未图谋叛逆。其论据是：（1）奇辙传里虽有关于其肆行叛逆的记载，恭愍王世家却未作记载。（2）权衡的《庚申外史》，未记载奇氏的阴谋。（3）奇辙传也无其灭三族的记载，只论述了其拥有的奴婢与财产。（4）恭愍王致元的表章也未论述。如果奇辙等真有谋反之罪行，肯定会对其之作一些说明。

不仅是庶子，而且是奴婢所生，却依恃其系永陵君亦即王之庶子之名分肆行叛乱，孙守卿等一伙也因而被斩首。从现在起，该是举国上下振奋精神依法整顿纪纲的时候了……整个国家亦将更始和中兴……”^①

当时，还曾发生了桎思不花事件。桎思不花本是高丽人，到蒙古后博得顺帝的欢心。其兄徐臣桂因而被封为六宰，其弟徐应吕也因而被封为上护军，并倚仗蒙古势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他曾从蒙古回到本国，所到之处横行无忌，肆意辱骂存抚和按廉使等地方官吏，使其叫苦不迭。

他到达全州时，全罗道近按廉使郑之祥对他恭恭敬敬，他却傲慢无礼。接伴使洪元哲曾有事求于郑之祥，郑之祥曾予以拒绝。洪元哲为了报复，便无中生有地对桎思不花说：“郑之祥大肆辱骂天使（指桎思不花）不学无术。”桎思不花一听大怒，命人将郑之祥捆绑起来，对其辱骂了一通。郑之祥气愤不已，便让人把全州的官吏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朝廷已将奇氏满门抄斩，不再对蒙古拱手称臣，并以宰相金敬直为元帅带兵把守鸭绿江。而今要收拾这个使者已易如反掌，你们还怕什么，为何不敢救我？你们这样胆小怕事，将会使你们的故乡降等，降为一个小县。”郑之祥所言不实。但这些官吏一听，群情激愤，涌上前去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6月乙亥。恭愍王5年，恭愍王听说前护军林仲甫拥戴忠惠王之子释器，暗地里图谋不轨，便命人把他抓到巡军里治罪。前政丞孙守卿，前密直洪峻，监察大夫孙涌与黄淑卿，典校令郑世功、李大年、姜不花，前判事洪桂、金成，前内辇丞朴蒿等10多人，因与此案有牵连而被下狱。后来，孙守卿、洪桂、金成和林仲甫等被斩首，赞成事康允忠被贬至东莱当县令，郑世功与汉城尹洪仲文等被视为孙守卿的同伙。释器被安置于济州，由李安与郑宝等负责押送。到了海上，李安与郑宝等将释器推于水中，而释器未死，逃离大海藏匿起来。参阅《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释器传。

第二十六章 恭愍王的复兴政策

为郑之祥解去绳索，搀扶他离开被捆绑之处。郑之祥当即带领一帮人把桢思花和洪元哲等抓起来，没收了桢思不花身上携带的金牌，向京城进发。途中，在经过公州时，他将桢思不花之弟徐应吕抓起来，用铁锤将其打死。1355年（恭愍王四年）2月，他到达京城，向恭愍王奏报了这一切。恭愍王考虑到他的所作所为有可能影响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会留下不容小觑的后遗症，便把他关进监狱。同时，命人把解救郑之祥的全州牧使和地方官吏也抓了起来。另一方面则派人去慰问桢思不花，将金牌还给了他，对他说了不少好话。

1356年（恭愍王五年）5月18日，就在处决了奇辙等一伙人的当天，恭愍王起用郑之祥为巡军提控。恭愍王在此之前不得不处罚按廉使郑之祥，而维护御查使桢思不花的权威，说明他在当时在对蒙关系方面还得恭敬与顺从。而重又起用郑之祥，则表明恭愍王很想在高丽抹去蒙古的色彩，矢志重用敢与蒙古势力抗衡的有骨气的官员。^①

改革官制，也是恭愍王追求独立自主和力图摆脱蒙古羁绊的一大举措。忠烈王在位期间，按照蒙古皇帝的指示，模仿了蒙古的官制。恭愍王则对之进行改革，实行文宗在位时独立自主的官制。忠烈王在位时，根据蒙古的指示，取消了三师（大师、大傅与大保）、三公（大卫、司徒、司空）与尚书省。恭愍王则予以恢复，重又设置了三师、三公和尚书省；都金议使司改称中书门下省，领都金议改称中书令，左右政丞改称门下侍中与守侍中；将密直司改称枢院；由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礼部、工部等六部代替典理司、军簿司、版图司、典法司等四司，将监察司改

^①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4年2月辛巳。《高丽史》卷114，列传27，郑之祥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4年2月。

称为御史台。^①

1359年(恭愍王八年)6月,恭愍王确定了处决奇辙的功臣,并下达了这样的教示:“奇辙与权谦在与蒙古王室联姻之后,倚仗其威势,不畏纲纪的约束,肆意掠夺百姓的财物,干尽了坏事。后来,天下大乱,奇辙等深知自身作恶多端,早已怨声载道,极怕有朝一日失去权势后难以自保,便预先制订计策以求先下手为强。他们将其亲戚和心腹安插在朝廷的要津,让其担任要职,暗地里图谋不轨。他们私造兵器,检阅地方军人与武器,派假诏使(蒙古使臣)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秘密约定时日举事。当时,宗庙社稷于千钧一发岌岌可危……”恭愍王这样做,旨在制造舆论,使全国官吏都知道奇辙一伙的罪行,知道奇辙一伙敢于这样目无国王、目无王法、目空一切的罪状。

^① 参阅《高丽史》卷75,志30,百官1,庶文、评理、知门下府事、常侍、直门下、给事中、起居注、起居郎、献纳、正言、三司等。《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赵日新传。《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7月丁亥。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 与元朝的反击

第一节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

恭愍王即位之初，身穿蒙古服装理政。后来，欣然接受李衍宗的建议，换上了高丽式的服饰。不仅如此，他还把官制也恢复为高丽式的官制，除掉了以元朝势力为背景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赵日新^①和桎思不花。紧接着，又处决倚仗元朝奇皇后势力干尽坏事不可一世的奇辙、权谦和卢颐，撤销了元朝在高丽的控制机

^① 恭愍王在元朝京城当宿卫时，赵日新有功，因而被恭愍王即位后所重用。1352年（恭愍王元年）9月，他被封为判三司事。后来，他与其党羽郑天起、崔和尚、张升亮合谋除掉奇辙一伙，于深夜对之进行奇袭。结果，只杀死奇辙。这伙人转而包围侍御官，杀死值宿的崔德林和郑桓等。赵日升胁迫恭愍王盖印，自封为太政丞，其党羽郑天起等也都有了官职。这年10月1日，他杀死崔和尚，又劝恭愍王将张升亮等八九人枭首。10月5日，恭愍王至行省，命人杀死了赵日新。参阅《高丽史》卷38，恭愍王元年9月壬申、己亥、庚子，10月辛丑，乙巳，12月癸卯；恭愍王2年3月甲戌。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赵日新传。《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元年9月己亥、庚子，10月辛丑；恭愍王2年3月。

构，亦即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①

恭愍王采取如上举措，显然是要摆脱元朝的桎梏。然而，元朝虽然已处于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却还未灭亡，依然将其干预之手伸到了高丽。当时，恭愍王处决了奇氏一伙，预料到元朝必会追究此事，元朝在辽东的兵力也有可能因而入侵高丽，必须对此采取适当的对策。于是，恭愍王在撤销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的同时，出兵收复北方的领土。

在西北面，他任命评理印瑄和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珣、俞洪和前护军崔莹为副使，让他们率军去攻打鸭绿江对面的八站。

在东北面，他任命密直副使柳仁雨为东北面兵马使，前大护军贡天甫和前宗簿令金元凤为副使，让他们率军去收复双城等地，不得有误。

当时，恭愍王认为元朝由于需要对付南方的起义军，辽阳方面的守备必然松弛，想抓紧这一时机先下手为强。

1356年（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6月，印瑄率军跨过鸭绿江攻打婆娑府（即九连城）等三站，占领了这三站。

10天后，元朝使臣直省舍人带着元朝朝廷封奇辙为太司徒的诏书和印章来高丽，却不知奇辙已于前月被处决。西北面兵马副使辛珣在进军途中遇到一行人，当即收缴了其所携带的诏书与印章，将舍人关押起来，杀死了他的三名随行人员，舍人则于当晚逃之夭夭。

这年7月，东北面兵马使柳仁雨和赵暎率军攻陷了双城（即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恭愍王5年5月丁酉，10月甲寅。《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5月：“罢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270页。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永兴)。

99年前，亦即1258年（高宗四十五年，蒙古宪宗八年）12月，蒙古的散吉大王和普只官人等率领蒙古大军入侵古和州（永兴）、高州、定州、长州、宜州、文州等15州，占领了这些地区，驻扎了蒙古军队。高丽朝廷当时让这15个州百姓避难于猪岛，而东北面兵马使慎执平认为猪岛城大人少难守，便想让这15个州的百姓迁往竹岛，竹岛小而没有水井，百姓不愿意前往。而慎执平却偏执得很，竟强迫他们移居竹岛。于是，有许多百姓四下奔逃，只有十分之二、三的百姓不得已迁入了竹岛。这些百姓粮食，慎执平便派别抄赴朝廷，要求定量供应粮食。然而，朝廷无法满足其要求。于是，其地的守备也就逐渐松弛。

在这种情况下，原是汉阳府人的赵暉与定州人卓青一起，同登州人和文州人聚集在一起密谋，然后带领蒙古兵入城，利用高丽军民疏忽防范，杀死了兵马使慎执平、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和别京抄等，又带领蒙古兵占领高城，烧毁官府，屠杀百姓。赵暉和卓青把和州以北地区献给蒙古，卑鄙地向蒙古投降。蒙古随即在和州设置了双城总管府，任命赵暉为总管，卓青为千户。

99年后，高丽于1356年7月派柳仁雨领兵攻毁了双城。当时，柳仁雨率领军队，经由铁岭驻屯于登州。登州与双城只隔200里地，而柳仁雨却在此呆了十多天而毫无进展。其时，双城总管赵小生（赵暉的侄子）得知官军前来攻城，使制订了对策。赵小生的叔父赵暉是当年背叛高丽献地投降而被任命为双城总管的赵暉之孙。他不同于其祖父，在高丽朝廷当官，立过不少功劳。赵小生便把赵暉请到双城，对之威胁道：“此刻，情况已十分危急。叔父您在高丽做官，深受几代国王青睐。今天，您如果还是偏向高丽，双城等十二城的百姓还会跟着我们走吗？”赵小

高 丽 外 交 史

生请赵噉带兵与其一起抗击高丽的军队。他见赵噉未加应允，便以保护叔父安全为名，将赵噉软禁了起来。

另一方面，高丽权臣李仁任对柳仁雨说：“赵噉虽是赵小生的叔父，却一向对国王忠心耿耿，对朝廷一片丹心，决不会同叛徒同流合污。如今只要我们以国王之命令说服他，他必会回到我们这边来。还有，只要赵噉在双城传述我们的檄文，赵小生这伙人定会被我们平定。可以说根本无需交锋，也无需将叛徒斩首，双城等便会被我们拿下来。”柳仁雨认为言之有理，便派将蜡书（为了保守机密与防潮，书信用蜜蜡封得很妥帖）送给了赵噉。

赵噉收到蜡书后，知道此乃极密，便静候时机同高丽军队里应外合。赵噉在幼年时节，见双城人赵都赤聪明伶俐，曾与之结成挚友。而今，赵都赤已是百户，成了赵小生的参谋。于是，赵噉对他说：“如今，赵小生与卓都卿这两个叛徒之所以敢与朝廷唱对台戏，是因为你做参谋，有他们为你出点子。你怎么会背叛高丽而跟着叛徒们走呢？只要你能洗于革面，忠心祖国，便能转危为安，获得功名与富贵。现在，是你做出抉择的时候了。你要听我的话。”赵都赤感到他说得很在理，当下激动得泪流满面，指天发誓道：“请您救救我。我一定跟公走，听从公的吩咐！”在赵都赤的帮助下，赵噉得以与弟弟赵天柱一起离开双城到达三岐江。赵小生派100多骑兵追捕，却未能抓到赵噉兄弟俩。赵噉带着儿子仁璧、仁琼、仁珪、仁沃等连夜奔驰二百里，于次日黎明时分抵达柳仁雨的兵营。赵噉对柳仁雨说：“叛徒赵小生与卓都卿已无什么势力可言，将往北奔逃。双城人现在都躲藏在山沟里。如果现在就出动大军打进去。百姓会害怕得不下山。公若能派我的儿子仁璧去说服他们，那就最好不过了！”

柳仁雨认为这是良策，便派赵仁璧与知通州事张天翻到双城去说服双城人。双城人听说赵仁璧来到，高兴得连声说：“高丽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国王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王！”他们都表示甘心情愿向高丽军队投降。也就是说，双城的高丽人民都为自己能摆脱元朝的桎梏成为高丽百姓而庆幸。

有人向恭愍王奏报，说柳仁雨按兵不动。恭愍王派兵马判官丁臣桂去鼓动李子春（李成桂的父亲）作内应，答应事成之后封其为小府尹。李子春得令，悄悄地率领手下人马与柳仁雨的人马一起攻打双城总管府。赵小生与卓都卿见势不妙，扔下妻儿老小逃至伊板岭北面的立石地。于是，高丽收复了和、登、定、长、预、高、文、宜等州，以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

咸州以北的哈兰、洪猷、三撒地区，本是高丽的领土。赵暉等背叛高丽时，被元朝所占有。99年后，高丽才把它们收复。^①

高丽朝廷并不以此为满足，盯准了双城地区以北的女真。丁臣桂率领军队越过伊板岭同女真力战大胜，处决其头领帖木儿后，将其首级送到开城。柳仁雨率军来到该处，起初端州以北一千数百里地区的百姓皆心向高丽。然而，柳仁雨为人贪鄙暴戾，既搜括财物又草菅人命。当时，赵都赤以其功劳被恭愍王所赏识，并被任命为护军，得到了朝廷颁发的金符，成了东北面的千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7月丁亥。《高丽史》卷111，列传24，赵暉传。参阅《高丽史》卷58，志12，地理，东界及北青州府条。《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7月：“桓祖闻命即衔枚就行，与仁雨合兵。仁雨等遂进，攻破双城总管府。赵小生、卓都卿弃妻子逃入伊板岭北立石之地。于是按地图，收复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诸城。盖咸州以北哈兰、洪猷、三撒，本为我疆，自高宗戊午没于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复之。”关于这次收复地区的范围，可参阅津田左右吉著《高丽末期东北境的开拓》，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13年的《朝鲜历史地理》第2期，见其第255页到258页，第263页到264页。

户，负责镇抚女真。柳仁雨却厌恶他，将他杀害。

赵小生与卓都卿逃到女真族居住的地方之后，见大势已去，本想投降高丽，后来看到赵都赤被柳仁雨所杀害，不由得犹豫不决。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表示，如有恭愍王的手谕便向高丽投降。1359年（恭愍王八年），恭愍王将其亲笔所写的手谕交给赵噉，让他去说降赵小生与卓都卿。后者临时却又改变主意，想动用武力抓住赵噉。赵噉只好匆忙赶回京城。赵小生等终于未投降而居住在女真地区。

高丽不再使用元朝的年号，将元朝的官制改为高丽官制，处决了奇氏一党的头目，撤销了奇氏一伙倚仗元朝势力设置的征东行中书省理门所，又在西北面越过鸭绿江收复了婆娑府等八站，在东北面推翻了双城总管府，收复了和州、定州和咸兴，收复了三撒（即北青）之后，元朝对于高丽所采取的这种反元政策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高丽与元朝之间出现了纠纷。

高丽军队越过鸭绿江攻占婆娑府等八站之后，元朝将高丽派往元朝的节日使金龟年扣押在辽阳行省，声称将出动80万大军征伐高丽。西北面兵马使印瑄得知这一信息，要求朝廷增兵西北面以应付不测。

1356年（恭愍王五年）7月1日，元朝魏王太子孛罗帖木儿到达鸭绿江边，恭愍王允许魏王太子及其两个侍从入国。他们进入高丽之后的活动，史料未予记载。

接着，元朝中书省断事官撒迪罕来到鸭绿江边，将顺帝的诏书交给高丽朝廷的有关官吏转给恭愍王。这份诏书强调了高丽与元朝自元世祖以来关系多么友好和密切，然后写道：“近来，有高丽奸民在国境地区惹起事端，闯入我朝境界骚扰百姓，既烧毁民宅又不准行人往来……朕想来想去，这些贼徒可能是贵国逃亡中的罪犯，或者他国之人冒充高丽人。这些歹徒竟然出动军队，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妄想离间高丽与元朝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倘若朕不顾以往的情谊，出动大军追究此事，则玉石俱焚，朕不忍如此。因而特派撒迪罕等前来查清事实，望卿切莫多心，派军队查出侵犯天朝边境者，并与天朝军队一起夹攻这帮歹徒，以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①

这说明元朝对高丽的态度已极其软弱。当时，元朝各地的起义军蜂起，元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加上与高丽的边境地区有了战乱，顺帝早已是焦头烂额，不敢对高丽提出强烈的抗议。明明知道是高丽出兵收复不少地方，却只好采取迂回式的抗议方式，说成是他国之人冒充高丽人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业已趁元朝大厦之将倾圮而收复了东北面的双城总管府的恭愍王，却突然处决了率领军队越过鸭绿江恢复了失地的西北面兵马使印瑄将军。与此同时，高丽通过元朝的撒迪罕，给元朝中书省送去了一份阐明事实的表章，在回忆了高丽和元朝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后写道：“此外，贼臣奇辙同卢硕、权谦勾结图谋不轨。”列举了奇辙等胁迫国王为非作歹的种种罪行，说明这些罪状不仅十分严重，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存亡。由于情况危急，高丽朝廷来不及向天朝奏报，就只好将他们逮捕并处决。它最后写道：“又虑边鄙之乘衅妄动，或有奸人往来乱我情实，故置关防以谨出入，而其吏士过江劫掠，实非本意，考其罪人以正邦典，伏望弘天之仁，垂荡荡之洪恩……”^②

恭愍王派兵恢复失地，堂堂正正治理本国领土，本是天经地义之举，而他却不敢直抒胸臆，反而把这说成是“吏士过江劫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7月丁巳。《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5年7月戊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5年7月。

掠，实非本意”，这实在是太不光明磊落。不仅如此，他还把责任完全推诿到奉命行事的印珣身上，并将其处决，把这美其名曰“考其罪人以正邦典”，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他这样做，也许是生怕元朝派兵前来攻打，故而以违心的谢罪来加以搪塞。然而，他作为国王自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想法。

追溯起来，元朝自其世祖以来，一直把高丽的国土置于其军事威慑之下，使高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与干涉。恭愍王对此十分不满。他敢于抗拒元朝，正是为了恢复高丽的自主形象。不过，他在努力摆脱承受已久的元朝桎梏时，尽力避免正面冲突。他毫不声张，便派人处决了奇辙、卢硕与权谦等野心家，从而断绝了与元朝的来往。他改革官制，恢复了祖制。他推翻了双城总管府，收复了双城等故土。他还打算派兵越过鸭绿江，占领辽阳路等故土。

他处决印珣还有另一种原因。印珣在领兵奋勇当去恢复鸭绿江那厢的失地之前，同样担任西北面兵马使的姜仲卿喝醉之后未很好地履行出征的职责。印珣良言相劝，姜仲卿却当成耳旁风。于是，印珣让副使辛珣杀害了姜仲卿。事后，他向恭愍王奏报：“姜仲卿居心叵测，臣已按军法予以处决。”而朝廷官员得知此事后议论纷纷：“同样是兵马使，级别相同，可以不奏报国王就以军法处置为借口将对方处死吗？”当时，恭愍王之所以未采取任何措施，是生怕因小失大。而今，鸭绿江那厢的八站已经收复，而元朝又刚好对此提出抗议，他便乐得把责任都推给印珣，将印珣处决，恰好可向元朝朝廷道歉谢罪，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节 元朝的衰微与恭愍王恢复国权

恭愍王即位后，在对元关系方面矢志执行独立自主和确保领土的强硬政策。在进行外交交涉时，则时而强调加强两国之间的传统的纽带关系，时而以辩解和谢罪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

1356年9月，他招募居住在两江道和全罗道来自济州的禾尺与才人，把他们派到西北面为边防服务。同时，任命廉悌臣为西北面都元帅，任命刑部尚书柳渊、判司宰寺事金之顺和上将军金元命为副元帅，巩固收复地区的防备。

对此，元朝又派撒迪罕等使臣，将一份外交通牒交给高丽朝廷。它写道：“今年夏天，贵国之游兵侵入我国疆域，捣毁了我国的驿站，使得边民无法安居乐业。对此，我朝已派使臣向贵国作了通报。使臣归来后报告说，贵国已将入侵我边境者治罪，并且转述说贵国因这等事件发生得太突然而无暇向天朝奏报……一有事件发生，两国理应一同依法予以处置。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果无暇及时奏报，事后也该有个交待。然而，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贵国应知道悔改，并上呈陈表请求宥谅。……”

四天后，高丽派政堂文学李仁复去元朝，以表章提出了果敢而又积极的要求，要求清除元朝在高丽的影响，对领土问题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这份表章的内容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1) 撤销征东行省理问所，不干预高丽的审判。恭愍王命人清除奇氏一伙时，已经撤销了理问所，而理问所的官吏依然与叛徒们一起图谋不轨，甚至抢走有关官府的文件，蓄意制造事端。

(2) 恭愍王命人处决奇氏一伙之后过了几天，高丽朝廷就曾

要求元朝撤销高丽国内接受元朝调遣军队里的万户、镇抚、千户和百户。这次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元世祖所设置的中军、左军、右军三万户之外的巡军，合浦（马山）、全罗、耽罗、西京等的万户府，既没有所属的军队，又装腔作势胡作非为。因此，请求只保留征伐日本所需的三万户，其余五万户则一律予以撤销。

(3) 奉命前来高丽的元朝使臣和元朝的府、寺、院、监事所派遣的官吏大多是出身于高丽的人，他们倚仗元朝的威势，来高丽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民怨很大，今后请勿派出身于高丽的人充当使臣。

(4) 严禁元朝的宣徽院、资政院、将作院、大府监、利用监和太仆司寺等衙门官吏来高丽收取土产品。进贡之物需定下数量，高丽再向元朝献物。

(5) 在元朝的德兴君塔思帖木儿，自称是高丽忠宣王的庶子，招募从高丽逃往元朝的歹徒，以甜言蜜语蛊惑他们，使他们前来蛊惑高丽的百姓，已有明显的罪行，请将德兴君塔思帖木儿及其这一伙党羽送回高丽。

(6) 双城（即永兴）和三撒（即北青）原是高丽领土。高宗四十五年（1258年），赵晖和卓青等畏罪而把它们献给元朝并向元朝投降。请将双城和三撒以北高丽故土归还。

(7)（西北面的）女真人，从泥城（即昌城）等地山区越过高丽国境，侵入各地，惊扰百姓，抢劫牛马，并接受高丽罪犯，使得高丽官吏无法将这些罪犯逮捕归案。该处像双城、三撒一样，也是高丽领土。请定下法规，不许这些女真人随意入侵高丽骚扰生事。

元朝此时国力已今非昔比，走的是下坡路，而且接近崩溃。高丽对它采取的是和与战、外交与武力双管齐下的方针。对于高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丽提出的这些要求，元朝未作答复，采取的是默认的态度。高丽占领双城，曾经借元朝之威势作威作福的赵小生和卓都卿遁走之后，和州（现在的永兴）、定州（现在的定平）和咸州（现在的咸兴）等地区，像高宗以前一样，又成了高丽的领土。高丽在咸州设置了知咸州事，在三撒（现在的北青）设置了安北千户防御所，完完全全拥有了北青以南的地区。翌年，亦即1357年（恭愍王六年）8月，高丽任命大将军崔莹为东北面体覆使，任命吏部尚书洪有龟为东北面兵马使，加强了东北面的防御。

当时，都堂（宁、枢两府的决策官吏都兵马使）向行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双城和三撒等地原是我国领土，其北面一向以伊板岭（即摩天岭）为境界……该处既险峻且又幽深偏僻，在我国犯罪而畏罪潜逃者，每每逾越这一境界，类聚一起愚不可及的亡命之徒专干背叛国家的勾当。倘若在伊板岭要冲设置官府控制出入，则可绝其后患。从双城等地沿例向天朝呈交的黄金，也就可由本国派人采掘而交呈。如果把采金一事交给赵小生和卓都卿掌管，深恐他们以此为理由搞名堂而与辽阳行省勾勾搭搭。故而高丽行省应照会辽阳行省：最好是未雨绸缪，不让赵小生等的阴谋得逞。”

这是高丽在向元朝通报：以伊板岭（即摩天岭）为高丽和元朝的国境。翌年（1358年）5月，酋长完者不花率领1800名军士在伊板岭外的海阳（即吉州）向高丽投降。当时，赵小生与卓都卿正是躲藏在海阳。这说明当时高丽的威力已远播于海阳。

这样一来，高丽已摆脱元朝的羁绊，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独立自主的国家。1357年（恭愍王六年）恭愍王分别给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追加了景孝、宣孝、懿孝、献孝、显孝大王等尊号。过去，高丽没有给忠烈王等去世的国君赐谥号的自由。高丽这样给忠烈王等已逝的国王加尊号亦即谥号，

意味着高丽已经完全独立自主。从1359年（恭愍王八年）以后起，高丽未再向元朝派祝贺新年的贺正使和祝贺各个节日的节日使，也未再派使节去祝贺皇后和皇太子的生日，亦即祝贺千秋节。^①

这些事实，说明元朝的势力已经衰微，高丽已摆脱了元朝的干涉，完全得到独立自主。在此之后，史料上虽然也有高丽的贺正使、千秋使去元朝的记载，但这已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礼节。

第三节 红巾贼两度入侵与高丽的大捷

在恭愍王收复西北面与东北面的国土之时，高丽不仅遭到了倭寇的入侵（下一章加以说明），而且受到了兴起于中原的红巾贼的侵略。高丽倾注全力打退了这些贼寇。

1358年（恭愍王7年，元至正18年）3月，静州府使朱永世与全罗道万户姜仲祥进京，请求晋见恭愍王。恭愍王大怒，责骂道：“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西面忧虑红巾贼来犯，东面要防倭奴入侵，海边地区的百姓惶恐不安。你们为何不忠于职守，敢于擅自离开任职之地？”骂完，命人将他们下狱。其时，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恭愍王8年11月癸丑：“贺太子千秋节宴群臣，时与元虽不相通，不欲遽废也。”从第二年起，再未庆贺这类节日。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奇辙传：“辙等诛，李氏（荣安王大夫人）以忧病。时国家遣将西北以备元，春秋贡献羁縻而已，故音问颇阻。”《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8年5月辛丑条也有停用元朝年号记载。这时，明朝已兴，元朝朝廷向北方逃逸。参阅《高丽史》卷56，志10，地理1，庶头：“其四履：西北自唐以来，以鸭绿江为限，而东北则以过之”。西北面以鸭绿江为境界，说明高丽尚未完全收复高句丽旧土。参阅《高丽史》卷56，志12，地理3，东界及北青州郡条。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高丽朝廷为了对付倭寇的入侵，已修理好了京城的外城。

与此同时，高丽朝廷收到了红巾贼蠢蠢欲动的情报，正在防备他们的来犯。所谓红贼，是红巾贼的简称，本是元末中国内地的一个秘密社团。这支红巾军的首领是韩山童。他自称是弥勒佛再生，于元朝顺帝在位时率众在河南起义。他被元军活捉以后被处决。他的儿子韩林儿及其妻子杨氏逃到安徽省境内，加入了白莲教。1355年（恭愍王四年，元至正十五年），刘福通拥戴韩林儿为皇帝，定国号为宋，年号定为龙凤，定都于亳。由于白莲教徒均以红巾裹头，世人便称之为红巾贼。

1359年（恭愍王八年，元至正十九年）2月，红巾贼致函高丽。这封通牒写道：“汉族无法忍受鞑虏统治，起兵恢复中原，东越齐、鲁，西出函、秦，南经闽、广，北至幽、燕，义兵所向披靡。真是归顺者不予计较，反抗者罪不容赦。何去何从，善自抉择！”这封通牒，显然是要高丽对之屈服，否则便要侵略高丽。当时，正好有2300多户住在辽阳和沈阳的高丽人投降高丽，高丽便将他们安置在西北面郡、县，以巩固西北面的边防。

这年11月，有3000多名红巾贼越过鸭绿江大肆掳掠而去。都指挥使金元凤未及时将这一情况向高丽朝廷奏报。高丽朝廷后来得知这一事实后，派户部侍郎郑之祥前去追问，只是指责了金元凤的失职，并未对之治罪。次日，朝廷任命庆千兴为西北面元帅，安佑为副元帅，加强了边防的防备。

这年12月8日，红巾贼的首领、官居平章的毛居敬出动号称为四万的大军，从鸭绿江的冰面上过江入侵高丽，攻陷了义州，杀害了义州府使宋永世和居民1000多人。这就是红巾贼的第一次入侵。

红巾贼攻陷静州后，杀死了都指挥使金元凤，趁势又攻克了麟州。

高丽朝廷闻报大惊，当即任命守门下侍中李岩为西北面都元帅，庆千兴为副元帅，金得培为都指挥使，李春富为西京尹，李仁任为西京存抚使，加强了防备。

红巾贼不想退去，又入侵铁州（铁山）。安佑与李方实等率领军民把他们击退。红巾贼退至麟州、静州等地。紧接着，红巾贼又犯铁州，在其邻近县抢掠。安佑率领军队在清川江将他们打败。红巾贼再战又败，只好后退至定州。

这样一来，高丽军民一片混乱。都元帅李岳来到西京，却不见诸军奉命而来，只好退至黄州。由于民心惶惶，京城百姓准备逃走，争相预备粮食。在此之前，一匹布可换得两斗大米，而此时，一匹布已可换得五斗到六斗粮食。这年12月28日，红巾贼攻陷了西京（平壤）。

高丽见势不妙，一方面了解敌情，另一方面更换指挥官，部署下一阶段战略。高丽朝廷首先让户部尚书朱思忠去敌人兵营，以细布、马鞍和好酒等送给敌将，从而了解敌人的虚实。与此同时，高丽朝廷解除了都之帅李岳的职务，任命平章事李承庆为都元帅，抽出官吏们参加西北面的战斗。又让前金议赞成事权适率领僧兵参与战事。

朱思忠在了解敌情，并对敌人使用了怀柔手段之后，于1360年（恭愍王九年）1月9日回到高丽朝廷。当时，敌人的将领给高丽朝廷所下的通牒，不仅十分傲慢无礼，而且丝毫也没有退兵之意。

高丽军队继续奋战。判事金缙在敌人攻入西京之时到义州与静州，将周边散居的百姓组织起来，歼灭敌军150名，获得敌军积蓄的粮食。他派人向朝廷报告，军民团结一心决心誓死守住义州。金缙与宦官金玄一起率领几百名骑兵攻打西京，与300多名敌军遭遇，歼敌100多名。上将军李芳实率领军队在铁州与敌人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交锋，歼敌 100 多名。为了夺回西京，高丽出动由 20000 多人组成的大部队进军生阳驿（即中和）。敌人得知高丽军队浩浩荡荡前来征讨，在义州、静州和西京杀害了 10000 多名被他们活捉的高丽人。^①

为了剿灭如此残忍的贼军，高丽军队攻打西京。步兵先行进攻，损失了 1000 多人，敌军也死去几千人。敌人见大势不好，遂退至龙岗和咸从。在与红巾贼的战斗之中，要数西京这场战斗最为激烈。

这年 2 月间，安佑率领军队在咸从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却遭到敌人奇袭，损失很大。十二天后，高丽军队再次攻打咸从，判开城府事辛富与将军李坚是役阵亡。高丽军队发动猛攻，歼敌 20000 多名，活捉敌人首领沈刺与黄志善，取得很大战果。敌军受挫之后，退至甑山县。

次日，安佑与李芳实率领 1000 名骑兵追击敌人，追至延州（现云山），金得培等率军也随后赶到。两军合在一处，声势更加壮大。敌人锐气大减，连连后退。高丽军队追至古宣州，歼敌几百名，剩余的 300 多名敌人越过鸭绿江逃逸。

与此同时，义州等地残存的敌军受到高丽军队的奇袭，也大多被歼。

3 月 1 日，庆千兴、安佑和金得培联名上书朝廷，奏报高丽军队已经获胜。七天之后，红巾贼退出了高丽境内。^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 39，世家恭愍王 9 年 1 月丁酉、己亥、癸卯、甲辰、丙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 27，恭愍王 9 年 1 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 273 页。

^② 参阅《高丽史》卷 39，世家恭愍王 9 年 2 月己未、壬申、癸酉，3 月戊子朔、乙未。《高丽史》卷 113，列传 26，安佑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27，恭愍王 9 年 2 月。

红巾贼在陆地上失败之后，出动水军入侵高丽。

3月24日，红巾贼出动70艘兵船，出现在西海道丰州的碧达浦。接着，敌船停泊于西京、德岛（现在的龙岗）和席岛（现在的殷栗）。敌人闯凤州（现在的凤山），烧毁了城门。敌人另外100多船兵船则入侵安岳郡元堂浦，抢走粮食，烧毁官府。高丽军队与敌人激战了几天，在丰州歼敌30多人，敌人还有30多人受伤。

敌人又入侵黄州的琵琶浦。三天后，敌人闯入了安州城的垣浦。4月1日，敌人入侵黄州的铁和浦。牧使闵率军与敌人交锋，歼敌20多名，活捉1名。4月3日，高丽朝廷派李芳实率领军队攻打丰州的红巾贼，歼敌30多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乘船逃走。红巾贼第一次入侵高丽，到此算是划了个句号。^①

当时，红巾贼不仅在高丽气焰嚣张，在辽阳路和沈阳路也是横冲直撞。这年3月，高丽朝廷派户部尚书朱思忠向元朝朝廷奏报高丽平定了红巾贼，他刚到辽阳，便因道路不通只好返回。这年7月，高丽朝廷派益山君李公遂、户部尚书朱思忠和宦官方都赤到元朝打探敌军的情况。这一行人走到九连城西面的汤站，便因道路不通只好返回。恭愍王闻报勃然大怒，吼道：“怕什么？就是有生命危险，也应往前走，不该回来！”又派他们前往。他们在沈阳（奉天）呆了几个月，很想去元朝燕京，却还是未能如愿，只好回到高丽。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元朝在东北的势力已衰弱到极点，红巾贼在辽阳和沈阳地区的气焰也是相当嚣张，那一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9年3月己酉、甲寅，4月丁巳朔、己未。《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佑传。《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遇庆传。《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9年3月、4月。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带已深受其害。^①

翌年，也就是1361年（恭愍王十五年）10月，红巾贼头目潘城、沙刘、关先生和朱元帅等率领10万多名将士跨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朔州的泥城。这是红巾贼的第二次入侵高丽。《高丽史》安佑传则记载说红巾贼将士有20万名。

高丽朝廷任命枢密院副使李芳实为西北面都指挥使，同知枢密院事李余庆为副指挥使，让他们领兵在岳岭（慈悲岭）阻遏红巾贼进军。五天后，敌人闯入泥城。高丽朝廷又任命安佑为上元帅，任命金得培为都兵马使。

11月，红巾贼进驻抚州（现在的泰川）。李芳实带领的军队寡不敌众，只好后退，并出动顺州（现在的顺川）、殷川（现在的孟山）、成州（现在的德川）等三个州和阳岩（现在的阳德）、树德（现在的阳德）、江东（现在的中和）、三登（现在的江东）和祥原（现在的顺安）等五县的百姓，把粮食运到岳岭栅藏好。安佑、李芳实同指挥使金景碑一起，分别率领军队在价州、延州和博州等地破敌，歼敌300多名。于是，高丽朝廷任命安佑为都元帅，负责指挥所有的军队。

这年11月，红巾贼攻打安州。在这场战斗中，高丽军队打了败仗，上将军李荫和赵天柱战死，都指挥使金景碑被敌人活捉。红巾贼以被生擒的金景碑为贼之元帅，写了一封通牒给高丽朝廷。通牒让高丽快快投降，莫再抵抗下去。^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宗恭愍王9年3月乙卯、7月乙丑。《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佑传。《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9年3月、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10年11月丙辰。《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10年11月丙辰：“贼袭安州，我军败绩。上将军李荫、赵天柱死之。贼获指挥使金景碑，为其元帅，移文曰：‘将兵百十万而东，其速迎降。’”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佑传。

高丽朝廷采取了各种歼灭红巾贼的对策。高丽朝廷出榜招募士兵，规定凡是应募的贱人，可免去其贱籍；凡是应募的书生与乡吏，可录用为官吏，还可依其所愿赐给金银财宝。高丽朝廷还规定：公侯（指贵族阶层）以下，都得捐献战马。与此同时，高丽朝廷任命参知政事郑世云为西北面军容体察使，派遣郑思道、金玗率领军队负责把守岳岭栅，派遣李成遂率领军队把守竹田。当时，李成桂率领军队奋战，歼灭敌人的王元帅及其将士 100 多名，活捉了 1 名敌人。

敌人出动 10000 多名将士攻打岳岭栅。高丽军队大败。安佑和金得培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两人仅以身还。敌人的先锋部队到达兴义驿（现在的中峰）。

由于事态危急，恭愍王于 11 月 19 日与太后、王后一起踏上避难之途。当时，侍从恭愍王的有侍中洪彦博和李岩等 28 人。洪彦博建议道：“先王之规不宜废弃。王还是亲自率领军队与百姓同生共死为上。”而恭愍王听说西京的高丽军队已被打败，便继续向南方避难。洪彦博见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恭愍王不愿率领军队与百姓抗击红巾贼，只好侍奉恭愍王向南方避难。

恭愍王在五天里，经由兜率院（现在的坡州境内）、焚修院（现在的坡州境内）和扬州的迎曙驿以及广州的沙平院、广州和庆安驿，于 11 月 24 日抵达利川县。这天下了大雪，天气很冷，恭愍王的御衣被雪花浸湿与冻硬，只好生火把它烤干。

11 月 24 日，红巾贼攻陷高丽的京城。敌人在开城驻屯了几个月，宰了不少牛和马，以马皮与牛皮把城墙围起来，浇上水，使之硬冻，以利于防御。高丽军队向这样的兽皮墙射箭，箭矢无法穿透，遇到了难题。敌人在京城干尽坏事，杀了不少男女，并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大吃人肉。他们甚至割下孕妇的乳房，烤熟之后大吃特吃。^①

在这期间，恭愍王继续在南方避难。11月25日，他到达阴竹县。11月28日，到达忠州。12月16日，他这一行人避难于福州（现在的安东），不知高丽军队的战斗情况。

高丽检校中郎将金长寿率领军队在盐州歼灭了红巾贼的140多名骑兵，而红巾贼出动300多名骑兵，攻陷了原州，杀害了牧使宋光彦。有29名敌人闯到安边府，当地的百姓佯装投降，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死。江华府也由百姓采取同样的手法把敌人灌醉，然后由禅将王同金带领伏兵将敌人悉数消灭。敌人因而不敢闯入江华。

1362年（恭愍王十一年）1月17日，高丽朝廷让安佑、李芳实、崔莹等重整旗鼓，率领20万大军反攻。总兵官郑世云督励各路将士包围了京城的敌人。18日清晨，各路人马从四面进攻敌人，只有郑世云率军后退，屯至兜率院。这时，雨雪交加，敌人疏于防范。李余庆负责领兵攻打崇仁门，其麾下的护军权僖率领数十骑进行奇袭，敌人仓皇失措。李成桂率领2000名将士率先登城奋战，打垮了敌人，杀死了敌将沙刘和关先生。

20万高丽大军当即趁势从四面冲锋。敌兵失去了头头，乱成一团，互相踏死者甚多。这一役，歼敌10万多名。高丽军队还缴获了敌人从元朝朝廷抢劫到的元朝皇帝的玉玺、金银财宝、金印、银印、铜印以及各种兵器，真是不计其数。

敌人的头头破头幡连忙率领其10万多名部下跨过鸭绿江逃

^① 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10年11月丁巳、辛酉、癸亥、丙寅、丁卯、己巳、辛未。《高丽史》卷111，列传24，洪彦博传。《高丽史》卷111，列传24，李岩传。《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佑传。《高丽史》卷113，列传26，郑世云传。《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10年11月。

走。这样一来，侵犯高丽的红巾贼终于被平定，并被撵出了高丽国境。

恭愍王于2月15日从安东向京城进发。然而，京城的宫城与民宅已成废墟，死者的尸体堆积如山。

这年6月，恭愍王派典法判书到元朝朝廷，在告之红巾贼已被平定的同时，将从红巾贼处截获的元朝的玉玺、两把玉锁、二十多个金银铜印以及金银牌等，还给了元朝。^①

第四节 金镛、崔濡废黜恭愍王的叛乱与元朝的作用

平定红巾贼之后才过了五天，高丽朝廷的大臣与将军便于1月22日起开始倾轧，向国王争宠夺权。

平章事金镛以自己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大功而沾沾自喜，不可一世，把陷害的矛头对准平日与他合不来的总兵官郑世云，追究郑世云畏敌退往兜率院的罪责。他矫书一封，将郑世云邀至酒筵上，与安佑、李芳实和金得培等合谋，将郑世云当场杀害。1月24日，将军睦忠将几位将帅合谋杀死郑世云却秘不通报之事公

^① 参阅《高丽史》卷40，世家恭愍王11年1月甲子、乙丑、己巳，2月辛丑，3月丁巳，6月丙申。《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佑传。《高丽史》卷113，列传26，郑世云传：“十一年，世云督诸将围京城，自退屯兜率院。”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11年6月甲子、乙丑。参阅末松保和著《高丽鲜初的对明关系》，该文刑载在出版于1941年《史学论丛》2，笠井出版社出版于1965年的《青丘史草》1，见其第300~304页。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8，《高丽与元明关系》，该书出版于1974年，见其第181~182页。参阅金庠基著《高丽时代史》，该书由东国文化社出版于1961年，见其第716~719页。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诸于众。1月25日，恭愍王得知这一变故，下令让这些将帅都到其驻蹕的尚州，想让他们消消气镇静下来。

2月9日，安佑来到恭愍王在尚州的行宫，想晋见国王奏报打败红巾贼的经过。而金镛作为杀害郑世云的元凶，生怕事情败露，便让守门的心腹将刚刚踏进行宫中门的安佑杀死。然后，金镛恶人先告状，向恭愍王谎报是安佑等擅自杀害了郑世云。同时，他又派使者去逮捕李芳实与金得培。结果，万户林椿在龙官县将李芳实杀害。3月1日，金得培也被捉拿并被杀害于尚州的山阳县。

这天，恭愍王作了如下的教示：（1）为了避开外寇的加害，本王避难至安东，临行前曾任命郑世云为总兵官代替本王指挥歼敌。这一点，早已晓谕全体官兵。（2）经过戮力同心奋战不息，现已歼灭了敌人，本王将论功行赏。（3）安佑等恃功自大，与郑世云不和，竟目无国法，乱泄私愤。（4）安佑等竟敢以下犯上，杀死了代替本王指挥军队的总兵官。（5）安佑等虽然为国立了功，而歼敌乃一时之举，蔑视国王之罪则是万古难容，所以应将他处以死刑，以儆效尤。（6）都元帅安佑、元帅金得培、李芳实、闵涣和金琳均已被处决，矫正了国法，但他们的儿子无罪。（7）直接加害郑世云的副将金赞在逃，其罪不可恕。

金镛胆敢对高丽名将郑世云、安佑、李芳实和金得培等下毒手，与属于奇皇后一派的崔濡等企图废黜恭愍王的阴谋是密不可分的，其手段可谓毒辣至极。

在此之前，奇氏一伙被铲除后，元朝的奇皇后始终怀恨在心，一直在伺机进行报复。奇皇后曾对太子说：“尔年已长，何

不为我报仇？”^①而崔濡则在高丽犯了罪，当时还正畏罪潜逃在元朝的燕京。

崔濡自恭愍王即位之后，曾在元朝首都与金元之帖木儿密谋搞乱高丽，并向元顺帝建议在韩国征集10万名征南军。元顺帝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元朝首都的那些高丽人得知后，连忙向元顺帝启奏：“高丽国土狭小，又常受倭寇侵略。再说，它离南方太远，很可能征兵不成。”元顺帝觉得也很有道理，便予以接受，命人将业已启程去高丽征兵的崔濡等召回。后来，元顺帝打算征伐高丽，便任命崔濡为元朝的中书监丞，带着元顺帝的诏书去高丽督促征集高丽人当兵一事。崔濡到高丽后，建造了仓库，要高丽朝廷为之准备足够的出征之物。

当时，元朝对高丽的干涉还能起作用。恭愍王拿崔濡没有办法，只好让他担任三司使，封他为龙城府院君。

崔濡左右逢源，又深知奇皇后对恭愍王报仇心切，便千方百计对元朝的丞相搠思监和后宫宦官、高丽人朴不花阿谀奉承，从而当上了将作同知和同知枢密院使。他见金镛在国内杀害了安佑等几个将军，感到如果对高丽搞点阴谋，金镛必会作内应。于是，他便与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一起鼓动奇皇后，让她同意废黜

^① 崔濡的蒙古名字为帖木儿不花，系同知密直崔安道之子。忠宣王在位时，他曾是平定“曹颀之乱”的一等功臣，深受忠宣王青睐。当时，幸臣赵芬之妻马氏守寡，他曾强奸过她。元朝使臣曾到高丽追究此事，他大肆行贿而得以无事。他还曾强奸过海平府院君尹硕夫人。忠定王即位后，他深受器重。当时，裴佺曾对他说：“你有今天，都是我提携了你。”他不买账，打了裴佺一顿。崔濡当参理时，曾对国王说这一官职不合其意。闵思平听了之后说道：“你出身于奴隶，提拔你当参理已经过分啦！”崔濡又打了他一顿。国王见此情景大怒，但未责备他。监察司上书弹劾崔濡，他带其弟崔源等人逃往元朝京都。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崔濡传。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75页。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恭愍王，扶持江陵大君的儿子笃朵不花登上王位。笃朵不花一再辞让，说道：“叔父（恭愍王）当国王当得好好的，我怎能去夺他的宝座？”

于是，奇皇后一伙转而决定让德兴君塔思帖木儿（忠宣王之子）当高丽国王。德兴君自从为得计，便向元顺帝诬告：“红巾贼作乱时，高丽失去了国印，竟擅自刻了新的国玺使用。”元顺帝不悦，便立德兴君为高丽国王，以奇三宝奴为元子。元顺帝还命令高丽人服从德兴君领导的政权。

这样一来，金添寿、柳仁雨和康之衍等便完全倒向德兴君。与此同时，元朝任命金镛为判三司事，崔濡则自命为左政丞，那些在元朝京都的高丽人都当上了官。这帮人还打算出动辽阳城的军队征伐高丽。^①

1362年（恭愍王十一年）12月，恭愍王得到了元朝顺帝封德兴君塔思帖木儿为国王的情报，怀疑宗室里有心怀二心之人，便命吏部尚书洪师范为西北面体覆使，负责探听这方面的真实情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崔濡传。《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遇庆传：“初，诸奇败。皇后谓太子曰：‘尔年已长，何不为我报仇？’”会濡在元，论事丞相搦思监及后宦宦者本国人朴不花……又恃金镛杀安佑等。诸将而为内应，遂与群不逞说后，谋废王立德兴君，妄奏红贼之难，高丽失国即擅铸新印用之。元主以德兴君为王，以奇三宝奴为元子，金镛判府司事，濡自为左政丞。凡国人之在都者，咸置伪官，且请发辽阳之兵以来。王不以失位……”参阅《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忠烈王条江阳公滋附焉。当时忠烈王长子江阳公王滋的长子王嵩，与典理判事印安等投降红巾贼，告之以高丽国内之沃土与米谷仓库。在此之前，他欺骗良人，以之为自己的奴隶。他逃到元朝之后曾想挑起事端。参阅《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江阳公王滋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12年3月。《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3年9月：“初，帝令高丽人皆以德兴之国。金添寿、柳仁雨、康之衍、黄顺、安福从、文益渐和奇叔伦等皆附之。洪淳等匿不从，执节不移。”

况。

恭愍王在形式上已被剥夺了王位，又听说崔濡等准备出动辽阳城的军队入侵高丽，心下不由得忐忑不安。他于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1月1日避难于青州。2月间，他在青州经镇川、竹州（即竹川）和峰城县的坡州，到达通济院兴王寺。他任命金议评理李仁任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耐心观察崔濡等人的动静。同时，任命赞成事金镛为巡军提调官，派赞成事李公遂（奇皇后的姑表弟）和密直提学许纲赴元朝，就元朝定德兴君为高丽国王一事呈上陈情表，祝贺元朝平定海州、盖州和奉天的敌人。当时，恭愍让庆千兴和安遇庆将军等率领军队驻屯于西北面，防备崔濡率领辽阳军队入侵。

这年闰3月辛未日的夜晚，金镛作为崔濡废黜恭愍王和迎立德兴君的阴谋内应，秘密调动金守、曹连等50多名党羽，扑向恭愍王所在的行宫兴王寺。守卫行宫的人见势不妙都作鸟兽散。金镛一伙杀死守门人，闯入行宫，互相以大臣相称，口口声声说是奉元顺帝的命令而来，将恭愍王的侍卫金汉龙（判典校寺事）、王梓（金议评理）、金台权（文睿府左司伊）和宦官姜元吉以及七八名卫兵一一杀害。接着，他们飞快地闯入恭愍王的寝殿。这时，宦者李刚达已背起恭愍王跃出窗外（《高丽史》金镛传称是将恭愍王藏进了密室），而宦者安都赤长得酷似恭愍王，他明知躺到国王睡觉的地方必死无疑，却还是假装国王躺着。金守这伙人闯入寝殿，见了安都赤以为是恭愍王，就砍下了安都赤的头。这伙人自以为得计，不由得欢欣雀跃，一蹦几尺高。

金镛这伙人紧接着冲进右政丞洪彦博的家里，张口就是：“快出来接旨！”这伙人想假借元朝顺帝的命令杀害洪彦博。当时，洪彦博的奴婢劝彦博道：“这些家伙不怀好意，丞相快快逃避，莫再迟延！”洪彦博的妻子与儿子洪师范也劝其快走。然而。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洪彦博决心亲自询问金镛一伙叛乱的缘故，便对妻子和儿子说：“我是朝廷的宰相，怎能在关键时刻怕死求生？”他慢慢地穿戴停当之后，向门外走去。他对那伙人说：“你们才是逆贼，怎敢矫传帝旨？”那伙人二话未说，冲过去砍下了洪彦博的脑袋。洪彦博被杀害时，年仅 55 岁。

金镛一伙得知恭愍王未死，便假惺惺地对众人说：“千万别惊动国王的王轿！”同时，让其同伙 40 多人掌管宫内的一切事务。他们催促厨师给恭愍王上御膳，以诱使恭愍王不存疑虑，从藏身之处走出来。

金镛还派其一伙进城，把在京城的首相一一杀死。这时，那些宰相为了祈求福祉，一个个躲到妙连寺。他们在寺中听说国王的行宫发生了变故，便想去巡军调动人马惩治歹徒，却未能如愿。

这时，密直使崔莹、副使禹碑、知都金议安遇庆和上护军金长寿等从京城率领将士赶到行宫，平定了这一叛乱。然而，金长寿在这一过程中不幸殉职。

这次叛乱平定之后，恭愍王命令李仁复、丁赞、禹碑和洪善福让巡军拷问与这次叛乱有关的 90 多名贼徒。

十三天之后，恭愍王确定了兴王寺之变的讨贼功臣，崔莹、禹碑、李刚达和柳泽等 39 人榜上有名。他们被册封为一等功臣。八天后，金镛被流配于密城郡，其党羽华之元和大护军高權等几个人也被流放到外地。后来，大护军林坚味和护军金斗对金镛一伙进行审讯。结果，金镛被剁去四肢，押解到各道示众，然后砍下其脑袋，挂在京城十字路口示众。其党羽有 10 多人被斩首，另外几十人被施以杖刑后流放于荒岛。

1363 年（恭愍王十二年）4 月，金镛之乱被完全平定，而崔濡一伙则仍在元朝首都搞阴谋诡计。于是，高丽朝廷于这年 4 月

高 丽 外 交 史

15日派使臣到元朝，开展说服性的外交活动，使元朝朝廷确认恭愍王是贤君。密直商议洪淳和同知密直司事李寿林被派到燕京之后，将一份由高丽国内所有官吏联名写的奏章送到元朝的御史台、中书省和詹议院，希望元顺帝真正了解高丽的情况。然而，逗留在元朝燕京的崔濡和朴不花等抢走了高丽进献的礼物与上呈的表章，使之无法上达于元顺帝。于是，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越闹越大。

这年5月，恭愍王得知元朝使臣李家奴带着元顺帝关于废黜恭愍王和让德兴君继位的诏书来高丽，并已从燕京出发，立即任命禹碑为接伴使负责遏阻李家奴入境。禹碑在途中截住李家奴，说道：“这几年来，有不少歹徒冒充元朝使臣前来高丽为非作歹，朝廷特地让我来此迎接您，有什么事要办，请多多吩咐！”这句话体现了禹碑弦外之音，不知李家奴究竟是元朝的使臣还是替崔濡一伙搞阴谋诡计。

与此同时，恭愍王任命知密直司丁赞为西北面都按抚使，负责统管各领的军队，同时做好了向南方避难的准备。

六天后，翻译李得春从元朝回到开城，向朝廷奏报道：“元顺帝在让德兴君当高丽国王和让奇皇后一族的奇三宝奴为高丽元子的同时，准备出动辽阳的军队作崔濡等叛徒的后盾。”高丽朝廷当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此事。经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贼臣崔濡欺瞒元朝朝廷，故意生事，搞什么国王之递位，还将高丽的军与民区分开来，要高丽为元朝运送军粮，又要高丽出动军队助军。然而，我们已经通过洪淳将说明事实真相的国书送给了元朝，还是等候元朝答复之后再作道理为上，不必鲁莽行事。”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恭愍王也犹豫不决，无法做出决定，只是任命庆千兴为西北面都元帅，驻扎于安州；安遇庆为都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指挥使，率军驻扎在义州；李龟寿为都巡察使驻扎于麟州；李珣为都体察使，率军驻扎于泥城；洪瑄为都兵马使，驻扎于江界和秃鲁江；典工判书池龙寿为发抚使，驻扎于龙州；所有的将领都受都元帅庆千兴指挥，齐心协力搞好西北面的防备。同时，任命李仁任为平壤尹，负责筹措与调配军粮。让都巡抚使丁赞与韩暉一起，作为游兵将，往来于所有的兵营，了解军队的情况。另一方面，以韩方信为东北面都指挥使，金贵为都兵马使，率领军队驻扎于和州（现在的永兴），搞好东北面的防备。

这年6月，元朝使臣李家奴越过国境进入高丽，禹碯命人抓住他的随行人员，询问废黜恭愍王的缘由，此人说不清楚，因而也就难以知其究竟。7月，李家奴到达京城，所有的官员和军士罗列于宣义门前，恭恭敬敬迎接他。他没收了恭愍王的印章。高丽朝廷给他与副使分别送了两条金带、两个马鞍、两套衣服和10匹苧麻布，还送了棉布和麻布给他的随行人员。大臣们在行省设宴招待李家奴，百官和元老们的代表将一封上呈给蒙古中书省的表章交给了李家奴。李家奴说：“这份表章，我无法代呈给皇帝与皇太子，却一定替你们送给中书省。”看来，高丽朝廷为李家奴等设宴，又送给他们不少礼物，还是很有效的。

高丽官员们写给元朝中书省的表章这样写道：“德兴君塔思帖木儿是被高丽忠宣王赶走的宫女嫁给白文举后生下的儿子。奸臣崔濡竟然推戴他，而且向元朝朝廷作诬告，妄想夺走我国国王的王位，还怂恿元朝朝廷出兵，已把问题搞得相当复杂。倘若立德兴君塔思帖木儿为国王，那么，高丽朝廷与元朝朝廷也就没有了甥舅关系。臣等敬请中书省将实情奏报元顺帝，立即逮捕塔思帖木儿与崔濡等，将他们引渡给高丽朝廷，以泄臣等之愤。”

两天后，李家奴等离开高丽归国。庆复兴通过德兴君的部下送给德兴君一份檄文。这份檄文写道：“你们跟随白家的后嗣，

甘为叛逆，自织罗网，难道说非得等到九族被灭、祖坟被挖、祖宅变成泥淖、田地全部被没收，才知道醒悟和反悔？”名曰忠宣王次子的德兴君，乃是宫女出嫁至白文举之家后所生，实际上乃是白家之后裔，故而这篇檄文称德兴君塔思帖木儿为白家的后嗣。

这年12月，德兴君将其军队驻屯于辽东，多次出动其骑兵到鸭绿江边。对此，高丽朝野在震惊的同时，官吏与军民做好了击退其军队的准备。

恰恰就在这时，奇皇后的姑表哥李公遂滞留在元朝首都燕京。元顺帝召其进宫，与之晤谈，想博得李公遂的好评。奇皇后感谢李公遂对她的母亲荣安王大夫人照顾得很周到，说他不只是她的姑表哥，她将把他视为亲哥哥，好好地对待他。然而，李公遂列举历史上有名的皇后的事例，鼓励奇皇后以她们为楷模，然后说恭愍王是贤君，应当予以赞许，怎可凭感情用事而这样对待他呢？李公遂说：“丙申之祸（指1356年，亦即恭愍王五年奇辙等被诛杀的事件），是我们这家人得势后不知自重的结果，而不是恭愍王之错！”

李公遂向元顺帝奏报了实情，请元顺帝恢复恭愍王的王位。

而德兴君到达辽阳之后，崔濡向他建议：无论如何要说服李公遂，使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于是，德兴君送了许多礼物给李公遂。李公遂说：“我已无父母，膝下又无子女，官职也升到了这个程度，还有何求？我本当剃发进山当和尚。但我不想跟着德兴君走！”这样一来，独奴帖木儿等向元顺帝说明了此事，建议干脆除掉李公遂，而元顺帝不肯答应。^①

赞成事安遇庆成为都指挥使后，率军驻扎在义州，给婆婆府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2，列传25，李公遂传。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的脱脱禾孙送去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大意如下：己亥年（恭愍王八年），高丽有过红巾贼之乱。辛丑年（恭愍王十年），沙刘、破头潘和关先生又率领红巾贼侵略高丽。高丽成功地打败了红巾贼，将红巾贼撵出了国境。对此，元朝本应称赞高丽，没想到崔濡等却愚弄元朝朝廷，妄图立庶子为高丽国王，高丽的百姓咬牙切齿地说：“真该讨伐崔濡这一伙蠢贼，吃其肉寝其皮方解心头之恨！”崔濡在高丽已是怨声载道。我们现在出动精兵百万，相约一定打垮高丽的敌人。接着，这封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元朝朝廷应当将崔濡一伙斩首，将其首级送来高丽，以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①

1364年（恭愍王十三年）1月1日，崔濡出动一万名元兵，以拥立德兴君为名，跨过鸭绿江，包围义州。都指挥使安遇庆率领军队与之交锋，战斗了七次，才把元兵打退。然而，崔濡又让元兵闯入，高丽军队与之较量，都兵马使被其活捉，高丽军队大败，退至安州。崔濡率领元兵攻入宣州（现在的宣川）。

起初，高丽朝廷由中央负责指挥军队，将领们因而有危殆之感，发挥不了首创精神。不仅如此，士兵们于夏天参战，时至冬天不得更换，粮食又接济不上，不免有人冻饿而死。只有将领与官吏相对地说来稍微强一些。于是，恭愍王以赞成事崔莹为都巡卫使，率领将士急赴安州，负责指挥全军。又让李成桂从东北面率领一千名精兵出战于西北面。都体察使李珣、都兵马使禹碯、朴椿也率领军队参战。高丽军队这才重又声势大振。

恭愍王命令都元帅庆千兴把守西北面，让安遇庆等几位将军率军跨过鸭绿江去攻打辽阳和沈阳。李仁任对都元帅府的镇抚河乙沚说：“我军又饿又冷不想战斗，一个个三心二意。让他们跨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安遇庆传。

过鸭绿江去战斗，后果不堪设想。你快去把我的这一意见转奏国王！”他极力反对派兵过江作战。

于是，恭愍王命令庆千兴勿让军队过江。恭愍王上了李仁任的当。李仁任又与河乙沚共谋，对都元帅庆千兴说：“主上是旧国王，德兴才是新的主上。”说什么只有让军队固守鸭绿江才是上策。庆千兴一听，颇为恐惧，竟附和李仁任之说。

1364年（恭愍王十三年）1月15日，女真的三善与三介等入侵高丽东北面的忽面、洪原和三撒（现在的北青）。恭愍王命令交州都兵马使成士达率领500名精兵攻打他们。敌人攻陷咸州（现在的咸兴）后，守将全以道和李熙率军逃走。都指挥使韩方信和兵马使金贵率领军队向和州（现在的永兴）进发，却因敌人已攻陷和州而只得退守德源北面的铁关。三善和三介入侵东北面之时，起初，全以道是知兵马使，跟着都指挥使韩方信阻止他们入侵。后来，他率领6000名军士负责戍守忽面。忽面山险流急，粮食往往接济不上，在防戍方面难处多多。他曾多次吁请韩方信前来把守三关，韩方信怕元兵与女真兵，未接受其吁请。

三善和三介逼近忽面时，全以道向威风方面奔逃。当时，德兴君的军队已经雄踞宜州，与东北界只有一座山岗之隔。由于越过一座山岗，忽面就在敌人的后面。韩方信并未责骂全以道临阵脱逃，而让他们戍守三关。三善与三介逼近三关时，全以道戍守不住，又拔腿就逃。于是，和州以北的全部被敌人占领。三善与三介往后退去时，韩方信又让全以道戍守忽面，全以道心下对韩方信很不满。

这年1月17日，大护军金斗考察北面高丽军的战况后，向高丽朝廷报告了实情。据他的报告，军卒饿死冻死不少，饿殍遍野，随处可见。那些残兵败将或者乞讨饭吃，或者拿军马去与百姓换大米。然而，将军们却不敢向上司报告。体覆使在路上见到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了这种情况也不敢报告，高丽朝廷与国王也就不知有这种悲惨的情况。

当时，恭愍王命崔莹为都巡尉使星夜驰赴至安州，整顿一盘散沙般的军队，让将士宣誓一定消灭贼徒。这样一来，朝野有了信心，军民勇气百倍，同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崔莹在路上遇到逃兵，便将其斩首示众，从而整顿了军纪。此后将士都严格遵守军纪，令行禁止。

恭愍王又命李成桂从东北面率领 1000 名精兵，向西北面推进。都体察使李珣和都兵马使禹磻、朴椿率领军队与之配合，高丽军队声势大振。

次日，也就是 1 月 18 日，高丽军队攻打定州。当时，贼徒们已退至随州（定州）的毖川。毖川一战，高丽军队趁势追击，敌人烧毁其兵营，四散奔逃不成队伍。

当初崔濡对那些由他率领而来的蒙古族士兵与汉族士兵说道：“高丽的国王威胁将军们把守西北面，而将士们一听说新王（即德兴君）的军队来到，都不愿为旧国王卖命，而作鸟兽散。这一次，平定了他们，我会将高丽大臣们的妻、妾和财产分给你们！”起初，这样的引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过了鸭绿江，与高丽军队一交锋，才知高丽军队士气激昂，没有一个士兵投降，便怀疑起了崔濡的胡说。他们在毖川一战中被打败之后，才知道自己上了崔濡的当，不少士兵纷纷投降高丽军，埋怨崔濡信口雌黄。这样一来，敌军士气消沉，无心恋战，高丽军队也就有可能歼敌并驱之于鸭绿江之外。崔濡的党羽柳仁雨、康之衍、安福从和扈千奇等已太疲劳，落在了崔濡的后面，被高丽军队抓住并立即斩首。崔濡率领的一万军队，结果只有十七人得以生还，逃到元都燕京。

另一方面，东宁路的朴伯也大率领军队侵入高丽的延州（即

云山)，崔莹率其部下打退了他们。西北面都元帅庆千兴让录事全南贵赴京城，向恭愍王奏捷报。

崔濡逃回元都燕京后，继续与奇皇后和高丽叛徒们沆瀣一气，伺机再兴大军入侵高丽，还向元顺帝建议：“倘若让臣返回高丽，臣会征发高丽所有的壮丁参加天子（元顺帝）的军队，并且年年向天朝献上军粮和女人，决不会有任何耽误。如能在庆尚道与全罗道设倭人万户府，吸引倭人前来，赐之以金符，那么倭人必能对天朝有所助益。”然而，监察使纽怜却向元顺帝作了这样的建议：“高丽国王卜颜帖木儿（一名伯颜帖木儿，系恭愍王的蒙古名字）是作为嫡者登上王位的正统。他成为国王之后，忠于职守治国有方令人佩服。尽管遭到了外贼多次入侵，他率领军民一一予以平定……塔思帖木儿（一名塔失帖木儿，指德兴君）乃是庶奴。他居心叵测逃来元都，与那些奸臣合谋，致使陛下授以王印，使之取代高丽之王位……从这些糊涂的主意看来，显然皆是崔帖木儿不花（指崔濡）所策划。崔帖木儿不花为人狡猾，狗猪不如……倘若将塔思帖木儿的王印追缴回来，依法下令将崔帖木儿不花（即崔濡）遣送回本土（即高丽），则边防不致再有骚扰，恭愍王亦可洗雪怨，更加忠于天朝。”元顺帝准奏，接受了其建议。于是，元朝朝廷命人收回了塔思帖木儿的王印，将他安置于永平府。又命人给崔濡带上枷锁，押解回高丽，由高丽朝廷处置。

1364年（恭愍王十三年）9月，护军张子温从元都燕京回到高丽，传元顺帝命曰：“元顺帝准许恭愍王复位，并已将崔濡押回。”恭愍王一听大喜。10月，元朝正式派翰林学士奇田龙到高丽，下达了让恭愍王复位的诏书。这份诏书写道：“恭愍王率领军民多次打垮外敌的入侵，将元朝之玉玺夺回并归还元朝，为我家（指元朝皇室）立了大功……不料崔濡依恃元朝权臣搆思监之

第二十七章 恭愍王收复北方领土与元朝的反击

势，与宦者朴不花和庶子（批德兴君）勾结，再三请求，致使朕下令进行王位交替，并出动军队作战。回想起来不禁仰天长叹……朕已将塔思帖木儿撵至永平府，追回了王印，让伯颜帖木儿（即恭愍王）正式复位。至于崔濡，则已命人于次日（壬寅）予以逮捕，押送回高丽。”

九天之后，恭愍王派赞成事李仁复作为特使到元朝，对天朝让其复位表示感谢。

11月，高丽廷将元朝派人押回的崔濡斩首。

高丽朝廷对于国内与德兴君事件有关人等，一一作了追究。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5月，密直副使朱思忠被处决。1364年2月，被德兴君任命为密直副使的护军裴自富，因内通德兴君而被斩首。

1356年（恭愍王十四年）1月，高丽朝廷派密直副使金庾去元朝，请求引渡德兴君。金庾到了辽阳，元朝知枢密院事黑驴对他说：“元顺帝囑臣，他已命人将德兴君处以杖刑，送回本国。而德兴君眼下正患背疮，待其病愈执行杖刑之后再遣送回高丽。”金庾一听，只好回国。

这样一来，金镛与崔濡妄图除掉恭愍王的阴，和元朝朝廷听信谗言册封德兴君为高丽国王的糊涂行事，在真相大白之后得以终结。在恭愍王堂堂正正复位的同时，崔濡得到了可耻的下场，德兴君则被处以杖刑。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第一节 明朝的兴起与元朝的衰

顺帝末年，元朝更加混乱不堪，国家纲纪越来越松弛。顺帝自己沉迷于骄奢淫逸，政治十分紊乱，重臣则互相争权夺利，动辄反目成仇，地方上的将军们也是拥命自重各不相让。这样一来，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形成了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在元末群雄纷争之中，出身于贫民的朱元璋因参加红巾军而发迹。后来，他率军征服长江流域，以金陵（现在的南京）为根据地，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势力范围。他的这支起义军，遂成为最强大的一支起义军。从1364年（恭愍王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年起，朱元璋领兵陆续平定群雄，终于于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月，在群臣拥戴下登极于金陵，是为明太祖，并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

当时，元朝的辽阳省平章人洪宝宝和哈刺不花等派客省大使卜颜帖木儿到高丽，通知说：“元朝要高丽别倾向明朝，再三叮嘱高丽朝廷一如既往密切与元朝朝廷的往来，增进友好关系。”^①

同年4月，明朝出动水陆大军击溃了元朝的主力部队，逼近

^① 参阅《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7年1月戊子。《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7年9月条记载的是洪宝宝于这年9月到高丽，实际上则是在这年1月。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元朝的首都燕京。元顺帝无力阻遏明军，于这年7月带领皇后、妃嫔和太子退至上都开平。正是在这年7月，金之秀从元朝的燕京回到高丽京城，向朝廷报告：“明朝派了一万多艘军舰停泊于通州，接着攻入元朝的燕京，元顺帝已与皇后一起逃往上都开平。元太子率军与明军交锋大败，也逃到了上都。”于是，高丽朝廷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召集全体大臣就与明朝交换使节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

考虑到明朝已经兴起，元朝朝廷已退至北方，高丽需要确定对汉族掌权的明朝的政策，以及改变对即将被完全推翻却又一直与之保持传统纽带关系的元朝的政策。当时，摆在高丽朝廷面前的课题是：是同时与元朝和明朝修好，还是一边倒而在元朝与明朝之间择一而与之友好？经过协商，恭愍王与大臣们取得了共识：暂时还是两相兼顾，既与元朝保持交往又和明朝建交。于是，翌年10月，恭愍王派判宗簿寺事文天式到元朝，祝贺千秋风。文天式赴元朝朝廷途中到达辽阳，因明朝与元朝的军队仍在交战，道路无法通行，只好返回高丽。恭愍王不悦，对文天式处以杖刑，仍派其去元朝祝贺千秋风。

同年11月，高丽派礼仪判书张子温去金陵，请求吴王朱元璋答应与高丽建交。朱元璋在金陵（现在的南京）登上帝位前自称吴王，此时朱元璋已登极为明太祖，但高丽未收到这方面详细的情报，故仍称朱元璋为吴王。朱元璋对张子温接待得很隆重，让六部御史台设宴款待张子温。

高丽与明朝有了这层关系之后，元朝于同年11月派利用蓝太卿蛮子罕到高丽，向恭愍王和高丽朝廷通报了元顺帝的决心：“将令各路将军率军恢复元朝的威风！”高丽朝廷一方面设宴款待元朝的使臣，另一方面派赞成事李成瑞去元朝祝贺新年。

元朝朝廷为了密切与高丽的关系，于1369年（恭愍王十八

高 丽 外 交 史

年，元至正二十九年）1月，让辽阳省的纳哈出和平章洪宝宝派使者到高丽，力图增强两国之间的纽带。这年3月，元朝派使臣到高丽，提升恭愍王的官职，告诉恭愍王元朝已封之为右丞相。

1369年4月，明朝派符宾郎契斯到高丽，将明朝的国书与40匹绸缎交给恭愍王（契斯官居符宾郎为契逊之弟。契逊原名百了逊，是回回人。元顺帝即位后，考取进士，当过皇太子的老师，给皇太子讲授过经书。恭愍王七年，他曾到高丽躲避红巾贼之难。他在元朝京都即与恭愍王相识，当时就很受恭愍王的赏识），并通报了如下的情况：明太祖的军队所向披靡，西面平定了汉主陈友谅，东面在姑苏抓住了吴王，南面平定闽越镇压了八蕃，北面撵走了蒙元，肃清了华夏诸对手，恢复了中国的旧疆。在臣民推戴下，明太祖登上皇位，国号定为明，年号为洪武。国书写道：“昔日，中华之君主，版图与高丽接壤，高丽国王称臣宾，大抵旨在仰慕中华之教化，藉以安定民心。……而今，高丽已如此。”它在承认恭愍王为高丽国王的同时，显然是要高丽对明朝以小事大。恭愍王收到国书后，不再使用元朝的年号至正。^①

恭愍王十八年，明军攻陷元朝上都，元顺帝只好逃至察哈尔省多伦附近的达里泊西南面的应昌。

此时，高丽已决心与明朝建交，便于这年5月派礼部尚书洪尚载到明朝首都南京，祝贺明太祖即位，并呈上谢恩表。这份谢恩表中写道：“臣在东方一隅，恭仰北辰（天子），虽未参与祝贺

^① 参阅《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8年4月壬辰，5月辛丑。恭愍王5年6月乙亥，高丽也曾摒弃元朝的年号。后来，两国外交关系好转，高丽才又加以使用，并派贺正使与千秋使等去元朝朝廷。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8世4月、5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79页。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班列，却对天朝永献事大之忠荃。”明朝告诉高丽明廷，明朝军队已平定了晋、冀、秦、陇等地，这些地区的百姓已安居乐业，而在将幽、燕地区的百姓南迁时，发现其中有165名高丽人，已让高丽籍宦金丽龙渊带领他们返回高丽。^①

元顺帝逃至应昌后，史书称此元朝残余势力为北元。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元至正二十九年）8月，北元的中书省和大尉政丞奇平章派使臣到高丽。9月，北元的吴王、淮王、双哈达王也派使者到高丽，要求增进友谊，加强友好关系。其中，吴王最先要求与高丽增强往来，高丽派禹碑去向吴王致意，从礼节上作了回敬。当时，吴王要求与高丽通婚。淮王对禹碑接待很周到，让禹碑为其联系，想让女儿嫁到高丽有势力的官家。禹碑当即婉言谢绝，说道：“臣只是奉命前来执行公务，其余的一切非我分内之事务。”然而，淮王执意要禹碑成全此事。恭愍王得知后，于这年10月派参知门下大将军崔伯和郑云到北元，将金逸逢的女儿嫁给北元的吴王。但在崔伯奉命去迎迓淮王的女儿到高丽时客死途中，此事只好作罢。

顺帝于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元至正三十年）死于应昌。奇皇后所生的太子爱犹识里达腊继位，成为北元的昭宗。后来，应昌也为明朝军队攻陷，昭宗只好逃至和林（即喀喇喀林，蒙古初期的首都），算是保留了元朝最后的一点点命脉。

在此期间，高丽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年4月，明太祖派道士徐师昊到高丽祭祀山川。当时，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名义所写的祝词有这样的句子：“迩来，高丽国王上表称臣，朕甚感欣慰，封之以王爵。”徐师昊在当地立碑，碑文有言：“高丽迩来派

^① 参阅《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8年5月甲辰，6月丙寅。《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8年5月、6月。

使臣来京上表称臣，朕（指明太祖）已封之为王，使之为高丽国王，其国境之山也就业已归属职方……”所谓职方，据《周礼》记载，系夏朝掌管天下九州之版图和接受与保管四方之贡物的官府。

这年5月，明太祖派尚宝司丞契斯到高丽，向恭愍王转达了明太祖亲笔诏书。它写道：高丽的王颙（指恭愍王）治国有方，朕平定四方之后一将情况通知他，他就对天朝表示了其耿耿忠心。朕封他为高丽国王，赐以王印。从明太祖的这封诏书可知，明朝已经确立了对高丽名分上的统治权。然而，这只是形式上的服从。实际上，高丽已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明太祖的这封诏书也说：“一切仪制服用，准许仍按高丽原有之风俗。”

所谓仪制服用，就是仪式、制度和服饰。也就是说，高丽不仅可以自行采取适应本国之需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而且可以自行采取统治手段。

翌月，亦即这年6月，明朝使臣徐师昊回国时，恭愍王让他带去了向明太祖表示谢意的国书。它表示：“臣一定永远遵从世封”。^①

7月，高丽使用明朝的年号洪武，并派三司左使姜师赞去明朝，感谢明太祖对恭愍王的册命，将元朝赐高丽的金印交给明朝。高丽与明朝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增进友好关系，在于当时明朝在其与北元的关系方面需要有高丽的支持。

^①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5月甲寅，6月乙亥。《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19年7月乙未、甲辰。《明史》本纪，洪武2年8月丙子：“封王颙为高丽国王”。

第二节 高丽收复辽沈地区的政策

面对元朝与明朝在中国朝代交替的国际新秩序，恭愍王与明朝确立了丽明友好关系，以保证高丽的安全。同时，他想趁机推行其北方政策，收复失去的北方领土，实现高丽太祖的夙愿。

恭愍王想收复北方领土，是因为牢牢记住了高丽太祖的训要十条和太祖生前奉行的北方领土政策。高丽太祖之所以定国号为高丽，旨在继承高句丽的雄风，重振高句丽的伟业。太祖驾崩后，高丽历代国王总是一有机会就想恢复高句丽的版图。993年，徐熙与契丹的萧逊宁进行外交谈判时，就说过“高丽是高句丽的延续，说起国境，贵国的东京（即辽阳）也是高句丽的故土。”徐兢所编之《高丽图经》，以及《宋史》、《元史》的高丽传，也都将高丽记载为高句丽的继承。1108年在契丹衰退和金国崛起之前，尹瓘率领军队征伐过女真。1356年恭愍王即位之初，曾派军队攻占过鸭绿江对岸的八站和三站。所有这些事实，都是高丽伺机收复高句丽故土，把高句丽故土视为高丽领土的佐证。

在元朝衰退、明朝尚未占有辽阳、沈阳等地时，高丽觉得有机可乘，收复高句丽故土的意志也就更为坚定。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8月，恭愍王在西京（平壤）、义州、静州、泥城（昌城）和江界等地设立万户和千户，准备出兵征伐北方。

奇辙在高丽被斩首后，其子奇赛因帖木儿怀恨在心。在恭愍王欲收复北方领土时，他企图以辽阳和沈阳的地方官金伯颜和东

宁府为后盾，^①率军侵入高丽北方，为父亲报仇。

恭愍王深知奇赛因帖儿居心不良，意识到已有必要断绝与北元的外交关系，并出兵征伐东宁府，既可收复失去的北方领土，又可消灭奇赛因帖木儿及其党羽。于是，从这年秋天起，恭愍王在东北面和西北面的要冲，设置了不少万户与千户。11月，他任命李成桂为东北面元帅，池龙寿为西北面元帅，李仁任为西北面都统使。

1370年1月，恭愍王命令在东北面的李成桂率军征伐东宁府。李成桂率领50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兵，从东北面越过咸兴地区的黄草岭，行军600多里到达江界附近的雪寒岭。接着又行军700多里，于10天之后跨过鸭绿江。东宁府同知李吾鲁帖木儿（即李原景）得知李成桂率军来犯，连忙带兵驻屯于佟佳河流域的亏罗城，凭藉天险准备应敌抗战。但在李成桂率领军队到达也顿村时，李吾鲁帖木儿佯装应战，然后放下武器，率领300多户向李成桂投降，并说：“我本来就是高丽人，愿成为将军的心腹。”后来，他改名为李原景。

然而，酋长高安慰却率领军队坚守亏罗山城。李成桂率军英勇攻击，高安慰等抵挡不住，弃妻子逃走。次日，高安慰的20多名部将率领部下向李成桂投降。亏罗山城陷落后，一万多户人家向高丽投降，高丽军队缴获了2000多头牛。

这年2月，李成桂将元朝的枢密院副使拜住（韩复）和李原景、杨伯渊、李长寿、李天佑、玄多士和金阿鲁丁等以及300多

^① 这里所说的东宁府，指的是辽阳和沈阳，不是以西京（平壤）为中心的原东宁府。以西京为中心的东宁府归还高丽，成为高丽的领土之后，元朝在与高丽人关系相当深远的辽阳和沈阳又设立了东宁府。《高丽史》卷42，恭愍王19年正月条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之东至皇城，北至东宁，西至渤海，南至鸭绿江，有如空旷地区一般。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户一并献给恭愍王。

这年5月26日，明太祖派使臣契斯到高丽，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高丽人成准得从明朝京都归国时，带回了明太祖亲笔诏书，它写道：“而朕兵未至辽沈，其间或有狂暴者不为中国患，恐为高丽之扰。况倭奴出入海岛十有余年，王之虚实岂不周知，皆不可不虑也。王欲拒之，非雄武之将、勇猛之兵，不可远战于封疆之外。王若守之……”它的意思是恭愍王若有意收拾辽、沈地区，得委派雄武之将和勇猛之兵。

当时，高丽与明朝已就引渡罪犯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明朝的海寇陈君祥等在明朝的沿海地区大肆掳掠，受到明朝追捕后，潜入高丽的古阜以图东山再起。明朝请高丽派兵捉拿并引渡给明朝，恭愍王立即下令照办。高丽官府抓住了陈君祥等，及时引渡给明朝。这一次，共引渡了100多名海寇。^①

这年8月，恭愍王任命侍中李仁任为都统使，率军驻扎于安州，又命令西北面上元帅池龙寿、副元帅杨伯渊和李成桂等率领军队攻打东宁府。

11月，池龙寿和李成桂等率军到达义州，让万户郑元庇、崔奕成、金用珍等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要求这样的浮桥一次可让三匹到四匹马通过。浮桥修好后，李成桂和林坚味率军通过，其余的军队分三天通过了浮桥。高丽军到达距辽阳城只有两天路程的螺匠塔之后，池龙寿晓谕辽阳和沈阳人道：“辽阳与沈阳本是我国领土，其百姓也是我国百姓。现在，我们率领义兵前来，大家定能安居乐业。”于是，在两地的高丽人纷纷前来报告实情。

^①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5月甲寅：“成准得还自京师，帝赐玺书曰：‘王若守之……’”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19年5月。

李成桂派裨将崔仁桂与崔公招率领 3000 名骑兵前去攻打，敌军以为高丽军队人少，顽强抵抗。后见高丽军队攻城攻得很猛，城中的敌将才知高丽派来的是大部队，士气大大低落。敌军之中的处明，自以为了不起，挺身而出，率军抗拒，却见李成桂的箭法不比一般，这才乖乖投降。奇赛因帖木儿逃走后，其党羽金伯颜（其父为高丽和尚，其父与通流院婢女私通生之）成了高丽军队的俘虏。

当晚，池龙寿劝告纳哈出与也先不花等道：“奇赛因帖木儿是高丽微贱的小官，因向元朝献媚而受宠。如今，元朝皇帝已移至漠北，按理来说，他应当跟随而往，而他忘恩负义躲在这东宁府，对高丽恨之入骨，一心想为其父奇辙报仇，想搞垮高丽。”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现在，金伯颜成了我们的俘虏，哈刺波豆德左不花和高达鲁花赤这两个头目也已被我们抓住，只有奇赛因帖木儿逃走了。高丽……从箕子之时起，也即从周武王时起，世代相传，我们的领土都是西至辽河。元朝统一中国后，让公主嫁给高丽国王，辽阳与沈阳便成了公主汤沐地。”所谓汤沐地，指的是以辽阳与沈阳的收入作为公主的沐浴的费用。也就是说，元朝将这两地赐给了公主，两地成了公主的领地。而池龙寿的上述这段话，旨说辽阳与沈阳自古以来就是高丽的领土。^①

与此同时，高丽朝廷于 12 月 2 日让都评议使司送了一份通牒给东宁府，指出奇赛因帖木儿自其父奇辙图谋不轨被处决之后一直心怀不满，总在妄想搞垮高丽。这份通牒说，辽沈地区本是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2，世家恭愍王 19 年 8 月己巳，11 月丁亥。《高丽史》卷 114，列传 27，池龙寿传。《高丽史》卷 114，列传 27，杨伯渊传。《高丽史节要》卷 29，恭愍王 19 年 8 月、11 月。参阅《太祖实录》卷 1，恭愍王 19 年 12 月：“凡辽河以东，本国疆内之民，大小头目官等速自来朝……”

高丽的领土。

另一方面，高丽让江界万户府向辽沈地区百姓散发公告，指出“辽阳本是高丽的疆土。倘若出动大军攻打，诚恐玉石俱焚，善良百姓罹难。故而不拟出兵，而让万户跨过鸭绿江对大家进行安抚。凡是愿意成为高丽百姓者，由高丽朝廷发给种子，使之安居乐业。”李成桂也发布通告晓谕金州与复州居民，指出辽河以东乃是高丽的领土。

在此前的一个月，女真的达麻大派使者到高丽，将他们所在的地方献给了高丽。^①

1371年（恭愍王二十年，明洪武四年）闰3月，北元的辽阳省平章刘益和王右丞（王哈刺不花）等投降明朝。北元朝廷生怕这两人把当地的百姓也交给元朝，就以辽阳本是高丽领土为前提，让高丽与明朝交涉，请求不让该地百姓归属明朝。

这说明北元业已承认辽沈地区是高丽的领土。北元在其灭亡之前，生怕明朝占领这一地区，而怂恿高丽把这一地区占领，使之成为既成事实。所以，北元特地让高丽出面与明朝协商，解决辽沈地区居民的归属问题。当时，高丽未能通过明朝解决这个问题，也未能说服刘益投降高丽，辽沈地区百姓也就未能成为高丽的国民。这是很遗憾的一件大事。

这年4月，明朝开始关注辽阳地区，特地通过中书省向高丽朝廷发函通报：“前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献出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地归顺于明朝，明太祖已以此处为军队的指挥所。”当时，明朝一方面在辽阳路设立了定辽卫（辽东卫），另一方面

^①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11月、12月丁巳。《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19年11月、12月：“十二月丁巳，都评议使司移咨东宁府曰：……又虑辽沈原系本国旧界……令江界万户府，榜谕辽沈人曰：辽阳原是国界……”

派出军队征伐一直以满洲为基地大肆进行活动的元将军纳哈出，攻克了其根据地金山（现长春西面的农安），在达里泊江边击溃了一直支持纳哈出的北元皇帝昭宗之弟脱思帖木儿的军队，扫平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推进到了混同江流域。这样一来，明朝的疆域已经与高丽的疆域相毗邻。

这年9月，高丽派西京都万户安遇庆和安州上万户李珣征伐五老（又称兀刺）山城，并以廉梯臣为西北面都统使，努力将势力扩张到辽沈地区。10月，判事黄用成向高丽朝廷报告：“我军在五老山城取胜，活捉北元枢密院副使哈刺不花。”

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明洪武五年）3月，高丽再一次表态，声称辽沈地区是高丽的领土。也就是说，恭愍王致函明朝设置于辽东的定辽卫，首先说明了如下的实际情况：由于奇皇后之兄搞叛逆阴谋，已将奇辙一伙处决；奇辙之子奇赛因帖木儿勾结辽阳路与东宁府多次为非作歹，高丽两度派兵摧毁了他们的根据地；奇赛因帖木儿逃之夭夭，未能将其抓获。接着指出：今年1月间，东宁府的残余分子胡拔都等偷偷潜入波儿口子，杀死了守御官金天奇等，抓走了一些百姓。2月，他们又突然入侵山羊会口子，被御官张元吕等撵走。3月，东宁府金院曹家儿和万户高铁头等率领军队悄悄地摸进阴龙口子，被守御官金光富等撵走，而在过江时全部溺死。这封书函写道：“窃详：东宁辽阳未曾附朝廷，即是梗化之人。况与我构隙，理宜防备。已令把守要害，待变剿捕。如获奇赛因帖木儿，起遣前来。”^① 恭愍王的这份咨文，旨在告诉定辽卫：辽沈地区与明朝无涉，理所当然高丽的领土。

^① 参阅《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1年3月庚戌。

第三节 勉强进贡济州马与征伐济州牧胡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明洪武三年）7月，高丽曾派三司左使姜师赞到明朝京都，感谢明太祖派使臣契斯到高丽对恭愍王册封和太祖亲笔诏书谕高丽，同时把元赐高丽之金印交给明朝朝廷。当时，姜师赞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这就是就有关济州问题与明朝朝廷进行协商。他带去的高丽国书写道：“耽罗岛自开国以来，便由高丽人设州置牧。迨至高丽与元朝建交后，元朝朝廷派人在岛上牧马，因为该处的马草相当丰茂，至于封疆则一如旧制。”它阐明了济州乃是高丽的领土。接下去，它言明了如下的事实：近年来，奇氏兄弟在高丽兴妖作乱，朝廷忍无可忍，已将其处决；元朝在耽罗的达达牧子和忽忽达思，与之也有牵连，这伙人在济州还拥有很大的势力，宰相尹时道已被其所杀害；前侍中尹极的家奴金长老，与奇辙一伙勾结妄图危害高丽，高丽朝廷已将其逮捕归案，使之罪有应得。国书还写道：“元朝太仆寺、宣徽院、中政院、资政院在济州所放牧的马和驴等，已命高丽的济州官吏调查其马籍，由当地人负责饲养，按时节献给明朝。元朝的达达（即牧童），如让高丽将其归化使之成为良民，则必将有助于明朝的马牧，也将有助于高丽百姓之生业。”^① 它要说明

^① 高丽之所以向明朝提出济州问题，是因为明朝曾要求高丽献纳济州马，高丽朝廷未能及时送去。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明洪武五年）4月，高丽派民部尚书张子温向明朝朝廷上呈一份请求出兵征伐耽罗的表章。它提到“纳贡姗姗来迟，并非出于本意”，其原因是：“今年3月，派礼部尚书吴季男去耽罗运马，以便献至明朝京都。因济州蒙古牧胡发动叛乱，未能把马收上来。”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7月甲辰。《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1年7月。《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1年4月壬寅。参阅朴容淑著《恭愍王在位时的对明关系》，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71年釜山大学编辑的《史学》第2期，见其第22页。

的意思是：高丽将铲除元朝在济州的残渣余孽，将有关牧马场的业务承担起来，定期向明朝朝廷献马。

就在高丽与明朝就耽罗问题进行交涉之时，牧胡于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明洪武五年）4月，在耽罗发动了叛乱。他们杀死秘书监刘景元和济州牧使李藏用。3月间，礼部尚书吴季南带领425名弓兵去济州征收进贡给明朝朝廷的马，第一批上岸的300多名弓箭兵也被他们杀害。吴季南不敢前往，只好返回开城。高丽随即派民部尚书张子温到明朝京城，报告这种情况，说明上报来迟的原因，表示高丽一定会平定这一叛乱。5月，高丽又派礼部尚书吴季南去明朝朝廷，详细奏明济州叛乱的始末。

张子温与吴季南于9月归国。当时，他们带回明太祖亲笔诏书，敦促高丽出动军队把发动叛乱的济州牧胡全部抓起来。诏书还写道：“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恁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① 这封诏书说明，明朝对济州并没有什么领土方面的野心。

1374年（恭愍王二十三年，明洪武七年）4月，明朝派礼部主事林密和蔡斌^②到高丽，转达了明朝中书省的文书。它指出：

^① 参阅《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1年9月壬戌。

^② 这些使臣到高丽后胡作非为。尤其是蔡斌，在高丽朝廷摆设的宴会上，当妓女为他的帽子插花时，他认为插得不正而大怒。恭愍王得知后，为了讨他们的欢心，将负责操持宴会的侍中廉梯臣流配到广州。五天后，蔡斌又以妓女违悖其意而怒不可遏，竟骑马踏上归途。恭愍王让金兴庆去挽留他，把他带回京城。金兴庆在金郊驿赶上了他，好不容易将他带回开城。当时，高丽朝廷对他们招待得很周到，而国库则已枯竭，只好上各司去搜罗财物充实国库。蔡斌为人性情暴戾，喜欢侮辱下属。高丽朝廷侍中以下的大臣，均曾遭其羞辱。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3年6月丁酉。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明朝朝廷出兵征伐北元余孽，损失了不少军马。今后，明朝大军仍将征讨北元。皇帝陛下估计北元在济州尚有两三万匹马，让中书省移咨高丽，让高丽国王尽快精选 2000 匹骏马送来。高丽朝廷对此不敢怠慢，当即派门下评理韩彦邦去济州，准备明朝朝廷要求选送的马匹。

这年 7 月，韩彦邦一到济州，牧胡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和观音保等说道：“我们是按照元世祖的谕旨在这里饲养马匹，为何要把辛辛苦苦饲养的马，全部献给明朝？”他们只交出了 300 匹马。

当然，这是残留在济州的元朝余孽的一种抗议方式，而说起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反抗。而高丽既已对明朝以小事大，自然也就不能对这样的反抗置之不理。明朝要求选送 2000 匹骏马，而济州牧胡只交出了 300 匹。当时，明朝使臣林密对恭愍王说：“济州交不出 2000 匹马，明太祖便会下令砍掉我们的头。倒不如国王殿下在这里把我们处死算了！”恭愍王无言以对，便召集重臣讨论讨伐济州的问题。大臣们一致为应当立即出兵讨伐济州，肃清济州的蒙古余孽，同时，加强与明朝的纽带关系。

次日（己丑），恭愍王作了部署，任命崔莹为杨广、全罗、庆尚道都统使兼西海交州道巡问使，廉兴邦为都兵马使，李希泌为杨广道上元帅，睦仁吉为全罗道元帅，池渊为庆尚道上元帅，分别率领本道军士出征。同时，以全庾为三道助战元帅兼西海交州道巡问使，一同前往讨伐济州。当时，出动了 314 艘战舰，共调集 25605 名将士。恭愍王晓谕征讨军道：“耽罗位于大海，代代拥戴朝廷已五百年之久。近来，牧胡（喂马的蒙古人）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和观音保等杀死朝廷的

使臣，将高丽百姓作为奴隶，犯下种种罪行。现将孤将节钺交给卿（指崔莹），代孤讨伐胡贼，用以督励将士，尽快荡平胡贼！”

从高丽明廷出动的这支征讨军的规模看来，荡平牧胡势力，当然不在话下。

这年8月，崔莹在罗州荣山阅兵，对全体将士说道：“各道的船只不可混杂，各自在桅杆上挂旗以示区别。每一船只均有指挥官，行列不许紊乱无序。船只一出发，先要整顿好行伍……到达济州之后，分别率领各船将士一齐冲锋，千万别乱成一团。将士要分别占领可以依恃之处，以烟火为号互相通气。所有的将士，要听都统使的号角指挥，不得有误。攻城时，如有百姓倒向敌魁首哈赤那一边，不听从我方的命令，应立即出动将士将其斩首。对于向我方投降者，不准加以打骂。敌酋家产，全部归于官府。缴获公私契券、金牌银牌、印信和马籍，全部交至官厅者受赏……贪图财物不力战者受罚，缴获财宝乘船逃跑者以军法论处。”

次日，征讨军抵达济州，从四面登陆进攻。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和观音保等出动3000多名骑兵在明月浦抗御。崔莹派前济州牧使朴允清送通牒劝降。通牒写道：“此次兴师问罪实乃出于无奈。除了贼首之外，济州星主、王子、士官以及军民均应各安其所。即便是贼首一伙，倘能俯首来降，一律宽大对待。如若违抗，定予处罚。大军到处，玉石俱焚，悔之莫及。”

征讨军登陆后挺进了30里，因天色已晚，只好回明月浦在水边安营。群贼杀害安抚使李下生后，在汉拿山下安营休息。征讨军将士因而缴获了不少马匹而成了骑兵。这时，三个贼首前来讨战，佯装败阵而逃，想将征讨军诱至晓星平原与五音平原，以其骑兵加以奇袭。崔莹识破其奸计，命令部下在群贼进入晓星平原之前急追。敌首只好逃入汉拿山南面的虎岛。崔莹命令前副令郑龙带领40只船包围虎岛，然后亲自率领精兵进攻。石迭里不得已带领妻子和党羽几十人出降。必思肖古、秃不花和观音保仓

皇失措坠崖身亡。崔莹命令将石迭里及其三个儿子腰斩，又割下了必思肖古和观音保的首级，由知兵马使安柱带回京师献给恭愍王作为捷报。

哈赤、石多思万和赵庄忽古孙等率领几百人，在济州东面据城抗战不肯投降。崔莹率领将士攻打他们。他们溃不成军，四下奔逃。征讨军四下搜索，群贼一部分被活捉，大部分被杀死。征讨军缴获了9个金牌、10个银牌、30个印信和1000匹马。所缴获的印信，交给了安抚使。星主和王子的马，分给各州饲养。这年10月，崔莹与部下一起凯旋。这时，恭愍王已被弑而不在人世。

第四节 丽、明外交的尴尬与明朝的刁难

明朝一统中国并将元帝撵至蒙古草原之后，高丽与明朝的关系很快就变得相当密切。高丽在这方面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 废弃元朝年号，改用明朝年号；(2) 对明朝俯首称臣，仪制服用则遵从本国俗；(3) 使用明朝的大统历；(4) 恭愍王十九年5月壬子，使用明朝的王、王后、陪臣宫服；(5) 派贺正使去明都南京祝贺新年。

在对明朝进行亲善外交的同时，高丽与北元仍有使臣来往。恭愍王十九年9月乙巳，北元丞相廓扩帖木儿曾派使者到高丽。

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5月，明朝派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和孙内侍到高丽，向恭愍王赏赐了贵重物品，同时转交了明朝中书省的行文，向高丽致友好之意，表示将把自称汉后帝的陈友谅之子陈理老小和自称夏皇帝的明玉珍之子明升老小等送到高丽。当时，明朝右丞相汪广洋也致函高丽，称明太祖率军驱逐了鞑虏，平定了四方的群雄。陈友谅曾在湖湘自立，国号定为大

汉。明贞（或称明升）以川蜀为根据地，自称大夏皇帝。明太祖出动六师（即六军）攻打湖广，陈氏率部投城。去春命令中山侯与颖川侯率军以水陆两路攻打川蜀，明氏亦含璧请命（即投降）。在叙述了明统一中华的过程之后，其函写道：“明朝朝廷不能让他们久居京城，只好让他们带领妻儿到高丽居住。贵国如果接受，可让其滞留。否则，可打发他们回来。望好生处理此事。”

明朝使臣延达麻失里和孙内侍到达高丽后，过了三天，汉皇帝陈理和夏皇帝明升等与其家小 27 人来到了开城。当时，陈理年仅 22 岁，明升才 18 岁。出人意料的是作为明朝使臣来到高丽的孙内侍，却在其抵达开城后第十天吊死于佛恩寺的一棵松树下。恭愍王接受了明朝的逆臣陈理和明升，并赐给夏布，将总郎尹熙宗之女嫁给明升。这些举措，当然使明朝朝廷满意，然而明朝使臣孙内侍的自尽，尽管其缘由谁也弄不清楚，却给高丽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罩上了巨大的阴影。

1373 年（恭愍王二十二年，明洪武六年）2 月，北元派波都帖木儿和於山不花到高丽。他们带到高丽的北元国书写道：“近因兵乱而北迁，以廓扩帖木儿任丞相之后，元朝几近中兴。高丽国王系元世祖之外孙，理应襄助，为我们平定天下出力。”北元派遣使臣到高丽，对于高丽来说，无异于为高丽和明朝建立不久的外交关系泼上一桶冷水。所以，恭愍王曾想派出杀手，在北元两使臣进入高丽境内后将他们杀死，以使高丽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不致留下祸根。然而，高丽大臣们表示反对，认为杀害他国使者实在说不过去。于是，恭愍王让大臣们就如下的举措发表看法：对于北元的使者，是加以扣留，还是打发他们回国，抑或是引渡给明朝？大臣们一致建议打发他们回国，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的后遗症。根据这一建议，恭愍王于三天之后的夜晚接见了北元的这两位使臣，对他们辩解道：“我有眼疾，白昼一见阳光，双目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便灼痛难忍，故而于夜晚招待两位。”其实，他这样做，是生怕明朝朝廷得知此事。

当时，在刚刚建立不久的高丽与明朝的外交关系方面，还有一个难题：高丽使臣来往于明朝的通路。早在1371年11月，明朝中书省就曾发文于高丽，谈到了如下两点：第一，高丽于8月派郑思道到明朝贺正，郑思道一行人行至梧桐岛，因水浅和船只漏水而未能及时到目的地。(2)9月，高丽派韩邦彦赴明贺正，而船开后突遇暴风，被巨浪击沉。对此，高丽回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高丽距明朝京都很远，气候一旦不佳，就难以航行，耽误贺正日期。与渡海相比，金州与复州等地乃是稍近的驿路（即陆路），经由辽东，几乎同时可以到达金陵。现派韩邦彦前往，他取道辽东，先到辽东都司，然后去金陵。这样改道前往，请大朝多加谅解。”^①

1373年（恭愍王二十二年，明洪武六年）2月，北元使臣归后，高丽又向明朝提出了这个通行路线的问题。高丽派判书张子温到定辽卫，通过外交牒文提出：“高丽曾于此前派郑庇去明朝京都献马，他到达定辽卫时，定辽卫的守门官不让其入城，声称‘明太祖已下诏书，说由于山东新近归属百姓很多，来来往往多所不便，勿让高丽使臣经由这一路线来京。’这样一来，郑庇就无法到明朝朝廷，只好返回。”其旨在向定辽卫通报：这种做法，已使高丽到明朝京都的陆路通行路线阻碍。遂提出了如下要求：“我们只是听说此路不许通行，却未收到明文规定的通牒，因而不知其伪。倘若明朝朝廷确实有这样的明文规定，请移咨作答。”明朝定辽卫的总兵官就此对张子温说：“根据明太祖的谕旨，高丽使臣只能由海路入境。”张子温未能得到诏书式的回答，只好

^① 参阅《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0年11月乙亥。

返身回国。

总之，当时在高丽与明朝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第一，明朝使臣孙内侍之死；第二，高丽与北元的地下外交；第三，两国通行路线，明朝朝廷只开放海路，陆路则不准通行。于是，高丽与明朝之间有一个时期以上述这些问题为主，进行了外交斡旋。

1373年7月，赞成事姜仁裕，同知密直司金湑、成元揆，版图判事林完、洪师范和书状官郑梦周等，到明朝京都祝贺明军平定川蜀，然后一起归国。姜仁裕等于1372年12月7日曾去中国浙江，得到明朝中书省派来的礼部主事王本道转达的明太祖谕示。此谕示让高丽使臣一行晋见明太祖，听取明太祖的指示。12月8日，太仓卫让高丽使臣分乘两艘快艇，由镇抚周成礼负责护送到金陵。12月20日早晨，高丽使臣一行晋见了明太祖。

当时，体现明太祖的旨意的一份宣谕，大抵有如下的内容：

第一，明朝朝廷前次派往高丽的老院使延达麻失里和两个内侍，没能及时返回，明太祖对此深感奇怪。后来，听说孙内侍已死，或说系病死，或说他系自杀。我们派人去仔细了解，才知道实情。原来，明朝使臣到高丽的开京之后，高丽国王派了全副武装的军士经常监视他们。有个姓朴的宰相，不把孙内侍说的话当回事，一拳把孙内侍打倒，又灌之以毒药，毒死了他……这个家伙生怕毒死孙内侍的痕迹被人发现，等到孙内侍嘴里生蛆之时，向明朝明廷通报说孙内侍自尽。明朝使臣孙内侍之死，成为高丽与明朝关系上的一大悬案。

第二，高丽每年派人到明朝的次数为三四次，送来了不少东西，朕焉能一点回答也没有？所以，朕让老院使和两个内侍带了一些纱罗去高丽。然而，高丽把这个孙内侍杀死了。他并非高丽派到明朝者，也非高丽逃避贼役者，而是朕从元朝官廷里挑选出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来带到朕宫中的内侍。今后，高丽每三年进贡一次即可！

第三，高丽竟然派人到中国来侦察明朝朝廷的情况，怎么就这样不相信我们呢？高丽人来我们这里搞间谍活动是有证据的。去年过新岁，高丽派来祝贺新岁的使节中有个姓韩的人说是不懂汉语。后来，他的形迹可疑，被有关人员绑住手脚往水里一扔，他知道不妙才说出了汉话，而且说得很好。他们来明朝朝廷时，从陆路来，而归国时却说要走海路。这不是搞间谍活动的证据是什么？今年，高丽来祝贺新年的贺正使之中，也有人从事间谍活动。这个姓李的内侍是高丽人，已经来过两三次。此人见到鞑鞑人，说鞑鞑语，见到一般内侍说高丽语，见到中国人说中国语，从而趁机从事间谍活动。高丽国王派人到辽东等地，给吴王送粮食财物，为他设宴，这也是搞间谍活动。这些人还与纳哈出的部下一起，侦察明朝兵营的情况。高丽招待徐总官徐达，也是为了侦察北平府军官的情况。

第四，高丽国王没有主见没有胆识，连年幼者也不放过。也就是说，我们在元朝京城找到了一个13岁姓周或是姓宋的高丽少年，送给他的亲人，使之与亲人相见。而高丽则把他们的父亲流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高丽国王通过信函说他丢失了侄女（长宁公主）。朕得知后，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还给了高丽国王。后来，名叫金哥的内侍回来说，高丽朝廷认为她不是国王的侄女，而把她杀死了。

第五，高丽朝廷常常说要献济州马，今天也说送，明天也说送，说了一年，才送来了四匹。高丽的商人，不贩马来卖，只贩一些无关紧要的布和草席。这是怎么一回事？朕真是无法理解。

第六，你们去太仓，趁风向好的3月间回国去吧！以后，别从海路来啦！如果想从海路来，让那些清廉勤政有能耐的中举者和官吏前来（弦外之音是别派间谍来，防止作间谍者混在商人之

中潜入金陵)。

第七，我们把使臣派到高丽，你们却把他们杀死。朕不拟再派使臣啦！然而，高丽可以随便，想派使臣就派来，不想派嘛，就不必派出。这样说的意思是：今后，两国之间不互派使臣也无妨。

第八，高丽可以派 200 名到 300 名清廉得力者到我们这里来。朕会把他们安排在省、台、六部或各卫，任命他们当明朝的官吏。这样做，从高丽来说，不是比派人到明朝来做生意和做间谍更强一些吗？

明太祖还对姜仁裕等高丽使臣说：“你们回去之后，把朕说的这些转达给你们的国王！”“高丽如果对明朝疑心重重，可准备好军马、炮石、箭矢和弓，前来较量较量！”明太祖说道：“朕如果去征伐高丽，将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朕一打定主意，便会在三个月内从明州、温州、泉州、太仓、广东和四川把军队调集起来。”^①

明太祖这席话，列举了明朝与高丽之间当时存在的种种悬案，对高丽提出了抗议。当时，明朝认为高丽尽力在侦察明朝的情况，是不可信赖的邻邦。所以，对高丽采取了强硬态度，甚至往后可以断绝使臣来往，如果想以兵力较量，明军奉陪到底。相处到了这种地步，两国关系的恶化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随时都有可能绝交而反目成仇。

另一方面，明朝的中书省致函高丽朝廷云：“洪武五年（1372 年）10 月 22 日，金湑等上呈的祝贺洪武六年的表与土产

^① 参阅《高丽史》卷 44，世家恭愍王 22 年 7 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 29，恭愍王 22 年 7 月。参阅末松保和著《丽末鲜初的对明关系》，该文刊载在岩波书店出版于昭和 16 年的《史学论丛》第 2 期。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 282 页。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品业已收到。姜仁裕等上呈的谢恩表文与土产品也已收到。”接着，转述了10月23日明太祖接见金湑等使臣时所作的谕示，亦即：“最近，朕让延答里麻失里把明升等的家小带走时，曾叫高丽中书省把朕的意旨告诉高丽国王。”这又转达了明太祖的谕旨：“高丽每年多次派人前来献土产品，今后勿这样做。”因为，第一，这会劳民伤财；第二，使臣来往得渡海，其间难处不少。近来，高丽使臣洪师范从明朝京师回高丽，在海上遇到旋风，船被大浪击碎，他不幸落水溺死。倘若其同行者如书状官郑梦周等都溺死，在两国之间将免不了会有许多话柄。第三，自古至今，中国的诸侯对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在九州（即中国）之外的藩国和距离太远的国家，每三十年作一次朝聘。高丽的文化经史虽然与中国类似，而且一向很亲近，最好还是按惯例来办事。^①

这说明明朝为了减轻高丽的负担，不是一味施恩布惠，而是让高丽与周边的其他国家按惯例行事。

这年10月，高丽派密直使周英赞去明朝贺正，献上24匹马和两头驴，同时上呈陈情表和谢恩表。

高丽陈情表的内容有：第一，高丽国王怎么会居心叵测地欺诳明太祖呢？第二，高丽早就想派六七名童子到明朝，明朝有关方面却抗议说明朝怎能一下子接受300名留学生？陈情表写道：臣（指恭愍王）尽到了一切礼节，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臣竭诚尽忠，却不知如何才能更加引人注目。陈情表以宽洪大量的气度，请天朝见谅和多多赐教，写得可谓十分婉转。

高丽的谢恩表写道：“（一）老院使既联床而共眠，何来鸩杀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2年7月。《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7月壬子。《高丽史》卷117，列传30，郑梦周传。

老院使？（二）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三）武卫乃有国之常也，视为迎诏之不恭，宾馆无持兵之理也。（四）责为典客者有备，有旧朝之遗烬与纳哈出之游魂，而如矛盾之不谐，犹日辅本之相附。（五）取亲奉化（浙江省地区），修聘北平，以至朝觐之骏奔，皆谓觐伺之狙诈。（六）感谢天朝准许高丽子弟入学。（七）感谢天朝在高丽使臣所乘之舟颠覆之时所给予的关怀，感谢天朝让幸存的高丽使臣从陆路归国。”谢恩表最后写道：“臣谨当佩服圣谟涵濡洪造，庶无亏于臣节，恒上视于皇龄。”^①

高丽在上述的陈情表与谢恩表中，作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表示了对明朝和明太祖的满腔忠诚。

这年11月，高丽又派张子温到明朝中书省作了如下的要求：“倭寇来侵，忽来忽去，至今已延续了二十多年。过去，小邦只是在沿岸的州郡要冲配备了军士，只重守备，未追击倭寇，并以逮捕。近年来，敌势愈炽，小邦已命令军士下海追击倭寇，将其逮捕归案，以使百姓没有受害之虞。小邦已派官吏督造足以捕获倭船的大船，只是船上应有的装备如机械、火药、硫磺和焰硝等仍不足，请帮助解决为荷。”^②

这样一来，明朝朝廷对于高丽的不信任总算有所转机。

这年12月，高丽大护军金甲雨从明朝京都回高丽时，明太祖亲拟诏书让他带给恭愍王。这份诏书这样写道：“自古以来，君主身在中华，威披四方夷狄，使之互相往来，一至于今。在他们之中，依理治国而洪福齐天者有之，由于距中华过远而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终致罹祸者亦有之。回顾以往，善为世人所赞

^①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10月乙酉：“两院使既联床……恒上视于皇龄”。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2年10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11月乙丑。《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2年11。

第二十八章 元、明交替期的两面外交

美，而愚则为世人所厌恶……朕对海东（指高丽）未曾布恩施惠，而一直以王心为朕心……王亦能以朕心为王之心否？”^①

为了使自己与明朝的关系更亲善，高丽于1374年（恭愍王二十三年，明洪武七年）2月，派密直副使郑庇和判事禹仁烈到明朝，一方面祝贺新岁，另一方面请求明朝朝廷允许高丽使臣从陆路去明朝京师，请求允许高丽使臣如以往年年进贡，而不是三年一贡。恭愍王还让周谊代他上呈给明太祖一份请恩表，求恩准高丽使臣来往于陆路并恩允上传下达。

这年6月，郑庇一行从明朝归国，明太祖让他回国后向高丽朝廷传述如下两点：郑庇等带来的礼物过多；高丽所用的太府监名称系元朝的制度，明朝不设置这一机构，高丽这样做，违悖了事大之礼。明朝的中书省也发文给高丽朝廷，指出：高丽所请求供应之火药、硫磺和焰硝，天朝确有不少，但是，所需使用之处极多。高丽生产硝和硫磺之后可与其他药品配合使用。今后，高丽使臣来往仍走海道，不许从陆路往来。^②

由此可知恭愍王的独立自主精神，表现为外柔内刚，不屈服明朝的压制，自然也就难免受到明朝朝廷的干预。

这年9月，明朝使臣林密与蔡斌等从高丽京城回国，恭愍王派密直副使金义带了300匹马，送到明朝新设于辽阳的定辽卫，恭愍王又派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将一份表章交给林密与蔡斌，请他送至明朝中书省。这份表章感谢明朝朝廷指明了朝贡之路，请明朝朝廷将明朝的冠服送给高丽朝廷。这份表章倾诉了这样的苦衷：高丽使臣想通过辽东去明朝京都，两次受到明朝官吏的阻挡，只好又从海路来往于明朝京都。

^①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12月癸丑。

^②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3年2月甲子、6月壬子。《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3年2月、6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事件与 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第一节 恭愍王被弑与禑王的即位

恭愍王即位之后，竭尽全力勤政善治，努力恢复北方的领土，使高丽步入中兴之路。他一方面灵活处理与已经快要灭亡而又与高丽密不可分的前元关系，另一方则很好地推进了与刚建国不久的明朝的友好关系。然而，1365年（恭愍王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2月，鲁国公主在结婚15年之后终于怀了孕，但在即将分娩时因病重而死。恭愍王为此万分伤心，几乎寝食俱废。^①

① 恭愍王在其宠爱的公主（亦即王妃）过早去世之后，心情过于悲痛，便亲手画了公主画像，张挂于壁。日夜进餐时万分忧郁，三年不食肉，却总是坐在公主画像前劝公主进食。还在王轮寺东南面修建公主的影殿，每年都辟于这里。当时，洪伦、韩安、权璠、洪宽、卢瑄等是子弟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受到了恭愍王的青睐，常常在国王寝殿侍候王。恭愍王素不喜女色，性功能低下。公主在世之时，恭愍王很少与之同房。公主死后虽然先后娶了几个王妃，却分别置之于别宫，不去行幸。由于郁郁成疾，患上心病，常画女人像。起初，他让年轻宫女到其房间里，用布蒙住她的脸，让金兴庆和洪伦等奸污她，他自己则在别的房间里从门缝中窥伺。如果动了心，便把洪伦等叫到寝室里作房事。他让子弟卫的几十人轮流如斯，赏赐给他们不少贵重物品。参阅《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1年10月甲戌。参阅《高丽史》卷125，列传38，奸臣2，金兴庆传。《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1年10月。《高丽史》卷131，列传44，叛逆5，洪伦传。《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恭愍王条鲁国大长公主。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一面外交

此后，恭愍王郁郁成疾，竟将政务交给妖僧辛吨主持。性格也完全变态，竟于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10月设置了子弟卫，抽调一些年轻英俊的男子厮混其间，让代言金兴庆负责掌管。

恭愍王还让洪伦和韩安等与王妃们私通，想将如此这般生下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大部分王妃拒绝干这种丑事，只有益妃与洪伦等私通，怀上了孕。^①

一天，恭愍王如厕，宦官崔万生秘密地向他奏报：“臣去益妃殿，听到益妃已怀孕五个月了！”恭愍王大喜，说道：“我一直忧虑无后嗣可传位，如今益妃已经怀孕，我可以放心啦！”少顷，问道：“与谁人有关？”崔万生奏报：“益妃说与洪伦私通所得。”恭愍王吩咐道：“明天，你让昌陵佯装发酒疯，杀掉洪伦等灭口。还有，你也知道得太多了，难免一死。”崔万生惊恐，便与洪伦、韩安、权璠、洪宽和卢瑄等密谋弑王。

1373年（恭愍王二十三年）9月甲申夜，这伙人潜入恭愍王寝殿。崔万生见恭愍王喝得酩酊大醉，便拔剑杀王，恭愍王脑浆四溅。权璠、洪宽、卢瑄、韩安等也拔剑乱捅恭愍王。恭愍王登

^① 恭愍王让金兴庆、洪伦和韩安等与几个妃嫔通奸，以便为他生子，好有个后嗣继承王位。然而，他要定妃（即安氏，竹州人，竹城君安克仁之女）与这些人私通时，她解发赤足要吊死。他大惊，只好作罢。他要惠妃（李氏，鸡林人，府院君李齐贤之女）与这些人私通时，她断然拒绝，决不肯俯就。他要慎妃（廉氏，瑞原县人，曲城府院召廉悌臣之女）与这些人私通时，她也坚决不从。只有益妃（韩氏，宗室德丰君义之女）在恭愍王要她与这些家伙乱来时，始而加以拒绝，后来禁不住恭愍王以枭首相威胁，才惧怕得只好顺从。从此，洪伦等以奉恭愍王之命为借口，与之私通，她明知他们往往假传王命，却无法拒绝，终于怀孕。祸王登上王位后，台谏轮番上书，请求将益妃所生之子杀死，而祸王未予准许。起初由中郎将金元桂收养此子，在家里进行抚育。事发后方知此子非男实女。台谏请求审问益妃，祸王不允，说道：“此乃先君之错。”

时死于非命。这就是恭愍王被弑事件。^①

恭愍王突然被弑后，王位的继承成了一个大问题。

恭愍王因无子嗣，曾一直为此忧心忡忡。1353年（恭愍王三年）4月，恭愍王与鲁大长公主曾到福灵寺求子。1359年（恭愍王八年）4月，大臣们见鲁国大长公主尚未怀孕，便建议恭愍王以民女为妃，以便生个儿子。于是，恭愍王娶了李齐贤之女，封之为惠妃。1368年（恭愍王十五年）12月，妖僧辛吨以王无后嗣需选新妃为名，将王义、安克仁、郑万、郑良生之女叫进内庭，选中了王义之女，封之为益妃，赐姓韩，安克仁之女则被封为定妃。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3月，恭愍王担心自己没有后嗣，而想把毅陵改葬。1371年11月，恭愍王娶廉悌臣之女为妃，封之为慎妃。然而，纳了这么多妃，还是无子。只有益妃被迫与洪伦等私通之后生女。^②

从正史的记载看来，恭愍王无子继承其王位。而有的史料却记载其有子，即后来即位为禡王的牟尼奴是恭愍王之子。据说，

^①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3年9月甲申。《高丽史节要》131，列传44，叛逆5，洪伦传。《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3年9月甲申。崔万生与洪伦是弑害恭愍王之主犯，禡王即位后，下令灭其三族。韩安、权瑄、洪宽、卢瑄等用及其父子均被斩首示众，其族或被杖流或成为官婢。

^② 参阅《高丽史》卷38，世家恭愍王2年4月乙卯。《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8年4月丙戌。《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恭愍王条徽懿鲁国大长公主。参阅《高丽史》卷132，列传45，叛逆6，辛顿传。《高丽史》卷89，列传2，后妃2，恭愍王条惠妃。《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3月甲午。《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8年4月。《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19年3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恭愍王有时微行至和尚辛盹^①宅。辛盹有侍女（有的史料说是婢妾）名叫般若，颇有几分姿色，恭愍王与之同床，遂生下了牟尼奴。恭愍王也曾亲口说过此事。所以，恭愍王在将辛盹斩首并杀死辛盹两岁之子时，曾把牟尼奴叫到明德太后宫，将元子（即牟尼奴）托付给守侍中李仁任，并且言及此事的来龙去脉。^②

而《高丽史》祸王条则作了如下的记载：祸王年幼时的名字是牟尼奴，系辛盹之婢妾般若所生。或谓般若快分娩时，辛盹让她去挚友能佑母家生下男婴，由能佑母亲负责抚养。不到一年，男婴夭折。能佑母生怕辛盹发火，便想寻觅一相像的男婴取而代之。后来，把邻居一军兵的男婴偷走，置于他处，而向辛盹说孩子有病得换个地方抚育，辛盹表示同意。就这样，过了一年，才把这个男孩带回家里，以同知密直金铉所献之女仆金庄为其乳母。于是，连母亲般若也不知这个孩子实际上并非其亲生子。

恭愍王平日一直因无后嗣而忧心忡忡。一天，去辛盹家里小坐。辛盹指着这个男孩说：“但愿殿下能以之为养子，了却一桩心愿。”恭愍王对这个男孩笑了笑，并未作答，内心却有了这样的愿望。于是，辛盹暗地里让其党羽吴一鸞写了一张字条，到洛山向观音菩萨祈祷：“请让弟子之孩子牟尼奴福寿住国。”

^① 辛盹的母亲是桂成县王川寺的尼姑。辛盹从小就是和尚，名遍照，字耀空。他不识字却常常到京城劝人信佛，曾诱奸过好几个寡妇。士大夫妻子受其蛊惑，以之为神僧，听其说法向其求福，他便与她们私通。恭愍王封辛盹为真平侯，从此，他集尊敬与权力于一身。辛盹后来干尽各种坏事，甚至企图侮辱国王。1371年（恭愍王20年）8月辛卯，辛盹一伙全部被诛杀。参阅《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0年8月辛卯。《高丽史》卷132，列传45，叛逆6，辛盹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2，列传45，叛逆6，辛盹传：“盹婢妾般若生牟尼奴，王以必己子，是必祸。”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祸王条初。

还有一种说法是：禡王实为故宫人韩氏所生，有人还查清了韩氏的三代及禡的外祖父。^①

总之，既有恭愍王有子之说和无子之说，也有恭愍王有个名叫牟尼奴的儿子的说法。更令人困惑的是：有人说牟尼是辛吨的婢妾般若与恭愍王所生，也有人否认这种说法，说牟尼奴是辛吨或之外的其他人与般若所生。这些说法，分别见诸高丽的正史。而时至今日，却已难于分辨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何况后来，般若事件发生之后，金续命还说过：“普天之下，分辨不出父亲是谁者是有的，而我还未听说有分辨母亲者。”这是讽刺牟尼奴的说法。

1373年（恭愍王二十二年）7月，恭愍王给牟尼奴取名为禡，封之为江宁府院大君。后来，恭愍王一心为牟尼奴着想，让其就学，命令成均直讲李崇仁教他断文识字。明德太后（忠肃王之王妃，恭愍王生母）表示反对，说道：“等这孩子长大后再就学也为时不晚。”恭愍王说：“我来日不多，也许很快就会死去，倘若现在不安排后事，该把社稷托付谁？”^②从这次对话看来，可知明德太后并不认为牟尼奴是恭愍王的儿子。

王子禡既然有了以上这样的背景，恭愍王被弑之后，王位继承问题便成了众目所瞩的大事。明德太后与侍中庆千兴想在宗亲之中挑选一人继任国王。守侍中李仁任则想立禡为国王。都堂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2，列传45，叛逆6，辛吨传。《高丽史节要》卷30，辛吨条初。关于这种种说法，许多条，史家认为《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是李朝编纂的，李氏朝鲜为了贬低高丽王朝，对史实作了加工。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吨恭愍王23年9月。《高丽史》卷111，列传24，金续命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7月乙巳。《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吨条初。《高丽史》卷114，列传27，李寿山传。《高丽史》卷89，列传2，忠肃王条明德太后。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即议政府)则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这时,判三司李寿山说:“如今之计,以立宗室为上。”他显然支持明德太后与侍中庆千兴的主张。而永宁君王瑜和密直王安德等则附和仁任的说法,大声说道:“王(指恭愍王)在世之时,已选中了大君(指禔),怎可舍此求乎彼,怎可舍近求远?”

结果,仁任率领百官推戴禔为国王。当时,禔才10岁。^①这年10月,禔王下达教示:“洪武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社稷宗亲与大小官吏遵从先考(即恭愍王)遗命,秉承王大母(即明德太后)意旨,让我继承王位。全国百姓各宜尽心遵守先王之法度与教示,助孤治国定邦。”紧接着,禔王赦免辛吨等人不予追究。^②

第二节 围绕禔王即位的对元外交

明朝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在恭愍王在位期间,高丽一心想改善对明外交,而明朝则以种种借口刁难高丽。这样一来,两国的关系起初并不那么和谐。

恭愍王被弑,禔王即位之后,为了使其正统性受到承认,高丽朝廷开展了对明朝与北元的两面外交。

当时,高丽的新国王即位,只有受到统治中国的皇帝的册

^① 参阅《高丽史》卷列传46,辛吨条初,恭愍王23年丙戌。《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参阅《高丽史》卷111,列传24,庆千兴传。

^② 参阅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及北元的关系》(一),该文刊载在史学会出版于大正7年的《史学杂志》29—1,见其第63页。参阅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抄》卷1,太朝康献大王实录1,太祖元年秋7月丁酉。

封，被册封为国王才具有正统性。虽然对内治与外交，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与拘束，而只是在名分上必须经过这样的步骤不可。

于是，高丽朝廷于这年11月，派密直使张子温和典工判书闵伯萱去新兴之国明朝，送去了恭愍王遽逝的讣告，请求明太祖赐予恭愍王谥号（当时，高丽国王世后，得由中国皇帝赐之以称号），并承认禡王继位为高丽国王，给予册封。

而在此之前，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前面提到的明朝使臣林密和蔡斌回国时，护送他们的高丽人金义在途中杀死了蔡斌及其子，林密则在被拘禁了几天之后，被强行押解到了北元。关于高丽此时的对明外交，将在后一节里详细叙述。

这年12月，侍中（相当于首相）李仁任派判密直司事金湑到北元，告之以恭愍王之丧。^①李仁任倾向于北元，他派使臣去北元传述高丽国王的讣告，耐人寻味。当时，亦即在恭愍王被弑之三天前，传言有个蒙古僧侣从北元来到高丽对康舜龙说：“蒙古后帝已册封沈王的孙子脱脱不花（或称笃朵不花）为高丽国王！”恭愍王得知后，曾命人将这个蒙古僧侣和康舜龙（回回人，作为齐国公主私属人来到高丽）捉拿入狱，讯问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谣言曾在高丽广泛流传。由于恭愍王没有儿子，这样的风闻自然也就得以传开，且信者众。

当时，有人对李仁任说：“自古国君见弑，为宰相者先受其罪。帝若闻先王之故兴师问罪，公必不免。莫若与元和亲。”^②

^①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屯条，恭愍王23年12月。《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3年12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禡王条，恭愍王23年11月、12月。《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或谓仁任曰：‘自古……莫若与元和亲。’仁任然之。”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李仁任认为说得有理，便派金湑去北元，告之以先王有子，旨在一方面防止北元拥立脱脱不花，另一方面借助北元之势力预防明朝可能会对高丽朝廷施加的压力。

李仁任在接受上述这样建议的同时，倾向于排明亲元，认为亲明排元不如排明亲元，竟然制订了杀害明朝使臣的计策。也就是说，他在明朝使臣林密与蔡斌一行人踏上归途之时，让赞成事安师琦去护送他们，同时私下指使护送官金义（原为胡人，本名也到哥，恭愍王被弑之前已被任命为同知司事）杀害明朝使臣。金义遵命，在使臣赴明途中，在开州站杀死了蔡斌及其子蔡执密，然后带着林密和随行的300名军人以及准备献给明朝朝廷的200匹马，投奔北元的纳哈出。这样一来，弄得人心惶惶，高丽有一段时间不敢派使臣到明朝，生怕遭到报复。^①

1375年（禡王元年）1月，纳哈出派使者到高丽，正式干预高丽之王位继承。该使者问道：“前王无子，今谁嗣位耶？”北元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及帝使蔡斌等还，仁任遣赞成事安师琦阳言饯行，密谕金义中路杀斌等以灭口，义遂杀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惧，未敢通使朝廷。”《高丽史》卷131，列传144，叛逆5，金义传：“朝廷使臣林密、蔡斌等还，命义护行。斌醉酒，每欲杀义。义不能堪，欲害之。李仁任亦恐朝廷问恭愍王之故，遣安师琦密谕义杀斌等以灭口。至开州站，义遂杀斌及其子执密，以甲士三百人进献马二百匹，奔于纳哈出。”参阅《高丽史》卷112，列传25，朴尚衷传。参阅金岸基《新稿高丽时代史》第167页，东国文化社出版于1961年。参阅《高丽史》卷117，列传30，郑梦周传：“初皇朝肇兴，梦周力请于朝，首先归附。至是恭愍被弑，金义杀使，国人恟恟，不敢通使朝廷。”参阅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及北元的关系》，（1963年）1918年《史学杂志》29—1、2、3、4，吉川弘文馆《朝鲜史研究·中世篇》3，第274—280页。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82页。

以恭愍王无嗣，乃封沈王暠之孙脱脱不花为王，故有是问。^①当时，侍中李仁任等虽然采取亲元路线，却反对北元的这一要求，不想让脱脱不花继任国王。他们这一伙人知道，由他们推戴的禡王地位哪怕有丝毫动摇，对他们来说也是很不利。

于是，这年2月，他们让禡王下达了这样的教示：“孤于幼年继承先王之伟业，位居臣民之上……仰各内外大小官员尽心尽意以社稷为重，不为流言蜚语所惑，谨遵职守各安其业。”然而，北元并不甘心，或直接或间接地向高丽施加压力，必欲达到其以脱脱不花为高丽国王的目的。4月，李仁任等任命判密直李子松为西北面巡问使兼平壤尹，以赞成事池渊为西北面都元帅，以问下评理柳渊为东北面都元帅，征发各道的军士，防备北元兴兵入侵。^②

李仁任率领百官到孝思馆，在高丽太祖画像前宣誓：“本国一些无赖之徒挟沈王之孙来北方边境觊觎王位，朝廷百官誓死阻遏其阴谋之得逞，鼎力襄助嗣王（即禡王），推戴为高丽国王。”还表示要大行仁政，振兴高丽。

这时，北元派使臣来到高丽。李仁任以赞成事黄裳为西北面体察使，让他到江界慰问北元使臣，劝其回北元。李仁任等的这一招，可谓防患于未然。这样北元使臣也就无法到高丽朝廷侈谈脱脱不花继承王位的问题，高丽朝野也就不致造成混乱。

紧接着，杀死明朝使臣后逃往北元的金义部下来到了高丽。当时，李仁任与安师琦对他接待得很热忱。典校令朴尚衷见此情

^①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禡元年正月：“纳哈出遣来问曰：前王无子……故有是问。”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正月、4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禡元年4月。《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高丽史》卷111，列传24，林朴传。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一面外交

景连忙向禡王上诉，列举了亲蒙派的四大罪状，对之进行了声讨。这份上诉状写道：“对明朝以小事大，是先王之意旨。先王被弑尸骨未寒，就大肆提倡亲元，必会使殿下得罪上国。此亲蒙派罪状之一也。吴季南在北方进行防御时，随意杀死定辽卫的人，然后妄图掩饰这一罪行。亲蒙派与歹徒惹祸危国害民。此其罪状之二也。金义杀死明之使臣，抢走献给明朝之马而叛变，此乃弥天大罪，为天下所共诛同讨。而今金义之同伙前来高丽，却对之不加追究，不思此罪将危国害民，将使宗社灭绝。此亲蒙派罪状之三也。金义叛逃已逾月，却不向明朝朝廷通报。崔源想去明朝朝廷，他们却胆敢违抗国王命令不让崔源去，以致又耽误了几个月，使明朝朝廷更加疑窦丛生。此亲蒙派罪状之四也。”这份上诉状接着写道：“这四大罪状，仅有一便足以定为死罪，何况四罪俱有，不予治罪怎可服众。”^①

刚好判事朴思敬从北元归来，向太后奏报：“纳哈出言尔国宰相遣金义，奏王薨无嗣，愿奉沈王为王，故帝封沈王为尔主。若前王有子，朝廷不必遣沈王也。”太后召李仁任曰：“宰相遣金义如元，予闻此言久矣。卿等独不知乎？”^②

于是，朴尚衷的上诉状被移至都堂（议政府的别称）。辛禡将安师琦下放至巡卫府。安师琦逃走，然后悄悄自尽。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2，列传25，朴尚衷传。《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高丽史》卷46，列传46，辛禡传，禡王元年5月。《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条，禡王元年4月。《高丽史》卷117，列传30，郑梦周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元年4月：“判事朴思敬还自北元，白太后曰：‘纳哈出言：尔国宰相遣金义奏王薨无嗣，愿奉沈王为王。’故帝封沈王为尔主。若前王有子，朝廷不必遣沈王也”。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义如元，予闻此言久矣。卿等独不知乎？’”

李仁任得知此事后说：“让金义逃往北元者，是赞成康舜龙、知密直赵希古和同知密直成大庸等人。”

通过这些有关记载，让人感到让金义投奔北元者正是宰相李仁任自己。李仁任立辛禡为王，为的是想独揽大权。他之所以要佯装赞成立沈王为国王，是想密切高丽与北元的关系，使北元势力卷土重来。这样一来，他便可以使人们以为杀害明朝使臣乃是高丽宰相不得已按照北元的指使行事。逃至北元的金义，也谎称传述李仁任的要求，请北元推戴沈王为高丽国王。实际上，李仁任并未对之做这样的指使，而是金义与来自北元的康舜龙、赵希古和成大庸等勾结搞出的阴谋诡计。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因为恭愍王无子，其继承者不明确，令人难以定夺而导致的。

于是，李仁任与高丽王室宗亲、元老和文武百官一起联名上书北元中书省。当时，侍中庆千兴未署名。这份联名奏章，提到高丽元宗在位之时与蒙古世祖特别密切的关系，提到元宗之后几位国王以蒙古王室之公主为王妃，元宗则成为蒙古国王驸马的特殊关系，然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完泽秃沈王曷的孙子脱脱不花，不属于嫁到高丽的公主血系，却恬不知耻居心叵测觊觎王位，可谓完全违悖了蒙古世祖之旨意，请北元皇帝制止其非分之念。”^①

1375年（禡王元年，明洪武八年）8月，泥城（即昌城）万户火速奏报：“沈王母子带金义和去年12月去北元的进奉使金湑，已经到达信州（奉天怀德）。”这样一来，高丽百姓复又人心惶惶。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高丽史》卷91，列传4，宗室2，忠烈王条曷。参阅《高丽史》卷111，列传24，庆千兴传。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高丽朝廷则任命知门下府使林坚味为西京上元帅，同私密直李元桂为元帅，池渊为西北面都体察使，密直副使赵仁璧为东北面元帅，又向各道征发军队，以对付不知是否实有其事的沈王一伙和北元的军事挑衅。

9月，西北面都体察使池渊要求增派军士，高丽朝廷便任命三司左使李希必担任都指挥使，率领军士踏上征途。同时，给所有寺庙主持僧一匹战马，征收各寺庙的土地税充当军用。^{*}另以密直副使李琳为西北面宣慰使，负责侦探敌情。^①

李仁任对北元采取的是怀柔政策。1376年（禡王二年，明洪武九年）2月，在委派李之富到明定辽卫改善关系并探听虚实的同时，派出李源实到北元，与纳哈出改善关系。纳哈出于5月派吴抄儿志到高丽表示答谢。高丽对吴抄儿志接待得很隆重。

7月，作为进奉使去北元的金湑从纳哈出的兵营脱身回国。在此之前，和尚小英等几名同伙去北方，悄悄给沈王送去一封书信，信上写道：“而今高丽混乱，大臣弑君，权臣独揽大权，人心不服。倘能趁机率兵前来，必能成就大业。”金湑截获此信，当即报告朝廷。朝廷将小英下狱审讯，小英供出了实情。^②由此可知，当时在高丽国内不但支持沈王的团伙，也有一伙人支持沈王的孙子脱脱不花。

然而，在这年10月，北元派兵部尚书李哥帖木儿到高丽，转交了北元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的一封信。它写道：“由于先王无子，我朝考虑到贵国久而无王必生祸乱，曾想派王族去贵国料理先王之后事，不料我朝使臣在贵国受阻。当时

^①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禡王元年8月、9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元年8月、9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6，列传46，禡王2年2月、5月、7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2年2月、5月、7月。

我朝本想兴兵问罪，转而一想，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必有不少牺牲，故而悄然作罢。于是，脱脱不花暂时停留于辽西，一兵一马未曾过江，等候高丽幡然悔悟。”这是软弱无力的威胁。接着写道：“先君去世已满两载，脱脱不花也已驾临国境地区。由于北与蒙古为邻，南与朱寇紧靠，王子（指禡）充其量也只能得到一半百姓的认同。……回想起来，当时，贵国不回归北元而事朱寇，即使对之五体投地竭尽忠诚，嗜侵夺如癖的朱寇也必会百般刁难贵国。……王子（禡王）务须回心转意，按照我朝之旨意，厉兵秣马，相互呼应，以朱寇为敌，襄助我朝中兴。”纳哈出还派右丞久住，将高丽行人（负有某种使命者）文天式送回开京。^①

紧接着，高丽派密直副使孙彦到北元，以高丽百官的名义上书北元中书省。它写道：“高丽自元宗与元世祖保持密切关系以来，忠烈王成了元世祖的驸马。……伯颜帖木儿（即恭愍王）之子牟尼奴，现已即位为国王，等候大朝的承认。去岁呈上国书，业已提到这一点。出乎意料的是，金也烈哥（金义的蒙古名字）竟然依附与本国王室毫无关系的沈王完泽秃的孙子脱脱不花，结成狐群狗党欺瞒朝廷，妄想践踏小国之国境。”显然，它是想强调禡王的正统性和要求北元尽快承认禡王，给予册封。它认为子继父位乃是古往今来各国王位继承的惯例。亦为人间之正道，要求代为逮捕脱脱不花一伙歹徒，早日引渡给高丽。

不久，高丽派开城尹黄叔卿赴北元，作为纳哈出派九住到高丽的答礼。当时，纳哈出对黄叔卿说：“我从来就不想与高丽兵戎相见。”很明显，纳哈出对高丽采取的是软化政策。12月，北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2年10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2年10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元派使者到高丽，赐给高丽朝廷一些白金与羊。^①

北元在深思熟虑之后，于1377年（禡王三年，明洪武十年）2月，派翰林承旨孛剌的到高丽，以诏书册封禡王为高丽国王。这份诏书写道：“蒙古一直为高丽王位的继承而忧心忡忡。在对高丽宗亲中的人选作了认真考虑之后，下诏让脱脱不花继任国王。而今听说伯颜帖木儿（恭愍王）有子名曰牟尼奴，遂派使臣加以探问。……兹封牟尼奴为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它叮嘱牟尼奴（即禡王）竭诚让黎庶安居乐业，像先祖一样，对北元以小事大始终不渝。^②

当时，对于业已日薄西山的北元来说，已无力坚持让脱脱不花当高丽国王，只好顺水推舟按高丽权臣的要求行事，以此博得高丽的欢心。于是，北元便像对忠烈王以后的历代国王一样，赐予禡王以相同的称号。另一方面，这也是高丽的权臣李仁任绞尽脑汁贯彻其推戴牟尼奴为国王计划的结果。

紧接着，纳哈出派文哈刺不花到高丽谋求两国保持友好。北元还派豆个达参加弑身亡的恭愍王之祭祀。由于北元如此这般博得高丽的欢心，高丽竟又使用起北元年号宣光。^③

这年3月，高丽派三司左使李子松去北元上书，对北元册封禡王表示谢意。同时，又派礼仪判书文天式到北元，送给纳哈出不少礼物，意在巩固友好关系。6月，文天式从北元回到高丽。紧接着，谢恩使李子松也回到开城。大臣们见李子松身穿蒙古式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2年10月戊辰，12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2年10月、12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2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2月。

^③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2月：“始行北元宣光年号”。《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2月。

官服，泣而说：“我国倾向北元之后，今天第一次看到意外行礼的礼节。”^①

北元采取册封高丽国王的手法，博得高丽权臣欢心之后，于7月派宣徽院使撒里帖木儿到高丽，要求与高丽联合出兵，攻打和占领明朝设在辽阳的定辽卫。这一提议，对于北元来说，意在以此作为中兴的一种举措，而高丽此时进行的是对北元和明朝的两面外交，处于既无法答应又不好明确加以反对的境地。高丽朝廷经深思熟虑之后，不想立即答应北元的要求，试图与北元周旋，尽力拖延时间，使北元这一提议不了了之。

禡王赐北元使臣以金腰带和马鞍，予以慰抚，而北元的使臣一再辞让未加接受。这年8月，高丽派晋州君姜仁裕作为启禀使去北元，想与北元协商其提出的联合攻打定辽卫的提案。9月，姜仁裕派人回高丽，报告了与北元协商的情况。当时，北元的平章文典成和大参政张海马，同丞相纳哈出一起致力于厉兵秣马，等候高丽出兵。据说，北元正在制订夹攻定辽卫的具体计划。

于是，高丽派军簿判书文天式到北元，以天气寒冷为借口，声称高丽出兵有不少难处。其实，这是一种延期出兵的策略。高丽不好一口回绝出兵，只好找时逢严冬的借口加以搪塞。为了不致触怒北元，高丽于这年11月，派前开城尹黄淑卿到北元祝贺节日。12月，又派顺兴君王升去北元祝贺新正。

1378年（禡王四年，明洪武十一年）7月，北元派使臣到高丽，通报豆叱仇帖木儿已经即位为北元皇帝。

1379年6月，北元又派金院甫非到高丽，通报北元已将年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3月、6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3月、6月。参阅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和北元的关系》第2回，该文刊载在出版于大正7年的《史学杂志》29—2，见其第166页。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号改为天元。哈纳出还派文哈刺不花到高丽。文合刺不花回北元时，禡王对他说：“丞相（指纳哈出）与先父称兄道弟，我应称之为父亲哩！”禡王赐给他150匹夏布，使他这一行人感到很亲切。^①

高丽则派永宁君王彬到北元，祝贺北元改换年号。北元于1380年（禡王六年，明洪武十三年）2月，派礼部尚书时刺问到高丽，册封禡王为北元大尉。3月，高丽派密直副使文天式到北元，既祝贺节日又感谢北元对禡王的册封。^②

就这样，高丽权臣李仁任等人在明朝与北元之间搞两面外交，以种种借口有效地使北元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亦即联合夹攻定辽卫的提议，变成了一纸空文。李仁任一伙还力排反对派的种种主张，与北元斡旋，解决了禡王继承王位的问题。^③

第三节 围绕禡王即位的对明外交（1）

高丽权臣李仁任推戴禡王登上王位后，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棘手的善后问题，亦即如何解决所谓的天子承认禡王承袭的难题。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7月、8月、9月；禡王4年7月；禡王5年6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7月、8月；禡王5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6年2月、3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6年2月、3月。

③ 禡王即位之后，渐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朝廷大权由权臣李仁任一伙把持。禡王荒淫无耻嬉戏胡来的具体事例有：（1）喜击球、骑马、狩猎和玩火炮；（2）骑马驰骋，抢夺百姓的狗与鸡，抓麻雀烤熟吃，爬上屋顶踩踏，抢夺行人马骑，夜行途中用箭射行人；（3）以谈婚为名玩弄姑娘，霸占他人以娇艳闻名的妻子，玩弄重臣之妻，嫖妓；（4）坠马受伤后，进入妃嫔寝室与后宫养尊处优；（5）夺人宅基建造宫室等等。

当时，对于禑王的承袭，北元起初曾加以反对，并且推出了脱脱不花，看起来似乎很难得到北元的承认。然而，这一承袭实际上更难得到明朝朝廷的承认。于是，高丽朝廷就此与北元和明朝同时进行了交涉。北元由于本身已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无力对高丽朝廷作更多的刁难，后来顺水推舟成全了这一承袭，对禑王进行了册封。而明朝建国不久，国运隆盛有如旭日东升，对高丽朝廷的这一拥立自然不会轻易承认。

禑王即位后，高丽不是先派使臣到北元要求予以承认，而是首先于1374年1月（到12月才派使臣去北元）就派密直使张子温和典工判书闵伯萱去明朝，奏报恭愍王之逝世，并求赐谥，兼请承认禑王的承袭。

高丽禑王的请谥表写道：“先臣王颺（恭愍王之讳）……深明为臣之理，恭谨奉上，诚心治政，造福一方，循规蹈矩，理应为之请求赐与特殊之谥号。……伏请体念先臣之忠贞敦笃和孤臣（指禑王）哀悼之心切，赐之以谥号，安慰其在天之灵。”

高丽禑王的承袭表是这样措词的：“臣禑……先臣（指恭愍王）遽然辞世，而臣又尚年幼……而藩王之职无法一日空缺。伏乞……颁与诏书，使小国谨遵旧典。如蒙恩准孤臣守卫遗基，臣将永怀忠心治国安民，报答陛下之洪恩。”高丽当时实质上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在形式上则不得不呈这样以小事大的表章。^①

当时，发生了负责护送明朝使臣林密与蔡斌归国的金义在开州站杀害蔡斌父子，劫持林密逃往北元的事件。高丽使臣张子温与闵伯萱得知这一消息大惊失色，连忙带着请谥表与承袭表匆匆

^① 参阅《高丽史》133，列传46，禑王条，恭愍王23年11月己巳。《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3年11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归国。

翌年，也就是1375年（禡王元年，明洪武八年）1月，高丽朝廷又派判宗簿寺事崔源去明朝，奏报恭愍王之丧，请求为恭愍王赐谥和承认禡王的承袭。3月，高丽派判事孙天用赴明朝京都献马，一心想获得明太祖对高丽禡王和高丽朝廷的好感。^①

尽管明太祖未予置理，高丽朝廷还是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不懈。1391年（禡王二年，明洪武九年）正月，高丽派金宝生到明朝。2月又派李之富到明朝新设于辽阳地区的定辽卫，谋求通好和了解当地的情况。3月，派金龙去定辽卫。同时，派李原实到北元，增强高丽与北元的关系。

这年6月，到辽阳定辽卫的金龙带着李家奴的信回到高丽京城。这封信阐明了明朝朝廷的看法。也就是说，李家奴于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明洪武五年）投降明朝后，在明朝供职。他在信中一一列举明朝朝廷十分重视高丽与明朝之间存在的且使明太祖恼火的悬案。它们是：（1）高丽和一些别有用心者为何要弑害恭愍王？（2）为何要杀害明朝的使臣蔡斌？（3）近两三年间，高丽与北元（特别是纳哈出）眉来眼去来来往往，这究竟有何用意？（4）派金龙作为使臣前来，当然很好。然而南雄候大人（在高丽问题上能做主者）已在京师（指明朝京都南京）。这样委派使臣，究竟有何用意？他在信中，还建议高丽朝廷必须了解和做好如下几件事：（1）明朝已派总兵官靖海侯、余都督和李平章这三个大官到牛家庄。他们率领着大军，备足了军粮。（2）愚昧无知的纳哈出曾出兵攻打定辽卫，结果大败而归，其残兵败卒逃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即位年11月；元年正月、3月、5月。《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3年11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元年1月、3月、5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第282页。

到长春与怀德之间的金山，入侵的北元军队只剩下了百之一二。(3) 高丽朝廷要派使臣到明朝，不失时机尽快与其总兵官靖海侯会晤。(4) 赶快把从辽阳去高丽避难的百姓送回辽阳。(5) 被杀死的蔡斌归国时带走的马，要尽快送至明朝廷。^①

李家奴让金龙转交给高丽朝廷的这份情报，对于高丽来说可谓十分重要，透露了明朝当时对高丽的看法和态度。

这年8月，有人从定辽卫逃回高丽报告道：“定辽卫想在秋季发兵侵略高丽。”高丽得知后，当即命令各道点检军队以防万一。^②然而，这不过是谣传而已。明朝当时急于处理国内问题，并无侵略高丽的念头。

就在北元册封高丽的牟尼奴为国王、高丽使用北元年号宣光、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之时，明朝对高丽也采取了怀柔政策。1378年（禡王三年）2月，明太祖派人将在此之前被拘留在明朝京城的丁彦等358名高丽人送还给高丽。1379年（禡王四年）6月，又派人将高丽行人（外交官）崔源、全甫及李之富等也送回高丽。8月，周谊和柳藩从明朝京城回高丽时，明朝礼部尚书朱梦炎记下了明太祖的谕示，将这一谕示以诏书的形式让周谊等带给高丽朝廷和禡王。它写道：“派来使臣，请求赐予王颙（即恭愍王）以谥号……首先，随意弑害国王，又欺诬行人（外交官）将其杀害（指蔡斌杀害事件）。像这个样子，现在还谈得上守法律护宪章吗？”接着，又写道：“中华一向提倡礼节。前来京城者，送他回去也就算啦！大臣不必干预人家的国事！”这是说明朝不会干涉高丽的内政，也不想扣留高丽的使臣，只是在审视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2年6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2年8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2年8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丽对明朝的态度。明太祖这样表态，是想使高丽感受到一种压力，从而对明朝忠贞不二。

这年9月，高丽朝廷将作为使臣赵过明朝京城的崔源下狱，随即处以死刑。其罪名是：在明太祖垂询时，毫无保留地讲述了金义杀害明朝使臣蔡斌的经过和先王恭愍王被弑害的真相，不守使臣的本分，不为朝廷保守秘密。紧接着，高丽又开始使用明朝的年号洪武。10月，高丽派沈德符到明朝，在祝贺节日的同时，对明朝让金宝生将崔源和丁彦等358人送回高丽，表示谢忱。^①

然而，明朝对高丽朝廷的看法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采取强硬立场。1379年（禡王五年，明洪武十二年）正月，辽东都指挥使派镇抚任诚去高丽，对高丽朝廷说：“洪武三年，被高丽军队抓走的一千多名辽阳男女官民和逃往高丽军人，要尽快还给我们！”他所说的洪武三年事件，指的是李成桂和池龙寿率领军队到义州、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然后率领军队攻陷辽阳城的事件。任诚这次到高丽朝廷的使命，一方面是要高丽朝廷释放俘虏，另一方面定辽卫收到了关于高丽与北元打得火热、准备组成丽元联军的情报，让任诚到高丽作实地考察，分清情况的虚实。^②

这年3月，沈德符与金宝生从明朝回到高丽。他们带回了明太祖亲笔诏书和礼部尚书朱梦炎所记录的明太祖谕示。它们体现了明朝的强硬政策和对高丽强烈的抗议。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12月；4年6月、8月、9月、10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6月；4年6月、8月、9月、10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禡王5年正月。《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11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5年正月，卷29，恭愍王19年11月。

明太祖的诏书写道：“你们到明朝来，是按照奸臣的奸计前来欺骗朕等。朕不会拘禁你们，让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之后，向高丽的祸首转达朕的意旨。对于杀害无辜的使臣（指蔡斌）负有责任的大臣，要站出来谢罪。高丽如果不按规定纳岁贡，便难免惹来兵祸。倘若不相信朕之此言，朕将出动几千艘军舰和几十万精兵征讨。”

朱梦炎所记录的明太祖谕示，首先提到恭愍王被弑害之后，高丽曾多次派人来明朝。他们带来的国书都说他们是继承王位的嗣王（指禡王）派来的使者，自称是来明朝贺正或贡马，令人不知其真假。明太祖说：“从高丽对中国的态度看来，自古至今可谓背恩忘德而降而复叛，反复无常已成家常便饭。”这份记录列举几个实例之后指出：（1）恭愍王被弑后，高丽被奸臣窃权，成为北元走卒，对我们怀恨在心，与这种人打交道，于我们有何好处可言？（2）高丽先后五次派使臣前来，一个个都自称是嗣王（即禡王）派来的真正使臣。中书省可派人前往高丽，问一问有关嗣王（即禡王）之事，看一看他的政权在哪里。（3）倘若没有什么不正常，那么，叫高丽按照恭愍王在位时所规定的那样，献纳1000匹马。今年，由大臣带一半来。从明年起，每年交纳100斤黄金、10000两白银、100匹良马、10000匹细布，并且以之为惯例。（4）让高丽将辽东在高丽的百姓如数送回。（5）高丽奸臣也许以为高丽位于沧海重山之间，是个要塞，明年攻打不了。然而，他们应当牢记：明军打天下时，一向是水军陆军配合作战。^①

由上可知，明朝对高丽与北元往来甚密十分不满，怀疑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禡王5年3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5年3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对明朝的事大诚意，进而加以威胁：如果对明朝三心二意，明太祖将下令出兵，以兵戎相见。

明朝使臣根据明太祖的指示，为了了解禡王的实体、政权之所在、丽元关系以及高丽对明朝的忠诚程度，听说高丽派出文天式与吴季南做为使臣到了北元，便说道：“昔杀行人，今又怀二心。吾与其死于高丽，宁死于本土。”他们当即返身回明朝京都。这说明当时的明朝使臣不仅不相信高丽对明朝有诚意，而且有一种恐怖之感，认为去高丽没有安全感可言，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这样一来，高丽与明朝的外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进展。

高丽朝廷得知这种情况，感到颇为棘手，便派前典工判书李演与护军任彦忠去辽东，想向辽东总兵潘敬和叶旺就有关事件作些解释。李演一行人到达辽东后，进不了城，只好无功而返。^①明朝进而又把同知李元鲁思帖木儿等 33 人送还高丽，并将迁至黄城等地的高丽人推刷还高丽。

护军周谦在明朝京城逗留时，明朝中书省的官吏曾向他探问：“禡王果真是前王的儿子吗？”周谦答道：“前王之正妃鲁国公主没有儿子，禡王系前王与宫女所生。”周谦强调了禡王继位的正统性。

当时，明朝辽东都司曾移牒高丽都评议司，牒曰：“近闻纳哈出遣人经由哈刺（咸兴）、双城（永兴）潜往高丽行礼，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儿亦遣使驰驿前往高丽，会议公务。……本国岂意复与交通！可将胡使差人押送，以表忠诚不然则奸宄自昭，后悔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禡王 5 年 3 月：“朱梦炎录帝旨……今岁贡马一千，差执政陪臣，以半来朝。明年贡金一百斤、银一万两、良马百匹，细布一万匹，岁以为常。……”乃使奏差邵垒、赵振随德符等来，二人至甜水站，传闻本国遣文天式、吴季南使北元，乃曰：‘昔杀行人，今又怀二心。吾与其死于高丽，宁死于我土。’遂不至而还。”

无及。”^①

这年10月，高丽派门下评理李茂方和判密直斐彦到明朝的京都南京，上呈了禑王的陈情表。这份陈情表首先通报四种情况：(1)先臣(恭愍王)早已作古；(2)叛臣金义杀害明朝使臣，已畏罪逃往北元；(3)臣(指禑王自己)年幼无知；(4)臣之祖母(明德太后，忠肃王妃)业已年迈。然后写道：“小邦多灾多难，要想有所改观，非有天明之助不可。小邦请求赐先王(恭愍王)以谥号，承认臣之承袭，却至今未见答复。”陈情表提到使臣带去的贡物有：黄金31斤4两、白银1000两、白细布500匹、黑细布500匹和杂色麻布200匹。陈情表指出，实在无法按规定的数量纳贡，这些贡物也是经过努力才筹集到的。陈情表写道：“今将祖母的陈情表一并上呈，祈允赐予先臣(恭愍王)以谥号，对(禑王)进行册封。”

向明太祖上呈高丽国王祖母的陈情书，在过去没有先例的。这说明高丽面对国际政治状况不得不这样做，自有其苦衷。明德太后的陈情书谈到了如下情况：(1)颛(指恭愍王)遽尔作古。由于他死得很惨，便引起了他人的疑窦。其实，他之被弑，没有其他的缘故。(2)金义杀害天朝使臣之后，在投奔北元途中得知颛之不测，竟定下奸计，立沈王为王。至今他仍在胡地(指北元)，不敢归国。由此可知高丽朝廷与天朝使臣被杀害事件毫无关系。(3)现在，禑作为颛的遗子，已肩负起治国之大任，特向天朝上表，请求给颛赐谥号和承认禑之承袭。此事已拖了几年，天朝未予恩准，不能不令人扼腕。(4)高丽不产金，岁贡黄金实在勉为其难。(5)马有两种，胡马来自北方，国马才是高丽所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禑王5年3月、4月、8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0，禑王5年3月、8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产。国马与驴差不多，无法选优。一百匹国马，仅有一二匹算得上是好马。(6) 高丽虽然产布，却筹措不了一万匹。(7) 至于从辽东地区来到高丽的人口，高丽朝廷决定发出告示寻找。这份陈情书阐明了高丽尴尬的处境。

明德太后的陈情书最后写道：我已是 82 岁的老迈之姬，来日已经不多。而看到已经被弑的儿颙全心全意拥戴明朝，却未得到应有的褒扬，孤孙祸承袭王位之事又未被承认，心下不免惴惴不安。老身明知有悖礼法，却冒昧述怀，谨恳请给颙下赐谥号，恩准祸王继承王位为祷。^①

1380 年（祸王六年，明洪武十二年）2 月，李茂方和裴彦奉命去明朝京都，但到明朝之登州返身回国。因为辽东道司有言：“明之省部与台官，遵从明太祖如下谕示：高丽进贡之物不按规定，陪臣亦未来到，可由中书省派人让高丽使臣回国。如果按以前所定的规矩办事，可让他们进京纳贡。”

如前所述，北元已在祸王三年时册封祸为高丽国王。祸王三年 7 月，北元曾向高丽提议组成联军夹攻明朝新设的定辽卫。然而，高丽对此持消极的观望态度。当时，高丽收到明朝在辽东训练军队准备攻打纳哈出的情报，便派判事崔郾和副正安天吉去西北面，确认与此有关的事实究竟有无。

4 月，高丽派崇敬尹周谊到辽东送国书，与明朝就以前所约定的贡物定额和派遣陪臣等问题进行协商。这份国书提到明太祖让高丽每三年朝贡一次，近年来高丽朝廷之所以未纳贡，是因为孙内侍之死和金义的叛逃。这写道：“孙内侍如是小邦（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祸王 5 年 10 月。《高丽史节要》卷 31，祸王 5 年 10 月。参阅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和北元的关系》第 3 回，刊载在出版于大正 7 年的《史学杂志》29—3，见其第 257—258 页。

所杀害，延院使一行也势必难免被害，为何只有孙内侍遭此不测？从金义逃往胡地（即北元）不敢归国看来，不是可以完全证明其为非作歹与小邦（高丽）无关吗？”又写道：前次与沈德符等一同前来的明朝使臣如来高丽实地一看，便可很好地了解事件的真相，然而，他们终于未至。高丽的李茂方等也只好中途返回。这样一来，我们的下情也就无法上达至天朝朝廷。今后，倘若准许我国使臣去明朝京都，他们将这一切详加说明。

周谊带着这样的国书到辽东之后，辽东道司立即向明朝朝廷报告。明朝朝廷对此很重视，下令让周谊到京都南京来。^①

周谊被抓到南京后，明太祖于这年7月5日下令将周谊拘禁于天界寺，一连拘禁了好几天。一天，明朝尚宝监丞崔安（高丽人）去找周谊，询问高丽廷为何不按照明朝朝廷要求办事。周谊说：“高丽土地瘠薄，人口又少，产品当然也就不多，实在很难筹措贡品。如果不体谅高丽的处境，即使杀了我周谊，天朝也无法如愿以偿。”崔安把周谊的这段话原原本本向明太祖作了奏报。

翌日，明太祖把周谊叫到身边，作了如下的对话：

明太祖：东夷（指高丽）变幻多端，奸佞耍滑，每次往来必惹是生非。这样做，能国泰民安吗？难道说，非得使自身今后罹祸受害不可？

周谊（跪拜两次）：高丽并未惹是生非。未能如约上纳贡物，不是小邦对天朝不忠诚，而是百姓实在太穷苦，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交给朝廷。

明太祖（大怒）：高丽是个竟敢弑害其主残忍无道的国家。朕已下令与高丽绝交。由于高丽有山阻隔，有海难渡，难于接受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禑王6年2月、4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1，禑王6年2月、4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教化，朕曾让高丽自为。然而高丽却奸邪作伪，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在这期间，高丽使臣多次前来，口口声声表示愿意臣服。我们规定按常例纳贡，看看行不行。结果，就是不好好办事。这果真是愿意从属吗？这不是奸狡投机的活生生写照吗？

明太祖命令校尉把周谊监禁了起来。

翌日，崔安前来对周谊说：“你这一来，就没有那么好回去啦！”在作此威胁之后，崔安说：“快让你的翻译先回高丽去，按规定把贡物送来！”他为周谊出了这样的点子：“马一千匹，已交了一些，快去把数目凑齐。明年，如能按常例献纳黄金一百斤、白银五千两、布五千匹和马一百匹，你们东夷杀害使臣与内侍之罪便可得到宽宥。”

8月，周谊将此事向都堂（议政府）报告，请大臣们斟酌处理。10月，明朝朝廷找不到什么话柄，只好将周谊释放。^①

高丽在对明朝的外交方面，一直致力于消除隔阂，于这年12月派门下赞成事权仲和与礼仪判书李海到明朝京都，既献纳300两黄金、1000两白银、450匹马和4500匹细布，又上书请求为恭愍王赐谥和恩准禡王承袭王位。然而，明朝朝廷于1381年（禡王七年，明洪武十三年）3月，通过辽东道司告诉高丽朝廷：岁贡尚未如数上纳。至于高丽朝廷的赐谥与准许承袭之请求，自然也就不予受理。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禡王5年8月、10月。《高丽史节要》卷31，禡王5年10月。

第四节 围绕禡王即位的对明外交 (2)

当时，高丽未能窥准明朝的真正用意。明太祖有时让高丽每隔三年纳贡一次，有时又嫌岁贡未按定额行事，高丽朝廷不知如何才能符合明朝朝廷的旨意。于是，1381年（禡王七年，明洪武十三年）5月，高丽派判典农事李龟哲去西北面了解定辽卫的内幕。7月，又派副正郑阵去定辽卫探听其用意。10月，派门下评理金庾去明朝京都贺正。11月，派密直使李海去明朝献马933匹。然而，金庾与李海只是到达辽东。定辽卫不许他们再往前走，他们只好返身回国。^①

1382年（禡王八年，明洪武十四年）11月，高丽又派同知密直司书郑梦周去明朝贺正，同时呈上了陈情表、请谥表和承袭表。

这三份表章的内容分别是：请求恩准两国之间的使臣来往；先王（恭愍王）被弑已经九年，尚未得以赐谥，请一定满足这一要求以慰先王在天之英灵；请以九经（《礼记》中庸篇）治国九德目怀柔之道，让禡王承袭其父之国王之位。

翌年，亦即1383年（禡王九年，明洪武十五年）正月，郑梦周等到辽东，辽东道司出示了明太祖之救命，收下礼物，却不准郑梦周等去明朝京都。明太祖的这份救命很含蓄。他这样写道：“前者三韩酋长为臣所弑，弑后叠来奏朕，臣贡如常。却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禡王7年5月、7月、10月、11月。《高丽史节要》卷31，禡王7年10月、11月。金庾于1382年4月带着岁贡的黄金100斤、白银10000两、布10000匹和马1000匹从高丽京城出发，于6月到达辽东，却因不许其入境，只好返回。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再三不止。特以岁贡难之，必止。今不止而固请，乃以前数年零碎之贡合而为数，而暗为愚侮。……朕观我中国之书，其方之人不怀恩而好构祸，纵使暂臣亦何益哉？固守我疆，毋与较徵。今以数年之物合而为一，称为如敕，其意未诚。符到之日，仍前阻归，不许入境，止许自为声教。”^①

不仅如此，辽东道司于同月致书高丽，所写的是：“贵国一方面表示要服从明朝，另一方面却与北元之纳哈出来往。这种做法极其不妥。现在，听说纳哈出派文哈刺不花与高丽来往，贵国又予以盛情款待，对其慰抚有加，这是服从明朝者应有的态度吗？如欲免罪，那么，赶快把文哈刺不花抓起来送到我们这里。这样，才能显示真心和诚意。否则后患无穷，悔之亦晚矣！”

这是很强硬的抗议与要求。高丽朝廷接到这份书函后，未予作答，也未有任何反应。明朝定辽卫责怪高丽事大不真诚，不时派兵侵犯高丽之边境。然而，高丽不仅不屈服，而且任命门下赞成事赵仁璧为东北面都体察使，门下赞成事韩邦彦为西北都体察使，前判图判书安思祖为江界万户，以对付定辽卫的来侵。^②

1383年8月，高丽派遣门下赞成事金庚和密直副使李子庸到明朝，在祝贺明太祖生日的同时，上呈了关于请求为恭愍王赐谥和承认禡王承袭王位的陈情书。过去，高丽使臣经辽东去明朝京都，每次都被辽东道司拒绝入境，因而无法到达明朝京师南京。而这次，金庚等是通过海路去明朝的，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明朝京都南京。然而，金庚和李子庸、洪尚载等一行，却在明太祖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禡王9年正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1，禡王9年正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禡王9年正月……敕曰：“前者……不许入境，止许自为声教。”《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9年正月、8月。《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禡王9年8月。

生日过后才到达南京。明太祖为此大怒，再一次提到高丽无法无天，既敢于杀害明朝使臣，又连国王也敢加以弑害，并追问了两个问题：高丽现在的掌权者究竟是谁？高丽前王明明没有儿子，现在的国王究竟是谁的儿子？

当时，金庾只回答说高丽现在由李仁任执掌朝廷大权，对于其他问题则默不作答。为了给高丽施加压力，明太祖当即下令将金庾等软禁于大理。大理距高丽 28000 多里，距天竺 2000 多里，是个遥远的地方。三年后，金庾才被释放归国。^①

这年 10 月，翻译张伯从明朝京城回到高丽，向朝廷报告了金庾等误吉期至南京，已被明太祖下令给予处罚的事实，转达了明朝礼部致高丽的公文。其内容有：(1) 高丽对明朝朝廷既疑虑重重又弄虚作假。为此，明太祖不许其使臣来往，着令其自为声教。(2) 高丽的使臣往往逾期才到达。(3) 高丽表示愿意按规定纳贡的头五年欠交的岁贡有：马 5000 匹，黄金 500 斤，白银 50000 两，细布 50000 匹。这些欠交的贡品应当一次性交来。它既责怪高丽朝廷，又提出了如上苛刻要求。它警告高丽朝廷：只有如数交纳岁贡，高丽才能使朝廷不致采取军事行动，才能使明朝不致通过兴师问罪而径赴高丽寻找业已失踪的明朝使臣。

禡王收到明朝礼部的公文之后，于这年 12 月召集两府的百官，商议如何对付明朝的要求。商议的结果，大家认为应当按照明朝的要求办事。为此，高丽朝廷设置了进献盘缠色，负责筹集贡物。1384 年（禡王十年，明洪武十六年）5 月，高丽向明朝朝廷交纳了 1000 匹马。6 月，又交纳 2000 匹马。8 月，再次交纳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5，列传 48，禡王 9 年 8 月。《高丽史》卷 114，传传 27，金庾传。《高丽史》卷 117，列传 30，郑梦周传。《高丽史节要》卷 32，禡王 9 年 8 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了1000匹马。至于金银，因高丽不生产，便上表向明朝朝廷作了说明，要求均少其纳贡的数额。^①

这年10月，高丽派正月堂文学郑梦周到明朝朝廷，一方面祝贺圣节，一方面请求给予恭愍王赐谥，承认禡王承袭王位。接着，又派右常侍李天祀到明朝朝廷祝贺千秋节。当时，由于金庚等使臣去明朝，受到了明太祖的亲自审问，然后被软禁于几万里之外的大理，高丽大臣均不敢作为使臣到明朝朝廷办事。这一次，高丽起初决定派密理副使陈平仲作为使臣去明朝，陈平仲连忙送给林坚味几十个奴婢，以患病为借口推卸这个差使。林坚味接着荐举了郑梦周。

禡王将郑梦周召进宫中，表明其对时局的忧虑，命令郑梦周作为使臣到明朝京都走一趟。郑梦周说：“君父之命，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何况是去天朝？只是去南京，迢迢八千里，需耗时九十天。现在距千秋日仅有五十天，臣只怕无法及时赶到。”然而，郑梦周日夜兼程疾行，终于在千秋日之前赶到了南京，呈上承袭表与请谥表。^②

明太祖称赞郑梦周如期到达，将拘禁了一段时间的洪尚载等释放回国。然而，明太祖对于为恭愍王赐谥与承认禡王继位之事，却未做任何答复。

紧接着，高丽崔涓派延安候与静宁候到辽东都司，询问道：“高丽已经送上了五千匹马，今后是否允许高丽使臣来往？”辽东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禡王9年11月、12月；10年5月、6月。《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9年11月；10年5月、6月。

^② 参阅《高丽史》135，列传48，禡王10年7月、10月。《高丽史节要》32，禡王10年7月。《高丽史》117，列传30，郑梦周传。当时，判书孙用珍作为高丽使臣去明朝。明朝朝廷怀疑高丽朝廷，对孙用珍进行了审讯。孙用珍为国家保密而失去了生命。他一直到死去为止，未按明朝朝廷有关官吏的要求作答，做到了威武不能屈。

道司回答说：“此事已奏报朝廷，明太祖已允许高丽使臣来往。”延安侯与静定侯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高丽金银的产量很少，所需进贡金银的不足部分，今后可否用马顶替？”辽东都司的答复是：明太祖已经恩准，可按一匹马抵300两白银或50两黄金的比率予以替代。

由此看来，明朝所谓的可以三年一朝贡，不过是宣扬圣君之德的幌子，其用意还是在于多得贡物。到头来，没有减少贡物的数量，却残酷地要高丽以物代物交足数量。

这年闰10月，高丽派连山君李元宏到明朝京都，所带去的国书作了这样的说明：“前五年未送去的岁贡马五千匹、黄金五百斤、白银五万两和细布五万匹，天朝让小邦一次性送来，小邦经多方筹措，好不容易已经凑足。”高丽都评议司致明朝礼部的公文则写道：“小邦需交纳的五年岁贡，即五百斤黄金，现已交纳九十六斤十四两，剩余的四百零三斤二两以一百二十九匹马替代。五千两白银，至今已送去一万九千两，剩下的三万一千两，以一百零四匹马替代。五万匹细布，至今已送去白巾四千三匹、黑麻布二万四千四百匹，白麻布两万一千三百匹。五千匹马，已送去四千匹，剩余的一千匹现在送去。”

明朝还通过定辽卫通知高丽朝廷，要越过鸭绿江办置市（即进行交易）。高丽朝廷的答复是：可在义州设互市，但禁止金、银和牛马上市。因为，金、银和马均是要交纳给明朝朝廷的贡品，如果允许上市交易，势必有所消耗，会影响贡物的交纳。^①

高丽对明朝俯首称臣以小事大，尽力交纳贡物，而明朝的辽东都司并不体恤，竟指使女真千户白把把山出动70多名骑兵入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禑王10年10月、闰10月。《高丽史节要》卷32，禑王10年闰10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侵高丽的北青州。^①万户金得卿率领军士与之交锋，焚毁其兵营，歼敌40多名，白把把山狼狈逃命。在此之前，李元紘等到辽东，得知辽东都司将率领军队至咸兴、双城（永兴），阻止北元使臣与高丽来往，便立即奏报高丽朝廷。高丽朝廷得知后，让金得卿事先做好了对付这一事态的准备。

这年12月，高丽朝廷任命李成桂为东北面都元帅，沈德符为上元帅，到北青州防止辽东明军来侵。李成桂等率领军队到达北青州后，听说金得卿已率军打退白把把山的骑兵，便率军回到原来的驻地。

1385年（禡王十一年，明洪武17年）2月，明朝辽东都司派百户程与到高丽，对金得卿击退明朝军队提出抗议。高丽朝廷生怕扩大事态，竟将立下战功的金得卿抓起来，引渡给明朝。另一方面，让林坚味与李成琳盛情款待明朝使臣程与。同时，指使张子温送给程与等50两黄金。

在此之后，明朝朝廷对高丽的看法开始有所好转。明太祖将他于三年前下令拘禁或流放的高丽使臣金庾、李子庸、周谦、黄陶和裴仲伦等释放回国，准许高丽使臣来往于明朝京都南京。^②

高丽见明朝的政策有了松动，连忙于翌月亦即5月，派门下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禡王10年11月。此前，石城（昌城）万户曹敏修曾派兵马使朴伯颜去辽东了解其动向。朴伯颜得到情报后作了汇报。其报告书写道：“据鞍山百户郑松说，辽东总兵官向明太祖作了这样的奏报：‘鞑鞑（北元）派文哈刺不花到高丽，企图与之联手攻打辽东，请派兵前来援助。’明太祖当即命令孙提督等率领八千九百艘战舰攻打高丽。孙提督业已到达辽东，将军队分为三路，辽东军乘船向高丽进发。这时，鞑鞑在浑河口子杀死了明朝官军屯兵，浑河提督的军队与之交锋，未能取胜而返。”禡王得知此事，命令都堂召集百官商议对付之策。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5，列传48，禡王11年4月、7月：“四月，……帝放还金庾、李子庸、周谦、黄陶、裴仲伦等，许通朝聘，子庸道死。”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11年4月。

评理尹虎和密直副使赵伴到明朝向明太祖谢恩，同时第八次请求给恭愍王赐谥和承认禡王的承袭。

禡王 11 年 9 月，翻译廓海龙从明朝京都回到高丽京城，转达了喜讯：明太祖将诏书使和谥册使到高丽。不久，明朝使臣张溥与佑佑来到高丽京城，下达了明太祖的诏书，他写道：“今允虔诚，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实际上，这不过是在形式上承认禡王承袭王位。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让高丽朝廷在礼仪与法度方面按高丽的传统办事。换言之，即使明太祖未下令和恩准禡王继位，禡王实际上也早已坐在国王宝座上处理国务了。至于让高丽“仪从本俗，法守旧章”，这意味着高丽朝廷在内政与外交方面可以自主，同时也说明明朝允许高丽国王的承袭，实际上只是走走形式。而从高丽朝廷来说，这也就是事而不服和卑而不屈。

紧接着，明朝使臣周倬和稚英等来到高丽，转达了明太祖承认禡王为国王和赐予恭愍王谥号的诏书。禡王平日干尽坏事，对礼节极不熟悉，大臣们为之担心不已。据说，他在接受诏书时，其行动与举止也很不符合礼节。所以，明朝使臣张溥说：“闻名不如见面，诚哉斯言。”^①

这年 10 月，高丽让判门下府使曹敏修和张子温、河仑等去明朝，在谢恩的同时，上呈了谢谥表与谢承袭表。12 月，又派密直副使姜准伯到明朝，献上了岁贡马 1000 匹，细布 10000 匹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5，列传 48，禡王 11 年 9 月、11 月、12 月：“九月……张溥等来赐诏曰：‘……今允虔诚，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周倬等册禡为国王，制曰：‘……袭封累世。尔王禡……精笔朕言，歆天命尔，弗敢礼违，仍前高丽国王，世守三韩……’”，“赐谥制曰：‘……允其所请谥，谥尔恭愍，以彰人世，爵尔王，封英灵于幽坏。”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32，禡王 11 年 9 月、12 月。

第二十九章 恭愍王被弑与高丽对明元的两面外交

和替代金银马 66 匹。

这样一来，持续 11 年之久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前王赐谥与禡王承袭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第一节 吉州地区女真归属高丽

1356年（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7月，东北面兵马使柳仁雨与赵墩率军攻打双城（永兴）总管府，收复了和州、登州、定州、长州、预州、高州、文州和宜州，以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地。咸州以北的哈兰、洪猷、三撒地区，在被元朝占据99年之后，也均得以收复。

当时，元朝势力已经开始衰落，顾此失彼，无法兼顾，已不足以统率这一地区的女真。这一地区北面的女真遂逐渐归属于高丽。1358年（恭愍王七年）5月，海阳人完者不花等率领军士1800名投降高丽。1365年（恭愍王十四年）3月，女真人所音山、所应哥和阿头刺等请求降服，高丽朝廷将他们安置在朔方（咸兴地区）安居乐业。

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12月，元朝平章事奇赛因帖木儿（奇辙之子）将其父余众召集到一起，以东宁府为根据地，声称要为其父奇辙报仇，虎视眈眈妄图入侵高丽的北边。早在1270年，元世祖在高丽西京设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慈悲岭以北变成元朝领土。高丽元宗曾在燕京请求将这一地区还给高丽，元朝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朝廷未予答应。1275年，元朝朝廷将东宁府升格为东宁路总管府。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正月，李成桂率领50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越过咸兴地区的黄草岭，跋涉600公里到达江界附近的雪寒岭，又跋涉700多里越过了鸭绿江。当时，东宁府同知李吾鲁帖木儿（一名李原景）被撵到佟佳江流域的亏罗山城，想凭藉天险抗拒高丽军队。李成桂率军追至也顿村时，李吾鲁帖木儿佯装挑战，突然又率军放下武器，两度跪在李成桂面前哀求道：“我本是高丽人，愿在麾下效犬马之劳。”他率领300多户投降高丽。然而，酋长高安慰依然率领部下坚守城池。高丽军队便围攻该城。

其时，李成桂未带弓箭在身，就用部下的弓向城里射片箭。总共射了70多箭，全都射在高安慰的面前。城中军民见此情景，全都泄气了无斗志。酋长高安慰大惊，便抛下妻子，连夜越城逃走。次日，该城20多名头目率领一伙人投降。亏罗山城遂告陷落。邻近的城池，见李成桂率领的大军威势惊人，也都相继投降。当时，投降高丽的百姓共有一万多户，李成桂的军队缴获了2000多头牛和几百匹马。然而，李成桂把这些牛和马都还给了其主人。北边的民众找回自己的牛和马都非常高兴，欣然归附者络绎不绝。

当时，东至皇城、北至东宁府、西至海边、南至鸭绿江的这大片土地，竟是一片旷野，了无人烟。

2月，李成桂与枢密副使排住（一名韩复）、李吾鲁帖木儿（一名李原景）、杨伯渊、李长寿、李天佑、玄多士和金阿鲁丁等一起，将300多户献给了国王。由此可知，李成桂这次率军攻打女真，曾到达满洲佟佳江流域一带。

李成桂率领军队完成了一直到佟佳江流域的征伐，却因饥寒

所迫，无法久留，只是使当地居民归顺高丽和显示高丽军队的战斗力，便率领军队回到了高丽。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正月，女真万户弓大到高丽献上土产品，请求允许其部落的一百户居民归属正陵。这年11月，女真达麻大派使者到高丽，献上其所属的土地。恭愍王委任他为大将军镇边都护府使，赐给他官服。他们所献之地区被称为所音山，即分吉州南面的城津。弓大的部落在吉州。

1371年12月，海阳（吉州）万户弓大和镇边元帅达麻大派使者到高丽祝贺新年。弓大定居吉州，达麻大居无定所。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5月，达麻大与女真万户弓大一起，又派使者到高丽京城，祝贺恭愍王的生辰。从达麻大总是与弓大一起行动看来，可知达麻大住在距吉州不远之处。

前已提及，完者不花于恭愍王七年投降高丽。所应哥与阿头刺等于恭愍王十四年移居高丽内地。弓大和达麻大于恭愍王十九年各自归属高丽。女真土地成为高丽的领土，可以说始于此时。

在吉州方面的女真部落归属高丽之时，其南面端川地区的女真因大势所趋归附于高丽，乃是极其自然的。《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列举附属于李太祖（李成桂）的女真酋长，举出了海洋猛安括儿、牙火失帖木儿、秃鲁兀猛安夹温不花和阿沙猛安朱胡引答忽等名字。秃鲁兀，就是端川。阿沙就是利城（利原）。只要一看其注解，即可知其投降高丽的时间不详，很有可能是在恭愍王末年或禡王即位之初。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8月，高丽朝廷命令李成桂和西北面上元帅池龙寿、副元帅杨伯渊等攻陷东宁府。11月，他们率领军队至义州，命令军士架起浮桥，越过鸭绿江急攻辽阳城，将其攻陷。12月2日，高丽都评议使司致书东宁府。书道：“奇赛因帖木儿自其父作乱被处决之后，一直心怀不满图谋不轨……他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躲藏于东宁府和辽阳等地，与分省、分院官吏勾结，狐假虎威。”揭露了奇赛因帖木儿的阴谋。接着写道：“回溯起来，辽阳与沈阳乃是在高丽的旧境界之内，高丽与元朝成事大与姻戚关系之后，他们已属于高丽行省管辖……”明确指出辽阳与沈阳原是高丽的领土，指出该地属于高丽行省管辖，就涵括了它们不是元朝领土的意思。并指出，奇赛因帖木儿不断横生枝节，高丽因而于去年出动军队对之问罪。他们顽抗不止，高丽队遂击溃了他们。并要求：“奇赛因帖木儿逃之夭夭，尚未落网。倘若他躲在贵处，请将其逮捕交给我们。”^①

高丽强硬的收复领土政策，不仅推行于东北面，而且在西北面也出兵进行了征伐。这年12月18日，北元的纳哈出派使者到高丽，对禡王等作了礼节上的问安。翌年亦即1371年（恭愍王二十年，明洪武四年）2月，女真千户李豆兰帖木儿（一名佟豆兰）派百户甫介到高丽，率部落众100户向高丽投降。10月，判事黄用诚向朝廷奏报：高丽军队在五老山城取得胜利，活捉了北元枢密院副使哈刺不花。^②

第二节 高丽与纳哈出的关系

纳哈出是元朝的遗臣。高丽末期，他与一伙人盘踞在沈阳

^①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8月己巳，11月丁亥，12月丁巳。《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19年8月、11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9年12月丁巳；20年2月甲戌，10月丙戌。《高丽史节要》卷29，恭愍王20年2月、9月、10月：“九月，遣西京都万户安遇庆往击五老山城。冬十月，我军克五老山城，捕元枢密院副使哈刺不花。”

(奉天)，自称行省丞相。他在这一带呆得不耐烦，曾命人率军队攻打高丽的东北面，企图占领双城（即永兴）。高丽朝廷以李成桂为东北面兵马使，击退了其入侵。后来，纳哈出多次派使者到高丽，说了许多好话以释前嫌。

1374年（禡王即位年）11月，纳哈出派其儿子哈刺不花到高丽，进献了两头骆驼和四匹马。

1375年（禡王元年，明洪武八年）正月，纳哈出表明了他对高丽王位继承的关注，派使者到高丽询问道：“高丽前王子，准备让谁继位？”如前所述，当时，北元知道恭愍王无后嗣，曾封沈王王嵩之孙脱脱不花为高丽国王。纳哈出之所以派人询问高丽朝廷，是想打探高丽大臣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在禡王将要继承王位时，纳哈出在沈阳对此更是关注。因为行将灭亡的北元与其听任采取排元亲明政策的禡王及其权臣统治高丽，不如将死心塌地奉行亲元排明政策的傀垒脱脱不花扶上王位。在此之后，北元又想与高丽组成联军夹攻明军，企图东山再起之。

1376年7月，判密直司事金湑从纳哈出兵营逃回，向高丽朝廷提供了这样的情报：沈王脱脱不花与纳哈出想趁高丽王位继承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和政局混乱之机，出兵攻打高丽，以达到其预期目的。由此纳哈出对高丽的野心昭然若揭。

这年10月，纳哈出派右丞九住到高丽，将高丽行人（外交官）文天式送回。紧接着，高丽派开城尹黄叔卿到沈阳，就文天式被释放对纳哈出表示谢意。当时，纳哈出曾这样说：“我本不想与高丽动武。而伯颜帖木儿王（指恭愍王）却曾派年轻的李将军（李成桂）率军攻打我们，使我们极其狼狈……”

这年12月，纳哈出通过使者送给高丽一些白金和羊。

1377年（禡王三年）2月，纳哈出派文哈刺不花到高丽，致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力于增强双方的友好。3月，高丽派刚被纳哈出释放不久的文天式到沈阳，一方面表示友好之忱，另一方面送许多礼物给纳哈出、翁主、文哈刺不花、豆个大、王女及其麾下的官人。12月，纳哈出派使者到高丽，送了160头羊和3头牦牛。

1379年（禡王五年）6月，北元派金院甫非到高丽，告之以北元已改年号为天元。当时，文哈刺不花受其父纳哈出指派，也在高丽。文哈刺不花归去时，禡王对他说：“丞相（指纳哈出）与先召称兄道弟，我应尊奉令尊为父哩！”禡王送给他150匹苧麻布。当时，禡王内心对明朝极其不满，很关注北元及其丞相纳哈出。

1383年（禡王九年，明洪武十六年）1月，纳哈出派文哈刺不花到高丽，要求双方继续加强友好往来。明朝得知高丽与纳哈出的这种关系后，通过辽东都司移文高丽曰：“高丽臣事大明，不宜与纳哈出通好。今闻纳哈出遣文哈刺不花请好，高丽厚礼以慰之，其于臣事大明之意如何？如欲免罪，莫若遣送文哈刺不花以效其诚。不然，必有后患，悔之何及。”^①

明朝逐渐将其势力扩展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大军剿灭纳哈出集团，以断绝高丽与北元和纳哈出的来往，根绝高丽与北元排明夹攻之隐患。1387年（禡王十三年，明洪武二十年），纳哈出乖乖向明朝投降。

这年9月，高丽派知门下府使张方平到明朝京城，祝贺击溃纳哈出的军队，迫使纳哈出投降，并且表明高丽从未有过同纳哈出联合对抗天朝之意。其贺书写道：“熊羆般军士所到之处，犬羊般贼匪尽被平定，如此伟业彪炳古今。”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9年1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9年1月。

就这样，纠集北元遗民在辽阳肆虐一时的纳哈出集团，终于树倒猢猻散。随之，明军占领了沈阳。

第三节 李成桂提出安定边防的方略

在明朝朝廷尚未正式承认高丽禡王的即位，并且不许高丽使臣来往的期间，不时有辽东都司拟出兵征伐高丽的情报谣传于高丽。另一方面，北元则派使者到高丽，提议组成联军夹攻明军。胡拔都和女真却不时地侵扰高丽边境。胡拔都于禡王九年8月曾入侵高丽。

当时，李成桂为了捍卫国土，曾向禡王上书，提出安定边防的详细方略。

1383年（禡王九年）8月12日，李成桂提出了这一方略，其前提是：高丽北界与女真和北元以及辽阳、沈阳等地区相毗邻，实在是国家的要津。即使是安然无事之时，也要备足军粮，操练军士，为一旦有事之时做好准备。为此宜采取如下举措：“现在，我国百姓常常与其交换物品，渐渐相处亲近，有的百姓甚至与之联姻，其族属常常引诱我国百姓前去，充当其向导，入侵我国边境。当然，忧患不只来自东北方面。”“双方交战的胜负，在于谙熟地理的得失。其基地靠近我国西北面，而我们在防守方面还是老一套，这对他们来说也就有利可图。他们给吾邑草、甲州、海阳（吉州）的百姓一些好处，博得百姓的好感。现在，他们入侵端州（端川）和秃鲁兀的疆界，掠夺百姓的财物。看来，他们已经对我国要津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他说，他作为东北面防卫事务的指挥官，不能坐视这一切。他在阐明了有关状况之后，建议朝廷采取如下具体对策。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他写道：“防御贼寇之方，在于把军士训练成精兵猛卒，做到同心同德。现在，我国未经训练的军士散戍于各地。敌人入侵时，才把他们临时召集起来，等我军到达目的地，敌人在大肆掠夺之后已经退去。即使我军与敌人交锋，带兵者却不知如何指挥军队，很不熟练，军士则不谙枪法剑术，真是令人无可奈何。但愿从现在起，注重训练军队，使之成为一支精锐的军队。军队的纪律要严明，这样一旦发生事变，就不致有所失误。军队的生命在于军粮。一日之粮，是军队一日之生命。一月之粮食，是军队一月的生命。各道的军士，过去负责运送庆尚、江陵、交州道的粮食，供给军队。现在，道内以其地税充军粮。而近来因水灾与旱魃肆虐，军粮已近枯竭。尤其是那些游闲度日的和尚和地方上的无赖之徒，假借佛寺之名，骗得权臣的允许，向州郡百姓放高利贷，借民斗米尺布，敛以近石寻丈，使百姓饥寒交迫。……应当按照耕地多少收税，公私必须分明。”他提倡培训精兵，公正收税，制止权贵横征暴敛。

他接着写道：“先王（指恭愍王）在丙申年的教示确实是良策。先王以三家人为一户，以百户为一统，统主隶属于兵营。国家无事太平之时，三家人轮流参加巡查。一旦有事，三家的壮丁全部出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家家都有壮丁被征发。近几年来，法纪松弛，需要征发军士时，散处的百姓纷纷逃往山沟里躲藏，很难把他们召集起来。而贼寇到来之后，以金钱和粮食为诱饵收买我国百姓，归附敌寇者大大增加。穷苦百姓没有恒心，都看风使舵，只顾自己的利益。但愿能继续按先王丙申年教示行事，重新整理军籍，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1384年（禡王十年，明洪武十七年）12月，禡王以李成桂为东北面都元帅和门下赞成事，沈德符为上元帅和知密直，洪征为副元帅，率军到北青州，加强对辽东军队的防备。由于万户金

得卿已经率领军民击溃了女真千户白把把山的部队，李成桂与沈德符便率领军队回到驻地。后来，由于女真继续入侵，1385年（禡王十一年）9月，高丽朝廷重又任命李成桂为东北面都元帅，知密直洪征为副元帅。

第四节 兀良哈与斡都里的归属

高丽在恭让王即位之后，内政完全受李成桂等左右。1389年（昌王元年）11月，禡王被贬迁至江陵，昌王被逐放于江华，都完完全全成为平民。12月，李成桂等又让恭让王指使政堂文学徐均衡诛杀禡王，指使艺文馆大提学柳珣诛杀昌王，弄得人心惶惶。然而，李成桂等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却一如既往，倾注了心血。

1391年（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7月，高丽朝廷根据李成桂的建议，派人到东女真部族聚居地区张贴榜文，加以安抚和说服。结果，当时东女真有300多人归顺于高丽。史料记载为东女真地区的部族，而张榜安民的地区究竟在何处却未加阐明。从其他一些记载看来，有可能是兀良哈的部族与斡都里的部族，均聚居于图们江两岸地区。这年8月，兀良哈派人到高丽朝廷请安。9月，高丽派前祥原郡守李龙华对斡都里与兀良哈进行了宣抚。这说明斡都里的部族就是东女真。

1392年（恭让王四年）2月，兀良哈与斡都里等来朝，在会馆里有一番争论。斡都里说：“我们这次来高丽，不是争做头头，争做什么大酋长。过去，侍中尹瓘率军平定我们的土地，曾竖立碑石，把我们的土地归为高丽的领土。现在，我们境内的百姓仰慕诸军事（即李成桂）之威望，而让我们前来归附。哪怕诸军事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的房屋紧贴马厩，我们也为其朴素忠厚所感动。何况他住的是华屋呢？我只想谒见主上与诸军事，别无所求。”于是，兀良哈未再与之争论下去。

翌日，斡都里与兀良哈等拜见恭让王，进献土产品。当时，恭让王听说他们总在争当大酋长，便对他们说：“常言说得好：山上有树，木匠便会去估量。有客前来，主人心中有数分别加以接待。凡是前来归化者，以先归服者为长。”兀良哈觉得言之有理，便推戴斡都里为大酋长。由此可知，兀良哈与斡都里都已归属于高丽，而斡都里则先于兀良哈。从时间上看来，其归附当自尹瓘将军征服该处之日起，即1108年（睿宗三年）左右。

3月，恭让王将斡都里和兀良哈等几个酋长封为万户、千户、百户等官职，发给了他们一些大米、衣服和马匹等。这些酋长感激不已，成高丽的藩屏。高丽朝廷当即在女真各部落出榜安民。榜文是这样写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亦即去年）7月，使李必等人带着榜文到女真地区的豆万（豆满）等处作了招谕。当年，斡都里、兀良哈的万户、千户等头目便来归附，朝廷已给以赏赐与名分，让其各安其业。尔等之速颊、失的觅、蒙骨、改阳、实邻、八邻、安顿、押兰、喜刺兀、兀里因、古里罕、鲁别、兀的改等地区，原属高丽公险岭境内，朝廷早已作过招谕，但至今尚未前来归附，可谓于理不合。今又派李必等人带榜文前往招谕，榜文张贴之日，如能前来归属，则予以赏赐与名分（即官职），仰各向先行归附的斡都里和兀良哈看齐，速速做出抉择。”

这是高丽对居住在斡都里和兀良哈部族北面的女真进行招抚。当时，恭让王将睿宗在位时派兵占领并筑过城池的公险岭以南地区视为高丽的领土，因而对之进行这样的招谕。

从这一记载看来，在高丽末期，李成桂曾率军征服过图们江

两岸地区的女真与公险岭以南的女真，并进行过招谕。兀良哈与斡都里分明曾到高丽表示服属，其地区与百姓自然也已属于高丽，而其以北地区虽由尹瓘将军率领军队占领并在公险岭地区立了碑石，宣称这一带已成为高丽的领土，但居住在此处的女真族却并未归附。所以高丽对之招谕，并认为他们应当归附，应当成为高丽的百姓。

这样一来，兀良哈和斡都里所在的地区究竟是何处，公险岭究竟在何处，便成了一大疑问。

如前所述，吉州在1108年（睿宗三年）虽然修筑了九城，但不久即归还给女真。后来被元军攻陷，称之为海阳（亦称三海阳）。1356年（恭愍王五年）7月，高丽恢复了旧疆。1390年（恭让王二年），高丽设置雄州吉州等处管军民万户府。吉州在其北面，雄州在其南面。由此可见，吉州在1390年之前就已是高丽的领土。而在1390年（恭让王二年），高丽设置了吉州，翌年又在豆万等处张榜，对女真进行招谕。豆万，毫无疑问在图们江附近。所谓等处，则不是指一处，而是指多处和几个部族。兀良哈与斡都里所在的地区，与高丽相距更近，兀良哈与斡都里对高丽的国力有所认识之后，早早就归附于高丽。从这一点也可知他们所在的地区在吉州近处。很明显，当时兀良哈与斡都里已将其女真势力扩展到了吉州之外的图们江流域及其北面的南满洲地区，这些地区当时已分布有女真部族。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番兀良哈部族所在的位置。《龙飞御天歌》在列举归属于李成桂的女真酋长名字时，兀良哈就是土门括儿牙八儿速，亦称土门猛安古论孛里。《龙飞御天歌》的注释，说明土门是地名，在图们江以北，庆源在其以北六十里之处，其西面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有常家下。^①而土门八儿速与李里的关系则不详。但是，土门括儿牙八儿速则确实是兀良哈。而土门却不是图们江，而在庆源北面六十里处，分明在图们江北岸近处。

《龙飞御天歌》第四章记载了穆祖（李成桂的高祖）在斡东的事迹。按惯例，高丽将斡都里等地的兀良哈、兀狄哈和女真的那些种族都视为野人。^②斡东与斡都里，是相同的地名。

据以上资料显示，兀良哈是图们江附近八儿速部落，曾因仰慕李成桂的威望来归，恭让王在位时归附高丽的兀良哈，系同一种族。所以兀良哈的根据地肯定是在图们地区。而兀良哈并不仅在图们江流域，其势力已扩大至其周边地区。兀狄哈如是另一股女真势力，则当时高丽的领土已扩至图们江以北地区。

其次，让我们来考察斡都里。斡都里在兀良哈以北，即在松花江上游。据《輿地胜览》会宁条记载，李朝第三代国王太宗在位时，斡朵里童猛哥帖木儿曾居住在这里。^③《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提到归属李成桂酋长时，有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的名字，他与斡朵里童猛哥帖木儿是同一个人。恭让王在位时，遵从李成桂的招谕而归附高丽的斡都里，便是李朝第三代国王太宗即位后居住在会宁的童猛哥帖木儿的部落。当然斡都里与斡朵里是同一个人。

① 《龙飞御天歌》第53章：“兀良哈则土门括儿牙八儿速。……土门猛安古论李里，土门地名，在豆漫之北，南距庆源六十里。”《輿地胜览》卷50，会宁山川条：“土门，地名，在豆漫之北，南距庆源六十里，西距常家下。”常家下，会宁江外之地。《輿地胜览》的庆源条，虽然记载为“北至豆满江六里”，但这是60里之误。

② 《龙飞御天歌》第四章之注记：“我国之俗，通称斡都里等处兀良哈、兀狄哈及女真诸种为野人。”

③ 参阅《輿地胜览》会宁条：“太宗朝，斡都里童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

如前所述，1392年（恭让王四年），斡都里曾与图们兀良哈一起来高丽争当大酋长。而在归附高丽方面，兀良哈虽在高丽近处，却归附得迟一些，斡都里的部落在兀良哈部落以北，却归附得更早。如果真像《舆地胜览》所说明的那样，斡都里在李朝太宗在位时曾趁机进入会宁居住，那么，在此之前他们便住在图们江以北地区。《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记载了吾笼所猛安暖秃古鲁归附高丽的事实。其注称吾笼所为江名，从钟城绿杨岬往北流，经东林城流入图们江，在庆源西北面六十里处。

此事发生在孔州。孔州在钟城近处，《高丽史·地理志》的公险岭条记载为“一去孔州”。这一事实说明，恭愍王在位时，李成桂曾奉命从事图们江方面的经略。

《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注写道：“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之东，火儿阿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为名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而北流，三城相次沿江。”“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城，其俗谓之移兰豆漫，犹言三万户也。盖以万户三人分领其地，故名之。自庆源府西北行，一月而至。”“斡朵里，本地名，野人之居其地者，国人称为斡朵里。”^②

海西江，就是松花江。火儿阿江，据《辽东志》记载：“忽儿海河，城（开原）东北一千里，源出潭州城东诸山，北流谷州城东，经朵里城北流入松花江。”^③ 忽儿海河，就是现在的瑚尔

① 参阅《龙飞御天歌》第五十四章。

② 参阅《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注，第七十五章注。参阅箭田瓦著《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一）》，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4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研究》（2），见其第412页。

③ 参阅《辽东志》。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喀河。所以，斡朵里在松花江与瑚尔喀河的汇流近处。《辽东志》所说的朵里城，在今三姓城对岸地区。^①高丽末期，受李成桂招安而隶属于高丽的斡都里，就在这个地区。朝鲜太宗在位时，进入图们江内侧会宁居住的斡都里，很显然也在这一地区。

1108年（睿宗三年），尹瓘将军率军征伐女真，修筑了九城。其中，最北面的一个城池就是公险岭镇。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公险岭镇于睿宗三年筑就，设县置防御使。睿宗六年，起筑山城。《高丽史》地理志注称此一名孔州，又称匡州，在先春岭东南、白头山东北，亦称苏下江边。对于公险岭的位置，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认为在先春岭以南，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苏下江边。看来后者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如果说，苏下江就是瑚尔喀河，那么其江边的公险岭镇的位置便一目了然。从《舆地胜览》会宁条看来，在记载通往苏下江通道之后写道：“江边有公险岭镇旧址。其南面与具州和探州相邻，北面与坚州接壤。”

具州，就是《辽东志》中提到的古州。探州，则是潭州。坚州，乃是建州。古州，是宁古塔地区。潭州，在宁古塔西南面的毕尔腾湖的西面。建州，在吉林地区。当时，从吉林经毕尔腾湖的沙兰站到宁古塔有一条大道。瑚尔喀河近处有鄂默和索罗站。从这里往东，可通往沙兰和宁古塔。从这里往西，可到达吉林。从会宁沿布尔哈图河逆流而上，沿富尔佳哈河往下走，来到瑚尔

^① 参阅津田左右吉《高丽末期的东北境开拓》，该文刊载在1913年出版的《朝鲜历史地理》(2)，见其第281页。参阅箭田瓦《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一)》，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1924年的《满洲历史地理研究》2，见其第5页到第6页。

喀河的本流处，就算到达了这里。^①

苏下江边公险岭镇的位置确定之后，再来看先春岭究竟在哪里呢？

《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在说明古州位置后写道：“这里往西步行四天，即可到达先春岭。”现在，从宁古塔通往西面的大道，就是前面说到的吉林街道。从这条街道出发，走上四天，可到达鄂默和索罗的西面。《盛京通志》记载说宁古塔与鄂默和索罗相距 250 里。《北路纪略》则认为宁古塔与吾毛所里（鄂默和索罗）相距 300 里。这里所说的里，究竟是朝鲜的里还是中国的里，没有记述清楚，反正是用其中之一计算出来的里程。从古州往西步行四天，自然是距离不算太远，所到达之处如果有岭，那么，就是到了瑚尔喀河与松花江的分水岭嵩岭附近。嵩岭，就是先春岭。明太祖登极之后经略辽东，所设置的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 25 卫和两州，其势力范围为满洲山地的西绿西面与辽河西面。当时，明朝的势力尚未扩展到辽河以东。^②

以上，我们弄清楚了兀良哈、斡都里以及公险岭镇和先春岭的位置。关于兀良哈和斡都里的位置，学术界还有争议。公险岭镇的位置，在上述解释之外，还有学者认为它在现在的庆兴附近，持此观点者大多是日本学者。

到了高丽末期，高丽朝廷表现出强烈的将领土扩展到图们江以北的意识，其政策也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高丽后来的历代国王逐渐把领土北扩，推行的政策也都是旨在做到这一点。尤其是

^① 参阅津田左右吉著《高丽末期的东北境开拓》，该文刊载在 1913 年出版的《朝鲜历史地理》2，见其第 302 页。

^② 参阅和田清著《明末对鸭绿江方面的开拓（一）》，该文刊载在东京大学出版于 1932 年的《史学杂志》30—9，见其第 938 页及 944 页之注 1。

第三十章 高丽末期对东北边境的开拓

《舆地胜览》、《龙飞御天歌》、《高丽史》和《辽东志》等，在记载公险岭镇与先春岭的位置时，也体现了这种政策。

1108年（睿宗三年），尹瓘将军率领军队征伐鸭绿江对岸的女真，曾在该地修筑了九城。1388年（禑王十四年）2月，明朝设立铁岭卫时，高丽朝廷曾宣称铁岭以北的文州、高州、和州、定州和咸州等和公险岭镇，自古以来就是高丽的领土，甚至曾出兵攻伐辽东。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曾率领军队越过咸兴北面的黄草岭，行军600多里，到达江界附近的雪寒岭，往前再行军700多里，越过鸭绿江，终于攻伐了佟佳江流域的亏罗山城，体现了高丽人恢复高句丽旧土的顽强意志。

1392年（恭让王四年）2月，兀良哈和斡都里等到高丽朝拜，算是完全服属于高丽，这说明高丽已拥有了图们江对岸的女真地区。

如上所述，高丽王朝自太祖以降，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恢复高句丽故土，即恢复北方领土的政策，从未中断。恭让王时期，尽管王氏高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仍致力于推行恢复北方领土的政策，努力开拓其东北边境。

第三十一章 倭寇的入侵与 防倭抗倭的举措

第一节 高宗与元宗在位时的倭寇

倭寇^① 自自古以来就一直不时地侵犯朝鲜半岛的海岸地区。

新罗曾深受倭寇之侵害。为了将倭寇击溃，打击其气焰，文武王专门修建了感恩寺。据说，他曾对其左右近侍说过：“我死之后，但愿能成为护国大龙。”

到了中世纪，之所以有倭寇之说，是因为倭寇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不断到中国和高丽的沿海地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于是，两国便对日本一些侵略成性者的集体掳掠行径深恶痛绝，呼

①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便以“倭”指称日本。倭寇猖獗，不仅危害高丽，而且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倭寇最猖獗时期为高丽末期与李朝初期，即中国的元末明初。在日本，则是吉野至足利执政时期。当时，日本有过南北朝的战乱。南朝失败之后，其遗民流散成海寇。日本平定战乱，建立统一的封建秩序之后，倭寇的活动才告弭息。倭寇一词在《高丽史》上始见于 1278 年（忠烈王 4 年，元至元 15 年）7 月戊戌条。忠烈王第一次去元朝京都，与元世祖谈论两国存在的问题时，谈到了倭寇。参阅《高丽史》卷 28，世家忠烈王 4 年 7 月戊戌：“王曰：‘小邦亦请依上国法点户，又请留合浦镇戍军以备倭寇。’”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20，忠烈王 4 年 7 月。《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隋书》、《魏志》、《明史》与《东国通鉴》等，均有关于倭寇的一些记载。参阅张三植编《大汉韩辞典》第 232 页，该辞典由韩国教育书馆出版于 1989 年。参阅李弘植著《国史大事典》，百万社 1975 年版，第 969 页。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之为倭寇。

在《高丽史》中，有关倭寇侵略的最早记载为高丽、蒙古联军征伐日本之前的高宗十年（1223年）5月22日条。^①这一记载称倭寇入寇金州（即金海）。

1225年（高宗十二年）4月8日，有两艘倭船侵犯庆尚道沿岸诸州县，高丽军队将这些倭寇全部生擒。

1226年（高宗十三年）正月，倭寇又入侵庆尚道沿岸州县。巨济县令陈龙甲出动海军，在巨济岛北面沙岛与之交战，斩杀两名倭寇，其余倭寇连夜逃遁。这年6月1日，倭寇再一次侵犯金州（即金海）

日本文献记载与《高丽史》的记载有所不同，但都记载了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事件。1226年（高宗十三年，日本嘉禄二年）10月16日，在日本有对马国曾与高丽国交战的传闻。1230年（高丽高宗十七年，日本嘉禄六年），日本的镇西凶党，亦即所谓的松浦党出动几十艘兵船，在高丽的别岛同高丽军交锋，破坏了民宅，抢掠百姓财物。当时，日本有一艘来往于唐朝的船舶，赴唐朝曾停泊于高丽海岸，从唐朝归来时，这艘船因风浪过大而停泊于高丽海岸。高丽人对倭寇恨之入骨，便放火烧毁了这艘木船。

1227年（高宗十四年，日本安贞元年）4月，倭寇又侵略金州。高丽的防护监卢旦率领军队迎战，俘获两艘倭船，斩杀倭寇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0年5月甲子：“倭寇金州”。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10年5月。在此之前的11世纪后半叶，对马、壹岐、萨摩等地地方官府与太宰府（筑前），以及对马等地的商人，常乘所谓的进奉船到高丽献上特产，而从高丽获得赐予品。他们经常来往，旨在牟利。后来，高丽不许日本进奉船来往，其次数才逐渐减少，参阅青山公亮著《高丽高宗朝与元宗朝的倭寇》，该文刊载在《白鸟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见其第117页至131页。

30多名，将缴获的武器交给了官府。这年5月2日，倭寇入侵熊州附近的熊神县，高丽别将郑金亿等埋伏于山间，待倭寇来到，突然出击，当即斩杀七人。倭寇连忙逃之夭夭。也就是在这年5月，日本国寄书高丽朝廷，为其贼船曾寇掠高丽边地而谢罪，请仍修好互市。^①

由于倭寇年年侵犯高丽，高丽于这年12月，派及第朴寅去日本，告之以倭寇如此侵略高丽州县，于日本国后患无穷。朴寅带去的通牒，强调两国历来友好，倭寇入侵高丽，实在是天理不容。日本朝廷接到这一通牒，当即将前去高丽肆行掳掠的倭寇抓获并处决。这样一来，倭寇的侵略气焰曾有所收敛。

日本北九州权势家小貳资赖也加以响应，当着高丽使臣的面处决了恶徒（即恶党党羽）^② 90名，而且未经向中央政府奏报，就致书高丽表示歉疚。日本朝廷对此不悦，指责小貳资赖这一行径是“日本的羞耻”。小貳资赖致高丽朝廷之道歉谢罪书，被记载在《高丽史》高宗十四年5月条。当时，小貳资赖是想利用高丽的说谕，修好日本与高丽进奉船的来往，口头上高唱友好与通商，实际上则想藉以牟利。换言之，是想用杜绝倭寇作恶的办法，使进奉船贸易不致因而衰退。这可说是高丽对日政策的成

^① 参阅《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14年4月甲午，5月庚戌、乙丑：“五月庚戌，倭寇熊神县。别将郑金亿等潜伏山间，突出斩七级。乙丑……日本国寄书谢贼船寇边地罪，仍请修好互市。”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5，高宗14年4月、5月。

^② 在13世纪中叶，日本的镰仓政权将山贼、海盗、夜盗、强盗等反社会反体制分子称为“恶徒”，视之为在防御外敌的同时，不能不加以对付的“恶党”。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上），第52页及注（41），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参阅纲野善彦著《关于元寇前后的社会情势》著该文刊载于《历史学研究》第231期。参阅稻垣泰彦著《国民的海外发展》，该文刊载于《日本历史讲座3·中世篇》，该书由河出书房出版于昭和26年。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功。此后一个时期，倭寇未再入侵高丽沿岸地区。

1231年（高宗十八年）到1259年（高宗四十六年，元朝元宗即位年）的近30年里，蒙古军队不断入侵高丽。从这期间的高丽文献记载看来，1251年（高宗三十八年）尽管处于多事之秋，高丽还是在金州修筑城池，以对付倭寇的入侵。1259年（高宗四十六年，元宗即位年）7月，高丽派监门卫录事韩景胤等使臣到日本，要求制止倭寇作乱。^①翌年，亦即1260年2月3日，在高丽朝廷的大臣会议上，有大臣提出济州是宋朝商人与倭寇经常来往的大港口，为了以防万一，应当设置防护别监。然而经过讨论，高丽朝廷只是在该地设置了防护使。

由上可知，当时高丽对倭寇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进行外交交涉，另一种是认真防备以对付其入侵。

元宗即位之后，倭寇又开始出没于高丽沿海地区。1263年（元宗四年，日本弘长三年）2月22日，倭寇出现在金州（即金海）辖下熊神县勿岛，对停泊在那里各州县的贡船（运送贡物到朝廷的贡船）肆行了劫掠。^②4月，高丽派大观署丞洪泞等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劫掠。当时高丽的牒文写道：“自两国交通以来，岁常进奉，一度船不过二艘，设有他船枉凭他事，滥扰我沿海村里，严加惩戒，以为定约。越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贵国船一艘，无故来入我境内熊神县勿岛，略其岛所泊我国贡船所载，多船舶谷米并一百二十石，细布四十三匹。将去，又入椽岛，居民衣食资生之具尽夺而去。于原定交通之意，甚大乖反。今遣洪泞等，赍牒以送，详公牒，并所口陈，穷推上项夺攘人等，尽皆征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即位年7月庚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7，高宗46年7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4年2月癸酉。

沮，以固两国和亲之义。”^①

高丽曾以通牒允许日本每年派两艘进奉船到高丽一次，要求日本尽力遵照这一约定，严格制止倭寇胡作非为。

由于高丽提出了这样强硬的抗议，日本当时维护两国友好的义理出发，履行了双方协议的规定。这年8月1日，洪泞等从日本回到高丽，奏报道：“经过调查，这次海盗是对马岛倭寇，我方已找回了20石大米、30石马麦和70领牛皮。”^②这说明经过高丽进行交涉，日本当时承认了错误，表示以后一定遵守协议，同时将海盗劫掠的一部分物品还给了高丽。

1265年（元宗六年）7月1日，倭寇又入侵南部沿岸的州县，再次大肆掠夺。高丽命令将军安洪敏等率领三别抄军击退了这些倭寇。

有不少史料都有这样的记载：倭寇侵掠高丽自庚寅年始。恭愍王亲自率军征伐倭寇时，对各个军营所作的教示有“庚寅以来之倭寇，非不可敌”之说。尹绍宗上书恭愍王，也提出“国家自庚寅以来，东御倭寇。丙申以后（恭愍王五年）北御鞑靼。”王派安吉到去日本，由其转交的高丽通牒写道：“岁自庚寅，海盗始发，扰我岛民。”李朝太宗在位时，有人提出的《时务论》认为：“倭寇之于我国，自庚寅以来侵掠郡县”。太宗时，京畿道观察使上呈奏章的提法也是：“庚寅以后，倭贼始兴。”世宗派兵征伐对马岛时，曾出布告宣示太宗出师之由，布告里有这样的措辞：“岁自庚寅，始肆跳梁于回缴。”日本《太平论》辑的元朝诏书，也说的是“至正十年，庚寅以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4年4月甲寅：“自两国交通以来，……以固两国和亲之义。”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4年4月。

^② 参阅《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4年8月戊申。参阅《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4年8月。

第二节 李穡和长寿的防倭之策

高丽与元朝联军征伐日本之后，倭寇自1350年（忠定王二年庚寅年，日本南朝正平五年，元朝观应元年）2月起，又开始在高丽沿海地区猖獗。^①当时，倭寇侵入了固城、竹林、巨济和合浦（现在的马山）。千户崔禅和都领梁瑄等与敌人交战，将敌人击溃，歼敌300多名。这是倭寇侵略高丽的肇始。

此后，倭寇侵略连续不断。只有1356年（恭愍王五年）和1386年（禡王十二年），倭寇未在高丽出没。此后倭寇的侵略规模大于以往，所侵犯的范围从南海岸至东、西海岸与内陆，可以说祸及整个朝鲜半岛。

当时，倭寇不仅入侵高丽，而且骚扰元朝和明朝。其中，数山东省受害最大，其次是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1292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恭愍王十八年），元朝沿海地区曾受到倭寇的侵扰。^②明朝在明太祖即位后，倭寇几乎年年都侵扰中国沿海各地。

下面详述1350年（忠定王二年）2月以后，倭寇对高丽的侵略。

^① 参阅《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6年7月丁未。《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6年7月。《高丽史》卷43，世家恭愍王21年10月乙未。参阅《东文选》53。《高丽史》卷120，列传33，尹绍宗传。《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传，禡王3年6月。参阅《太宗实录》太宗13年4月。《太宗实录》太宗18年9月。《世宗实录》世宗元年6月。

^② 参阅《元史》本纪，世祖29年10月：“日本舟至四明（浙江），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刺带将之，以防海盗。”

高 丽 外 交 史

1350年4月，100多艘倭船入侵全罗南道顺天府，掠劫高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地的高丽船舶。5月，66艘倭船再一次侵入顺天府，高丽军队缴获一艘倭船，歼寇13名。6月，20艘倭船侵寇合浦（马山），烧毁高丽驻军兵营，又洗劫固城、会原（昌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351年8月，130艘倭船侵入紫燕岛和三木岛，烧毁高丽驻军兵营。高丽朝廷命令印瑄、李权等率领军队入海剿寇。李权对忠定王辞命说：“臣非武将，未受此禄，难以从命。”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倭寇的猖獗，与高丽军队士气低落，以及朝廷未制订防倭举措，当不无关系。

1352年（恭愍王元年）2月恭愍王公布解决朝政悬案的教示。恭愍王认为倭寇之所以敢于屡犯边境，敢于烧毁民宅和抢劫租税船，都是由于防御失策。下令凡是献计献策者必受奖赏，御寇有功者加官晋爵，招兵歼寇者官升三级，如系贱民赏给钱财。州郡受到倭寇侵扰后，要派官吏前往，调查受害情况，酌情予以减税。军人逃避兵役者，处以笞刑。官吏在这方面有罪者，也责之以笞杖。很明显，这一教示的公布，旨在振作士气，加强防范，做到赏罚分明。

当时李穡上书，就防寇之策提出了建议，提出了田制的弊端与改正之策。他写道：“近年来，倭寇屡犯疆域……为今之计，不外乎二：在陆地上搞好防范，平日便要征发当地居民，配备精良武器，使之驻屯于要冲，严加训练，严明军纪，慎燃烽火，使倭寇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此事宜由按廉使和郡守负责安排，都巡回使并非无事可干，而应加以督查。至于海战战术，依臣看来，本国三面临海，居住在岛屿上的百姓有百万人。其善舟长泳，不以织布为主业，而以渔盐牟利。近来，倭寇侵扰，他们流离失所无利可图，对倭寇恨之入骨，甚于陆地百姓十倍有余。如以得当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奖励，募集海边百姓，一举即可募集几千人。只要扬其所长，定能战胜倭寇。他们歼寇立功受奖，比牟取海盐之利更好，其何乐而不为？可由追捕使负责指挥之，使之经常戍守船上以防万一，再加上州郡之助，他们必能大败倭寇。倘若只在陆地上防范，不敢入海与倭寇交锋，倭寇就会视我胆小，其侵略气焰也就会更加甚嚣尘上。如仅在海面上与倭寇交锋，陆地上了无防范，倭寇便会乘虚而入，其害无穷。陆地上加强防范，可万无一失；出海作战，则可使倭寇胆战心惊。如是，便可一举两得，庶几可以防寇安民。”^①

然而，倭寇依然肆虐如前。这年3月，捕倭使金晖南以25艘战船阻遏倭寇。到达风岛之后，与20艘倭船相遇，竟然不战自退。退到江华乔桐，又遇上许多艘倭船，他们竟然回到西江（礼成江），请求救兵援助，行迹十分卑怯。两天后，金晖南带领战船在窄梁（华城）、安兴（瑞山）和长岩（舒川）与倭寇交战，缴获了一艘倭船。当时，倭寇侵入江华巴音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四天之后，倭船大举入侵。由于军士太少难以御倭，金晖南带领战船退至西江向朝廷告急。朝廷当即出动几个领的军队和宫城的卫戍兵到西京、甲山、乔桐防御。当时，一些妇女上街痛哭，京城为之震惊。于是，朝廷征集官民纳粮食与弓矢，充实军粮和武器。

这年闰3月1日，因高丽当时常备武器相当不足，高丽大臣与小吏，只要是有一官半职者均奉命准备一张弓、50支箭矢和一把剑。崇文馆则奉命对此进行检查。4月，元世祖命人送给高丽300张弓、30000支箭矢和300把剑。6月，元朝朝廷又把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5，列传28，李穡传。

丽请求送与的武器送到了开城。

接着，倭寇侵寇全罗道茅头梁。知益州事金辉带领军舰与之交战，却未能取胜。沃沟监务郑子龙坐视不出，朝廷处以杖刑，将其流配至突山峰。

当时，高丽朝廷发生赵日新之乱，朝廷政处于瘫痪状态。元朝则册封奇皇后所生之子为皇太子，使奇皇后之生母荣安王大夫人在高丽势大。不久，元太子声称要与高丽金允藏之女结婚，将她带往元朝京城。元朝丞相脱脱奉命出兵攻打南宋，要高丽出兵参加这次征伐。另一方面，高丽的印瑄率领军队越过鸭绿江攻，占了婆娑府（九连城）等三站，柳仁雨率领军队攻毁了双城（永兴），高丽对元朝采取了强硬的对峙态度。

在这样的形势下，倭寇继续侵略高丽。1357年（恭愍王六年）5月，倭寇大举入侵乔桐，朝廷不得不在京城下令戒严。9月，倭寇闯入丰德升天府兴天寺，抢走忠宣王韩国公主画像。闰9月，倭寇侵略乔桐。李云牧与李蒙古大惧敌，不敢率军出战，被朝廷关押于巡军。

同年1月，恭愍王根据王师僧侣普愚的建议，准备迁都至汉阳，确定了建造王宫的地址。普愚是根据“建都汉阳，必有三十六国前来朝贡”这一谶语提出这一建议的。其动因在于税收锐减和倭寇猖獗，首都开城难以防御。乔桐与升天府等均在开京附近，倭寇经常出没于乔桐与升天府，开城不得不经常下令戒严。

此后，高丽还有过几次迁都之论。在红巾贼侵略高丽，高丽北方岌岌可危之时，倭寇继续乘虚而入。1360年（恭愍王九年）5月，倭寇入侵全罗道的会尾和沃沟等地，以及杨广道（京畿道）的平泽、阿山和坪县（洪城）等地，烧毁龙城（水原）等10多个县，高丽京城又不得不下令戒严。当时，高丽朝廷任命前平章事柳濯为京畿兵马都统使，判枢密院事李春富为东江都兵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马使，判军器监事李子春（李成桂之父）为西江都兵马使，征发地方壮丁编入军队，让官吏们也都奔赴战场。闰5月1日，倭寇侵入江华，杀死百姓300多人，抢走大米400石。当时，在野人士沈梦龙只身歼寇13名，自己也为国捐躯。

恭愍王在京城开始下令戒严之后，有意迁都他处，于7月1日亲自到被列为候选地址的长湍邑白岳巡视，然后命人修建宫阙。这年11月，恭愍王移居于该处。然而，翌年3月又还都开城。后来，白岳被朝野人士称之为新京。

在此之前，恭愍王有意迁都南京（现在的汉城），曾派前汉阳尹李安前去督修城墙和宫阙。而百姓则叫苦连天。于是，恭愍王到太庙占了一卦。由于所占的卦很不吉利，恭愍王不再想迁都南京，而命人加紧修建白岳。

后来，倭寇的侵略有增无减。高丽朝廷不得不费尽心机加以抵御。加上红巾贼又入侵高丽，恭愍王只好去安东避难。这时，契长寿^①上书恭愍王，就防倭之策提出了其建议。其建议书的

^① 契长寿提出关于防倭策的时间不明确。恭愍王在位时，他居父丧参加科举及第。其父契逊死于1360年（恭愍王九年）。这年8月，契逊被封为高昌伯，可知其死于1360年8月至12月之间。恭愍王曾于这年闰五月下令：百官在父母丧亡时，必须服丧三年。而这年8月，他又下令：四方战乱频仍，国家处于用人之际，宜废三年服丧制。由此可知，即使是后来实行服丧两年制，从1361年8月至12月，契长寿也在服丧。这年11月，恭愍王因红巾贼入侵离开京城去安东避难。从契长寿“脱去丧服参科考而得以登第”的记载看来，他是及第于1360年8月到1361年11月之间，然后提出了防倭之策。然而，《高丽史节要》有百日脱丧之说。据此，他很可能是在1361年3月以前提出了防倭之策。史料有恭愍王8年10月郑梦周等33人及第的记载，如果契长寿在此之列，其防倭之策有可能于1360年10月提出。参阅《高丽史》卷39，世家恭愍王9年6月丁亥，8月丙戌、乙丑；10年11月丙寅。《高丽史》卷112，列传25，契逊附契长寿传。参阅《高丽史节要》卷27，恭愍王9年8月；10年11月。

内容如下：

“当务之急是对倭寇进行防备。贼船出没有一定的时间，百姓随时都在担心自身安危。海岸防备虽常被提及，实际上。而驻地士兵全是乌合之众，平日受训不严，装备与兵器不坚不精，以致无法固守阵地，就像草屋篱笆只能略挡风雨，一旦倭寇闯入，他们闻风丧胆逃之唯恐不及。这样的兵卒，就是启用颇牧（中国战国时代赵国名将廉颇与李牧）为帅，也是枉然，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这一段话，说明了当时高丽的防备状况。又写道：“我国防倭处个个相隔五六十里，没有一处相隔二三十里以内。这样，倭寇便易于侵入。我国海边郡、县、村百姓散居各处，而倭寇一来，多则一千人或百人一伙，少则十人或五人结队，其手段与计谋甚多。晴朗的白昼，看到他们闯入时，倒是可以分辨出其人数的多寡，而一到晚上则看不清远处，根本不知其虚实。他们往往出没于我们料想不到之处。其人数多时，故意虚张声势四出扰乱，见我们兵力分散便搞突然袭击。有时，他们置民宅于不顾，先行袭击我们的兵营和阵地。有时，先派间谍前来摸清底细，认准富裕大户人家之后，突然偷袭，将这些有钱人家洗劫一空。等到官兵闻讯追击而来，敌人已满载赃物远去。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募集壮丁时，倭寇已逃走，百姓已遭难。我们所能再募集者多为衰残之人。而我们一将这些征集来的壮丁打发回家，倭寇便乘虚而入。这样一来，百姓得不到休息，而朝廷则得不到用兵的机会。”

契长寿写道：“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方便而采用的坚壁清野方略，其弊病谓更多。由于海边之地很肥沃，百姓喜欢居住于该处。实行清野方略，让他们都迁走，本以为这样做，于国于民有利，结果却适得其反。距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当然也有田地，也可以打井，然而当地百姓在那里定居，谋生颇为艰辛。而清野方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略实行之后，其他地方百姓又迁至这里居住时，举目空荡荡，他们也只能更加穷困。所以，迁走者怨气冲天，迁来居住者更是心怀不满，当地百姓纷纷失业。平日，臣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仰天长叹忐忑不安。让百姓入保，亦即参防倭寇之命令下达后，起初，防倭者之间距离较近。而现在他们之间距离已超过六七十里。依臣之见，不如把在海边百里之内居住的百姓召集起来，在方圆三五十里肥沃可耕作之土地，选择地势平坦有薪木和水之处，计算户数的多少，让他们安居于其内，四周则筑起城墙，按二三百户的比率设置官府。民宅栉比鳞次，周围筑起墙垣。除了住宅之外，要有储藏粮食的场所。城墙与堑壕应当是墙高壕深。城墙上应有城楼和吊桥，还要适当设置防备设施。城墙与堑壕之间要挖品字形小坑，布上鹿角，阻遏敌人往来。晚上要有人打更。烽燧制要严格执行，耕地不可越二十里之外，农民早出晚归应当不感到麻烦。水稻一熟，就要收割，就要及时运回。倭寇入侵时，壮丁们上城戍守，老弱者负责送饭送水。在城墙上实行分区负责制，通过烽火向邻近城池请求派兵支援。一旦接到邻近城池告急之信，或看到求助的烽火，要挑选精锐骑兵立即前往。得知告急之信而不派人前去救助者，当事人与指挥者均应被治罪。敌人往往利用潮起潮落确定时间而来攻城。他们不是来占领土地，不能在我们这里久留，只是想抢掠财物。即使一无所获，一到退潮时也非走不可。我们要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这种情况袭击他们，用种种办法引诱他们，使之无法发挥其勇猛之长处，无法调动其一伙人的力量，使之毫无所获，使之无法进攻。只要能做到这一切，那么，倭寇在后退时就会害怕我们对它首尾夹攻。这样一来，主动权与胜利就属于我们，而倭寇只能感到痛苦和悲

哀。^①

契长寿的这份防倭建议书写得相当冗长，却阐述得很具体很有逻辑性。作为当时对付倭寇入侵的对策，很有可取之处。

第三节 高丽对日交涉与日本的态度

1361年（恭愍王十年），高丽遭到红巾贼的侵略，恭愍王不得不于这年12月避难至安东。而金镛则趁机叛乱，国内局势更加混乱。

1363的（恭愍王十二年）4月，有213艘倭船侵入江华的乔桐。高丽朝廷连忙在京城宣布戒严，任命安遇庆为倭贼防御使，率领军士全力对付倭寇。1364年（恭愍王十三年）4月，全罗道都巡御使金镛率领漕船（税米船）到达内浦时，倭寇一拥而上，想掠夺船上大米。金镛等与之交手，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军卒，大败而归。

这年5月，庆尚道都巡问使金续命率领军队惩处在南海岸抢劫的倭寇，在镇海县与3000名倭贼交战，获得大捷。6月，倭寇入侵海丰郡（丰德），两天之后闯入江华与金浦之间的窄梁。高丽朝廷命令密直副使边安烈率领军士赶走了倭寇。

1366年（恭愍王十五年）5月，倭寇大举入侵并攻陷乔桐，竟然驻屯于该处不肯退去。开城百姓闻讯大惊。恭愍王命令赞成事安遇庆和评理池龙寿等率领33名兵马使及其所部军士对之进行征讨。他们率军驻屯于东、西江升天府。当时，高丽朝廷正在大兴土木修建影殿和正月陵，所有官吏由于这项工程而未出视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2，列传25，契逊传附契长寿。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事，国库空虚，政纪松弛，防卫紊乱，军政大坏。由于朝廷未让兵卒武装起来，所有的军队对倭寇只能持观望的态度。

为了防御倭寇的侵略，恭愍王曾下令重赏歼敌有功者，采取军民联手积极防倭的举措，却一时未能生效。李穡提出的在陆地上进行防御、到海面上与之大战、重赏立功者的建议，在现实生活中无异于纸上谈兵。现实情况则是倭寇的侵略气焰甚嚣尘上，而高丽军民的士气与防倭御寇的意志，却渐趋消沉麻木。

高丽朝廷未能真正实施李穡提出的陆守海战这一战略方针，却派外交使节到日本，想通过与日本执政者进行交涉而根绝倭寇掳掠之患。1367年（恭愍王十六年、日本贞治六年，正平二十二年）11月，高丽派检校中郎将金龙到日本，要求禁制海盗横行。^①

从当时的东方局势看来，元朝正在崩溃、明朝如朝日初升之时，中国沿海地区也遭到倭寇骚扰。方国珍作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于1365年10月派使者到高丽通问友好。高丽于1367年（恭愍王十六年）5月派张子温到中国中原，向河南方国珍的友好表示答谢。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4月，明朝也派使臣契斯到高丽，与高丽通问友好。1370年5月，明太祖在高丽使臣成准得归国之时，让他带回了一份国书，其中写道：“况且倭奴已在海中出没十多年，怎会不知王之虚实？”劝恭愍王采取举措对付倭寇，不可掉以轻心。

^① 参阅《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15年5月乙巳：“遣金逸如日本，请禁海贼。”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的研究》上，第141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参阅青山会亮著《日、元之间的高丽》，该文刊载在《史学杂志》32—8—9。参阅青山公亮著《弘安之役与高丽》，该文刊载在《史学杂志》36—10。参阅青山公亮著《日、丽交涉史的研究》，第132页至148页，该书由明治大学出版于昭和30年。

当时，日本正值室町时期^① 第二代执政者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第一代足利义满）执政的贞治五年，亦即正平二十二年。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战乱时期，足利义满政权则值执政之初，无力禁制倭寇的劫掠活动。

日本曾遭到高丽与元朝联军的征伐，后又臣服于明朝，但在外交上无所作为。以海盗的掳掠而与明朝有了接触的日本，其第二代执政者征夷大将军义满，于1367年（恭愍王十六年，日本贞治6年、正平二十二年）11月，接见了他执政后接触的第一位外国外交使节，亦即高丽的金龙。^② 对此，《高丽史》只记载为金逸奉命到日本，要求禁制海盗横行。然而，日本的史料却记载得比较详细，让我们看一看其所作的记载。

^① 关于室町时期的范围有好几种看法，一般认为系从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起至足利氏灭亡时为止，亦即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的二百多年间。从日本对外关系史来看，系从平安时期末期到江户时期初期，在日本人的海外进出史上，这是很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在高丽史上相当于从恭愍王即位到高丽灭亡后李朝宣祖初年。室町时期之初，日本分为南北朝。李成桂建立新王朝的那一年，日本南北朝正式统一。在此期间，高丽与日本的接触和交涉，始于倭寇猖獗之时。中村荣孝著《日韩关系史的研究》（上），第51~54页，141~142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

^② 参阅三浦周行著《足利幕府的外交事情》，该文刊载在《日本史的研究》一书。参阅《太平记》之高丽人来朝事。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高丽使臣金龙^①等17人,^②当时到达日本的出云。金龙一行带着元朝的赐予品与外交通牒向日本京都进发,没想到在途中亦即在云州遇到盗匪,赐予品被抢劫一空。于是,他们只好带着通牒前往,于翌年2月24日才到达京都,被安排在嵯峨的天龙寺。^③

2月27日,高丽的另一位使臣金一(或称金逸)率领30多名随行人员也到达日本京都。这个金一,就是《高丽史》上记载的金逸。金逸此行,也是奉高丽朝廷之命前来要求日本禁制海盗出海劫掠。

金龙一行与金逸一行之所以几乎同时到达日本,并不是他们同时从高丽启程去日本。早在10多天以前就到达日本的金龙一行,是于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三年,日本贞治二年)8月13日从高丽出发的。他们到达日本后,走错了去出云的路,因而到达日本的京都便延迟了好多天。高丽朝廷见金龙一行迟迟未归,只好再派金逸等带着国书赴日本。^④

^① 《高丽史》记载为金逸。然而,《日本实录》认为金龙与金逸几乎是同时来到日本。据《高丽史》禡王时的记载,恭愍王15年曾派万户金龙等到日本,告之以倭寇侵略罪行,得到日本征夷大将军关于禁止倭寇滋事的许诺,这说明金龙也曾到过日本。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6月:“因此,丙寅年间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

^② 这17名人名单,以万户左右卫保胜中郎将金龙为首,包括权重文(?)、朴之、李长寿、冲彻、金大、金哲、祁之用、金寿、金玉、金能文、朴天震、金千、权成、舛玉、某某和禅云寺长老延某等。参阅《大日本史料》第6编之27,见其第820页到824页。参阅昭和37年出版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太平记》3,卷39之补注32。

^③ 参阅三条公忠著《后愚昧记》,贞治6年3月24日条。

^④ 参阅《太平记》卷39,高丽人来朝事:“止使异国,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两位高丽立定于日本国贞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出云二着岸又。”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上),第205页。

当时，高丽遭到红巾贼入侵，恭愍王避难至安东。紧接着，又连续发生了金镛之乱与崔濡之乱。高丽局势极为动荡。尤其是在这年4月，倭寇又以213艘贼船侵入乔桐，使得高丽朝廷不得不在开城下令戒严。金龙作为使臣被派往日本进行交涉一事，《高丽史》未作记载，而若日本史料记载其来过日本，当是在此之后。

当时，金龙带着元朝征东行中书省通牒。通牒写道：“照得……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贼船数多，出自贵国地面前来，侵本省合浦等处，烧毁官廨，骚扰百姓，甚至杀害。经及一十余年，海泊不通，边民不能宁处。……若使发兵剿捕，恐非交邻之道。除已移文日本国照验，颇为行下概管地面海岛，严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①至正十年庚寅，为公元1350年，亦即高丽忠定王二年，日本南朝正平五年，北朝观应元年。

当时，金龙一行之所以带去的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通牒，在地形式上征东行中书省是元朝在征伐日本时设置于高丽的机构，而实际上它已属高丽朝廷管辖。

日本足利政权建立不久，足利义诠对海外局势与情况一无所知，而且高丽派来要求日本禁止海盗出外劫掠的金龙、金逸这两位外交使节，是他执政后接见的第一批外交使臣。当时，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与其亲信起初还以为金龙与金逸是来自蒙古的使臣，后来才明白他们来自高丽。他从未接待过外国使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便仿照日本政权过去的做法，不是先由中央政府

^① 《太平记》高丽人来朝事：“皇帝圣旨褒征东行中书省照得……毋使如前出境作耗。……”原文记载当时派出的使节是万户金凡贵和千户金龙等。金凡贵是何许人未加说明，而其后的投拜使名单却没有他的名字。该名单提及的禅云寺在高敞郡雅山面，至今仍是名刹。参阅《东国輿地胜览》卷36，全罗道茂长县佛宇寺条。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办理此事，而是先让武臣处理。到3月16日，高丽使节带来的通牒才转给日本政府。稍后到达的金逸所携带的高丽国书，也依此转给了日本政府，其内容自然也是要求日本禁制海盗的掠夺行径。

从4月中旬起，日本宫廷用两个月时间对事情做了慎重的调查，然后交重臣协商，采取相关的对策。在此期间，高丽使节受到了优待。4月18日，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到高丽使臣下榻的天龙寺问寒问暖，还设宴款待他们，让舞姬们在宴席上以歌舞助兴。

日本足利政府未与外国进行过交涉，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才恰当，曾为之颇为作难。他们感到棘手之处，有如下几点：第一，答章是否应以宫廷的名义正式致对方？第二，如果宫廷不直接出面，或是用将军的名义，或是以大宰府的名义发文，或干脆以小貳资赖的名字落款？他们为此绞尽脑汁颇费周章。^①

当时，只有内大臣三条实继认为应以宫廷名义发文，但其他大臣认为不妥。大臣们的多数看法是：（1）倭寇出自九州，王权无法对九州加以禁制。如果由宫廷出面，有损日本的体面，而且会对后世有所影响。（2）高丽在通牒中对元朝称皇帝称圣旨，对日本则称国王，这个问题令人不快。（3）有大臣认为不仅如此，通牒中未写日本的年号及收信者，而且通牒与国书未装在箱子里，这些都是无礼的行径，可以此为由，干脆不予答复。就这样，经过讨论，大臣们认为写答章是武臣们的事。于是，日本宫廷政府未写答函，决定由武臣向高丽朝廷作个交代。

^① 参阅《师守记》，贞治6年5月9日，5月23日、28日，6月2日、3日条。参阅《后愚昧记》，贞治6年5月23日条。参阅松田英松著《弘安、文禄征战伟绩》，史学会刊。

就这样，日本由参议藤原行忠执笔写了答函，以将军足利义诠名义给高丽使节送去了土产品及答函。^① 答函的原因在于元朝征东行省的通牒要求日本作答，日本不能不对此有个反应。

日本武臣所送答函的内容是：侵略高丽的是四国、九州的海盗。在京都的宫廷政府对之无法加以制止，也无法对之进行惩罚。这年6月24日，足利义诠到高丽使臣下榻的天龙寺，与之告别，并且就答函的内容作了一些说明。

6月26日，金龙和金逸这两位使臣由天龙寺的日本和尚梵盪和梵繆保护和陪同（日方的解释是：他们不只是尽保护与陪同之责，而是作为答函的使节与之同行），带着足利义诠送给高丽的贡物和作答函踏上归程。当时，足利义诠送给高丽的贡物有：10匹鞍马、两领铠甲、3把白太刀、10段御绫、100段彩绢和300把扇子。^②

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日本贞治七年应安元年）正月17日，金龙与金逸率领的两个使团完成了答访与报聘，带着足利义诠的贡物回到高丽，高丽大臣们以礼相待。当时，受到恭愍王信任而执掌朝廷实权的辛旽独自面南而坐，等候日本使臣到来。日本的两位和尚负有送答函的命令而来，见辛旽这副模样，不由得勃然大怒，当场提出抗议。辛旽则更是怒不可遏，竟想殴打日本使臣。于是，高丽对这两位和尚接待得很冷淡，有时甚至不让他们吃一餐饭。李仁任看不下去，暗地里命人给这两位日本使臣提

^① 参阅三条公忠著《后愚昧记》，贞治6年6月26日：“后闻高丽牒使今日下向云：于公家者，不可有返牒之由，虽落居，自武家遣返牒（行忠卿清书云云）又大树（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赐种种物等于牒使。……”

^② 参阅《太平记》卷39，高丽人来朝事。参阅三条公忠著《后愚昧记》，贞治6年6月24日、26日。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供饮食。^①

这两位日本使臣备受冷遇后踏上归途，于6月回到日本京都。他们归国时，高丽将回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他们把这些礼物交给武臣，武臣未转给宫廷政府，而分给了其麾下的亲信，即“大名”。分配这些礼物时，这些武臣当着将军足利义满（义满已于前年12月死去）的面，大肆你争我夺。^②这与倭寇入侵高丽海岸之后大肆掳掠时的贪婪无度何其酷似。

这就是高丽派外交使节去日本，与其足利政权打交道的一次外交活动。要求日本禁止其海盗到高丽肆虐，实际上也是一种镇压倭寇的举措。而日本掌权者当时由于长期没有进行过外交活动，龟缩于岛国而不知世界辽阔，只知互相争权夺利，一旦需要接待外国使节时，既无先例可循又不知国际惯例，漏洞百出。他这次突然接待高丽使臣，尽管有不少地方做得不周，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次往来，对于两国不可或缺的交往和建立贸易关系，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此后，高丽与日本之间不时有使臣往来。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7月，日本派使臣到高丽表示友好之忱，四天之后，对马岛万户也派使者到高丽献上了土产物。翌月，亦即闰7月，高丽派讲究使李河生到对马岛，示高丽朝廷答谢之忱。11月，对马岛万户崇宗庆派使者到高丽朝拜。高丽朝廷应其要求，送给他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2，列传45，叛逆5，辛吨传。

^② 参阅《愚管记》，应安元年闰6月2日：“传闻高丽国牒使去年归国之时，故大树送遣种种重宝云云。天龙寺僧相伴波海件僧等，近日归朝之次，送返答之珍宝，于武家分赐诸大名云云，于左马头（将军义满）各取团子云云。”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研究》（上），第266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

们 1000 石大米，叮嘱其根绝倭寇的海盗行径。^①

第四节 倭寇的猖獗与郑地的平定计划

外交交涉的效果毕竟是暂时的。后来，倭寇竟然更加飞扬跋扈无恶不作。

当时，倭寇之所以如此猖獗，要言之，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高丽与元朝联军征伐日本以失败告终之后，倭寇认为高丽与元朝没有什么可怕，竟至目空一功，开始以大海为其屏障大肆掳掠。

第二，高丽与元朝联军征伐日本之后，孤立了日本，不与之建交和往来。倭人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竟采用暴力，大肆掳掠大陆上的物资。

第三，当时日本分为南朝与北朝，群雄割据，国内秩序混乱不堪，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控制社会上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于是，日本边民的海盗活动也就猖獗肆行而无人过问。

高丽与日本之间的使臣往来，后来一直未曾间断，却由于上述几个原因，使倭寇的劫掠行径不仅无法根绝，而到了恭愍王末年，反而更加猖獗起来。

1367年（恭愍王十六年）3月，倭寇闯进江华府肆行掠夺。5月，元朝中书省派直省舍人乞徹到高丽，提醒高丽朝廷：“倭寇肆虐，必经高丽，应出动军队，除恶务尽。”当时，无比猖獗的倭寇把骚扰的魔爪伸到了元朝的海岸地区，元朝中书省要高丽

^① 参阅《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17年7月乙亥、己卯，闰7月，11月丙午。《高丽史节要》卷28，恭愍王17年7月、11月。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在倭寇闯入其领海时把它剿灭，使之不致成为元朝的后患。

1369年（恭愍王十八年）7月，一些倭寇在巨济岛和南海县投化高丽，愿与高丽永远和好。高丽朝廷相信其誓言，准许其投化。后来，这些倭人自食其言，在侵掠了高丽的边防之后，全部返回日本。

同年，辛吨听信道洗的松京气衰说，又见倭寇实在猖獗，竟建议迁都忠州。恭愍王一听起初大怒。辛吨却极力说服恭愍王，说道：“松京（开城）近海，海寇（倭寇）来侵，常受威胁。”恭愍王觉得言之有理，便下令在三苏修路，在平壤与忠州建造离宫与鲁国公主的魂殿。所谓三苏，是高丽时期建筑的宫阙，为历代国王前往逗留的三个地方。右苏，为开丰郡大成面的白马山；左苏，为长坛郡的白岳山；北苏，为新溪东面的箕达山。

1370年（恭愍王十九年）2月，倭寇侵入内浦，捣毁当地的30艘兵船，将当地作为租税收下的谷粟全部劫走。五天之后，倭寇入侵宣州。杨伯渊率领军队击退他们，歼寇50多名。1371年3月，倭寇入寇海州，烧毁官府，抓走牧使之妻女。7月，倭寇闯入礼成江，烧兵船40多艘。高丽朝廷因失职罪杖责兵马使金立坚，将其流配至安山。并任命李成桂为西江都指挥使，杨伯渊为东江都指挥使，负责镇压倭寇。8月，倭寇入侵凤州（凤山），大肆掳掠。

1372年（恭愍王二十一年）3月，倭寇入侵顺天、长兴、耽津和道康郡。4月，倭寇劫掠镇溟仓。6月，这帮海盗闯入安边与咸州（咸兴），烧杀掳掠无所不为。高丽朝廷因此对安边府使张伯颜处以杖刑。16天之后，倭寇入侵东界的安边等地，抓走妇女，抢走储粮10000多石。高丽朝廷为此革除存抚使李子松的官职，将其流配至山沟僻壤。次日，倭寇又闯进咸州、北青，州万户赵仁壁早有准备，设伏击溃倭寇，斩首70余级。第二天，

倭寇侵入洪州。7月，这些贼寇掳掠杨广道。

9月，27艘倭寇船入侵阳川，停留三天。高丽地方将领率领军士与之交锋，却因不惯于水战而大败。倭寇抢走高丽军队帅旗，闯入江华，将帅旗交给当地居民而去。

当时，高丽军队军纪松弛，士气低落。恭愍王只好亲率五军至升天府，严惩败坏纲纪军兵。恭愍王对赞成事安师琦说：“本王严惩害群之马，是想严明军纪，使军队不去骚扰百姓，使军队有战斗力。庚子（1360年，恭愍王九年）和辛丑（1361年，恭愍王十年），我们不是无法阻遏红巾贼。庚寅（1350年，忠定王二年）以来，我们也不是无法剿灭倭寇。之所以弄得百姓被掳，朝廷官阙迁移，是因为用兵无纪，施令不严。现由本王亲自指挥尚且有人敢于抗令，何况各位将领带兵？卿等好生领会，说服百姓军士，务必做到今后无人再敢违抗军令。”

1373年（恭愍王二十二年）2月辛卯，倭寇侵掠龟山县（昌原）。庆尚道都巡问使洪师禹率军击溃之，斩首数百级，并将缴获的装备交给国家。3月8日庚戌，倭寇闯入河东郡。4月戊戌，倭寇滞留于其近处的海岛，朝廷命令评理柳渊镇守东江。6月丙申，倭船集结于东、西江，侵犯阳川（高阳），直闯汉阳府（现在的汉城），烧毁官府，屠杀百姓，骚扰周边地区，开城因而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混乱。

这时，赞成事姜仁裕与书状官郑梦周等自明朝京都回到高丽京城，带回明朝致高丽的国书。明太祖的这篇宣谕文，仍在追究高丽歹徒杀害使臣孙内侍等的原因，然后写道：“说倭寇近年频频侵犯贵国海边，贵国以三百五十艘战舰收拾了他们，此乃果断之举。我朝也在注视倭国及其海上的动向。倭寇也在侵扰我朝沿海，我朝明州和太仓两地指挥官仓促战死。我朝又派指挥官率军

第三十一章 倭寇入侵与防倭抗倭的举措

追击倭寇，抓获其年轻的贼首加以处决，海上遂告平静。”^① 由此可知，高丽曾出动军队剿灭倭寇，明朝也曾深受倭寇的侵扰。

这年7月丙子，倭寇攻陷乔桐。9月辛丑，又侵入海州，杀死牧使严益谦。高丽朝廷得知州官未发兵救助，诛杀这个州官。16天后（丁巳），西海道万户许子麟未率军民抗倭，朝廷派体覆使三司左尹郑丹凤对之处以杖刑。10月，崔莹以杨广道都巡问使李成林抗倭不力，处以杖配，以之为放烽火的烽卒。都镇抚池深，则被崔莹处以极刑。

这年11月，高丽朝廷行文明朝中书省，请求补给火药，文曰：“倭寇来侵已有20多年。近年，小邦只派军队在海边诸州郡防倭，未能入海追捕倭寇。而今，倭寇的势力已不容小觑，小邦拟于今后派兵入海追捕之，以绝百姓之忧。现在，小邦正在制造捕倭船，只是无法筹措船上应当配置的机械、火药、硫磺和焰硝，恳请予以解决为荷。”^②

明朝尽管一直在指责高丽进贡之物过少，并对仍在使用元朝旧制等横加挑剔，却于翌年（恭愍王二十三年）6月派人将高丽所要求的火药、硫磺和焰硝等送到开京。这显然是在督促高丽朝廷早日彻底剿灭倭寇。

1374年（恭愍王二十三年）3月丙戌，倭寇入侵安州。接着入侵庆尚道，捣毁40多艘兵船。9月壬子，倭寇出动350艘倭船，侵寇庆尚道的合浦（马山），烧毁港口兵船，杀害高丽军士5000多名。高丽朝廷闻讯震惊，派赵琳去当地，将都巡问使金铉处以死刑，并将其五马分尸，通报全国，以儆效尤。与此同

^①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7月壬子，明太祖之宣諭文。

^② 参阅《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22年11月。

时，西海道万户李成、副使韩方道、副使崔思正率军与倭寇交锋于木尾岛，不幸以身殉职。两天后（甲子），倭寇侵犯紫燕岛。5月22日，侵犯江陵。24日，入寇庆州和郁州。28日，侵犯三陟。6月甲辰入侵襄州。8月丁酉侵扰淮阳。9月癸酉在安州烧杀抢掠。

倭寇如此猖獗，迫使高丽朝廷决心进一步采取防倭之策。当时检校中郎将李禧曾建议对军士进行水战训练。恭愍王听了叹息说：“禧虽官微，却能献计献策。在百官和卫士之中，为何在此之前没有一人像禧这样！”卫士柳爱廷奏道：“郑准提（中郎将，后来改名为郑地）早就有了平倭的计策，只是未能提出。”郑准提（郑地）刚好在场，便向恭愍王奏报了自己想好的平倭策。

郑地的计策都有哪些内容，史料未作说明。然而，恭愍王听了他的叙述，当时曾十分感动，随即任命他为全罗道安抚使，李禧为杨广道安抚使，分管追捕倭寇事宜。恭愍王对大臣们说：“本王今日给禧等封官，卿等无需多心。本王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他们立功安民。如果他们不好好立功，日后本王不会放过他们。”恭愍王给郑地麾下的85名军人和李禧麾下的67名军人也各封官职，还发给他们以千户空名牒20张，百户空名牒200张。所谓空名牒，就是未写上姓名的任命状。

当时，郑地与李禧多次上书，提出了几十条建议。综述之，其主要内容为：“居住在内地的百姓，对舟楫不熟，难以参加御敌。只要将生长于海岛上而又自愿参加水战者招募起来，由臣等相率，五年之内一定将倭寇悉数剿灭。都巡问使一职，只是空耗军粮劳民伤财，请立即撤销此职。”以这些建议，可以想见郑地（郑准提）所提出的计策，大概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 征伐对马岛

第一节 暗杀倭人的阴谋与禁倭交涉

祸王即位之后，倭寇的掳掠更加猖獗。1374年（恭愍王二十三年，祸王即位年）12月，倭寇入侵密城，烧毁官府，抓走许多百姓。1375年（祸王元年）正月，倭寇又侵入密城，放火劫掠，无恶不作。由于密城万户未能率领军民抗倭，高丽朝廷派将军崔仁哲前往调查实际情况。3月，倭寇入寇庆阳县，杨广道都巡问使韩邦彦率领人马与敌交锋后大败。

当时，日本足利政权由第二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执政。细川赖之当上管领后，整顿了内政。九州的今川贞世等得到提拔而成为探题，征西将军怀良亲王的势力范围则逐渐被其蚕食。高丽使罗兴儒到达博多时，日本的了俊正在肥前兵营，未能前往迎接。

1375年（祸王元年，日本永和元年）2月，高丽第二次派使臣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出海为非作歹。当时，判典客寺事罗兴儒作为通信使到达日本的博多，日本误认为他是间谍，曾使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幸亏得到业已归化日本的和尚良柔帮助，才得以到达京都，受到了日本政府的优遇接待。日本在朝廷会议结束之

后，以和尚良柔为答信使，让天龙寺和尚周佐德臾拟就国书，该国书答应等到平定九州之后，立即采取禁贼措施。

1376年10月，罗兴儒从日本回到高丽。他带回的答函是这样写的：“唯我西海一路九州乱臣割据，不纳贡赋且二十余年矣。西边海道（盗）顽民对衅出寇，非战所为。是故朝廷遣将征讨，深入其地，两阵交锋，且以相战，庶几克服九州，则誓天指日，禁约海寇。”^①

另一方面，高丽有人采取征治倭寇的计策，没想到这一计策却变成了引发大患之事件。也就是说，1375年6月，高丽有人曾想诱杀倭寇头目藤轻光的事件。之前的5月，藤轻光率领其一伙向高丽投降，要求给予粮食。高丽朝廷将他们分别安排在顺天和燕岐等地居住，供给他们所需的粮食。

6月，倭寇公昌等16人见高丽朝廷对待他们如此仁至义尽，也向高丽投降。然而全罗道元帅金先致却想诱杀日本人藤轻光。金先致所采取的手法是佯装以酒肉款待藤轻光等，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但计划事先败露，藤轻光连忙率领其一伙往大海奔逃。金先致实际上只捕杀了其中三人。由于生怕要负诱杀未遂之责，他竟向朝廷谎报杀了70多个日本人。这一谎报很快就被查清，朝廷将金先致降为兵卒，将他安排去戍守边防。

从此之后，倭寇的侵略变得越来越凶暴。起初倭寇入侵并不杀人。在这以后，竟连妇女与儿童也不放过，一律加以杀戮。于是，“全罗、杨广滨海州郡萧然一空”，百姓不敢在这一带居住。倭寇有时逆江而上，深入陆地骚扰，有时以近海之岛为据点，长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4，列传27，罗兴儒传。《高丽史》卷46，禡王元年2月，2月，10月：“二年十月，罗兴儒还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来报聘。……寄书曰：‘唯我西海一路……禁约海寇。’”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期盘踞，不时入侵，其为害更甚。^①

1377年（禡王三年）3月，倭寇入侵窄果（水原），又闯入江华，高丽京城臣民惶恐不安。高丽朝廷当即任命崔莹为六道都统，使总领水陆各军。以三司左使李希泌为东江都元帅，睦仁吉和林坚味等11人为副元帅，接受守城都统使庆千兴的指挥。以黄裳为西江都元帅，李成桂和杨伯渊等10人为副元帅，接受京畿都统使李仁任的指挥。另一方面，募各道僧侣负责建造战舰，京山募集300人，杨广道1000人，交州、西海和平安道分别为500人，并下令一切僧徒胆敢逃避者一律受军法处治。

这年4月，倭寇入侵蔚州和庆州，在杨山、密阳等地烧毁民宅，在彦阳郡也是烧杀掳掠，还出没于西江。

由于难以预测倭寇在开城海岸肆行掳掠，高丽朝廷曾召开大臣会议，讨论是否有必要迁都于内地。大臣们在内心深处都反对迁都，却生怕以后果真发生不测，便都赞成迁都。只有崔莹挺身而出加以反对。禡王一心想迁都，曾派政堂文学权重和到铁原考察，物色恰当址，后来并未能如愿。

倭寇长驱直入侵寇智异山，又闯入江华，告急烽火连白昼也在点燃。高丽朝廷见势不妙，在开城下达了戒严令。6月，倭寇入侵西海道安州，出没于长泽县。

^①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元年6月：“初，倭寇州郡不杀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寇，损伤甚可怜愍。因此，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近自甲寅以来，其盗又肆猖獗，差判典客寺事罗兴儒咨再达，两国之间，海寇造衅，实为不祥事意。去后，据罗兴儒咨来贵国回文言称：‘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乱臣，割据西岛，顽然作寇，实非我所为，未敢即许禁约’。得此参详，治民禁盗，国之常典。前项海寇，但肯禁约，理无不从，两国通好，海岛安静。在于贵国将妇女婴孩屠杀无遗，全罗、杨广、滨海州郡萧然一空。”参阅《高丽史》卷114，列传27，金先致传。

于是，高丽朝廷于1377年（禡王三年，日本永和三年，南朝天授三年）6月，派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到日本，致国书要求禁制倭寇到异国侵扰滋事。这份国书这样写道：“本国与贵邦为邻，虽隔大海，或时通好。岁自庚寅，海盗始发，扰我岛民。各有处之，如何耳。”^①并说，唯其如此，丙午年间曾派万户金龙等去日本告之以事实，蒙征夷大将军许诺，几乎得享平安之福。近自甲寅年（1374年）以来，盗贼重又猖獗，只好让判典客寺事罗兴儒持国书再度前来要求禁制。两国之间因海寇而生隙，实乃不祥之兆。而罗兴儒归国时带回的贵国答函却写道：“唯我西海一路，九州乱臣割据，不纳贡赋且二十余年矣。西边海道顽民对衅出寇，非战所为，亦无法禁止。”在我们想来，治民禁盗乃立国之本。对于这些海寇如能加以禁约，决无不从之理。两国之通好与海上之安宁，端在贵国如何处置。

当时，日本认为西海海盗乃是叛乱者，难于加以统制，而实际上则是想回避其责任。对此，高丽强调治民禁盗乃立国之本，继续督促其禁制海盗之妄为。这是高丽向日本提出的第三次禁制海盗的要求。

安吉祥在日本逗留三年，一直在交涉禁约之事，不幸于1380年（禡王六年）11月病死在该处。押物中郎将军房之用从日本回到高丽京城，日本的探题将军五郎兵卫等的使者与房之用一起到高丽，向高丽朝廷交纳了土产。

经过安吉祥的努力交涉，两个月之后，日本僧侣信弘于1377年8月作为日本使臣来到高丽。由他转交给高丽朝廷的日本国书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表示以个人之力难以禁制倭寇之

^① 参阅《高丽史》卷46，禡王3年6月：“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请禁贼书曰：‘本国与贵邦为邻……各有处之如何耳’。”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妄为。他是日本的探今川了俊派到高丽的。^①

尽管高丽使臣后来继续到日本要求禁止海盗出海，日本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总是说非其所为，非其所能禁制，说什么“庶几克服九州，则誓天指日，禁约海寇”。于是，倭寇对高丽侵掠也就无法禁绝。倭寇不久即出动 200 艘贼船入侵济州，接着，又侵犯了西海道的永康、长渊、丰川、安岳、咸从、三和和江西。

1377 年（禡王三年）8 月，倭寇入侵信州（信川）、文化、安岳和凤州。当时，元帅梁伯益、罗世、朴普化和都巡问使沈德符等率领军队与之交战，均败下阵来，遂向朝廷请求速发援军。于是，禡王以李成桂、林坚味、边安烈和柳曼殊等为助战元帅，率兵前往支援。

9 月，倭寇入侵高丽的灵光、长沙、牟平、咸丰、海州和平州。

于是，高丽派前大司成郑梦周到日本致国书，再次要求禁止倭寇肆虐。这份国书写道：“本国北接大元，西邻大明，经常培训军队巩固边防。对于海贼，只在有事之时由近海之州郡进行防御。海盗们乘虚而入，烧毁民宅劫掠百姓，一见官军便乘舟逃亡。而我邦所受海盗之害却也着实不小。而今蒙征夷大将军一再许诺和弘长老（即 8 月来高丽的日本使臣僧侣信弘）前来下书，又使我们深深了解了贵国的厚意，本国便更加对此有了信心，深信定能如愿。”

日本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为了接待高丽使臣郑梦周，特地从肥后战阵中回到九州。他听取了高丽所提出的要求。郑梦周在博多一直逗留到翌年。当时，郑梦周向今川了俊阐明了古往今来在交邻方面的利害得失。今川了俊等大为惊叹，对郑梦周接待极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禡王 6 年 8 月。

周。倭僧请郑梦周吟诗助兴，郑梦周即席一挥而就。于是，僧侣们纷纷前来，天天请他坐轿去景致优美之胜地欣赏风景。郑梦周在逗留期间，要求日方释放被抓到日本的高丽人，让这些高丽人同他一起回国。

郑梦周归国时，今川了俊释放了周孟仁，让周孟仁同郑梦周一同归国。今川了俊还将尹明、安遇世等几百名高丽人送回高丽。接着，郑梦周请三岛（对马、壹岐、肥前松浦）头头禁制倭寇到高丽掳掠。倭人对之称赞不已，在此之后依然十分思慕郑梦周。

在此之前，日本派僧侣信弘到高丽。信弘带领 69 名军人协助高丽捕获倭寇。这是日本应高丽要求所采取的的必要措施。

郑梦周尽力说服日本掌权者，并使之感动，而在这方面取得了如上成果之后，于禊王四年，亦即 1378 年 7 月归国。^①

此后，高丽对日交涉改变方针，着重与其边境掌握实权者打交道，而不仅仅寄希望于当时无济于事的中央政权。

1378 年 10 月，高丽派版图判书李子庸到日本请求禁贼，向九州节度使源了俊，亦即探题今川了俊献上了金银制成的碗和汤匙、人参、席子和虎豹皮等。同时，派前司宰令韩国柱到日本，会见九州节度使之靠山的中国重要人物大内义弘，请求禁制海贼和遣返俘虏。

1379 年（禊王 5 年）2 月，日本派僧侣法郎到高丽，在报聘的同时献上土产。5 月，在韩国柱归国之，日本大内义弘麾下的朴居士率 186 名军士与之一同来到高丽。这些军士在防倭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情。闰 5 月，高丽派检校礼仪判书尹思忠到日本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禊王 4 年 6 月、7 月、11 月。《高丽史节要》卷 30，禊王 4 年 6 月、7 月。

报聘，表示答谢之忱。

这年7月，李子庸归国之时，九州节度使源了俊（即今川了俊）释放了230多名被抓走的高丽人，由李子庸领回高丽，源了俊送给李子庸以长矛、刀和马匹。

另一方面，代表日本足利政权雄据西国的九州节度使，直接负责处理日本与高丽的外交业务。其后台大内义弘也派了使节到高丽。高丽不时地派使者到日本，向他们请求禁制海贼，要求释放被抓走的高丽人。日本九州探题源了俊对高丽送与礼品很感兴趣，从而往往答应高丽的要求。

此后一个时期，九州探题禁制了海贼，并把被抓到其管辖地区和博多贸易市场的俘虏（包括倭寇从高丽和中国方面抓去的俘虏）送还高丽。这样一来，高丽与日本九州常有使节来往。日本四国各地也纷纷效尤。这些地区，成为高丽与日本频繁交往的外交前哨。^①

第二节 倭寇逞凶与高丽的讨伐（1）

如前所述，全罗道元帅金先致诱杀倭寇头目藤轻光的阴谋泄露，导致藤轻光等逃走之后，倭寇入侵高丽的次数大大增加，而且每次入侵必见了妇幼便杀，一个不留，十分残忍。结果，高丽全罗道、杨广道沿海地区各州郡百姓纷纷避难于他处，许多村屯萧然一空。恭愍王在位时，人们对倭寇的评价是：狼毒有如毒峰和断肠草。后来，倭寇的残忍更是达到了难以言喻的程度。

^① 参阅中村荣孝著《日鲜关系史的研究》（上），第146页至147页，该书由吉川弘文馆出版于昭和40年。

倭寇自 1350 年（忠定王二年）2 月开始入侵高丽以来，一直到高丽灭亡，整整肆虐了 40 多年。高丽朝廷在此期间注重防倭和根绝倭患，一直在与之战斗，终于将其气焰打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好几位将领立下了大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大捷有：（1）崔莹的鸿山大捷；（2）罗世的镇浦大捷；（3）李成桂的荒山大捷；（4）郑地的南海大捷等。

当年，崔莹将军率军击溃过北方的夷狄，征伐过济州，在开拓北方方面也出过大力，而在打击倭寇的战斗中更是声名赫赫的人物。1358 年（恭愍王七年）3 月，倭寇 400 多艘兵船侵入角山戍（泗川），其中有 300 艘被高丽军队烧毁。4 月，大将军崔莹出任杨广道和全罗道的倭贼体覆使。倭寇于 4 月入侵韩州和镇城仓，入寇江华的乔桐，烧毁民宅。高丽朝廷因而不得不又在开城下达戒严令，征发村屯壮丁入伍。

1365 年（恭愍王十四年）3 月，倭寇又侵入乔桐与江华。东江西江都指挥使崔莹将军奉命率领军士戍守东江，终于击退了倭寇。后来，他被奸臣陷害，受到降职处分，不久被完全革职。直到 1371 年 8 月，他才又被任命为赞成事。1373 年（恭愍王二十二年）10 月，他出任都巡察使，对军队进行整顿，命人制造火箭与火筒。手下将领犯了罪，他毫不留情加以惩罚，从而严明了军纪。

当时，崔莹将军下令制造 2000 艘战舰，将各道的军队动员起来捉拿倭人。而百姓并不理解，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以致有不少人毁家出逃。郑地等见此情景，赶忙向恭愍王上书，建议停造 2000 艘战舰。而崔莹将军剿灭倭寇计划规模之大和积极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374 年 3 月，崔莹将军被任命为庆尚、全罗、杨广三道的都巡问使。7 月，他出任杨广、全罗、庆尚三道都统使。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1375年（禡王元年），高丽派罗兴儒作为使臣到日本，要求禁制倭寇，而倭寇这时仍在侵犯高丽。这年正月，倭寇纵火焚烧密阳。3月，倭寇入侵庆阳县。杨广道都巡问使韩邦彦率领军队与之交锋，却大败而归。9月，倭寇入侵平安道之宁州、木州（燕岐）和瑞州（瑞山）。

1378年（禡王二年）6月，倭寇入侵固城县，烧毁了不少民宅。7月，倭寇的20多艘贼船闯入全罗道，倭寇蜂拥而上，攻入全罗道元帅大本营。倭寇侵入荣山后，烧毁了高丽的战舰，闯至扶余与贡州。牧使金斯革率领军队在鼎岬与之接战，不幸战败。倭寇攻毁贡州后入侵石城，闯进连山县的开泰寺。朴仁规率领人马与之交锋，不幸坠死于马下。当时，朝臣向禡王奏报：“倭寇实在太猖狂，光靠防御都监制造武器已远远不够，请下令让各司、各爱马和诸都监分别以其掌管的铁物，尽快打造武器以济战时之需。”禡王当即下令速办。

当时，倭寇一方面让年老的士兵乘船，佯装将回日本，另一方面则派几百名精锐军士长驱直入到处掳掠，一直闯入了鸿山。崔莹将军见倭寇如此嚣张，干脆顶着铜锅上阵。他与杨广道都巡问使崔公哲、助战元帅康永、兵马使朴寿年等一起率军赶到鸿山，与倭寇大战一场。不少将领怯阵，不敢大胆指挥军队，而崔莹将军却身先士卒英勇冲锋。他手下的将领和士兵见他如此不顾安危，也都随后冲上前去。倭寇当即像草木被风刮倒一般死去不少。其时，有个倭寇躲在树丛中，一箭射中崔莹将军的嘴唇，当即血流如注。崔莹将军面不改色向这个倭寇回敬一箭，这个倭寇应声倒毙。这时，崔莹将军才把唇上之箭矢拔了出来。历史学家将这次抗倭胜利称为崔莹将军的鸿山大捷。禡王称赏崔莹将军的武功，想封之为侍中，崔莹将军固辞，说道：“一旦当上侍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便难以出宫城杀敌。等到平定倭寇之后，

臣再膺此重任。”^①

1378年（禡王四年）2月，倭寇侵入安山、仁州（仁川）、富平、矜州（矜川）和江华。3月，又入侵富平与泰安。接着，倭寇闯入南阳与水原，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府使慎仁道侥幸逃生。元帅王宾率领人马与倭寇交战大败后，连忙向朝廷请求速派救兵。朝廷命令密直府使朴修敬率军助战。倭寇又侵掠了林州（林川）和韩山。4月，倭寇侵入德丰县和合德县等地，烧毁都巡问使的行营。

紧接着，倭船集结于窄果（水原），想侵入升天府（开丰）。倭寇的头目扬言：“接下去攻打其京城！”高丽朝野闻讯大乱，朝廷赶忙下令戒严。禡王命令所有的军队把守东、西江，调集一些军队守护宫门防备倭寇侵入。又征集村屯的壮丁，与军队一起戍守王宫。

与此同时，崔莹将军奉命指挥所有的军队，镇守于海丰。赞成事杨伯渊则被任命为副元帅，襄助崔莹将军平倭。倭寇侦得此事，说道：“只要打垮崔莹的军队，高丽京城便唾手可得！”倭寇因而绕过一些地方直奔海丰，向中军挺进。

崔莹将军认清形势之严峻，对左右说道：“社稷存亡，当此一战！”与杨伯渊一起，率领军队攻打敌人。倭寇攻势很猛，直逼崔莹将军及其随从。崔莹将军佯装逃遁，而让李成桂率领奇兵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辛禡2年条。《高丽史》卷46，禡王2年7月。《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2年7月。当时，倭寇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在祝贺大捷的庆功会上，禡王向崔莹将军敬酒，问及这股敌人究竟有多少人，崔莹将军说：“究竟有多少不太清楚，看来并不那么多。”几位大臣又追问倭寇的数字，崔莹将军说：“敌人如果很多，老夫也就无法生还啦！”从禡王论功行赏想任命崔莹为侍中看来，可知倭寇为数不少。崔莹将军回答禡王说不那么多，应当视之为其谦逊之语，他当时不想哗众取宠。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与杨伯渊的军队一起大破倭寇。崔莹将军见敌人已经中计，命令部下狠狠击杀倭寇。这一战，倭寇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败卒连夜潜逃。

崔莹将军派使者将捷报上奏，高丽朝廷才得以在京都解除戒严，百官为此放下心来。高丽朝廷认为这一胜利应该归功于崔莹将军。

从此，倭寇对崔莹将军畏惧有加。一次王安德抓获倭寇的探子，探子说道：“我们都在议论：如果进攻杨广道各州，崔莹将军势必率领军队前来，不如趁机攻打开城，必能一举拿下。”其时，崔莹将军率军戍卫京城。倭寇得知后不敢攻打开城，便佯装攻打杨广道，想将崔莹将军的军队引至杨广道，然后攻打开城，其计策实在狡黠。

1380年（禡王六年）4月，崔莹将军兼任海道都统使三司左使。他向禡王奏道：“现在，仅有战舰一百艘，兵卒三千名。军士本应有一万名，然而国库已经枯竭，用什么来维持这么多军队？”禡王说：“防御敌人，情况相当复杂。现在，只好由卿兼任海道都统。卿就用这三千名士兵，以一当百使用吧！”由此可知，高丽当时防御倭寇入侵，力不从心，捉襟见肘。^①

1381年（禡王七年），崔莹为了阻挡倭寇入侵，决心建造战舰。在动员各道军队和募集僧侣时，他说道：“过去，我当六道都统使之时，曾建造800多艘战舰以剿灭倭寇。没想到李海等蒙骗先王，得以分别率领那些战舰，却又大败而归。孙光裕负责率领江口之战舰，与倭寇遭遇后不战而败，战舰几乎全部被敌人烧毁。这次造船，适逢农忙之时，不宜调集百姓，故而以僧侣来玉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高丽史》卷133，列传47，禡王6年4月。《高丽史节要》卷31，禡王6年4月。

成此举。”

崔莹将军让李光甫负责监造战舰，由于督促得过于紧急，人们极其不满。然而，不到一年建造好了 130 艘巨舰，以之分别供各要塞使用后，倭寇再也不敢那么放肆，军队、僧侣与百姓这才皆大欢喜。

其次，让我们看一看郑地的南海大捷的始末。

郑地，一名郑准提。如前所述，曾因献上平倭之策，从而为朝野所注目。1377 年（禡王三年）夏，倭寇入侵顺天与乐安等地，郑地作为顺天都兵马使率军与倭寇作战，斩首 18 级，活捉 3 名倭寇。这年冬，他又率领人马痛击倭寇，斩首 40 级，活捉两名倭寇。1378 年，倭寇入侵灵光、光州、同福等地。郑地与都巡问使池勇奇、助战元帅李琳、韩彦邦等一起追击至玉果县。敌人潜入弥罗寺，郑地等率军包围，烧毁弥罗寺，将敌人全都烧死，缴获 100 多匹马。

1382 年（禡王八年），郑地出任海道元帅。倭寇 50 艘贼船潜入镇浦，郑地率军追击，在群山岛缴获敌船 4 艘。1383 年，郑地率领 47 艘战舰停泊于罗州和木浦。而倭寇出动 120 艘大船出没于庆尚道。合浦元帅柳曼洙向郑地告急，郑地夜以继日督励军队前往援救。他亲自摇橹，将士们士气大振。他的舰队抵达蟾津后，调动合浦的兵卒参战。当时，敌人已至南海的观音浦，在侦察高丽军队的情况后，以为都是一些卑怯之辈，很瞧不起高丽军队。这天，下着淫雨，郑地到智异山神祠祈祷道：“一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冀相予，无作神羞。”据说，少顷，果然雨霁风息。

当时，敌人旌旗蔽空，从四面八方包围郑地的军队。郑地率军进击至朴头洋，敌人以 20 艘大船作先锋，每艘均有 140 名健壮的军士。郑地上前向敌人射箭，箭无虚发，敌人应声倒下。这一战，郑地的军队大胜。郑地命令军士射火炮，烧毁了 17 艘敌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船。兵马使尹松不幸在这次战斗中阵亡。郑地召集部下之将领说道：“我曾多次破敌，均不像今天这样胜得痛快！”历史学家把这一战称为郑地的南海大捷。^①

在此之前，军器尹房之用作为使臣到日本（其年代未详），却在完成使命归国途中遇上倭寇而被抓获，当即被带上枷锁关在船舱下。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曾对他说：“倘若我们打败，先斩你头祛除晦气。”可幸的是，倭寇在这次战斗中全部被歼，房之用才得以获救生还。

第三节 倭寇逞凶与高丽的讨伐（2）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罗世的镇浦大捷与李成桂的荒山大捷。

祸王即位之初，罗世^②出任全罗道上元帅兼安抚使。当时，有50多艘倭寇闯入熊渊，越过狄岬，入侵扶宁县，拆毁了东津桥，切断了高丽军队前进的道路。罗世将军与边安烈和赵思敏一起，率领战士连夜搭桥，分兵痛击倭寇。倭寇溃退，高丽军队乘胜追击，倭寇被打得落花流水。

倭寇以50艘战舰入侵江华，杀害府使金仁贵，抓走百姓1000多人。然后，他们闯入水原。罗世将军与元帅杨伯渊一起率领50艘战舰追击。罗世将军经过江华境界时，一妇女躲藏在水边，出而指着一幢房屋说：“敌人的奸细都藏在里面！”罗世将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郑地传。

^② 罗世本是元朝人。恭愍王在位时，曾与诸将一起攻打和赶走红巾贼，立下了二等功，后来其官职为版图判事。他当乔桐万户时，见倭寇来侵，曾逃至京城。祸王大怒，曾将他监禁于巡卫部。参阅《高丽史》卷114，列传27，罗世传。

军当即率领人马上前，将其团团围住，放火烧死了29名倭寇。^①

1377年8月，45艘倭船闯入信州、雍津、文化、安岳和凤州。罗世将军与元帅赵仁璧、沈德符等一起率领人马与之交锋，杀死几个倭寇，却无法取胜，便向朝廷报告：“敌人很强，我军又弱又疲乏，难以取胜，请火速派兵来援。”朝廷闻报，立即以李成桂、边安桂与几位元帅一起在海州击退倭寇。边安烈与林坚味等率领的军队却打了败仗。

倭寇又入侵信州、文化和安岳，罗世将军与沈德符、梁伯益、朴普老一起攻打倭寇，击溃了这帮歹徒。倭寇闯入延安府，罗世将军与金海君金庚一起出动50多艘战舰迎击，击溃了他们。然后，他又与金庚一起在龙岗县柁浦缴获两艘倭船，将船上倭寇全部歼灭。^②

倭寇500多艘战舰停泊于镇浦口，由一部分倭寇守船，其余上岸攻打州郡，烧杀掳掠为所欲为，被其残害的百姓尸体遍布山野。倭寇把抢到的粮食装在船上逃跑，大米撒得满地皆是，罗世将军与沈德符、崔茂宣等率领100艘战舰追击倭寇至镇浦口，用崔茂宣制造的火炮烧毁倭船，当即烟火腾空，守船倭寇几乎尽被烧死，落水溺死者也不在少数。^③

当时正值日本僧侣信弘奉命到高丽京城报聘，所带日本政府的国书写道：“贼寇均系亡命之徒，不听从中央的命令，日本中央政府不易对之进行禁制。”

^① 参阅《高丽史》114，列传27，罗世传。参阅《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边安烈传。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3，列传46，禡王3年8月。《高丽史》卷114，列传27，罗世传。《高丽史》卷115，列传29，沈德符传。

^③ 参阅《高丽史》卷132，列传46，禡王3年8月。《高丽史》卷114，列传27，罗世传。《高丽史》卷115，列传29，沈德符传。《高丽史节要》卷30，禡王3年8月。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1380年(禡王六年),倭寇的入侵更加猖獗。2月,倭寇侵入永善县和宝城郡、富有县,3月,侵入顺天的松广寺,旋即出现于光州、綾城、和顺。高丽朝廷派元帅崔公哲、金用辉、李元桂、金斯革、郑地、吴彦、闵伯萱、玉承宝和都兴等分别率领军队在全罗道阻遏倭寇。5月,倭寇出动100多艘舰船入侵结城的洪州。崔莹将军率领各位元帅带兵戍守东、西江,严密防范倭寇。然而,高丽朝廷追究抗倭不力的责任,将全罗道助战元帅崔公哲和杨广道都巡问使安翊处以杖刑和流配,将两名都镇抚使处以死刑。这充分说明当时倭寇的侵略凶焰多么炽盛,而高丽有关官员的受害又是多么惨烈。

这年6月,倭寇出现于井邑县。7月,禡王派宦官李得芬责备崔莹将军道:“有黎民社稷才有国家。而今,倭寇的入侵与掳掠到了这等地步,你们有何面目面对百姓?难道说非得国王亲征不可吗!”^①

然而,倭寇的寇掠凶焰愈炽。他们闯进西州,寇掠扶余、定山、云梯(高山)、儒城(公州)等数县,然后入侵鸡龙山。尽管该处的妇女小孩已入山躲避,仍有许多百姓遇害和被俘。杨广道元帅金斯革率军击退倭寇,倭寇却又窜至青阳、新丰(公州)、鸿山等县大肆抢掠,然后才退去。接着,倭寇又侵入锦州、沃州、咸悦与丰堤,高丽朝廷只好命人将高丽太祖画像从加恩县杨山寺转移到顺兴张挂。

这年8月,倭寇的侵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倭寇出动500艘战舰,进入舒川锦江的入口镇浦口,以巨绳将舰船连结在一起,安排部分倭寇守船。而后让大部队上岸,分成几支队伍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7,辛禡传有关年月。《高丽史》卷134,列传47,辛禡传,禡王6年7月。

分别入寇各州郡，所到之处烧抢掠，被其杀害的百姓尸体狼藉于山野，所抢得的粮食装满一只只舰船，撒在地上的米粒无法计数。罗世将军闻讯，与沈德符和崔茂宣等率领军队歼倭，崔茂宣制造的火炮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① 倭寇的那些战舰或被烧毁或被击沉，焚烧战舰的浓烟直冲云霄。走投无路坠海而亡的倭寇甚众。当时，那些无路可逃的倭寇欲将被其活捉关在船上的高丽妇女儿童全部杀死，却被罗世将军等救出了234人。这一次，倭寇仅有330人逃脱。他们逃至沃州（沃川），与上岸较早的倭寇会合。历史学家把这一战役称之为罗世将军的镇浦大捷。

其次，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李成桂的荒山（黄山）大捷。

战舰尽失又被切断退路的倭寇只好远掠尚州，在此处停留了七天，干尽烧杀抢劫的坏事。

当时，全罗道元帅池勇奇麾下的裴俭自愿去尚州说降倭寇。池勇奇欣然应允。裴俭一进尚州敌营，敌人便想处死他，他说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国几位将军率领无数精兵到此，如若交锋势在必胜，尔等则必死无疑。即便如此，又有何益尔等悄然回老家逃生为上策”倭寇的头头说：“你纯粹是在愚弄我们！你们如果让我们逃生，为何抢走我们的战舰？我们自有我们的计谋。”他以酒肉款待裴俭，然后让骑兵护送裴俭出境。

当时，倭寇的残忍真是罄竹难书。不妨举如下一例以资窥斑而见全貌：

倭寇将一个两三岁的儿童砍去脑袋，剖开其腹，清洗干净，

^① 中国在宋元时期即已将火药用之于战争。高丽与元朝联军征伐日本时，元军就使用了火药。元朝并未把火药制法告诉高丽。崔茂宣早就认识到了火药的威力，深知要打败倭寇非有火药不可，便一直注重研究火药的制法，终获成功。

与米饭和酒一起作为供品，举行祭天活动。他们分左右两厢站立，边奏乐边行礼。祭祀结束后，他们分吃大米饭，每人喝酒三盅，将那个儿童的尸体焚化。他们把一支长矛折断，以之占卦。占卦者说：“如果久留此地，必遭不测！”他们的头目便带领部下逃逸。^①

进出于尚州、善山和沃州、永同等地的倭寇，肆行杀戮掠夺恶毒至极。进出于尚州和善山的部队，是倭寇的主力部队。他们向西南面入侵京山（星州），集结于沙斤乃驿（咸阳）。高丽元帅裴克廉、金用辉和郑地等率军追击倭寇，在这里与之交战却败下阵来。当时，三道元帅裴克廉等九位元帅所率军队全部战败，朴修敬与裴彦两位元帅阵亡，兵卒 500 多人战死。于是，倭寇进袭咸阳。

这年 9 月，倭寇攻打南原山城未遂，退而烧毁云峰县。然后集结于引用驿（云峰），大言不惭地扬言：“将在金城（潭阳）喂马北上！”高丽朝野闻讯，不免又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战况到了这种地步，高丽朝廷任命李成桂为杨广、全罗、庆尚三道都巡察使，赞成事边安烈为体察使，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林宗、洪仁珪、林成味、李元桂（李成桂的庶兄）等为元帅，统一听从李成桂的指挥。

当时，李成桂看到朝鲜半岛上尸体狼藉，不由得万分愤慨。这年 9 月，李成桂整顿队伍，怀着必胜的信念，挥军向东越过云峰，登上黄山（或称荒山）西北部的高峰。李成桂率领的军士一进险峻的大山，倭寇便设伏袭击。李成桂射了 20 发大羽箭和 50 多发柳叶箭，都射中倭寇的脸部，倭寇一一应声倒下。倭寇一连进行了三次袭击，都被李成桂率领部下打退。在这场激战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26，列传 39，奸臣 2，李仁任传。

中，李成桂的兵卒也损失不少，他们骑的马也被多次射中。他只好一次次换马，继续指挥战斗。李成桂也曾中箭，但他亲手拔箭后，继续与部下一起投入战斗。

当时，李成桂环顾左右之后指日发誓：“卑怯惧敌者尽管退下！我一定与敌人拼个死活，歼灭更多的敌人！”其部下将领与军士一听，深受鼓舞，一个个更加勇猛无畏。这时，贼直立不动，有一倭寇之将年方十五六，骨貌端丽，骁勇无比，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高丽军队称之为阿只拔都，人人争避之。蒙古语谓阿只为少年，拔都为勇者，阿只拔都即是少年勇士之谓。^①

这个少年勇士竟是倭寇的最高指挥官。“太祖（李成桂）惜其勇锐，命豆兰生擒之。豆兰白曰：‘若欲生擒必伤人。其人至于面上，皆被坚甲，无隙可射。’太祖曰：‘我射顶子兜牟，兜牟落，汝便射之。’遂跃马射之，正中顶子兜牟，纒绝而侧，其人急整之。太祖即射之，其顶子兜牟遂落。豆兰便射，杀之。于是，贼挫气。”^②

当时，地上尽是烂泥坑，稍不注意，便会陷入而难自拔。战斗结束之后，打扫战场一看，死者全是倭寇，高丽军队无人受伤。敌人的哀鸣声有如万头牛悲鸣。这些幸存的敌人下马往山上逃跑，高丽军队长驱直入，鼓声与欢呼声惊天震地。高丽军队从四面包围和夹攻敌人，大获全胜。

开战之初，倭寇十倍于高丽军队。战斗结束之后，仅有 70 多个倭寇得以逃至智异山。李成桂说：“穷寇莫追。天下无彻底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禡王 6 年 9 月。《高丽史》卷 126，列传 39，奸臣 2，李仁任传。《高丽史节要》卷 31，禡王 6 年 9 月。

^② 参阅《高丽史节要》卷 31，禡王 6 年 9 月。参阅《高丽史》卷 126，列传 39，奸臣 2，李仁任传。

歼灭敌人之国。”他未挥军穷追，而率领军队退出了战场。

当时，山溪水已被死去的倭寇鲜血染红。高丽军口渴已极，只好用碗盛上血水，等到水清之后饮用。这场战斗结束后，高丽军队缴获了1600多匹马，缴获的武器更是难计其数。^①史家将这次战斗称之为李成桂荒山大捷。

第四节 赵浚建议征伐对马岛与朴葳率军征伐

高丽当年对于倭寇的政策构思是这样的：（1）进行外交交涉，忠告日本政府，使之禁制海盗活动。后来又转为以日本西海方面边境地区的掌权者为对象，与之进行交涉，以逐渐从外交上解决这个问题。

（2）加强海岸防御体制，击溃倭寇入侵。在海边要冲修筑城池，整顿戍守军队，使边防守备固若金汤，进而讨伐入侵者。

（3）允许抱着和平友好愿望的倭人来到海边各个港口进行贸易，采取抚慰政策，为倭人在近海捕鱼提供方便，将倭商与倭寇区分开来，分别加以对待。

（4）积极进击倭寇巢穴，消除其肆虐根源，根绝倭寇骚扰。

在倭寇活动趋于猖獗之时，高丽朝廷采纳过几位大臣提出的防倭之策，加强海防，严防倭寇入侵。并派出多位外交使节，通

^① 参阅《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李仁任传。《高丽史节要》卷31，禡王6年9月：“太祖挺身奋击，锐锋尽毙贼，痛哭声如万牛。弃马登山。诸军乘胜驰上，鼓噪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尽赤，六七日色不变，人不得饮，皆盛器候澄，久乃得饮。获得马一千六百匹，兵仗无算。初贼十倍于我，唯七十余人奔智异山。太祖曰：天下未有歼敌之国。遂不穷追，退而大作军乐，陈摊戏，军士皆呼万岁。”

过正式外交途径，要求日本禁制倭寇。诸位将军率领军士讨伐入侵之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倭寇贼心不死，依然继续大肆寇掠。这样一来，高丽既要处理对元与对明关系的棘手问题，又要处理好国内的种种问题，还要对付倭寇，更加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朝廷决心消除产生倭寇作乱的根源，做到标本兼。

郑地于1372年（恭愍王二十三年）曾上书力陈平定倭寇的计策，1382年（禡王八年）曾取得镇浦大捷。1387年（禡王十三年）8月，他向禡王提出建议：出兵征伐日本。

当时，尽管高丽数位将帅在讨伐倭寇方面取得辉煌战果，而倭寇贼心不死，仍然相当猖獗，常来高丽寇掠。这年正月，倭寇入侵江华岛。崔莹将军由是率领军队驻防于海丰。5月，契长寿从明朝京都回到高丽开城，向朝廷报告：尽管明朝朝廷对高丽多所挑剔，却称赞高丽建造许多兵船防范倭寇入侵，认为这是，很好的举措；考虑到有些倭寇竟在高丽的岛屿上建房定居不思回日本本土，明朝朝廷劝高丽出动兵船，围歼这些倭寇。^①

郑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禡王上书的。他写道：“近来，中国声称将征伐倭寇，倘若中国将战舰停泊于我国国境，则不仅难以对待，而且恐将探知我国之虚实。倭者，并非全都是倭寇，只有其中乱民以对马岛和壹岐岛为据点四出寇掠。这些岛屿与我国东海岸近在咫尺，随时都可乘船入侵。倘能阐明其罪状，先攻打这些岛屿，彻底捣毁其巢穴，同时移牒日本，请其将逃亡之海賊刷还或使之归顺，则可永远无倭寇侵扰之忧，中国也不会因而出兵。”他接着写道：“而今，我国水军已善于水战，非辛卯年（1281年，忠烈王七年，该年5月高丽与蒙古联军从合浦出发征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4，列传49，禡王13年正月及5月。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伐日本——作者注）东征之时不熟于船技的蒙汉兵卒之可比拟。如果选准时机，顺风而出征，必易成功。只是我国之舰船久且已霉烂，军士老而易疲，而且我国之水军因徭役多而疲乏，逃散者日增。必须赶紧抓紧时机作出决策，出兵剿灭倭寇，不可再加延宕。”^①

郑地的如上奏章，主要内容有五点：

(1) 倭寇与日本政府有别。宜大举先攻倭寇之巢穴，以塞源拔根。其逃亡者，我方可请求日本政府使之归顺。

(2) 据最近的情报，明朝将出动战舰剿灭倭寇。他们若将战舰停泊于高丽沿岸，高丽朝廷难以承担重负，且其可能因而获得高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报。

(3) 现在，高丽水军已善于进行海战。

(4) 由于赋役过多，水军业已疲乏，不少人想逃走，而让他们有参加战斗的机会，便可提高其士气。

(5) 高丽与蒙古联军前次征伐日本时，所利用的时机不当。此次应当利用好风向，选择好进攻时机。

郑地之所以上书，是因为倭寇的入侵有增无减。1388年（禡王十四年，昌王即位年）4月乙丑，倭寇又侵入椒岛。当时，京城壮丁均已参军，只剩下老弱者每晚点燃烽火。京城空虚，处于千钧一发之危殆状态。5月1日，全罗道按廉使柳亮报告：

^① 参阅《高丽史》卷113，列传26，郑地传：“地上书，自请东征曰：‘近中国声言征倭，若来我境分泊战舰，则非唯支待为艰，亦恐觊我虚实。倭非举国为盗，其叛民据对马岛壹岐诸岛，近我东鄙，入寇无时。若声罪，大举先攻诸岛，覆其巢穴，又移书日本，尽刷漏贼，使之归顺，则倭患可以永除，中国之兵亦无因而至矣。今之水军，皆善水战，非辛巳东征蒙汉兵不习舟楫之比，若顺时候风而动，则易以成功。但船久则朽，师老则疲，且今船卒困于徭役，日思逃散。宜乘此机决策荡平，不可迟疑。’”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13年8月。

“倭船 80 多艘已至镇浦，倭寇在附近州郡大肆掳掠。”于是，禰王派上将军陈汝宜率军至全罗道和杨广道戍守。

当时，许多壮丁以患病为借口不去参加对北方的征伐，而以其子弟或家奴代替。而这次朝廷征发他们防御倭寇，则规定得很严厉：借故躲避者按军法处治，没收其全部财产。由于倭寇实在猖獗，朝廷派元帅金立坚率领军队到汉阳，保护世子与妃嫔。与此同时，杨广道按廉使田理报告：“倭寇正在四十多郡寇掠，我军软弱抵挡不住，敌如入无人之境。”禰王得知之后，派元帅都兴与赵浚等率军前往阻击，命人将妃嫔从汉阳接回开京。

这年 6 月（昌王即位年），倭寇入侵金堤、万顷和仁义等地，烧毁了官府。7 月，光州失陷。高丽朝廷命令杨广、全罗、庆尚三道都体察使皇甫琳等率领军队前往救援。8 月，倭寇气焰益炽，朝廷派慈惠府尹曹彦等率领军民加以阻挡。倭寇侵入巨济，镇抚韩元哲带领军民缴获倭船一艘，歼寇 18 名。倭寇侵寇连山县开表寺，又闯入清州、儒城、镇岑和乐安郡、高兴、丰安等地，烧毁民宅抢劫财物，干尽丧天良的勾当。倭寇随后又入侵晋州，牧使李斌率领军民与倭寇交战时以身殉国。倭寇还侵寇了沃川、黄洞和永同。这年 11 月，倭寇闯进了求礼。

这时，赵浚及其同僚一起上书，列举高丽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时务之策提出了建议。其中防倭之策如下：

“鸭绿江以南，大抵都是群山峻岭，肥沃土地均在海边。而几千里沃野屡被倭奴占领，荒芜得芦苇丛生，国家难以再利用。望鼓励开荒垦荒，允许其二十年不服赋役，使之归属水军万户府管辖。修筑好城池后，招募一些老弱者到远处作为斥候，慎重点燃烽火，太平无事时则以之从事耕作与渔业；有事之时，参与造船。倭寇一来，全部入城，坚壁清野，由水军负责击垮倭寇。从合浦到义州，如果能如此照办，那么用不了几年，离散于

第三十二章 高丽的强硬政策与征伐对马岛

各处的百姓又会回到村屯里。海边州郡富庶之后，各个岛屿也会逐渐富足。战舰一多，水军训练有素，倭寇便会闻风而逃，边防各郡便可平安无事，海上与陆地的运输便可越来越顺畅，国库也就能越来越充实，不致空空如也。”

接着赵浚等建议做到信赏必罚。它写道：“水军万户与各岛之元帅，如能搞好屯田，修理好战舰，深得民心，有令必行，进而歼灭来犯之敌，使边防平安无事，则将岛田赐予，使其世代相传勤恳守业，传诸子孙共享洪福。倘若做不到这些，而使城池失守，以致州郡被倭寇所侵占，则按军法加以处置，决不轻饶，以儆效尤。全罗、庆尚、杨广三道作为租税所出之处，乃是国家之中心，而今倭奴横行，攻陷诸州郡，践踏庄稼，杀戮老弱者，抓走男女壮丁以之为奴婢。而负责戍守国防者却紧关城门龟缩其间，无意与倭寇作战。倭寇气焰遂甚嚣尘上。请审时度势，组织兵力，一举剿灭倭寇。……”

昌王收到这份建议书后，转给都堂酌办。

面对倭寇猖獗不止，国家与百姓受害日深，高丽都堂召集大臣对赵浚的时务策进行了商议。结果，决定掀掉倭寇的老巢，拔根塞源。同时决定由朴葳^①率领舰队攻陷对马岛。

1389年（昌王元年）2月，朴葳率100艘战舰攻打对马岛，烧毁了倭船300艘及其修建在海边山岗上的绝大部分居住与防御设施。元帅金宗衍、崔七夕和朴子安等率领军队随后赶到，找到

^① 禡王在位之时，朴葳出任金海府使，率军在黄山江出击倭寇，斩首29级。倭寇畏其威势，投水而死者不少。一次，倭寇50艘兵船到达金海南浦，张榜告知后来的倭寇：“我们一伙乘风逆行至黄山江，旨在攻打密城。”朴葳侦得此情，在黄山江两岸埋伏了士兵，然后率领30艘兵船等候倭寇到来。后来的倭寇见了榜文之后，有一艘倭船先开进了江口。这时伏兵四起，朴葳指挥军士截击，倭寇狼狈不堪，或以刀割腹，或坠水而亡，几乎全军覆没。参阅《高丽史》卷116，列传29，朴葳传。

被抓来的 100 多名高丽男女百姓，带领他们回到了国内。^①

昌王大大赞赏朴葳等的功勋，并下达教示曰：“高丽升平已久，武备渐趋松懈，以致倭寇放肆侵寇。而今倭寇劫掠三陟（即杨广道、全罗道和广尚道）已达四纪（一纪为十二年），国家只是消极防御，将帅不思进取。卿等满怀义愤，不顾狂涛巨浪，摧毁倭寇经营多年老巢，烧毁其舰船与傍岸庐舍，救出被俘百姓，使之平安回到故乡。洗雪了国耻，报了臣民之仇。欣闻捷报，本王喜出望外，兹派门下评理徐钧衡给卿送去衣类、鞍马与白银等，以资褒奖和助勉。”

高丽自 1350 年（忠定王二年）以来，在漫长的近四百年间，一直是消极防御倭寇。朴葳这次率领战舰与军队征伐对马岛，是高丽首次积极反攻，大长了民族志气，振奋了国民的信心，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真是大快人心。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16，列传 29，朴葳传：“又以战舰百艘击对马岛，烧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庐舍殆尽。元帅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继至，搜本国被掳男女百余人以还。”参阅《高丽史》卷 137，列传 50，昌王元年 2 月。参阅朝鲜史学会编《朝鲜史讲座·一般史·中世史》一书的第 291 页。

第三十三章 与琉球的关系

第一节 中国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今日本冲绳），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过接触。隋炀帝曾派羽骑尉朱宽去琉球进行过慰抚。后来，隋朝曾派陈陵与张镇周率领军队征伐过琉球。^①

唐代与宋代姑且不提，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于1291年（高丽忠烈王十七年，元至元二十八年）派杨祥到琉球，想使它乖乖臣服，然而未能如愿。杨祥等与之舌战无果后，只好扫兴而归。

到了明朝，朱元璋于1367年（高丽恭愍王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月登基为皇帝，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明军逐渐占领了福建、山东、广东、河南、广西、山西和陕西，势力越来越大。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太祖下诏晓谕占城、安南和高丽。1370年，下诏晓谕占城、爪哇与西洋。1371年下诏晓谕安南、高丽、渤泥、三弗齐、暹罗、日本和真猎。1372年下诏晓谕高丽、占城、瑊里、乌斯藏和琉球。

^① 参阅《隋书》记载：“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琉球，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琉球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

高 丽 外 交 史

1372年1月16日，杨载奉明太祖之命去招抚琉球国，随身带着明太祖的诏书。这份诏书写道：“中国皇帝一统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论远近，中国对之均一视同仁。元朝腐败、民不聊生的最后十七年间，各处兵乱峰起。朕以一介平民揭竿而起，率军征伐四方，西平陈友谅，东捉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北扫幽燕，而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建立大明。……屡派使臣去外夷，晓以朕意。使臣所到之处，夷狄之首长均俯首称臣入贡。琉球在中国东南面远海之处，不知中国现在的情况。今特派使臣诏谕，望汝知之。”^①

琉球国中山王察度^②接到这一诏谕之后，于同年12月29日派其弟泰期去明朝上表，献纳土产，作了第一次朝贡。琉球国中山王与明朝建交之后，年年与明朝有使臣往来。^③

自中山王察度遣使赴明朝朝贡以来，每当王薨，必遣使至明朝递交讣告。通过明朝的册封，中山王的王位得以世代相袭，代代都感谢明朝的承认与册封之恩。从中山王察度之子武宁即位起，琉球国中山王代代都及时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册封。琉球每年

① 参阅《明史》洪武5年1月。参阅秋山谦藏著《李氏朝鲜与琉球的建交和往来》，该文刊载在出版于1930年的《史学杂志》41-7，见其第790页。

② 琉球由三个岛屿组成，即北山、中山与南山，三个岛屿纷争不休。中山以农耕为主，北山和南山主要靠渔猎为生。

③ 《明史》记载有明一代各国到明朝朝贡的次数如下：

国名	次数	国名	次数	国名	次数
琉球	171	暹罗	73	瓦刺	23
安南	89	吐鲁蕃	41	满刺加	23
乌斯藏	78	爪哇	37	日本	19
哈密	76	撒马儿罕	36	苏门答腊	16
占城	74	朝鲜	30	真腊	14

第三十三章 与琉球的关系

派特使亦即奉祝使到明朝祝贺新年，祝贺明朝皇帝万寿无疆，以博取明朝的欢心。琉球甘愿成为明朝的又一个附属国。

琉球的中山王察度遣使赴明朝朝贡，明朝朝廷必赐以大统历、绸缎和纱罗等物。后来，明朝使臣向朝廷建议：琉球人不喜欢绸缎，喜欢陶瓷器和铁器等，赏赐之物以投其所好为上。因琉球天气炎热，盛产土布和芭蕉布，对衣裳别无奢求，而其岛上却几无金、银、铜、铁之产品，因而分外喜欢陶瓷器与铁器之类物品。

明朝给附属国所定的定例是两年一贡。而琉球在尚巴志为王时每年都遣使到明朝朝贡。尚真为王时，甚至一年朝贡几次。明朝朝廷知其之所以如此，在于通过朝贡得到陶瓷器与铁器产品，便劝其按定例办事。

第二节 高丽与琉球的关系

1389年（昌王元年）8月，琉球中山王察度派使臣王元到高丽上表称臣，表示将设法把被倭寇抓走的高丽人送还高丽。他献给高丽朝廷的特产有硫磺300斤、苏木600斤、胡椒300斤和甲20副。在琉球使臣到来之前，全罗道观察使向高丽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听说我国将出兵攻打对马岛，特派使者到顺天府。”高丽都堂（议政府别称）考虑到琉球从未派过使臣到高丽，感到接待他们颇有难处。昌王得知后说：“有客自远方来纳贡，怎可不予盛情接待？宜让他们到京城来，好生加以慰抚，然后送他们回国。”于是，任命前判事陈议贵为迎接使。

昌王想将琉球国进贡的苏木与胡椒留在官中使用，判内府事寺柳伯濡进谏道：“昔日，忠肃王将装满鱼虾酱的醞瓮置于宫中，

高丽外交史

而留笑柄记诸于史书。”昌王不听，以为少见多怪。^①

当时，昌王年仅9岁，高丽朝廷的实权已为李成桂所掌握。李成桂见明朝已取代元朝统一了华夏，决心依附明朝建立朝鲜，以取代高丽。

昌王于当月派典客令金允厚和副令金仁用到琉球国，尽到了答礼之谊。他们带去的高丽答书写道：“高丽权署国事王昌向琉球王殿下致意。我国与贵邦一海之隔，迢迢万里从无往来，而敬慕芳誉已久。今通过贵邦使臣收到来函和重礼，并得知贵邦将把我我国沦为俘虏者送还，欣慰之情洵是难以言喻。我国官员对贵邦使臣接待不周，昌深感遗憾，还请多加原宥。今派金允厚等去贵邦献上薄仪，请予笑纳。”答书继续写道：“听说殿下将于明年把我我国百姓全部送还，昌更是喜出望外。金允厚等归国之时，如允其与父母妻子见上一面，则幸甚。”

金允厚等带去作为答礼的高丽赏赐品有：鞍子两副、银铲、匙筋各两套、银盏银杯各一、黑麻布二十匹、虎皮两张、豹皮一张、满花席四床、弓箭一百套、花屏风一套和画簇一套。^②

在金允厚等归国之前，高丽发生了昌王被弑和拥立恭让王的政变。

金允厚等于1390年（恭让王二年）8月从琉球国启程归国。当时琉球中山王察度又派使臣玉之等到高丽上表称臣，归还37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昌王元年8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玉之，奉表称臣……”

^②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昌王元年8月：“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报聘琉球国，答书曰：……”

第三十三章 与琉球的关系

名俘虏，向恭让王献纳特产。^①

高丽与琉球的往来，实质是一种贸易形式。两国这样互通有无，可以说同明朝与琉球的关系相似。当时，琉球派使臣到高丽奉表称臣，是把高丽作为上国看待，愿意以小事大。高丽则对此采取礼尚往来姿态，给予答书及赏赐。有表上呈，便给予回函。派使臣前来，也派使臣前去表示答谢。高丽在形式上处于宗主国地位。

其实，琉球在外交上的举措，是对明朝、高丽和日本均俯首称臣，可以说是其很有特色的一种外交手腕。

^① 参阅《高丽史》卷45，世家恭让王2年8月丁亥：“金允厚等还自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又遣其臣玉之等，称臣奉表。……”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4，恭让王2年8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使来聘，归我被虏民三十七”。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 与高丽的灭亡

第一节 明朝的无理刁难

高丽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后，明朝朝廷下达了高丽恭愍王的谥号，册封禡王为高丽国王。在十一年间，明朝满足了高丽的请求，解决了两国之间的不少悬案。然而，由于高丽依然沿用其事而不服、卑而不屈的政策，两国关系之间的根本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

1385年（禡王十一年，明洪武十八年）12月，安翊与张方平从明朝京城回国，带回了明太祖的宣谕。该宣谕称：明太祖派使臣到高丽时，之所以主要派出在元朝呆过的高丽宦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亲戚均在高丽，便于传述我朝之意。然后指出：“尔之先王虔诚上表，而其后一切却毫无诚意。是以朕干脆让高丽莫再来往。尔国后来虽派遣使者，但派来祝贺朕之皇太子生日的使臣误了吉期；9月18日乃朕之万岁节，派来的祝贺使又是姗姗来迟；贺寿使洪尚载带来的表文，竟然迟至贺正已过才送到。”接着宣谕说，洪尚载之怠慢职守罪无法饶恕，朕已将他发配至云南。岁贡如期送来时，使者之中有人病死，其余皆已免于处罚遣其归国。明太祖强调指出：“而今朕之诏书均不让饱学之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士代拟，而由朕亲笔书写。朕早就曾囑尔莫改风俗按原有风俗行事，而此次送来之马匹竟无一匹适合朕乘坐。尔平素口口声声发誓竭尽忠诚，岂非口不对心？不论是任何一种事，靠什么来证明竭尽了忠诚呢？连对凡间的人也侍奉不好，又何以尊奉天地鬼神？今后，岁贡应早早准备按时送来！由于交通不便，尔之进贡与朕之赏赐均多有不便。望汝命令大臣好生治理黎民百姓。汝之使臣能否如实传述朕之旨意，朕实在放心不下难存奢望。”

这充分说明，明朝希望高丽真心实意以小事大，而真心之佐证便是贡物。不仅如此，明朝认为高丽使臣对天朝缺乏虔诚之心，也很不赞成高丽使臣频繁来往。明太祖对高丽国王所做的这一切，没说一句好话，认为高丽连进贡之物也是只求数量，凑数敷衍了事，毫无诚意可言。

明朝的这种态度，分明是对高丽所采取的“事而不服，卑而不屈”的对明姿态表示不满。这种挑剔与刁难，及不加掩饰的颐指气使，是两国关系趋于恶化的预兆。

当时，明朝对高丽所作的挑剔与刁难，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高丽对明廷很不虔诚；高丽对辽东及明朝内政进行秘密侦察；高丽岁贡的质量、马的供应、济州及济州马的管理均存在问题；要求遣返在高丽的辽阳人。由于有这样种种不满，明朝因而对高丽发出断绝外交关系和征伐高丽的威胁。

1386年（禡王十二年，明洪武十九年）2月，高丽派郑梦周到明朝，递呈上请衣冠表，请求明廷准许高丽“用夏变夷”，让高丽享有明朝的文化惠泽，并表示高丽决心采用明朝的衣冠制度，请明朝赐给高丽以国王诸服和官吏朝服及便服。

在明朝对高丽所作的种种挑剔与刁难之中，唯一得以解决的是衣冠制度。1386年8月，高丽派密直副使李筠到明朝，又上呈了一份请求准许高丽采取明朝衣冠制度的奏章。1387年2月，

高 丽 外 交 史

高丽派知密直事契长寿到明朝，请求明太祖为高丽确定有关国王的祭服、朝服及官吏的朝服、便服等制度，并且准许高丽采用明衣冠制度。明太祖当即予以应允。于是，契长寿在回国途中抵达辽阳时，干脆穿起了明朝指定的纱帽团领，一直穿戴着回到高丽京都。

然而，其他事项则依然成了两国之间的悬案，继续使两国关系处于尴尬的境地。1386年2月，郑梦周奉命到达明朝京都，在请求让高丽采用明朝衣冠制度的同时，要求减少岁贡。明廷要求高丽一次性地把过去五年之间该纳的贡品都交齐。而高丽朝廷则回答说难以做到。说得具体一些，就是高丽不产金银。前年，据辽东道使称：金银不足，可用马抵数。一匹马抵300两纹银，一匹马还可抵50两黄金。然而高丽由于国土狭小，常有海寇侵扰，物产的消耗又很大，民生极其艰难，而且根本不产银，实在难以按量纳贡。高丽朝廷叫苦道：就是以马匹抵数，日后也难以做到。

这年7月，郑梦周从明朝归国时，明朝朝廷让他告诉高丽朝廷：明朝将用麻布与绸缎购置耽罗之马，高丽朝廷莫加阻拦；今后，从辽阳、山东、金城、大仓到陕西、四川，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允许高丽商人进行买卖活动。对于高丽提出的减少岁贡数量的要求，明廷未作明确的答复，只说想以麻布与绸缎交换高丽马。1386年8月，高丽派赞成事尹珍和密直副使李希蕃到明朝京都，对明廷免除高丽岁贡金银一事表示感谢。

1387年2月，郭海龙从明朝回高丽时，明朝朝廷确定了马与布的兑换比率：马一匹抵八匹布和两匹缎。交易的主体，不论是官是民皆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种交易永远继续下去，不受限制。

翌月亦即3月，高丽派典工判书李美冲到明朝，奏报高丽已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将岁贡之1000匹马送到了辽东，而辽东以这批马老弱有病为由，悉数退还高丽。6月，高丽又派判司宰寺事朴之介到明朝，将1000匹岁贡之马及前次退回之马送到了辽东，辽东道使把马分为三等，上等马以两匹缎和四匹布的比例做了兑换，其余两个等级的马，也分别按兑换比例做了相应的处理。

其次的一个悬案，是明廷认为高丽每每派人到明朝进行间谍活动。从郑梦周1386年7月自明朝京都带回的诏书看来，明廷认为高丽人自汉唐以来，就往往以到中国做买卖为借口而进行间谍活动，然后收买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带回高丽。1387年2月，郭海龙从明朝回国时带回明朝礼部的文书，这份文书写道：“去年，高丽的金通事从海路悄悄地溜进浙江民家。今年，任通事又鬼鬼祟祟通过我京城的宦官，侦探明朝宫廷的情况。”这份文书特别强调：像这个样子，两国之间能相安无事吗？^①

其次，明朝开始重视耽罗问题。1386年7月，高丽将典医副正李行和大护军陈汝义派到耽罗。因为当时明朝看中了耽罗岛，不仅如此，还因为耽罗在元明交替之时，让元朝牧胡继续饲养耽罗马，使元朝残兵败将得以作乱。翌年4月，李行等带着星主高臣杰之子凤礼到高丽京城。此后耽罗完全归顺于高丽。

1387年（禡王十三年）5月，契长寿从明朝带回明太祖诏书。诏书写道：“明朝本想去耽罗物色马匹，朕转而一想，还是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朕如果派海船到该处，很有可能发生什么变故。届时，朕当然也不会罢休。耽罗原属于元朝，那里的马自然应由明朝加以管理。所以，如果朕欲取该处，早就派人把它拿到手了。不过，朕不喜欢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份诏书在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耽罗与汝之国土毗邻，汝想管辖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6，列传48，禡王12年7月；13年2月。

它是应当的。朕绝无派人去占领与加以管理之意。”明太祖所说的是明朝从未想过要占有耽罗，而只是关注耽罗的马。

再次，明朝要高丽遣返已迁往高丽的沈阳人。1386年12月，明朝派指挥金使高家奴和徐质到高丽，要求归还己亥年（恭愍王六年，亦即1358年）因躲避战乱而到高丽的四万多户军民。高丽认为有四万多户沈阳军民避难于高丽之说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担任过元朝沈阳路达鲁花赤的咬住等所作的诬告。所以翌年2月，高家奴与徐质返回明朝京都时，契长寿奉命与之同行，转达了高丽朝廷对此阐明文书。它写道：“己亥、辛丑年（1358年、1361年），敌军侵入辽东沈阳，大肆抢掠并俘虏，当时居民四处奔逃，沈阳人去城空。当时也许有极其少数沈阳人逃入高丽，怎会有四万多户呢？”接着指出，高丽朝廷就此做过调查，发现逃到高丽的沈阳人连同其家属仅有358人，高丽已将他们送回辽阳，其余均是在高丽土生土长者，当时只是回到高丽定居。^①由此可知，当年曾有不少高丽人居住在辽阳地区。

明朝对高丽所作的最后一个指责，是高丽对明朝以小事大不够虔诚。1386年7月，郑梦周从明朝带回明太祖诏书，充分体现了明朝朝廷对高丽的看法。诏书写道：“天朝要高丽进贡，是想藉以了解高丽对天朝的忠诚。汝邦在起初那两年很服从命令，后来便自食其言。然后又有两年多守诺。而今，便再三强调交岁贡难处多多。……汝为何出尔反尔花样翻新？”

明朝朝廷认为高丽的做法不是光明磊落，实质是不想履行诺言。这份诏书说：“规定要纳岁贡，不是想以之致富，而只是中国想藉以了解高丽对天朝是忠诚还是狡诈。现在，中国算是领教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6，列传48，禑王12年12月；13年2月。《高丽史节要》卷32，禑王12年12月；13年2月。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过了。”断言高丽朝廷很不诚实。它又写道：“尔等常常说‘用夏变夷’。夷之制度能否变更，关键要看高丽君臣是否努力。汝之使者归国时，朕生怕高丽百姓被岁贡折磨得太穷苦，曾答应削减岁贡数量，而且定为三年一朝贡。汝要在今年底之前送来良马50匹。自洪武二十四年（禡王十七年，公元1391年）正月之后，汝好自为之，像起初一样好生进贡吧！”又一次表现了明太祖的宽容。

从契长寿于1387年5月自明朝带回的明太祖诏书看来，明朝仅要求高丽进贡50匹良马，与过去的1000匹相比，只不过是二十分之一，减少了许多。诏书写道：“汝要以应有的虔诚进贡良马，而在此之前进贡的都是一些老弱病马。……朕此时亟需一些军用之马。尔国需要绵与绢，可相互以马换绵而互利。汝有何难言之隐？为何不好生尽忠？汝两度派来使者，为何不接受天朝的好意？”对高丽禡王严加责备。

高丽使臣契长寿回国之前，明太祖告诉他：由于云南有人不服天朝，明朝廷出动27万大军和22万匹军马，对之进行了讨伐。明太祖言外之意是：明朝并不喜欢兴师动众征伐。但是倘若高丽不好好地以小事大，或者触怒了明太祖，那就休怪明朝不客气。明太祖说，明朝如果出兵攻打高丽，不会轻举妄动，而会节节筑城做好准备之后再动手。明太祖对高丽的恐吓也是严厉的。^①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6，列传48，禡王12年7月；13年5月：“契长寿还自京师，钦奉宣谕圣旨：……则今番，兀都那云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边衅。以此无奈何去征他，调了二十二万军马和余二十七万。平定之后……你回去慢慢的说与他，交至诚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侮我，这中国有甚话说。若不至诚，不爱百姓生边衅……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也。”

第二节 明朝的绝交通牒

综上所述，高丽一方面对明太祖用尽了所谓天子圣恩之类的最高敬语，对明太祖与明朝表示了事大姿态，另一方面则还是保持事而不服的心理，一心只求独立自主。而明朝则一贯对高丽不信任，常加挑剔和指责。这样一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很和谐。

1387年（禡王十三年）11月，高丽得知明朝的细作（间谍）在辽东开展活动，窥探高丽的动向，有征伐高丽之迹象，便给西北面都巡问使郑熙启、都安抚使崔元沘以及泥城（即昌城）、江界、义州的万户，每人发了一匹绸缎，对之进行激励。同时，命人尽力征收全国私田的租税储足军粮，让各道安抚使观察将帅的能力与守令的优劣，于每月月底向朝廷报告。总之，高丽为加强北方的守备，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当时，明太祖向定辽卫辽东都司下达谕旨：“今后高丽国使臣来者，于一百里外止回，不许入境，亦不许送赴京师。不拣指以诸等时节行礼等项，不必教来。其国执政之臣、轻薄谲诈之徒，难以信凭，自许往来至今，凡百期约，非过则不及，未尝诚意相孚。可以绝交，不可与之往来。若欲求进，示敕使录而还。”

很显然，明太祖对高丽信不过，认为高丽多轻薄狡黠之徒，表示今后将与之绝交，从而不许高丽使臣往来。明太祖已经下达了这样的谕旨，高丽使臣张方平、李种德和李玖等当然并不知晓。他们去明朝途中到达辽东东面的甜水站时，辽东都司使、千户王成示之以钦录圣旨，张方平等只好返身回国，并将这种情况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传述给了高丽朝廷。^①

高丽朝廷得知这种情况，不免惊惶万状。潘益淳对崔莹说：“公受先王恭愍王之重托，又身负三韩（即高丽）之期望。而今国运危殆，怎可不为朝廷分忧？”崔莹长叹一声，说道：“掌权者争权夺利，无所不为，而招来横祸，这叫老朽又有何计可施？”李成林也对曾作为使臣到明朝而不得不中途而返的李玖说：“公作为大臣，一贯为国效劳，为何卑屈屈膝不敢进入定辽卫？如此没有骨气，岂非白吃国禄！”李玖与之对视良久，无言答对。

当时，有人从辽东逃至高丽，向高丽朝廷奏报：“明朝将要高丽进贡姑娘、秀才及宦官各一千名，牛一千头，马一千匹！”高丽朝廷听了，为此忧心忡忡。崔莹说：“果真如此，可发兵与之决一雌雄！”

高丽朝廷以此为契机，将一直专权结党营私的李仁任及其同伙三司左使廉兴邦、领三司事林坚味、赞成事都吉敷、左侍中李成林、赞成事潘福海（其父为潘益淳）、大司宪廉廷秀、知密直金永珍和密直副使林楸等下狱和诛杀，一举铲除了其党羽 1000 多人。与此同时，禡王任命崔莹为门下侍中，李成桂为随门下侍中，李穡为判三司事。

值得一提的是林坚味在其掌权时，只要在对明关系方面有了棘手的问题，便袒护其惹是生非的部下，或是采取杀人灭口的办法将其处死，使得问题不了了之。当时辽东都司曾派百户程与到高丽，追究北青州万户金得京杀害明官军的责任，准备将金得京拘捕送至明朝。林坚味曾对金得京说：“北青州之事，你要挺身

^① 参阅《高丽史》卷 135，列传 48，禡王 13 年 11 月：“张方平等行至甜水站，都司使千户王成钦录圣旨，以示之曰：……。方平等遂还。”参阅池内宏著《高丽与明朝及元朝的关系》（第四回），该文刊载在史学会出版于 1927 年的《史学杂志》29-4，见其第 381 页。

而出，把责任全部揽到身上，千万别连累国家。”金得京说：“我只是按朝廷的指使行事。被抓到明朝后，他们问及，我怎能隐瞒到底？”林坚味一听，生怕与自己和高丽朝廷有关之事败露无遗，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密直提学河峇偷偷对他说：“事在人为。而今倭寇作乱，被其杀害者不少。”林坚味一听恍然大悟，便派人赶到铁州，在金得京到达该处之后，于深夜将其杀害。然后向明太祖奏报：金得京已被倭寇在途中杀死。

正月，高丽派赵琳到明朝，请求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赵琳带去的高丽国书，谈到了如下几点：（1）突闻陛下下达诏敕，对小邦严加训斥，臣等真是不知所措。（2）想派使者去天朝陈述心迹，却被拒于国门之外，遂未能如愿。接着，讲述了期间的情况，并一再道歉和请罪。（3）高丽之所以对明朝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罪在林坚味、李成林和廉兴邦等。（4）高丽已经将这些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全部铲除，今后决不会再发生类似之事，一定诚心诚意以小事大拥戴天朝。国书写道：“陛下对臣等一向关怀备至，有如父母之爱护子女。伏乞准许敝邦使臣来往，使臣等得以永远虔诚地拥戴陛下。”然而，赵琳也是一到辽东便被禁止入境，只好悻悻然返身回国。上述国书，当然也未能上呈明太祖。

这封国书写得虽然虔诚，却仍然表里不一。高丽朝廷这样做，旨在希望这些业已表面化的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然而，明朝对高丽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依然十分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

翌月亦即2月，契长寿从明朝京都回到高丽京城，捎回明太祖诏书。诏书写道：“高丽不愿接受朕的旨意。朕年年令其献马，所献之马均羸弱不能坐骑。而且总是叫苦连天，口口声声说有难处，朕只好干脆命汝邦不必年年进贡，三年间进献五十匹种马即可。然而，所献之马还是全部无法作为坐骑使用。后来买回的五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千匹马，也是矮小羸弱。买我国一匹马的钱便足以买两三匹你们的马。汝等只是为了改换衣冠而来谢恩，所献之马也是蹄粗腿肿。既是朝贡之物，竟然是这等货色！依朕看来，定是使臣将马赶到平壤后，将进贡之马卖掉，从中渔利而买了劣马充数。张子温（去年6月，因感谢明太祖准许高丽改换官服而来谢恩之使臣——作者注）因而被朕命人关在锦衣卫关了一年。今年朕将他放回，让他转告高丽掌权大臣：朕已允许两国通商。而高丽人却不是光明正大地前来进行贸易，高丽朝廷偷偷派人来到江苏大仓，侦察我国进行军事动员和制造军舰的情况，重贿那些泄漏与提供我国情报者。这一事实，已是尽人皆知，妇孺皆晓。今后不准再发生类似的事，也不必再派使臣前来。”这份由明太祖亲笔所写的诏书，可以说淋漓尽致地表明了明朝当时对高丽的看法。

这份诏书还谈到了高丽所无法接受的领土问题。它写道：“铁岭以北，原属元朝，并令归之辽东，其余开原、沈阳、信州等处军民，听从复业。”^①

第三节 明朝将铁岭以北纳入版图与高丽的抗议

早在1385年（禡王十一年），高丽禡王曾去郑梦周府邸，与尹桓、李仁任、洪永通、曹敏修、李成林和李穉等一起饮酒。饮至有几分醉意时，君臣谈到了高丽征伐辽东的问题。当时，禡王曾将弓箭交给崔莹，说道：“愿与尔等一起平定四方！”禡王此人，平日虽暴虐无道，荒淫耻，但对北方领土问题则十分关注，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禡王14年2月。参阅《高丽史节要》卷33，禡王14年2月。

态度相当积极。

在明朝设置定辽卫于辽阳之时，池渊曾与当时掌握实权的李仁任和崔莹等一起，讨论过如下问题：究竟是先讨伐倭寇还是先讨伐辽东？当时，李仁任与崔莹均着重于对倭寇的讨伐。池渊说：“倭寇只是骚扰边防而已，对之没有什么可以过多忧虑的。而一旦明朝大军驻屯于定辽卫，要想得到北边领土就难上加难了，要想兴兵攻打辽东也谈何容易？侍中（指李仁任）计策虽好，却非今日为国着想之策。”然而，池渊说服不了当时掌握朝廷实权的李仁任与崔莹，无法促使他们改变其看法与主意。

1387年（禡王十三年）5月，辽东的船舶停泊于西海的几个岛屿。当时，有人奔往善谊门，告众人道：“唐朝（明朝）海军已进入海岸，即将攻打京城。一部分人马已兵临城下！”一传十，十传百。京城的人们一听，无不大惊失色。官府把此人抓起来一审讯，才知他是在造谣。

然而，明朝定辽卫将攻打高丽之说却并非总是被视为谣传。这年6月，李元吉自定辽卫逃回，说道：“定辽卫在检阅军队，即将兴师攻打我国。”禡王一听，赶忙命人整顿军备，移师海岸。^①

西北面都安抚使崔元祉也曾奏报道：“辽东都司派使臣李思敬等前来。他们到达鸭绿江边，张榜道：‘户部顷接圣旨，晓谕铁岭以北与以东和以西原属于开原所辖军人，不论是汉人、女真还是蒙古人，一律归于辽东管辖！’”崔莹一听这样的奏报，连忙与宰相们讨论究竟是出兵讨伐定辽卫，还是与明朝保持友好。当时，所有的宰相都主张还是以与明朝保持友好为上。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禡王13年5月、6月。《高丽史节要》卷32，禡王13年5月。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禡王十一年正月，高丽派赵琳去辽东。然而如前所述，赵琳一到辽东就无法入境，只好空手而归，无法完成其上呈国书并要求与明朝和好的使命。

崔莹见情况有变，便又召集百官，就可否将铁岭以北的土地交给明朝的问题进行协商。结果，百官均认为不能将铁岭以北交与明朝列入其版图。

就在讨论这一问题并取得了共识之时，契长寿于1388年（禡王十四年，明洪武二十一年）8月从明朝京城归国，带来明太祖诏书。这份诏书宣布：明朝与高丽断绝外交关系；不许高丽使臣来往；由于铁岭以北原属元朝，该处归属于明朝（辽东）；开原沈阳和信州等地军民一律视为明朝百姓。

禡王一直在领土问题上持毫不让步的态度，得知明太祖诏书内容之后，立即命令五道修理和加固城池，将所有将帅派到西北面，以便在有事之时采取行动。同时，与一向十分关注北方领土问题的崔莹密议出兵征伐辽东之举。在此之前，崔莹已向禡王提出了兴兵征伐辽东的建议。

高丽在制订征伐定辽卫政策的同时，通过外交通牒向明朝提出抗议。1388年8月，高丽派密直提学朴宜中到明朝，传述了高丽朝廷的主张。禡王的表章写道：“切照铁岭以北，历文高和定威等诸州以至公险岭，自来系是本国之地。”这就是这份表章所提出抗议的前提。紧接着说明了其间的来龙去脉。在辽国的乾统七年（亦即1107年），东女真等大肆作乱，占据咸州以北的土地。高丽睿宗把这种情况报告辽国，请其出兵夺回了这些土地，高丽在咸州和公险镇等地修筑了城池。元初戊午年间，蒙古吉吉大王和普只官人等率军降服女真时，高丽叛徒卓青和赵暉将和州以北土地献给元朝而投降。元朝听说在高丽咸州附近的和州，有金代昔日修筑过的两个小城地基，竟阴差阳错地把和州命名为

双城，任命赵晖为双城总管，卓青为千户，管辖此处百姓。元至正十六年（亦即1356年），经高丽要求，元朝撤销了双城总管和千户等，将和州以北的土地归还高丽。高丽当即任命州县的官吏，管辖其处百姓至今。后虽被侵元丽军均予以平定，该地复又归于高丽。这份表章写道：“今钦见奉铁岭以北以东以西，原属开原，所管军民仍属辽东。铁岭（疆阳与安迅之间）之山，距（高丽）王京仅三百里，公险之镇，限边界非一二年。……遂使数州之地仍为下国之疆，臣谨当益感再造之恩，恒视万年之寿。”^① 总之，这份奏章要求明朝将这几个州归属于高丽。

3月，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走访崔莹，力陈决不可出兵攻打定辽卫，请崔莹打消这一念头。崔莹不仅不听，李子松此后竟被流放于荒岛。这说明禡王与崔莹征伐与收复定辽卫的意志十分坚定，容不得任何人和意见的劝说与制止。

第四节 禡王派兵攻伐定辽卫与李成桂的回师

西北面都巡抚使崔元祉又向高丽朝廷奏报：“辽东都司派两名指挥，率千名士兵来到江界，想成立铁岭卫。明太祖命其部下设置卫和镇抚等机构，属辽东统管。从辽东到铁岭设置七十一个站，每个站都设了百户。”

禡王闻报，仰天泣道：“都怪群臣阻吾攻打辽东，以致事态恶化到了这等地步！”紧接着，他下令征发八个道的军士，并且说：“我于明天去西部巡察，所有大臣一律换上元朝的官服前来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禡王14年2月：“大明欲建铁岭卫，禡遣密直提学朴宜中上表请曰：……。”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送行!”这是高丽从慕华到慕元的转变，也是重大的政策变化。然而，北元的纳哈出已于去年9月向明朝投降，完全臣服于明朝，高丽根本不可能与之结成军事同盟，此举只不过是一种感情上的发泄而已。李成桂等大臣当即进谏道：“明朝使臣即将到达，王如现在就西幸，民心必然动摇，何不等候明朝使臣归之后再西幸？”禡王觉得言之有理，答应暂不西行。

当时，高丽百姓有不少人依然身穿元朝的衣服，发式也保持蒙古式。由于明朝使臣将至，高丽朝廷下令禁止穿戴元朝服，禁止保持元朝发式。

明朝后军都督府终于派辽东百户王得明到高丽，通报铁岭卫业已设置。明朝使臣王得明一回辽东，禡王便命令门下赞成事禹玄宝负责守卫京城，同时下令征发五部的军士，准备出发征伐辽东。

当时，崔莹对明朝采取了强硬立场。在向禡王提出出兵征伐辽东建议之后，将21名带回辽东都司榜文的军人全部处死，将李思敬等5人监禁起来，对之进行严密监视。

4月1日，禡王将李成桂和崔莹叫到宫中，把他自己同崔莹制订的攻伐辽东的计划告诉李成桂，说道：“孤已决定出兵攻伐辽阳，卿等要竭尽全力以求其成。”李成桂当即表示反对，提出了如下的四不可：(1)以小抗大，一不可；(2)夏天出兵，二不可；(3)举国远征，倭寇有机可乘，三不可；(4)时值雨季，弓使不便，传染病多，四不可。然而，崔莹固执己见，向禡王建议：夜长梦多，莫听闲言，赶快出兵！

翌日，禡王召李成桂入宫，斩钉截铁地说：“孤意已定，人马已调集，非打辽东不可！”李成桂无言可对。

又过了一天，禡王去平壤督促各道尽快征集军士，又命令大护军裴矩去监造鸭绿江上的浮桥。命人将业已被处决的林坚味和

廉兴邦等家产用船只运至西京，作为奖励有功军人之用。同时征集京乡之僧人道士参军，抽调轻骑兵驻屯于东江西江，严防倭寇入侵，保护百姓安全。

与此同时，禑任命崔莹为八道都统使、参成府院君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任命沈德符为西京都元帅，李茂为副元帅，王安德为杨广道都元帅，李承源为副元帅。征伐辽东的左右军兵力共有38830名，军役11634名，战马21682匹。

在此之前，崔莹派裴厚到北原，联合女真与蒙古同时夹攻辽东，女真与蒙古表示一定效命。

4月18日，左右军从平壤出发，踏上了攻打定辽卫的征程。这支军队浩浩荡荡，号称10万大军，其势颇为壮观。

这时，有人从泥城前来奏报：“辽东兵全部已去征伐夷狄，城中只有一名指挥和少量军人。大军一到，不必交锋便可使该城投降！”这一情报，令人鼓舞。

三天之后，禑王不再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命令百姓一律穿上胡服（元服）。^①

高丽这次出动10万大军攻打辽东，得到了亡元余孽夹攻明军的许诺，禑王又不再使用明太祖的年号，并下令让全国百姓重又穿上元朝的服装。这一切，旨在使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对明作战，旨在与明军决一死战，以壮国威。

1388年（禑王十四年，明洪武二十一年）5月7日，高丽左右军终于驻屯于鸭绿江心的威化岛。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禑王14年4月丁未、壬戌、乙丑。《高丽史》卷113，列传26，崔莹传：“时亡元余孽……莹遣裴厚，约与为援，夹攻辽东。”当时，崔莹一再向禑王请求道：“殿下回京城去吧！让老臣留在这里指挥契长寿。”禑王说：“先王说过：‘卿去南征，我怎敢一日不与卿同在？’”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5月11日，泥城元帅洪仁桂与江界元帅李蕤首先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与明军打了一仗，而后回到威化岛。禡王为了鼓舞士气，赏赐给了他们一些绸缎。

就这样，高丽的对明作战揭开了序幕。

然而，李成桂这一派将领却提出了回军论，主张立即停止这场对明作战，把军队撤回国内。

5月13日，曹敏修和李成桂这两位都统使向禡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臣等乘木筏流鸭绿江，前面是大川。由于连日下雨，江水猛涨，我军在第一滩即溺死了几百人。第二滩更深，只好驻军于洲中（即威化岛），徒自耗费军粮。从这里到辽东城，一路之上还有许多大江，要想安全渡江，洵非易事。兹将如此不便进军之事写成奏折，托都评议使司旨朴淳奏闻。如果不能得到恩准，洵是诚惶诚恐。大事当前，不能不言。知而不言，是为不忠。臣等怎敢畏斧钺之刑，而坐视不言？”他们的这份奏章还详尽列举了这次征伐辽东在地理上的难处与季节上的不便。

他们的这份奏章接着写道：“以小事大，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如今，我邦得知刘指挥（指明朝定辽卫指挥官刘显）率军成立铁岭卫，便命密直提学朴宜中送去信函，表明我朝的态度，此乃可喜善策。而尚未得到刘指挥的答函，就突然发兵侵犯大国，此举于国于民均有百害而无一利。”李成桂与曹敏修阐明了他们反对攻打辽东的理由，他们认为从战略上着眼也必须赶快停止这场攻伐。其理由是：“暴雨连天，使用弓箭极其不便，而盔甲分外沉重。由于人困马乏，即使勉强冲至对方城下，只要对方的城池防备稍严，就休想打胜仗。勉强攻打，无法攻克。军粮一断，则进退维谷。届时何以收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赶快回军！

崔莹读了李成桂与曹敏修这份建议回军的奏章，心想你们怎

么只是上呈奏章？若有胆量，就该回来当面向禡王直接提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不敢向禡王提出这样的建议，使他扫兴。于是，他在禡王面前还是反对撤回军队。

禡王当即任命宦官金完担任过涉察理使，命令他带着金银财宝和马匹，到军营送给左、右都统使曹敏修和李成桂以及各位元帅，督促他们快快向辽东进军。禡王让金完坐镇军营，代监军督师。

5月22日，左右都统使曹敏修和李成桂派人向崔莹报告：“军士饿死不少，水深难以行军，请允许速速回师！”然而，崔莹与禡王不为所动。

事态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坚决主张回军的李成桂下定了非带领军队回京不可的决心。曹敏修见他真要付诸实施，不免惊惶万分。接着，李成桂召集各位领兵的将军，对他们进行诱导与说服。他说：“倘若我们去侵犯明朝领土，那么，就是触犯了天子，就是犯下了弥天大罪，我们的国家和百姓很快就会遭殃。我已向国王上书劝谏，请求准许回师。而国王不加反省，崔莹老迈昏庸，不听忠言，置我等生死于不顾。我愿与卿等回京面见国王，当面言明祸福，剪除国王身边的佞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他见无人公开反对，便带领军队渡过鸭绿江回军。

此举对李成桂来说，是决定其命运的大事。要么，是一种革命，要么便罪为叛君叛国。

5月24日，漕转使崔有庆飞马向禡王奏报：李成桂带领军队回师。

5月25日，禡王得知大军已至安州，连忙向慈州和泥城下令：“奉命率军攻打辽东的几个将军竟然随意率军回朝，尔等赶快出动军民加以阻止。有功者给予重赏！”

李成桂作为回军的总指挥，见其部下要求加速行军，撵上禡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王奏明情况，连忙加以劝说。他考虑到如果加快回军速度，必然会引发冲突，便让军队稳步行进。

5月28日，禡王在途中听说回军之师已近京城，连忙走捷径回到京城。这时，崔莹命令百官迅速武装起来，对李成桂此举表示抗议。

6月1日，李成桂把部队驻扎在京城近郊，让金完将他的奏章交给禡王。这份奏章写道：恭愍王诚心诚意以小事大，天子（指明太祖）从未有过向我国用兵之念。而今，崔莹身为宰相却昏庸无能，不思以小事大，却想兴兵侵犯上国（即明朝）。尤其是时值盛暑出动大军，竟使全国失农，田地荒芜，而倭寇则得以趁机长驱直入，杀我百姓，烧我国库，使我国不得不迁都于汉阳。如今，举国骚乱不安，如不斩除崔莹，国无宁日，民难安身。

6月3日，回军京都的部队冲进宫阙，抓获与禡王在一起的崔莹，将他流放到高峰县（今高阳）。崔莹亲信宋光美、安沼、赵珪和郑承可等也一一被流配于荒岛。

这年12月，崔莹被诛杀。

崔莹的势力被铲除之后，李成桂掌握了朝廷实权。6月4日，高丽重又使用明朝年号洪武，官员与百姓一律穿明服，禁止再穿胡服。

当时，明朝朝廷听说高丽禡王发兵攻打辽东，便想出兵征伐高丽。明太祖本想亲往宗庙占卜，后得知高丽军队已回师，才悄然作罢。

第五节 李成桂掌握实权与恭让王被废黜

李成桂掌握高丽朝廷实权之后，禑王与继位的昌王地位岌岌可危，实际上已成为傀儡。李穡与契长寿等在外交方面曾为确保王权，进行多么努力，却未能有什么成效。

1388年（禑王十四年，明洪武二十一年）6月4日，禑王在其亲信崔莹被流放之后，曾与80多名宦官一起，带刀箭骑马到李成桂、曹敏修和边安烈的府邸，却因其均不在家，家门口又有军士守卫，而未能如愿以偿。

6月8日，大权在握的李成桂同几位将帅一起，请求禑王将崔莹的女儿亦即宁妃交出。其实，这是李成桂想将崔莹一家斩草除根而特地设下的计策。

禑王说：“如果要我交出宁妃，我愿与她一起离开。”于是，李成桂等几个将领率领军队镇守宫阙，请求禑王去江华岛，实际上则是逼宫，强迫禑王离开王宫。禑王只好说愿意去。他亲手抓住马缰，倚在马鞍上说：“今天天色已晚！”然而，左右无一人垂泪挽留，也无一人说国王不能走。他只好灰溜溜地与宁妃和燕双妃一起向江华岛走去。至此在位14年后被逼退位。^①

李成桂在内心深处决心进行易姓革命，改朝换代建立新朝，而在外表上则表示谦让与拒绝，实际上则按其精心安排的步骤，一步一步接管高丽的政权。

李成桂想在王孙中挑选一人继承王位，而曹敏修回想起李仁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禑王14年6月丙午、庚戌、辛亥。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任荐举自己的恩典，主张拥立王昌为国王。王昌是禡王之子，是李仁任舅表兄李琳之女，亦即谨妃所生。由于两人的看法不一，便都同意征求一下当时著名学者李穡的看法。两人悄悄地请教于李穡，李穡认为拥立前王禡之子才能得民心、顺民意。

1388年6月9日，曹敏修秉承正妃的吩咐，将年方9岁的王昌扶上了王位。^①

正当高丽将军们在国内争权夺利倾轧不已时，明朝又提出了领土问题。当时，密直提学朴宜中从明朝首都归来，带回了明朝礼部的一份文书。它写道：“本礼部奉旨阅览高丽之表章。表章称‘历文高和定咸等诸州以至公险岭，自来系是本国之地’，高丽国王认为该地应当属于高丽。然而，此乃高丽一厢情愿。平心而论，那几州之土地早就属于元朝统治，如今该属辽东。眼下，不能光凭高丽之言就加以轻信，待详细加以考证之后再作决定。”它列举了高丽反复无常、变幻多端的例证，指出了如下五大事项，表示对高丽朝廷极其不满：

第一，高丽每年只需进贡五十匹马，规定了这些马必须是毛色纯粹的骏马。然而，其后进贡的却全部是驽马。第二，所进贡的马，毛色不纯，五彩斓斑，就是拿去市场上进行交易也不会有人问津。第三，派人到明朝的温州、台州、绍州、杭州和苏州，向百姓收集情报，花言巧语进行诓骗，终至原形毕露。第四，来到明朝的高丽使臣狡黠地引诱明朝百姓，使之把金银珠宝卖给这

^① 李成桂决心带兵从威化岛回军时，曾与曹敏修约定，禡是辛旽之子，废黜他之后拥立王氏的后裔登上王位。曹敏修荐举禡王之子王昌继位，李成桂颇为不满，曾提到两人的约定，表示反对。然而，曹敏修借用名儒韩山君李穡之说而我行我素。其实，李成桂见王昌年方9岁，内心倒是很可能赞成其即位。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昌王条序文。《高丽史》卷116，列传29，李琳传。《高丽史》卷126，列传39，奸臣2，曹敏修传。

高 丽 外 交 史

些使臣，进行黑市交易。第五，以前明朝一匹马可以换到两三四高丽马。而今经过高丽哄抬价格，明朝的两、三匹马竟难以换到一匹高丽马。

这份文书列举了中国历代王朝攻打高丽的实例，责怪高丽言而无信。也就是说，汉朝先后十四次征伐朝鲜（高丽），均因高丽（朝鲜）屡次侵犯汉朝之边境，汉朝忍无可忍，终于灭掉了古朝鲜。魏两次征伐高句丽，也因其心怀二心，与吴国勾结，遂占领其京都。晋曾征伐过高句丽一次，为的是它侮慢无礼，遂焚烧其宫阙。隋朝两次征伐朝鲜半岛，是因为它侵略辽西，不守蕃礼，只好以武力使它臣服。唐朝四次出兵征伐，是因为它杀死国王，兄弟争权。唐朝将它平定，设置了九个都督加以治理。辽国四次征伐，也是因为它杀死国王，侵扰他国。辽军只好放火烧毁其宫阙，杀掉乱臣康兆等人。金国第一次征伐，也是由于它杀死使臣，杀死金国人之故。元朝五次进行征伐，则是因为它接受逃亡者，杀害其使臣与官员。这份文书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攻打高丽，均是高丽自取其咎，绝不是中国想占据其领土，想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这份文书还这样写道：“今铁岭之地，王国有辞。其耽罗之岛，昔元世祖牧马之场。今元子孙，来归甚众。朕必不绝元嗣，措诸王于岛上，戍兵数万以卫之，两漕发粮以贍之，以存元之后嗣，使元子孙复优游于海中，岂不然乎？”^①。

由上可知，在明朝朝廷看来，尽管高丽声称铁岭卫原来是高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禡王14年6月：“今铁岭之地……岂不然乎？！”《高丽史节要》卷33，禡王14年6月：“铁岭人户事，祖宗以来，其文和定高等州，本隶高丽，以王所言，其地合隶高丽。以理势言之，其数州之地，曩为元统，今合隶辽东。高丽所言，未可轻信，必待评察然后已。且高丽隔大海，限鸭绿……”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丽的土地，但考虑到该处实际上一直归属元朝统治，便无法完全相信高丽的主张，于是提出这个问题需在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再作决定。明朝朝廷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算是后退了一步。然而，明朝朝廷却提出了济州岛（耽罗）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其耽罗之岛，昔元世祖牧马之场”，要让元朝的后裔加以管理。言下之意，透露出了对耽罗的占有野心。因为，明朝已取代元朝主宰着泱泱中华。

1388年7月，高丽派门下赞成事禹仁烈和政堂文学契长寿到明朝，向明朝朝廷呈上了以禡王名义写的国书。国书谈到崔莹一手遮天想发兵攻伐辽东时，曾有不少将领表示反对，而高丽之所以还是出了兵，禡王负有责任，罪无旁贷。它在说明禡王因有病在身而退位之后写道：“臣之子昌，如蒙恩准其继承王位，洵是幸甚。”

当时，契长寿还以崔莹的独裁势力已在高丽被根绝这一事实为证据，说明当时被崔莹拘禁的李思敬等也被释放。^①

从高丽的情况看来，其时昌王的地位还不巩固，明朝朝廷和明太祖又尚未加以承认。而出任门下侍中的李穡则已窥出李成桂及其亲信正在进行一场易姓革命，而且急于获取明朝对李成桂的好感与信任。于是，李穡和金书密直司事李崇仁与同知密直金士安等，于这年10月到明朝贺正时，虔诚地请求明朝派官吏到高丽监督政务，并准许高丽青年到明朝留学深造。这份要求明廷派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列传50，昌王即位年7月。《高丽史节要》卷33，昌王即位年7月。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洪武21年，亦即1388年）4月，明朝名将蓝玉率领100万大军，进击捕鱼儿每（内蒙古达理伯），大败北元之主脱吉思贴木儿（昭宗之弟）的军队。脱吉思贴木儿逃走，其次子地保奴等64人和故太子必里秃奴及公主等59人被俘，77037名军士也成了俘虏。北元的宝玺和书籍等被蓝玉的部队缴获。

官员到高丽监国的国书写道：“小邦求存，关键在于事大。而天朝怀柔远方，则旨在一个‘监’字。……小邑（指高丽）远在边陲，虽然饱受中华文化惠泽，但在礼仪与风习方面还颇蒙昧，敬请王官（指明朝的官吏）莅临，广布圣化。”要求明廷允许高丽青年去明朝留学的国书写道：“帝王培育人才，旨在搞好新政。让子弟入学，则在于思慕华风。……伏乞陛下谅察臣之向化精诚，允许臣继承先辈之遗志，让小邦年轻一代跻身遵规守矩的班列。”^①

这年11月，高丽又派密直使姜淮伯到明朝，请求让昌王赴天朝朝觐明太祖。1389年（昌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3月，姜淮伯从明朝回到高丽京都，带回明朝礼部奉明太祖之命写的诏书。它写道：“臣子撵走国王，拥立其子，请求让其来天朝朝觐。看来，高丽已是人伦颓毁，全无君道，有了难言之逆谋，故而只好让尔邦之使者归国。再者童子（对昌王的贬称）不必前来，拥立是高丽自身之事，废黜也是高丽自身之事，与中国无关。”很显然，它全盘拒绝了高丽请求。

这年4月，李穡从明朝京都回到高丽的京城。

当时，明太祖有几个儿子。明朝朝廷有意让高丽的名门闺秀与之结成夫妻。

于是，这年6月，高丽派门下评理尹承顺和金书密直司事权近到明朝，一是请求让昌王到明朝朝觐明太祖，二是与明朝有关方面协商明太祖诸皇子的婚事。

9月，昌王明知无法获得明太祖恩准赴明朝朝觐，却依然制订了赴明朝朝觐的计划，确立由领三司洪永通、判门下府使李穡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昌王即位年10月、11月。《高丽史》卷115，列传28，李穡传。《高丽史节要》卷33，昌王即位年10月、11月。

第三十四章 禡王出征辽东与高丽的灭亡

和判三司事契长寿等作为其随行人员。本来，这一行人想即刻启程赴明朝，却因昌王母李氏顾及昌王年纪幼小，在与其亲信商量之后，中止了这次出访。^①

9月，尹承顺和权近等从明朝回到高丽。他们带回的明太祖亲笔国书，充分表明了明朝对高丽的态度。它写道：“高丽国中多事，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为皆非良谋。君位自王氏（指恭愍王）被弑绝嗣，复虽假王氏，以异姓为之，亦非三韩世守之良法。古有弑君之贼……以回天意，以安有众。今高丽陪臣等，阴谋壘诈……礼部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它还提到，高丽如果真有忠臣拥君安民，即使几十年不来朝觐也无妨。倘若做不到，即使年年来朝，又有何用？本年4月间所求之名门闺秀，也不必选来。^②

继昌王之后即位的恭让王，也于1392年7月被李成桂及其助手设下计谋赶下了王位。当时，右侍中裴克廉等对王大妃（恭让王之母）说：“而今国王昏庸，不知为王之道，失去了民心民望，无法维护社稷和保护生灵，敬请将其废黜。”王大妃自知情况不妙，已无法抗拒，只好答应他们的请求。于是，废黜恭让王之事便这样决定了下来。

^① 参阅《高丽史》卷137，昌王元年6月、9月。

^② 参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86，洪武22年8月癸卯：“高丽国复遣使来奏，权国事王昌乞入朝。上不许，谓礼部尚书李原明曰：‘高丽国中多事，陪臣忠逆混淆，所为皆非良谋。君位废立自由，岂三韩世守之道哉？彼既囚其主，来言童子入朝，必有隐谋，不可信也。……尔礼部其谕高丽，使童子不必来朝……’”参阅《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91，洪武23年正月癸未。《高丽史》卷137，列传50，昌王元年9月：“尹承顺、权近还自京师，礼部奉圣旨：‘高丽国中多事，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为皆非良谋。君位自王氏被弑绝嗣，复虽假王氏，以异姓为之，亦非三韩世守之良法。古有弑君之贼……以回天意，以安有众，今高丽陪臣等，阴谋壘诈……礼部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

同旨密直南闵与门下评理郑启熙一起，带着王大妃的教旨进入时坐宫，让右府代言韩尚敬宣读教旨。恭让王不服，要臣子守为臣之道。南闵只好让献纳宋因走到廷院宣读懿旨，走了个过场。

恭让王被废黜后，被放逐于原州，王妃与世子以及几个奴婢与之随行。

恭让王被赶下王位之后，高丽朝廷百官把国玺放在王大妃面前，请她垂帘听政。^①

高丽至此名存实亡。

^① 参阅《高丽史》卷46，恭让王4年7月辛卯。《高丽史》卷114，列传27，池勇奇传。《高丽史》卷116，列传29，南闵传。《高丽史》卷117，列传30，郑梦周：“梦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归心，又知赵浚、南闵、郑道传等有推戴之谋。”《高丽史》卷116，列传29，朴葳传。《高丽史节要》卷35，恭让王4年7月辛卯：“辛卯，王逊于原州，寻移杆城郡，封恭让君。后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后追封恭让王。”参阅《李朝实录》，太祖元年7月丁酉。

后 记

金 龟 春

本书作者卢启铉博士系韩国放送（广播）大学教授，曾任大韩民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曾受聘为延边大学名誉教授。在研究韩国古代外交史方面，可谓大名鼎鼎。

改革开放之后，中韩两国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大大增加。我因而与他相识达十多年之久，其间我认为其大作《高丽外交史》很有译成中文出版的价值，他欣然同意并无偿转让中文版权。同时，我也愉快地接受为他联系翻译出版事宜的委托。经过努力，本书的中译本终于得以问世。

《高丽外交史》是卢启铉先生在长期收集有关高丽外交史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多年呕心沥血取得的成果之一。在韩国，它作为首次问世的这方面的著作，曾引起了史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本书是根据卢启铉先生所著《高丽外交史》1994年韩文版译出的，共有四篇三十四章。

本书以高丽与辽金之间的通交，高丽与蒙元之间的通交、战争、干涉与反干涉、和亲与破裂以及元丽联军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等为历史线索，论述了高丽的北方外交中展开的实利外交、适应外交和事大外交，从而在谋求国家主权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壮大的史实。在对倭和琉球的外交方面，着重论述了高丽根据当时的情况，使用的恩赐、安抚、怀柔和惩戒等外交手段。对于中东、南方、西域等国家和地区主动要求接触时，高丽采取了以恩惠、雅量交涉为主的抚恤外交政策。

基本上忠于历史事实，是本书最突出的优点。作者依据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政治关系为主线，一步步深入而又详尽地阐述了丽蒙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论及了高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从而填补了韩国史学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开拓了丽蒙外交关系研究上的新视角和领域。

有关丽蒙关系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史学界少之又少。所以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蒙元时期蒙元对高丽的对外关系和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国研究有关蒙元对外关系的学者还可以从中看到当前韩国学者的研究动向及其研究方法。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论述有待进一步商榷，有关高丽领土问题等，更是表现了作者的立场，请读者加以鉴别。

这部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卢启铨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多次用传真、电话和写信为我们解决了翻译工作中的难题。他还在百忙之中拨冗撰写了中文版的序言。在此，我仅向卢启铨先生致以由衷的谢忱。担任本书翻译工作的两位译者，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谨在此对两位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水平有限，时间又比较仓促，翻译方面的纰漏在所难免，敬请作者、诸位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予以究谬补正。